

卡尔·马克思

彼·费多谢耶夫等著

卡尔·马克思

〔苏〕彼·费多谢耶夫等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书店

卡尔·马克思

КАРЛ МАРКС. Биография.

Изд. 2-е.

М., Политиздат, 1973.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73年版翻印

卡 尔 · 马 克 思

〔苏〕彼·费多谢耶夫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26印张 634,000字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5,000

书号 11002·529 定价 2.55元

(内部发行)

序 言

v

在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中，卡尔·马克思占有卓绝的地位。他与自己的挚友和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制定了无产阶级争取共产主义胜利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和策略。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天才导师和为他们事业奋斗的伟大战士，作为革命工人运动的思想鼓舞者和卓越的组织者，载入史册。

最先进的真正科学的世界观，人类和最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伟大武器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对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全面深刻的理论论证，是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vi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生和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批工人阶级革命政党的创立，是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工人反对资本压迫的自发运动变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和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的自觉的阶级斗争，是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许多世纪的全部社会思想史上，马克思的科学功绩是无与伦比的。还在马克思青年时期，人们就把他比作普罗米修斯，在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授给人们知识，教给他们各种手艺并给他们带来火种，使他们摆脱饥饿、寒冷和黑暗。普罗米修斯的形象体现

了人类创造性的天才,争取进步、自由和幸福的顽强意志。马克思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从而第一次给劳动人民指出了摆脱社会压迫,为真正人的生活、为每一个人的福利和体力脑力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真正道路和手段。

马克思以前的社会理论照例是有产阶级的理论,它们离开人民群众的利益很远。在阶级社会的整个历史时期,统治的剥削者阶级垄断了教育、科学、艺术和政治活动,而劳动人民则遭受为剥削者进行的强制性体力劳动的摧残并被排斥于政治、教育和文化之外。即使被压迫群众的某些代表人物有时也表述了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观点,但这些观点是不科学的,因为其中至多包含有个别深刻的推测,但是整个说来,对历史发展的进程和前途是不理解的。他们所反映的是一种自发反抗和自发运动的意识形态。

受剥削和受黑暗统治的劳动群众,许多世纪以来为了寻找生路,或者是回到理想化的过去,回到过去的“黄金时代”或者是求救于有关彼岸的阴间生活的宗教神话。在马克思以前已经出现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是在黑暗中徘徊,找不到有科学根据的目标,不了解从资本的统治下获得解放的正确道路。形形色色的社会清谈家和空想家常常用小资产阶级的偏见来玷污工人的意识,用空想的计划把工人引入迷途。正象由于对自然规律的无知而相信灵丹妙药一样,由于对社会生活规律的无知而相信社会领域里的奇迹。

然而,发展着的解放运动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为制定这种理论所需要的一定的物质条件和思想条件也已经成熟了。

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为解决消灭人剥削人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为劳动的解放,创造了现实的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能够解决这一任务的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就是这种力量。

随着封建制度衰亡和资本主义确立而来的革命风暴和工人的大规模发动，把阶级矛盾和迫切的社会问题暴露到不能置之不理的程度。人类的先进思想探索并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反映这些矛盾和问题，寻找对历史提出的这些问题的答案。新世界观的理论前提就这样形成起来了。但是，有产阶级的思想家由于他们的阶级本性，不可能在社会学上有彻底科学的观点，因为对社会生活过程的科学理解是同社会主义分不开的，而社会主义的物质体现者是无产阶级。

当然，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不是脱离以前社会思潮，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在认识自然和社会生活方面所创造的全部优秀成果的合法继承者。马克思主义学说依靠社会思想的全部成就，特别是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社会主义的成就。

这些成就本身并没有对历史过程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解，并没有构成完整的世界观。需要有一种崭新的观点去看待历史，去认识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各个阶级、个别人物和人民群众在其中的作用。这种新观点是由马克思制定的。

马克思批判地考虑到了各种进步社会思想流派所包含的一切合理因素，在工人运动中加以验证，并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对它们进行创造性的改造。

列宁非常明确而深刻地确定了马克思的科学发现对工人阶级，对全体劳动人民的意义。viii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出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①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6页。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利益的科学表现，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揭露，导致资产阶级社会必然灭亡的结论，而工人运动勇往直前的发展则表明：正是无产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对社会关系发展过程的深刻分析，认识到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它是能够根本改造社会关系，消灭人剥削人现象并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力量。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是由它本身的生活地位决定的。无产阶级只有把全体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剥削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才能解放自己。马克思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崇高的人道目标，这个斗争的使命是使劳动者摆脱资产阶级社会中非人的生存条件。

由此可见，共产主义不是空想家的愿望，而是现实的历史运动，这是已由科学分析证明的真理。从十九世纪以来，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已成为历史规律。关于马克思在揭示这个规律和用共产主义教育群众方面的作用，社会主义时代的杰出诗人弗·弗·马雅柯夫斯基表述得好：

“我们还以为——

这是偶然事件的波浪

旋转着，

把我们

投向

共产主义的

港湾。

马克思

发现了

历史的规律，

让无产阶级

来掌舵。

马克思的书

不是排版的活字盘，

ix

也不是枯燥无味的

一行一行的数字——

马克思

使工人

站起来，

使他们

排成

比数字还要整齐的队伍。”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论证了工人阶级的革命世界观，群众运动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了科学的思想体系以代替宗教幻想和乌托邦空想。

马克思是伟大的学者，同时而且首先是热情的革命家。他最重视科学，认为它是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他生活的主要目的和最高理想，就是帮助工人运动组织起来并促进推翻资本主义、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革命斗争。他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中许多重要创举的倡导者和灵魂，也是许多主要历史事件的参加者。马克思在发展世界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方面的功绩是伟大的。在他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领袖的全部活动中，国际主义是神圣的旗帜和指导原则。

马克思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者的活动，开创了人民群众

① 《马雅柯夫斯基选集》第3卷第380页。

解放斗争历史的新篇章。马克思在各方面都是革新者，他在这里也作出了理论和实践辩证统一的榜样。他的活动反映了群众及其领导人的利益的有机结合。在欧洲工人面前，马克思不是一个向群众传播预言的先知，而是使科学为被压迫者服务并把科学变为群众自己手中的武器的学者。由于马克思同工人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对运动的各种形式有深刻了解，他成了先进工人的良好愿望、国际无产阶级的社会意识的真正体现者。

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历史，整个世界革命过程的发展以及一些国家革命斗争的成败，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为指导的党，才能完成先进战士的作用。还在俄国工人运动的初期，列宁就非常确切地表述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的本质：“这一理论对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具有不可遏止的吸引力，就在于它把严格的和高度的科学性（它是社会科学的最新成就）和革命性结合起来，并且不是偶然地结合起来（即不仅因为学说的创始人本人兼有学者和革命家的品质），而是把二者内在地和不可分割地结合在这个理论本身中。”^①

严格的、科学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的统一——这是共产主义的动力。没有革命的实践，不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付诸实现，理论就会变成一堆陈旧的教条，变成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防空洞。另一方面，没有科学，对社会发展过程没有严格的科学的认识，革命性就会蜕变成冒险主义，走向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的一生和他的活动，是高度的科学性和革命热忱的典范。

* * *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81页。

卡尔·马克思的生活历程是艰苦的，但是他并没有寻找轻松的道路。他首先是一个战士。争取劳动者的自由和幸福，反对剥削者及其走狗，是他生活的使命。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独自同专制制度、黑暗势力、政治和社会压迫进行斗争。他毕生从未放下过手中无情批判的武器，他反对错误思想、虚伪口号和假科学理论，反对因循守旧、伪善、懦怯，不断向统治阶级及其思想家和政客挑战。

马克思虽然出身于有产阶级，但放弃了在大学任职的锦绣前程，放弃了大有成就的学者或时髦作家的舒适生活，选择了政治流亡者的艰苦命运。他背井离乡，被迫离开祖国，使自己 and 妻子儿女过着漂泊贫困的生活，遭受警察的迫害。

过度繁重的劳动和极为艰苦的、多灾多难的生活条件，使马克思经常生病，疾病过早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不过，他幸福地看到了他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最初成果在生前就得到了公认，他为工人建树了不朽功勋，博得了他们的热爱。

本书的目的是叙述卡尔·马克思的艰苦奋斗的光辉的一生。

马克思的才干是多方面的。最伟大的学者、科学真理的孜孜 xi 不倦的探索者和最早发现者，热忱的革命代言人，英明的无产阶级战略家和策略家，无产阶级群众解放斗争的领导者，这些素质都有机地融合在他的身上。马克思具有高尚的人的品质——朴实，诚恳，乐观，刚毅的意志和非凡的才能，无畏和勇敢。在传记中把这一切都反映出来，是个极其艰巨的任务。

最早打算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撰写传记的是他的伟大的战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恩格斯写过几篇出色的关于马克思的传记性的文章和许多阐明马克思在各个时期的活动的文章。为他的朋友撰写一部更详尽的传记，特别是反映马克思在国际中的作用，曾经是恩格斯晚年的宿愿。可惜恩格斯的这个愿望未能

实现。

1914年列宁为格拉纳特百科辞典写了马克思传略。列宁在这篇简要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章中，不仅通俗而又非常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生平的重要阶段，而且阐述了他的学说的实质。列宁写的这个传略是撰写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传记，创造性地反映他的生活道路和他的学说发展的典范。

1918年，著名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代表、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弗兰茨·梅林撰写的《马克思传》出版了，梅林的著作是多年研究的成果。这部著作因内容丰富和文笔优美而享有盛名。但是，梅林不知道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样一些重要著作，许多传记材料也不清楚。

梅林的著作出版之后，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有成效地研究了马克思生平和活动的各个阶段，他的科学著述的各种问题。近年来又有试图用传记体裁来概括已积累起来的材料的作法。已经出版的有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奥·科尔纽撰写的多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传的头几卷，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集体编写的马克思的传记以及其他专题著作。

那些伪造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历史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和改良主义思想家写了许多著作阐述马克思的生活和活动。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创始人的传记已成为思想斗争的主要对象之一，特别是最近几年。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企图把青年马克思和成熟的马克思对立起来，竭力在他的学说中寻找矛盾。反共分子特别热衷于编造谎言，似乎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似乎历史的发展并不符合他的预见。

科学地阐明马克思的生活道路和他的学说的历史命运，阐明他的思想对世界发展进程的巨大作用，阐明这些思想在国际工人

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胜利以及在社会主义制度，首先在苏联后来在其他一系列国家中取得胜利的作用，都是对反共分子和假社会主义者的这一切胡言乱语的坚决驳斥。

科学的传记应当依据文献和经过严格核对的历史事实，应当把思想和它的影响，把理论和实践活动加以对比。这种对比很好地表明，马克思主义已为生活和整个历史进程所检验和证实。

这部马克思传使用的资料首先是已经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集、《早期著作选》、《马克思恩格斯文库》和其他单行本（如《印度史编年摘录》、《数学手稿》等）中的著作和书信。

现在马克思主义史和工人运动史的史料来源大大扩大了。譬如说，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三十九卷中，就有四百多篇著作和六百多封书信是第一版中没有收入的。这些著作的绝大部分是第一次提供给学术界使用。有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的传记材料发表在各卷的附录里。

此外，还吸收了尚未发表的马克思著作中内容丰富的资料：《资本论》第一稿，大量写着提纲和摘录的笔记，个人藏书上的批注。这就使我们有可能深入了解马克思内在的创作活动，确知他的科学兴趣和范围，对某些尚未实现的科学的和写作的设想获得更完整的概念。保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馆的其他文件，如马克思家庭成员的材料，恩格斯的手稿，工人运动和民主主义运动活动家给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大批书信，以及这些活动家之间来往的有关马克思的珍贵材料的书信，都是马克思传的重要材料来源。

同时代人的回忆清晰地描绘出马克思作为学者和战士的面貌。写作这部传记时自然也利用了回忆录。 xiii

在十九世纪各种工人组织的文件里，能够说明马克思在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方面的各种活动的材料特别多。必须注意到的

不仅是那些已经公布的文件(国际总委员会的记录、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其他文件汇编)还有那些现在尚未公布的文件。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以及和马克思有密切联系的各国工人阶级组织的活动家的私人收藏,对这项研究工作有一定的价值。我们还利用了普鲁士、比利时和法国的警察机关的档案。

马克思同时代的期刊是一批特殊的资料。不仅需要研究马克思编辑的或者直接撰稿的刊物,而且还要研究资产阶级报刊杂志,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对马克思活动的反映或对他的著作的评论。

列宁的著作,特别是他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作者的最重要的参考书和宝贵的方法论指南。

在苏联共产党和各马列主义兄弟党的文件中,对本书涉及的理论问题、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作了科学的解释,这些文件是写作组的依据。

苏联国内外出版的所有关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有些意义的学术著作,特别是那些有珍贵文献资料的著作,也都注意到了。

* * *

本书第二版作了一些修改和订正,吸收了本书出版以后在苏联和国外报刊上所发表的评论中的意见,满足了把本书从俄文翻译成其他语言时所提出的一些要求。根据第一版出版以来发现的新文件和材料作了许多修订和增补。修订时写作组尽量利用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在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补卷工作中已经取得的成果。

马克思传第二版附有人名和期刊索引(奥夫夏尼科娃编)。奇基列娃参加了原稿付排的准备工作的。

写作组谨向对本书第一版和第二版给以帮助的所有同志、科学团体和机关表示感谢，特别是对那些读过本书原稿并在本书准备出版过程中提出宝贵意见的同志以及对本书的出版发表意见和评论的同志表示感谢。

目 录

序 言	11—21
第 一 章 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1—53
童年和青年时代	4
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时代	8
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黑格尔派小组	13
博士论文	17
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21
开始政治活动。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制的 论文	23
《莱茵报》的撰稿人和编辑	25
马克思政论文章中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27
同“自由人”的冲突	33
《莱茵报》被查封	34
在克罗茨纳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 历史笔记	38
准备出版《德法年鉴》。迁居巴黎	44
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46
伟大友谊的序幕	49
同时代人对《德法年鉴》的评价	52
第 二 章 开始制订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原理	54—86

与卢格决裂	54
1844 年马克思在巴黎	55
科学研究工作	61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63
为《前进报》撰稿	70
历史性会见	73
准备和恩格斯一起反对青年黑格尔派	74
《神圣家族》	77
驱逐出巴黎	85
 第 三 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	87—123
在布鲁塞尔	87
恩格斯的到来。新的哲学著作的构思	90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93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在报刊上发表 文章	95
第一批拥护者	96
旅游英国	100
批判地研究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文献	103
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108
完成社会观点上的革命变革	112
主要是自己弄清问题	122
 第 四 章 开始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制定国际 工人运动的纲领	124—188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126
同魏特林决裂	129
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132

同蒲鲁东的分歧	136
《哲学的贫困》	140
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147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	151
《雇佣劳动与资本》	153
为创办刊物而斗争	157
在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	161
同海因岑的论战	163
为团结革命力量而斗争	168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172
代表大会以后	176
撰写《共产党宣言》	178
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180
第 五 章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	189—268
欧洲革命开始。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	189
马克思在巴黎。反对“革命输出”计划的斗争	193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194
在革命德国活动的开始	197
反对哥特沙克和波尔恩的立场	199
民主运动中的无产阶级一翼	202
《新莱茵报》总编辑	204
争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的斗争	208
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斗争。《新莱茵报》在外交 政策上的立场	213
巴黎六月起义	216
无产阶级的革命机关报	217

反对反革命的进攻。马克思在科伦工人联合会 和民主协会的活动	219
去柏林和维也纳旅行	223
德国的九月危机	226
维也纳十月起义	230
在反对普鲁士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中	233
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初步总结和前景	239
争取民主力量的统一	242
两个审判案	244
马克思在 1849 年 2—3 月	248
建立一个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步骤	250
《新莱茵报》和匈牙利、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255
莱茵地区起义的失败。《新莱茵报》停刊	257
在德国西南部	261
重返巴黎。六月十三日	263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考验	267
第 六 章 总结革命的教训	269—317
在伦敦的最初几个月	269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272
《法兰西阶级斗争》	274
为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而斗争。三月的《中央 委员会告同盟书》	280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285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的评论文章	287
国际述评。对革命前途的估计	290
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斗争	292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两个朋友的通信	296
对蒲鲁东进一步反击的计划	298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300
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判。抨击性小册子	
《流亡中的大人物》	306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308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建党斗争的新形式	315
第七章 在反动年代	318—385
在反动和贫困的压迫下	318
马克思在家庭中	322
经过患难考验的友谊	326
经济学研究	328
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	333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维护德国工人中的革命	
传统	339
马克思和五十年代的宪章派	342
同美国工人运动的联系	345
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报刊撰稿	347
政论家马克思	352
关于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	354
同欧洲大陆上的反动制度进行斗争	357
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	361
批判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	368
在东方问题上的革命策略。对克里木战争的	
态度	370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375

《革命的西班牙》	381
迎接新的战斗	383
第八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决定性	
阶段	386—411
关于 1857 年经济危机的论文	386
一系列新的经济学手稿的写作	389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	391
1857—1858 年的一组主要手稿	396
付印新的经济学著作的准备工作	401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402
马克思和达尔文	407
第九章 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新高涨	
《人民报》	414
主张以革命的途径统一意大利	415
加里波第运动	418
争取德国统一斗争的策略	420
同拉萨尔的分歧	422
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428
燕妮·马克思患病	431
荷兰和德国之行	433
维护布朗基	435
马克思和俄国的社会变革	437
为《新闻报》撰稿	440
美国内战。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	442
英国工人支持北部各州的运动	448
马克思对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的态度	449

写作关于波兰的小册子	453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457
失去一位朋友	458
马克思和全德工人联合会	459
在走向国际的道路上	463
第十章 《资本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466—530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	466
1861—1863 年的经济学手稿	467
1863—1865 年的经济学手稿	469
《资本论》第一卷准备付印和问世	471
《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	477
《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	479
作者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法文版	480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	482
资本的生产过程	489
资本的流通过程	495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500
《剩余价值理论》	506
《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问题	511
《资本论》的方法及其普遍的科学意义	516
第十一章 第一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	531—597
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大会	531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532
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	536
走向群众的道路	539
德国通讯书记	545

波兰问题	548
在扎耳特博默耳休息	549
在 1865 年伦敦代表会议上	551
国际的支部在德国的建立。普奥战争和德国	
工人阶级	554
国际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纲领	556
同英国工联领导人的分歧。爱尔兰问题	561
为国际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斗争	566
战争与和平问题	570
第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诞生	574
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的开始	578
巴塞尔代表大会。国际在农民问题上的策略	584
爱尔兰问题的国际意义	585
总委员会俄国通讯书记	589
第二帝国的危机和欧洲革命的前景	594
第十二章 巴黎公社	598—625
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	598
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600
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制定革命策略	601
第二帝国的覆灭。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	
宣言	604
为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而斗争	606
三月十八日革命	609
同公社社员的关系	612
支援公社的运动	614
分析公社的活动。起草总委员会的宣言	618

《法兰西内战》	619
第十三章 为国际的思想纯洁性而斗争	626—658
筹备伦敦代表会议	626
国际历史上的里程碑	629
争取承认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的斗争	633
加紧同巴枯宁分子的斗争。《所谓国际内部的 分裂》	634
反对改良主义	638
同公社流亡者的联系	642
迎接海牙代表大会	643
海牙代表大会	645
代表大会之后。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	650
国际的最后一年	652
国际工人协会停止活动	656
第十四章 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659—697
七十年代中期	661
踏着父亲的足迹	667
就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问题与无政府主义者的 论战	671
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	674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导师	681
《哥达纲领批判》	687
参与《反杜林论》的写作	693
第十五章 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马克思和革命的俄国	698—777

最后几年的理论研究	698
研究世界史	705
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715
反对俾斯麦的非常法。对机会主义的批判	718
对创建法国工人党的贡献	728
英国社会主义宣传的新阶段	738
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景	742
对改革后的俄国发展的分析	747
对俄国革命的殷切希望	754
俄国革命家的顾问和朋友	757
重大的损失。病情恶化	768
1883 年 3 月 14 日	772

人名索引	778—802
------------	---------

期刊索引	803—806
------------	---------

第一章

走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

1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我们就不会被它的重负所压倒……”^①

马克思

马克思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德国经济和政治最发达的莱茵省度过的。莱茵省比德国其他地区更多地受到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影响。莱茵河流域是当年革命军队采取军事行动，农民举行起义，以及受雅各宾党的自由、平等和博爱思想鼓舞的德国民主主义者进行活动的场所。法国人胜利后，莱茵河左岸并入法兰西共和国，后属拿破仑帝国。在这里基本上废除了封建制度：消灭了大地主和教会的土地占有制、取消了封建特权、实行了陪审制²和资产阶级的《拿破仑法典》，因而推动了这一地区工业的发展。

根据 1815 年维也纳会议的决议，莱茵省的大部转归普鲁士，成为这个封建专制制度占统治地位的大德意志邦的莱茵省。容克地主（有领地的贵族）保持了自己的绝大部分特权。从这个特权等级中产生了普鲁士有权势的官僚上层和崇拜军国主义的军官集团。没有全国性的代议机关。省议会只有发言权，代表资格的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1958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 49 页。

级原则严重地损害了资产阶级在省议会中的权利。例如，在莱茵省议会，约有十万居民的亚琛和科伦这两个大城市只有三名代表，可是六千五百二十个贵族却有二十五名代表。

在经济发展方面，普鲁士远远落后于英国和法国。虽然工业有发展，但它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无产阶级人数不多，也很不成熟。居民的主要部分是对大土地占有者有半封建依附关系的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商人）。

尽管如此，德国在工业上还是有进步的。各地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的基地，开办工厂和矿井，从 1835 年开始修筑铁路。莱茵省比普鲁士其他地区，甚至比工业发达的地区还要领先。这里的封建主义基础被摧毁得相当彻底，以致普鲁士政府无法完全取消法国革命的成果，尤其是不能用普鲁士法来代替《拿破仑法典》。但是，莱茵资产阶级还是受到莱茵省也已经推行的警察专制制度的束缚。莱茵资产阶级对于不能使他们在外国竞争面前得到足够保护的普鲁士政府的赋税和关税政策不满，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普鲁士和整个德国资产阶级集团反对派的情绪。

- 3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莱茵省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是全德国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所发生的社会进程的反映。到处都可以看到，要求消灭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封建残余并为资本主义扫清自由道路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决条件正在日益成熟，这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做到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分散状态，是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由于德国有三十八个邦，每个邦都有自己的关税、货币单位和度量衡制度，这就严重地阻碍了经济的发展。1834 年普鲁士为了对抗它在争夺德国霸权斗争中的对手奥地利，成立了以它为首的十八个邦的关税同盟，这仅仅是克服经济上的分散状态的第一步。德国各小邦的统治者紧紧抓住自己政权和特权，激烈反对任何形式的进步。一个有权势的

大公曾声明说：“我不愿意在我的这个邦里有铁路，我不想让任何一个鞋匠和裁缝行走得和我一样快。”

国内进步力量的主要注意力都集中在德国统一问题上。1830年的法国资产阶级七月革命在德国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间激起了反政府的情绪。但是，德国资产阶级是不坚定的，容易同地主集团妥协，而这一点并不仅仅是由于它在经济上比较软弱。在资产阶级背后已经出现一股新的社会力量，即工人阶级，资产阶级已经感到工人阶级是自己未来的敌人。诚然，德国工人运动不过是刚刚兴起。

同时，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法国和英国，无产阶级已作为资本家阶级的对抗者，作为在客观上与资产阶级社会相敌对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日益发展的工业革命，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向以机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转变，给劳动人民带来贫困，给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带来破产，给那些在资本主义工厂中遭受残酷剥削的工人带来无数的苦难。新的机器排挤了成千上百的工人，造成失业。1825年以来震撼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危机，使这些灾难更加深重。

同时，大机器生产的出现使无产阶级群众都集中到工厂里，促进了他们的团结，使原来的手工业者逐渐摆脱他们的小资产阶级心理状态，不再幻想重新成为独立的业主了。在阶级意识的觉醒过程中，工人们不象过去那样，已经懂得他们的敌人不是机器，而是工厂主本身以及一切享有特权的有产阶级。工人们联合起来⁴反抗压迫的要求日益强烈，最初是按行业联合，后来规模更大，出现了第一批工人组织：工会（英国工联），互助会。

在1831年和1834年，在法国的大工业中心里昂爆发了无产阶级起义。里昂纺织工人战斗在街垒里，他们的旗帜上写着“不是

劳动而生，就是战斗而死！”起义很快被镇压下去，但却把资产阶级吓得要死。1831年12月8日政府的《辩论日报》就已经对第一次起义作了这样描述：“里昂起义揭开了一个重要的秘密：社会上有产阶级和一无所有的阶级之间发生了内部斗争。”三十年代后期，英国爆发了工人阶级的第一个有组织的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它的参加者要求通过人民宪章（“宪章派”运动的名称由此而来），人民宪章有六项要求，其中主要一条是实行普选权，因为宪章派认为政治斗争是改善工人群众处境的手段。

人民群众对剥削的自发反抗，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很早就产生了建立一种比较公正的社会制度的理想。空想社会主义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十九世纪初的三位天才思想家，昂·圣西门、沙·傅立叶和罗·欧文创立了古典形式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们的著作尖锐地一针见血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祸害和弊病，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许多特征作了天才的猜测。过了许多年以后，在1874年，恩格斯写道：科学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①。

童年和青年时代

卡尔·亨利希·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诞生在特利尔城的一个律师亨利希·马克思的家里。当时他家住在布吕肯巷664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301页。

号的一幢两层楼房里，这房子至今还保留着（现在是布吕肯大街10号）。两年之后，全家搬到西梅翁大街上的另一幢房子里，马克思在那里一直住到1835年离开特利尔。

莱茵河支流摩塞尔河岸边的特利尔城，是德国的一座古老的⁵城市。在中世纪，这座城市是教会大公国的首都，特利尔大主教的府邸的所在地。后来，它已经不象莱茵河沿岸的其他城市（科伦、杜塞尔多夫等）那样重要，但仍然是普鲁士莱茵省的中心区域之一。当时特利尔的居民差不多达到一万五千人，但是，宁静的特利尔也脱离不了席卷整个德国的社会运动。在这里，过着悲惨生活的城市贫民和少数富裕市民之间同样形成了鲜明的社会对照。社会主义的理论已经在特利尔响起了回声。在二十至三十年代，德国第一批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路德维希·加尔在这里出版了自己的小册子。

卡尔·马克思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他学识渊博，对十八世纪先进思想家的著作非常熟悉。卢梭和伏尔泰的著作已成为特利尔的这位律师的经常性读物，在他的藏书中还有革命作家托·倍恩的著作《人的权利》。他对洛克、莱布尼茨、莱辛的著作也很熟悉。这位在高等上诉法院担任律师的有才能的法学家在他的同行中是很受尊敬的。根据马克思本人后来的追述，他的父亲“以自己的纯洁品格和法学才能出众”^①。

亨利希·马克思的政治观点总的来说并未超出自由主义的范畴，但是，就连这一点也引起了普鲁士当局的怀疑。1834年1月18日，在卡集诺大厅为莱茵省议会议员举行的一次庆祝宴会上，亨利希·马克思发表了一篇为代议制辩护的演说以后，竟然引起了警察对他的注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99页。

亨利希·马克思曾经接受启蒙思想，虽然出身于一个拉比的家庭，但在宗教问题上持有相当自由的思想。他对宗教的具体形式和正统的教义都十分不感兴趣。在卡尔诞生前不久，他放弃了犹太教，改信路德教，采取这一步骤是因为当时在德国犹太人是受限制的。后来，他的妻子和子女也都受洗了。

亨利希·马克思对儿子非常温存，不断地关怀着他的思想成长。

卡尔对父亲的感情也很深厚。这种情感，即使父子之间在观点上和人生观上出现分歧的时候，也不曾减弱。马克思一生始终对父亲保持着崇高的敬意，他父亲的一张用老式银板照像法照的像片一直带在他的身边。当马克思逝世的时候，恩格斯就把这张像片装进他的棺内。

马克思的母亲罕丽达·普勒斯堡是荷兰人。她是九个孩子的母亲，主要操持家务。她的精神世界是狭窄的，她没有象马克思的父亲那样成为儿子的知心人。马克思有三个兄弟和五个姊妹；他的兄弟早已去世，只有三个姊妹，姐姐索菲娅和妹妹艾米莉、路易莎比他活得长久。

卡尔是全家最喜爱的人。他聪明机智，游戏时富有创造性，能有声有色地讲述和编造各种想象的故事和童话，这就使他成为童年伙伴的中心。他的女儿爱琳娜后来回忆说，她常常听姑母讲，卡尔对他的姊妹的影响是很大的。

1830年马克思进入特利尔中学，他学习很好，尽管成绩并不出众，但是，在需要学生创造性地发挥独立思考能力的地方，年轻的马克思总是名列前茅。他的中学毕业证书表明，他的作文有丰富的思想，对事物有深刻的理解，在古代语言（拉丁语和希腊语）学习方面，他能流利地、有把握地讲解古典作品，首先是那些“与其说在语言特点上，不如说在思想实质和总的联系上有困难的部

分”^①。马克思对数学掌握得也很好。同学们喜欢他，但又惧怕他那尖刻的语言和讽刺的诗句，因为他用这些嘲笑过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马克思有幸遇到一些好的教师。那时，特利尔中学校长是约翰·维滕巴赫，他是当时最有学识的教育家之一，在学校讲授历史和哲学。德国和法国启蒙思想对他的世界观有强烈的影响。这个具有自由主义精神的人认为，必须教育青年对“进步和高尚品德抱有崇高的信仰”。当然，维滕巴赫不会受到普鲁士当局的信任，在晚年甚至受到警察的监视。数学和物理教师约翰·施泰因宁格尔被当局认为是唯物主义的信徒，对他的“爱国主义情绪”表示怀疑。

特利尔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立中学的厚墙没有把学生们同外界沸腾的生活隔绝开来。1833年在这个中学里发现了被查禁⁷的著作以及反政府的讽刺诗，一名学生被逮捕。

那时，马克思已经开始憎恨一切反动的东西。1835年秋，在他毕业的时候，他示威性地拒绝对教员勒尔斯作告别访问，此人以反动观点出名，并被任命为副校长，专门对这个中学进行政治监视。

马克思在1835年8月写的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是表明他当时精神面貌的一份重要文件。青年马克思在论文里谈到必须选择一个能为人类进行的活动开辟最广阔场所的职业。他了解，这样的选择并非易事。人并不总是能选择到合意的职业，因为“我们在社会中的关系，早在我们能对它施加一定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被确定了”^②。但是，这篇论文热情洋溢地发出一个音调：不要局限在狭隘的利己主义的框子里，而要寻找为人们服务的道路和手段。“如果一个人只是为自己而劳动，他也许能成为有名的学者、伟大的贤人、优秀的诗人，但他永远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年俄文第1版第1卷第4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195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47页。

能成为一个真正完美的伟人。”青年马克思写道，如果一个人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劳动的职业，那时，他所感受到的就不是毫无意义的、有限的、利己主义的欢乐，而他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①。

从这篇论文中可以看到，十八世纪启蒙学者的思想，他们关于人的使命是寻求普遍幸福这种深刻信念、关于人依赖于周围环境这一学说，对马克思发生了影响。固然，青年马克思的热爱自由的人道主义的热情还是相当模糊的，但是他与统治着当时德国的反动制度的冲突、他的勤奋好学，推动了他继续向前迈进。

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时代

亨利希·马克思对卡尔寄托很大的希望。他想把卡尔培养成为一个学者。他写信给儿子说：“无论对你的个人幸福和你的家庭幸福来说，或者，如果我的预感没有欺骗我的话，对全人类的幸福来说，你还得走漫长的生活道路。”^②

- 8 1835年10月，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研究法学，以青年时代的全部热情埋头学习。他的父亲甚至不得不写信劝儿子不要因为过于勤奋而损害自己的身体。马克思选了好几门课程，购买大批书籍，特别是历史书。除了专业课程外，他还听有关希腊和罗马的神话、荷马的作品和现代艺术史的讲座。他抱着激情的幻想和强烈的创作欲望，亲自在文学艺术方面初试锋芒：他写诗，加入大学的诗人小组，这个小组与哥丁根大学的诗人小组有通信往来。

波恩大学的学生同德国其他大学的学生一样，组织了同乡会。马克思参加了特利尔同乡会，并被选入它的理事会。在保留下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1958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版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下册第196页。

的一幅石版画上有这个同乡会的会员，其中就有青年马克思：一头浓密蓬松的黑发，一副严肃沉思的面容……

大学时代的马克思，当然要重新考虑中学和部分是家庭给他灌输的那些传统观念。这些考虑看来已经反映在他给父亲写的那些尚未找到的信里。亨利希·马克思在对其中一封信的回信中——很明显，试图解决儿子对宗教能否成为道德基础这个问题的重大怀疑——写道：“你知道，我从来不是狂信者。但是，每一个人迟早会感到对这种信仰的需要……”为了坚持他的论据，他还向儿子举了信仰神的大科学家牛顿和莱布尼茨作为例子^①。但是，列举权威也动摇不了马克思的批判的头脑。

在波恩，马克思只学了两个学期，后来，他按照父亲的建议，决定转到有许多法学权威任教的柏林大学继续攻读法学。

在去柏林以前，马克思在家乡度过了1836年的暑假。在这期间，他同他童年时期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了婚。燕妮是政府枢密顾问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的女儿，生于1814年，出身于贵族家庭。她的祖父是一名出色的军人，不伦瑞克公爵的顾问，娶了苏格兰名门望族的女儿。然而，燕妮的父亲却不象他家族的某些成员其中包括大儿子斐迪南（燕妮的异母长兄，后来的普鲁士大臣）那样具有贵族的傲慢和优越感。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同这位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平民”亨利希·马克思有很好的友谊，也很喜欢他的儿子。正是他第一次向青年马克思介绍了圣西门的学说。卡尔·马克思非常喜欢特利尔的这位枢密官，把他看成是自己的导师，后来，把自己的博士论文献给了他。燕妮的母亲卡洛琳·冯·威斯特华伦出身于官僚家庭，真挚纯朴，待人热心。两个小一点的孩子燕妮和埃德加尔（马克思中学时期的同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下册第186页。

和朋友)没有等级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父母的影响。

燕妮聪明伶俐,很有教养,以特利尔城的第一美人和舞会皇后闻名(过了许多年,马克思从特利尔给她的信中写道:“作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①),但是她毫不犹豫地毅然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同一个既不富裕也非名门的青年大学生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拒绝许多和她同属一个等级的提出了“有利”条件的求婚者。

马克思和燕妮还在童年时期就互相爱慕。这种感情与日俱增,发展成炽烈的爱情。一个热情奔放、感情充沛的青年同心地善良、有着罕见的女性品行和魅力的少女之所以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彼此情投意合,而且因为他们在精神需求上相近。燕妮十分钦佩马克思的天资和才华,力求在各方面都能配得上她的卡尔。马克思十分敬仰自己挑选的爱人,象大多数恋人一样,试图用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他为燕妮写了许多诗。他的诗象所有新手写的诗一样,也有无数的感叹和过分的夸张,后来马克思本人谈到这一点也感到可笑。但是,他也写了一些反映他的感情深处的动人的抒情诗篇。

“我被紧紧地缚住,
我眼睛却看得清楚,
现在我才发现,
什么是我的朦胧追求。

我的心灵被命运驱使,
我不能希求的东西,
只因你看我一眼,
它就钻进我的心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40页。

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订婚的事，有一段时间是瞒着燕妮的亲属的，因为担心这些亲属会反对他们的婚姻。燕妮为了争得同自己心爱的人结合的权利，不得不同贵族亲友们进行艰 10 苦的长期的斗争。马克思和燕妮订婚七年后才结婚。在这期间发生了许多变故：曾热烈赞同卡尔的选择的亨利希·马克思于 1838 年去世了，象对儿子一样对待卡尔的路德维希·冯·威斯特华伦也在 1842 年与世长辞了。

1836 年 10 月，马克思到柏林，入柏林大学法律系。在普鲁士君主国的首都，马克思亲身接触了当时德国现实中的许多尖锐矛盾——容克地主飞扬跋扈，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没有平等权利，广大人民群众贫困交加。柏林大学的教授中有许多著名的学者。不久以前，黑格尔在这里讲授哲学；在法律系讲课的是持有进步观点的德国最著名的法学家之一爱·甘斯。马克思听甘斯的课并且被他评定为“最勤奋的”。马克思很可能也参加了 1838 年大学生在甘斯住宅附近为祝贺这位教授生日而组织的游行。这次游行引起了警察的注意。

在柏林，最初一段时间马克思的生活是孤独的。在这里，他学习比在波恩大学还要勤奋。后来，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来到柏林之后，我同所有先前认识的人断绝了联系，勉强作了几次拜访，我打算埋头于科学和艺术。”^①除了献给燕妮的三本十四行诗和其他体裁的诗以外，他还写了相当数量的诗歌、叙事诗、抒情诗、嘲讽诗，这些都是这种努力的成果的一部分。

青年马克思的许多诗篇贯穿着由革命浪漫主义引起的反抗精神，他还试写剧本（悲剧诗《乌兰涅姆》），甚至写讽刺小说（《斯考尔皮昂和菲利克斯》），但是全都没有最后写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 年俄文版第 7 页。

青年马克思的诗作没有多大艺术价值。他本人对自己的文学作品也持自我批评的态度，认为它们唯一的长处是表现了某些热忱的情感。他以这种风格写的全部诗作只有《狂歌》于1841年发表在《雅典神殿》杂志上，但是，这些作品作为传记材料还是很有意义¹¹的。从这些诗篇看到了一个不满现实、力求积极参与活动和斗争的青年人的形象。他还不知道如何行动，但整个说来，已经初步意识到不能苟且偷安，不能听候命运摆布，不能走别人走出来的道路。

“我再不能安静地生活，
心灵已被紧紧抓住，
我再不能悠闲地度日，
要狂飚似的向前突进。

我们要勇往直前，
永不休息，永不偷闲，
切莫抑郁苦闷，沉默不语，
切莫无所希求，无所事事。
切莫顾虑重重，
屈伏辄下忧心忡忡，
因为我们也还有：
渴求、期望和作为。”

马克思对脱离实际生活的抽象的哲学体系总觉得不满足，他竭力寻求一种能作为正确理解和积极参与生活过程的支柱的世界观。马克思关于黑格尔的一首诗，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他自己：

“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舞，
寻觅一个遥远的国度。

而我却只想透彻地理解，
在街头巷尾遇到的事物。”

但是，马克思在柏林主要不是研究诗歌而是研究科学。他在当时寄给父亲的注明 1837 年 11 月 10 日写的这封唯一被保存下来的信里，谈到他所读过的书籍，谈到他想整理他所研究过的大量材料，谈到他自己的理论探索。这封信证明他在这段时期的兴趣是广泛多样的，他的治学精神是异常顽强的，他严格要求自己，对自己的结论采取批判的态度，只要他确信这些结论没有根据，他就坚决抛弃。

马克思在柏林除了研究法学、历史、艺术理论和外国语以外，还开始认真地研究哲学。他这样做的最初的推动力是想写一部法哲学方面的长篇论文。当然，他对哲学发生兴趣也是因为他渴望¹²认识当时的充满矛盾的现实。

研究黑格尔哲学。参加青年 黑格尔派小组

马克思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深信，如果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来解释世界，在理论上是不会有任何成果的。促使马克思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原因是他想从现实内部所固有的规律性的观点来解释现实，或者用当时还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马克思的话说，在现实本身中寻找观念。他写道：“……必须从客体的发展上细心地研究客体本身，而决不当作任意的区分。”^①

黑格尔的哲学反映了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欧洲由于法国革命摧毁了封建社会关系而引起的历史变革。这些社会进程，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 年俄文版第 8 页。

学的特别是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给旧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以沉重打击。后来，恩格斯写道：“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① 黑格尔的杰出的功绩是第一次系统地创立了辩证方法。

在黑格尔哲学中，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处于从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发展过程中。黑格尔认为，发展是通过克服内部矛盾，通过内部矛盾的斗争完成的，斗争的结果是向新阶段转化，或者说，“扬弃”旧矛盾，产生新质所固有的新矛盾。发展过程是间断性和非间断性的统一，是逐渐的量变和渐进过程中断，即向新质转化的飞跃的统一。黑格尔把这个原则首先用于人类社会的历史。在黑格尔看来，世界的历史是精神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而且这种发展的意义在于精神对自己的自由的认识。

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以唯心主义为基础的。他宣称绝对观念是一切存在的基础，他把辩证运动的全部过程归结为绝对观念的自我发展。恩格斯写道，按照黑格尔的说法，“绝对观念……
13 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②。绝对观念发展到顶点就是作为绝对真理的黑格尔哲学。他把他自己的哲学体系奉为人类思想发展和一切事物发展的终点，这同他本人提出的应当以不断运动、不断变化的观点来观察一切现象的辩证方法是完全对立的。黑格尔哲学的局限性在他的政治观点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宣称君主立宪制——其任务只是对普鲁士国家作某些“改进”，使它适合于资产阶级的要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顶点。因此，黑格尔辩证法的客观上革命的内容，就因保守的形而上学体系的需要而牺牲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② 同上书，第214页。

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他的形而上学体系之间的矛盾，反映了力图摆脱封建束缚但又害怕革命的斗争形式、宁愿与反动势力妥协的德国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不彻底性和两面性。

马克思在来柏林之前就对黑格尔哲学有了一些了解，而认真研究黑格尔的著作是在1837年春天开始的。这个时期，马克思在柏林郊区施特拉劳休养，因为他整夜地看书，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在那里，他把“黑格尔的著作从头至尾读了一遍，还读了他的许多门徒的著作”^①。

然而这时，1831年逝世的这位哲学家的那些弟子们正在分化。其中一部人，如辛利克斯、加布勒尔、格舍耳等，拚命地捍卫宗教。这些右翼黑格尔分子用基督教正统思想来解释黑格尔的哲学，完全为现存政治制度辩护。

黑格尔派的左翼代表人物即所谓青年黑格尔派——大·施特劳劳斯、布·鲍威尔和埃·鲍威尔兄弟俩、阿·卢格、路·费尔巴哈——则力图在自己著作中从黑格尔哲学中得出激进的结论。青年黑格尔派批驳对这一哲学作保守的宗教的解释，并批判了基督教和整个宗教的教义。大·施特劳劳斯在他的两卷本的《耶稣传》（1835—1836年出版）中首先做了批判，认为福音书是集中了反映早期基督教教团的幻想和希望而自发产生的神话。与他相反，布·¹⁴鲍威尔认为，福音书是该书作者有意识的神话创作的产物，它反映了整个人类自我意识发展的一个阶段，即人类在自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所必须克服的一个阶段。鲍威尔对宗教和福音书的批判比施特劳劳斯更进一步，不仅对神的产生表示怀疑，而且对耶稣基督的存在本身也表示怀疑，他把基督教的起源同古代的精神生活和哲学思潮联系起来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4页。

青年黑格尔派同宗教的正统卫士之间在形式上是神学的争论，具有一定的政治内容：否认宗教是神的启示，宣布宗教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产物，这就破坏了绝对专制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青年黑格尔派提出通过批判来改造现实的原则，进一步从对宗教的批判转向对政治的批判，对反动的浪漫主义和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意识形态的批判。因此，这就使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成了德国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

青年黑格尔派的根本弱点是他们的代表人物的唯心主义。与黑格尔不同，他们倾向于主观主义的历史观。他们轻视人的实践活动，尤其是轻视人民群众的活动，因为他们只相信理论批判万能，确信只有通过杰出人物的批判思维才能保证人的自我意识的进步，因而，正如青年黑格尔派所说的，保证普遍的进步。

马克思在柏林大学读书时，结识了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他们勇敢地批判在庸人看来是不可侵犯的宗教教义和哲学教条，他们之中许多人具有激进的政治信念，他们捍卫信仰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这一切都引起了青年马克思的同情。他同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小组，即所谓“博士俱乐部”的成员非常接近，当时波恩大学的神学讲师布鲁诺·鲍威尔是该俱乐部的灵魂。该小组的成员有历史教员卡尔·弗里德里希·科本（他熟谙启蒙时代并给以热烈的赞扬，很快成为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和地理教员阿·鲁滕堡等。

马克思不久就成为“博士俱乐部”的精神领袖之一。他的渊博15 知识、很强的逻辑性、论断的深刻性和彻底性，甚至赢得一些年长的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的赞赏。大家对马克思不仅平等相待，而且许多人公开承认他是出类拔萃的人物。他对科本有很大影响，后者在1840年出版的《伟大的弗里德里希及其反对者》一书就是献给马克思的。1841年，著名的黑格尔分子之一莫·赫斯给他的朋友奥艾尔巴赫写道：“……请准备认识这位伟人，也许是当今现有的

唯一的伟人，真正的哲学家……我所崇拜的马克思博士还是一个很年青的人（他大概不到二十四岁），他将要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最后的打击。在他身上既有最深奥的哲学的严肃性，也有最机敏的智慧；请你想象一下，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结合成一个人；我所说的结合不是机械地混合——这将会使你得到一个关于马克思博士的概念”^①。许多人也有赫斯的这一看法。

博 士 论 文

1839年初，马克思埋头钻研哲学史，开始广泛地研究古代的哲学思想，包括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选择这个题目不仅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对这些哲学体系（他们把这些体系看作是自我意识哲学的先驱）都感兴趣，而且主要是因为马克思本人感兴趣。由于他具有无神论思想，伊壁鸠鲁这位古代最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称之为希腊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的哲学，当然对他很有吸引力。马克思对于那些研究伦理学问题和人对周围世界的关系问题的哲学流派深感兴趣。最后，马克思对哲学史的研究也有助于他解决他所思考的一个问题：哲学应当怎样对待外部世界，它能否证明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和必然的，或者说它本身是否含有与存在的东西相对立的应该有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最初的科学研究已经超出了抽象的、纯理论的兴趣，他要确定一种世界观来回答他所苦恼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人不受压迫，怎样才能使人成为自由人。

这项研究的初步成果就是1839年写的七本笔记的准备材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1卷下册第261页。

这些材料经过九十多年以后才以《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哲学史笔记》为题发表。在《笔记》中，马克思揭示哲学和宗教是势不两立的。当时马克思已经认为哲学是能够影响世界的一股积极力量。他写道：“正象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天火之后开始在土地上盖屋安家一样，哲学把握了整个世界之后就起来反对现象世界。”^①

马克思正是根据积极干预生活的哲学，批判了一些认为“中庸是绝对精神的正常表现”^②的黑格尔追随者。他坚决认为，哲学具有最广泛的认识的可能性，能够对世界起巨大的影响，人的理性是有威力的，同时他还尖锐地讽刺那些宣扬人的精神不能认识事物本质并鼓吹盲目崇拜所谓不可认识的现象世界的哲学体系的代表人物。马克思也把康德派不可知论者归入这些哲学家，按照他的确切说法，这些人是无知的职业祭司，他们“每天干的事就是哭诉自己的无能和事物的强大”^③。

青年马克思的激进主义和自由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他对伊壁鸠鲁哲学的探讨。马克思特别注意这位古代思想家关于自由问题的观点，高度赞扬伊壁鸠鲁竭力主张精神的自由和独立，主张摆脱宗教迷信的束缚和对来世因果报应的恐惧。马克思也提到了他在卢克莱修这位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诗人的著作中所发现的他所欣赏的观点。

至于谈到伊壁鸠鲁同古代作家、道德论者普卢塔克（他责难前者不信神）那场争论，马克思则反对对伊壁鸠鲁哲学的这种攻击，赞同它的全部无神论结论；马克思同意过去无神论者的观点：信奉宗教的人把自己的特性转给某种最高的存在——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早期著作选》1956年俄文版第195页。

② 同上书，第196页。

③ 同上书，第127页。

马克思用 1839 年全年和 1840 年的一部分时间，以他向来一丝不苟的精神研究了古代哲学史。1841 年初，马克思决定考哲学博士学位，他的论文的题目是《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他早已拟订了论文的一系列论点并在《笔记》中部分地作过发挥。就这篇论文的题目本身来说，就是同对于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古代原子论和唯物主义有明显偏 17 见的黑格尔的论战。马克思在 1841 年 3 月写的博士论文的序言中，实质上谴责了黑格尔对这些哲学体系没有足够的认识，他指出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历史的钥匙”^①。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特别强调伟大的希腊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观点对人类精神发展的重要性。马克思的功绩是揭示了伊壁鸠鲁哲学体系的辩证因素，尤其是伊壁鸠鲁关于原子的自发偏斜的学说，认为这是自我运动的辩证原则的表现。他把偏斜原则解释为能动性、活动性的原则。“因而善就是恶的逃避，而快乐就是痛苦的消除。”^②把德谟克利特的自然观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观点相比较，马克思则倾向于伊壁鸠鲁的观点，因为伊壁鸠鲁的哲学给他的伦理观点，特别是他关于自由的学说提供了基础。马克思从哲学对生活的积极干预的角度来考察道德问题。他主张改造不合理的世界，强调哲学和生活的辩证统一原则。他写道：“世界的哲学化同时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哲学的实现同时就是它的损失……”^③他想以此说明，一旦哲学被转变为生活，就使生活上升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而哲学本身也不再是纯理论，而要体现在实际事物中。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他的关于理论和实践相互联系和统一这个未来学说的最初萌芽。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1961 年人民出版社版序第 2 页。

② 同上书，第 21 页。

③ 同上书，第 65 页。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把他的无神论观点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论文贯穿了战斗的无神论的精神，充满了对迷信的憎恨，反对企图把科学研究束缚在宗教框子里使它服从宗教利益的一切反动的哲学。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公开宣称无神论就是他的信仰。他在谈到先进的哲学科学时写道：“哲学……将永远象伊壁鸠鲁那样向着它的反对者叫道：‘那摈弃群氓的神灵的人，不是不诚实的，反之，那同意群氓关于神灵的意见的人才是不诚实的。’……普罗米修斯自己承认道：说句真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这是他的自白、
18 他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他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下的神灵……”^①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强调指出，关于神的存在的一切所谓的证明都只不过是空洞的同义反复^②。但是他也了解，宗教的世界观是不合理的，而宗教却是一股现实的力量。想要战胜宗教的真正科学的任务不仅在于推翻宗教的教条，而是在于解释宗教的本质、根源和流传的原因。马克思的结论是，对神的信仰反映了人类意识发展的初级阶段，反映了思维的低级水平，还不能理解和说明周围世界，还认为它具有超自然的非理性的特征。马克思指出：“**这个世界对于谁是无理性的，亦即谁本人是无理性的，对于他上帝就存在。**”^③

当时在柏林大学，博士论文的答辩程序相当复杂并且需要花不少钱。因此，马克思就把他的论文送到耶拿大学，1841年4月15日，他在那里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博士论文是马克思的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时马克思总的说来尽管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派，但他公开表明了无神论的观点，宣布了哲学应该积极地对待现实的原则。当时黑格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序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93页。

③ 同上书，第95页。

尔在马克思看来,还是一个权威,还把他称之为“伟大的思想家”^①,但是马克思仍然在一系列的问题上走自己独立的道路,做出与黑格尔观点不同的结论。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探讨了一些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是十分重要的问题。马克思继续钻研哲学和现实的关系问题,不久必然要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的在原则上同唯心主义不相容的战斗的无神论,促使他后来转向唯物主义。

对费尔巴哈的态度

当马克思完成他的博士论文的那一年,德国的思想界发生了一件大事: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它对当时的先进思想界起了巨大的解放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费尔巴哈是第一个克服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的哲学家。他的著作用唯物主义批判了宗教,宣称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是人即自然界的产物赖以产生的基础。费尔巴哈说,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而人的宗教幻想所创造的最高存在物只是人的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费尔巴哈指出,人在神的概念中,把不是属于个人的但确是属于所有人的、属于人类的、按费尔巴哈的说法是属于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一切特征具体化了。费尔巴哈写道:“你相信爱是上帝的属性,因为你自己也在爱;你相信上帝是一个智慧的、仁慈的存在者,因为就你自身来说再也不知道有什么比仁慈和智慧更好的了……这样,上帝就是人的本质,被看作最高的真理。”^②所以,人应当使自己重新获得被自己在关于神的概念里异化了的人的本质。

① 马克思《博士论文》1961年人民出版社版序言第2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下卷第44、45页。

费尔巴哈学说的某些特征即使在当时也是同青年马克思的正在形成的世界观的那些倾向相违背的。费尔巴哈哲学的直观性是同马克思认为哲学是一个积极因素的观点不符合的，费尔巴哈对辩证法的估计不足是同马克思对它的革命作用的深刻认识相对立的。但是总的说来，他热情地认为费尔巴哈的书是一部有利于扩展科学的认识眼界的著作。马克思也特别注意费尔巴哈关于宗教的世俗起源的独特的思想。后来，随着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信念日益成熟，这位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后一个代表（他沉重地打击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基础）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就越来越大了。

马克思当时象许多青年黑格尔分子一样，把《基督教的本质》首先看作是一篇激进的无神论的宣言，是比施特劳斯书中彻底得多的对宗教偏见的批驳。他还不能理解这部著作的唯物主义内容，因为他基本上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是他认为费尔巴哈的思想是在理解现实的人的关系方面向前迈出的极重要的一步。对这些思想的接受是促使马克思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成份形成的因素之一。费尔巴哈的著作更加使马克思坚信，对宗教的批判是对现存制度的批判思维的一个阶段，是使人摆脱精神束缚和其他束缚的一种斗争形式。关于这一点，后来马克思首先针对费尔巴哈的哲学写道：“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①

因此，青年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是集中自己的人民和时代的“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②的先进哲学的杰出代表。公开地和勇敢地捍卫这些思想，使它们不受守旧派和反动分子的攻击，使它们进一步发展和深化，——这就是马克思所面临的主要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务之一。

开始政治活动。抨击普鲁士 书报检查制的论文

马克思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又安排了许多创作计划。他准备同布·鲍威尔一起在波恩大学讲授哲学，计划在费尔巴哈参加下出版一份名称醒目的杂志《无神论文库》，还打算写一部论基督教艺术的著作。马克思在特利尔逗留两个月之后，于1841年7月初迁居波恩。在波恩马克思同布·鲍威尔特别接近，帮助他撰写无神论小册子《对黑格尔的末日的宣告》，这是直接反对黑格尔右派的。

但是，马克思希望获得教席的愿望未能实现。1840年登上王位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曾经答应反对派集团实行自由主义的执政方针，不久就公开声明，不要指望他实行立宪改革。批评普鲁士君主专制制度的最微小的尝试都被无情取缔。约翰·雅科比因为发表一本小册子，主张在普鲁士实行代议制，就被指控犯了叛国罪。布·鲍威尔也被柏林大学免职了。

政府镇压的加强，而某些青年黑格尔分子关于“开明君主”可能主动实行宪法和自由主义制度这一幻想的破灭，决定了该派最有激进情绪的代表转向政治。站在这些激进民主主义分子前列的是马克思、布·鲍威尔和阿·卢格。马克思终于为自己选择了政
21
治战士的使命。

他以年青人的满腔热情投入反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和争取民主自由的直接的斗争。他把早先开始的理论工作放在一边，在1842年1月中至2月初写了《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这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尖锐地批判了书报检查令，而政府报纸

和部分温和的反对派报纸却吹捧书报检查令表明了新国王的自由主义的意图。

马克思揭露了这个措词虚伪的检查令的真正用意。他直截了当指出，这只不过是表面上扩大出版自由，实际上是让反动的书报检查制度横行无阻。他写道：“**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这样就转移了表面看问题的公众的注意力。”^①检查令的重点之一是完全禁止批判基督教，而对宗教的批判在当时是反映反对派的政治观点的主要表现形式，政府实际上企图阻止对现存制度的一切批判。

马克思谴责普鲁士政府想把出版物置于检查令的全面监督之下。他指出，只有那种自诩为国家理性的独占者和同人民对立的政府，才能颁布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②。这样的政府只能依靠官僚机器，只能信赖官吏。马克思认为，官僚的权力，那些狂妄霸道和握有全权的官吏（他们言行在现行制度下几乎是不可侵犯的）的专横，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特有弊病。

因此，马克思一方面批判了书报检查令的条款，同时也坚决彻底地谴责了普鲁士的整个国家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本身的根本弊病。

马克思以革命的语调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处。”^③这个结论和他的全部论述在启发读者：德国社会制度需要的不是部分的改善，而是根本的改造。当然，当时他还不了解这种改造的动力和阶级目的，但是他作为一个革命政论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页。

而初露的锋芒，清楚地表明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信念。

当时在德国存在着书报检查制，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未能发表，只是在1843年才发表在卢格在瑞士出版的两卷集《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第一卷上。

《莱茵报》的撰稿人和编辑

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推动马克思寻找广阔的活动场所和宣传自己思想的讲台。他成了1842年1月在科伦创刊的反对派报纸《莱茵报》的撰稿人。这家报纸是由莱茵省大资产阶级的著名代表康普豪森、汉泽曼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其他领袖出钱创办的。为了征集优秀的著作界力量，他们求助于激进派，尤其是青年黑格尔派。莱茵省的自由主义派和这个哲学派别的代表人物之间订立了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秘密同盟。根据马克思的推荐（当时他在莱茵省的政治团体中已经很有权威了），柏林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阿·鲁滕堡被任命为《莱茵报》的编辑。为该报撰稿的有鲍威尔兄弟、赫斯、科本等这样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政论家。但是，报纸的方向最初还很不明确，自由主义的调子占了主要地位，报纸没有受到广大读者的普遍欢迎。1842年1月该报只有四百个订户。

马克思在1842年5月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当时该报发表了他的关于莱茵省议会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篇。这篇文章哄动了德国全国。从1842年夏天起，马克思更加积极地参与该报工作，不仅为该报撰稿，而且对报纸编辑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报纸工作促使马克思在1842年10月中旬迁移到科伦。1842年10月15日起他担任了该报的编辑。

自从马克思主持该报以来，报纸越来越具有鲜明的革命民主

主义的特色。对普鲁士专制制度及其思想辩护士的批判也日益尖锐了。²³实际工作的初次锻炼显示了马克思各方面的才能：他的组织能力，选择撰稿人的本领，在创作上和编辑方面的惊人的工作能力和文学艺术才干。

作为大型日报的编辑，马克思不得不经常接触一些社会经济问题。马克思参加了由许多撰稿人和报纸监察委员会成员出席的每周会议，会上就社会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

马克思约请了更多的撰稿人，大大提高了该报的声望。报纸的影响很快就越出了莱茵省甚至越出了普鲁士王国国界。报纸的通讯员中有年青的恩格斯，早先他从柏林投稿，现在从英国投稿。《莱茵报》在整个德国成了民主主义者的意志的代言人。报纸的发行量迅速增加。1842年8月只有八百八十五个订户，11月就增加到一千八百二十户，到1843年1月又增加到三千四百户，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大的数字。1842年12月，在《曼海姆晚报》上有这样一段评论：“这家报纸的订户在德国和国外每天都在增加，进步的 and 自由的朋友……有了一份保卫他们利益的机关报。”^①

马克思的文章为报纸规定了调子，报纸的倾向使普鲁士政府感到严重的不安。在马克思的一组关于莱茵省议会的文章的第一篇发表以后，政府的书报检查官就故意刁难，禁止发表第二篇关于教会和国家的关系的文章。他的那篇关于莱茵省议会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章使当局更加恼怒。莱茵总督冯·沙培尔以“对现存国家机构进行傲慢无礼的指责”为借口，决定对该报提出诉讼。报纸面临被查封的危险。马克思在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写道：“由于我们现在从早到晚都要忍受最可怕的书报检查的折磨，忙于同部里通信，对付总督的指控、省议会的责难、股东的埋怨等等，而我仍然守在岗位上，只是因为我认为有义务在力所能及

^① 1842年12月12日《曼海姆晚报》第292号。

的范围内不让暴力实现自己的计划……”^①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必须特别沉着和机智，才能既不改变报纸的原则路线，又不给普鲁士反动派有查封报纸的任何借口。

马克思政论文章中的革命 民主主义思想

24

围绕当时德国迫切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所进行的经常而激烈的辩论，使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信念更加坚定，他这位热情的革命政论家的笔锋也更加锐利了。

马克思的许多文章都贯穿着现存制度是不合理的这一思想，揭露它的辩护士所鼓吹的“专横和暴力的法”^②的谬论。这些文章的特点是深信进步，深信新生先进的东西必然战胜陈旧落后的东西。这些文章中有许多马克思本人关于革命时代的文学语言，这种文学在其无情的批判活动中依靠的是“**新生命的固有的自身力量的感觉，这种新生命破坏已被破坏的东西，抛弃已被抛弃的事物**”^③。

把发表在《莱茵报》上的第一篇文章《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同《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相比，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论述书报检查和言论自由问题的。马克思原来只是一般地论述出版自由，现在他把这个问题同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和阶层对待出版自由的态度问题联系在一起了。马克思把对普鲁士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不仅扩大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6页。

③ 同上书，第100页。

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出版规定，而且扩大到这个制度的社会基础，即贵族统治和普鲁士各个政治机构中盛行的等级特权。他坚决谴责等级代议制原则，揭露它是反人民的。

莱茵省议会受贵族控制的典型的封建等级机构，是对代议制的拙劣的模仿。马克思指出，省的利益应当受到省议会的保护，“与其说省必须通过它的代表来进行斗争，倒不如说它必须同这些代表进行斗争”^①。

从出版自由的辩论中也可以看出省议会的等级性质：诸侯和贵族的代表反对出版自由，理由是出版自由会促使革命的爆发。马克思揭露他们企图把革命说成是由于某种阴谋诡计造成的，并
25 指出革命是合乎规律的，是客观的过程。出版自由不会引起革命，正如天文学家的望远镜不会引起天体的运动一样^②。

在马克思的政论文章中，最突出的是对省议会的那些资产阶级代表的模棱两可的立场的批判。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知道，他们受着狭隘的阶级利益的驱使，这是“资产者反对派，而不是市民反对派”^③。

与资产者相反，马克思赞同省议会中的农民代表的意见，公开用他们的“英勇果敢的可贵观点”^④来对付反对出版自由的人的可怜的挣扎。马克思强调指出，为自由而战——这不是毫无效果的哀诉，也不是低声下气的乞求，而是用矛头和斧子去为它而战斗^⑤。

这篇文章明显地反映了马克思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的实质：憎恨封建君主等级制度；号召争取全体人民的民主自由而不是争取某些阶层的特权；批判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局限性；以坚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0页。

④ 同上书，第93页。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96页。

的革命行动对抗自由派的要群众消极等待的策略。

马克思这位政论家不仅向当时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宣战，而且向支持这一制度的反动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宣战。他严厉地申斥反动的浪漫主义，这个流派的代表在德国有律师施塔尔和历史学家利奥等，在国外有法国人博纳德和德·梅斯特尔，瑞士人哈勒，他们攻击启蒙思想，咒骂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中世纪唱赞歌。法的历史学派（胡果、萨维尼等人）也在颂扬贵族封建制度，叫嚷历史传统和由来已久的制度不容破坏，因为它们特殊的民族精神的产物，对它们不必做合理的解释，也不应当做任何改变。

马克思的《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这篇文章，揭露了这个学派的反动性质以及它对先进思想尤其是用革命手段推翻现存制度的思想的仇视。后来，他又更尖锐地对法的历史学派作了一个评价：这个学派“以昨天的卑鄙行为来为今天的卑鄙行为进行辩护，把农奴反抗鞭子——只要它是陈旧的、祖传的、历史性的鞭子——的每个呼声宣布为叛乱”^①。

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马克思对自然界和国家作用的观点，对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相互关系的解释，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的。但是，他力图批判地认识现实，在现实中而不是在纯思维领域中确立自由理想，他很了解和保护人民的真正利益，这就使他能更深刻、更具体地认识周围世界，首先是认识各种社会关系，使他最终走向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唯物主义地解释社会现象方面前进了一步，他在报纸上表述了一系列有洞察力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现实关系在法律规范形成过程中的作用的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法律也只能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意识上的反映，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页。

独立表现。”^①

马克思对同时代人所迫切关心的社会问题作了生动的回答。在他担任《莱茵报》主编的第二天，报纸就发表了他的《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他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反动的奥格斯堡《总汇报》对《莱茵报》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指责。文章指出，共产主义问题对先进的欧洲国家，首先是对英国和法国具有重大的意义。共产主义是目前极端严重的问题，是具有“欧洲的意义”的问题。此外，马克思也开始认识到共产主义思想同正在这些国家所开展的无产阶级群众的斗争的密切联系。他写道：“现在一无所有的等级要求占有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财产，这是事实……它仍旧是曼彻斯特、巴黎和里昂大街上引人注目的事实。”^② 他在这里提到了几个城市，这并不是偶然的：曼彻斯特是宪章运动的中心之一，巴黎和里昂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行动的场所。许多人对 1831 年和 1834 年里昂纺织工人的起义仍然记忆犹新。

马克思后来回想，他在认识他所面临的这些问题的全部重要
27 性时，他认为当时他的知识不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容作出任何透彻的判断。但是，他在阅读了勒鲁、孔西得朗、蒲鲁东的著作以后，已经清楚地看出这些社会主义思想代表人物的学说在理论上是软弱的。马克思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各种互相模仿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因为它们明显地表现出教条主义，因为它们竭力向世界揭示绝对真理。马克思写道：“《莱茵报》甚至在理论上都不承认现有形式的共产主义思想的现实性，因此，就更不会期望在实际上去实现它，甚至都不认为这种实现是可能的事情……”^③

年青的马克思不主张发表宣言或给现实开一些教条主义的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2 版第 40 卷第 25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131 页。

③ 同上书，第 133 页。

方，他顽强地、深入地研究现实中的矛盾，以便寻找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后来，当他对优秀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有了更广泛更深入的研究以后，他才能评价他们学说中的合理成分，并创造性地利用它们来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

马克思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这篇文章作为《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这一组文章的第三篇论文，发表在1842年10月25日至11月3日《莱茵报》上。在这里，马克思保护的不仅仅是与私人利益相对立的整个社会利益，而且也保护了“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①。这就说明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有了更明确的社会目的，保护受现存制度压迫的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成了他的旗帜。

马克思指出，莱茵省议会支持对砍伐林木的人加重治罪和甚至对贫民捡枯枝规定严厉惩罚的新的法案，这就完全同林木占有者、私人所有者站到一起了，而这些人的利益同一无所有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对立的。马克思这时开始意识到不仅省议会，而且整个国家都是保护私有制的。当然，马克思对国家制度的观点还是唯心主义的，还以为它是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者。在他看来，在存在着等级特权和官僚警察制度的普鲁士国家里，国家本身的原则²⁸和性质都消失了。他愤慨地写道：普鲁士国家“降低到这种水平，即按私有制的性质而不按自己本身的性质来行动”^②。但是，马克思已经发现了主要的东西，即私有制利益同现存国家的政策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谴责普鲁士国家巴结林木占有者，成了私人利益的奴隶，同时强调指出它是敌视人民的利益的。马克思当时在文章中经常使用的私人利益这一概念，逐渐获得了越来越具体的内容。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1—142页。

^② 同上书，第155页。

据哲学上部分和整体的对立，有产和无产的矛盾也被提出来了。

对这些矛盾和普鲁士国家的反人民的本质，马克思在1843年1月15—20日发表在报纸上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做了更明确的揭露。这篇文章是对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的声明的答复，因为沙培尔声称《莱茵报》发表的彼·科布伦茨关于摩塞尔的酿造葡萄酒农民的困境和政府不愿意帮助他们的那篇通讯是诽谤性的。由于同冯·沙培尔的论战，马克思作为报纸的主编就公开同当局交锋了。

马克思的文章表明他对专制制度和封建残余统治下的人民贫困的原因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当时有些人企图把摩塞尔的酿造葡萄酒农民的贫困状况说成是自然条件的变化和个别官吏的失职造成的，马克思坚决驳斥这种论调，他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29 和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①可见，马克思提醒读者：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在于普鲁士社会制度的性质，在于普鲁士君主制度本身。他出色地描绘了脱离人民、骑在他们头上、不顾他们利益的官僚机器。他直接提出了人民利益和普鲁士国家政策经常发生矛盾的问题。他的这篇文章整个贯穿了这样一个思想：在现存制度下，人民不能期待从政府那里得到好处。因此毫不奇怪，预定答复总督的五篇文章只发表了其中的两篇。其余的文章遭到了禁止。

从这篇文章中还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政论文章的风格有了一些变化：逻辑上无法反驳但有些抽象的结构越来越少了，同过去的文章相比，经常可以明确地听到一个人民利益保卫者的愤怒呼声。**“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的粗鲁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最谦恭的方式来表述思想的技巧。他也许还会认为自己在**政治上**有义务暂时用迫于贫困的人民的语言来公开地说几句话，因为故乡的生活条件是不允许他忘记这种语言的。”^①

同“自由人”的冲突

同青年黑格尔派的分歧越来越深的马克思的理论观点，首先是在他在《莱茵报》所执行的策略路线，使他同当时在柏林成立的“自由人”小组成员发生了冲突。加入这个小组的是以埃德加尔·鲍威尔和卡斯巴尔·施米特（后来他用了麦克斯·施蒂纳这一笔名）为首的青年黑格尔派。“自由人”的典型特征是：他们不加区别地、抽象地批判一切，提不出任何积极的纲领，鼓吹彻底的否定，在毫不相干的场合高喊共产主义和无神论的极端激进的词句。“自由人”宣称，他们拒绝一切妥协和陈规旧习。他们的粗暴行为使柏林的资产者惶恐不安，但是却不能真正威胁政府，只是败坏民主主义运动的声誉。

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自由人”醉心于抽象的批判是毫无根据的。他主张根据具体的条件和材料，系统地阐述和发挥正确的理论。他担任《莱茵报》的主编以后，就不再发表他们的文章了。1842年11月，他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这班人已习惯于把《莱茵报》看成是**自己的**唯命是听的机关报，而我则决定不让他们再象以前那样空谈下去。”^②“自由人”恶意地攻击他有保守主义。³⁰马克思在给该小组的成员之一爱德华·梅因的答复中，要求他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5页。

“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他还说，偶尔在剧评中肤浅地讨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学说，是不能容忍的，并要求他们，“如果真要讨论共产主义，那就要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①。但是，“自由人”对马克思的批评置若罔闻，更加陷入了主观主义和无政府个人主义。马克思同他们的决裂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公开与青年黑格尔派划清界线的开始。

《莱茵报》被查封

马克思在《莱茵报》的工作条件愈来愈困难了。报纸要受到双重的书报检查：在一般检查官检查之后，现在还要受高级官吏即行政区长官的检查。有时被书报检查弄得凌乱不堪的报纸简直无法出版。马克思感到在普鲁士警察国家笼罩着令人窒息的气氛。他在1843年1月给卢格的信中说：“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恶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奉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②

政府人士越来越感到《莱茵报》对普鲁士国家是一个威胁，报纸的编辑也使他们十分恐惧。1843年1月初从柏林派到科伦来监视报纸的政府检查官圣保罗（除了原来任命的两个检查官）称马克思是《莱茵报》的“灵魂”^③和“报纸理论的活的源泉”^④。当局对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② 同上书，第439—440页。

^③ 约瑟夫·汉森《莱茵政治运动史文件集（1830—1850）》（第1卷（1830—1845年））1919年埃森德文版第489页。

^④ 同上书，第472页。

克思的抗议政府查封象《莱比锡总汇报》和《德国年鉴》这样一些民主主义机关报的文章十分恼火。马克思的《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是使普鲁士政权不能忍受的最后一击。

1843年1月19日，政府决定从1843年4月1日起查封《莱茵报》，在这段时期内，要实行特别严格的书报检查制度。官方的公报指出，《莱茵报》的“倾向显然是散布对教会和国家的现存秩序的仇恨，破坏它们，煽动不满情绪，恶意诽谤国家行政机关……侮辱友好的国家”^①。最后一句话是指《莱茵报》对沙皇干涉德国事务的尖锐批评引起俄国专制制度代表的不满。沙皇的驻柏林公使满意地向圣彼得堡报告，这份“一直带有公开的革命倾向”^②的报纸已被查封。

查封《莱茵报》引起了抗议的怒潮。全莱茵省都在征集给普鲁士国王请愿书的签名，要求撤销这个命令。在科伦很快就征集了一千个签名者。摩塞尔的酿造葡萄酒农民（马克思曾在报纸上热情地捍卫他们的利益）也递了请愿书。他们写道：“我们不知道《莱茵报》是否发表过虚假的报道，是否诽谤过当局，但是我们知道，它确实写过关于我们的家园和我们的状况，关于我们的权力和我们的命运的真实情况。”^③反对派的报刊认为，政府的法令是反动势力对德国出版物讨论国家迫切的社会问题的最低限度的可能性的公然侵犯。

但是，为报纸提供资金的莱茵省的自由资产者根本不想采取任何断然的手段来保卫报纸，事实上，他们也不满意报纸在马克思主持下所具有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倾向。在讨论给国王的请愿书

① 约瑟夫·汉森《莱茵政治运动史文件集（1830—1850）》（第1卷（1830—1845年））1919年埃森德文版第402—403页。

② 《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历史文集》1958年俄文版第660页。

③ 1843年3月2日《特利尔日报》。

时，一位股东和报纸监察委员会的一位委员在长篇发言中攻击该报的倾向。该报的出版负责人之一，达·奥本海姆在1843年2月全体股东会议上抱怨说，1842年11月以前他根本不知道当局不满意《莱茵报》上的文章，“只是从1842年11月起才发生了这场冲突，引起了目前这场没有预料到的灾难”^①。这是直接指责马克思的政治路线，因为他正好在这段时期担任主编。

- 32 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不能再继续为这份报纸工作了。1843年3月18日《莱茵报》发表了他退出编辑部的声明。即使这样，股东们也未能挽救报纸。1843年3月31日，报纸出版了最后一号。

马克思深信在普鲁士已经不可能公开进行革命宣传，就决定离开这个国家了。在退出《莱茵报》编辑部以前，马克思曾讨论（主要是在同卢格的通信中）在国外出版一份革命刊物的计划。马克思认为，应当出版的不是以少数人为对象的大厚本的科学论文集，而是人民喜欢阅读的定期的月刊^②。1843年5月底，马克思到德勒斯顿去看卢格，在那里逗留了几天，商谈出版这种期刊的计划。

马克思毫不怀疑革命正在日益临近。他写道：普鲁士国家这艘满载傻瓜的船正在驶向那不可幸免的命运。这命运就是即将来临的革命风暴^③。

从此以后，关于革命、它的性质、原因和动力的问题成了马克思研究的重点。在这个时期，他在理论上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在这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他的实际的政治活动。他在《莱茵报》这段时期的工作标志着他的世界观的根本转变：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这时马克思并不只是热情地捍卫人民的利益和反对压迫他们的普鲁士封建专制制

① 1843年2月21日《法兰克福报》。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1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8页。

度。他逐渐懂得,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的人们的行动,根源在于某种客观因素,他们的私人利益在一定方式上取决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客观地位。马克思的探索的主要方向已经愈来愈清楚了,这就是揭示“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①的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

马克思在担任主编时期遇到一些经济问题,他开始不仅认识到他在这方面的知识是欠缺的,而且也认识到这些经济问题在生活中所起的头等作用。正如恩格斯后来所回忆的,他曾“不止一次地听到马克思说,正是他对林木盗窃法和摩塞尔河地区农民处境的研究,推动他由纯政治转向研究经济关系,并从而走向社会主义”^②。

马克思决定要去寻找能够真正改变现存制度的力量。从他在《莱茵报》停刊一个半月后写给卢格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他是多么正确地选定了他要走的道路。马克思在信中指出:“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③

办报工作使马克思在有关国家的领域的其他方面获得了许多经验。他逐渐认识到国家根本不是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世界理性的化身,也不是超越于个人私利之上的普遍物的化身。

因此,在《莱茵报》被查封之后,在新的革命杂志的出版还没有付诸实现的时候,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说法,他又暂时回到书房,这时,他面临着双重任务:批判地考察黑格尔关于社会和国家的唯心主义观点,阐明社会过程的真正动力、革命地改造世界的道路和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在克罗茨纳赫。《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手稿。历史笔记

1843年5月，马克思到达莱茵省的一个小城镇克罗茨纳赫，当时他的未婚妻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和她的母亲住在这里。1843年6月19日，“居住科伦的哲学博士卡尔·马克思先生和居住克罗茨纳赫的约翰娜·贝尔塔·尤莉娅·燕妮·冯·威斯特华伦女士……”举行结婚登记。

马克思从1843年5月到10月在克罗茨纳赫度过的这几个月，也许是他的漫长而艰难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平时感情不外露的马克思，在结婚前不久写给卢格的信中说：“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对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①

马克思得到了燕妮这个亲爱的妻子，在他的工作中也有了一位毫无私心和富有献身精神的助手。他对她讲述自己的创作计划，
34 同她交换一些大胆的想法。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交给有学识的和聪慧的妻子去评判。她是这些著作的第一批读者之一，往往是这些著作的第一个批评者。马克思非常重视燕妮的批评意见，乐意听从她的建议，相信她的卓越的鉴赏力。

在克罗茨纳赫的这一段时期是马克思的创作工作极度紧张的时期。他首先要批判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这一学说实质上总结了这位哲学家对社会的唯心主义的观点。这项工作的成果就是1927年在苏联发表的标题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一份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1页。

完成的手稿。

马克思开始批判黑格尔的国家和法的观点,是在1842年的头几个月,当时马克思就已经指出黑格尔观点的主要核心之一是对君主立宪制的颂扬。他在1842年3月5日写给卢格的信中谈到,他想写一篇文章来批判黑格尔的法的概念和政治概念,“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是同**君主立宪制**作斗争”^①。这篇文章没有保存下来,很可能没有最后写完,但是,马克思的思路是很清楚的。他力图指明民主主义原则同君主制度是不相容的,然而他在那时还不能给自己提出批判地考察黑格尔的整个社会学说的任务。这一任务在一年以后他才提出来。

1843年初在瑞士出版的《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上发表的路·费尔巴哈著作《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对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很有帮助。费尔巴哈在这部著作中表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观点:“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②费尔巴哈指出,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的庇护所。他把自己在批判宗教时所使用的方法应用到批判唯心主义哲学,并强调指出,“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明显的真理。”^③

这种把唯心主义哲学“颠倒过来”和确定思维和存在的真正关 35 系的思想,被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用作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一般方法论的原则。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观点的批判,帮助了马克思沿着他独立走上的唯物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与此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1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61年三联书店版上卷第115页。

③ 同上书,第102页。

时,马克思也发现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弱点,首先是他回避当前迫切的政治问题。在《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发表后不久,马克思在给卢格的信中写道:“费尔巴哈的警句只有一点不能使我满意,这就是:他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然而这一联盟是现代哲学能够借以成为真理的唯一联盟。”^①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人的观点上是有区别的。费尔巴哈根据抽象的人道主义观点把人主要看成是天然的、自然的存在物;他用狭隘的人本主义原则来解决各种哲学问题。而马克思当时已经认为,人首先是社会的存在物,是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的产物。

因此,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中成了中心问题,并不是偶然的。当时“市民社会”这一概念是指私人利益、首先是物质利益以及与这些利益相联系的社会关系的领域。关于市民社会是个人在其中犹如孤立的、敌对的单位而相互对抗的领域这一流行的看法,反映了在“人对人象狼一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关系的特征。正确解决市民社会的本质及其对国家的关系问题,标志着在科学地唯物主义者地认识现存社会制度的道路上前进一大步,为认识整个历史过程的主要原因提供了一把钥匙。

黑格尔认为,国家处于比市民社会更高的发展阶段,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提出相反的论题: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马克思在探索国家的本质同具体的社会关系的性质的联系时,提出了关于私有制对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一天才思想。他写道:
36 “最高阶段的政治制度就是**私有制**。”^② 尽管马克思对私有制主要还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理解,但是,他对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解释上的总的唯物主义倾向已经是无疑的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2—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68页。

马克思集中火力批判黑格尔的政治观点，特别是黑格尔为普鲁士官僚制度和君主等级制度的辩护。马克思在总结他对崇拜现存制度的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分析时写道：“黑格尔应该受到责难的地方，并不在于他如实地描写了现代国家的本质，而在于他用现存的东西来冒充**国家的本质**。”^①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提出了他对人应该有的社会制度即民主制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民主制就是人民自决。根据他的意见，民主制的根本法则是人的存在，换句话说，是人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马克思用黑格尔的专门术语写道，民主制是一切国家的真理，也就是说，是国家发展的理想的最终目的。马克思断言，只有在民主制中，人才不再是人本身所创造的力量——政治机构手中的玩物，而将是它们的主人。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国家不再与人民相对立，而是“**人民的特殊存在形式**”^②。马克思特别引用“现代法国人”的话，他们认为，“在真正的民主制中**政治国家就消失了**”^③。显而易见，他指的是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及其关于未来社会的思想，在那个社会里，对人的管理将让位于对物的管理。

因此，把民主制看成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现实的人民权力这愿望促使马克思必须寻求一种能实现人民权力的社会制度，这也就使他向共产主义迈出了一步，尽管在手稿中，对民主制的认识本身在一定程度上还带有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影响。

马克思世界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的形成，是同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深入批判紧密相联的。马克思从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各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24页。

②③ 同上书，第282页。

37 方面进而批判地考察它的唯心主义基础。他还没有宣布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实际上已经从唯物主义立场来批判黑格尔了。他指出了唯心主义方法的弊病，这种方法“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样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①。马克思以黑格尔为例得出结论：唯心主义必将导致宗教和神秘主义。他揭示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同黑格尔保守的政治观点之间的联系，并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普鲁士君主制这一个具体的历史事实是如何变成绝对观念的一个发展阶段的。黑格尔把半封建国家的其他属性——等级制度、官僚制度、长子继承权等等，也同样弄得神秘化。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促使马克思从历史中寻找一些实际材料来批驳黑格尔的那套观点。他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贯穿着唯物主义的倾向：出发点应当是对具体现实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前提，应当是“事物的逻辑”，而不是“逻辑的事物”。马克思知道，只有认真地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才能解决市民社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的问题。他没有满足于一般地提出问题，而力求从历史的角度来阐明问题。因此，他在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的同时，在1843年夏（主要是6月到8月）便开始认真地研究历史了。

马克思的写得很密的五本《克罗茨纳赫笔记》，是他在研究关于国家的理论和历史和关于个别国家（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意大利、瑞士）的历史的著作时所做的大量摘录。他尤其注意十八世纪末法国革命史的专门著作，包括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瓦克斯穆特写的书。他特别注意这一事件，是因为他想弄清它对他那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时代的社会的形成的作用，想通过它来研究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社会原因。马克思当时还阅读了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弗利、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卢梭、反动浪漫主义理论家沙多勃利昂和尤斯图斯·麦捷尔的著作。

从马克思摘录的问题和性质以及为摘录所做的索引的内容，我们可以了解他当时感兴趣的问题的范围，在某些情况下能使我们看出他对待这些问题的态度。在摘录中最突出的是关于封建所有制及其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政治机构的影响问题。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史的分析也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种分析使马克思能更深刻地了解各阶级利益的冲突及其对革命事件发展的影响。这里可以明显地感到，马克思正努力追溯资产阶级政治对经济因素，特别是对所有制关系的依赖性。他有一批摘录强调资产阶级革命不能保障真正的平等，即不是由于人人在法律面前形式上的平等的建立，而是由于所有制关系的根本改变而产生的平等。

主题索引还证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点的形成，不仅是由于他批判了唯心主义的社会学说，而且是由于他本人力求唯物地认识历史现象。《所有制及其后果》这一部分在索引中占有中心地位，它集中了关于政治依赖于所有制关系的材料。

马克思研究历史教训，还为了探寻一条通向配称真正人类社会的社会制度的道路。马克思发现以往的革命是有局限性的，这也使他越出革命民主主义的范围，促进他的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另一方面，他对历史的研究使他的理论探讨有了科学的基础，成为防止空想主义的有效的解毒剂。

在克罗茨纳赫度过的这几个月，是马克思的世界观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线。恩格斯在许多年以后写道，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得出这样一种见解：要获得理解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锁钥，不应当到被黑格尔描绘成‘大厦之顶’的国家中去寻找，而应当到黑格

尔所那样蔑视的‘市民社会’中寻找”^①。

39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及其全部唯心主义的批判，他对过去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他对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和人道主义观点的研究，加强了他的观点中的唯物主义倾向，这种倾向这时已经占优势。作为一个掌握并发展了辩证方法的革命实质的伟大辩证论者，马克思看出了现存社会本身就有根本改造的必然性。不过他还只是很粗略地描绘了这个改造的方向（采取“民主制”或者“真正民主制”的理想国家形式），并且也只是刚找到能够实现这个变革的社会力量。

准备出版《德法年鉴》。迁居巴黎

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继续进行他在《莱茵报》被查封以前就开始的通信活动，筹划出一份能够联合德国和法国民主主义者的期刊。他周密地考虑了这份期刊的性质、目的和未来的撰稿人。

马克思在1843年9月给卢格的一封信中提出了在巴黎出版杂志的计划。按照马克思的想法，杂志的基本方针应当是对现存制度进行无情的批判，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马克思认为，这种批判不是目的本身，不是为批判而批判，而是制定新的世界观、开辟走向新世界的道路的一种手段。他认为这种新世界观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党性原则。他主张把理论的批判变成实际的革命行动，把对现存制度的批判同“政治上的党派立场结合起来，因而就把我们的批判同实际斗争结合起来，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做同一件事”^②，从而第一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418页。

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这一最重要的思想。

马克思在批判现存制度和阐述未来社会的见解时，还经常用他在费尔巴哈影响下形成的一些概念（“人的真正本质”的实现等）。费尔巴哈人道主义的这些因素，以及民主主义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思想情绪，是已经找到一条制定真正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途径的马克思，能够在一个非常短暂的时期（正象后来所证明的）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卢格、民主主义者尤·弗吕贝尔、革命诗人格·海尔维格、激进主义政论家卡·路·贝尔奈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未来思想家之一莫·赫斯等人一起行动的共同基础。⁴⁰

计划邀请一些著名的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梅耐、勃朗、卡贝、蒲鲁东等人为杂志撰稿。马克思还试图邀请费尔巴哈写一篇文章来批判谢林的反动哲学。列宁高度评价马克思1843年10月3日写给费尔巴哈的这封信，说他在这封信中“就已经异常明确地指出了哲学上的根本路线”^①。但是，费尔巴哈宁愿离群索居。而马克思仍然希望能吸引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1844年8月11日马克思从巴黎写给他的信就是证明。邀请费尔巴哈参加杂志工作虽未成功，但是，伟大的德国革命诗人亨利希·海涅同意撰稿，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这一点。

创办杂志的大量组织工作要求马克思到巴黎去。他早就决定要离开德国，由于普鲁士政府企图收买马克思，许给他一个“肥缺”，通过他已故的父亲的朋友、枢密官埃塞尔建议他担任普鲁士的公职，他就提前离境了。后来马克思在回忆这件事时写道：“**在他通知我这些建议之后，我就离开普鲁士到巴黎去了。**”^② 1843年10月的最后几天，马克思偕同妻子去巴黎，住在田崑路38号。

以后，马克思好几次重访法国首都。他非常了解法国，熟悉它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3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4页。

的历史，经常热情地赞颂法国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但是，马克思第一次在巴黎的一年半逗留对他观点的发展影响最大，正是在这里他完成了向革命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确定了自己的终身使命：代表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利益，为这个阶级的事业而奋斗。

他在法国的头几个月，就感到了法国首都沸腾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当时巴黎是世界科学和文化最大的中心之一，也是革命运动最大的发源地之一。按列宁的说法，巴黎“政治生活沸腾，
41 大家都在热烈地讨论各种不同的社会主义学说”^①。法国首都为研究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同革命的无产阶级代表建立了政治联系。

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

《德法年鉴》双刊号(第1号和第2号)在1844年2月底出版。除了马克思的文章以外，还刊登了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两篇文章，海涅和海尔维格的诗歌，赫斯和贝尔奈斯的文章以及许多其他材料。

在《通信》这一部分里刊登了马克思在筹办杂志时期写给卢格的几封信，以及卢格本人、俄国革命者米·亚·巴枯宁和费尔巴哈的信。马克思的两篇文章决定了该杂志的基本方向。第一篇《论犹太人问题》，看来是在克罗茨纳赫写的，第二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是1843年12月到1844年1月在巴黎写的。

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驳斥布·鲍威尔在解决被剥夺政治权利的德国犹太人的解放问题上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鲍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60—561页。

威尔认为，解决办法就是使犹太人从宗教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指出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在考察犹太人的解放这个局部问题时提出了人类从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这一普遍性问题。同时，他还阐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之间的区别。

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就是人摆脱封建的桎梏，就是宣布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实现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马克思在承认政治解放的重大意义时，也看到了它的局限性。他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① 它的局限性是私有制的存在造成的，因为私有制是由资产阶级革命作为某种不可侵犯的社会制度加以保护的。

马克思以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分析了基本的资产阶级自由的实质，这种自由是因政治解放而获得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把它宣称为人的天然权利的表现。马克思指出，这些“人权”首先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资产者的权利。资产阶级所理解的自由，实质上是个人任意处置其私有财产的自由，而个人安全的权利是所有者的不受侵犯的权利，是个人的首先是财产的不受侵犯的权利。因而，政治解放或政治革命（马克思作为同义语使用的这两个术语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是人即市民社会的成员的解放，是“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② 的解放。

针对政治解放，马克思提出了关于人的解放的原理，即人从现代市民社会的弊病中解放出来，消灭实际的不平等、压迫和相互倾轧，创造一切条件使社会中占优势的是真正的社会原则，而不是利己主义和人与人的互相敌对。这里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使用的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9页。

② 同上书，第437页。

是费尔巴哈的术语，尽管已赋予别的含义。他写道：“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①

这些论述实质上已经初步勾画了关于根本改造市民社会的基础和建立人们的真正的共同体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当然，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术语上，而且表现在关于人类解放问题的某些抽象提法上，但是对政治解放即资产阶级革命的批判，已经非常具体了。然而马克思的《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实质上已经论述了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同时提出了后者必将随着前者而出现的论点。马克思的另一篇文章《〈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回答了应当由谁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性来实现人的解放，哪种社会力量能体现社会的进步。

根据对以往革命经验的分析，马克思得出结论：在革命时期，
43 有一个社会阶级力图作为全社会的解放者出现，但是，它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并寻求自己的特殊目标。只有在客观上当这个阶级的“本身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②，这个阶级才能扮演全社会的解放者的角色。能够实现全人类解放的阶级，应当是一个同整个现代社会处于对立的阶级，应当是一个如果不解放全人类因而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摧毁者和新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的思想，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的起点。从这个时候起马克思世界观的形成过程，同时也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页。

观的形成过程。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还论述了另外一个极重要的原理：先进的理论具有巨大的革命作用，先进的理论是根本改造社会的斗争中的强大因素。他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①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真正运用革命学说的结论并把它付诸实现的社会力量。“哲学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②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思想，表明马克思在同带有敌视无产阶级的那些阶级的烙印的一切理论划清界限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而，很自然，马克思正是在第一次得出这个结论的这篇文章中，言简意赅地批判了保守反动的思想体系的许多表现，比早期阶段对这些思潮所做的批判更加深刻。此外，马克思第一次公开地提出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观点的根本缺陷，指出他们企图把斗争局限在理论范围内。

伟大友谊的序幕

44

在《德法年鉴》的目录上，并排出现了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个名字。乍看起来，这是巧合，却有深刻的象征意义。马克思不久就有了一位同他肩并肩地走过以后生活道路的志同道合的忠诚的战友，一位在科学工作和实际斗争中不可缺少的助手，这个人的名字同他本人的名字是分不开的，这就是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5页。

恩格斯的精神发展,虽有其特点,同马克思观点的发展在方向上是一致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普鲁士莱茵省人。他于1820年11月28日诞生在乌培河谷的巴门的一个因循守旧的纺织企业主的家里。父亲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竭力用严格的资产阶级的规范和宗教正统思想来教育孩子们。但是这在年青的恩格斯身上引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

父亲没有让恩格斯中学毕业就派他到不来梅去经商。恩格斯一面在商行里工作,一面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自学。他研究历史、哲学、文学、语言学和外国语。他从小就在外语方面有特殊的才能。当代的先进思想,首先是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帮助恩格斯摆脱了家庭灌输给他的宗教观点。

恩格斯所以形成革命民主主义的观点,是由于当代进步的社会思潮——白尔尼的民主主义、黑格尔哲学、青年黑格尔派的激进主义思想的影响和直接的生活体验,他对他出生城市的劳动人民遭受剥削的情况有深入的了解。青年恩格斯早就表现出卓越的文学才能。早在1839年,他就为激进主义文学团体“青年德意志”的机关报《德意志电讯》这个进步刊物撰稿,当时他十分赞同该杂志的观点。他的第一篇文章《乌培河谷来信》描写了伪装虔诚的雇主残酷压迫工人的情景。恩格斯的以后的几篇文学批评和政论文章就有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对德国现存制度的强有力的批判。

45 从1841年9月下半月到1842年8月中,恩格斯作为志愿兵在当时普鲁士的首都柏林的一个炮兵部队里服兵役,这就使他有在柏林大学旁听,结识更多的人。在柏林他同青年黑格尔派接近,他当时基本上同意他们的观点,并积极参加当时在德国开展的思想斗争。那时,费尔巴哈的著作,特别是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对恩格斯的观点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后来恩格斯写道:“这

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①

在柏林，恩格斯写了一系列著作（《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的哲学家》）直接批驳著名的哲学家谢林，当时谢林显然已向右转，成了神秘主义和反动思想的鼓吹者。恩格斯的这几本写得机智而出色的小册子，充满了无神论和对蒙昧主义的抨击。这些小册子颇受欢迎，但是读者中很少有人想到它们的作者并不是有学位的哲学家，而是一名年青的志愿兵和大学旁听生。

1842 年秋，恩格斯去英国曼彻斯特，到他父亲入股的贸易公司的办事所工作。恩格斯在这个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差不多住了两年。由于他亲自接触当时这个最发达的具有尖锐矛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从而学到了很多東西。他从研究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罗伯特·欧文的著作中，又获得了许多思想养料。在英国他还赶上了欧洲最发达的工人运动——宪章运动。

恩格斯在英国作为一个政论家，积极为欧文主义和宪章主义的报刊撰稿，向《莱茵报》和《瑞士共和主义者》杂志投寄文章和通讯。他还给《德法年鉴》写了两篇文章。

在英国居住，研究英国的经济生活和政治发展，深入了解工人运动及其领袖，直接参加工人运动，——这对恩格斯的世界观彻底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后来，恩格斯回忆道，他在曼彻斯特得出了一个结论：作为阶级对立和党派斗争基础的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性的作用。

象马克思一样，恩格斯也认为工人阶级是能够改造社会的力量。⁴⁶ 新世界观的这些因素反映在他当时写的文章，特别是发表在欧文主义者的《新道德世界》上的那些文章中。但是，最能说明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

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是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两篇文章：《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

当时，青年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还没有完全摆脱自己思想前辈的影响，还认为费尔巴哈主义是无产阶级应该全盘接受的革命哲学。象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恩格斯也认为共产主义不仅是劳动人民而且是资本家本人从资产阶级关系狭隘框框中解放出来的手段。

1842年11月底，恩格斯在去英国途中访问了《莱茵报》编辑部，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这时马克思正在同柏林的“自由人”发生尖锐冲突，恩格斯在柏林时曾与他们有过联系。因此，这两位未来的朋友第一次见面显得非常拘谨。但是这没有妨碍马克思对恩格斯这位《莱茵报》的英国通讯员的评价，仍然重视他的写作活动。

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恩格斯的文章，使马克思看到他们两人的思想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从这时起，他们彼此开始通信，揭开了亲密友谊的序幕。而恩格斯也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德法年鉴》的这位编辑对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作用，愈来愈清楚地看到“有一颗暴烈的心的、面色黝黑的特利尔之子”——这是马克思的未来战友在1842年同埃·鲍威尔合写的《奇迹拯救圣经免遭毒手》中对马克思的称呼——的非凡才能。

同时代人对《德法年鉴》的评价

《德法年鉴》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开始打开了销路。《曼海姆晚报》说，在巴黎的德国人几乎都人手一份。在莱比锡、柏林、维也纳，有大批人要求订阅。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向政府报告了该杂志的“危险”倾向，政府便下令禁止该杂志入境，如果马克思、卢格、海

涅等人进入普鲁士国境，就加以逮捕。一批杂志在边界被没收。据某些材料说，三千份印数中有三分之二落入了警察的手中。

《德法年鉴》的出版引起了右派报刊和温和派报刊的恶毒攻击，它们已经明显地觉察出该杂志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倾向了。1844年4月4日，莱比锡的反动的《铁路报》写道：《德法年鉴》的编辑和撰稿人的目的是“把各民族的无产阶级奉若神明，只对它寄予希望和信任”，因此，“德国自由主义报刊的神圣职责就是坚决表示自己的愤慨，毅然割断同他们的一切联系”。保守的《总汇报》也急忙愤懑陈词。该报于1844年3月10日写道：“巴黎新杂志的批判毫不留情，它的论战超出了一切美学的标准，它的讽刺笔调虽然不象匕首那样锋利，但确象一个粗壮拳头的打击。”

然而，一份份《德法年鉴》传到了德国和包括俄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同情革命思想的读者手中。伟大的俄国启蒙者、革命民主主义者维·格·别林斯基阅读了马克思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写信告诉亚·伊·赫尔岑：“我找到了真理，我在**神**和**宗教**这两个词里看到黑暗、愚昧、锁链和鞭子，如今我爱这两个词，如同我爱随着这两个词而来的那四个词。”^①马克思这几篇文章的手抄的译文在俄国也曾秘密流传。

《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总结了马克思生平活动中的整整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克服了唯心主义，最终地转到唯物主义立场，从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思想家。列宁写道：“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已作为革命家出现，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②从这时起，马克思的世界观的发展开始了一个新阶段，他开始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了。

① 《别林斯基书信集》1914年俄文版第3卷第87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7页。

第二章

48

开始制订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原理

“如果有哲学家和我们一起思考，
有工人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事业奋
斗，那么世界上还有什么力量能阻挡
我们前进呢？”^①

恩格斯

与卢格决裂

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中叙述的新观点，暂时还只是对以往的科学发展和社会历史发展作了一定的总结之后所形成的天才的假设，但是，无论从历史方面，还是首先从哲学方面和经济学方面，都需要加以全面论证。在这以后，马克思使自己全部孜孜不倦的理论活动都服从于这一任务。

然而，马克思不再把自己的科研和创作的计划同出版《德法年鉴》联系在一起。第一期出版之后不久，他就发现很难再继续出版了。由于该杂志在德国境内处于非法地位，传播遇到了极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95页。

困难。

《德法年鉴》这么快就停止出版还有另外一些更深的原因。在准备出版第一期的过程中，在杂志的编辑马克思和卢格之间就已经发生了原则性分歧，随后又导致公开冲突。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不赞成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信仰。作为青年黑格尔分子，他对“无批判力的”群众，对工人阶级采取藐视的态度。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里的彻底革命的调子，对现存制度的无情批判，马克思要同工人建立紧密联系的意愿，把卢格吓坏了。在杂志第一期上，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同卢格所写的文章在内容上的差别。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抨击性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中指出，他们那些文章的内容和卢格写的出版前言中的主张是“完全相对立的”^①。杂志出版以后，走在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上的两个编辑不能再继续合作已经成为明显的事实。不久以前的两个同盟者站到两个不同的营垒中去了。

从那以后，马克思不止一次地在报刊上严厉批判卢格站在无产阶级运动的资产阶级反对者立场上。然而这并没有妨碍马克思在1845年1月，当他刚刚得知警察机关准备对他过去的同事采取镇压手段时，立即写信给卢格要他提防。

1844年马克思在巴黎

马克思在巴黎住得越久，他对七月王朝的社会政治形势、当时法国社会中各种政治流派和社会主义流派的性质了解得也就越深。马克思和各种反对派、法国社会主义者、革命无产者以及德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11页。

革命流亡者之间的联系也更密切了。

法国 1830 年资产阶级革命把政权从大土地所有者手里转交给了金融资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的上层——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和铁路大王，煤矿和铁矿的所有者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土地私有者。金融贵族从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中捞到的油水最多。1830—1840 年这十年里，法国蒸汽机的数目增长了三倍多。50 1828—1847 年钢铁产量增长一倍以上，采煤增长了两倍。后来，马克思非常准确地把七月王朝称作“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二十四万选民和他们的随从之间分配的”^①。国内发生的工业变革带给工人的是剥削加重，实际工资降低和工作日延长。高额财产资格限制使工人阶级和城乡中等阶层处于政治上无权的地位。国内不满情绪增长。在工人阶级中间宣传革命思想有了更有利的条件。工人阶级不仅倾向于激进共和主义学说，而且倾向于社会主义学说。

三十年代末，空想社会主义和空想共产主义思想在工人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法国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是五光十色的。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是圣西门和傅立叶的追随者。他们在传授老师的学说时使这些学说具有极端教条主义的、宗派主义的性质，而这些学说的客观上带有革命性的内容被阉割了。和他们类似的有其他小资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们，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比·勒鲁和菲·毕舍、“国家”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到涂上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社会主义者比·约·蒲鲁东，他们都否定无产阶级的独立革命行动，宣扬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和阶级调和，害怕革命行动。这些思想能够在工人中间传播，反映了法国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14 页。

不够成熟。

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具有另外一种性质。虽然他们的学说的基础是唯心主义的，有时还是臆造的观念，虽然他们之中某些人，例如埃蒂耶纳·卡贝，继续抱有可以通过和平宣传和建立试验性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来实现共产主义的幻想，但是他们的理想已经超出了通过改造现存社会的某些机构来革新社会这个范围。空想共产主义者号召人们建立一个崭新的制度。他们推动了无产阶级的觉醒，使他们认识到资产阶级社会和他们应当争取的未来社会制度之间的对立。从这种意义上说卡贝的《伊加利亚旅行 51 记》一书以及他出版的《人民报》起了积极的作用。

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的杰出革命家巴贝夫的学说的德奥多·德萨米和奥古斯特·布朗基所代表的法国空想共产主义的革命派，在更大的程度上反映了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增长。他们认为必须用革命来推翻现存制度并建立革命的专政。而且，如果说布朗基追随巴贝夫认为可以通过组织得很好的少数人的密谋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那么德萨米已经否定了密谋策略。但是，甚至这个最先进的思潮的代表们也不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没有认清无产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创造者的世界历史作用，没有把无产阶级从广大的劳动阶层和被剥削群众中区分出来。

在巴黎，马克思直接目睹了许多工人小组中围绕着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热烈的争论。他了解了大多数以秘密团体形式存在的工人组织中间发生的思想斗争。正如马克思所确信的，法国工人的政治经验是相当丰富的。但是，在他们头脑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反映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想大杂烩的混乱糊涂的思想。在法国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中反映出它的社会结构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同小的、半手工业的企业在法国工业中占优势这一现象联系

在一起的。工人在确信大资产阶级在 1830 年叛卖之后，依旧相信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者，并在政治上追随他们。

马克思在巴黎不论是同法国人的工人组织、还是同德国流亡者的工人组织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结识了它们的领导者，参加了工人的集会。从巴黎寄往德国的一份警察局情报中说，德国共产主义者每星期日都举行集会，参加的约有一、二百人。在这些集会上发表演说的名单中也有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在 1844 年 8 月写给费尔巴哈的信中谈到自己的印象时写道：“您应当出席法国工人的一次集会，这样您就会确信这些受尽劳动折磨的人纯洁无瑕，心地高尚……历史是会把我们文明社会的这些‘野蛮人’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的。”^①

- 52 马克思会见了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正义者同盟是流亡国外的德国无产者化的手工业者的组织，建立于 1837 年，它不仅在巴黎，而且在德国、瑞士、英国和其他地方都设有支部。它和法国的秘密团体，其中包括布朗基的“四季社”保持联系。开始，在该组织成员中间占统治地位的是巴贝夫及其门徒的思想，稍后，德国第一个空想共产主义者威·魏特林的观点得到了传播。

马克思也和蒲鲁东有密切交往。在经常是通宵达旦的长时间争论中，马克思努力启发蒲鲁东用辩证的和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世界。马克思与勃朗和卡贝也有个人交往关系。

马克思虽然和各种工人组织保持联系，但当时没有加入其中的任何一个组织。他不愿意亲自参加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宗派，因为他对它们观点的弱点和反科学性了如指掌。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制定为无产阶级指出根本改造现存制度的途径和手段的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并宣传这一理论。他希望借此来提高当时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450、451 页。

人运动参加者的思想水平,促进建立真正革命的、摆脱了宗派主义狭隘性和片面性的无产阶级组织。正如马克思后来所写的:“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①

繁重的理论工作,对工人运动的研究,还没有包括尽马克思在巴黎的全部多种多样的活动内容。他广泛结交法国激进派人士,其中包括聚集在《改革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结交住在巴黎的各国革命派的代表。马克思参加了1844年三月底举行的国际民主主义者的宴会。

到田鳧路马克思家里来的有诗人格奥尔格·海尔维格和亨利希·海涅,正义者同盟巴黎支部的领导人海·艾韦贝克和海·梅伊勒,新闻工作者贝尔奈斯,俄国革命者巴枯宁及其他许多人。1844年11月,居住在莱茵地区的具有激进情绪的医生罗·丹尼尔斯和政论家亨·毕尔格尔斯来到巴黎并拜访了马克思。

马克思和《莱茵报》的老同事、民主主义诗人海尔维格的关系⁵³是友好的。当卢格对海尔维格进行粗暴庸俗的攻击时,马克思为他辩护,尽管这个时期马克思同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上的海尔维格已经不是志同道合的了。

深厚的友谊把马克思和伟大的德国诗人亨利希·海涅联系在一起,在巴黎他们经常见面,有时每天都见面。海涅把自己的诗读给马克思和马克思夫人听,他对马克思夫人的意见评价很高。有时马克思成了海涅作品的第一编辑。后来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写道,海涅和马克思常常一起推敲某一首诗,无数次地反复诵读,逐行琢磨,直到这首诗达到完善地步为止。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海涅的创作中的社会主题增加了,正是在这个时候他写出了标志着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

诗作顶峰的《织工之歌》和《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曾按清样把《一个冬天的童话》发表在《前进报》上，清样是作者本人在该诗单行本出版之前寄给他的。

当海涅受到不怀好意的人和评论家的攻击时，深感痛苦的、受到严重伤害的海涅，就到马克思家里去寻求慰藉。诗人眷恋自己年青朋友的家庭，这位朋友的内心世界对他是真正贴近的。有一次海涅给了马克思莫大的帮助。1844年5月1日诞生的马克思的半周岁的孩子燕妮突然发生严重痉挛。全家人——父母亲和保姆——完全慌了手脚，幸好刚在这时到来的海涅采取了措施。海涅没等医生来到，异常镇静地给小女孩洗了个澡，她就恢复了正常，吓得要命的马克思夫妇也和她一起恢复了常态。

在马克思的巴黎的朋友中间，海涅在那一阶段几乎是最知己最亲近的。马克思同这位天才的诗人、这位当时最有教养的人交往，受益不浅。难怪马克思后来在得知有被逐出巴黎的危险时，给海涅写信说：“在我要离别的人们中间，同海涅离别对我来说是最难受的。我很想把您一起带走。”^①

同样，海涅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也对马克思——学者、革命家、人——怀有深深的敬意。1856年海涅逝世之前不久在写到“德国共产主义者的领袖”时，说他们有着“德国最聪明的头脑和最刚毅的性格”，是“德国无与伦比的有生气的人”^②，未来是属于他们的。

马克思在巴黎结识了俄国流亡者米·亚·巴枯宁、瓦·彼·波特金、赫尔岑的朋友尼·伊·萨宗诺夫等人。在这些年里马克思和巴枯宁见面最多。马克思在谈话中向他讲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观点，试图在这方面影响巴枯宁，那时巴枯宁在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7页。

② 《海涅全集》1937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10卷第337页。

己的世界观中把感伤的唯心主义和“本能的”——按他自己的话来说——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的朋友们在他家里不仅受到亲切的关怀，而且还得到经常的帮助。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根据她母亲的叙述回忆说，她母亲在结婚之后不久得到了一笔不大的遗产。年青的夫妇把这笔钱放在一个匣子里。当穷困的朋友和同志来看望他们时，他们就把匣子打开放在桌上，每个人都可以从那里拿到他所需要的数目^①。

科学研究工作

马克思迁居巴黎后，象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热心地研究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历史”^②。他常常是一连几昼夜坐在那里读书，只是在吃饭和短暂睡眠时才间断一下。

马克思力求弄懂资本主义及其矛盾发展的内部过程，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现代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在这些科学研究中占重要地位。马克思一次又一次地研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典型事例。他非常认真地研究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史上一个最重要的时期，1792—1793年时期；当时，在1792年8月10日推翻了王朝以后，在温和的资产阶级代表吉伦特派和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雅各宾派之间展开了斗争。马克思打算写一部国民公会史，并且收集了大量的材料。他研究了雅各宾派领袖罗伯斯比尔、圣茹斯特、德穆兰的著作，从国民公会议员、雅各宾党人勒瓦瑟尔的回忆录中作了摘要，冠以《雅各宾派和吉伦特派的斗争》的标题。

关于马克思的写作计划，显然在民主派人士中间已经是众所

① 参看《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93页。

55 周知的。1845年冬《特利尔日报》在谈到马克思被逐出巴黎时写道，他越过国境是“为了在那里完成自己的《国民公会史》”。马克思的计划没有实现。但是，他在研究法国革命史过程中所得出的结论，在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为计划中的著作所准备的材料没有白费。马克思对法国革命大动荡时期的阶级斗争史的研究，弄清这一斗争的物质根底和下层群众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马克思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在研究阶级斗争的起源、规律和形式的问题时利用了复辟时期历史学家——梯也尔、米涅、基佐的著作。资产阶级历史学中这一学派的代表尽管在他们的观点上有种种局限性，但承认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斗争在导致资产阶级社会产生的历史进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然而，他们看不到产生阶级的经济基础，也不懂得资本主义时代阶级斗争的真正性质。与他们相反，马克思首先关心的是作为阶级结构的基础的社会经济结构，当代世界经济关系的实质，这是理解眼前发生的阶级冲突的关键。政治经济学在马克思的科学研究中开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在1843年夏得出了结论：对所谓“市民社会”即社会关系的总和的剖析，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从这时开始一直到生命结束，对经济问题的研究成了马克思科学研究工作的主要方面。

马克思在巴黎仔细研究了许多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萨伊、斯卡尔培克、詹姆斯·穆勒、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麦克库洛赫、布阿吉贝尔等人的著作。在他的大量经济著作摘录中，常常同时写下了他个人的评述和想法。从这些评注，特别是有关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详尽评注中可以看出，尽管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划清界限的工作还刚刚开始，他自己的经济学观点还处在形成的最初阶段，但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采取

了非常鲜明的批判态度。马克思尖锐地看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陷：它把历史地形成的、暂时的资本主义关系解释成仿佛⁵⁶从来就有的、同“人的本性”^①相适应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本身和在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评注是很有远见的。评注中包含有对剥削制度经济基础的批判（诚然还是萌芽的形式），指出了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占有制所固有的那些矛盾。

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给马克思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马克思认为这是一部天才的著作，后来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尤其是《资本论》中不断引用这本书。他认真地阅读了恩格斯这一著作，并作了摘要。在这一著作中第一次从社会主义立场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马克思把自己在这段时期的研究成果叙述在这样一部著作中，这部著作我们看到的是三本未完成的手稿，有一部分还是片断，它们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著称。这些手稿是同年4—8月写的。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叙述了马克思那一时期的经济学观点和哲学观点。马克思在序言中写道，他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的”^②。他把展开对私有制和现存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目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5页。

② 同上书，第45页。

马克思发展了他在《德法年鉴》中表述的思想：只有根本改造“市民社会”，换句话说，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才能实现人的解放。在这里明确地表示要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作者完全对劳动人民都抱有政治同情。关于法国的无产者，他写道：“人与人之间的兄弟情谊在他们那里不是空话，而是真情，并且他们那由于劳动而变得结实的形象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①他揭露并痛斥那个“使工人陷于贫困并变为机器”^②的制度。

- 57 在确定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态度时，马克思对它的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在马克思看来，经济思想的发展不是取决于某种绝对对精神的运动，而是取决于私有制的历史演变。在经济思想的历史接力赛中，就象在镜子里一样，反映出封建主义日趋解体和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制度一步一步地屈服于资本。政治经济学成了万能的资本的奴仆，而政治经济学家则成了“经验的生意人”即资本家的科学良心。生产领域中现实变化的真正进程是，资本家最终战胜土地所有者，高度发展的私有财产战胜“不发达的”或者说“不完全的私有财产”^③。

与只承认农业劳动才是财富的源泉的重农学派不同，斯密和李嘉图承认一般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显然是前进了一大步。因此，马克思把斯密和李嘉图的“启蒙国民经济学”评价为这门科学发展中的最高阶段，虽然他在这里还没有特别强调这些经济学家的主要成就——他们的劳动价值理论。但是，马克思在作这个肯定评价的同时，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薄弱的、纯粹是辩护性的方面进行了尖锐的批判。

马克思斥责政治经济学不理解“运动的相互联系”，往往把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0页。

② 同上书，第55页。

③ 同上书，第110页。

济方面的事实、现象和过程解释成彼此孤立的，是外在的力量或意志的活动的结果。这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所固有的形而上学方法的公正批评。马克思指出了它对经济现象的形而上学的反历史的态度，揭露了它对资本主义现实本身的依附关系，即它的局限性的根源，从而把它和他自己正在创立的新科学的分界线划清了。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理解私有制、贪欲、竞争、人的价值（自然，马克思当时还不知道劳动力的价值这一范畴）和人的贬值等等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①。

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主要部分是揭露异化和异化劳动范畴的实质。在这里，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本身所承认的“当前的经济事实”当作确立自己的观点的出发点，这个事实⁵⁸就是：随着工人生产的财富的增长，工人越来越贫困化。

“异化”这个术语本身在马克思以前的哲学著作中曾广泛使用。黑格尔曾经讲过自我异化的精神的世界。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观念自我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历史和思维中，又重新回复到自身，变为“纯意识的太空”^②。费尔巴哈把异化归结为人把自己的本质的“类的”特性，即从所有人特有的自然本质中抽象出来的共同特性加以异化，就是说人创造神并把神当作世界的创造主。因此，人在尘世不得不采取那种同他的真正本质相异的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而同这种真正本质相适应的“类的”生活只存在于宗教幻想中，变成纯粹幻想的生活。费尔巴哈力图克服黑格尔对异化问题的唯心主义解释，把这个概念归结为抽象人的自然本质的异化，按照抽象人道主义的精神对它作了解释，他忽略了这个问题的社会内容。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着手研究人们的社会生活并且从生产资料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0页。

^② 《黑格尔全集》1959年莫斯科版第4卷第262页。

私有制所决定的这种生活条件中引伸出异化。他把异化首先解释成人们的社会联系、社会交往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们生活和劳动的条件，他们活动的结果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表现为异己的敌对的外部力量。他所理解的异化是私有制度的直接结果。经济领域中的异化是社会关系的各种物质领域中的，归根到底也包括精神领域中的其他异化形式的基础。马克思把现实生活作为出发点，这样他就不是把那种只有古典哲学及其追随者号召进行的“纯粹观念的斗争”^①作为目标，而是把同那种产生异化并使之成为必不可免的不公正的和无人道的现实进行斗争作为目标。这样提出问题就已经包含着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在这方面的弱点的克服。同时也就实际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正常性和永恒性的基本命题。

马克思特别详尽地发挥了异化劳动的范畴。马克思强调指出，⁵⁹人的活动和人作为自觉的社会存在物的自我肯定，首先表现在对象世界的实际创造之中，表现在社会生产之中。工人生产产品是工人自身的对象化，由于私有制的统治而失去他们生产的对象就是劳动的异化，因为对象“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②同工人相对立。劳动的产品不是归它们的创造者所有，而是归掌握资本的人所有。作者给资本下的定义就是他人劳动产品的私人占有。人以自己的劳动、自己的生产活动产生出 not 从事生产的人支配生产和产品的权力。“对对象的占有竟如此表现为异化，以致工人生产的对象越多，他能够占有的对象就越少，而且越受他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③随着资本的威力的增长，除了自己的双手外一无所有的工人越来越贫困。出现了两个极端，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5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1页。

一极是需要和满足需要的资料的精致化,在另一极是“需要的……最彻底的粗糙的、抽象的简单化”。可见,劳动的异化表现为日益加剧的财产不平等,表现为劳动与资本之间鸿沟的加深。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条件和劳动本身对工人来说是可诅咒的,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属于他的本质的东西”^①。在资本统治下的雇佣工人“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②,不是发展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而是摧残、损害自己的身心。物质财富的生产者成了既定的分工的奴隶,他被永远束缚在一定的职业上。工人在工厂、机床和其他地方的劳动具有被迫的性质——这是“他自身的丧失”^③。工人实际上只是在他的纯粹动物机能——吃、喝等等之中才感觉自己是自由的。工人只有在在劳动时才“属于自己”,劳动时就不“属于自己”。

《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关于异化劳动的观点按其实质来说是马克思的资本占有他人雇佣劳动这一理论的萌芽的、原初的形式,是马克思许多年以后在《资本论》中发挥并科学地论证的那些极重要思想草图的发端。

人同他的劳动产品的异化,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本身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敌对的对立,在马克思看来,必然导致“类本质”的退化,导致“人同人相异化”^④。因此,要恢复正常的、符合人类本性的社会联系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只有根本改造社会,根本改造所有制关系,而不能象费尔巴哈所说的那样,用另外一种高级的宗教代替传统的宗教,用爱的说教来实现。

私有财产是异化或劳动的自我异化的基础和原因。另一方面,它又是异化的结果。劳动的异化本身的结果是私有财产的再生产。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③ 同上书,第94页。

④ 同上书,第98页。

马克思把私有财产称为异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①。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从私有财产下面解放出来是工人的经济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必要的和主要的条件，这也意味着真正地取消异化。同时马克思强调指出，工人的解放“包含全人类的解放”^②。

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基本上是从哲学观点考察了对社会实行共产主义改造的问题。当时他使用了传统的，其中包括费尔巴哈的哲学词汇，说共产主义就是和人道主义完全相同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或者是和自然主义等同的完成了的、现实的人道主义。然而，整个说来马克思在这里已经大大超过了他的思想先驱，并且表述了崭新的观点。他从不同角度叙述了自己关于**真正的**共产主义的观点，他认为真正的共产主义是私有制被废除的高级形式，也就是人的任何异化和自我异化，经济的和意识领域的异化包括宗教的异化被废除的高级形式。

马克思指出，在私有制的基础上，自然科学的发展，体现在工业中的应用自然科学一方面导致经济上富有的产生，另一方面导致经济上贫困的出现。而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它们为充分表现人类本性的丰富多采和丰富人类需求本身创造条件。马克思在同
61 那些歪曲共产主义内容并使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丧失威信的早期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观点划清界限时，着重指出，只有那种社会制度才能称为共产主义，这种制度消除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使人的感觉合乎人性，使之符合人的社会本质和自然本质，生产出“**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③。因此，未来社会在马克思看来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符合最高人道主义原则的阶段；这个阶段使人得到充分发展，使人的物质的和精神的需求得到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2页。

② 同上书，第101页。

③ 同上书，第126页。

面满足,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和谐一致。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尖锐地指责空想共产主义流派所固有的平均主义倾向。马克思承认它们作为一种受历史制约的对私有制统治和财产不平等的反抗形式所具有的意义,同时否定它们是未来的理想。马克思把平均共产主义叫作粗陋的、未经周密思考的、否定人的个性的、崇拜平均化的共产主义。它的原则之一就是倒退到“**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的非自然的单纯**”^①。这实际上是对真正的共产主义的拙劣模仿。

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的胜利是在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制度内部准备好的。但是,要保证这一胜利,只有理论觉悟是不够的。“要消灭私有财产的思想,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而要消灭现实当中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②可见,马克思强调了作为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手段的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

在哲学方面,马克思首先想回答“……我们如何对待黑格尔**辩证法**”^③的问题。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性分析是这篇著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最后专门有一章谈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主义,其中包括“精神现象学”作了周详而相当成熟的批判。马克思站在彻底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利用费尔巴哈的正面经验和发现,对黑格尔哲学作了深刻的分析。马克思做到了明 62
确区分这一哲学的革命方面和保守方面。他明确地批驳了它的唯心主义,指出黑格尔的抽象形式和思维形式脱离现实,并强调指出“**绝对观念本身是无,只有自然界才是某物**”^④。马克思在对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

② 同上书,第140页。

③ 同上书,第156页。

④ 同上书,第177页。

化范畴作唯物主义解释的范围内,考察并肯定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积极的环节”^①,即黑格尔关于异化的发展和扬弃过程的合理思想,虽然这种思想是以抽象的唯心主义的形式表述的。

尽管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抱赞许态度,但他把社会生产、社会实践提到了首位。费尔巴哈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只看作自然的关系,把人类的这个概念只看作人和自然界的自然统一,马克思的全部叙述远远超过并克服了费尔巴哈的这种观点。

马克思的出发点是承认社会环境对人们之间关系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他实际上证明了,在决定社会关系的环境即物质生活生产的条件没有改变之前,希望社会关系向好的方面有某种改变,是徒劳无益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手稿尽管在术语上还不太合适,但反映了一系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形成过程中的一定阶段。《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表明马克思在努力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进行了多么广泛的探索,唯物辩证法对于有成效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和分析社会现象又是多么重要。

为《前进报》撰稿

在继续出版自己的刊物的希望破灭以后,马克思开始寻找在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的可能性。很快马克思和其他《德法年鉴》的老同事就有了在一家流亡者报纸《前进报》上发表著作的可能。

这家报纸是由一个有进取心的德国商人亨利希·伯恩施太因从1844年初开始在巴黎出版的。作为主编的伯恩施太因吸收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4页。

普鲁士退伍军官阿达尔贝特·伯恩施太德参加办报，后来弄清楚此人是普鲁士和奥地利警察局的密探。《前进报》每周出版两次。⁶³起初它的政治倾向是非常温和的。报纸对《德法年鉴》的出版进行了尖刻的攻击，把那些在年鉴上发表文章的作者骂成“共产主义败类”。在1844年5月激进主义者卡尔·路德维希·贝尔奈斯担任主编之后情况开始转变。这位知识渊博、具有革命情绪并和马克思友好的政论家，不顾出版者伯恩施太德的反对，使报纸具有了民主主义倾向。这就使马克思有可能在报纸上撰稿。在这个报纸上开始发表文章的还有海涅、海尔维格、艾韦贝克、巴枯宁、毕尔格尔斯、卢格等等。

在每周举行的编辑会议上争论非常激烈，正如报纸的一个编辑所回忆的，连窗户也不能打开，否则街上就要挤满人群，打听激烈叫喊的原因。主要的争论是在马克思和卢格之间。胜利属于马克思，他从1844年夏季开始对报纸的方针影响越来越大。象后来恩格斯所写的那样，在马克思的影响下，“该报辛辣地嘲笑了当时德国专制制度和冒牌立宪制度的空虚拙劣”^①。

《前进报》的新思潮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出版界的注意。斯图加特的《士瓦本信使报》在报道中说，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上风的是“极端激进党”。德国民主主义新闻记者亚·魏尔在汉堡的《德意志电讯》杂志七月号上写道：“现在马克思和卢格永远决裂了，这样很好。马克思和他的战友还要完成重要的事业，因为他们年青有为……”

马克思在《前进报》中的领导作用，不仅从报纸的总方针中可以看出，在许多报道中都可以感觉出他的思想，特别是他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发挥的那些思想的直接影响。当时想和马克思结识的魏特林在1844年10月从伦敦给他写信说：“看了您在《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93—394页。

进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把它们的精神和人们对我谈到的您相比较,我觉得我已经认识您了……”^①

马克思和卢格之间的矛盾很快就转变成公开论战。1844年6月在西里西亚发生了抗议不可忍受的剥削和极少的劳动报酬的纺织工人起义。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得到全国响应的第一次公开发动。1844年6—7月,从巴伐利亚到东普鲁士,工人罢工和示威的
64 浪潮此起彼伏,哈布斯堡帝国统治下的捷克也发生了严重的工人骚动。德国资产阶级不得不惊恐地承认,不仅在英国和法国,而且在德意志各邦,无产阶级都咄咄逼人地、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存在和要求。充满恐惧的资产阶级报刊写道:“纺织工人的起义表明在资本家和无产者之间隔着一条多么深的鸿沟。”^②

卢格对起义的反映,对一个资产阶级政论家来说是很典型的。在用笔名“普鲁士人”发表在《前进报》上的文章中,卢格硬说西里西亚的事件是缺乏“政治精神”的、毫无意义和徒劳无益的暴动。他对无产阶级的独立行动采取了激烈的否定态度。

马克思在1844年8月7日和10日在该报上对卢格的文章作了回答。这个答复的标题是《评“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与卢格相反,马克思在这篇文章中首先强调西里西亚起义的巨大意义。他在起义中看到了德国工人的阶级觉悟的提高,看到他们正觉醒起来,懂得自己和私有制社会的根本对立。马克思把西里西亚的起义看作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征兆,它证明在工人阶级这个社会的革命改造者中间蕴藏着强大的力量。

无产阶级的发动和卢格对此发表的市侩的议论,促使马克思决定把他正在形成的关于工人阶级世界历史使命的思想的某些方面具体化,更深入地研究对世界进行社会主义革新的途径问题。

① 威·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62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533页。

② 康恩:《西里西亚织工的两起义》1848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版第363页。

卢格宣称解决社会问题不是无产者群众的使命，而是政权、国家，其中包括普鲁士王朝的使命；与此相反，马克思坚决否定了那种认为有可能依靠现存国家制度的代表们的主动性来实现社会的根本改造和消灭劳动群众社会贫困的想法，他得出的结论是：在现存制度范围内实行的任何改革，任何国家干预都不可能消灭贫困，因为贫困是私有制的产物。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表述了没有群众的、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向新社会过渡的思想，马克思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⁶⁵一个非常重要的原理：革命的政治方面是推翻现存政权，革命的社会方面是破坏旧的社会关系，这两个方面在革命中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和相互制约的。“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权，所以它具有政治性。”^①可见，马克思在这里已经非常接近于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的认识。

历史 性 会 见

从英国返回德国的恩格斯，在1844年8月底到巴黎拜访了马克思。在巴黎逗留的十天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是形影不离的。他们从每天的坦率交谈中发现彼此完全志同道合，对所有理论和实践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恩格斯写道：“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②思想上的一致加强了正在产生的彼此之间的好感。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朋友并且商定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7页。

自己未来活动的各个方面合作。他们交流了各自的计划并决定共同行动。其中，马克思要写一部政治经济学著作的心愿得到恩格斯的完全赞同。

马克思要自己的新朋友为《前进报》撰稿。由于马克思的缘故，恩格斯结识了法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和许多革命流亡者，其中包括巴枯宁。他们一齐参加了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集会。当恩格斯回国时，在两个朋友之间已经有了互相交流今后一切行动步骤的牢固协议。从此他们开始经常通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4 年秋在巴黎的会见为他们史无前例的创造性合作奠定了基础。列宁写道，“古老的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的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①

准备和恩格斯一起反对青年黑格尔派

在恩格斯就要来巴黎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打算写一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著作。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马克思就已经公开谴责“理论派”，该派在同德国反动制度的斗争中没有超出哲学范围。马克思写道：“关于这一派，我们回头还要详细谈到。”^②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序言中，马克思公开提出了与青年黑格尔主义划清思想界限的必要性，把它看成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③。

①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2—9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 卷第 45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第 48 页。

马克思在1844年8月初把自己打算公开批判鲍威尔的意图告诉了费尔巴哈。^①

恩格斯在巴黎逗留的时间里已表明他完全赞同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看法。马克思向他建议共同写作批判鲍威尔兄弟的小册子。他们立刻就动手写起来了。当恩格斯还留在巴黎时，他就写完了自己的、大约有一个半印张篇幅的那一部分，而马克思在自己的朋友去德国以后，即在1844年9—11月间仍继续写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对青年黑格尔派一定要进行公开批判，是有一系列考虑的。他们深知，只有在不断地和异己的思想流派划清界限的过程中，才能制定科学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另一方面，青年黑格尔派本身，特别是聚集在鲍威尔兄弟周围的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青年黑格尔派的首领放弃了使他们成为激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那些民主信念，在许多方面都往右演变了。他们已经不是过去反对宗教和普鲁士国家的斗争中的同盟者了。他们现在成了无政府主义知识分子的集团，他们傲慢地蔑视“群众”，把群众看作是消极被动的，看成进步的障碍。在鲍威尔兄弟看来，进步的唯一动力是“批判的批判”，他们自己则是“批判的批判”的化身。

在1843—1844年由布·鲍威尔在沙洛顿堡出版的青年黑格尔派月刊《文学总汇报》上，青年黑格尔派公开放弃了自己过去的 67 反对派情绪。布·鲍威尔在该杂志第八期上发表的《1842年》一文中，直接表示要和“在《莱茵报》上得到反映”的“1842年激进主义”划清界限。鲍威尔明显地影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德国的共产主义的拥护者，他以自己的立场反对那些“把社会主义看作新发现”的人的观点。鲍威尔宣称批判不再是政治性的，这样就宣布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1—452页。

他对政治采取特别蔑视的态度。在面临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德国的条件下,这类观点特别有害,因为它轻视工人阶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是能够保证对现存的半封建专制制度取得胜利的唯一力量。

鲍威尔给《文学总汇报》定的方针明显地适合反动派的利益。一位负责检查报纸的政府官员的反应很能说明这方面的问题。他写道:“鲍威尔兄弟使我感到真正的高兴,他们非常符合书报检查条令。”与此相反,民主报刊则强烈谴责鲍威尔兄弟的倾向。

青年黑格尔派在宣传主观主义观点时硬说,任何矛盾在意识中的克服,等于这些矛盾在现实中的克服,他们的哲学的反动社会内容也就客观地表现在这里。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们学会了“把**现实的、客观的、在我身外存在着的链条变成只是观念的、只是主观的、只是在我身内存在着的链条**”^①。

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前的任务是揭穿青年黑格尔派的虚伪的激进主义,与“批判的批判”针锋相对,说明自己的唯物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观点。

在马克思写作的过程中,原定的批判鲍威尔的小册子扩展成超过二十印张的一厚本书。在该书中马克思引用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作摘录和国民公会史准备材料中的一些思想和材料。此外他还专门研究了培根、洛克、霍布斯、爱尔维修等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者的著作。恩格斯在得知著作的篇幅要增加很多以后,写信给马克思说:“这是很好的事情。这么多的东西现在都要问世了,否则,谁知道它还会在你的写字台里搁多久呢。”^②

68 该书的手稿在1844年11月底才完成,但在9月底——10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9页。

初的德国报刊上已经发表了消息，说马克思正在写一本反对鲍威尔兄弟的小册子，题为《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其中批判的批判“将要被批得体无完肤”^①。马克思打算让尤·弗吕贝尔在苏黎世出版这一著作，但是弗吕贝尔过去的同伙卢格破坏了计划中的协议。于是马克思又试图在巴黎寻找出版者，但在这里也没有成功。该书在1845年2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问世，书名是《神圣家族。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

《神 圣 家 族》

《神圣家族》主要是哲学著作。它的内容包括对许多重要的哲学问题所作的唯物主义的解释，同时又是批判新世界观的哲学敌人的战斗性著作。对青年黑格尔派主观唯心主义的批判占据该书的重要地位。由于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以拙劣的、往往是以可笑的形式体现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一切缺点，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青年黑格尔主义所作的批判实际上是对整个唯心主义，对它的方法即颠倒形式下的辩证法所作的批判。这种批判是站在彻底唯物主义立场上进行的。《神圣家族》的作者在讥笑青年黑格尔派对自我意识的崇拜时写道：“批判的批判家……就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有**意识和存在**互相分别的世界存在；想不到，当我只是扬弃了这个世界的想象存在……的时候这个世界居然还象往昔一样继续存在。”^②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第一次用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史，他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

① 1844年10月14日《法兰克福总邮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5页。

哲学上的基本流派互相斗争的角度来考察哲学史。马克思特别强调唯物主义思想同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的内部联系,以及唯物主义历史同自然科学发展的联系。

马克思承认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的巨大进步意义,但他没有把自己的观点和他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观点等同起来。他在为一种以辩证法的全部成就丰富起来的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奠定基础。

《神圣家族》的作者把辩证法看作反映在思维中的、物质世界
69 客观发展过程本身的不可分离的属性。因此在《神圣家族》中,对于社会现象,从它们的辩证运动作了分析,揭示了它们所固有的内部矛盾是这一运动的源泉,这些矛盾的斗争是向新质革命转变的先决条件。

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观点的过程中,马克思揭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例如把个别和一般割裂开来,把具体的个别的东西仅仅看作一般概念存在的形式。马克思讽刺地写道,思辨哲学家“完成了一个**奇迹**:他从‘一般果实’这个非现实的、**理智的本质**造出了现实的**自然的实物**——苹果、梨等等”^①。在唯心主义哲学家看来,通过从事物中分析出一般来认识事物的过程变成了对这些事物的“一次创造”。与这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观点相反,马克思对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马克思指出把一般同特殊和个别割裂开来是完全错误的,他的出发点是:要正确地理解从具体的可感知的事物的世界向一般概念的转化,只有在揭示这些事物客观地固有的内在本质的基础上才可能。

关于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关系的理解也是《神圣家族》中的重要贡献。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对抗性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4—75页。

盾的本质时，揭示了这一矛盾的内部结构，区分出它的保守方面和革命方面。他指出：“在整个对立的范围内，私有者是**保守**的方面，无产者是**破坏**的方面。”^①他强调指出斗争双方是不可调和的，因为私有者的行动是要保存对抗，而无产者的行动则要消灭对抗。同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对立面又有某种相对的统一性，因为它们双方都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所以，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消灭私有制和作为私有制的产物的无产阶级。

《神圣家族》整个内容的基本核心是制定正在形成的唯物主义 70 历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青年黑格尔派把逻辑范畴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并且支配人们行动的东西，与此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表述了历史就是“人的活动”这个总的观点。《神圣家族》中说：“‘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

马克思加深了自己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理解，为制定有关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学说奠定了基础。他解释说，在每一个历史时代都有一定的经济结构，与它相适应的是一定的政治制度。马克思指出：“正如古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奴隶制一样，**现代国家的自然基础**是市民社会……”^③他把自己和恩格斯所理解的资产阶级国家表述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首脑”^④，从而也就非常接近于明确理解到整个国家作为政治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作用。

马克思非常清楚地了解到，在国家 and 经济制度之间不仅存在着某种协调一致，而且还有着深刻的辩证关系。任何一种国家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② 同上书，第118—119页。

③ 同上书，第145页。

④ 同上书，第156页。

式归根到底都是由社会的经济制度决定的，但国家同样也对这一制度起反作用。例如，马克思明确指出，资产阶级国家摧毁了限制资产阶级的封建权利和特权，就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广阔场所，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

为了解决“市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含混不清，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对它作了具体说明。他努力把决定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区分出来。他已经明确地看出物质财富的生产是这个决定性因素，并且接近于得出生产关系即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这个概念。在谈到这些关系的特点时，马克思强调指出，在这些关系
71 中“**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①。

马克思对物质生产的理解，比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前进了
一步，认为它是整个人类历史的基础。马克思写道，不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②，就不能认识这一历史时期。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提出了关于人民群众在历史中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作用将不断增长的极为重要的原理。马克思指出，劳动群众的作用特别是在革命时代显露出来。但是，迄今发生的一切变革都是为了少数人的利益而完成的革命。所以，在这些革命中群众对历史进程的作用是受到限制的。但是，随着社会进步越来越多地反映群众本身的利益，他们对历史进程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大。马克思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开辟一个新纪元，那时“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列宁特别强调这一思想的意义，把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② 同上书，第191页。

③ 同上书，第104页。

看作是马克思有关社会发展的最深刻的思想之一。

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首先是制定关于作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主要力量和领导力量的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学说。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第一次表述了工人阶级这种作用是由社会经济条件所制约的思想。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在私有制和无产阶级这两种力量经常对抗的范围内发展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不断地产生这种对立，资本家、私有者为了切身利益而保存这种对立。而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①，所以无产阶级力图消灭这类关系。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②

这样，无产阶级由于它自己所处的客观状况而负有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不管“目前某个无产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做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无产阶级“由于其本身的存在必然在历史上有什么作为”^③。

当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资本主义剥削的重担帮助它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开始为反对现存制度而联合起来。马克思指出，这种联合使无产阶级变成强大的力量。

马克思还提到了无产阶级对其他被剥削阶级的解放使命的问题。马克思根据过去发生的革命经验指出，在每一次革命中起领导作用的阶级都是由自己的特殊利益所推动的，同时这些特殊利益至少在表面上表现为全人类的利益。比如，在资产阶级革命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5页。

② 同上书，第44页。

③ 同上书，第45页。

摧毁封建制度的经济和政治关系首先对资产阶级有利，虽然这种摧毁也对全人类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下层人民群众的利益的一致也是暂时的和非常有限的。

与此相反，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完全一致，这种群众“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①。无产阶级从剥削制度下解放自己，也就把整个社会从剥削制度下面解放出来。先进阶级的利益在历史上第一次真正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并在这种意义上具有全人类利益的性质。在马克思的这些论断里包含着 he 后来发挥的一个原理的最初的成分，这个原理就是：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它在现代社会被压迫群众的革命解放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写道：“批判的批判什么都没有创造，工人才创造一切，甚至就以他们的精神创造来说，也会使得整个批判感到羞愧。”^② 他们援引比·约·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作为例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批驳了青年黑格尔派对该书的批判。他们重视蒲鲁东在书中对大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揭露。同时他们73也看清了蒲鲁东观点的局限性，因为他是从私有制的观点来批判私有制的。他们看出的蒲鲁东的弱点构成了后来特别明显地暴露出来的他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的核心。

在确定《神圣家族》在马克思学说的发展中的地位时，列宁写道，这里包含着“几乎已经形成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③。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新著作中，费尔巴哈的影响仍然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② 同上书，第22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9页。

当大,虽然比起《经济学哲学手稿》来,程度要差一些。在1867年重读《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我愉快而惊异地发现,对于这本书我们是问心无愧的,虽然对费尔巴哈的迷信现在给人造成一种非常滑稽的印象。”^①马克思所说的“对费尔巴哈的迷信”是与他 and 恩格斯的观点形成过程的一个特点有联系的,这个特点是:他们在一步一步地确立自己的世界观时,只是逐渐地认清这种世界观的崭新性质的,而且这种认识还落后于他们观点的客观发展过程。换言之,他们在《神圣家族》中客观上远远超过了费尔巴哈,主观上认为自己是他的学生。因此,在1844年8月马克思还认为,费尔巴哈为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是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了,但仍用费尔巴哈的术语,自称“现实的人道主义者”^②,虽然他们在“现实的人道主义”这个概念中已经加进了费尔巴哈所不了解的、同他格格不入的新内容。

然而,除在术语上还依从费尔巴哈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费尔巴哈学说划清界限的客观过程本身也还没有结束。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还根本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的著作中完成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继续利用异化概念作为分析社会发展规律性的出发点。在提到象财产、资本、工业、雇佣劳动这类概念时,马克思继续把它们叫做“异化的生活要素”^③,“工人自我异化的具体的产物”^④。诚然,对这些范畴的全部分析贯穿着 74 深刻的历史主义。此外,在《神圣家族》中有力地批判了青年黑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3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③ 同上书,第14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

尔派对异化的崇拜，批判了他们的一种倾向，即“把人所固有的一切规定和表现都批判地改造成怪物和人类本质的自我异化”^①。然而，《神圣家族》的作者把社会形态和社会机构看作异化的人类活动的不同表现，这种观点也还带有抽象的性质。预定的科学研究途径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社会现象时采取更具体的历史的态度。异化范畴虽然对于从哲学上理解现实的重要方面还有其意义，但在进一步对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过程中应当把主要地位让给更准确的具体的社会学和经济学的概念。

总的说来，《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理论基础以及同他们的先驱和思想敌人划清界限的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是马克思在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提出的那些观点的发展阶段上的一个更高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本书在德国舆论界引起了相当热烈的反响。1845年3月21日资产阶级的《科伦日报》不得不承认，这本书反映了社会主义观点，因为其中批判了“所有旨在消灭现代社会弊病的不彻底办法都是站不住脚的”。1845年3月25日发表在激进派的《曼海姆晚报》的书评中说，《神圣家族》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近写的著作中最深刻和最有力量的著作。与此同时，反动报纸《莱茵观察家》相当准确地抓住了该书的实质，在1845年4月28日该报对于书中批判私有制，“尊重感性的和物质的东西”，“讥笑任何形而上学和哲学”，以及尖刻嘲讽所有基督教日耳曼的东西表示激烈反对。德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之一《总汇报》表示了更强烈的愤怒。该报在1845年4月8日谈到《神圣家族》时写道，该书“每一行都在鼓吹反对国家、教会、家庭、法制、宗教和财产……
75 的暴动。简言之，书中我们看到的是最激进的、最露骨的共产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页。

义，而更危险的是，无论如何不能否认马克思先生有非常渊博的知识，善于运用黑格尔逻辑学的辩论武器，即人们通常说的‘铁的逻辑’”。

布鲁诺·鲍威尔写了一篇既装腔作势又软弱无力的文章作为对该书的回答，他在文章中抱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不了解并歪曲他的原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反批评”的简短答复（1846年1月发表在《社会明镜》杂志上）是这样结束的：“布鲁诺·鲍威尔乞灵于玩得最拙劣的把戏和最可怜的魔术，却最终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给他作出的死刑判决。”^①

驱逐出巴黎

1844年秋，《前进报》上空乌云密布。报纸的革命民主主义方向，报上讨论包括工人阶级状况在内的各种尖锐的社会问题，登载海涅的杰出的讽刺诗，使它在具有民主情绪的读者中间享有盛名。报纸拥有八百个订户，这对当时的流亡者报刊来说是相当可观的数目。

反动报刊对《前进报》进行粗暴的攻击。法国的《地球报》写道：“这个报纸比第一次革命时期任何一种法国小报都坏。”《爱北斐特日报》在1844年9月19日发出了“德意志各邦政府及法国政府岂能容忍这个报纸的存在”这样的喊叫，同时要求对这个“危险的报纸”采取最坚决的措施。但是，担心法国和普鲁士政府对《前进报》采取某种程度的容忍态度是多余的。报纸的揭露性的调子引起普鲁士和法国当局的极大愤怒。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367页。

还在1844年7月普鲁士驻巴黎大使就已经设法使法国政府以“鼓吹谋杀国王”(指《前进报》对市长切希谋刺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一事所写的评论)为理由关闭报社。法国政府鉴于这个指控太荒唐而没有贸然把这个案件提交陪审法庭,却借口报纸没有交必要的保证金,将主编贝尔奈斯投入监狱。报纸编辑部通过决议把《前进报》改为不要求交保证金的月刊。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当局就在1845年1月16日发布了把《前进报》撰稿人马克思、海涅、毕尔格尔斯、巴枯宁等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在普鲁士政界压力下采取的这一步骤,在法国和德国的民主人士中间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改革报》在1845年2月4日写文章指责法国政府的专横行为,并号召其他报纸对这一措施表示抗议。巴贝夫派工人出版的《1845年博爱月刊》杂志在3月号中揭露普鲁士国王阴谋把“德国著作家”,其中包括“特利尔的共产主义者哲学家马克思先生”驱逐出巴黎。激进派报纸《特利尔日报》在报道基佐政府的命令时强调指出,从执政内阁时期以来从未对外国人采取过如此严厉的措施。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法国政府不得不作出某些让步,其中之一就是撤销驱逐海涅的命令。但是对马克思的态度却依旧不变。

1845年2月3日马克思从巴黎到布鲁塞尔。过了不久,他的妻子带着年幼的女儿也来到这里,她在政府指定的短时间内很便宜地卖掉了家具,以便筹集必需的搬家费用。

马克思生平活动中的巴黎时期就这样结束了。他来到巴黎时还处于寻求新世界观的过程之中。在法国首都最终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立场的转变。离开巴黎时,马克思有着明确的目标——完成论证和制定新革命学说的工作,促进这些思想在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者中间传播。

第 三 章

唯物主义历史观

77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①

列 宁

在 布 鲁 塞 尔

1845年2月初，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之后，因财力关系没有能够立即找到一所固定住房。直到5月初，马克思全家才迁居同盟路5号一幢房子里，这条街在市郊，住的主要是工人。马克思在这里住了将近一年。此后，他搬到布鲁塞尔一条古老的街道，圣居杜尔广场。从1846年10月至1848年2月马克思全家居住在奥尔良路（后来改称总统街）42号。1848年2—3月马克思又住到圣居杜尔广场，这是马克思在布鲁塞尔的最后住所。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马克思在比利时居住三年多。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付出了巨大的劳动。他不仅制定了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的科学原理，而且还为团结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为创建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展开了紧张的实践活动。在布鲁塞尔时期，马克思在创作方面的成就是非常大的。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两部杰作中，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完整概念，这是这个时期头半年的最重要的成果。

当时，小小的比利时是欧洲在经济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1830年的资产阶级革命使比利时从荷兰分离出来，使它不仅获得了民族独立，而且取得了大部分经济独立。四十年代中期，比利时已有了发达的采煤工业、机器制造业和纺织工业。大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工场，排斥了小手工业和传统的家庭手工业。资本主义发展对劳动群众造成的后果是典型的。大多数工人的工资微乎其微，劳动时间长达14个小时。女工和童工被广泛使用，包括在矿山。失业是劳动人民的真正的灾难。

比利时劳动人民的状况为分析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社会矛盾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比利时人民群众的贫困和比利时表面的经济“繁荣”形成鲜明对照，这种情景深深印在马克思的脑海中。

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反民主性质处处可见。虽然国内实行了1831年的自由主义宪法，但是严格的财产上的资格限制把选民的人数减少到只有居民的1%。四十年代比利时内务大臣诺通布声称：“我们的宪法，只有在人民认为它完全不适用时，才是好的。”天主教僧侣和教权派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

但是，比利时统治集团阻挡不住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著名的空想共产主义者邦纳罗蒂从1823年起居住在布鲁塞
79 尔，1828年他在这里出版了《为平等而密谋，又名巴贝夫的密谋》这部名著。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也传播起来了。激进民主主义反

对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受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比利时无产阶级中间宣传拥护民主共和国。旅居比利时的波兰、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政治流亡者也帮助比利时社会的先进分子接受革命思想。

比利时当局非常不乐意革命流亡者避难。马克思出现在布鲁塞尔使王国政府十分不安。司法大臣指示警察秘密监视这位“危险的民主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1845年3月22日，马克思被传到警察局并被强令签署一份不在比利时发表任何有关当前政治问题的意见的保证书。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允许马克思居住在布鲁塞尔。

普鲁士政府也使马克思不得安宁。由于普鲁士政府的唆使，马克思才被驱逐出法国。现在，普鲁士政府又力图把马克思驱逐出比利时。为了使普鲁士当局找不到干预他命运的形式上的借口，马克思不得不在1845年12月正式退出普鲁士国籍。

尽管警察当局经常找岔，生活费用又不足（极不固定的稿酬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但是马克思及其全家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环境。在布鲁塞尔象在巴黎一样，马克思的家里照旧充满了生活气息。马克思的灿烂的智慧、渊博的知识和非凡的机智，燕妮的殷勤好客和举止得体，高尚的教养和令人钦慕的才德，使他们的家成了不光是革命流亡者，也是比利时知识界许多先进代表人物喜爱的聚会场所。这个地方仿佛是德国社会主义者、法国革命者以及波兰、比利时和俄国民主主义者的一个政治俱乐部。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经常在邻近的咖啡馆里举行晚会，热烈地交谈和争论有关哲学、政治和创作方面的问题。

巴黎的老朋友（海涅、艾韦贝克、海尔维格、贝尔奈斯等人）同马克思有通信往来。新的友谊和联系建立起来了。马克思作为杰出的革命思想家的声望，他的著作，使很多人都想认识他。在这方

面,《神圣家族》一书的出版起了很大的作用。同马克思有友好交往的德国政论家格奥尔格·荣克,在读了这部著作以后于1845年80 2月底写信给马克思说:“你已经是你的朋友的人了,现在你应当成为属于全德国的人。您以自己的优美的文风和异常明晰的论据必定在这里获得成功,并成为第一流名人之星。”^①

1845年9月26日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劳拉诞生了。1846年12月儿子也出世了,为对燕妮的弟弟、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表示敬意,取名埃德加尔。马克思在布鲁塞尔居住的头一年,他的家里实际上还增添了一个人。燕妮的母亲卡洛琳娜·冯·威斯特华伦把自己的女佣人,二十二岁的海伦·德穆特派来帮助燕妮。德穆特对马克思一家全心全意,是这个家庭的真正的保佑者。天赋聪明和性格刚毅的海伦挑起操持家务的主要担子。全家人,首先是马克思本人都温顺地听从善良的和关心备至的琳薇的“专政”。马克思和他妻子对她极为尊敬和十分亲切。

恩格斯的到来。新的哲学著作的构思

1845年4月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从巴门来到布鲁塞尔,他立即以最亲密的朋友的身份到了马克思家。当马克思迁移到同盟路的时候,恩格斯也在他邻近的7号房子里租了一套住屋。在布鲁塞尔,恩格斯第一次见到马克思夫人。1844年秋,在他同马克思进行难忘的会见时,她当时没有在巴黎。

马克思为自己的朋友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在莱比锡刊印并于1845年5月底出版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骄傲。马克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63。

恩高度评价了这部真实地描述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困苦生活和斗争的著作的深刻内容和铿锵语言，后来列宁称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①。马克思在自己战友的著作中发现，他的关于工人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的思想也得到了表述，这个思想是恩格斯根据个人的亲身感受和科学研究独立地提出来的。马克思制定自己的经济学说时在许多方面是以这部著作的材料和结论为依据的。

1845年春天，在恩格斯快来比利时首都的时候，马克思已经意识到必须制定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历史观。还在1844年9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神圣家族》序言的结尾中申明要从正面来发挥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社会观点，同时批判现代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当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的时候，马克思已经能够梗概地向他叙述自己新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因此，他们共同决定全面地制定这个新的世界观，来对抗德国哲学代表人物的唯心主义观点。⁸¹

但是，两位朋友都没有停止各自的科学研究和创作计划。恩格斯继续研究英国的经济和历史。马克思恢复了自己的经济研究，并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经济学社会学著作和一些单篇论文来叙述研究成果。比如，还在恩格斯来到比利时之前，他就写了论弗·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一书的文章。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当时都打算同这个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和经济保护关税制度的鼓吹者进行公开的论战。虽然这个打算当时未能实现，但是不久前发现的马克思反驳李斯特的文章的手稿证明，他对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的批判是多么深刻。马克思认为，李斯特的观点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独有的特征，他们企图用为“民族理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0页。

想”服务的高调来掩盖他们发财致富的贪欲，剥削者的和民族主义的奢望，对更强大的外国竞争者的恐惧，对容克地主和官僚的奴颜婢膝。这就是马克思对李斯特的“生产力的国家联合”这个含糊不清的论断所作的解释。马克思在评价他所剖析的这部著作时写道：“德国资产者是以创造一种夸大的、假理想化的国民经济学开始创造自己的财富的。”^①

马克思在分析李斯特的著作时，发挥了他对诸如“劳动”、“交换价值”等这样一些政治经济学范畴的看法。马克思在探索对“生产力”这个最重要的社会学概念作唯物主义的解释的途径时，就坚决地摒弃了李斯特对这个概念所作的唯心主义解释，同时批判了圣西门的追随者，因为他们抽象地考察“生产力”（人在生产过程中利用的自然力、人本身的力量以及由于工业活动而获得的资料），把它看成是超越于它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借以发展的那种社会形式
82 的。马克思指出了资本主义关系对生产力的有害影响。他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对于生产力已成为必须消灭的桎梏，这就接近了他后来的一个发现，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的相互作用在社会过程中具有决定性作用（这个原理很快就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作了表述）。可见，在经济研究过程中，经常摆在马克思面前的任务是制定以科学历史观为根据的研究社会现象的新的一般方法论原则。

当马克思已经最终地、虽然还只是大体上形成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崭新观点的时候，他就清楚地意识到新的世界观同费尔巴哈的社会观点不仅是不相容的，而且是完全对立的。必须同谈论“共产主义信念”并自称是“布鲁克贝尔格共产主义隐士”的费尔巴哈的假共产主义划清界限，必须阐明真正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41页。

这些冒牌共产主义观点的根本区别。

尽管马克思看到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但是他仍然肯定这位德国思想家在发展进步哲学方面的功绩。马克思和恩格斯毕生对费尔巴哈怀有深厚的敬意。1872年9月这位哲学家逝世的时候,德国国会的社会民主党议员安东·曼明格代表马克思及其国际工人协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战友们在费尔巴哈墓前献了花圈。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马克思的新的哲学著作的构思,在他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得到了反映。马克思在1845年春,很可能是4月草拟了这十一条提纲,记在1844年至1847年旅居巴黎和布鲁塞尔时期使用的笔记本里。这些匆匆写成的、供进一步研究的纲要,虽然总共占五页手稿,但是就其思想的精练和深度,表述的清晰和准确来说大概是无与伦比的。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①。

提纲的中心思想是物质的、革命的实践在社会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马克思指出,实践是包括哲学认识在内的一切认识的出发点、基础、标准和目的。 83

在马克思以前,某些哲学家曾猜到甚至宣布实践是认识的标准和目的。但是只有从无产阶级这个彻底革命的阶级的立场出发才可能真正地理解实践在社会生活中和认识过程中的作用,理解这个范畴对哲学的意义。实践范畴引入认识论,是认识论上的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8—209页。

正革命,而且是整个哲学中的革命变革的主要因素之一。

马克思从新的世界观的立场出发,既批判了从前的唯物主义的直观性,也批判了把实践归结为纯理论活动的唯心主义。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企图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马克思最坚决地把自己的世界观确定为新的唯物主义。

同唯心主义相反,马克思强调指出,要变革现实,纯理论的批判是不够的,必须有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不仅必须改变意识,而且必须改变存在。人只有在革命实践过程中,既改变其周围现实,也改变自身。

费尔巴哈把人看作抽象的孤立的个体,同这种形而上学的和反历史主义的观念相反,马克思提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之一: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人生活在社会里,是社会的产物,并且不是一般社会的产物,而是各特定社会形态的产物。

马克思用彻底的无产阶级无神论的观点来解决战胜宗教的条件问题。马克思以前的唯物主义者,特别是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并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是他们的历史功绩。但是,只有马克思才指明了,宗教是从这个世俗基础的矛盾中,从社会对抗中发展起来的,要消灭宗教,就必须对现存社会进行革命。后来,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并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了经典性的表述。

以前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以革命实践对抗直观,以作为共产主义哲学基础的新的辩证的
84 唯物主义对抗旧的唯物主义。他在最后一条提纲中经典地表述了新世界观的原则:“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在于改变世界。”^①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这一天才著作中非常简明扼要地表述了新世界观的要点，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制定了这个新世界观。

《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 在报刊上发表文章

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出版一套《外国杰出的社会主义者文丛》。1845年2—3月恩格斯在巴门写给马克思的信中，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计划。出版这套《文丛》是为了使德国读者了解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优秀代表的著作，进而通过社会主义作家唤起对社会主义思想和对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兴趣。计划中还准备为《文丛》第一册写一篇总导言，阐明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并对其中发表的每一篇文章做详细的评注，在评注中首先注意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中的合理成分。

在前面提到的写着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那本笔记本里所记载的简略札记表明，这套丛书的计划是相当庞大的。《文丛》将包括摩莱里、马布里、圣西门及其学派、傅立叶及其信徒孔西得朗、欧文、卡贝、蒲鲁东和其他著作家的著作。一些主张用革命方法改造社会的空想家，如巴贝夫、邦纳罗蒂、德萨米等人的作品，占有特殊的地位。马克思还打算《文丛》中收入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平民思想家的著作：“社会小组”的代表、“疯人派”领袖卢和勒克莱克尔，左翼雅各宾党人阿贝尔的著作。英国人葛德文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没有被遗忘，他发挥了同社会主义学说相近的观点。

出版这套丛书的想法表明，马克思制定的新学说是以以往全部的世界文化和文明的发展为依据的。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弱点的批判没有妨碍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它的有价值的成分；吸收这些
85 成分同制定和宣传新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并不矛盾，相反，有利于解决这项任务。

出版方面的困难以及拟议中参加合编《文丛》的莫泽斯·赫斯思想观点的动摇，妨碍了预定计划的实现。恩格斯翻译了傅立叶《论三种外在的统一》一书的几章，是唯一完成的工作。这篇译稿连同其前言和结束语发表在杂志上，标题是《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

1845年马克思写成《珀歇论自杀》一文，发表在爱北斐特出版的《社会明镜》杂志1846年1月号上。马克思在文章中让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人物、管理过巴黎警察档案的资产阶级法学家和统计学家来控诉资产阶级社会。雅克·珀歇根据这些档案材料写成回忆录，马克思对这些回忆录作了摘记。警察记事中的这些事实暴露了资产阶级道德、风尚和生活方式的丑恶的方面。这些事实不仅揭穿了自杀的社会内幕——穷无出路，失业等等，而且指明了促使人们采取这种绝望举动的道德心理原因。马克思以自己的文章强调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里野蛮的利己主义横行、肆意侵害人格造成很多人内心空虚和厌倦生活；到处是虚情假义，口是心非，践踏人的自然情感，丑恶的家庭关系。

第一批拥护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把制定新革命学说的理论基础这项工作

同在当时参加工人阶级解放运动的人中间传播正在确立的革命世界观的任务分割开来。恩格斯后来回顾这个时期时写道：“我们有义务科学地论证我们的观点，但是对我们来说同样重要的是：使欧洲无产阶级，首先是使德国无产阶级相信我们的信念是正确的。”^①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留居布鲁塞尔的头一年就已经采取步骤来加强同革命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先进代表的联系。

起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传播自己的思想，主要还不是靠报刊（当时他们接近报刊的门径还是很狭的），而是靠同流亡布鲁塞尔⁸⁶的革命派，同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同居住在德国和法国的朋友们的私人来往。所有先进人物都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周围的人们中间开始形成一个志同道合者的核心。对其中许多人来说，掌握新世界观的过程是同破除和改变传统观点，克服（不总是迅速地 and 完全地）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尽全力促进这第一支无产阶级革命者队伍的形成。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朋友同他俩一样，也是普鲁士莱茵省人。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同马克思一起从巴黎迁居布鲁塞尔，在比利时首都一直居住到1845年秋，而后返回科伦，在那里作为马克思的拥护者进行活动。青年医生罗兰特·丹尼尔斯，1844年11月在巴黎认识了马克思，回到科伦后仍然同他的新朋友保持联系。同马克思相识是丹尼尔斯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而且对他的观点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丹尼尔斯很快就成了马克思学说的彻底的拥护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时期，还同退伍的炮兵军官约瑟夫·魏德迈往来。1845年魏德迈由于受到反政府情绪的影响而离开普鲁士军队，从事新闻记者工作。他深信社会主义思想。魏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3页。

迈是德国第一批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发表评论的人之一。魏德迈很快就成了“德国工人党的优秀战士之一”^①，后来在美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方面起了杰出的作用。

1845年夏季，天才的德国诗人和政论家格奥尔格·维尔特来到比利时首都呆了一段时间，1843年，他还在英国时就同恩格斯成了好朋友。1846年春，他以德国商业公司代理人的身分居住在布鲁塞尔。在这以前，维尔特已经发表过许多描绘工人阶级的苦难和反映工人阶级革命热情增长的特写、论文和诗歌。例如，在诗歌《大炮的铸造者》中，维尔特以工人的名义写道：

“……暴风雨和严酷搏斗的时刻，
就要来临，
那时我们要用十英寸口径的大炮
轰击你们！”^②

87 从布鲁塞尔相识时起，牢固友谊的纽带把维尔特置于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之下，这种思想影响最终决定了这位德国无产阶级文学创始人的创作具有革命共产主义的性质，他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③。正是在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交往的年代里，他创作了革命诗歌的最卓越的典范，组诗《帮工之歌》。

马克思的影响对另一位革命诗人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的创作的发展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1844年以前，弗莱里格拉特是浪漫主义流派的代表，醉心于虚妄的异国情调，鼓吹“纯艺术”的思想。但是，后来这位诗人开始转向真实的现实，并在他的诗歌里响起了革命的声音。1845年2月，弗莱里格拉特在布鲁塞尔会见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5页。

② 《格·维尔特选集》1957年俄文版第1卷第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7页。

马克思。虽然当时他们的会见时间很短促（弗莱里格拉特很快去了瑞士），但这次会见在诗人的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诚然，在他的创作中仍有“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但是，他的一些作品的确说明他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例如，在《自下而上！》这首诗里，弗莱里格拉特以下述诗歌形式表明他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已经懂得工人阶级所蕴藏的强大的革命潜力。他写道：

“我们就是力量！我们当代的无产阶级，
能用神圣的仇恨把地狱毁灭，
然后建造一个新世界！”^①

有一个人晚于其他人来到布鲁塞尔，这个人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亲密的战友和朋友之一。他就是威廉·沃尔弗——农奴的儿子，西里西亚的教师。他由于在报刊上发表了大胆的言论，特别是描写了布勒斯劳贫民区和公开捍卫1844年起义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而获得了声望。

沃尔弗为了躲避警察的迫害而流亡英国。后来于1846年4月迁居布鲁塞尔。在布鲁塞尔他首先急忙寻找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后来描写他们的会见时写道：“当时马克思和我住在布鲁塞尔的一个郊区，我们正好一起在写一本书，有人告诉我们说，一位 88 德国来的先生想同我们谈话…… 这就是威廉·沃尔弗…… 没过几天，我们就同这位新的流亡伙伴建立了诚挚的友谊，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交结的不是一位平凡的人。他在古典学校里受到良好培养的才智，他那丰富的幽默，他对艰深理论问题的清楚理解，他对人民群众的一切压迫者的强烈憎恨，他那刚毅而又沉着的气质，很快就展现了出来。但是，只有在斗争中，在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在顺利和不利的时刻，经过多年的共同活动和友好交往，我们才能充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选集》1956年俄文版第154页。

分认识到他那坚韧不拔的性格，他那无可怀疑的绝对忠诚，他那对敌、对友、对己同样严格的、始终如一的责任感。”^①

后来，在马克思周围的朋友和熟人中又增加了一些工人流亡者：排字工人瓦劳和波尔恩，从巴黎迁居到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荣克等人。

马克思还对比利时民主派中最革命的分子施加影响，促进他们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比如，马克思的比利时朋友当中有哲学和文艺副博士菲力浦·日果，还有利日的律师和革命政论家维克多·特德斯科，他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近的时间稍晚，在1847年。

马克思同一些不信仰共产主义而抱有革命民主主义信念的人保持密切的联系。比如，杰出的波兰历史学家和革命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积极参加者、波兰流亡者革命民主派领袖约阿希姆·列列韦尔就是在这个时期成了马克思一家的朋友。他是马克思的常客。

旅 游 英 国

为了了解英国的科学文献，首先是经济学文献（布鲁塞尔是没有的）和研究英国的社会经济条件，1845年夏，马克思同恩格斯一起对这个国家作了一次旅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大约从7月12日逗留到8月21日。在这段时间里，两位朋友游历了伦敦和曼彻斯特。对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进行的差不多一个半月的了解，使马克思较好地认识了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63页。

象。这些现象在其他国家里，他只能在不那么清晰完备的形式下看到。

对马克思来说非常重要，能直接了解英国的工人运动并同它的代表人物建立了私人联系。在当时，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已达到了比较高的水平。十年来不列颠诸岛是工人阶级争取人民宪章的强大斗争的舞台。宪章拥护者有自己的党，即1840年创建并建立了地方组织网的宪章派全国协会。在宪章运动高涨的年代，该组织成员达5万。宪章派在组织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出版机关刊物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马克思到来的时候，宪章运动由于1842年宪章派所组织的工人发动遭到失败而经历了一段低潮以后又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并去迎接1847—1848年的最后一次蓬勃发展。

恩格斯在他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书中第一次对宪章运动作了科学的评述，认为宪章运动是具有深刻社会根源的并在客观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当时面临的任务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形成的哲学观点和政治观点继续研究宪章运动，并且通过对它的经验的总结进一步发展关于工人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原理，阐明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式和劳动人民摆脱资本压迫的真正途径。

当时已经是一支重要力量的英国工联以及革命流亡者在英国建立的无产阶级组织和民主主义组织的活动经验也是值得注意的。伦敦是正义者同盟活动的中心之一。该同盟逐渐由德国的组织变成了国际性组织。还在1840年，正义者同盟的活动家就创建了公开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恩格斯是马克思在旅行中不可缺少的伴侣。恩格斯在英国住了约两年，英语讲得很流利，当时马克思的英语还掌握的不够好。恩格斯认识许多宪章运动的领袖，并且是好些宪章派和社会主义

的报刊的通讯员，其中包括宪章派的主要机关刊物《北极星报》。还在1843年，恩格斯在伦敦就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约瑟夫·莫尔、卡尔·沙佩尔和亨利希·鲍威尔有私人往来。所以他很方便地介绍马克思同他们认识。恩格斯非常熟悉英国的科学文献，在这方面也给马克思很大帮助。

两位朋友在曼彻斯特一个图书馆的阅览室里度过了不少时光，这个图书馆是由当地商人汉弗莱·切特姆早在1653年创办的，原来是中世纪城堡，后来是修道院。在切特姆图书馆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自己喜爱的位置。恩格斯后来在1870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曾回忆起他同马克思在这里一起度过的时光，他写道：“最近几天我又坐在小楼凸窗处的方形斜面桌前勤奋地工作，这是我们二十四年前曾坐过的地方，我很喜欢这个位置，因为那里有彩色玻璃，阳光始终充足。图书馆馆员老琼斯还健在，但是很老了，已经不再做什么事了……”^①

在英国，马克思和恩格斯结识了宪章派左翼的著名领袖乔治·朱利安·哈尼，他是无产者出身、天才的宪章派组织者、演说家和记者，是《北极星报》的编辑之一，是社会主义者，巴贝夫共产主义思想的信徒。同对国外革命运动抱有一定怀疑的许多宪章主义者相反，哈尼力图把宪章派同大陆上的革命者的行动统一起来。通过哈尼，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又结识了1846年1月参加宪章运动的革命宪章派的另一位领袖厄内斯特·琼斯。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国首都逗留期间，尽力促进左翼宪章派和正义者同盟代表之间联系的巩固。他们出席了1845年8月中旬宪章派同各国流亡者在韦伯街一家小酒店“天使酒家”举行的会议。恩格斯发表了演说，阐明他同马克思对讨论的各种问题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97页。

共同意见，同时对会议上提出的在伦敦建立国际性革命组织的思想表示热烈支持。1845年9月22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英国以后，这个组织成立了。它定名为“民主派兄弟协会”。在这个组织里起主导作用的是无产阶级分子——左翼宪章派（起初是哈尼，后来还有琼斯）和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沙佩尔和莫尔。魏特林参加了成立会议。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成立是先进无产者当中已经焕发起国际团结精神的鲜明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该协会保持联系，努力⁹¹使协会的活动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倾向并帮助协会的领导人摆脱小资产阶级的幻想。1845年9月22日的会议本身成了恩格斯在报刊上阐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根据。他在论述这次会议的《在伦敦举行的各民族人民庆祝大会》一文中，阐明自己和马克思的观点时写道：“……全世界的无产者却有共同的利益，有共同的敌人，面临着同样的斗争；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所有他们的修养和举动实质上都是人道主义的和反民族主义的。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①

批判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和社会主义文献

在马克思居住布鲁塞尔的整个时期以及在英国旅行期间，他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和对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的研究，在他的理论活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继续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6页。

事早已开始的搜集事实材料的工作，这些材料是全面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批判地考察在当时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所必需的。他既研究前几个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也研究和同时代的作者的著作。在布鲁塞尔和曼彻斯特，马克思从各种书籍中作的摘录写满了好多个笔记本。

马克思非常注意资本主义经济本身。他对资本主义生产中机器的使用，价格形成和货币流通，信贷和银行业务这样一些问题很感兴趣。马克思收集了有关欧洲、美洲和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史的大量事实材料。他也注意人口问题。

在研究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后果的时候，马克思的注意中心是劳动阶级、无产阶级的状况。他对英国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群众的生活和劳动条件特别感兴趣。除恩格斯有关这个主题的那本书^①以外，马克思收集了许多其他材料。其他国家劳动人民的贫困化问题也使马克思深为激动。

92 马克思在研读许多和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纳·西尼耳、约翰·麦克库洛赫、约翰·斯·穆勒、沙·加尼耳等）的著作时，敏锐地看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通常具有的辩护论倾向日益强烈。在斯密和李嘉图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眼光尽管受到种种局限，但他们还能真诚地探求科学真理，而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代表的所作所为则是，为了维护剥削制度，以有意识掩盖资本主义矛盾、粉饰现实来顶替科学的客观性。

马克思把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一书同他的父亲詹姆斯·穆勒（当年曾捍卫过李嘉图学说的进步结论）的经济学著作作了对比，指出了资产阶级经济科学衰退的特点。他写道：“这个小穆勒是从事理论的资产者陷

^① 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译者注

入绝境的好榜样。”^①

马克思把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即自由贸易的维护者归入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辩护论流派。马克思还继续研究自由贸易派的反对者即保护关税派的著作。这两个流派的代表曾发生激烈争论，他们都力图把各自主张的那套办法描绘成消灭社会贫困的万应药方。1845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有过这样的想法，打算针对他们之间的争论共同发表一部论述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的著作。

马克思还对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献非常感兴趣。早在去布鲁塞尔之前，他就掌握了法国和德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遗产。而他在这里的研究对象是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他仔细研究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尤其是后者的主要著作《论新道德世界书》。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读约翰·布雷、托马斯·艾德门兹、威廉·汤普逊和其他欧文信徒的著作，这些人企图用李嘉图的经济学说论证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用社会主义思想来说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对这些著作家想消灭剥削和劳动阶级贫困的真诚愿望是尊重的，但是对他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关系的空想主义计划则非常怀疑，这种计划的根据是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借用来的前93提，办法是建立按价值直接交换产品的市场，实行“劳动货币”等等。他在自己的批注中指出，这些社会方案都是建立在唯心的和虚幻的观念上的。马克思在他的一个批注中谈到汤普逊的方法本身的错误根据时写道：“汤普逊以为靠‘平等保证’，‘自愿交换’等等空话什么都可以办到。”^②

马克思没有忽视以所谓封建社会主义的形式反映贵族对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年国际版第1版第1部分第6卷第609页。

② 同上书，第615页。

阶级社会的反对立场的那个流派的著作。他阅读了法国作家维尔纽夫-巴尔热蒙的《基督教政治经济学》、接近这个流派的英国历史学家和唯心主义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的小册子《宪章主义》。同这些作者揭露现存资产阶级制度的言论伴随在一起的，是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关系的极端理想化和号召倒退到旧时代的反动叫嚣。这是从右的方面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它表明对社会发展规律一窍不通。

马克思还研究了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瑞士经济学家西蒙·德·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概论》。在西斯蒙第的观点中，对资本主义关系的批判同反历史主义和美化过去特别是美化小商品生产别出心裁地结合在一起。马克思在他的批注中强调指出，西斯蒙第“有些地方……把古代制度理想化了”^①。

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和其他社会科学问题是有明确打算的。还从写《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起，在他的头脑里就酝酿成了一本大部头著作的轮廓，在这部著作中，他准备从革命的共产主义立场出发来考察现代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及其基本政治制度。在到布鲁塞尔的前夕即1845年2月1日，马克思同达姆斯塔德的出版商列斯凯签订了出版该著作的合同，书名是《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熟悉马克思这些计划的一些密友极为重视马克思的这部经济学著作的出版。1846年3月7日罗兰特·丹尼尔斯写信给他：“我们热切地盼望你的《政治经济学》。”^②魏德近在1846年4月3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请求说：“你得设法尽快写好你的《政治经济学》。要知道，人们希望读到阐述共产主义的某种有条理的东西，因为他们不愿满足于一般的空话，也不相信通过普遍教育能建立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8年国际版第1部分第6卷第615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20，编号1。

产主义,而对于他们,我们的确提供不出任何东西。”^①

警察当局探知马克思的著作准备在达姆斯塔德出版之后,曾向出版商明确表示:坚决不同意这个计划。列斯凯后来要求作者局限于纯学术问题,这个企图立即遭到马克思的坚决抗议。他在1846年8月1日给列斯凯的回信中说,他不想使自己的著作符合反动的书报检查的要求,也不想为迎合它而牺牲革命的内容,并说,他的“这本书是学术性的,但不是普鲁士政府所理解的那种意义上的学术”^②。列斯凯在1846年9月19日通知马克思说,由于书报检查严格,他不能出版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不顾一切阻挠,继续深入地钻研理论。对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无疑是促进了马克思的一般理论观点、一般哲学观点的形成,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要批判以前的经济理论,就必须首先批判地改造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即它的哲学的、世界观的基础。要使人们接受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新思想,就必须为新世界观清扫基地。总之,要批判政治经济学就应当首先批判正在流行的哲学学说和社会学说。因此,写作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计划只好暂时搁下来,首先创作一部反对德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敌人的论战性哲学著作,马克思恩格斯把这部著作定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在1846年8月初的一封信中谈到了他计划写的著作的发表次序,他写道:“因为我认为,在发表我的正面阐述以前,先发表一部反对德国哲学和那一时期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的论战性⁹⁵著作,是很重要的。为了使读者能够了解我的同迄今为止的德国科学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的观点,这是必要的。”^③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553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1页。

③ 同上书,第473页。

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出版新的哲学著作的想法在1845年秋有了更具体的计划。这指的是撰写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即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和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两卷本著作。起因是夏天费尔巴哈发表了一篇文章公开宣称自己是“共产主义者”，9月“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发表了一批主要著作，而主要的是10月中旬《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发表了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文章。

《德意志意识形态》原计划是由马克思负责编辑的集体创作。马克思和恩格斯约请莫泽斯·赫斯写部分批判性章节。但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创始人之一赫斯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接近是暂时的。赫斯容易受各种影响（马克思讽刺地叫他“海绵”），因此好搞折衷主义，他肤浅地了解了新的唯物主义学说的某些特点。过些时候，他又站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敌人的营垒中去了。

赫斯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写了两章，一章批判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卢格，一章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库尔曼。但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最后一稿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删去了关于卢格一章，对库尔曼一章作了认真校订。

在创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实行了一种新的高级合作形式。这种合作同他们第一次共同创作《神圣家族》时已经不同。那时，分工很简单；按照共同制定的计划，各自写作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且在目录中也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其中的第一卷，是他们两人的难以分开的共同创作。两位作者认为，科学工作的集体性是现代科学的基本

原则之一。他们自己在这里就作出了全面的创造性的合作的榜样。当然，在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制定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方面，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马克思。过了许多年，恩格斯在自己朋友逝世以后，以他固有的谦逊精神写道，在共同制定革命理论的过程中，大部分指导思想，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⁹⁶的。“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夜以继日地埋头写这部著作。哈尼从恩格斯那里知道这部著作的写作情况后，在1846年3月30日写信给恩格斯说：“当我告诉我的妻子说你们两人为创作一个非常哲学化的体系一直工作到清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她声称，这样的体系对她不适用，倘若她在布鲁塞尔，她就在你们的妻子中间发动‘政变’。我的妻子并不是反对组织革命，只是希望按照**缩短工作日的**体系来进行这件工作。”^②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现了两位作者的出色的论战技巧，这种技巧在这部共同著作中仿佛获得了双倍的力量。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清理遗稿时找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他把其中的一章读给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和海伦·德穆特听，使他的两位听众极为快乐。恩格斯在1883年6月2日写给马克思的另一个女儿劳拉的信中曾谈到这段插曲：海伦·德穆特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你们两个人那时候在布鲁塞尔天天晚上这样哈哈大笑，使得家里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入睡”。恩格斯补充说：“我们那时都是大胆的小伙子，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天真的儿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② 参看《哈尼文集》1969年阿森英文版第239页。

而已。”^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着手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在1845年11月。这部著作的最后的结构并不是一下子就形成的。最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概括地、不分篇章地批判鲍威尔和施蒂纳发表在《维干德季刊》第三卷中的文章以及费尔巴哈的著作。后来，他们决定用两章的篇幅专门批判布鲁诺和施蒂纳，还写了论费尔巴哈一章摆在这两章之前作为总绪论。在论费尔巴哈这一章中，一方面批判性地分析费尔巴哈的观点，另一方面集中地正面叙述他们自己的观点。同这个决定相适应，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次中断了对⁹⁷施蒂纳的批判，而把大量的理论性论述从这一章移到绪论，代之以主要是批判性的材料。相反，把针对鲍威尔和施蒂纳的纯论战性的部分从绪论移到第二章和第三章。这样，对第一卷的材料在写作过程中作了分类，其结构也更严密了。

第一卷开卷第一章（《一、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在理论上是最重要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第一章中主要是从正面阐述自己的观点，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余各章，则主要采用批判自己的论敌的形式。在未写完的绪论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第一卷的另外两章中主要是对青年黑格尔派哲学的批判：一章是批判布鲁诺·鲍威尔的（《二、圣布鲁诺》），另一章是批判麦克斯·施蒂纳的（《三、圣麦克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鲍威尔和施蒂纳在《维干德季刊》（莱比锡出版）上的言论，讽刺性地描述为独特的“莱比锡宗教会议”，他们在写这两章之前先写一篇引言即《莱比锡宗教会议》，并以《莱比锡宗教会议闭幕》作为这两章的别致的结尾。

关于施蒂纳这一章，篇幅最大，结构也最复杂。1844年10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3页。

底在莱比锡出版的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从理论上来说是德国古典哲学解体和庸俗化的具有代表性的产物。在这部作品里，黑格尔哲学的全部精华被弄得一干二净，而它的一切糟粕确被大肆发挥。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客观主义变成了纯粹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辩证法变成了诡辩，批判变成了空话。施蒂纳是极端个人主义的鼓吹者。在他的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观念中反映了德国小资产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满。但是，施蒂纳的个人主义按其实质来说，是敌视共产主义，反对对私有制的任何侵犯的。对《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作者进行批驳（他发表在《维干德季刊》上的文章不过是对这部主要著作进行批判的引子）是必要的，因为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施蒂纳的观点对小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都有一定的影响，对工人运动也有间接的影响。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是对“各式各样的先知”所代表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批判。从1844年起在德国开始传播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变种的典型特征是：把德国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同空想社会主义者，主要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混合在一起。结果，它使社会主义学说具有非常抽象的、脱离现实条件和实际要求的性质。“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反对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途径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主张用伤感主义的爱的说教来实现人类解放。他们反映害怕资本主义发展的德国小市民的反动利益，公开反对革命的共产主义，把“野蛮破坏的”倾向硬加给革命的共产主义^①。对这种阻碍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流派必须给以迎头痛击。

第二卷第一章是批判代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的泽米希和马特伊的论文的，第四章是批判该流派的主要代表格律恩的一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页。

本书的,该书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历史编纂学的样板,最后一章即第五章是批判库尔曼的一本书,类似“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宗教。在我们掌握的手稿中缺第二章和第三章。恩格斯批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诗歌和诗文的文章《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1847年秋发表),很可能是第二卷的组成部分。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在1846年4月就基本上结束了。在以后的一年时间里,偶尔也写写,直到恩格斯写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一文(第二卷的补充),才算最后结束。

完成社会发展观上的革命变革

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基础,在马克思1848年革命前的科学活动中占有首要地位。当然,这个时期最大的一部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首先是一部哲学著作。这部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占有突出的位置。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批判黑格尔之后的德国哲学制定了新的世界观。同这种哲学的代表人物论战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改变目前的现实?青年黑格尔派对现存社会的批判是口头上的,以批判宗教的形式间接地进行的。这不是同现实本身作斗争,而是同现实的影子作斗争。青年黑格尔派实际上是承认现存事物的,只是企图对它们作另外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自己的目的是彻底揭穿这种对幻想的哲学斗争。他们证明,仅仅批判是不够的,应当正确地解释世界,而主要是改变世界。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阐述大体上分为三个部分:前提、观点本身和由此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提出前提，把它们作为出发点。这样的前提是：人们，人们的活动和人们活动的物质条件。这既是历史本身的前提，也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前提。追随黑格尔的德国唯心主义者自命不凡地宣称，他们的哲学似乎没有前提也行，因为他们说任何前提都是独断的。同他们相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彻底唯物地和辩证地解决了从何着手建立新世界观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公开承认，他们自觉地以一定的——并非独断的、思辨的、而是现实的、实际的——前提为出发点，并确切地阐明这些前提。

以往的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地把自然界看成是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克服了这种不彻底性，揭示了人们赖以生活和活动的自然条件本身的历史性。他们把人所得到一些现成的自然条件和人自己的活动所创造的自然条件区别开来。他们指出，在现存的社会中，物质环境本身成为人们历史活动的产物。费尔巴哈不了解也不考虑人对自然的反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他论战时强调指出：“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①随着社会的发展，自然条件越来越变为人们活动的历史产物。问题的这种提法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新理论的深刻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认，一定的自然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的物质条件。他们还指出，人们的身体组织、肉体组织制约着他们对外部自然界的一定关系。但是，这两个历史前提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9—50页。

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的主要对象。两位作者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观察作为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的人们的活动。

这种活动有两个方面：生产（人们对自然界的关系，人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和交往（人们的相互关系，首先是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生产和交往互相制约，但是，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生产是决定性的方面。

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是从生产开始的。正是物质生产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们自己开始生产他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①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人和动物的特殊区别作了具体的说明^②。

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人们必须生存，因而必须有食物、饮料、房屋、衣服。所以，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要求所必需的资料。生产方式决定各个社会的全部生活。社会活动的基本方面表现为生产的不同形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比较全面地发展了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原理，而且向前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在这部著作中，他们第一次从本质上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的辩证法。这个极其重要的发现（可以确定它是1845年的发现）在这里表述为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辩证法。这个发现仿佛是一道新的光芒，照亮了整个正在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范畴的体系，它使人们能够表述作为一个完整概念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现可以归纳为下述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决定社会关系的类型，即交往形式。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25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3页。

现存的交往形式发生矛盾。这个矛盾要通过社会革命来解决。一种新的、与更发达的生产力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将取代已经变成桎梏的原先的交往形式。以后，这种新的交往形式又不再适合发展着的生产力而变成生产力的桎梏，并且通过革命为另一种更进步的交往形式所代替。这样，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在依次更替的各阶段之间形成一种承续性的联系。

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地意识到并且清楚地表述了这个极其重要的发现的意义。他们扼要地总结为：“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①

这个发现对于弄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具有头等意义。如果说，从前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关系决定政治、法律等等的关系，那么现在则确定了什么东西决定经济关系本身，揭示了历史过程的更深刻的基础；归根到底，生产力决定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社会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如果说，从前马克思懂得并指出了物质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那么，现在则揭示了这个基础本身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样一来，社会生活的各主要方面之间，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与政治上层建筑以及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依赖关系被揭明了。

马克思的发现为科学地认识整个历史过程和真正科学地划分历史时期提供了钥匙。解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社会革命，也是历史的一些关节点，它们把历史划分为几个基本时代，构成社会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或者用马克思后来的术语来说，一种社会形态向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揭示了生产的历史发展的主要阶段，其基础是生产力的发展。分工的程度是生产力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1页。

102 展水平的外部表现,分工的每一个阶段决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而财产关系,正如马克思后来指出的,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这些新的思想,描绘了人类社会从它产生到必将向真正人类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轮廓。

与原始的历史关系相适应的是最初的自然产生的分工,这种分工决定了第一种所有制形式,即氏族部落所有制形式。从原始的历史关系向社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的过渡,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取决于自然分工向社会分工、以社会划分为阶级为表现形式的分工过渡。这就是从无阶级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随同社会分工一起发展起来的还有象私有制、国家、社会活动的异化这些派生的历史现象。社会分工的发展决定所有制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变更。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代所有制,第三种是封建所有制,第四种是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历史发展各主要阶段上占支配地位的、依次更替的所有制形式的划分和分析,也就为社会形态的学说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最后一种所有制形式即资产阶级私有制形式发展的前期历史和主要阶段的考察比对历史上另外几种所有制形式的考察更为详尽,他们考察了从行会制度到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的过渡。在这里,第一次划分和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发展中的两个主要阶段:工场手工业时期和大工业时期。同以往的批判私有制的空想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已经指出了私有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指出了私有制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上存在的必然性以及私有制行将消灭的不可避免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则证明,只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私有制消灭的必然性才显露出来,并且为它的消灭创造了物质条件。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生产力的发展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的革命创造了两个基本物质前提。第一是生产的高度发展水平，这¹⁰³同私有制是根本不相容的，但对于按共产主义原则组织社会来说是必需的；第二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化，这导致革命阶级的形成。这个原理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消灭私有制并实现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考察生产进到考察交往领域，即社会关系，社会制度，社会阶级结构，个人、阶级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等领域。他们以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为例研究阶级形成的规律性。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把阶级的形成和发展同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联系起来，第一次科学地指出了社会通过什么途径达到消灭阶级差别。

马克思和恩格斯进一步考察了政治上层建筑的领域，特地把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问题单独提出来研究。在这里，他们第一次科学地揭示了国家的实质，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国家是属于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即经济关系）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资产阶级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自己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政治组织形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指出，国家的产生是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结果，因此，随着阶级由于共产主义革命而消灭，国家本身也将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考察社会意识的形式完成了对唯物主义社会观和社会历史观的阐述。他们尤其阐明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对统治阶级的关系，从而揭穿了思想上层建筑的阶级本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第一次全面地运用阶级观点来看待各个思想流派，彻底贯彻了哲学的党性原则。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的基本问

题作了唯物主义的解答。这个最重要的原理在这里表述为：“意识
104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方面同其他唯物主义者、他们的先驱者不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们的存在本身提出了崭新的见解。这不单单指的是外部自然界，例如象费尔巴哈那样，而首先指的是社会存在即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物质的实践的活动起着决定作用。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象费尔巴哈那样仅仅局限于说明意识的这些或那些产物的世俗的、物质的来源是不够的。他们强调指出，更重要的是必须追溯社会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是怎样从物质的、世俗的基础及其矛盾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地运用唯物主义去研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现象：生产和社会关系，国家、法、道德、宗教和哲学，历史的一般进程、具体时期和事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概括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时写道：“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意识的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做当然就能够完整地描述全部过程（因而也就能描述这个过程的各个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了。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东西，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31页。

他任何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①

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的结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主要成果。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直接成果。105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的空想主义者前辈相反，认为共产主义不是思辨地制定出来的未来理想社会的计划，而是客观的历史过程的合乎规律的结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作者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任何社会革命的客观基础，也就证明了共产主义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因为，大工业所创造的生产力同已经成为生产的桎梏的私有制相矛盾，并且从生产力变成为破坏力。这个客观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基础。它们之间斗争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决。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这个革命的物质前提，科学地证明，正是大工业城市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中心。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为了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无产阶级必须通过革命夺取政权。他们写道：“……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如果它的统治就象无产阶级的统治那样，预定要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和一切统治，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③可见，在这里以最概括的形式（没有进一步具体化）第一次提出和确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过了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3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多年，在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从1845年起就持有这样的观点：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结果之一，将是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逐步消亡和最后消失。……但是同时，我们始终认为，为了达到未来社会革命的这一目的以及其他更重要得多的目的，工人阶级应当首先掌握有组织的国家政权并依靠这个政权镇压资本家阶级的反抗和按新的方式组织社会。”^①

马克思还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表述了在革命实践中环境的改造和人们自身的改变是一致的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②。

最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还概括地叙述了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仿照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样子教条式地描绘共产主义制度的详细结构，只是阐述了当时根据对现实的社会发展趋势的分析所能预见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③ 这将是一个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财产应当受联合起来的个人即整个社会支配的社会。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将消失，从而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政治统治和作为这个统治的工具的国家也将消失。阶级的分工将完全消灭，因此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将消灭，人们也不会终身束缚在这种或那种职业上。人们的个人活动不再作为某种异己的力量同他们相对抗。劳动由外部强制的活动变为自由人的真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38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7页。

自主活动。社会将变成成为人们的真正的联合体，变成成为人们的真实的而不是虚幻的统一体。人们在联合起来之后，使社会生活条件受自己权力的支配。他们自己控制并自觉地组织他们的共同活动；他们调节生产并使整个社会的发展服从自己的总规划。在改造人们活动的物质条件的同时，也改变人们自身，包括人们的意识。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

正如恩格斯后来多次指出的，社会主义之所以能从空想变成科学，是由于马克思的两个伟大发现。这两个发现是，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第一个伟大发现是马克思在1843年夏开始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以后的一系列著作中完成的。这个发现在1845年春已大体完成，并且在1845年11月到1846年4月期间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第一次得到了全面阐述。第二个伟大发现——创立剩余价值论——是在五十年代末完成的。不过，第一个发现已经成为第二个发现的方法论的前提。

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最伟大的科学成就，是社会学说中的真正革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哲学上完成的革命变革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唯物主义第一次被推广于认识社会现象，从而克服了所有以往的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他们第一次提供了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完备的科学理解并创立了研究历史的真正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这个新的世界观，第一次从理论上论证了科学共产主义。弗·伊·列宁写道：“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①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43页。

主要是自己弄清问题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命运并不象该书的作者所希望的那样。1846年4月底魏德迈从布鲁塞尔来到德国。他曾抄写过部分手稿并负责组织该书的出版。当时还打算筹备出版一个季刊，并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很早以前就拟定的出版法英社会主义者著作的译本的计划。魏德迈把《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手稿（缺论述费尔巴哈的第一章，当时没有写完）带到威斯特伐利亚。1846年5—6月，魏德迈又收到第二卷各章的手稿。这两卷的篇幅约有50个印张。

象《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样的著作按其性质肯定会遭到书报检查的刁难。108 尽管当时德国许多邦都有超过二十个印张的著作可免受预先检查的规定，但是这些著作在出版后可能被立即没收。因此，找到一个愿意冒此风险的出版商是非常困难的。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接受威斯特伐利亚的两个企业主尤·迈耶尔和鲁·雷姆佩尔的帮助是可行的，这两个企业主答应提供出版经费。但是这两个自称是共产主义者的资产者，实际上是典型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了解了这部新著作之后，根本改变了对该书出版计划的态度。魏德迈同迈耶尔和雷姆佩尔谈判毫无结果，这在1846年7月初就已经明朗了。迈耶尔7月9日和雷姆佩尔7月11日写信给马克思，借口他们的资金已投入另一项事业而拒绝出资刊印《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他的俄国朋友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你很难想象，在德国出版这种书要碰到怎样的困难，这困难一方面来自警察，一方面来自代表我所抨击的一切流派的利益的出

版商。”^①

在威斯特伐利亚出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计划落空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到1847年期间曾多次设法寻找别的途径来出版这部著作，但都没有结果。从1846年11月起，他们对由一家出版商同时出版两卷已不抱希望，从1847年4月起对完整地出版一卷的希望也不抱了，于是就设法出版该书的部分章节。直到1847年8—9月间才在《威斯特伐利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了第二卷中论述“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的一本书的那一章，署名马克思。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多年以后，于1932年在苏联第一次全文发表。虽然他们生前未能看到全书出版，但他们为这部著作花的心血并没有白白费去。关于这一点，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曾写道：“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②

已经获得的理论成果成了马克思后来的科学活动和实践活动 109 的基础。现在，他可以满怀信心地说，科学社会主义提供给工人群众的不是幻想和臆造的社会改革方案，而是严密的理论，这个理论的使命是充当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真正理论纲领。不久，马克思认为可以用更精确和更完善的形式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阐述的结论公之于世。这一点他在《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里实现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第四章

110

开始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制定国际工人运动的纲领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①

马克思、恩格斯

欧洲的事变预示着革命风暴的来临。1847年，经济危机笼罩着法国、德国、比利时、美国和其他国家。它对英国的打击特别厉害。欧洲许多国家的谷物和马铃薯的歉收使危机所造成的灾难更加深重。在爱尔兰，由于1845年到1847年马铃薯受灾，饥馑尤为严重。

111 欧洲大陆各国，从东普鲁士到布列塔尼和诺曼底，到处都有饥民暴动。在法国，工人举行罢工。在中世纪残余和专制制度还没有肃清的国家（普鲁士、奥地利、意大利），劳动人民的愤怒直接指向封建贵族、官僚和宫廷权奸；在法国和比利时这些实行资产阶级君主制的国家，则指向独揽政权的金融贵族。在人民群众革命热情的影响下，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代表采取了更加坚决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0页。

行动。1847年初，法国开展了改革选举法的运动。形形色色空想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的活动也更形活跃。

在普鲁士，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派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冲突。1847年4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在财政困难的压力下不得不召开联合议会，但是议会中的资产阶级多数派在没有实行宪法以前拒不投票赞成借款。国王没有得到议会的任何让步，6月26日解散了议会。在德意志其他各邦，局势也很紧张。

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如火如荼。1846年2月，在由奥地利、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共同保护的自由城市克拉科夫，波兰革命者举起了民族独立的旗帜。但是，起义遭到了镇压，克拉科夫被强行划归奥地利。在匈牙利，以拉约什·科苏特为首的民族主义反对派提出自治要求，受到捷克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欢迎。在奥地利国内，劳动人民和资产阶级各阶层也越来越憎恨梅特涅首相的棍棒制度。

在意大利各公国，人们对奥地利在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统治极端不满，渴望民族统一和摆脱专制制度的情绪日益强烈地传播开来。1848年1月，革命的高潮在巴勒摩引起了反对那不勒斯波旁王朝君主统治的人民起义。

在英国，宪章运动重新高涨起来。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所有工业城市，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宪章派召开的要求实行人民宪章的群众集会。激进民主派分子在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中也占了优势。

维·格·别林斯基和亚·伊·赫尔岑(1847年被迫流亡国外)¹¹²的革命民主主义观点对俄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增长；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西方思想生活中的事件和现象有了反响；在米·瓦·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小组里秘密宣传空想社会主义，——这一切都表明，在欧洲反动堡垒沙皇俄国也孕育着一场革命风暴。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

在革命前的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团结无产阶级运动先进分子所作的努力，已经具有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进行直接实际斗争这种性质了。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政党这个结论，是根据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学说，根据他把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看作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这种观点得出来的。马克思根据欧洲的局势发挥了这些思想，他认识到无产阶级必须脱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在日益临近的资产阶级革命（这场革命必将使工人阶级更接近于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目的）中，无产阶级必须保持独立的立场。这个任务只有通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办法才能解决。现有的各工人组织、包括成员复杂和思想不成熟的宪章派的经验证明：一个彻底革命的、真正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基础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担负了建党这项非常复杂的任务。当时在许多国家里，工人运动还刚刚兴起。集中在大企业的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也不多，在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中占优势的还是半手
113 工业阶层。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是分散的，他们听命于资产阶级政客或受着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能够接受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是不多的。要把他们联合成为一个团结一致的集体，需要作出巨大的努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想要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他们依据的前提是，未来的共产主义革命将是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行动的结果。这种看法是符合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的矛盾、它的发展的不平衡性还

没有那么尖锐以致使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为了克服工人运动中所存在的各国彼此隔离的现象，为了奠定工人运动国际团结的基础，建立一个把先进工人联合到国际组织里来的政党也是必要的。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样的政党应当既要争取工人阶级共同的国际性的目标，也要争取解决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民族任务。

为了筹建这样的政党，必须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首先是在英国、法国和德国，加强同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的联系；通过交换意见达到观点一致并拟定统一的行动方式。马克思写道，“为了摆脱民族局限性”^①必须这样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彼此保持经常联系的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应当成为这种活动的组织中心。

1846年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它的成员并不是固定的，由马克思、恩格斯和比利时共产主义者菲利浦·日果组成它的领导核心。在委员会里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工作的有：魏德迈、威廉·沃尔弗、埃德加尔·威斯特华伦、斐迪南·沃尔弗、载勒尔、海尔堡等人。有一个时期，威廉·魏特林也是布鲁塞尔委员会的成员。

委员会讨论的问题通常是有关各国的共产主义宣传问题。在它举办的集会上有时也有一些同情解放运动但并不赞同共产主义观点的人参加。比如，在四十至五十年代加入进步团体“西欧主义者”的俄国自由主义作家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安年柯夫，曾根据马克思的邀请出席过1846年3月30日的会议。

同各国工人、社会主义活动家和组织的通讯活动是根据委员会的委托并以委员会的名义进行的。凡是重要问题则公布石印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64页。

告。也曾试图筹集资金进行革命宣传和弥补通讯活动的开支。

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其他地方建立一些类似的委员会。通
114 过威廉·沃尔弗，他们同西里西亚各城市取得了联系，而魏德迈也
想方设法在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省建立通讯委员会。在某些地方，
同布鲁塞尔委员会保持经常联系的一些小组建立起来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拟定德国共产主义者的策略路线时，建议
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对宪法、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的要求。他们
强调指出如果这些要求实现了，“对共产主义的宣传来说，就会有
一个新纪元到来”^①。因此，共产主义者应当积极参加反对专制制
度的群众活动，应当促进资产阶级革命任务的解决，以便为无产阶
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否则，他们就会变成脱
离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狭隘宗派。这个策略也得到了马克思和恩
格斯的拥护者的支持。

通过艾韦贝克，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同正义者同盟
巴黎各支部建立了经常的联系。马克思关于在巴黎建立通讯委
员会的建议只是在后来即 1846 年 8 月恩格斯到那里以后才实现
的。

在各地建立通讯委员会的思想得到了伦敦正义者同盟活动家
莫尔、沙佩尔和鲍威尔的赞同。他们也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
会。但是，布鲁塞尔委员会和伦敦委员会并不是一下子就取得了
完全一致的认识的，因为正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有时对马克思
和他的朋友们对宗派主义思想家的尖锐批判过于敏感。马克思必
须有很大的耐心去说服他们相信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
路线是正确的。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竭力强调自己支持参加宪章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 卷第 25 页。

的英国工人的斗争。1846年3月25日,它通过决议,严厉谴责加入宪章派的小资产阶级激进派托马斯·库伯对宪章派领袖的诽谤。不久,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赞同宪章派全国协会开除库伯,并¹¹⁵指出他散布“象‘不抵抗’论这种只有老太婆才需要的腐朽可耻的学说”^①是特别有害的。同年7月17日,委员会以“德国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的名义给宪章派领袖菲格斯·奥康瑙尔发了专门的贺信,祝贺他在诺定昂选举会上战胜了对手议会候选人自由贸易派(过了一年,奥康瑙尔在这个选区被选入下议院)。

同魏特林决裂

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活动一开始,马克思就清楚地看到,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是现阶段团结先进无产阶级力量的巨大障碍,不利于克服工人运动中的思想混乱,不利于消除宗派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妨碍革命世界观的传播。魏特林主义就是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之一。

马克思承认这位有才能的自学者、马格德堡的裁缝威廉·魏特林在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功绩。当时马克思在巴黎《前进报》上把1842年出版的魏特林的主要著作《和谐与自由的保证》,称为“德国工人的**史无前例**光辉灿烂的处女作”。关于魏特林的这部著作,他写道:“只要把无产阶级巨大的**童鞋**拿来和德国资产阶级的矮小的政治烂鞋比较一下,我们就能够预言**德国的灰姑娘**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②

在《和谐与自由的保证》和小册子《现实的人类和理想的人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83页。

(1838年)中,魏特林学说的长处和弱点都很明显。尽管魏特林对社会发展规律一窍不通,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革命的看法是异想天开的,但是他的无产者的阶级本能使他感到只有通过深刻的人民的变革才能达到共产主义。他勇敢地宣称这样的变革是不可避免的,并声明“现存的一切自身就孕育着革命的胚胎和养分”^①。正是由于这一点,他超过了许多抛弃革命斗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魏特林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者,作为在手工业者和工人中宣传共产主义学说的不倦的鼓动者的功绩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没有把工人阶级看作是社会的改造者,没有把工人阶级从被压迫者的一般群众中划分出来。他认为流氓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116 分子。他把共产主义革命本身简单地理解为自发的暴动。由于他不能揭示社会的规律性,因此他就否认象在德国这样的国家有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反对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结成同盟。魏特林根本不同意工人阶级参加政治斗争。实质上,他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

魏特林的观点带有粗陋的平均主义的痕迹。在以后发表的一些著作中,他的世界观的落后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在《一个贫苦罪人的福音》小册子中(1844年),他给共产主义思想涂上了宗教色彩。他拒绝用革命的手段改造社会,而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建立共产主义的移民区上。

1846年初,魏特林到了布鲁塞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帮助他掌握科学世界观的原理。但是,一切努力都白费力气。魏特林过于敏感多疑,相信自己的观点是绝对正确的,不接收任何劝告。后来,恩格斯写道:“……这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天真年青的帮工裁缝,被自己的才能所震惊,力求弄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应当是什

^① 魏特林《和谐与自由的保证》1960年商务印书馆版第282页。

么样子了。这时他是一个由于自己卓越而受忌妒者追逐的大人物，到处都觉得有竞争者、隐蔽的敌人和陷阱；这个从一个国家被赶到另一个国家的预言家，口袋里装有一个能在地建成天堂的现成药方，并且觉得每个人都在打算窃取他的这副药方。”^①

魏特林反对制定和科学地从理论上论证共产主义的纲领。他要求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花一笔钱出版他的空想主义的著作。他把反对意见看成是嫉妒的表现，是企图“切断他的财源”。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计划出版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评注本也表示反对，认为这是“对他的体系的不正当的竞争”^②。

在1846年3月30日的布鲁塞尔委员会上，同魏特林的分歧发展成公开的冲突。凑巧作为论战的目击者的巴·瓦·安年柯夫¹¹⁷在他的回忆录中生动地描绘了这次论战。当时，马克思坐在桌子一端，“手里拿着铅笔，低着他那狮子头在看一张纸”，“身材高大、气概轩昂、具有英国人那种傲慢而严肃的”恩格斯宣布开会。恩格斯谈到，献身于劳动人民解放事业的人必须互相了解彼此的观点，取得一致的看法。魏特林企图借助于模糊不清的、蔑视革命理论的论断来维护自己的立场，遭到了马克思的尖锐的批驳。马克思强调说，“如果不给工人以严格的科学思想和正确学说，那就同传教士们所玩的一套空洞而无耻的把戏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激发别人的预言家，而另一方面则只能是一些张着嘴听他话的蠢材”。因为这些批评而恼羞成怒的魏特林竟把革命理论的拥护者描绘成脱离生活实际的书房里的学者，对人民疾苦漠不关心的学理主义者。马克思再也忍不住了，他跳起来愤怒地说道：“无知从来也不能帮助任何人！”^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249—2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111页。

③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0—312页。

同魏特林完全相反，马克思认为必须把庸俗落后学说的代言人从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出去。他要求，参加运动的人弄清革命任务的顺序，弄清资产阶级革命在德国的不可避免性，而不要象魏特林那样沉湎于立即实现共产主义的幻想。

不久，魏特林就开始反对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代表人物的批判。魏特林受到这一次反击后，于1846年5月底他就离开了布鲁塞尔。

与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有联系的工人运动活动家们赞同马克思对魏特林所采取的态度。1846年5月15日艾韦贝从巴黎寄给马克思的信中曾谈到这一点。马克思的路线还得到了正义者同盟伦敦领导人、威斯特伐里亚和科伦共产主义者的支持。但是，在瑞士、巴黎、汉堡等地还有不少魏特林的拥护者。

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交锋已经刻不容缓，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中曾对“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了批判。但是，这部著作的出版前景十分渺茫，而争取团结革命力量的斗争任务又要求坚决反对“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①。它的思想家卡·格律恩、奥·吕宁、海·皮特曼等人把自己的作品塞进各种报刊、杂志和文艺作品，还不断地出版书籍和小册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掌握了许多报刊。工人没有成熟起来，而同“真正的社会主义”十分相似的魏特林思想又在工人中广泛流传，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9页。

易地渗透到工人中间去。无论是魏特林主义者，还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都不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意义，以为德国能够而且应当越过资本主义阶段跳进“共产主义天堂”。

“真正的社会主义”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反动的政治倾向。“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傅立叶和圣西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机械地搬用于德国，而忽视德国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还存在许多封建残余，他们所批判的资产阶级制度比起这些封建残余还是很大的进步。他们反对自由主义反对派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宪法和资产阶级自由等等的要求。“真正的社会主义”攻击自由派资产阶级，客观上就是保护现存的封建专制制度。正因为如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出版物照例是不受书报检查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由于下述原因更有充分的根据开展一个反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广泛运动：那些反对共产主义者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经常把“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反动观点强加给共产主义者。“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许多代表人物本人也把自己打扮成共产主义者。

正是这种情况首先促使马克思在1846年5月5日的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上提出海尔曼·克利盖在美国的活动问题。这个德国记者、费尔巴哈的信徒于1845年在布鲁塞尔同马克思相识。同年秋天，他去纽约，在德国工人流亡者的支持下，创办了周报《人民论坛报》作为美国全国改革协会德国分会的机关报。美国全国改革协会联合了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主张禁止土地买卖和无偿地把土地分给劳动人民。克利盖在他的报纸上宣称协会的土地纲领是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基础，并开始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所谓普遍的爱和兄弟合作的思想。¹¹⁹

这种说教的内容和腔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愤慨。他们立即决定宣布不同意把自己打扮成德国共产主义在美国的著作界代

表的克利盖的言行。布鲁塞尔委员会不顾魏特林的反对，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反克利盖通告》。

《通告》的作者指出，克利盖把共产主义学说变为“爱的梦呓”，“在共产主义的幌子下宣传陈旧的德国宗教哲学的幻想，而这种幻想是和共产主义截然相反的”^①。克利盖和其他一些“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提出的理想，他们散布通过把小块土地分给劳动人民的办法就能消除社会的不平等、贫困和剥削的梦想，是反映了“希望在美国碰上好运气重新成为小资产者和农民”^②的破产小店主、行会师傅或破产农民的情绪。

克利盖企图把美国小资产阶级改革派反对土地垄断的运动描绘成共产主义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当然他们绝不否认这个运动对大土地所有制的抨击在客观上是进步的。列宁后来写道：“马克思虽然对这个运动的荒谬的思想外衣加以无情的讥笑，但他努力以冷静的唯物主义态度来确定这个运动的真正的历史内容。……所以，马克思对于赞助这个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斥责，而是完全赞同。”^③

《反克利盖通告》令人信服地证明，共产主义世界观同宗教是不相容的。《通告》的作者强调指出，象克利盖和其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以及魏特林那样把共产主义涂上宗教色彩，就是故意歪曲共产主义，使它庸俗化。宗教的世界观麻痹人们的斗志，使人们妄自尊大和俯首听命，最后安于现存制度，同时还使人们成为狭隘的宗教狂，对不同思想者、“异教徒”产生极端的偏激性。相反地，共产主义世界观使劳动人民坚信自己的力量，增强人类的自尊心、自豪感、自主精神，眼光远大——所有这些品德都是革命地改造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6页。

② 同上书，第94页。

③ 《列宁全集》第8卷第298页。

所必需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人民论坛报》的批评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针对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的。在克利盖的追随者和他的报纸的撰稿人中,有不少人是魏特林主义者。

对克利盖观点的批判,使德国、法国、英国工人运动的参加者有所觉醒,在这以前他们容忍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宣传。在纽约,克利盖的威望甚至在他的拥护者中也日渐动摇了。马克思1846年10月起草的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反对克利盖的第二篇通告也起了同样的效果。1846年底,克利盖的报纸停止出版,他的关于“无限的爱”的宣传也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1847年8月至9月,《威斯特伐里亚汽船》发表了马克思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第二卷第四章,这一章是批判格律恩的著作《法兰西和比利时的社会运动》的。马克思通过对这部著作的批判,揭示了整个这一派的思想缺陷:阉割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合理方面,在解释社会现象方面极其无力,用“人的真正本质”这种抽象词句来代替对社会现象的科学研究,等等。马克思指出,根据“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浅薄的经济学观点来看,他们追随那些“忽视了竞争和大工业的革命方面”^①,即否认资本主义比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进步的反动经济学家。马克思的批判揭示了“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基础本身是站不住脚的,“把德国哲学家的思辨词句”(首先是费尔巴哈的抽象人道主义)同“法国人对社会的批评的结果”^②,换句话说,同法国空想主义者的思想联系起来,是牵强附会的。马克思也揭露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民族自大狂,揭露他们“把德国人的全知和其他民族的无知”^③对立起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15页。

② 同上书,第609页。

③ 同上书,第578页。

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揭露巩固了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基础，从而帮助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如沙佩尔、魏德迈等
121 人摆脱“真正的社会主义”所鼓吹的不正确的观点，在思想上坚强起来，接受先进的革命学说。

同蒲鲁东的分歧

“真正的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流派，在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遭到彻底失败后，比较快地退出了舞台。另外一个与比埃尔·约瑟夫·蒲鲁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却顽强得多。蒲鲁东的观点反映了小企业主以及同小资产阶级手工业者或农民没有完全脱离关系的无产阶级阶层的心理和渴望。在这些阶层构成工人阶级相当大的部分的国家里，如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蒲鲁东的观点后来有相当多的拥护者，蒲鲁东主义就成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中的一个有影响的流派。还在 1848 年革命以前就开始的马克思主义同蒲鲁东主义的斗争，持续了几十年。

1844 年夏，马克思认识了蒲鲁东，并开始建立了友谊关系。马克思看重这个出身于人民下层的农民儿子的天资和写作才能，蒲鲁东根据自己的经历认识了劳动者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处境。1840 年他发表了《什么是财产？》。在这部著作中，象十八世纪作家布里索（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著名的吉伦特党人）那样认为，财产就是盗窃。这部著作在科学上是非常肤浅的。蒲鲁东抨击的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一般原则，而仅仅是大资产，因为他不了解其历史根源，不了解在商品生产发展和资本主义增长过程中财产集中的必然性。蒲鲁东一方面斥责资本主义的追逐暴利，高利盘剥和剥削压榨；另一方面又反对财产公有的社会主义要求。

然而，马克思即使在同蒲鲁东决裂和同他进行多年论战以后，仍然承认这部著作的优点，承认作者对“现存制度的丑恶……真实的激愤”，承认作者的杰出的写作才干，——“风格方面……强健的肌肉组织”^①。

马克思希望，蒲鲁东克服自己世界观的缺陷，特别是在哲学方面获得更广泛的知识，并由此能成长为法国无产阶级的理论家。马克思在反对卢格的文章和《神圣家族》一书中，按这个精神对蒲鲁东作了评论。所以，他就尽力使蒲鲁东增加见识，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¹²²

在布鲁塞尔，马克思继续努力影响蒲鲁东，吸收他参加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工作。在1846年5月5日的信中，他建议蒲鲁东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代表的身份担负同委员会的通讯活动。

但是，蒲鲁东实际上拒绝合作，同时对于用革命手段改造社会的共产主义思想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宣传这些观点就是鼓吹“粗暴的专横、暴力、毁灭”，相反地，他提出逐步改革上层的思想。

蒲鲁东认为主要祸害不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而是“不等价的”、“不公正的”劳动产品交换，是商业利润和借贷利息。蒲鲁东反映了遭受大资本家、高利贷者、银行家的竞争的那些手工业师傅、农民和小商人的情绪，他企图建立一个资本家和工人都是“平等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他认为达到这一点的办法是：根据商品的劳动价值来组织不用货币的交换；实行低息贷款，如果不能实行无息贷款的话；逐步收买占有者的大资产，并由根据平等原则建立起来的小企业主、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人的联合体来重新分配（联合体是为了重新分配而不是为了共同进行生产建立的）。蒲鲁东的空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41页。

实质上就是妄想保存一种不存在给小生产带来严重后果的竞争和大资本家垄断的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从恩格斯那里收到蒲鲁东的关于社会计划的第一批材料。1846年8月恩格斯受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委托，到法国首都巴黎去组织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向法国和德国工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并同魏特林主义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进行斗争。在巴黎，恩格斯看到了格律恩在德国工人中散发的蒲鲁东的改革计划。恩格斯在1846年9月16日和18日给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些设想都是“超出一切范围的荒唐事”^①。1846年10月底，在正义者同盟巴黎各支部的会议上，由
123 于恩格斯的努力，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拒绝蒲鲁东-格律恩的社会药方，确认恩格斯提出的论点：工人运动的目的是通过革命的途径消灭私有制。

恩格斯的活动得到马克思的热情支持。恩格斯寄自巴黎的信件是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关于蒲鲁东的新著作《经济学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的出版，马克思早在1846年10月23日左右就从恩格斯的信中知道了。马克思得到这本著作则晚些，在12月下半月。

蒲鲁东的著作自诩为一部震撼社会科学基础的福音书，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钥匙。蒲鲁东自以为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做出了定论。实际上，《贫困的哲学》证明，该书的作者既不懂得黑格尔哲学的方法，也不了解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蒲鲁东以为向前迈进了，实际上却倒退到黑格尔、斯密和李嘉图的后面去了。

必须狠狠地打击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捍卫被蒲鲁东诋毁的共产主义思想。蒲鲁东还粗暴地攻击空想社会主义者，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7页。

为他们的观点中没有什么合理的成分。因此，马克思立即着手写“反蒲鲁东”的著作，以便阐述（同蒲鲁东的教条相反）新的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

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给安年柯夫的信中，第一次扼要地概述了他的未来著作的内容梗概，因为安年柯夫曾问过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著作有什么意见。马克思在信中对蒲鲁东所作的批判性评述十分深刻和有说服力，使安年柯夫这样一个对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并不了解的人都感到惊奇。安年柯夫在1847年1月6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您对蒲鲁东著作的意见，以其正确无误、清晰明白，而主要是立足于现实的意向，对我起了真正振奋精神的作用。”^①

马克思在给安年柯夫的信中，揭露了蒲鲁东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他的方法是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揭露了蒲鲁东的社会学观点的局限性，指出他对资本主义的历史起源、它的性质和本质，对社会发展的规律，都是一窍不通的，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意义也是不理解的。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蒲鲁东的观点看作是一个糊涂思想家的某种奇谈怪论，他认为蒲鲁东的思想体现了一定的阶级的思想情绪。马克思写道：“蒲鲁东先生彻头彻尾是个小资产 124 阶级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②因此，对蒲鲁东观点的批判，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具有原则性的重要意义。这种批判应当确保无产阶级在理论上和思想上优越于小资产阶级，帮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划清同小资产阶级的界限，使无产阶级成为能够影响小资产阶级非无产者阶层（在即将来临的斗争中可能成为同盟军）的领导阶级。

马克思在信中，概括了他所发现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同恩格斯共同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生产力对社会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俄文版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0页。

展的决定性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和相互作用,所有其他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现象(包括思想领域)对生产方式的依赖关系。新的、更加进步的生产方式代替陈旧的生产方式这一历史必然性,取决于发展着的生产力和现存生产关系之间的不适合(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确切的术语,不象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把生产关系称为“交往形式”,而是称为“经济关系”、“社会关系”)。马克思关于旧的生产关系不仅阻碍社会发展,而且能使社会倒退,失掉它的“文明的果实”^①的思想是特别深刻的。他既揭露了所谓历史是一些能“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②的优秀人物的行动的结果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也揭露了所谓可以不顾客观条件任意进行“历史”创造这种唯意志论的观念。马克思阐明,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物质财富的生产者,首先是通过亲自参加生产力的发展来影响历史的进程。但是,他们不能随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而且后来的每一代人所得到的都是“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③。

马克思强调指出,必须把一定时代的各种生产形式,看作是历史的和暂时的,从而论证了科学中的历史主义原则。他指出,这个原则是对社会现象进行真正科学研究的必不可少的特征。

《哲学的贫困》

马克思在较短的时间里就写成了批驳蒲鲁东的著作。1847年初,马克思用法文写的这部著作已经基本完成并交给了出版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② 同上书,第329页。

③ 同上书,第321页。

这部著作是由巴黎的弗兰克出版社和布鲁塞尔的福格勒出版社出版的。1847年6月15日，马克思写了一篇简短的序言，同年7月初出版，书名是《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首先批判了蒲鲁东的观点，同时也发展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和经济学观点，还阐述了关于工人运动及其策略的许多深刻思想。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第一次通过出版物科学地，虽然还是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他主要是在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发挥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些原理成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初步的方法论基础。

在《哲学的贫困》问世以前，马克思作为哲学家已经赢得很大的声誉，但是作为经济学家还不太闻名，因此这本书对他说来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学方面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关于这部著作，马克思在1880年写道：“……在该书中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东西，经过二十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①列宁认为，《哲学的贫困》是第一批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之一。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的著作，指出了它的方法论原则的弱点。他认为，蒲鲁东企图把黑格尔的辩证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但是并没有掌握辩证法的实质，不了解科学地运用辩证法分析经济现象必须先揭露现象本身所固有的实际矛盾，却人为地用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的范畴凑成一些经济矛盾。结果不是真正的辩证法，而是诡辩地玩弄矛盾。马克思指出，蒲鲁东搬用了黑格尔矛盾学说的神秘的唯心主义形式，却阉割了这个学说的合理成分。他完全曲解了黑格尔关于矛盾的解决或扬弃的观念。在蒲鲁东看来，扬弃并
126
不是向新质的革命的转变，而是消除现存现象中与“好的方面”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48页。

矛盾的“坏的方面”。由此可见，蒲鲁东的意图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及其基础，只是清除商品生产的“坏的方面”，使它不被滥用。马克思强调指出，蒲鲁东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他“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①，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形而上学者。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蒲鲁东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是永恒的这种错误观念。他认为这些范畴就是消除现存社会制度的坏的方面和建立新的“公正的”社会制度的基础。他重犯了英国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布雷、汤普逊等人的错误，这些人都企图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公设中，特别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论出社会主义制度。马克思在1845—1846年的科学研究中已经揭露了这些企图是空想的。他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蒲鲁东的“科学发现”同布雷和这一流派的其他作家的空想计划是相似的。但是，他强调指出，蒲鲁东作为真正的小资产者与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不同，后者认为这些计划只是根据社会主义原则根本改造社会的过渡性措施，而他却认为这就是拯救个体小生产的灵丹妙方。

马克思反对形而上学地和唯心主义地把政治经济学归结为思想抽象的总和，一些僵死的范畴，他认为，真正的经济科学应当建立在对社会物质生活的客观过程的认识上，首先是对物质生产条件的研究的基础上。抽象、逻辑范畴，只是在它们本身反映这些过程的时候才能成为科学地认识现象的工具。另一方面，不论是现实关系，还是反映现实关系的经济范畴都不是永恒的，都具有历史的短暂性质。由此可见，科学的认识方法，首先要求从辩证发展中、从事物内部矛盾斗争所制约的运动中去认识事物、现象及其抽象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11页。

表述(科学的范畴)。

《德意志意识形态》提供了不少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分析社会现象的范例,马克思在分析过程中揭示了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着的辩证过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阶级对抗形式中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量变转化为质变,进化转化为革命的飞跃)。而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已特别注意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方法本身,并概括地揭示了它的本质特征。¹²⁷

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把辩证法看成只是思想、精神生活的属性,消极的物质就是它们的异在,而马克思认为,物质现象本身、生活本身是辩证运动的最初源泉,思想和概念的发展是它们的反映。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反对黑格尔对辩证法的唯心主义的和神秘主义的解释,深刻地揭示了辩证法的唯物主义性质,这样,他就在他自己的科学方法和这位德国哲学家的方法之间明确地划出了一条界线。

马克思非常科学地、简洁地阐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理。他扼要地表述了它的实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性,不断发展着的生产力的变化引起生产方式更替的不可避免性。“社会关系同生产力密切联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气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①

马克思在说明“生产力”这个概念的含义时指出,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还包括劳动者本身。他表达了一个重要原理:“……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②

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没有仅仅局限于批判蒲鲁东,也注意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8页。

② 同上书,第160页。

了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包括古典经济学家的根本缺陷：把价值、分工、信贷、货币等等解释成固定不变的范畴。马克思严厉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代表人物把资产阶级生产规律描绘成永远支配社会生产的自然规律。每一个生产阶段都是在某个时候产生，又在某个时候退出舞台。如果认为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这就错了。因为前者在当时同样也是“天然的”，就象后者在现在一样。但是，资产阶级生产规律必将失去作用，因为资产阶级关系体系本身必将从地球上消失。

马克思从新的方法论的立场出发，对政治经济学的许多范畴，首先对价值这个基本范畴作了分析。蒲鲁东对价值，象对其他范畴一样，把它仅仅看成是“价值观念”，也就是说，把它看作纯粹思想中的概念，相反地，马克思认为价值起源于生产和交换发展的一个现实的历史阶段，即劳动的产品成了商业对象的阶段。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理解的价值是体现在商品中的人的劳动。他继斯密和李嘉图之后指出，价值是由用于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与他们不同，马克思证明，只有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即当生产具有社会性，而劳动还不是直接社会劳动的时候，人的劳动产品才变成商品，才获得价值形式（马克思在这里经常把“交换价值”作为与“价值”等同的用语来使用）。价值实现和表现一个个商品生产者的社会联系。

蒲鲁东把价值和其他范畴划分为两个方面：坏的方面和好的方面。他写道，坏的方面（本来意义的价值，即交换价值）应当消除，而好的方面（物品的效用，即它的使用价值）则应当保存和发展。他认为，价值的这种矛盾，价值的这种两重性，可以通过建立一种不用价值工具即货币的产品交换来解决。马克思证明，不是货币本身造成资产阶级制度的矛盾，而是制度本身的基础就是矛盾的。它必须以价值、货币的存在为前提。马克思写道：“货币不是东西，而

是一种社会关系。”^①用消灭货币的方法，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内部的有机的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是由生产形式产生的，它们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产物。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提出他的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最初原理。这种理论是他在后来写的著作中发挥的。马克思在这里还使用从古典经济学家那里借用来的概念，如“作为商品的劳动”、“劳动价值”、“劳动价格”。但是，他赋予这些概念一种新的内容，从而揭露在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的剥削实质。李嘉图把劳动看成同任何其他一种商品一样的商品。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商品。购买和使用这种商品，使资本家发财致富，使工人处境恶化。马克思表述了——虽然还是以一般的、萌芽的形式表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他指出，“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②。

马克思理解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他就能按新的方式（同李嘉图相比较）去观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历史了。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发展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表述的思想，精辟地概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阶段——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工厂。他深刻论述了分工和机器生产的作用，与蒲鲁东相反，他充分强调机器生产的革命方面。资本主义工厂给工人提供的条件的是很不人道的，但是它却是工业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它有力地促进了生产的增长和集中。现代工人阶级也是从它的内部成长起来的。

虽然马克思当时还没有完成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但是他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根据崭新的、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采用的标准完全不同的方法论前提来研究经济现实了。马克思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开始制定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同时也利用了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0页。

的先驱者的一切合理的东西。

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通常的狭隘观念相对立，马克思指出了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矛盾和实现社会改造的真正的社会力量。马克思认为，工人阶级的理论家在规定科学与革命实践相联系的途径时，应当自觉地代表历史的前进运动，而不应当只是在自己的头脑里寻求科学真理。真正的革命科学的使命就是使工人阶级懂得资本主义的矛盾，懂得在这些矛盾中包含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

马克思同蒲鲁东的另一个原则分歧是：蒲鲁东否认罢工斗争的积极意义，说什么工人不愿意，也不应当参加工会。马克思用具体的事实驳斥了这些胡言乱语。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为工人反抗现存制度是毫无用处的，而空想社会主义者也提出一些引诱工人群众脱离现实斗争的计划，同他们相反，马克思指出，结成同盟对工人来说就是阶级斗争的学校，是训练工人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进攻的一种形式。资本把居民群众变成无产的工人，企业主奴役他们，竞争又把他们弄得四分五裂。但是，马克思写道，这些群众在共同利益的影响下将逐渐团结起来，联合起来，首先是按行业对资本家进行越来越有组织的反抗。“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①

随着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同现存制度是根本对立的，必须用革命手段改变现存制度的基础，为此必须组织和团结自己的力量。无产阶级的这种社会主义阶级觉悟，在使无产阶级从“对资本说来已经形成一个阶级，但还不是自为的阶级”^②的群众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方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59页。

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马克思在强调工人的经济斗争的意义时指出，这种斗争必将发展为革命的政治行动，因为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任何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的这个公式确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的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之一，这就是说，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是统一的，政治斗争对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起着决定作用。

马克思指出，建立在阶级对立上的社会，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冲突。只有在工人阶级取得胜利之后，阶级对抗才会消失，社会才能不经过革命风暴而排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①。马克思当时用乔治·桑的小说《扬·瑞日卡》的序言中的一句话作结束语：“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②

马克思的朋友们把《哲学的贫困》的出版看成是正在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一项重大的理论成就。德国共产主义者斐迪南·沃尔弗在魏德迈的协助下在《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上发表了书评。恩格斯在同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交谈时把马克思的这部著作称为“我们的纲领”^③。

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

1846 年底，巴黎和伦敦的正义者同盟盟员的思想有了转变。在这以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受到空想社会主义各种流派的影响，都经历了复杂的思想进化过程。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不能解答他们所遇到的工人运动的一些实际问题，因此他们必然要悲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109 页。

观失望。与此同时，正在形成的、能阐明最复杂最重大问题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吸引力在发生作用。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越来越坚信，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给工人组织指明正确的方向。手工业者一向对“有学问的人”的不信任逐渐消失了，逐步认识了科学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

1846年11月，正义者同盟的中央机关、它的人民议事会的驻地，从巴黎迁移到伦敦。人民议事会的成员有皮鞋匠亨利希·鲍威尔、钟表匠约瑟夫·莫尔和卡尔·沙佩尔（学生时代就是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政治流亡者、从事过各种职业——护林员、木桶匠、啤酒酿造工人、排字工）。从他们向同盟全体盟员发表的通告中，可以看出他们由于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思想上有了一定的进展。通告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政党”，并指出，追求发明各种矫揉造作的社会主义体系将给工人运动造成危害。通告把一些极重要的策略问题提出来讨论，例如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各阶层，如何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等等。通告的起草人建议1847年5月初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者代表大会。

由于制定代表大会的纲领遇到了许多困难，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决定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请求帮助。这个决定得到同盟伦敦支部最积极的盟员的热烈拥护。人民议事会派遣莫尔携带正式委托书去布鲁塞尔访问马克思，去巴黎访问恩格斯，商谈邀请他们加入同盟并参加制定纲领和其他文件的条件。

在这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被邀请加入正义者同盟。但是他们坚决地谢绝了，因为他们不同意在同盟中盛行的空想主义观点，不赞成同盟的宗派主义密谋活动的原则。这一次，马克思对莫尔的建议最初还多少有一些保留。但是，1847年1月底到2月初的谈判过程中弄清了同盟的伦敦领导人准备改组同盟。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把现存的国际性工人组织，按照新学

说的原则加以彻底改造，使它成为即将产生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马克思确信了这一点以后，便同意加入同盟。恩格斯也接受了加入同盟的建议。

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判的结果已反映在正义者同盟伦敦领导机构 1847 年 2 月发表的新通告中。虽然没有称名道姓，但通告的起草人已经写得很清楚：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支持者加入了同盟。通告还写道：“在法国和比利时，我们暂时按新的方式组织起来了。”^① 为了做好充分准备，代表大会的召开日期从 5 月改为 6 月。马克思同意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它规定全面改组同盟，制定新的章程，审定纲领、机关报等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莫尔的会谈，有助于伦敦的中央成员端正对各社会主义流派的立场。

马克思立即把他同人民议事会达成协议的消息通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战友。他不仅建议他们加入同盟，而且鼓动他们积极参加同盟的改组工作。他在 1847 年 3 月 7 日给丹尼尔斯的信中 133 提议在比利时的一个城镇安排一次会见，以便讨论党的事务。他在同恩格斯的通信中也讨论有关准备代表大会和选派代表的问题。

1847 年 6 月 2—9 日，正义者同盟代表大会在伦敦举行。马克思因为经济困难未能去伦敦。但是，他对参加代表大会的布鲁塞尔小组的代表威·沃尔弗作了详细指示。恩格斯从巴黎到达伦敦。马克思认为恩格斯和沃尔弗出席代表大会一定能保证代表大会的正确方向。

在六月的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实际上，代表大会是一次成立大会，它创立了一个具有新思想原则和新结构的另一个崭新的组织。

在制定同盟纲领方面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步骤。代表大会同意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国际的先驱（文件集）》1964 年莫斯科版第 133 页。

把恩格斯以革命的教义问答形式（这是当时在工人团体中能被接受的形式）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作为纲领的基础，并决定将草案分送各地方支部讨论。文件以科学共产主义的精神叙述了一些纲领性的原则^①。

在恩格斯和沃尔弗的直接参加下拟定了新章程。新章程经过地方支部讨论后提交下一次代表大会批准。根据马克思和莫尔达成的协议，在起草章程的时候删掉了以前同盟从密谋性的秘密团体承袭的一切做法：例如接受成员时的半神秘主义的仪式，宣誓尽忠，规定盟员繁琐的义务，造成领导人滥用职权的可能性的权利过份集中。关于这一点，后来在1877年马克思在给当时与他有书信往来的人的信中说：“恩格斯和我最初参加共产主义者秘密团体时的必要条件是：摒弃章程中一切助长迷信权威的东西……。”^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对领导人的个人迷信，在无产阶级组织中是不容许存在的。

在新章程中，领导机构的选举是同充分的集中制、下级机关服从上级机关的原则结合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最高机关是由各地
134 方组织的代表组成的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的坚决要求，后来取消了限制代表大会权限和支部有权接受或推翻大会决议的这一条。中央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是权力执行机关。基层组织是支部，支部选举出主席和副主席。本地区的一些支部联合成区部，由区部委员会领导。

新盟员加入同盟，必须了解章程，然后经支部同意，由支部主席和介绍人办理接纳手续。章程规定了因各种过错把盟员开除出盟的条例，规定了缴纳盟费和经费开支的制度。同盟盟员必须拥护共产主义原则，保持共产主义者应有的生活方式，严守党的机

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文件和材料》1970年柏林版第1卷第470—4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9页。

密，不参加任何敌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团体。最后这一条规定，是在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仍然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加进去的，它代替了过去禁止盟员加入任何其他政治组织和民族组织这一宗派主义的规定。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第一次给工人运动，带来了一个比当时已有的工人组织和民主团体所遵循的组织原则更高级的组织原则。同时章程采纳了这些团体的好的组织经验。代表大会决定把魏特林的追随者开除出同盟，这就标明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决不容许有宗派主义和空想主义的教条。

代表大会决定抛弃“人人皆兄弟！”这个旧的含糊不清的口号，并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伟大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因为它在历史上第一次体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本原则——劳动者的国际团结、工人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奴役的共同斗争中的统一和团结的思想。

共产主义者同盟——宣布科学共产主义是自己的思想旗帜的第一个国际工人组织的成立，是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上的突出事件。它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预示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思想必将胜利。

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

135

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必须努力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和小组也加入了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倡议，1847年8月5日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和区部。参加区部委员会的有：马克思、沃尔弗、日果和德国工人荣克。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并不局限于对

比利时各支部的领导。布鲁塞尔实际上成了整个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指导中心。伦敦中央委员会在处理一切重大问题时总是首先征询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意见。

马克思的亲密朋友和战友很快就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取得了领导地位。魏德迈、丹尼尔斯、毕尔格尔斯等人成了同盟西德意志各支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参加巴黎区部委员会的恩格斯领导同盟的巴黎各支部。恩格斯为了同盟的事务于1847年7月底到达布鲁塞尔，一直逗留到同年10月中旬。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安排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在专制制度国家的现存条件下，在实行“自由主义”体制国家（比利时、法国、瑞士）流亡者的政治活动遇到阻挠的情况下，同盟必须是一个秘密的组织。但是马克思想方设法不使同盟重陷它的先驱即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初的秘密工人团体所处的那种孤立无援和脱离群众的状态。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在同盟的那些秘密的、人数较少的组织周围应当有一些象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那样公开的工人团体。同盟应当或者同现有的教育团体建立联系，或者建立新的组织。

这个想法很快就付诸实现了。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建立的教育协会里，成立了图书馆，给工人开办了各种题目的讲座，组织了歌咏队等等。定期举行政治讨论会。后来马克思指出：“在这些公开的工人协会后面进行领导的同盟，既可以把协会用作进行公开宣传活动的极为方便的场所，另一方面，又可以从中吸收非常能干的成员来充实自己和发展自己。”^①

136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倡议，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成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参加协会的主要是德国工人流亡者。起初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4页。

会只有三十七人，几个月以后就达到一百人左右。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

德意志工人协会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和教育工作，马克思在协会中是活动最积极的成员之一。12月下半月，马克思在协会做了一系列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1847年12月31日协会组织的盛大新年宴会上的马克思的演说记录也保存下来了。马克思在演说中向出席宴会的客人——比利时和国际民主主义运动的活动家致意，强调指出了争取民主自由的革命斗争对于工人的重要意义。

《雇佣劳动与资本》

马克思打算把他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做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讲演整理出版，魏德迈抄写的供出版用的手稿保存下来了。但是1848年初这部著作未能在布鲁塞尔出版，因为欧洲发生了革命事件。只是在演讲以后过了一年半，即1849年4月上半月，马克思才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一部分，总标题是《雇佣劳动与资本》。但没有完全发表。在马克思的材料中有一份手稿，标题是《工资》，很可能就是他的讲演的未发表部分的草稿。

《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后半期继《哲学的贫困》以后的第二部篇幅较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这部著作的内容反映了马克思对这门科学的认识的深刻，证明了他的经济学观点的独创性。同时，《雇佣劳动与资本》是马克思用通俗的形式表述自己的科学观点的光辉典范之一。马克思简明扼要地向工人阐述了非常复杂的经济学问题。

马克思认为他的任务是阐明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揭露资产阶级统治和实际奴役雇佣工人的经济基础。这个任务是特别重要

的，因为许多资产阶级秩序的辩护士要工人相信：工人用自己劳动获得公平的工资，而工厂主用自己的资本（它给工人提供就业手
137 段）以利润的形式同样获得公平的报酬。另一方面，当时还流行各种空想主义的方案，来确定所有参加资本主义生产的人的利益的和諧一致。

马克思批驳了所有这些辩护士论点。他首先向工人讲明什么是工资和工资是由什么决定的。他指出，在同资本家的商业交易中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资本家按工作时间或者按生产产品的一定数量付给工人工资。工资是工人拥有的唯一的商品的货币表现，是这种商品的价格的特种名称。不做这笔交易，不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工人就活不下去。他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他的劳动，是他本人和他全家生活的唯一来源。因此，雇佣劳动仅仅从表面上来看是自由劳动。正象奴隶被当作没有灵魂的东西永远地出卖给自己的主人一样，正象农奴被束缚在土地上，为了土地把自己的部分劳动出卖给地主一样，雇佣工人实际上也被终身束缚于资产阶级。他至多可以把自己的劳动换一个买主，从一个资本家手里转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

一切商品的价格依据供应和需求，在卖主相互竞争的影响下而波动。但是不管怎样波动，价格总是趋向于该商品的生产费用的水平。因此，围绕生产费用的价格波动既不是平静的，也不是有节奏的，而是伴随着“极可怕的破坏作用”^①，有时，在危机时期，在总的方面造成真正的工业无政府状态。

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在生产费用的范畴或价值中，包括生产某个商品所使用的并以劳动时间计量的原料和劳动工具，以及同样以时间计量的直接的活劳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0页。

与其他商品相同，劳动的生产费用包括训练工人和维持工人本身的费用。这就是工人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费用。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格就是工资。

马克思对工资下了定义，接着又给利润下了定义。他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一向把资本当作物品和资料的总和，当作用于新生产的积累起来的劳动，这些观点是错误的。资本具有物的外壳，是作为物出现的。很多人都指出过这一点，但是只有马克思才证明，¹³⁸物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成为资本，只有在一定社会关系下，劳动产品、积累起来的劳动才能变为资本。资本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资本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即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统治关系。不管资本具有什么样的物的形式，不管资本由多少商品的总和组成，资本意味着存在这样一种社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占有了物就能够无偿地占有除劳动能力以外一无所有的工人直接的活的劳动。“只是由于积累起来的、过去的、物化的劳动支配直接的、活的劳动，积累起来的劳动才变为资本。”^①资本和雇佣劳动是相互制约和相互产生的。

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不仅给资本下了经典性的定义，而且还进一步发展了关于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原理。马克思通过具体的事例证明，资本家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了工人以工资形式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马克思考察了工资的各个方面，对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作了明确的区分，同时提出了关于相对工资的重要原理，相对工资反映雇佣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和资本在生产的产品中的份额对比。他表述了一条重要的规律：甚至在最有利于工人的情况下，工人的相对份额在下降，资本家的相对份额则在增长。“利润和工资仍然是互成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4页。

比的”^①。

马克思指出：雇佣劳动的利益和资本的利益是截然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在扩大。马克思强调指出，随着社会财富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无产阶级只是给自己“铸造金锁链，让资产阶级用来牵着它走罢了”^②。

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的迅速增加又为社会的革命改造创造了前提。马克思在《工资》这篇草稿中强调指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制度为无产阶级的社会解放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提供了物质
139 手段。资本主义同以前的社会形态相比有这样一个长处，就是说在资本的统治下，社会关系脱去了“神圣的外衣”^③，消除了宗法制的东西，买卖的金钱关系变成了唯一的关系。无产阶级在自己的发展中使组织性和力量达到了完全能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的程度。

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后期的观点认为《雇佣劳动与资本》中的原理不是全都准确的和恰当的。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也象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那样，把劳动解释为商品。后来，他就作了订正：工人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这不只是订正一个术语，而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大的发现。马克思在该著作中还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的说法，把商品价值和商品的生产费用等同起来。结果，价值中就漏掉了工人生产的但被资本家占有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总之，《雇佣劳动与资本》反映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完全形成前的一个发展阶段。这是马克思作为经济学家在四十年代末所达到的一个高度，为制定新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学说奠定了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72页。

② 同上书，第3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59页。

为创办刊物而斗争

为了广泛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就必须有一个刊物。在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开展活动时期，魏德迈写信给马克思说：“真遗憾，简直没有一个刊物能发表一些不受书报检查的小文章。我相信你是唯一能够胜任编辑的人……”^①

随着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成立，创办这样一个刊物的要求变得更加迫切了。1847年8月马克思计划在比利时用招股的办法创办一个评论性月刊。他把这件事通知他在德国和法国的朋友，请他们组织订户。但是，这个愿望未能实现。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伦敦领导人也打算在马克思及其朋友的支持下出版一份共产主义杂志。他们得到了威廉·沃尔弗的大力协助。1847年9月，《共产主义者杂志》试刊号问世了，上面刊印着 140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个口号（这个口号第一次出现在刊物上）。试刊号的内容显然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它的文章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阐述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某些重要的策略原理（尤其是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策略）。但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这个刊物停止了发行。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争取把流亡者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变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的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从1847年1月1日开始发行，每周出版两次。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此人一来到巴黎就被怀疑同警察局和法国正统派有联系。由

^① 约·魏德迈1846年6月28日给马克思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192。

于他尽量为激进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营垒的各种派别提供版面，这份报纸的思想面目是五光十色、很不确定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为该报写的稿子逐渐增多。为了把报纸变成不仅是表达民主主义思想，而且表达革命无产阶级思想的喉舌，威廉·沃尔弗做了很多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偶尔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一些文章。

马克思的战友们都为报纸的命运担忧，都希望能报纸上牢固地确立无产阶级的影响。1847年4月19日毕尔格尔斯写信问马克思：“《布鲁塞尔报》的情况如何？如果是跟着伯恩施太德先生走，结果只能是一团糟。问题是有可能……对他加以控制。”^①

1847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决定不仅通过自己的战友，而且要直接参加该报的出版工作来积极影响报纸的方向。马克思在1847年8月8日给海尔维格的信中指出，“这家报纸虽然存在许多缺点，毕竟还有一些功绩”，而且该报的编辑“已经表示愿意在各方面都适应我们”^②。伯恩施太德作出如此让步是因为报纸遭受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毫无疑问，他也希望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参加撰稿来提高报纸的信誉和声望。但是让他接受一定的条件看来也不那么容易。一个月以后，从1847年9月12日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就经常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撰稿了。

1847年底，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对该报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从这时起一直到1848年2月27日出版最后一号止，他们实

① 伯恩施太德1847年4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13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92页。

际上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伯恩施太德只不过是名义上的编辑而已。

这样,《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就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非正式的机关报,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性原则和策略原则的宣告者。它宣传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资产阶级保守制度的革命斗争,它站在一般民主主义运动的最前列,同时,坚决捍卫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社会要求。

马克思在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工作期间,显示了他的革命政论家的卓越才华。他的文章既有理论上深刻而令人信服的论据,也有机智巧妙的笔法和激烈辩论的特点。作为新闻工作者的马克思根据他的渊博学识,能自如地运用恰当的历史类比、文学比喻和语言大师们塑造的形象。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报刊著文的主要目的是向工人阶级阐明它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作用和任务,为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思想和策略方面作好准备去迎接行将到来的战斗。马克思竭力使党既不受自由主义活动家的甜言蜜语的诱惑,又能认清打着爱人民和关心穷人的幌子的那些反动政治力量的同样危险的蛊惑宣传。

这就是马克思作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经常撰稿人在该报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目的。马克思写这篇文章是因为科伦的一家保守日报《莱茵观察家》发表了一组匿名的文章,文章中竟把普鲁士国家说成是劳动人民的保护者。

在《〈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一文中,马克思撕下了普鲁士君主制度辩护士的“社会主义的”假面具,痛斥他们是最凶恶的反动分子和蛊惑者。马克思指出了那些描绘与人民为敌的普鲁士国家的社会使命的无聊作品的极端欺骗性和有害性。后来,马克思在 142 揭露拉萨尔派的首领向俾斯麦容克地主政府献媚时,把这篇文章

作为说明自己对“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①的态度的例子。

马克思揭露了反动的蛊惑者鼓吹基督教教义的真实用意，概括地指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世界观同基督教道德和一般宗教道德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写道：“基督教的社会原则认为压迫者对待被压迫者的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不是对生就的罪恶和其他罪恶的公正惩罚，就是无限英明的上帝对人们赎罪的考验。

基督教的社会原则颂扬怯懦、自卑、自甘屈辱、顺从驯服，总之，颂扬愚民的各种特点，但对不希望把自己当愚民看待的无产阶级说来，勇敢、自尊、自豪感和独立感比面包还要重要。”^②

马克思的文章明确地规定了无产阶级对已经形成的德国革命形势应采取的立场。他号召人民群众支持资产阶级反对派，但是他也强调指出，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反对派在联合议会中不够坚决的行为是不满意的。马克思反对自由派的温和路线，主张用革命手段推翻专制君主制、消灭半中世纪式的社会制度、使整个社会政治制度民主化的方针。他为这些民主改革拟定了一个纲领，包括实现真正的人民代议制，废除徭役，消除等级的隔阂和限制，实行陪审制，实现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

文章自始至终贯穿着人民群众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真正动力的思想。马克思用十七世纪英国的和十八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来论证这一点。他强调指出，在德国，要彻底解决革命的任务取决于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取决于他们是否准备把君主制“甩到深渊里去”^③，把封建领主送上断头台。马克思针对德国情况解释了“革命的人民”这个概念就是指无产者、小农和城市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18页。

③ 同上书，第220页。

民^①。他强调指出，这些阶级力量联合起来，对整个君主专制制度是最大的威胁。

马克思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同工人阶级有利害关系的思想。他指出：“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② 143

为了引导工人阶级认识自己的阶级目标，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通过《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向读者大量报道比利时和其他国家工人运动的情况，发表德意志工人协会各次会议的报告。这份报纸还刊登一些论述共产主义学说的各个方面和宣传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文章和材料。

在国际经济学家会议上

1847年9月16日至18日在布鲁塞尔举行了讨论自由贸易问题的国际会议。会议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组织的，他们主张废除一切进口税，彻底实行自由竞争，国家不干预商业活动。他们打算在这次会议上证明自由贸易制度比保护关税制度优越。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学界的许多知名人物都汇集到布鲁塞尔。资产阶级报刊对这次会议也大肆宣扬。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一些战友参加了这次会议，决定利用会议来揭露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伪善面目。工人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坐在最后面的位子上，马克思认为这次会议是同资产阶级思想家进行交锋、用无产阶级观点反击他们的观点的最合适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0页。

② 同上书，第210页。

场所。会议的第三天，当讨论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时，维尔特和马克思报名要求参加辩论。

维尔特首先发言。他的发言同会上以前的发言的调子迥然不同。在后排听众的赞许声中，维尔特要求说明为什么在讨论工人状况的会议上没有工人代表参加。维尔特驳斥了自由贸易派所谓的自由贸易是给无产阶级造福这种无耻谎言，有声有色地描绘了无产阶级群众的悲惨处境。

维尔特的发言象一股电流触动了会议的参加者。他们纷纷奔上讲台，企图反驳维尔特的论据。轮到马克思发言了，会议主持
144 人突然宣布停止辩论，尽管还有一些登记发言的人没有发言。会议匆忙地通过了一项赞同自由贸易的决议就宣布闭幕了。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在民主主义和工人的报刊上揭露了会议组织者的这些不光彩的行为。1847年9月29日，比利时报纸《民主工场报》发表了马克思准备好的演说稿。恩格斯也有几篇关于会议的文章发表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宪章派的报纸《北极星报》上。他在为宪章派机关报写的通讯中详细地摘录了马克思的未发表的演说的基本内容。这样，在布鲁塞尔经济学家会议上资产阶级倾向和无产阶级倾向的冲突就被广泛地宣扬开了。

马克思在他的演说中用无产阶级的观点对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制度做了科学的批判，揭露了这两种资产阶级经济体系的代表人物的虚伪的空话，揭露了它们的拥护者拿人民群众利益搞投机。

象对待其他问题一样，马克思也是具体地、历史地对待当前这个问题。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的前期阶段，保护关税政策对于加速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有积极作用，帮助它在同封建主义斗争中巩固起来。但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捍卫保护关税制度只有在德国这样一些国家才是在历史上正确的，因为在德国，保护关税

加强了资产阶级在向封建残余进攻中的经济阵地。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已经达到的发展阶段上,保护关税制度阻碍资本的自由运动,阻碍国际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增长。所以,马克思强调指出保护关税制度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是较为进步的,是可取的。

同时,马克思指出,不能象自由贸易派那样把自由贸易说成是医治一切社会灾难的万应灵药,相反地,自由贸易加重社会灾难,加深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这种制度一方面加深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对抗,另一方面又促使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先决条件迅速成熟。“……我们赞成自由贸易,因为在实行自由贸易以后,政治经济学的全部规律及其最惊人的矛盾将在更大的范围内,在更广的区域里,在全世界的土地上发生作用;因为所有这些矛盾一旦拧在一起,互相冲突起来,就会引起一场斗争,而这场斗争的结局则将是无产阶级的解放。”^①

145

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不要期望从资产阶级的任何经济政策中得到拯救。对整个社会制度进行彻底的革命的改造,这就是工人阶级的口号。工人阶级不要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建立在当今强者的“仁慈”和“博爱”上,而要建立在自身的革命干劲上。“……社会改革永远也不会以强者的软弱为前提;它们应当是而且也将是弱者的强大所引起的。”^②

同海因岑的论战

为了捍卫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思想观点,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要同资产阶级的学理主义者论战,而且还要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95—296页。

② 同上书,第284页。

的代表人物论战。同德国民主主义者卡·海因岑的辩论占去了他们很多时间，卡·海因岑反映了一群德国激进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弗吕贝尔、司徒卢威、卢格等人）对共产主义的敌对态度。

《莱茵报》的撰稿人海因岑曾经是一个小官吏，1844年他由于写了《普鲁士的官僚制度》一书而触怒了当局，为了避免逮捕才逃离德国。1845年在布鲁塞尔，他同尽力帮助他摆脱自由立宪幻想的马克思、弗莱里格拉特和毕尔格尔斯进行了长时间的政治争论。不久他又迁移到瑞士，在那里他充满了个人主义的反抗精神，沉溺于看起来很革命、实际上相当庸俗的激进主义。他号召德国人立即举行起义，惩治他认为是万恶之源的君主，建立联邦共和国。同时，海因岑还在报刊上对共产主义者进行恶毒的诽谤。

1847年秋，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得不同海因岑展开论战了。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和卡尔·海因岑》一文中深刻地指出，共产主义是随着生活本身的要求而产生的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运动。他强调说，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的远远超出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范围，但是他们最近的目标是争取民主，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他们同民主主义者共同行动。但是绝不要以为共产主义者会向自己的同伴作思想让步，共产主义者有权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恩格斯在谈到海因岑的社会观点和政治观点时指出，这位共产主义的“批评家”天真地以为对德国的君主采取一次革命行动就能建立社会的正义。海因岑从共产主义者那里搬来某些带有过渡性质的社会要求，把它们当作任何解放运动的最终目的。经过他们的解释，它们变成改善世界的庸俗幻想。

恩格斯的文章使海因岑有了借口，他又在1847年10月21日的《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一篇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标题是《共产主义者的“一个代表”》。海因岑的文章变本加厉地就共产主义者的“不坚定”和“观点摇摆”进行平庸的道德说教。这一次是

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对海因岑作了回击，马克思的文章陆续刊登在1847年10月底至11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也象他的许多其他文章一样，在内容结构上是丰富多彩的。这既是一篇揭露政治庸俗习气和市侩道德的讽刺性文章，也是一篇深刻评论各种文学现象的文学史评论；既是一篇阐述历史唯物主义重要原理的社会学理论的论文，也是一个解释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和策略原则的党的文件。文章用富有表达力的文学形式叙述了广泛的内容，同时大量地使用了忒伦底乌斯、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十八世纪讽刺作家让·保尔（笔名李希特尔）的著作中的文学人物来作类比。

马克思把海因岑的文章同宗教改革时期被称作粗俗文学的文学形式作了对比，痛斥海因岑在论战中用辱骂和“道德愤怒”^①来代替论据这种手法。马克思讥讽地指出，海因岑是复活这种“平淡无味，废话连篇，大言不惭，象伏拉松一样夸夸其谈，攻击别人时狂妄粗暴，对别人的粗暴则歇斯底里地易动感情”^②的文学的功臣。马克思指出，海因岑求助于道德，这是庸人对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的反动，因为“道德高尚的庸人”认为革命的共产主义思想具有破坏性，是不道德的。他的庸人道德是符合他的庸俗社会学观点的。

马克思批判了这些观点，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系列原理。¹⁴⁷马克思驳斥了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广为流传的所谓政治权力是造成“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的万能力量这种肤浅的观点，揭穿了所有社会问题在推翻现存政权后一下子就能解决的幻想。与此相反，马克思揭示并具体地阐明了关于经济基础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8页。

② 同上书，第162页。

政治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的原理。

他写道,不是财产关系取决于政治权力,恰恰相反,政治权力的性质取决于历史上形成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和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阶级结构。因此,政治制度是不能凭愿望在随便什么时候消灭的。要实现这一点,一定要使经济和历史的先决条件成熟起来,正在形成的新的财产关系一定要同现存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另一方面,政治的上层建筑在社会生活中也绝不是消极的因素。政治权力掌握在上升阶级的手中就可以加速进步的发展,反之,掌握在没落阶级的手中,就会严重地阻碍进步。因此,如果不通过革命手段消灭旧的政治上层建筑,新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战胜旧的社会制度的。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必须炸毁社会的旧的政治外壳。

马克思以君主专制的历史命运为例,论证了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的辩证法。揭露专制制度的本质当时不仅是历史科学的任务,而且是迫切的政治问题。同专制制度的斗争已经在欧洲许多国家中被提上日程。君主专制(中世纪等级制瓦解和资产阶级开始上升时期的封建君主制)初期执行了整个说来是进步的中央集权的职能;但是,随着资产阶级关系的发展,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如果说君主专制从前保护过工商业,同时以此鼓励过资产阶级上升,并且还曾经把工商业看做使国家富强、使自己显赫的必要条件,那么现在君主专制到处都成了工商业(它们正在成为已经很强大的资产阶级手中日益可怕的武器)发展道路上的障碍。”^① 消灭专制制度和中世纪的其他残余,在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已成为迫切的要求。

要彻底完成这个任务,只有由群众采取十八世纪末革命恐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1页。

时期的那种坚决的革命行动，“象施法术一样把全部封建遗迹从法国地面上一扫而光”^①。同海因岑的徒有其表的大吹大擂的革命性相反，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指望人民起决定性作用的1789—1794年类型的革命。劳动者阶级不得不违背资产阶级的妥协政策来完成自己的革命任务，因为德国的资产者“总想不经过革命而用和平方式把**专制君主国改造成资产阶级君主国**”^②。这些论述中已经包含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领导权学说的核心。

马克思把资产阶级革命看成革命斗争中的一个中间阶段。他指出，以为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一切社会问题就迎刃而解的看法，是庸俗的空想。而海因岑的政治理想，即关于“具有社会制度的联邦共和国”^③的主张，也带有这种性质，他认为，这种共和国的典范是美利坚合众国，它被说成一个模范国家。

马克思揭露了北美国家和社会的剥削本质，打击了欧洲流传的所谓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国是社会和谐一致的国度的神话。马克思认为，美国和瑞士所实行的联邦制原则，对于当时非常需要集中的封建割据的德国来说是不适用的。不论是从无产阶级的阶级任务观点来看（在中央集权的国家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容易得多），还是从争取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观点来看，都不能采取联邦制原则。德国的联邦制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意味着部分地维持中世纪的分立状态。所以，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相反，马克思直接提出德国的要求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④。

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不仅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1页。

② 同上书，第186页。

③ 同上书，第187页。

④ 同上书，第189页。

149 命，因为这个革命是工人革命的前提”^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只有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日才能真正展开。摆在无产阶级面前的由早已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的现实生活所提出来的任务就是：“成为权力，而首先是革命的权力”^②。可见马克思在报刊发表的言论中阐述了他的学说的基本原理之一——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对社会进行社会改造的工具的思想。

为团结革命力量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错误教条和幻想的批判，是同建立无产阶级力量和民主力量反对欧洲反人民制度这个共同敌人的联盟的斗争结合起来的。马克思坚决反对工人组织中的任何宗派隔绝状态。他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当积极参加一般民主主义运动，同时保持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立场的阶级独立性和纯洁性。马克思想方设法既要建立一个个国家中的共产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联盟，也要建立无产阶级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国际联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国际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创建工作，该协会团结了无产阶级革命者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先进分子。1847年9月底，比利时民主主义者和民主主义流亡者就想创建这样一个协会。为此目的，9月27日举行了一次国际性的宴会。这时马克思不在布鲁塞尔，他为私事到荷兰去探望他的亲戚。在那次宴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国际性团体。由于恩格斯的努力，无产阶级分子有了加入新组织的宽广门径，恩格斯本人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6页。

^② 同上书，第171页。

被提名任副主席。但是，恩格斯即将去巴黎，他在给主持这次宴会的比利时律师律西安·若特兰的信中提议由马克思代替他作候选人，“他最有资格在这个委员会中代表德国民主派”^①。

1847年10月初，马克思从荷兰返回，全力投入创建新组织的准备工作。1847年11月7日，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终于在六十三个¹⁵⁰发起人的会议上成立了。协会的章程规定：定期召开会议，发表宣言和呼吁书，同比利时和国外其他城市的类似团体建立联系。在11月15日的会议上成立了领导机构——协会委员会。参加过1830年比利时革命的弗朗斯瓦·梅利奈将军当选为名誉主席，若特兰当选为主席，马克思和法国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法国共和运动的参加者雅克·阿贝尔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有波兰流亡者列列韦尔、德国共产主义者维尔特。

马克思在布鲁塞尔一直到最后（1848年3月初），始终积极影响民主协会的活动，竭力使协会成为团结欧洲民主革命力量的中心。由于马克思做了大量工作，协会同宪章派，同伦敦“民主派兄弟协会”，同法国、瑞士、荷兰民主主义者建立了广泛的国际联系。协会声援国外的革命事件，公开支持瑞士激进派同宗得崩德（七个叛乱州的联盟，1847年11月在国内发动内战）的斗争。在民主协会内部讨论了召开国际民主主义代表大会的问题。

马克思竭力使民主协会成为比利时革命民主运动的领导力量，而协会也不仅得到布鲁塞尔的民主派，而且得到其他城市民主派的支持。

在协会中，在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其他派别的代表即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共和派（其中包括若特兰）之间，也不是没有摩擦的。后者企图把协会的活动限制在比利时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怀疑无产阶级分子的共产主义观点，对马克思批判他们赞许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94页。

7
自由贸易学说表示不满。马克思同若特兰的意见分歧几乎引起了公开破裂。在1848年2月22日会议上的一次风波以后，马克思不得不声明辞去副主席的职务。但是，若特兰表示愿意和解并请求继续合作，马克思考虑到局势紧张也就同意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同所谓的法国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有很
151 大意义。这个党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它的首领是赖德律·罗兰和勃朗。它积极参加改革运动，主张民主共和国，要求普选权，要求实行有利于劳动人民群众的某些社会措施。

但是“改革派”（人们通常根据它的机关报的名称来称呼这个政治集团）的小资产阶级首领玩弄革命的词藻，在这种词藻掩盖下他们根本不想采取革命的行动。“改革派”的许多活动家对工人阶级的独立的革命运动十分害怕，对其他国家的民主派又表现出相当严重的民族主义的傲慢。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路易·勃朗的社会主义观点是不能接受的。1840年出版的《劳动组织》小册子中阐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勃朗在小册子中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竞争等等）的批评是恰当的，尽管是表面的；他建议在国家津贴的帮助下建立各行业的工人生产协会来解决社会问题。他说：“国家是贫民的银行家”，这样他就掩盖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他散布一些有害的幻想，说什么通过阶级合作和资产阶级国家的帮助就能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眼就看出了社会民主党及其首领的弱点。但是为了加强民主派的国际团结，他们认为可以同这个党的代表人物进行合作，因为尽管这个党弱点很多，但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法国群众的革命情绪。在建立这种关系方面，恩格斯起了主要作用。保存下来的勃朗给马克思的信（这封信没有日期，但肯定

是属于这个时期的)证明,马克思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有直接的联系。

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未能同他们取得全面的相互了解,彼此都明显感到在世界观上有差别。恩格斯打算把马克思在经济学家会议上未能发表的演说稿和关于《哲学的贫困》的书评刊登在《改革报》上,这个计划遇到了主要是勃朗的暗中的但也是很顽强的抵制。

1847年12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北极星报》和《德意志
152
志—布鲁塞尔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批驳了“改革派”首领们的那些共产主义者所不能接受的思想:法国在世界史上具有独特的世界主义作用;法国民主派在国际民主运动中应占有领导地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民主协会中的活动以及他们同“改革派”的关系,证明他们同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合作是有原则的,并没有作任何思想的让步,并没有放弃对同路人的幻想和错误的批评。恩格斯写道:“各国民主义者的团结并不排斥相互间的批评。没有这种批评就不可能达到团结。没有批评就不能互相了解,因而也就谈不到团结。”^①为了把无产阶级的和民主主义的力量团结成统一的阵营,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对一般民主运动的政策的原则。

民主协会在比利时的政治生活中和国际舞台上起了革命作用,这首先是由于协会的左翼即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派的努力。正是这一派被比利时警察认为是主要的危险。马克思随时都在受到监视。他一来到布鲁塞尔,警察局就已给他立了档案,在他的档案中塞进了许多新材料,包括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副本。比利时的反动统治当局准备对马克思及其战友——其他无产阶级革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23页。

家下毒手。

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共产主义者同盟必须通过批准章程和制定纲领把第一次代表大会所取得的成果巩固起来，这就需要召开另一次代表大会。伦敦中央委员会急于召开代表大会也是考虑到同盟内部的形势。在许多支部中，尤其是在德国和瑞士，宗派主义分子起劲地反对领导的路线。中央委员会在1847年10月18日给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通告信中指出，只有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才能纠正局势。在通告信上签名的沙佩尔、莫尔、鲍威尔坚决要求马克思亲自出席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这次代表大会很重要，因为他们知道，
153 这次代表大会将把制定科学共产主义原则和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策略纲领的障碍彻底铲除。他们俩都当选为代表：马克思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布鲁塞尔区部的代表，恩格斯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部的代表。

在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同盟各支部都讨论了恩格斯起草的、1847年夏上一次代表大会赞同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列举一些问题和简短的答复）。巴黎的各支部针对这个草案提出赫斯的“修正”草案，但是也不令人满意。恩格斯受巴黎的同盟盟员的委托，对自己的草案作了修订和补充，把它称为《共产主义原理》。他保持了原有的形式，但是更详尽和更完善地叙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重要的纲领性的和策略的原理。恩格斯异常深刻地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前提，拟定了革命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为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应当采取的措施。

但是恩格斯本人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份纲领的草稿。他很快就认识到，对纲领的内容要作全面的历史的论证和系统的叙述，采用问答的形式是不可能的。他在去伦敦的前几天写信给马克思说：“请你把《信条》考虑一下。我想，我们最好是抛弃那种教义问答形式，把这个东西叫做《共产主义宣言》。因为其中必须或多或少地叙述历史，所以现有的形式是完全不合适的。”^①

马克思完全赞同这个想法。他和恩格斯一样，也认为《共产主义原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初步方案，同时还认为，在最终制定纲领性文件时，必须把这方案改写成一篇战斗的党的宣言。

1847年11月27日，这两位朋友前往伦敦的途中，在比利时海岸城市奥斯坦德会面。在渡过拉芒什海峡以前，他们在“王冠”旅馆详细地讨论了代表大会需要解决的问题。

代表大会于1847年11月29日至12月8日举行，它在这段时期成了国际工人运动的代表们的论坛。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德国、¹⁵⁴法国、英国、瑞士和比利时的代表。参加代表大会工作的还有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宪章派哈尼和琼斯，波兰革命流亡者的活动家。沙佩尔当选为代表大会的主席，恩格斯当选为秘书。在代表大会的一些会议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争论中捍卫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

在代表大会上，充分显示了马克思的演说家的特殊才能，他的论据有令人信服的逻辑性和说服力。他的整个形象给每一个与会者留下强烈的印象，他智慧高超、知识渊博、意志坚定、热情奔放，但他不傲慢自负，也不装模做样，而这都是资产阶级政客，有时是一些社会主义活动家常有的表现。马克思对思想上的敌人绝不宽容，对顽固的糊涂虫和宗派主义者冷嘲热讽，而对献身工人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23页。

事业的革命者，对工人则始终朴实、热情和关心。

凡是在代表大会的会议上、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议上，在公开的和非公开的集会上见过马克思的许多工人，都认为他不仅是天才的、才学过人的学者，而首先是一位能够领导工人阶级应付一切艰难险阻的英明而坚强的领袖。工人运动的老战士、当时伦敦的一个裁缝帮工弗里德里希·列斯纳，一辈子也忘不了他同后来公认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导师的那次会见。“当我看到马克思的时候，我立刻就感到这位非常杰出的人物的伟大和巨大的优点。我开始深信，在这样的领袖的领导下，工人运动必然会取得胜利。”^①

马克思在工人集会上发表的那些演说，对列斯纳和其他听众有非常强烈的影响。“马克思是天才的人民领袖。他发表的演说简洁而有条理，逻辑性很强；他决不浪费笔墨，一字一句都有深刻的含义，都是整个论据中不可缺少的一环。”^②

马克思对代表大会的成果是满意的。在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问题的讨论中，新的无产阶级学说的原则取得了完全胜利。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委托以宣言的形式起草纲领。根据他们的建议，
155 决定同盟在对外联系中公开以共产党的身份表明立场。原来起草的章程，经过重大的修改得到代表大会的批准。章程第一条具有纲领性质：“同盟的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③ 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终于建立起来了。

在伦敦，马克思还完成了布鲁塞尔民主协会委托他（也是根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132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他的倡议)的另外一个使命,即同英国的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建立联系。1847年11月29日,他和恩格斯出席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为纪念1830年波兰起义在伦敦举行的国际大会。当大会宣读他的正式委托书时,会上发出了暴风雨般的掌声。

马克思在大会上的演说论述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一系列重要原则,论证了战斗的无产阶级同波兰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解放运动团结一致的思想。他揭露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者关于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各民族友爱的虚伪的论调,并强调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才是始终如一地反对民族压迫的战士。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是“一切被压迫民族获得解放的信号”^①。

恩格斯在演说中对马克思的思想做了补充。他说:“任何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别的民族时,不能成为自由的民族。”^②

马克思的英国之行,使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国际联系大大加强了。在伦敦马克思关于召开国际民主主义代表大会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他得到了宪章派领袖的支持,得到了伦敦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流亡者代表们的支持。在伦敦马克思认识了宪章运动最有才能的革命领导人之一厄内斯特·琼斯。

在伦敦逗留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他们利用该协会的会议讲解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策略的原理。1847年11月30日,马克思给协会会员做了关于无产阶级运动和共产主义宣传问题的报告。他还谈到了科学地批判宗教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对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在11月30日和12月7日为协会会员作了两次主要是关于经济问题的演讲。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288页。

② 同上书,第288页。

代表大会以后

马克思从伦敦返回布鲁塞尔可能是在1847年12月13日。几天以后恩格斯也到达了布鲁塞尔，月底又前往法国首都。但是他这次在巴黎逗留的时间很短。1848年1月底他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又重新来到布鲁塞尔。

1847年底和1848年的最初几个月在革命即将来临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工作非常紧张。马克思作为真正的人民领袖在这样的时刻焕发出无穷的活力。写作《共产党宣言》，在德意志工人协会上发表讲演，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公众集会上讲话，在报刊上同工人阶级的敌人论战，同朋友们通信和会见，总之在这段时间里马克思做的工作是很难一一列举的。他为《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的编辑工作也花费了不少的精力，特别是恩格斯这时不在布鲁塞尔，马克思只好一个人担负起它的出版工作。

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活动也耗费了马克思许多时间和精力：12月19日他向协会报告他的伦敦之行；12月26日他在协会的会议上支持关于接受被法国驱逐出境的巴枯宁和德国共产主义者、医生德斯特尔为会员的建议；1848年1月9日他在协会举行的大会上发表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月20日左右他同民主协会的一个代表团前往根特参加当地分会的建立；在协会的2月13日的会议上他参加起草给“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信；2月20日主持协会的会议，听取恩格斯介绍他自己被驱逐出法国的详细情况；2月22日他和恩格斯在欢迎波兰独立战士的会议上发表演说。

国际民主主义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哈尼在1847年12月18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宪章派全国协会执行委员会同

意参加代表大会^①。关于代表大会的地点和时间已达成协议：大 157
会预定在布鲁塞尔召开，时间安排在 1848 年 8 月 25 日即比利时
1830 年革命十八周年那一天。这个安排好的预定计划并没有实
现，因为 1848 年欧洲被卷入了革命事变的漩涡。

马克思 1848 年 1 月 9 日在布鲁塞尔民主协会会议上发表的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成了比利时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马克思
是用法语演说的。挤满整个大厅的听众都全神贯注地听他演讲。
演说结束后，通过了由协会出钱发表这篇演说的建议。小册子还
没有出版，《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于 1848 年 1 月 16 日就刊载了
演说内容的详细介绍。

马克思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以 1847 年 9 月经济学家
会议上他没能发表的那篇演说材料为基础的。不过，他又补充
了许多新的论点。列宁在归纳马克思所发挥的观点的实质时指
出：“从他的分析中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不外是资本发展的自
由”^②。

同时马克思在演说中又一次尖锐地批判了资产阶级对自由贸
易的辩护，他的批判变成了对整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揭露。马
克思指出，自由派所谓的自由是虚假的，资产阶级及其思想家严重
歪曲自由和平等的概念，把它变成暴力和剥削的掩饰，变成欺骗群
众的工具。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是马克思论述殖民政策的最早的著作
之一。马克思指出，殖民统治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掠夺本性、资产阶
级的剥削欲望造成的，这种欲望远远超出了国界，既引起世界市场
上的竞争，又造成一个国家靠牺牲别国而自己发财致富的贪心。
他还指出，殖民主义的依赖性对被奴役国家产生严重的后果，它们

① 参看《哈尼文集》英文版第 247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2 卷第 225 页。

的经济被迫依附于宗主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极其愤慨地指出，有人想用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思想来为殖民压迫辩护，把自由贸易描绘成建立民族友爱、使各民族实现统一的文明的手段。马克思158 思说：“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①

马克思 1848 年 2 月 22 日在布鲁塞尔隆重举行的克拉科夫起义两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说，在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者的范围内也得到很大的共鸣。这篇演说同其他演说者（恩格斯、列列韦尔）的演说，也都以小册子形式出版了。马克思在演说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在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必须依靠这个运动的革命民主的力量，因为这股力量能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支持农民反对封建压迫的行动结合起来。事实上，克拉科夫起义是前进了一大步，因为它“把民族问题和民主问题以及被压迫阶级的解放看作一回事”^②。马克思在他的演说中指出，波兰的复兴必将在革命民主的基础上实现。

撰写《共产党宣言》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共产党宣言》的创作上。他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闭幕后在伦敦共同撰写了好几天，后来又在布鲁塞尔直到恩格斯去巴黎。以后，马克思一个人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撰写。他竭力使这部著作成为内容极为丰富的著作，竭力用简明扼要的形式叙述新的革命学说的基本思想。另一个复杂任务就是要使著作具有完美的文学形式，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08 页。

② 同上书，第 294 页。

有真实的热情和革命的精神，又有犀利鲜明的文体。从《共产党宣言》的思想来说，它是两位作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创作，是他们创造性合作的成果，一部分正文是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为基础的，而用文学形式表达这些思想的则是马克思。这部著作说明马克思不仅是一位革命思想的天才，而且是一位语言大师。

《共产党宣言》的手稿只有一页保留下来了，这一页手稿清楚地表明，马克思对自己的要求是多么严格。他字斟句酌，删改不满意的语句，孜孜不倦地寻找需要的言词。从保存下来的第三章提纲的草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使《宣言》的结构不断完善，使每一个新方案越来越严整。1月下旬这项工作结束了，手稿寄往伦敦。 159

《共产党宣言》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员、德国流亡者布尔哈特在伦敦开设的一个小印刷所里刊印的。第一版问世正是法国二月革命的时候。1848年3月中旬，巴黎收到了一千册，以便在法国和德国传播。其余部分发到各个国家。

1848年4月至5月，还是这个印刷所又印行了一版。1848年3月至7月《宣言》在德国流亡者的报纸《德意志伦敦报》上连续刊载。

很快人们就想方设法用各种欧洲文字出版《宣言》。从1848年到1851年在法国就出现了三四种译本，1848年在巴黎，《宣言》被译成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但是这些译文都没有出版。

1848年4月，恩格斯在巴门准备把《共产党宣言》译成英文。但是，第一个英译本只是在两年之后，于1851年11月在宪章派的杂志《红色共和党人》（伦敦）上发表。杂志的编辑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提到了作者的名字。在以前所有的版本和许多后来的版本中，《宣言》都是不署名发表的。

1848年，“民主派兄弟协会”的一些丹麦会员出版了丹麦文

本。1848 年底在巴黎出版了波兰文本。在斯德哥尔摩出版了瑞典文本，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格特雷克销售，书名已改为《共产主义的呼声。共产党的声明》。但是，其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被改为“人民的声音——上帝的声音！”

随着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发展，阅读《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日益增多，出版了许多新版本。1890 年，恩格斯说，“《宣言》的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着 1848 年以来现代工人运动的历史”^①，是有充分根据的。翻译这部伟大著作的有：西班牙社会主义者霍赛·梅萨，匈牙利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奥·弗兰克尔，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格·瓦·普列汉诺夫，革命的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季米特利·布拉哥也夫，杰出的布尔什维克政论家瓦·瓦·沃罗夫斯基，匈牙利共产主义者的领袖贝拉·库恩。1893 年列宁在萨拉居住时期曾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他的译文手稿曾在萨马拉的革命小组里传阅。

《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对它的第一批读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列斯纳回忆说，读了《宣言》之后，“狂热和幻想有了一些克服……才明确了目的，提高了觉悟”^②。

在统治阶级看来，阅读《宣言》本身就是犯罪行为。多年来这部著作在许多国家里只能非法地传播。官方对《宣言》问世的反映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狠狠地鞭笞了剥削世界。

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 1848 年革命前的创作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43 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65 页。

动的高峰。这部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作品的历史意义是无法估量的。这是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给各国工人阶级指明了摆脱资本主义奴役、争取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道路。恩格斯在 1888 年公正地指出，《宣言》“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带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起到加利福尼亚止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①。列宁在谈到《共产党宣言》时写道：“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② 161

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完整而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给自己学说奠定了牢固的哲学基础，制定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给自己的经济理论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出发点。《共产党宣言》的全部内容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各个组成部分是不可分割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列宁在谈到《宣言》的内容时写道：“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担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③

《宣言》一开始就描写了这个文件诞生时的历史情况：资产阶级世界的各种势力对正在形成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恐惧和仇恨。“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公开地和勇敢地宣布自己革命学说的原则是驳斥对共产主义诽谤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6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91 页。

③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78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0 页。

最好的方法。

《共产党宣言》描绘了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日益加深和发展的阶级对抗。作者强调指出，代替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旦建立，随之而来的是生产力的空前发展，经济的进步，科学文化的高涨。但是，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又象从前的生产方式一样，不再适应发展着的生产力，开始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这种不相适应的标志就是震撼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经济危机。《宣言》把资产阶级社会生动地比作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资产阶级在同封建主义作斗争时是一个进步的阶级，现在它变成了反动阶级，成了社会进步道路上的障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极为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它对劳动人民残酷剥削，道德没有人性，金钱有无限权力，金钱把人和人的一切关系变成买卖的对象，把人的尊严、知识和技
162 能变成单纯的交换价值。资本主义制度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己主义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关系，把强者对弱者的剥削和奴役变成决定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原則。正象资产阶级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①。资产阶级统治迫使一批民族陷于殖民奴役，造成毁灭性的流血战争。

资产阶级使生产具有社会性，把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中在大企业里，开创了更高水平的社会分工，使各经济部门的联系更加紧密。但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人占有产品，同生产的社会性有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

可调和的矛盾。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本身所起的作用，在客观上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以及整个资本主义体系作了准备。

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强调指出，资本主义是不会自行崩溃的。肯定要有一个阶级来完成旧制度的掘墓人的作用。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已经创造了这个阶级。《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①。

任何一个腐朽的统治阶级都不会自愿退出历史舞台。所以只有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这个革命的结论是《宣言》的作者根据对阶级斗争在社会历史中的作用的深刻分析做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从原始社会解体以来，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的斗争始终是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资产阶级社会把两个主要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抗提到首要地位。其余的阶级和阶层——农民、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流氓无产者——都处于中间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 163 发展，农民和城市的中间阶层日益破产和走向没落。他们只有同工人阶级联合，同工人阶级结成同盟并在它的领导下才能促进进步，推动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全面论证了关于工人阶级这个历史上一切阶级中最革命的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的原理。当其他被压迫阶级在分化瓦解时，无产阶级集中在资本主义的企业里，日益壮大，由于它本身的状况，它作为整个雇佣劳动制度的可怕的死敌登上了舞台。它本身的贫困变成了革命的因素，使它成为彻底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战士。“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①同时，工人阶级同资本主义进行斗争并不只是为了自身的解放。它完成自己的解放使命是为了一切被压迫阶级，为了全体劳动人民，使他们永远摆脱一切压迫和剥削。

《宣言》指出了工人同资产阶级斗争的各个阶段：最初是自发起暴动和捣毁机器，后来革命的无产阶级认清了自己的目的，就把自己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有组织的反抗。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进行的多少有些隐蔽着的国内战争必然成为推翻资产阶级和建立无产阶级统治的公开的革命。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揭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规律时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②。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无产阶级国家手里，并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样才能过渡到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的社会。

这个思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政权（按其本质来说是民主的，它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依靠他们的支持）的思想——是《宣言》的全部内容的核心。的确，《宣言》中还没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术语。必须要有1848—1849年革命的经验才能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把革命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思想明确而完备地表达出来。但是，在《宣言》中，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国家的概念本身，不仅有明确的表述，而且还有科学的论证。

工人阶级是历史上唯一的一个绝不打算使自己的政权永世长存的阶级。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治统治只是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内要消灭剥削阶级，消灭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和保证新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

② 同上书，第272页。

没有阶级的社会的社会关系的最后胜利。

《宣言》的作者以天才的洞察力描绘了共产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同时指出，共产主义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而是在旧社会逐步改造为新社会的过程中建立的。《宣言》指出了无产阶级国家为准备这一改造所必须采取的一些措施。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这些措施有独立的意义，他们认为建立新社会的实践本身以及实践中的具体条件必将使这些措施有相应的修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当时只能对未来制度的特征作一般的描绘。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将永远消灭剥削，消灭一切形式的社会奴役和一个人靠另一个人养活的寄生生活。民族压迫将彻底消灭。殖民压迫和流血战争也将永远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共产主义同物质生产的真正繁荣，同生产力的蓬勃发展联系起来，生产力将被用来充分和全面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的需要。“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①。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对立的方法之一就是“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②。城乡之间的对立将逐步消灭。农村居民将摆脱“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③。妇女的不平等地位也将完全消失。

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贯穿于共产主义条件下的人的一切关系中的崇高人道主义原则。真正的个人自由、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协调一致将会确立起来。共产主义社会将是一个平等的劳动者的兄弟般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6页。

② 同上书，第273页。

③ 同上书，第255页。

自由发展的条件”^①。科学共产主义预言家的思想是真正人道主义的高度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劳动人民指出了一条真正的道路，来实现他们多少世纪以来想摆脱压迫，获得自由、平等、兄弟友爱、和平和幸福的愿望。

《共产党宣言》创作者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这部著作中奠定了关于无产阶级政党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领袖的学说的基础。他们强调指出，建立这样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下面的话表达了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作用。“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②

《宣言》制定了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理。在这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臆造一付包医百病的药方。他们指出，共产党人的行动，必须依据历史条件，不是遵循死板公式。但是在制定具体政策时，党也应当考虑到不管有什么地方特点同样必须遵守的普遍的策略原则。这就是善于使工人阶级的最近目标服从于它的最终目标，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任务和民族任务的统一，支持各种革命的和进步的派别，同时还要批判地对待自己同盟者的幻想。

166 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共产主义运动是国际性的这一原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宣言》的作者强调指出，各国无产阶级观点和行动的统一，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伟大口号清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3页。

② 同上书，第264页。

地表明了全世界工人的阶级利益和目标是一致的。

在《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辛辣地中斥了资产阶级的那些造谣诽谤者，他们硬说共产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妄图消灭自己劳动得来的个人财产，消灭个性自由，消灭祖国、家庭、教育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共产党人的责难，恰好首先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罪孽。资产阶级社会摧毁了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私有制，把工人变成纯粹是机器的附属品，使他们愚昧无知，把教育变成富人的特权，用婚姻神圣这种伪善词句来掩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

至于责备共产党人要取消祖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①这个原理着重表明了无产阶级对于企图在“保卫祖国”的虚伪借口下奴役和掠夺其他民族的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是敌视的。这个原理也说明了各国工人有共同的国际命运，他们要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压迫这些民族的“本国的”资产阶级。

上述原理只是反映了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祖国的态度的一个方面。《宣言》中还有另外一些言论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族虚无主义是格格不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工人阶级的斗争首先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每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推翻本国资产阶级的统治，把本国的一切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只有工人阶级取得胜利，劳动人民才能有真正的祖国。无产阶级没有任何民族局限性和民族优越感，它的被正确理解的民族利益是同它的国际主义利益相符合的，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完全一致的。

《共产党宣言》专门评述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各种非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167 级思想流派的特征。《宣言》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及其德国变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的阶级实质和反动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改良主义流派是非常有害和危险的,他们把这些流派归在资产阶级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中,也把小资产阶级社会学家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思想体系归入这种社会主义。

《宣言》对科学共产主义的先驱者、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给予应有的评价。这些思想家在自己的著作中为批判资本主义和启发工人阶级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是,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和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形成,空想社会主义变得日益脱离生活并失去了实际意义。那些教条式地坚持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的消极方面的门徒,堕落成为反动的宗派主义者。

《共产党宣言》最后以这样一段激动人心的话结束:

“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①

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工人运动的纲领的制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共产党宣言》出现以后,马克思主义就成了大体成熟的完整的革命的世界观。这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科学的决定性的一步,为革命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把理论变为革命斗争的实践开辟了新的前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6页。

第五章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

168

“在 1848—1849 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同盟也经受了考验。”^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

欧洲革命开始。马克思被 驱逐出布鲁塞尔

1848 年 2 月 22—24 日法国人民推翻了“银行大王”路易-菲力浦，并宣布共和国成立。3 月 13 日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爆发起义，3 月 18 日在普鲁士首都柏林爆发起义。在人民群众的冲击下梅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381 页。

169 旧的警察制度垮台了，奥皇被迫同意立宪。在普鲁士由资产阶级反对派领袖组成的内阁执政。维也纳和柏林人民的胜利也加强了德意志其他各邦的革命运动。

米兰人民经过3月18—22日的英勇战斗，赶跑了拉德茨基的奥军。威尼斯、皮蒙特和罗马的人民群众都起来斗争。席卷欧洲的革命洪流越来越逼近西方资产阶级贵族的英国和东方农奴制的俄国。

1848—1849年革命的历史原因，主要是正在发展的资本主义和还在欧洲大多数国家保存的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在法国，封建专制制度早在十八世纪末就被消灭了，但是资产阶级上层集团即金融贵族的政治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引起了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其他的国家里，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专制君主制，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摆脱异族的压制，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

1848年革命和自己的典范——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不同，在革命的进程中一个新的阶级，无产阶级登上了广阔的政治舞台。无产阶级在法国所起的革命作用是非常卓越的。法国工人手拿武器赢得了共和国，并要求宣布它为社会共和国。工人阶级在维也纳和柏林进行街垒战时同样起了决定性作用，尽管在那些地方，他们和自己的法国兄弟不同，没有立刻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和社会要求。

资本主义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的故乡英国具有特别发达的形式。这种矛盾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不同程度地显示出来。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关于革命战斗中力量对比所作的“资产者的背后到处都有无产阶级……”^①这一预测，在1848年革命一开始就得到了证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14—515页。

马克思听到关于法国二月革命及其在其他各国的反响的最初消息，感到无比的喜悦。马克思认为，革命时期是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决定性的时刻，是人民群众扫除人类向前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而突飞猛进的时刻。¹⁷⁰

法国的事件也很快影响到比利时，那里展开了要求宣布共和国的运动。但是，人民群众缺乏组织和领导。马克思竭力通过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布鲁塞尔民主协会来克服这些缺点。民主协会委员会在2月27日会议上决定：开展广泛的宣传和要求市政委员会建立一支除资产阶级市民自卫军外吸收工人和手工业者参加的武装力量。同时，民主协会自己着手武装工人。几个星期以前，马克思得到父亲的一笔遗产，他捐助大笔款项供购置武器。

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民主协会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各国民主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统一行动。2月28日，民主协会委员会发出致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的贺信，以及致《北极星报》编辑、“民主派兄弟协会”书记哈尼的信。在致哈尼的信中，表示希望宪章派很快就能使人民宪章成为国家的一种法律^①。

不管命运把马克思抛到什么地方，他始终没有脱离人民群众的斗争，并把自己的全部知识和精力献给这一斗争。因此，他不仅在比利时，而且在英国和法国都博得了许多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莫大尊敬。3月1日临时政府委员斐迪南·弗洛孔以法国人民的名义写信给马克思，信中有道：“暴政把您放逐，自由的法兰西向您……敞开着大门。”^②

这一邀请正合马克思的心愿，因为他急欲奔赴革命斗争的中心。由于比利时政府对民主主义者首先是外国人采取迫害手段，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46页。

马克思去巴黎的时间提前了。3月3日下午五时马克思接到命令，限他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比利时。

不久以前马克思收到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关于把它的职权转交给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的决议。准备奔赴大陆的沙佩尔、鲍威尔、莫尔和其他中央委员认为在已经到来的革命时期，
171 直接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同盟的真正领袖马克思手中。然而，由于马克思的被驱逐，威·沃尔弗和同盟的许多其他领导人被逮捕，布鲁塞尔的形势变得非常不利。因此，马克思动身前，在自己的住处召开了刚成立的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将中央委员会所在地迁到巴黎，并委托马克思在巴黎成立新的中央委员会。而后，宣布解散布鲁塞尔中央委员会^①。

五个人通过了决议，没来得及离开，警察就闯进了马克思的住宅，进行搜查，并借口马克思没有身分证而逮捕了他。他被捕时受到了粗暴的对待，后来被关进牢房。

焦急不安的马克思夫人燕妮，在比利时共产主义者日果的陪同下前往警察局打听丈夫的下落，而他们两人也被逮捕了。因为被捕者没有随身带着身分证，他们犯了游荡罪！由于这种罪名太荒谬了，法院侦查员第二天不得不释放他们。

对比利时警察当局专横行为的无数抗议，迫使它也把马克思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但是，当他被释放的时候，给他的二十四小时离境限期已满。马克思和他全家不得不立即离开布鲁塞尔，连最必需的东西也没有来得及带走。

马克思在给《改革报》的声明和恩格斯给《北极星报》编辑的信中揭露了“立宪的**模范国家**”^②的统治集团对马克思夫妇所采取的卑鄙手段。报刊上的抗议和议会中的质问迫使比利时政府宣布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67页。

· 把迫害马克思的有关官员撤职。

马克思在巴黎。反对“革命输出” 计划的斗争

马克思一到巴黎，就立刻着手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新的中央委员会。不久他就告诉还留在布鲁塞尔的恩格斯：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成立，马克思被选为主席，沙佩尔被选为书记，委员是瓦劳、沃尔弗、莫尔、鲍威尔和恩格斯。马克思催促自己的朋友速来巴黎^①。

当时在巴黎的外国人——德国人、波兰人、比利时人、爱尔兰人、西班牙人中间有一种极为流行的想法：组织荷枪实弹的义勇军，去解放自己的祖国，在那里升起共和国的旗帜。巴黎德意志民主协会领导人、¹⁷² 驰名诗人海尔维格和前《德意志—布鲁塞尔报》编辑伯恩施太德倡议组织德国义勇军攻打德国南部一个邦。

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在热心革命事业的德国流亡者中间进行的鼓动工作，最初成绩很大。甚至在马克思来到巴黎之前选入德意志民主协会委员会的维尔特，也赞同协会的活动。沙佩尔在3月6日德国民主主义者大会上也赞成组织荷枪实弹的义勇军。很快马克思就使他们以及其他许多无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相信，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倡议人之一伯恩施太德在3月16日被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

马克思和很快来到巴黎的恩格斯竭力向工人们说明“革命输出”这种冒险主义思想具有很大危害性。恩格斯后来回忆说：“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35页。

们十分坚决地反对了这种把革命当做儿戏的做法。正在德国发生骚动的时候侵入德国,以便从外面强行输入革命,那就等于破坏德国的革命,加强各邦政府,并且使义勇军徒手去受德国军队的摆布。”^①

为了对抗民主协会,根据马克思的倡议建立了公开的德国工人俱乐部。3月9日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四个巴黎支部联席会议上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德国工人俱乐部的章程草案。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在圣丹尼街皮卡尔咖啡馆多次召开的俱乐部会议上说服工人不要参加义勇军,而应当单个地返回祖国。马克思向自己的听众阐明了法国革命的性质和前景。在一次会议上,他做了很长的报告向工人说明:二月革命仅是运动的开始,法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公开斗争很快就会展开,欧洲革命的命运将多半取决于这一斗争的结局。马克思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德国工人,同时建议那些留在巴黎的人准备参加法国无产阶级面临的斗争。他还向工人介绍了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事件。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解释已在德意志各邦爆发的革命的性质和特点上面。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

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一项迫切的任务是制定共产党人的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提出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时作为指针的主要要求。

共产党人策略的基本理论原则已经在《共产党宣言》中确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9页。

了。现在需要根据法国二月革命、维也纳和柏林三月事件造成的新的情况，使这些原则具体化。三月革命后的最初一些日子就已表明，刚掌握政权的自由资产阶级由于害怕群众的特别是法国工人阶级的革命积极性，准备同反动势力实行怯懦妥协。只有民族的更加进步的民主力量才能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使德国这个政治上和经济上分散的国家实现民族统一，是德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在他们起草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提出了符合全体德国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民族纲领。《要求》开头第一条是：“全德国宣布为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共和国。”^①只有建立这样的共和国，才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结束阻碍德国统一的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争夺，清除数不清的王朝，消除地方局限性，才能形成德意志民族并为工人阶级在全民族范围内的团结一致建立广泛的基地。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争取德国统一的斗争同争取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他们提出了一系列对整个政治制度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给予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以普选权，发给国会议员薪金，武装全体人民，诉讼免费，彻底实行政教分离，实行普遍的免费的国民教育。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些一般民主要求并不是革命的最终目的，而是为了无产阶级以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创造有利条件而采取的政治措施。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争取民主的斗争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组成部分。

革命的最重要任务不仅是消灭贵族的政治统治，而且是消灭 174 它的经济基础——封建土地占有制。因此，在《要求》中提出了共产党人的土地纲领。其中有如下要求：无偿地废除徭役租、代役租、什一税和其他封建义务；王家的领地和其他封建地产、一切矿山、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页。

井等等归国家所有。还要求在国有化的土地上今后用最新的科学方法大规模地经营农业，以利于全社会。《要求》中不仅规定要彻底肃清封建主义的一切残余；而且规定要限制对农民——小私有者和小租佃者的资本主义剥削。农民的抵押地宣布为民主国家所有。这些抵押地的利息转而缴纳给国家；地租或租金也缴纳给国家。

德国革命中的任何一个政党，在土地问题上都没有提出过这样彻底的纲领。在这里，也象在《要求》的其他许多条文中一样，所拟定的措施不仅应该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最新原则”，而且也应该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在这些过渡措施中，除了封建地产、矿井、抵押地和地租国有化以外，还有：成立国家银行来代替所有的私人银行，铁路、轮船和邮政国有化，限制继承权，实行高额累进税，取消消费品税，建立国家工厂，国家保障所有工人都有工作，并且负责照管丧失劳动力的人。这一切都有助于以后向无产阶级革命，向实现它的主要目标——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过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目的是能够在不断革命以及它按着上升路线发展的过程中达到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及其最亲密的同盟者——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看作能够在革命斗争的进程中实现《要求》的社会力量。要实现所拟定的纲领需要多长的历史时期，这不仅取决于德国本身阶级力量的对比，而且取决于最发达国家——法国和英国的革命斗争的进程。

《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是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
175 第一个具体纲领。3月底《要求》以传单形式在巴黎发表，4月初又在德国许多报纸上刊载。中央委员会的这个最重要文件和《共产党宣言》一起，作为临别赠言发给回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同盟中央委员会将三百到四百名工人逐个地送往德国。4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回到自己的祖国，直接参加德国革命。

在革命德国活动的开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因兹逗留了几天。早在巴黎期间，马克思就把中央委员会委员美因兹人卡尔·瓦劳派到那里，要他进行一些初步尝试，把在德国成立的工人联合会的活动集中起来。

这个重要任务十分艰巨。在英国和法国工业上发达的都市是工人运动的天然中心，与此不同，在德国工人运动则分散在各个邦、省和一些工业地区。工人阶级的成员多半是手工业者。他们中的许多人希望完全恢复行会制度，把它看成是防止资本主义竞争的灵丹妙药。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竭力帮助德国工人用速成的方法即革命的方法经受英法工人已经历过的那些考验，竭力把德国无产阶级提高到能执行历史赋予他们的任务的水平。

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来到以前，4月5日，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主席瓦劳和书记克路斯以协会名义签署的呼吁书《告全体德国工人书》写好了^①。呼吁书号召在整个德国建立工人联合会，以维护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并建立这些联合会之间的联系，建议在召开代表会议最后确定联合会领导机构的驻地以前，暂定美因兹为联合会的中心。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因兹停留时，同瓦劳和克路斯一起讨论关于联合各个工人联合会的今后行动计划。

这样，革命一开始马克思就采取措施建立在某些方面与宪章派相类似的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治组织。按照马克思的想法，共产主义者同盟应是这个组织的核心即政治思想中心。

马克思认为他计划在科伦出版的革命刊物在团结德国无产阶级 176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75—576页。

级和提高它的阶级觉悟这一事业中应起头等重要的作用。

与官僚的和市会的普鲁士都市不同，科伦是先进的莱茵省的中心，这里已有了大工业并形成了无产阶级的骨干。这里《拿破仑法典》已经生效，与普鲁士立法相比，它给报刊以较大的活动余地。

4月11日马克思到科伦后，就向科伦市政委员会申请给予他公民权，因为在1845年他被迫放弃了普鲁士国籍。经市政委员会批准后，马克思携带全家住在塞西利街七号。

在筹备出版报纸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必须克服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巨大困难。作为《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的威望以及朋友和拥护者方面的支持，大大促使他们的办报工作取得成功。为了强调新报纸和原来报纸有继承性的联系，另一方面在出版条件和行动纲领上又存在着重大差别，决定把新报纸命名为《新莱茵报》。

筹备工作的重担，主要落在马克思肩上。由于他的组织才能和编辑经验，在很短时间内就保证了大型的革命日报的出版。物质上的困难很大。甚至激进的资产者也不愿意给报纸出钱，因为他们怀疑报纸是他们的未来敌人。结果，马克思只好用从订户中搜集的极少的股份资本，来着手出版报纸，而这些股份资本也只是一小部分是现款。

同时，马克思面临着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义不容辞的任务。早在他逗留巴黎期间，为了巩固同盟的地方支部，瓦劳、波尔恩、维尔特，以及先后到过美因兹、科布伦茨、科伦、汉诺威和柏林，临时居住在自己的故乡西里西亚的沃尔弗都被派往德国。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来到科伦后，新的特派员被派往德国各个城市。恩格斯到爱北斐特和巴门；沙佩尔去美因兹、黑森—拿骚和他的故乡维斯巴登；德朗克前往科布伦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美因兹、哈瑙和加塞尔。

中央委员会的使者的报告和各地的信件表明，工人还没有意

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还处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之下。¹⁷⁷ 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以后，反对共产主义的叫嚣更起劲了。所有这一切使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数不多的支部的活动非常困难。困难加深了还没来得及成为磐石般团结的组织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内的意见分歧。

反对哥特沙克和波尔恩的立场

科伦支部委员、著名医生安得列阿斯·哥特沙克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路线的公开敌人。哥特沙克领导他所组织的科伦工人联合会时，就开始自行其是。他的特点是迅速地和出人意料地改变政治观点。起初他声明自己拥护“民主君主政体”，但是很快又号召为建立“工人共和国”而斗争。在“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想影响下，他忽视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客观历史任务。

在建立“工人共和国”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哥特沙克也按照“真正的社会主义”的要求办事。他劝导工人说，他们能够通过合法道路达到自己的目的。哥特沙克不向工人解释劳动与资本间的矛盾，而向他们鼓吹全人类博爱的乌托邦思想。他企图给共产主义提供宗教和伦理的论据，抹杀它的阶级内容。

哥特沙克的混乱的理论观点，决定了他的错误的宗派主义的策略。这一点在选举全德国民议会和普鲁士国民议会时明显地表现出来。他以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两级的为口实，号召工人抵制选举。这种立场导致了无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孤立。

在哥特沙克那里，超革命的空话与非常温和的行为奇异地结合起来。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只表现为向政府和地方当局的充分

反映手工业者的行会情绪和偏见的大批请愿。

对哥特沙克在工人联合会中采取的最初的步骤，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已经不能不予以坚决斥责。哥特沙克不同意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声明退出同盟。在1848年5月11日科伦支部会议上，他对马克思提出的关于他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态度问题回答说，他认为同盟的章程是对他的人身自由的威胁。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来说，无产阶级组织的章程是不方便的。

178 马克思认为，同哥特沙克的决裂并不意味着应停止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联系。考虑到哥特沙克的影响是由当时工人运动发展水平造成的，马克思暂时也不公开反对他，因为这样做工人群众还不能理解。甚至当哥特沙克在他编辑的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报纸上诽谤性地指责《新莱茵报》时，马克思还以惊人的忍耐保持沉默。他认为，他的拥护者耐心而顽强的工作以及工人群众的自身经验能使他们相信，哥特沙克的形式上是“左”的，实质上是机会主义的策略是站不住脚的。实际生活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个政策是正确的。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另一个盟员斯蒂凡·波尔恩也采取了一种特殊的立场。5月11日，他从柏林写信给马克思，吹嘘自己是工人运动的领袖，是一种类似由许多行业和工厂代表组成的工人议会的主席。波尔恩写道，资产者相信他的“中介人的才能”，甚至普鲁士商业大臣本人都和他联系。信中反映了波尔恩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轻蔑态度。而这不是偶然的。波尔恩把工人和手工业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日常的经济需要上面，诱使他们放弃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他确信，与英国和法国不同，德国不存在明显划分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德国工厂主向工人“友好地”伸出“妥协之手”^①。

① 1848年4月13日《柏林阅报室》第89号附刊。

在1848年8—9月在柏林成立的“工人兄弟会”的文件中，也打上了波尔恩所固有的改良主义和妥协主义的烙印。诚然，波尔恩的许多文章和这一组织的文件也表现出马克思的影响。照恩格斯的话说，波尔恩“完全不是一个能统一各种矛盾意向、澄清混乱状况的人物。因此，他那个兄弟会所发表的正式文件往往混乱不堪，竟把《共产党宣言》的观点同行会习气和行会愿望、同路易·勃朗和蒲鲁东的观点的残屑碎片、同拥护保护关税政策的立场等等混杂在一起；一句话，这些人想讨好一切人”^①。

列宁后来在说明马克思和波尔恩之间意见分歧时写道：“1848年德国的工人运动中有两种趋向……一种是波尔恩（我们的经济派的亲属）的趋向，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趋向。”^②波尔恩的立场是德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一种早期表现。这一立场无论同哥特沙克的“左”的宗派主义观点如何不同，它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本质是一致的。二者都妨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妨碍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

但是，“工人兄弟会”组织很快团结了一百多个工人联合会，主要是东普鲁士、梅克伦堡和萨克森的工人联合会，这一事实本身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所以马克思也没有公开批判波尔恩。《新莱茵报》不加评论地刊登了波尔恩给柏林工人代表大会草拟的纲领，这个纲领具有浓厚的勃朗和蒲鲁东的思想影响。但是马克思很快就公开声明，刊登这个纲领并不意味着同意这个纲领。《新莱茵报》在一篇反对都灵自由派报纸《协和报》的编辑部文章中，抗议这家报纸“把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所起草而仅由我们转载的纲领当作我们自己的纲领”^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6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99—300页。

民主运动中的无产阶级一翼

美因兹工人教育协会的呼吁书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德国工人的落后和政治上的不成熟、运动的地方性质和分立主义，都阻碍无产阶级建立集中的政治组织。哥特沙克和波尔恩的各行其是也妨碍了这一点。共产主义者同盟人数少，组织上软弱，以及许多盟员思想上不够成熟也是这个组织没有能够建立的原因之一。恩格斯后来写道：“当时很容易预见到，在正在高涨的人民群众的运动面前，同盟是个极其软弱的工具。过去在国外侨居的同盟盟员，有四分之三回国后就改变了自己的住址。他们以前的支部因此大部分都解散了，他们和同盟的联系完全断绝……最后，各小邦，各省份，各城市的条件是非常不同的，以致同盟要发指示也只能发出极为一般的指示；而这种指示通过报刊来传播是要好得多的。”^①

180 对现状的全面估计，促使马克思和他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对共产主义者活动的形式和方法，以及他们的策略，作必要的修改。如果同盟继续作为秘密组织存在，势必陷于宗派状态，而这就等于拒绝积极参加革命。当时对人数少而又分散在德国各地的支部和同盟的一些个别成员的领导，只能限于发出一般的政治指示，因此，这种领导通过马克思编辑的报纸来进行就容易得多了。根据这一切情况，马克思和多数中央委员认为，秘密的同盟继续存在下去，是不适宜的。这并不是说要解散共产主义者同盟，而是说，由于同盟的活动条件发生了根本变化，它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也要改变。现在政治上由《新莱茵报》编辑部所领导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9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必须广泛利用合法的可能性，在群众中开展工作。工人联合会是他们的重要活动场所，而建立和巩固工人联合会，马克思仍然认为具有重大的意义。

各地产生的民主协会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另一个活动场所。协会是广泛的政治组织，成员除了小资产者还有工人。参加民主协会使共产主义者可以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影响还没有脱离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另一方面又可以影响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吸引他们参加争取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的共同阵线。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加入了1848年4月底在科伦成立的民主协会。马克思向在德国其他城市进行活动的自己的拥护者介绍了这样的策略。共产主义者加入民主组织的必要条件是，保持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和公开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

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参加民主协会的活动，在科伦资产阶级人士中间引起了恐惧。5月中旬，自由派报纸《科伦日报》对“包藏祸心的共产主义者”在协会代表大会上产生影响一事表示不满。

6月14—17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了全德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也积极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工作。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建立区域委员会的决定。¹⁸¹在科伦也采取措施建立区域中心，以联合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所有民主组织，其中也包括工人联合会。马克思成为科伦三个组织（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工人和业主联合会）的总委员会委员，总委员会执行民主主义者临时区域委员会的职能。同时马克思竭力保持工人联合会在组织上的独立性。

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加入民主协会和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制定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合作的形式，也决定了《新莱茵报》的政治纲领。恩格斯后来写道：“当我们着手在德国创办一种大型报纸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我们的旗帜。这个旗帜只能是民主派的旗

帜，但这个民主派到处，在各个具体场合，都强调了自己的特殊的无产阶级性质。”^①

《新莱茵报》总编辑

1848年5月31日晚《新莱茵报》创刊号出版了，副标题是“民主派机关报”，注明日期：1848年6月1日。报纸编辑委员会成员有：总编辑卡尔·马克思；编辑：亨利希·毕尔格尔斯、恩斯特·德朗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格奥尔格·维尔特、斐迪南·沃尔弗和威廉·沃尔弗。编辑部的组成本身决定了报纸的性质：不仅是民主派机关报，而且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是同盟的领导和组织中心。

编辑委员会的特点是观点一致，紧密合作，工作效率高和按每个编辑的个人才能所作的明确的分工。

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充分地显示了他作为编辑的出色才干和作为革命政论家的杰出才能。恩格斯写道：“首先是有赖于马克思的洞察力和坚定立场，这家日报成了革命年代德国最著名的报纸。”^② 马克思在担任报纸总的领导的同时，还撰写了许多未署名的社论。他的文章容易辨认，因为文笔出色，语句精练，对比尖锐，对革命敌人的揭露尖刻泼辣。他的同事撰写的经他修改的社论，也留下了他的文笔的痕迹。

182 为了竭力使报纸具有统一的整体性，马克思也细心地审阅和编辑其他文章和通讯。作为总编辑，他的工作量很大：除了每天按时出报外，还要出版号外以及传单，这些传单不仅在莱茵省内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8页。

② 同上书，第180页。

发，而且还散发到莱茵省以外很远的地方。马克思以编辑部的名义同该报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通讯员进行大量通信，同国外许多进步报刊保持联系。

报纸的财务问题耗费了马克思许多时间，而同当局、同司法机关、同反动派和自由派的报刊的诽谤和威胁作经常繁重的斗争所花费的精力更多。有时编辑部不得不回击突然闯入办公室的普鲁士军阀代表的蛮横无礼的狂妄行为。

恩格斯同马克思并肩工作，是总编辑的左右臂。这种合作非常紧密，这一点恩格斯本身就可作证：“一般说来，马克思在这一时期的文章，几乎不能同我的分开，因为我们彼此有计划地作了分工。”^①由于恩格斯的视野极广，笔头迅速而灵活，在报纸工作中是无人可代替的。马克思在谈到他的朋友的新闻业务的才能时兴奋地写道：“他是一部真正的百科全书，不管在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是头脑清醒还是喝醉酒，在任何时候他的工作能力都很强，写作和思索都极快……”^②马克思不在科伦的时候，恩格斯就担任代理总编辑。

威廉·沃尔弗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编辑委员会中的一位可靠的助手。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中特别明显地表现出他写政论文章的才能。沃尔弗非常熟悉农民、特别是他的西里西亚老乡的生活情况。

在《新莱茵报》上，格奥尔格·维尔特出色地运用了诗人的才能和异常丰富的幽默感。他的一组辛辣的小品文《著名的骑士施纳普汉斯基的生平事迹》，写得很成功。在这些小品文中，他以讽刺的、离奇可笑的形式刻画了反动的普鲁士容克的典型形象。

马克思把恩斯特·德朗克这个有经验的政论家吸收到报纸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04页。

183 来。德朗克写过许多文章和一部巨著《柏林》，由于写了这部著作，他被关进要塞。虽然他曾经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但没有辜负马克思的希望。

亨利希·毕尔格尔斯在报纸上的地位有一点特殊。他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但还远远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观点。毕尔格尔斯的第一篇文章就迫使马克思谢绝他为新闻工作效劳。但是他在名义上仍然是报纸的编辑之一，并作为报纸的代表在各种人民会议和群众集会上发表演说，而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848年10月，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委会。这位驰名的革命诗人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诗篇，许多是在总编辑的直接要求下写的，是弗莱里格拉特的文学遗产中一部分优秀的作品。

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唯独《新莱茵报》深刻而科学地分析了德国革命和整个欧洲革命的最重大事件。报纸具有惊人的预见力，它竭力帮助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弄清阶级斗争错综复杂的情况，了解革命的总目标和在革命的各个阶段出现的具体任务。它教育群众要勇敢，要有坚忍不拔的毅力，要准备采取坚决的行动。

《新莱茵报》把德国人民争取真正的民族利益的始终不渝的斗争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有机地结合起来。它坚决支持在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所有革命群众运动，揭露革命群众的敌人，戳穿他们的假朋友面具。

马克思关切地注视着欧洲革命的进程，他认为，在法国发生的事件及其对德国和整个欧洲的命运的影响具有决定性意义。他把阐述事件的意义和包含结论的部分整段地加进从巴黎（特别是斐迪南·沃尔弗和德朗克曾一度住在那里）寄来的通讯报道中，后来在自己的著作《法兰西阶级斗争》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这些结论又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新莱茵报》同法国、英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波兰和其他国家的民主主义者保持紧密联系，并在自己报纸各栏中热情捍卫他们的事业。《新莱茵报》有充分的理由称自己不仅是德国民主派的机关报，而且是欧洲民主派的机关报。

虽然《新莱茵报》打着民主派的旗帜，但它并不是德国某一个民主派组织的官方机关报。从头几号起它就开始批判德国民主派 184 的缺点和错误，在整个民主运动中始终不渝地捍卫无产阶级的观点。

报纸不仅是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向群众、首先向无产阶级讲话并提出“真正的斗争口号”的论坛，而且是组织的中心，是努力团结人民群众去实现这些口号的特殊的革命大本营。恩格斯在回忆出版《新莱茵报》时期时写道：“这是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时候从事办日报的工作是一种乐趣。你会亲眼看到每一个字的作用，看到文章怎样真正象榴弹一样地打击敌人，看到打出去的炮弹怎样爆炸。”^①

《新莱茵报》编辑部实际上代替了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指导同盟盟员的活动。马克思通过报纸努力保证共产主义者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教育他们在同一时间协同一致地对激动着德国的重大事件作出反应。报纸是在政治上教育和组织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最具有群众性的工具，它为未来的德国工人的群众性政党的形成准备了条件。

列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新莱茵报》是“革命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8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60页。

争取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进行到底的斗争

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坚决反对在德国流传的幻想：似乎经过三月革命，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思想赢得了胜利，反动势力已彻底被粉碎。《新莱茵报》揭露了这种松懈人民群众警惕性的有害的幻想，证明了三月的“不彻底的革命”^①还没有推翻任何一个王位，旧军队及其贵族军官团还继续存在，国家机器仍掌握在贪得无厌的和冷酷无情的官吏手里，地主仍旧占有自己的大地产并压迫农民。马克思写道：“巴士底狱还没有攻下来”^②，并使人民群众相信，德国革命的決定性的战斗还在前面。当6月14日，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了武装自己攻占了军械库时，《新莱茵报》把这次自发的革命发动评价为面临的第二次革命的第一道闪电。

《新莱茵报》把自己的斗争锋芒不仅指向公开反动的势力，而且指向戴假面具的、因而也更危险的敌人——德国大资产阶级。三月革命以后在普鲁士执政的自由派政府采取的第一批措施就已经证明，这个政府背叛了革命。由于害怕革命人民，这个政府勾结反动势力，扮演了“王朝挡箭牌”的可耻角色。正如列宁所着重指出的那样，马克思所作的如下结论是马克思的理论思想中的巨大成就：德国资产阶级同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从革命开始的头几天起，德国资产阶级就不能起进步的历史作用，而是革命道路上的绊脚石。《新莱茵报》在6月14日这一天的报纸上简单明了地阐述了在三月革命以后的德国阶级力量的对比：“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92页。

开始就反对革命的大资产阶级由于害怕人民，害怕工人和民主的资产阶级，同反动派订立了攻守同盟。”^①

自由派政府开始“同国王协商”制定宪法，它妄图使人民和国王都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以便使他们彼此仿佛势均力敌。《新莱茵报》预言，这样的“均势”可能时间极短，一旦反动派重新感到了稳固的基础，资产阶级自己就要可耻地被赶出政府。

马克思把革命人民在武装斗争中取得的主权同叛卖的“协商论”加以对比。他解释说，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劳动群众所面临的革命任务，只有用革命的方法才能完成。马克思写道：“严重的疾病是不能用玫瑰油来医治的。”^②

在革命的进程中，马克思适应革命的每项任务和每个阶段，发展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加以具体化。从任何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这一点出发，马克思提出了人民革命专政的口号。他号召人民群众建立一个真正革命186的政权，它能果敢地、坚决地清除全部中世纪的废物，消灭君主制度，消灭地主，保证胜利地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革命之后，任何临时性的国家机构都需要专政，并且需要强有力的专政。”^③马克思认为，人民的革命专政的根本任务之一是消灭旧的国家机器，即作为反动势力支柱的“旧制度的残余”。

在谈到马克思提出的革命专政的口号时，列宁写道，马克思指的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革命政权组织，这个政权应保证民主改革，而与此相适应，这个政权的任务是“抵御反革命势力，在事实上消除一切和人民专制相抵触的东西”^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3页。

② 同上书，第36页。

③ 同上书，第475页。

④ 《列宁全集》第9卷第118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教育人民群众准备新的革命冲击时，竭力消除伴随三月革命以后产生的代议机构活动而来的幻想。报纸正确地批判了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国民议会，这个议会本应成为德国新的中央政权，并保证国家的真正统一。“制宪国民议会首先应该是具有革命积极性的**积极的**议会。而法兰克福议会却象小学生做作业似的在议会制度上兜圈子，对各邦政府的行动却听之任之。就算这个学术会议在充分讨论之后能够制定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吧。但是，如果德国各邦政府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那末，最好的议事日程和最好的宪法又有什么用呢？”^①

对法兰克福议会的这一批判，引起了许多德国庸人、其中包括《新莱茵报》一些股东的愤慨，他们立即拒绝向报纸提供财政上的资助。但是，实际生活完全证实了报纸对“法兰克福清谈馆”^②所作的有远见的评价。

《新莱茵报》编辑部密切注意普鲁士国民议会中的辩论，普鲁士国民议会不能借口讨论“全德问题”而回避现实生活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它的根本缺点就在于，它把“同国王协商”制定普鲁士宪法的原则，作为自己活动的基础。《新莱茵报》写道：“站在‘革命的立场上’的议会不是进行妥协，而是要发号施令。”^③ 187 报纸向议员指出了不愧为革命人民的代表的唯一途径：向人民群众求得支持，通过他们向议会施加压力。“民主的人民群众的这种权利——出席制宪议会，从而在精神上影响制宪议会的立场——是人民旧时的革命权利，这种权利自从英法革命以来，就被运用于一切暴风雨的时代。历史几乎把这些议会的所有坚决的措施都归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1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76页。

于这个权利。”^①

但是，柏林议会不是向人民呼吁，不是在自己的活动中依靠人民，而是宁愿沉溺于议会主义的死水中。“议会迷”^②这种重病不仅感染了右派和中央的代表，而且也感染了坐在左派席位上的那些人。《新莱茵报》对左派批评道：“他们只敢发出嗤嗤声！”^③报纸预言，左派企图通过纯议会途径得到根本解决的希望会导致多么悲惨的结局。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柏林国民议会的怯懦的妥协政策不能不影响到革命的基本问题的解决。

虽然德国资产阶级敏锐地感觉到需要消除国家的分散状态，但是它在上台以后力图通过同反动派的勾结来解决这个问题。德国资产阶级打算由上而下地统一德国：以哈布斯堡帝国或者帝国中间声望更大的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君主政体为中心来实现统一。

至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分成两派：北德派和南德派，前者把希望寄托在“民主的”普鲁士君主身上，后者力图仿照美国和瑞士的样子把德国建成一个联邦共和国。在德国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这实际上是建立一个由许多君主立宪国、小诸侯国和小共和国组成的极为混杂的联邦。

与此相反，《新莱茵报》根据《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力求通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建立统一的德意志共和国。因此报纸始终不渝地和坚决地维护德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即它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民族的前途。这样做也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统一的民主德国的条件下能很快结束工人运动的分散状态，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05页。

更广泛的可能去组织并从政治上教育工人阶级，培养他们为争取社会主义而斗争。

马克思把统一德国的任务不仅同德国的政治制度的完全民主化，而且同深刻的社会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新莱茵报》为消灭农村的封建主义残余而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在1848年革命前，只有最富裕的农民能享受1807—1811年土地改革的果实，因为这次土地改革只是给农民在极端苛刻的条件下赎回封建义务的权利。农奴制的地主经济只是缓慢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这就是列宁所称作的在农村中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鲁士式的道路”^①。随着革命的爆发，农民掀起了自发的反封建的斗争。许多地方焚毁了地主城堡。农民拒绝负担任何义务。《新莱茵报》写道：“政府只应当把实际上已经由人民的意志实现的废除一切封建义务的事情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②自由资产阶级却不是这样，它害怕保不住自己的资产阶级所有制，挺身维护封建所有制。根据普鲁士农业大臣吉尔克颁布的法律草案，无偿废除的只是那些最微不足道的义务，而那些最繁重的义务则必须赎买，或用价值相等的耕地进行交换。

马克思认为，吉尔克的法律草案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1848年的德国革命只不过是1789年法国革命的讽刺。”^③他写道：“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

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联，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1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24页。

③ 同上书，第331页。

对贵族。

保存封建权利，在(虚幻的)赎买的幌子下批准这些权利，——这就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结果。真是雷声大雨点小。”^①

189

马克思为争取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为争取完全无偿地废除封建义务，为争取使农民变成自由的自己土地的所有者而斗争。与坚持赎买封建义务的地主和自由资产阶级相反，《新莱茵报》在威廉·沃尔弗《西里西亚的十亿》(1849年春)著名的一组文章中，要求把“近三十年来强盗骑士老爷们从农民那里窃去的钱”^②归还给农民。

除了把土地改革开始时地主从农民那里抢去的所有东西归还农民以外，报纸还要求把大地产分成小块并分给无地和缺地的农民。这样，《新莱茵报》就照顾到农民的各广大阶层的利益，补充了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包含的土地纲领。

在《新莱茵报》关于土地问题的一些文章中，鲜明地反映出马克思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中制定的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无产阶级同整个农民阶级结成联盟的策略。

支持被压迫人民的斗争。 《新莱茵报》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

马克思也坚决主张积极支持当时广泛开展的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出发点是具体地历史地分析某一民族运动，确定它在革命和反革命这两大阵营之间进行的搏斗中所占的地位。根据这个决定性的标准，《新莱茵报》编辑部支持进步的民族解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3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80页。

运动,这些运动扩大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阵线,加强并巩固了这一革命的力量。

意大利民主派机关报《黎明报》出版前不久,马克思在给该报编辑的一封信中表述了《新莱茵报》的国际主义政策的原则:“我们要捍卫意大利争取独立的事业,要和奥地利在意大利以及在德国和波兰的专制统治作誓死的斗争。”^①恩格斯在1848年7月初撰写的社论《德国的对外政策》中着重指出了德国革命的命运和受奴役的民族解放运动之间的有机联系和相互依赖关系:“德国将来自由的程度要看它给予毗邻民族的自由的多少而定。”^②

《新莱茵报》每天揭露在民族问题上也步旧政权后尘的资产阶级的政策。正如在对待农民运动问题上一样,资产阶级政府在民族问题上也使用两种手法——虚伪的诺言和血腥的镇压。这两种手法都被用来反对由于在十八世纪末瓜分波兰而落入普鲁士之手的波兹南的起义的波兰人。报纸对这种罪行发出愤怒的呼声,呼吁德国人民和波兰人民这两种力量结束对波兰的压迫,并保证波兰人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新莱茵报》经常强调指出,恢复波兰不仅对于波兰人民,而且对于德国人民,对于欧洲革命的进程和结局,都具有重大意义。德国和欧洲的反动势力是建筑在通过瓜分波兰而缔结的俄奥普联盟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兰人民不仅是反对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斗争的可靠同盟者,而且是反对欧洲革命的主要敌人——俄国沙皇制度的斗争的可靠同盟者。列宁写道:这个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唯一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和无产阶级的观点。只要俄国和大多数斯拉夫国家的人民群众还在沉眠不醒,只要这些国家还没有什么独立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波兰贵族的解放运动,不但从全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8页。

② 同上书,第178页。

从全斯拉夫的民主运动的观点,就是从全欧民主运动的观点看来,都有头等重大的意义”^①。

《新莱茵报》对于又一个斯拉夫人民的觉醒,即对 1848 年 6 月中旬在布拉格爆发的捷克人民的起义深表同情。报纸着重指出这次起义的民主性质,指出这次起义的目标不仅反对奥地利的压迫,而且也反对捷克的封建主。当奥地利的军阀血洗布拉格的时候,报纸愤怒地痛斥了对待被压迫人民的这种可耻政策,并且预言在 191 布拉格进行血腥镇压会把捷克人推到沙皇俄国方面去的危险的结局^②。

事实上,布拉格起义的失败给捷克人的民主运动带来最沉重的打击。攫取了捷克民族运动领导权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德国革命。因此,这次运动客观上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反动派,以及准备向西方进行反革命讨伐的俄国沙皇制度处于一个营垒之中。

早在 6 月初,《新莱茵报》就提出警告:俄国沙皇把军队集结在西方边境,打算去帮助“友好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③。当时在俄国国内没有革命的群众运动,所以沙皇制度的这些反革命计划只能由外部,即由欧洲革命人民的共同努力来粉碎。因此,《新莱茵报》号召欧洲民主派参加反对俄国沙皇制度的革命战争。马克思希望这种战争会在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引起一次新的高潮。后来列宁指出:这个由马克思以整个进步的民主派的名义所宣布的策略,符合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符合完成资产阶级民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544 页。列宁接着指出:到二十世纪,在俄国和其他斯拉夫国家都掀起了独立的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而贵族的波兰已经消失而让位给资本主义的波兰了,这时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在这种条件下,波兰不能不失去其特殊的革命意义。”(同上书,第 545 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96 页。

③ 同上书,第 50 页。

主改革时代的性质。“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的战争相对立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这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①

巴黎六月起义

马克思早在巴黎的时候就预言，刚刚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的内部矛盾将不可避免地加深，而且这将导致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决战。事件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个预言。1848年6月23—26日，巴黎成了无产阶级群众强大起义的场所，他们进行武装斗争反对反革命资产阶级侵害二月革命的成果，损害工人的社会利益。起义者的口号是建立民主的和社会的共和国。

《新莱茵报》编辑部以兴奋的心情注视来自巴黎的每一个消息。恩格斯在根据事件的进程所写的一组文章中阐述了这次起义192 的性质，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军事行动的进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作为一种艺术的起义的学说的基础。

马克思立即评价了六月起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第一次国内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马克思为起义写了一篇充满力量和革命激情的令人惊异的文章《六月革命》。6月28日写的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巴黎工人被敌人的优势力量镇压下去了，但是并没有向他们投降。工人被击溃了，但真正被打败的是他们的敌人。”^② 马克思证明，为镇压巴黎工人的起义，敌人花了很大的代价：二月革命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幻想破产了，法兰西民族分裂为两个民族，即有产者民族和工人民族。

^① 《列宁全集》第22卷第3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3页。

马克思以简炼的语句描述了法国革命从2月到6月所走过的道路，揭示了导致巴黎无产阶级起义的法国革命的发展的规律性。他指出，法国资产阶级以它的全部政策推动工人举行起义。而正当陷于绝望的工人行动起来的时候，资产阶级则用鲜血洗涤了巴黎的街道。

针对那股对起义的巴黎工人所掀起的诽谤和憎恨的浪潮，马克思发出了充满激情的声音来维护他们。“给这些脸色严峻阴沉的人戴上桂冠，是一种特权，是民主报刊的特权。”^①马克思用这样充满热情的语言，用这样的颂词结束了他纪念六月起义的战士们和他们不朽事业的文章。

无产阶级的革命机关报

《新莱茵报》的无产阶级性质，不仅体现在它对六月起义的态度上。报纸在德国提出了联合一切民主力量的任务的同时，又坚持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特殊立场。

在共产主义者政治纲领里提出的要求中间，——在革命时期这一纲领性文件多次重印过^②——，报纸编辑部把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任务有关的那些要求提到了首位。根据对情况的冷静估计，报纸暂且没有提出过渡性质的要求，因为这些要求原定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其他欧洲国家的长期革命过程中来实现的。¹⁹³马克思认为，使这些要求超出宣传范围和变为行动口号的客观条件还不成熟。

但是，《新莱茵报》在把注意力集中于革命的最近目标的同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57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609页。

就已经在这个阶段开始为以后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组织无产阶级的政治大军了。

对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重大事件作阶级分析，在无产阶级的政治教育方面和在无产阶级觉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方面一定能起极其重要的作用。

报纸登载的论述法国革命进程的文章和通讯，在这方面具有巨大的意义。和法国小资产阶级报纸《改革报》不同，马克思证明了，二月革命以后法国的阶级搏斗不是某种错误和偶然性的结果，而是阶级对立的合乎规律的产物，这种阶级对立“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是建立在迄今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和由这种方式所决定的交换关系上的”^①。他着重指出，即使被《改革报》错误地看作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差别的主要根源的思想差别，也是从某一阶级在社会中地位不同产生的，是从社会关系产生的。“而这种关系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是从敌对阶级的物质的、经济的生活条件中产生的。”^②这样，马克思根据法国革命的经验引导读者唯物主义地了解阶级斗争及其在思想领域的反映。

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给马克思为宣传他的学说提供了最珍贵的具体的历史材料。他认为，在德国工人中间普及无产阶级的有组织派别——宪章派的革命斗争，首先阐明以哈尼和琼斯为首的革命一翼的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英国无产阶级比较丰富的经验，马克思力图使德国工人相信建立自己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

根据德国和其他比较进步国家的以往的教训和活生生的现实，马克思向工人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他所研究的政治经济学、
191 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的学说的一些极其重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33页。

② 同上书，第534页。

的原理。马克思就这样引导工人去掌握未来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

反对反革命的进攻。马克思在科伦 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的活动

整个欧洲革命进程中的转折点——巴黎六月起义失败以后，反革命到处转入进攻。阶级力量的对比在德国也变得有利于反革命了。在三月革命的日子里被迫退却的反动集团，现在力图摆脱暂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恢复三月革命前的秩序。早在巴黎六月事件的前夜，普鲁士反动派在这方面就采取了第一步措施。康普豪森的自由政府辞职，《新莱茵报》对辞职的政治意义作了如下描述：“康普豪森内阁曾经给反革命穿上他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服装。现在反革命感到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扔掉这副累赘的假面具。”^①

奥尔斯瓦特的自由派贵族政府取代了康普豪森政府。但是，在这个政府中，前内阁成员莱茵的大资本家汉泽曼仍起显著的作用。新政府吹嘘自己是“办事内阁”。为了恢复“法律秩序”^②的巩固性，它一就职便立即采取一系列警察手段来反对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

“办事内阁”蓄意把主要打击目标对准莱茵省的中心科伦。7月3日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哥特沙克和安内克被捕。这件事在工人中间激起了极大的愤慨。《新莱茵报》编辑部预感到政府的挑衅计划，急忙警告工人不要在重兵把守的第一流的普鲁士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12页。

② 同上书，第182页。

塞面前采取过早的孤独的行动。由于马克思沉着冷静，当局挑动科伦工人举行过早的起义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

马克思立即估计到科伦事件的严重性，并把它同普鲁士反革命集团的整个阴谋联系起来。他在7月5日发表的《逮捕》一文中说：“总之，**办事内阁**所办的事，中间派左翼内阁所办的事就是如此，它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旧普鲁士的内阁过渡的内阁。只要泽曼先生一扮演完过渡的角色，他就会被解职。”^①他在这篇文章中预言，可悲的命运也等待着柏林的左派，他们不是呼吁人民回击政府的反革命行动，而是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自己的能说善辩上，靠预先体会将来议会的胜利过活。“左派总有一天会相信，当它在议会里获得胜利的时候，它在实际上却遭到了失败。”^②

《逮捕》一文发表以后，由于文章内容似乎侮辱了最高检察官茨魏费尔和执行逮捕的宪兵，《新莱茵报》遭到司法追究。所以“办事内阁”把消灭马克思编辑的报纸列入镇压行动的计划。7月6日，法院侦查员传讯了总编辑马克思和发行负责人海尔曼·科尔夫。传讯后，侦察员和检察官黑克尔一起搜查了编辑部，目的是想找到文章的手稿并确定文章的匿名作者的名字。尔后又传讯了许多证人：印刷所老板克劳特和排字工人，报纸编辑恩格斯和德朗克，最后，恩格斯作为被告，而不是证人再次被传讯。虽然法院的官吏们工作非常努力，但审讯进展缓慢。当时还采取了一个“行动”，矛头是直接针对马克思的。

尽管科伦市政委员会决定给予马克思公民权，但这个决定必须经王国区行政机关批准，而后者又迟迟不做答复。现在，差不多过了四个月，马克思接到通知：王国区行政机关认为不能给予他这种权利，因此，他今后仍然应当算作外国人。对此马克思向内务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192页。

② 同上书，第193页。

臣屈韦特尔提出抗议，并直接了当地指出了拒绝批准的政治原因。他写道：“这种心怀叵测的借口只有在旧日的警察国家里才会被采用！但绝不该在普鲁士被采用，因为这里已进行过革命，并且建立了责任政府。”^①

科伦当局拒绝给予马克思公民权，引起了科伦的工人和民主主义者的抗议。民主协会派代表团到市政当局要求废除对马克思采取的警察措施。然而，内务大臣于9月12日批准了区行政机关¹⁹⁶的决定。虽然抗议运动使反动派的阴谋没有马上得逞，但是被驱逐出普鲁士的危险，就象达摩克利斯的剑一样，悬挂在马克思的头上。

在这种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力图不惜任何代价把大型日报这一影响群众的有力武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贡献给报纸，同时同自己的朋友和拥护者一起直接参加科伦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活动。他努力把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的经验变成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工人组织和民主组织的财富。

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以自己在科伦社会组织中的活动，日益博得群众的尊敬和信任。哥特沙克和安内克被捕以后，在7月6日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马克思的朋友约瑟夫·莫尔当选为委员会主席。他同刚从伦敦来的沙佩尔一起，现在在委员会里代表工人联合会。这个委员会，上面已经说过，包括科伦的三个民主组织，并执行民主主义者临时区域委员会的职能。

现在，马克思给予经常帮助的工人联合会的新领导所注意的中心，是从思想上和政治上教育工人的问题。讨论是进行这种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在一次讨论中，莫尔和沙佩尔向工人解释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53—454页。

祸害不是象许多工人和手工业者认为的那样,产生于机器,而是产生于现存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的拥护者利用这种生动的形式向工人们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基本思想。在讨论关于现代社会的劳动组织的过程中,实际上论证和宣传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的各点。讨论结束时,恩格斯在9月11日的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社会问题的报告。

科伦工人联合会在思想和政治方面进行了改革,同时在组织机构方面也作了一些改变:放弃以前的狭隘的行会原则,缴纳明确规定的会费。科伦工人联合会成为马克思和他的拥护者的日益可靠的支柱。

197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积极参加民主协会的工作。马克思作为民主主义者临时区域委员会委员,在协会的领导工作中起了显著的作用,并在什托尔维尔卡大厅举行的会议上发表演说。1848年夏天,在协会内他和从美国来科伦访问的魏特林之间发生了争论。魏特林在7月21日协会会议的发言中,吹嘘自己是“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拥护建立一个由少数人(首先指的是他自己)组成的独裁的临时政府。8月4日马克思批判了魏特林。根据极不完整的记载,马克思证明,魏特林企图把政治利益同社会利益分开是毫无根据的,因为“政治利益同社会利益彼此互相交织在一起”。马克思指出,魏特林关于专政的宗派主义观点是“脱离实际的”,而他的个人独裁政权的思想根本是荒谬的。针对魏特林否认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马克思提出了建立一个由民主运动的各个派别的代表组成的革命政府的任务^①。

马克思及其拥护者是民主协会就重大政治问题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和公函的倡导者。这些公函有几千人的签名,并寄给了柏林

^① 《莱茵守卫者》第2卷;1848年8月23日第1号。

国民议会和法兰克福国民议会。

8月13日和14日在科伦召开的第一届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民主主义者区域代表大会表明，马克思在革命民主团体内享有多么大的威望和影响。当特利尔代表席利在会上谈到关于特利尔市民自卫团的共和主义思想，大会主席宣布卡尔·马克思也是特利尔人时，与会者向这位《新莱茵报》总编辑，发出了欢呼声。伯恩代表、大学生卡·叔尔茨后来写道：在会上他“亲眼看到了当时最杰出的人物，包括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卡尔·马克思。那时他才三十岁，但他已经是公认的社会主义派的领袖了。他个子不高，体格结实，前额宽大，黑头发，大胡子，眼睛又黑又亮。他很引人注目。人们谈到他的专长时，说他是一位杰出的学者……马克思的言谈切实而有内容，清晰而合乎逻辑……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他说到‘资产者’这个字时的尖刻讽刺的声调”^①。

代表大会决定，把曾在科伦起过作用的临时区域委员会变成 198
常设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由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任主席，成员除马克思外，还有莫尔和沙佩尔。

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实际革命工作，促使在科伦建立了一个与德国其他城市相比是最巩固、政治上最成熟的民主主义者组织。

去柏林和维也纳旅行

民主主义者区域代表大会召开不久，8月23日马克思起程去柏林和维也纳旅行。这次旅行是为了加强同德意志联邦两个最大的邦首都的民主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联系，同时也是为《新莱茵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5页。

报》筹集经费，因为该报发表了关于巴黎六月起义的文章以后，剩下的股东宣布同《新莱茵报》脱离关系。

在柏林，马克思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一些左派议员，首先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斯特尔举行了会谈。在那里，马克思也会见了民主运动的其他活动家，其中包括巴枯宁，同他恢复了早在巴黎建立的友好关系。

马克思离开柏林前往维也纳。当时维也纳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由于布拉格起义和巴黎起义的失败，由于8月6日拉德茨基军队向米兰的进军，奥地利反革命受到了鼓舞，转入了进攻。它通过降低工资和取消失业工人补助金的办法，挑动工人起来骚动，造成了8月23日资产阶级国民近卫军同示威工人的流血冲突。

马克思到维也纳以后，同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领袖建立了联系。《新莱茵报》编辑的名字在那里是广为人知的。人们评价该报对政治形势具有卓越的见解。

8月28日，在民主联合会上马克思在讨论关于最近发生的维也纳事件的问题时发了言。在辩论过程中，在他和来到维也纳的民主派柏林中央委员会委员尤利乌斯·弗吕贝尔之间出现了重大的意见分歧。后者支持派遣代表团去晋见皇上，请求撤换8月23日事件的直接肇事者、公共工程大臣恩斯特·施瓦尔策的提议。马克思反对这个提议，并且气愤地说：柏林的自称民主主义者的那些“理论家们”在实践中力图与各邦君主“妥协”。正如维也纳民主派报纸《激进报》所报道的：“他的发言非常俏皮、尖锐而有教益。”

199 马克思强调指出：在维也纳也象在巴黎一样，“问题的实质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87页。

8月30日马克思在第一届维也纳工人联合会会议上发表演说。他向联合会会员致敬，并且说，他能够在维也纳工人代表面前发表演说是他的光荣，就象他以前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的工人协会发表演说一样。演说的题目是欧洲的社会关系和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他谈到德国工人流亡者参加了巴黎六月起义，他们同样遭受了法国兄弟痛苦的、然而也是光荣的命运。他说：德国工人能够以自己同胞的行为而感到骄傲。他也谈到了英国宪章派最近的活动和欧洲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他还提到比利时的形势。9月2日他向维也纳工人作了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报告。

由于马克思对奥地利这个“各族人民的监狱”的各民族相互关系也抱有浓厚的兴趣，他在维也纳会晤了奥地利国民议会中德意志波希米亚党团的领袖鲍洛施。同马克思会晤时鲍洛施诉说了所谓捷克人对波希米亚的德意志人的强烈仇恨。但是，马克思问他这种纠纷是否蔓延到工人中了，他回答说：“工人一加入运动，这种现象就告终，就不分什么捷克人或德意志人，大家就都在一起了。”^①

柏林和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政治形势的尖锐化，迫使马克思赶紧返回科伦。途中马克思在德勒斯顿和柏林停留。在普鲁士首都他旁听了国民议会的一次会议，又同柏林左派进行了谈判。他会晤了波兰活动家弗拉基斯拉夫·科斯策尔斯基，后者以波兰民主派的名义向马克思转交了两千塔勒，以资助《新莱茵报》。大约9月中旬马克思回到科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72页。

德国的九月危机

这时，由于柏林国民议会再次表决左派议员施泰因关于把反动军官开除出军队的提案，在柏林爆发了一场尖锐的政治冲突。议会早在8月9日就通过了这个提案，但陆军大臣不愿服从。9月200 7日，施泰因重新提出了他的提案，以多数票通过。于是奥尔斯瓦特—汉泽曼政府宣布准备辞职。鉴于这一严重的政治危机，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指出：只有两条道路：要么议会取得胜利，王权将被摧毁，组成左派内阁；要么国王取得胜利，那时议会将被解散，结社的权利将被取消，就会颁布选举资格的法律，也就是靠大炮和刺刀实现政变^①。

《新莱茵报》阐明，议会的命运取决于它是诉诸人民保护自己，还是左右摇摆，最终屈服于国王，结果把议会迁出柏林，作为议会解散的序幕。“法国制宪议会已由凡尔赛迁到巴黎。说句老实话，假如妥协议会由柏林迁到沙洛顿堡，那倒是符合德国革命的整个性质的。”^②

历史对这个预测只作了不太大的、纯地理上的修改：11月，议会最终解散前夕，宣布它的正式所在地不是迁到沙洛顿堡，而是迁到另一个偏僻的城市勃兰登堡。

九月政治危机的另一个策源地是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全德国国民议会正在这里讨论普鲁士和丹麦于8月26日缔结的可耻的休战协定。与奥地利军阀在意大利和普鲁士军阀在波兹南的反革命战争相反，为保卫主要是德国人居住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而对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72—4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81页。

丹麦的战争是受欢迎的。同丹麦的休战协定被公正地看作是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政府和宪制议会的背叛。普鲁士政府迫不及待地缔结休战协定，不仅是由于英国和俄国的压力，而且也有它自己的动机，因为它力图从前线撤回弗兰格尔将军的军队，用来对付人民群众。

《新莱茵报》完全寄希望于人民的力量来回击这种反革命阴谋。编辑部成了群众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它同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一起，在室内和露天场地召开广泛的群众大会。这些大会具有巨大的政治示威性质。

9月13日，《新莱茵报》编辑部、科伦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²⁰¹在弗兰肯广场召开民众大会。参加大会的约五、六千人。根据沃尔弗的提议并在恩格斯、海·贝克尔和德朗克的支持下，选出了由三十人组成的安全委员会，他们当中有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毕尔格尔斯、德朗克、沙佩尔和莫尔。后来，一致通过了恩格斯提出的致柏林议会书的草案，要求议员们在有人企图解散柏林议会时，即使在刺刀威胁下也不要擅离职守。

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意味着人民直接选举的机构的诞生，它应成为革命斗争的组织中心，应成为新的、真正革命政权的胚胎。科伦资产阶级对此感到恐惧，当天便以科伦君主立宪派的市民联合会理事会的许多理事的名义提出抗议。于是，委员会的许多委员，其中也包括民主协会主席施奈德尔第二都发表声明，拒绝参加该委员会的活动。这证明，民主协会中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派之间的矛盾尖锐化了。

9月17日在科伦附近的沃林根召开的民众大会，对于巩固安全委员会的声誉起了重大作用。除科伦居民外，参加大会的还有邻近农村的农民以及约伊斯、杜塞尔多夫和克雷弗尔德等城市的代表团。台上飘扬着象征德国统一的黑红黄三色旗和红旗。在这

次大会上，象9月13日那样广泛散发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与会者表示赞成社会民主的红色共和国，热烈赞同建立安全委员会，一致通过了恩格斯针对普鲁士和丹麦休战而提出的致法兰克福议会决心书；决心书中谈到，如果普鲁士政府和全德议会之间发生冲突，与会者“准备为德国而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①。

正象《新莱茵报》预言的那样，法兰克福议会于9月16日批准了普鲁士和丹麦的休战协定。当时，为了维护德国的革命声誉，法兰克福、奥芬巴赫和哈瑙的工人以及附近农村的农民举行了起义。

由于这些事件，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科伦工人联合会于9月20日在埃塞尔大厅召开民众大会，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编辑部其他成员出席了大会。恩格斯在明晰的演说中，痛斥了全德议会的叛卖决议，报告了法兰克福起义的经过。会上通过了宣言，宣布批准同丹麦实行休战是背叛德国人民的行为，议会的议员，除了向人民声明准备退出该议会的以外，都是人民的叛徒^②。

这个宣言在《新莱茵报》上的发表，成为当局对该报和总编辑再一次提出诉讼的借口，这次的罪名是他们诽谤了法兰克福议会的议员。

法兰克福起义被镇压以后，科伦检察机关对恩格斯、沃尔弗和毕尔格尔斯提出控告，控告他们在民众大会上发表演说，阴谋反对现行制度。法兰克福王国政府司法大臣下令对安全委员会、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的领导人以及声明为援助法兰克福起义者及其家属募集捐款的《新莱茵报》发行科提出诉讼。

科伦的形势日益紧张。9月25日晨，马克思去参加第二届民主主义者区域代表大会会议。但是，由于在科伦已开始逮捕，会议未能举行。凌晨沙佩尔和海·贝克尔被捕；沃尔弗没有被警察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96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97页。

到；工人联合会的最有声望的领导人之一莫尔也在逮捕之内，但他为聚集在他家的民众所解救。

上午，工人联合会在旧市场“伊姆克兰茨”旅馆举行了会议。马克思号召工人不屈服于挑衅行为，但警告他们不要举行过早的单独的起义。下午三时在埃塞尔大厅，马克思在有民主协会会员参加的会上发出了同样的号召。

晚上，群众聚集在旧市场。传来普鲁士军队正在逼近的消息。工人们奔来修筑街垒。由于部分市民自卫团“不可靠”，当局没有调用军队。但是，这些事件成了他们实行戒严的借口。集会、民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均被禁止，《新莱茵报》和其他民主派报刊被停刊，市民自卫团被解除武装，被迫解散。

科伦实行的戒严，在整个德国激起了愤怒的浪潮。左派议员德斯特尔、博尔夏特和吉尔在普鲁士国民议会提出强烈抗议。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10月2日，科伦检察机关得到解除戒严的命令。10月3日《新莱茵报》又宣告征求订户。

但是，为了使报纸复刊，马克思需要时间。报纸失去了自己许多编辑。恩格斯和德朗克因不愿在紧张时刻坐牢，已到布鲁塞尔去了。当地警察逮捕了他们，并把他们送到法国；德朗克留在巴黎，恩格斯步行到瑞士，住在伯尔尼，并积极参加瑞士的工人运动。恩格斯想方设法尽可能帮助马克思，给他寄去通讯。沃尔弗为躲避逮捕，隐藏在普法尔茨，可是当他知道马克思的处境艰难时，便秘密回到科伦，住在离编辑部不远的下制帽人街17号。他每天经过不朝街的院子到编辑部。除了维尔特和沃尔弗以外，马克思又有了一个新的助手——弗莱里格拉特。

报纸的暂时停刊更加重了还在戒严前因购置贵重的快速印刷机而造成的经费上的困难。为了挽救报纸，马克思把父亲留下的遗产七千多塔勒全花在报纸上了。马克思后来写道，《新莱茵报》

和某些其他报纸不同，任何时候都不力图“把革命变成摇钱树”。
“只是以牺牲大量的资金为代价并且冒着个人的危险，我才得以把报纸维持住……”^①

从10月12日开始，《新莱茵报》又在科伦街上销售了。总编辑发出一篇报道：“编辑委员会原有成员不变，不久前斐迪南·弗莱里格拉特参加了编委会。”^②这仿佛是对当局关于逮捕报纸的几乎所有编辑的命令的挑战。

在那些日子里，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的处境也是复杂的。沙佩尔在监狱，莫尔被迫流亡伦敦，哥特沙克的追随者企图利用这种情况，夺回他们失去的阵地。当时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派代表团去马克思那里，请求马克思任主席。尽管马克思的办报工作繁重，尽管由于拒绝恢复他的公民权和遭到司法追究，他在科伦的
204 处境不稳定，他还是同意暂时担任这个职务。他在10月16日的委员会会议上说：“政府和资产阶级应当相信：尽管他们百般迫害，总有人愿意听工人的吩咐。”^③10月22日，联合会全体会议批准马克思为主席。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849年2月。

在科伦工人联合会会议上，马克思阐述了工人在维也纳开始的武装起义中的卓越作用。根据他的提议，一致通过了向维也纳工人联合会致信的决议。

维也纳十月起义

戒严解除以后，《新莱茵报》第一号上刊登了马克思关于维也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493页。

③ 同上书，第602页。

纳起义的文章。国王颁布的关于解散匈牙利议会和关于委任不久前被匈牙利独立维护者打败的反动的克罗地亚总督耶拉契奇为匈牙利总督的命令，是马克思写这篇文章的起因。10月5日，维也纳驻军接到命令，联合被击溃的耶拉契奇军队，对匈牙利革命开始新的征讨。10月6日，人民群众、大学生军团和维也纳国民自卫团举行起义，反对派出军队。傍晚，人民赢得了胜利。

往后的斗争进程多半取决于维也纳人民的统一和组织性。但是，马克思在第一篇文章中就已警告过的维也纳资产阶级叛变的可能性，终于证实了。奥地利反动派同样也会利用这个民族矛盾。除受地主上层欺骗的南部斯拉夫人外，捷克资产阶级民族自由主义政党也站到了哈布斯堡王朝一边。至于革命的匈牙利，它的领导人在自由派和一部分军官的压力下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主张匈牙利军队不急于去帮助维也纳起义者。

因此，德国各种民主力量对起义的维也纳的支持就特别重要了。法兰克福、柏林和其他一些德国议会的左派议员，就10月底即将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全德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问题，进行了会商。马克思专门会见了途经科伦去柏林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西蒙、齐茨和施略费尔等人。马克思力图通过他们来影响议会的其他左派议员。但是参加会商的人数甚少，而且意见非常不一致。德斯特尔、雅科比和西蒙起草的致德国人民的呼吁书，205遭到了不愿放弃“法律”基础的大多数柏林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

10月26—30日在柏林召开的第二届全德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也不很成功。《新莱茵报》愤慨地写道，正当决定维也纳而且看来是整个德国命运的时刻，这个代表大会却为微不足道的组织问题进行无休止的辩论而浪费时间。大会只是到第三天才开始讨论维也纳事件。左派提议，在齐尔加尔登召开民众大会，发表告人民书，号召他们行动起来。有相当一部分代表退出会场，表示不同

意。留下的代表发出了告人民群众书，号召他们要求自己的政府帮助维也纳。

马克思严厉地批判了这个告人民书。他写道：“难道‘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有权利稍微用这种幼稚和保守的观点来对待德国各邦政府吗？”马克思希望人民“给予维也纳以他们在目前能力所及的唯一帮助，这种帮助就是战胜本国的反革命”^①。

10月30日留下的代表大会与会者在讨论社会问题时采取了更激进的立场。报告人是科伦工人联合会代表博伊斯特，他提出了一个纲领草案。《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的各点成为民主共和国建立以后拟定各项实际措施的基础。《要求》中的大部分规定在实际措施中被逐字地转述了，但一部分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精神被改写了。这个报告被提交各民主协会讨论。

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闭幕和维也纳陷落几乎是在同一时候。马克思在11月6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会议上和几天以后的民主协会会议上谈到了这个问题。参加过这次会议的列斯纳回忆说：“马克思告诉了大家关于民主主义者罗伯特·勃鲁姆被维也纳野战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消息。全场顿时鸦雀无声。马克思走上讲台，宣读了关于勃鲁姆牺牲的电报。我们在盛怒之下顿时呆若木鸡。接着，场内群情激奋，人声鼎沸。”^②

206 马克思在《反革命在维也纳的胜利》一文中愤怒地痛斥了资产阶级出卖维也纳起义的行为：“历史上没有比德国资产阶级更可耻更下贱的角色了。”^③马克思在评价维也纳事件对德国革命和整个欧洲革命进程的影响时写道：“第二幕戏在维也纳刚刚结束，这出戏的第一幕是在巴黎演出的，叫做‘六月的日子’……我们在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29、530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1页。

林很快就会看到第三幕。”^①马克思预见到普鲁士反革命的决定性攻势，并且清醒地估计到那里形成的力量对比。因此，他把自己的主要希望寄托在革命法国的首创性上面。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人民从过去战斗的经验中应当吸取的教训：“六月和十月的日子以后的无结果的屠杀，二月和三月以后的无止境的残害，——仅仅这种反革命的残酷野蛮行为就足以使人民相信，只有一个方法可以**缩短、减少和限制旧社会的凶猛的垂死挣扎和新社会诞生的流血痛苦，这个方法就是实行革命的恐怖。**”^②

这样，马克思根据失败的沉痛经验，再次论证了建立一个能够防止反革命势力的新的血腥暴行，从而能促进和加快广大人民群众胜利的真正革命的政权的必要性。

在反对普鲁士反革命政变的斗争中

正如马克思预料的那样，维也纳十月起义的失败促使普鲁士反动派采取断然的行动。11月2日，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委托彻头彻尾的反动派勃兰登堡将军成立新政府。11月9日，国王颁布了国民议会从柏林迁往省城勃兰登堡的谕旨。“**勃兰登堡在议会，议会在勃兰登堡！……警备部在议会，议会在警备部！**”^③——马克思就是这样概括了导致普鲁士国家政变的11月9日谕旨的实质。马克思要求议会采取革命措施，他认为：“首先应当通过**逮捕大臣们的决定，因为他们是国事犯——出卖人民主权的国事犯。**本来议会应当**驱逐一切违抗议会命令而服从其他命令的官吏，并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542页。

② 同上书，第5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4页。

207 布他们**不受法律保护**。”^①但是议会认为，没有能力采取这样有力的革命行动。诚然，议会决定继续在柏林召开，但同时却又声明，自己打算只作消极的反抗。

马克思抨击了“怨天尤人、自作聪明和犹豫不决的国民议会”^②的策略，并且号召国民议会求助于人民，求助于普鲁士士兵，照法国的样子采用雅各宾的、平民的办法。马克思向人民提出了一个问题：

“在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我们应当拒绝纳税。”^③

这样，11月11日马克思在政治决战的形势中提出了斗争的基本口号。这个口号一旦实现，一方面能够削弱反革命力量，摧毁它的财政基础；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最广大人民群众吸引到斗争中来，使他们直接同国家政权发生冲突。这就能促使革命的政治队伍的成长。

为了赢得时间，反革命急忙实行他们的计划。11月11日，士兵阻挡议员进入剧场——国民议会开会的会址。议员们不得不在靶场开会。对柏林市民自卫团实行缴械、解散的命令颁布了，柏林宣布戒严。马克思评价当局的这一行动是犯新的叛国罪行，他号召议员们采取议会外的斗争形式：“**国民议会的会址是在人民群众中，而不是在什么由大块石头砌成的建筑物中。**”^④

马克思让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起最积极的作用，他竭力联合全国一切进步力量，不仅是为了粉碎反革命的计划，而且也是为了给反革命以致命的打击。马克思自己成了莱茵地区广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页。

② 同上书，第19页。

③ 同上书，第20页。

④ 同上书，第25页。

革命运动的灵魂。根据他的倡议，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在科伦和科伦附近召集了一系列民众大会。11月11日在埃塞尔大厅召开大会，会上通过了致柏林国民议会书，号召议会坚持不屈从于国王的谕旨。到11月12日中午，在致议会书上面签名的已有七千人。大会宣布自己为常设机构，并于11月13日选出由各派的民主主义者代表和共产主义者共二十五人组成的人民委员会。与9月份在科伦进行活动的安全委员会相比，人民委员会是在更广泛的基础上建立的。参加委员会的除了工人、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一些进步的资产者。委员会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力量回击侵害革命成果的反动派。 208

关于武装人民的问题具有首要意义。在埃塞尔大厅召开的大会还在11月11日就要求科伦市政府立即把九月份从市民手里夺去的武器还给市民。但“城市老爷们”对这些要求置之不理。于是，民主协会采取步骤恢复解散了的市民自卫团。科伦工人联合会着手成立自己的“流动部队”。募集武器经费的呼吁书发布了。《新莱茵报》发行科声明，愿意代收为此目的的捐款。

同时，在军队内开展了大量工作。11月12日，民主协会呼吁科伦守备队的士兵不作独裁者们的盲目的工具。11月15日出版的《新莱茵报》第143号号外附刊上以《祖国在危险中》为题刊登了一则通知：今天在埃塞尔大厅召开科伦后备军和预备队的士兵大会。这次大会要求柏林国民议会“向后备军发出呼吁书，要他们象1813年那样举行起义，象那时消灭国外的敌人那样消灭今天国内的敌人”^①。科伦守备队的士兵们不顾严格的禁令，多次出席了后备军的大会。这一切都标志着革命风潮也正在军队内掀起。

为了吸收农民参加斗争，民主协会、工人联合会和人民委员会

^① 1848年11月17日《新莱茵报》第145号。

派出了使者到附近乡村。

马克思还极力和莱茵省各城市的民主派采取共同行动。他受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委托,11月13日在写给杜塞尔多夫起着重要作用的拉萨尔的信中,建议杜塞尔多夫人通过如下决议:1. 普遍拒绝纳税——特别要在农村宣传。2. 派遣志愿军去柏林。3. 捐款给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①。

209 马克思和施奈德尔第二署名的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11月14日的呼吁书,在把拒绝纳税的要求变为群众行动口号的事业中是很重要的步骤。委员会号召莱茵省所有民主组织,不要耽搁时间,召开民众大会,鼓励该省全体居民拒绝纳税。可是,马克思认为,只要这个口号还不为柏林国民议会所承认,还得不到其他省的积极支持,暂时制止人民群众用暴力对抗征税,是必要的。

区域委员会的呼吁书立即得到了莱茵省许多城市和农村人民群众的同情。关于萨克森、西里西亚和威斯特伐里亚革命风潮的消息也不断传来。但这次运动仍然是分散的,多半是自发性的。为了使地方反抗中心汇成全民族的革命斗争,下面的革命行动,必须用上面即柏林国民议会这个唯一能够集中运动的机构的行动来补充。

马克思在提出斗争口号的同时,也给普鲁士国民议会,首先给它的左翼想出了策略。同时马克思准备给议会以有效的支援。还在11月14日的《新莱茵报》社论中,他就号召莱茵省人民:**“赶快用人员和武器支援柏林国民议会。”**^②在这些严峻的日子里,马克思同柏林左派建立了经常的联系,这是利用了为此专门设立的,主要由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担任的信差实现的。

在莱茵等省的无数宣言书的影响下,国民议会于11月15日决定,自11月17日起拒绝纳税。现在马克思提出的口号,终于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2页。

获得了全国性的意义和强制性的法律的效力。马克思写道：今后“**纳税是叛国行为，拒绝纳税是公民的首要职责！**”^①。

作为革命的战略家和策略家，马克思的天才，在于能够迅速地注意到政治形势的变化，并相应地改变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国民议会的决议，现在允许提出武装对抗强行征税的口号。在这个关键时刻，即在批判的武器应当代之以武器的批判的时刻，马克思又掌握了主动权，在区域委员会 11 月 18 日的新的呼吁书中，提出了 ²¹⁰ 整个革命民主运动的行动纲领。呼吁书是由马克思、施奈德尔第二和沙佩尔签署的。该呼吁书包括三条新的口号：

1. 各地都应当用一切手段反对强行征税；

2. 各地都必须组织民团，抗击敌人；

3. 在当局拒绝执行国民议会的决定时，应该成立安全委员会与之相对抗。

反革命集团妄图制止马克思的革命活动。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呼吁拒绝纳税以后的第二天，就遭到司法追究。11 月 14 日市内就流传马克思有被逮捕的危险。法庭院里聚集了一大群人。正如科伦检察长茨魏费尔给司法部的报告中所说的，只要有人打算逮捕马克思，聚集的人就准备使用强力解救他。当马克思走出大楼时，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并被伴送到埃塞尔大厅，马克思感谢大家对他的支持。

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 11 月 18 日的呼吁书引起当局新的惊慌。科伦行政长官写信给内政大臣曼托伊费尔说，如果能够逮捕呼吁书的起草者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造成这里愤激情绪的主要因素就会得到消除”^②。11 月 20 日，在马克思、沙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36 页。

② 格·贝克尔：《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科伦。1848—1849 年》1963 年柏林版第 159 页。

尔和施奈德尔第二接到因被控公开号召叛乱受司法当局传讯的命令后，他们警告莱茵省民主主义者，科伦正酝酿着一场新的挑衅，将重新宣布戒严。他们写道：“你们要粉碎这种企图。不管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你们都要保持镇静。”同时，他们要群众对面临的斗争作好准备，并声明，莱茵省“决不向军刀统治屈服”。^①

人民委员会派出代表团去晋见检察长茨魏费尔，要求解释关于准备进行逮捕的谣言。当局考虑到政治气氛很紧张，这次只提出诉讼案件。不过，这并不排除会有新的专横的行动，马克思一天一天地等着被捕。

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马克思坚决果断地实行他的既定策略。从11月19日—12月17日，《新莱茵报》每天在第一版刊登用大号字体印刷的口号：“打倒捐税!!!”还出版了一些相应的宣传画和传单。

211 为了讨论今后的革命措施，在科伦召开了莱茵省第二届民主主义者区域代表大会，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次会议。《新莱茵报》只刊登了一条简要的报道：“11月23日召开的莱茵省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批准区域委员会通过的各项决议。——详细指示，将由代表们通知自己的联合会。”^②这样，大会赞同了马克思提出的行动口号。代表们得到了如何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口号的指示。

由于马克思及其在莱茵省的拥护者的努力，使人民群众同反革命进行一场决战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但是全国斗争的胜利多半要取决于普鲁士国民议会。而议会继续推行消极的合法的反抗策略。马克思讽刺地把这种使群众恢复平静状态的胆怯的反抗策略，比之为被屠夫拉去屠宰的牛犊的反抗^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4页。

② 1848年11月26日《新莱茵报》第153号。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页。

反革命王国集团利用这一点于12月5日颁布了两项命令：一、解散国民议会和1849年2月召开新议会，二、国王不同任何议会协商钦赐普鲁士宪法。这样，普鲁士就实行了政变。

报纸向读者报道了此事，马克思写道：“国民议会长期以来软弱怯懦，现在它自食其果了。它曾听任反人民的阴谋活动在好几个月中从容地策划、加强和巩固，而现在它成了这种阴谋活动的第一个牺牲品。”^①

德国革命和欧洲革命的 初步总结和前景

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这组文章中，马克思对1848年3月到12月德国革命的特点和各个重要发展阶段，作了最好的分析。

马克思分析了德国革命同1648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之间的本质区别，从而得出了关于各种类型资产阶级革命的极其重要的理论结论。他写道：在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中，“资产阶级都是**实际上领导运动的阶级。无产阶级和那些不属于资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阶层**，不是还没有与资产阶级不同的任何单独的**利益**，就是还没有组成为一些独立发展的阶级或一个阶级的几个部分”^②。

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却毫无相似之处。“德国资产阶级发展得如此萎靡、畏缩、缓慢，以致当它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 没有首创精神，不相 212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17页。

^② 同上书，第124—125页。

信自己，不相信人民，没有负起世界历史使命；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年的利益，没有眼睛，没有耳朵，没有牙齿，衰颓不堪，——这就是**普鲁士资产阶级**在三月革命后执掌普鲁士国家政柄时的形象。”^①

马克思在总结 1848 年 12 月普鲁士事件时，对于德国革命今后的前景这个使人民群众焦急不安的问题也作了回答：“普鲁士资产阶级以及一般德国资产阶级从三月到十二月的历史证明：在德国不可能发生**纯粹资产阶级的革命**，也不可能建立**君主立宪式的资产阶级政权**，可能发生的不是封建专制的反革命，就是**社会共和的革命**”^②。

这样，马克思明确地表述了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反革命赢得最终胜利，完全废除在三月革命中取得的代议机构、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报刊自由；或者是发生新的革命，结果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建立一个能实行社会改革，实现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提出的纲领的真正民主的共和国。

同以前一样，马克思把德国革命运动的前景有机地同欧洲革命的进程结合起来。他在 11 月 19 日写成的《意大利的革命运动》和正好在 1849 年前夜写成的《革命运动》两篇文章中，主要阐明了 1848 年欧洲革命发展的总结和今后的前景。

马克思在其中的第一篇文章里追述了二月和三月欧洲革命的凯旋行进以后，它的敌人是如何进行反扑的，马克思指出了这次反扑的下述事实：4 月 10 日，伦敦宪章派的示威游行遭到破坏，从而使革命通往英国的道路被切断了；6 月 25 日，巴黎工人遭到失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126—127 页。

② 同上书，第 146 页。

给了欧洲革命沉重打击；8月6日，奥地利军队重新占领米兰；11²¹³月1日，维也纳十月起义最终失败。文章写完不久，又多了柏林发生国家政变这一重要事实。

不管这个总结多么令人不快，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绝望——要知道，人民不仅在胜利中、而且也在失败中学习。革命开始时，人民群众到处为幻想，为博爱的甜言蜜语所迷惑。但是，反革命的残酷行为教会了革命斗争的参加者许多东西。“1848年革命运动的主要成果不是人民赢得了东西，而是他们失去了东西——他们丢掉了幻想。”^①

马克思分析欧洲革命在1849年的前景时，仍然期待着法国的革命首创精神，期待着能够再次引起欧洲人民反响的高卢雄鸡的新的啼鸣。现在，马克思把推翻专制政体，争取被压迫民族的独立同法国工人的胜利起义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英国及其工业和贸易上的霸权是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敌人。“英国……好象是一座使革命巨浪撞得浪花四溅的岩石……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欧洲大陆在经济方面的变革，如果没有英国参与，都不过是杯水风浪。”^②要使法国的社会变革不被英国资产阶级所扼杀，就必须击溃老的资产阶级的贵族英国。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认为，欧洲战争将是法国胜利的工人革命的第一个结果，而因为英国将参与欧洲战争，这一战争就具有世界战争的性质，在世界战争的进程中，宪章派的胜利起义前提也会成熟起来。“象在拿破仑时代一样，英国将成为反革命大军的首领，但由于这场战争，英国本身将被投入革命运动，将成为革命运动的领袖并赎偿它对十八世纪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62页。

② 同上书，第174—175页。

命所犯下的罪过。”^①

马克思曾预言，法国无产阶级起义将在世界舞台上引起革命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规模巨大的冲突，而他对这次起义的指望，是由当时造成的历史形势所决定的。那时，要使欧洲革命转到新的更高的阶段，没有法国工人阶级新的胜利的发动是不可想象的。214 马克思把这个革命过程的成功也同英国这个经济上最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认为，1847年经济危机的严重后果，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对工人难以置信的残酷剥削的形式和方法，手工业者的大量破产，农民的困难处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把这一切看作是社会主义革命临近的征兆。他们当时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性”估计过分了，并且错误地期望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胜利。列宁写道：“但是一直在努力提高并且已经提高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水平，使他们超出日常细小的任务范围的两个伟大的思想家所犯的**这种**错误，同大叫大嚷，信口开河，妄说革命是无谓忙碌，革命斗争徒劳无益，反革命的‘立宪’幻梦妙不可言的那些官场自由派的拙劣的智慧比较起来，要高尚千倍，伟大千倍，在**历史上宝贵**千倍，**正确**千倍……”^②

争取民主力量的统一

普鲁士政变以后，一度出现了暂时的沉寂，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势力仿佛都在准备进行最后决战。

1849年1月至2月初，马克思密切注视普鲁士邦议会第二议院的选举，这次选举基本上采用了1848年4月实行的普遍的平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5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709页。

的选举,但还不是直接的选举。如果选举的结果有利于民主派,那么在第二议院里就可能形成一个反对派去对付反革命的下一步计划。因此,马克思和 1849 年 1 月中旬回到科伦的恩格斯认为这次选举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一次也坚持把所有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的策略。

彻底揭露和孤立既接受钦定宪法又希望能部分地修改它来自我安慰和欺骗人民的自由资产阶级,是民主派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马克思在《孟德斯鸠第五十六》这组文章中,讥讽地解释说:资产阶级可能有机会修改宪法,但“只能按照国王和第二议院的愿望修改它,而第二议院是由容克地主、金融贵族、高级官员及僧侣组成的”^①。他谴责了自由派的喉舌《科伦日报》,该报企图欺骗群众,²¹⁵说什么钦定宪法能够有助于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而又不会触动现存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极力联合一切民主力量,但并没有掩饰民主派阵营内部的意见分歧。例如,他对以前的柏林左派机关报《国民报》就进行了公开而尖锐的批判,因为该报一方面宣称“想要**真正的民主立宪制度**”^②,同时又反对继续革命而要“法制、安宁和秩序”^③。马克思写道:“这些先生们‘想要’的东西,全是那些除了进行新的革命以外他们用别的方法永远也得不到的东西。而新的革命他们又不想要。”^④马克思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要求他们始终不渝地、坚定有力地完成一般民主的任务。

1 月 15 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的会议也讨论了对第二议院选举的策略问题。还留在联合会中的一些追随哥特沙克的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218 页。

② 同上书,第 244 页。

③ 同上书,第 242 页。

④ 同上书,第 245 页。

反对同民主派结成选举同盟。马克思在回击宗派分子时，发表了长篇演说，再次论证在选举中联合民主派的必要性。这个策略收到了效果。1月22日在科伦当选的人有三分之二是民主派的候选人。在莱茵省的其他许多城市和乡村，民主派也取得了胜利。马克思写道：这次初选证明，“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摆脱了大资产阶级、高等贵族和高级官员的影响”^①。

2月5日进行的第二议院议员的选举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策略的正确性。整个民主阵线提名的候选人吉尔和施奈德尔第二获得胜利。施奈德尔第二的当选具有特别重大的政治意义，因为再过三天，他将同马克思、沙佩尔一起到科伦陪审法庭受审。而在审讯开始以前，大多数选举者通过投票仿佛作出了被告无罪的判决。

两个审判案

1848年底，马克思已经数不清当局对《新莱茵报》和它的一些编辑人员究竟提出了多少次诉讼。

216 第一个案件是由于1848年7月5日发表的《逮捕》一文引起的，当局为了等待更有利的政治时机而一再拖延，直到1849年2月7日才开始审理。在陪审法庭上受审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和《新莱茵报》的发行负责人科尔夫。律师施奈德尔第二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正式辩护人出席。但是，审判中的最精彩的场面却是被告无畏地为《新莱茵报》、为莱茵省以及整个德国出版自由而辩护的发言。

出席这次审判的列斯纳回忆道：“令人欣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55页。

斯以敌人无法相比的才智和渊博的知识同黑白反动派展开了斗争。甚至连敌人也掩饰不住对这两个人的敬佩！”^①

马克思决定在敌人的土地上用敌人的武器来打击敌人，结果取得了辉煌的成功。他对起诉书作了详细的法律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控告侮辱了科伦检察长茨魏费尔和诽谤了宪兵所根据的刑法典的那些条文，对这个案件是完全不适用的。马克思从这一点出发，指出了这个案件的全部政治意义。他向陪审员声明说，如果你们要象检察机关所解释的那样运用这些条款，“那末你们借助刑事立法就可以把你们在宪法中所承认的和通过革命才取得的出版自由取消。这样你们就是批准官员们的恣意专横，给官方的一切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专门惩罚对这种卑劣行为的揭露”^②。

马克思继续说，他本人宁肯去研究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也不愿意同当地的要人，即同宪兵和检察机关打交道。“如果我们决定同**这样的**敌手交锋，我认为，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牺牲。但是首先，报刊的义务正是在于为它周围左近的被压迫者辩护……报刊必须反对**某一具体的**宪兵、**某一具体的**检察官、**某一具体的**行政长官。”马克思在听众的一片欢呼声中继续说道：“为什么**三月革命**会失败呢？三月革命只是改组了政治上层，而没有触动它的全部基础：旧官僚制度、旧军队、旧检察机关和那些从生到死 217 终身为专制制度服务的旧法官。目前报刊的首要任务就是**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③

这样，马克思就利用处于被告的机会，不仅维护了出版自由，而且还宣传了以推翻旧的官吏机构、军队和司法机关为使命的人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74页。

③ 同上书，第277—278页。

民革命的思想。

恩格斯在马克思发言以后指出,《逮捕》这篇文章所援引的事实是完全正确的,文章中关于“办事内阁”是一个向旧贵族、旧官僚内阁过渡的内阁这一总的政治结论也是正确的。恩格斯向法官和陪审员指出,看来我们的罪行就是我们“正确地指出了确凿的事实并从中得出了正确的结论”^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演说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致陪审员不得不宣判他们无罪,许多听众发出了一片欢呼声。

第二天,马克思、沙佩尔和施奈德尔第二到陪审法庭受审,他们因为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在1848年11月18日发表了第二个呼吁书而被控告“煽动叛乱”。《德意志伦敦报》报道说,和昨天一样,在法庭“旁听的人空前踊跃”^②。

马克思在长篇发言中对普鲁士政变的起因做了深刻的理论分析,揭露了这次政变的性质,证明了莱茵省民主主义者区域委员会的策略是正确的。

马克思批判了保存“法制基础”这种臭名昭著的理论,做出了关于革命对陈腐的法律上层建筑的关系的重要的理论结论。唯心主义的法学家们认为,社会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③。马克思强调指出,旧的法律不应该是新的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革命的最重要任务,就是要摧毁旧的法律上层建筑。

马克思还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批判了“协商论”这种叛变的理论。他指出,国王和国民议会之间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285页。

② 同上书,第691页。

③ 同上书,第292页。

示了冲突的社会本质。“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²¹⁸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①

谈到莱茵区域委员会 11 月 18 日的呼吁书，马克思根据历史上的一些事例论证了拒绝纳税是合法的，因为这是人民对侵犯他们利益的政府所采取的自卫手段。在这种情况下，破坏法制基础的是动用暴力的王权。马克思的基本思想是：对抗这种恣意横行直至用革命的暴力来回击暴君的暴力，推翻现存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和义务。检察机关指责被告在呼吁书中比普鲁士国民议会本身跑得更远，马克思驳斥了这种指责，并指出国民议会自相矛盾，它的多数派胆怯怕事。“国民议会的行为并没有预先决定人民的行为…… 当国王实行反革命的时候，人民完全有权利利用革命来回答它。”^② 在发言的结尾他着重指出，斗争并没有结束，而只是戏剧的第一幕结束了。必然的结果只能是：“不是反革命的完全胜利，就是新的胜利的革命！”^③

恩格斯后来写道：马克思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向资产阶级陪审员们说明，使他遭受审判的这些事情，其实是资产者自己应当做的事情。^④ 马克思的发言给人留下了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首席陪审员代表陪审员对马克思的富有教益的说明表示感谢。被告再一次被宣判无罪。

陪审法庭失败以后，当局只好用别的手段来对付马克思。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6 卷第 301 页。

② 同上书，第 305 页。

③ 同上书，第 306 页。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234 页。

伦要塞司令建议驱逐马克思，因为他是“莱茵省骚乱的主要祸根”^①。但是警察当局担心这样做会引起人民的抗议，便向内务部请示。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的回答是：驱逐马克思，他没有任何意见，他要科伦行政当局自己去选择适当的时间和借口。科伦当局只等有利时机一到，便利用这种办法赶走这个危险的革命家。

马克思在 1849 年 2—3 月

第二议院从 1849 年 2 月 26 日开始召开会议的唯一目的就是使已经完成的政变合法化。为了使人民沉默不语，议会提出了三个反动的法案：俱乐部和集会法、招贴法和出版法。马克思把它们比作英国 1819 年的反人民的法律，并称之为“禁口律”。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人民群众尤其需要对议员不断施加有效的压力。正是科伦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这不是偶然的。1849 年 3 月 11 日的复选人大会，选出了一个九人委员会，委员会中包括一些共产主义者，其中有马克思和沃尔弗。由于没有公民权连正式选民都不是的马克思的当选，这本身就是一次政治示威。委员会的任务是召开复选人会议，向第二议院的议员呈递他们的请愿书和抗议书等。这次会议通过了给议员的请愿书，要求解除柏林戒严。3 月 16 日的大会对声名狼藉的俱乐部法、招贴法和出版法的草案进行了讨论，有几百个人在根据《新莱茵报》精神起草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在致科伦议员吉尔和施奈德尔第二的特别信件中，包含了马克思提出的要求：如果第二议院批准这些法案，莱茵省议员就应该退出第二议院。科伦要塞司令立即向陆军大臣汇

^① 格·贝克尔《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在科伦。1848—1849 年》1963 年柏林版第 206 页。

报了这些会议的情况，并强调《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组织大会方面的领导作用。

尽管有来自人民群众的压力，但是议员们，甚至左派议员都畏缩不前。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几乎在每一篇关于第二议院的文章中都要对左派议员提出尖锐的批评。

为纪念二月革命和三月革命一周年而举行的那些民主宴会是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的一种形式。2月11日在莱茵河畔缪尔海姆当地的工人联合会举行了第一次民主宴会。马克思在挤满听众的大会上发表演说，叙述德国工人参加法国、英国、比利时和瑞士等国家的革命运动的情况。人们举杯向客人们表示祝贺，特别是祝贺“那些象在座的《新莱茵报》总编辑**卡尔·马克思**那样早在二月革命以前很久就用自己的言行捍卫了工人阶级权利的人”^①。

1849年2月24日，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也在科伦举行了民主宴会。宽敞的埃塞尔大厅座无虚席。这次宴会是各国民主派的国际团结的标志。与会者缅怀了巴黎二月和六月起义中的死难烈士。

在普鲁士三月革命一周年临近的时候，《新莱茵报》编辑部收到了许多邀请参加纪念宴会的请帖，但是它并不赞同这个纪念活动。“坦白地告诉我们的读者，我们今天没有找到社论的题材。柏林的三月革命这种对维也纳革命的微弱反映，从来没有使我们感到兴奋。”^②

可是马克思和《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参加了3月19日由工人联合会和民主协会举行的宴会，但宴会纪念的是柏林街垒战战士，而不是纪念普鲁士的三月革命。到会的人有六千左右。恩格斯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92页。

② 同上书，第430页。

议为巴黎的六月起义者干杯，沙佩尔建议为英国宪章派干杯，德朗克建议为无产阶级革命干杯。为此，弗莱里格拉特根据《马赛曲》的韵律专门作了一首鼓舞人心的革命赞美诗《号角》。这首诗把六月起义同三月革命作了对照，号召人们在红色旗帜下进行新的革命。宴会结束时，大家高呼红色共和国万岁。《新科伦日报》称这次宴会为“无产者的节日”。

工人联合会里的马克思的拥护者在科伦扩大共产主义的影响方面建立了不小的功绩。他们在2月通过了以地区原则为基础的新的章程。联合会有九个分会，各分会有权接收每月缴纳会费的会员。现在政治讨论都集中在分会里进行，讨论的题目通常都是《新莱茵报》社论所阐明的迫切的政治问题。

联合会非常注意捍卫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经济利益，他们的状况由于1847年的危机和失业仍然十分贫困。科伦市政当局唯恐发生自发的暴动，就雇用一些失业者让他们参加公共工程的劳动。但每个人必须填写“工人手册”，服从极端严厉的纪律规定。²²¹马克思在1849年1月初写的《资产阶级的文件》一文中，痛斥了这种残酷的无耻的制度，并指出，普鲁士资产阶级同为穷人建立实行监狱制度的习艺所的英国资产阶级一样，把善举同报复结合起来了。

建立一个群众性无产阶级 政党的实际步骤

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竭力使无产阶级成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准备逐步使工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脱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一个自己的政党。但是，虽然科伦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同马克思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委员有直接的联系，但在其他地方活动的同盟盟员却不是这样。在德国其他城市以及在伦敦、巴黎、瑞士和比利时的同盟支部同科伦中央委员会的组织联系日益松散，而且逐渐中断了。

显然不同意结束共产主义者同盟秘密活动的约瑟夫·莫尔，在到达伦敦后不久，就同亨·鲍威尔和埃卡留斯建立了一个新的中央委员会。1848年底至1849年初，伦敦中央委员会委派莫尔到德国去改组——不管马克思和科伦中央委员会是否同意——共产主义者同盟，使它重新成为一个以伦敦制定的章程为基础的秘密团体。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一个盟员勒泽尔后来作了报道：1849年春，在《新莱茵报》编辑部办公室安排了一次同莫尔的会晤，参加者有科伦中央委员会委员：马克思、恩格斯、沃尔弗和沙佩尔，还有沙佩尔在科伦组织的秘密的同盟支部的成员：勒泽尔、诺特荣克、赖夫、豪德、埃塞尔和弥勒。在讨论过程中，沙佩尔和莫尔坚决主张恢复秘密的同盟；马克思、恩格斯和沃尔弗表示反对，因为在德国还存在着共产主义者进行合法活动的条件。他们坚决反对伦敦中央委员会的章程。伦敦人显然十分担心“共产主义的幽灵”会把工人吓跑，就把它称为“革命政党章程”。旧章程第一条关于同盟的共产主义目的的精确提法，在新章程中被改为：“同盟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共和国。”^①在关于盟员条件的第二条中，不提必须承认共产主义这一要求。马克思说得对，这个新章程²²²根本就不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也批判这个章程把革命斗争贬低为密谋活动。这样的章程对于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不但无益，反而有害。

^① 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十九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1853年柏林版第1部分第45页。

伦敦人和科伦人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因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巴黎区域委员会主席兼《新莱茵报》通讯员艾韦贝克早就同赫斯和哥特沙克在一起进行阴谋活动了。艾韦贝克作为德国民主派巴黎代表，在柏林第二届民主主义者代表大会上，打算实现他同赫斯共谋的计划：在普鲁士首都建立一个与科伦中央委员会相对立的新领导中心。此外，他还企图离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11月14日，他在科伦写信把马克思对这件事的看法告诉了赫斯。他写道，马克思“非常欣赏恩格斯，他认为恩格斯‘在智力上、道德上和性格上’是一个杰出的人物”^①。

尽管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的情况越来越复杂，马克思和他的亲密战友还是始终坚决地遵循他们在革命开始时所奉行的路线，即建立一个以共产主义者为核心的、德国无产阶级的公开群众性的政治组织。正如马克思设想的那样，革命斗争的实践，特别是1848年11月—12月事件，是对工人进行政治教育的最好学校。生活本身砸烂了狭隘行会式的工人联合会的框框，使工人转向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原来跟随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日益确信他们是不坚定的，并努力争取自己的政治独立。

革命的经验教训不能不影响工人兄弟会及其领导人斯蒂凡·波尔恩。十一月事件、解散国民议会的威胁，使波尔恩不得不改变腔调。毫无疑问，在莱茵区域委员会11月18日的呼吁书的影响下，工人兄弟会中央委员会才号召它的地方和区域委员会尽力把工人武装起来。波尔恩写道：要么受人鞭答，要么拿起“自由的宝剑”，德国人必须作出选择。

1849年冬春举行的一系列代表大会，反映德国工人运动发生223 了深刻的变化。1849年1月底，海德堡大会决定工人兄弟会

^① 艾韦贝克1848年11月14日给赫斯的信，见《赫斯通信集》1959年德文版第209页。

(它主要在北德意志有影响)和全德工人代表大会(它联合了许多南德意志的工人联合会)的领导机构合并。预定设在莱比锡的统一的中央委员会被委托召开全国工人代表大会来建立一个既有政治目标又有社会目标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北德意志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汉堡),绍林吉亚(阿尔坦堡)、维尔腾堡(戈宾根)和巴伐里亚的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纽伦堡)也都通过了类似的决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工人运动中的新趋势:即渴望联合,竭力克服行会观点和“经济主义”,不再信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争取政治上的独立。他们认为,必须参加德国工人的正在形成的全国性组织,以便使它成为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

这就需要大力宣传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原理,改变同民主派的合作方式,最后还要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共产主义者在未来整个德国的无产阶级组织中的影响。

马克思认为,他的《雇佣劳动与资本》对德国先进工人建立自己政党的思想准备方面是很重要的。他在1847年12月给在布鲁塞尔的德国工人作的这些讲演,1849年4月5日开始在《新莱茵报》上发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一著作明确地指出了《新莱茵报》政策的社会目的^①。

马克思在这一著作的简短的引言中写道:“现在,在我们的读者看到了1848年以波澜壮阔的政治形式展开的阶级斗争以后,我们想更切近地考察一下资产阶级的生存及其阶级统治和工人的奴役地位所依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本身,也就适当其时了。”^②

4月11日,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决定建议它的分会根据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文章讨论社会问题。委员会也号召德国各工人联合会讨论这些文章。在这方面,科伦工人联合会成了整个德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3—1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51页。

国工人运动的思想中心。

224 为了促进工人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独立，以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马克思及其拥护者于4月14日通过了关于从组织上脱离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即退出各民主联合会的极为重要的决议。在同一天举行的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会议上——在施奈德尔第二因被选入第二议院而退出委员会以后，委员会的成员就是海·贝克尔、卡·马克思、卡·沙佩尔、弗·安内克和威·沃尔弗——后面四个人联合发表如下声明：

“我们认为，各民主团体的现行组织成分过分庞杂，这势必将妨碍有利于事业的有效活动的开展。

我们认为最好是建立一个由单一成分组成的工人联合会的更为严密的组织，因此我们声明：自即日起退出各民主团体莱茵区域委员会。”^①

马克思及其拥护者退出莱茵区域委员会，绝不是放弃同民主派的联合。在新的政治条件下，这种联合只能采取另一种形式，即两个独立的组织在反对共同的敌人，反对准备转入新攻势的反革命力量的斗争中统一行动。

科伦工人联合会也通过了同民主派划清界限的决议。4月16日，联合会全体会议一致决定：退出德国民主协会总会，加入德国工人联合会总会（中央委员会设在莱比锡）。会议还决定派遣代表参加莱比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召开以前，在科伦召开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各工人联合会的代表大会。大会筹备期间成立了一个委员会，马克思也是委员之一。但是，他没有能直接参加委员会的工作，因为4月中旬他暂时离开了科伦。由于这个原因，《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发表也中断了，而后也未继续发表。在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09页。

期间，他访问了不来梅、汉堡、比雷菲尔德和哈姆，他这次旅行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解决报纸的新的财政困难，另一方面是希望同共产主义者和各工人联合会建立更紧密的联系，由于许多地方正在准备建立一个德国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这种联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新莱茵报》和匈牙利、 意大利的民族解放斗争

225

1849年春，在马克思的政治战略上占据重要地位的是匈牙利的革命战争，匈牙利的革命力量在这次战争中给了奥地利军队一系列沉重打击。马克思希望匈牙利革命斗争的熊熊烈火将点燃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再一次堆积起来的干柴。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继1849年1月从瑞士寄出第一篇关于匈牙利的斗争的文章以后，又写了一组文章，从政治上分析了匈牙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评论了军事进程。恩格斯对匈牙利军队的战士的英勇表示赞扬，对匈牙利革命家迅速组织武器生产和对阻碍革命斗争的人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表示钦佩。

恩格斯分析了匈牙利革命战争期间的力量的配置，从革命利益角度研究了历次民族运动，对各个民族在这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作出了评价。大家知道，在有剥削的社会里，阶级对抗是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剥削阶级为了自私的目的，就利用民族不睦。他们根据情况，利用欺骗或暴力，使人民卷入侵略战争，使人民同正在争取社会解放和民族解放的民族去作战。1848—1849年，当剧烈的民族冲突阻碍了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残余的斗争时，统治阶级就力图强迫一些民族扮演反革命的角色，唆使他们去反对那

些为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而斗争的民族。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根据各民族在革命中的作用，将它们划分为革命的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

列宁认为，根据1848年和1849年的具体历史条件，对民族作这样的评价是正确的，是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丝毫不矛盾的。他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是把在欧洲充当‘俄国前哨’的‘一整批反动民族’同德国人、波兰人、马扎尔人等‘革命民族’直接地肯定地区分开来的。这是事实。在当时指出这个事实，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在1848年各革命民族为自由奋斗过，当时自由的主要敌人是沙皇政府，而捷克人等确实是反动民族，是沙皇政府的前哨。”^①

226 《新莱茵报》上的文章在正确地评价奥地利斯拉夫民族的民族运动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客观作用的同时，也包含某些不完全准确的，甚至错误的判断。例如，恩格斯曾发挥这样的思想：生活在奥地利帝国疆土内的小的斯拉夫民族，除波兰人以外，已不能作为独立的民族而存在，被较强的邻国所吞并将是它们不可避免的命运。恩格斯指出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集中、建立大国这一趋向，但他没有考虑到另外一种趋向，即小民族反对民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及力图建立自己的国家这一趋向。同时应当指出，恩格斯对他的预测还有一些重要的保留意见。他写道：“如果斯拉夫人在他们受压迫的某一个时期开始新的革命历史，那末他们仅用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从这个时候起，革命就会要求他们求得解放，而德国人和马扎尔人的局部利益就会在欧洲革命的更重要的利益面前消失。”^②

《新莱茵报》估计的这种可能性后来变成了历史事实。随着奥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8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34页。

地利帝国内的小斯拉夫民族的经济的发展，随着参加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群众日益广泛，随着他们的觉悟和组织性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民族运动越来越具有民主的性质，从而扩大了革命斗争的战线。在奥地利帝国内曾经受压迫和奴役的小斯拉夫民族，不仅能够取得独立的民族发展和建立自己的国家，而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对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马克思和恩格斯每天都在关心英勇而艰巨的匈牙利的斗争，认为斗争的结局不仅取决于奥地利帝国内各种力量的对比。俄国沙皇早就陈兵于西线边境，只等有利时机进行干涉。只有在德国和整个欧洲掀起革命的新高潮，匈牙利人才能得救。

3月20日在意大利重新开始的皮蒙特军队同拉德茨基将军的部队之间的军事行动是一次令人鼓舞的重大事件。但是3月23日皮蒙特军队就被击败了，主要是因为皮蒙特军队没有用革命的方法作战。恩格斯在《新莱茵报》上写道：“一个想争取自身独立²²⁷的民族，不应该仅限于用一般的作战方法。群众起义，革命战争，到处组织游击队——这才是小民族战胜大民族，不够强大的军队抵抗比较强大和组织良好的军队的唯一方法。”^①

莱茵地区起义的失败。

《新莱茵报》停刊

1849年5月初，萨克森、莱茵普鲁士和德国西南部成了革命和反革命势力斗争的战场。这场斗争是由争取承认法兰克福议会好不容易产生的帝国宪法的运动引起的。大部分德意志邦的政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61页。

拒绝承认这部宪法。4月15日，奥地利召回了驻法兰克福的代表。4月27日，普鲁士邦议会第二议院因为它敢于要求承认帝国宪法而被解散。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向法兰克福议会和德意志各邦政府发出一份照会，《新莱茵报》认为这是对解散议会的直接威胁^①。普鲁士确实已经在萨克森边境和莱茵地区集中了兵力。这些反革命行动在人民群众中激起了强烈的义愤。

5月3日，德勒斯顿爆发了起义，波尔恩和巴枯宁在起义中起了重要作用。尽管起义者——主要是工人和手工业者——十分英勇，但经过六天的激战还是被萨克森和普鲁士军队击败了。

5月5日，各政治组织在科伦召开区代表大会的前一天，谣传当局又要实行戒严了。《新莱茵报》编辑部号召工人，当“整个德国正处在内战前夜，工人们也许很快就有可能举行实现自己要求的发动”^②的时候，不要受人煽动。

5月6日，各民主协会和工人联合会在科伦举行代表大会。代表们的一次联合会议决定支持帝国宪法，但是前提条件是：法兰克福议会必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革命的立宪机构。由于普鲁士政府声称要征集一部分后备军，准备用它来对付人民，莱茵省的骚动就更不可收拾了。5月9日，爱北斐特开始起义。恩格斯一听到这个消息，就立即赶回他的家乡。当地的安全委员会委派他领导修筑街垒的工作。他计划把起义扩展到整个贝尔格—马尔克区，但是不久安全委员会在吓破了胆的爱北斐特资产者的压力下，决定把恩格斯逐出城市。工人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保护他，但他不愿引起起义者阵营内部的分裂，离开了爱北斐特。

《新莱茵报》写道：“让那些对我们的编辑表示如此深厚的情谊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49—5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65页。

和如此依恋不舍之情的贝尔格和马尔克的工人记住，现在这个运动只是另一个更重要千百倍的运动的序幕，在那个运动中涉及到的将是他们工人切身的利益。这一新的革命运动将是现在这个运动的结果，而只要这个新的运动一开始，恩格斯便会——这一点工人们可以相信！——象《新莱茵报》的所有其他编辑一样，立刻出现在战斗岗位上，那时世界上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使他离开这个岗位了。”^①

继爱北斐特起义之后，莱茵省其他城市——杜塞尔多夫、佐林根、伊塞隆的孤立的起义，也都遭到了失败。只是在巴登和普法尔茨这些南德意志邦，起义者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成立了有起义军支持的临时政府。

在五月起义的危急日子里，《新莱茵报》的文章的语调特别激昂慷慨。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在整个德国，人们都因为我们在普鲁士的头等堡垒里敢于面对着八千驻军和岗哨做出这一切事情而感到惊讶；但编辑室内的八枝步枪和二百五十发子弹，以及排字工人头上戴着的红色雅各宾帽，使得我们的报馆在军官们眼中也成了一个不能用简单的奇袭来夺取的堡垒。”^②

《新莱茵报》的这些大胆的揭发性的文章，使政府越来越惊恐不安。4月和5月初，内务大臣曼托伊费尔多次要求科伦当局对该报的编辑提出诉讼。当时，为反对他们而制造的诉讼案已达二十三次之多。但是，检察机关在陪审法庭已经有过两次失败的教训，因此不敢同《新莱茵报》再进行一次法律上的争议。只是在莱茵省起义被镇压以后，当局才敢采取早已准备好的措施。5月16日，²²⁹马克思旅行归来，接到了政府的命令，要他这个外国人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普鲁士，他被剥夺了外人待遇法，因为它已遭到他“粗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598—5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4页。

之破坏”^①。

随后，其他编辑也受到了惩罚。德朗克和维尔特这两个非普鲁士臣民，同样被迫离开普鲁士；恩格斯因参与爱北斐特起义被指控犯了刑事罪。其他编辑们也面临着法律制裁的威胁。

这一切都意味着《新莱茵报》的结束。5月19日该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一号。

马克思在社论中揭露了关于驱逐他的命令的虚伪的政治理由：“最近几号”的报纸煽动居民蔑视现存政府，号召暴力革命和建立社会共和国^②。马克思愤怒地回击敌人：“试问，难道只是在‘最近几号’《新莱茵报》里我们才认为必须明显地以社会共和的精神发表言论吗？难道你们没有读过我们关于六月革命的文章，难道六月革命的灵魂不就是我们报纸的灵魂吗？

那末你们干吗要玩弄虚伪的词句，制造荒唐的借口呢？

我们铁面无情，但也不向你们要求任何宽恕。当轮到我们动手的时候，我们不会用虚伪的词句来掩饰恐怖手段。但是保皇恐怖主义者，上帝和法律所宠爱的恐怖主义者，在实践上是残酷的、卑鄙的、下流的，在理论上是胆怯的、隐讳的、虚伪的，而在这两方面都是无耻的。”^③

马克思骄傲地写道，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机关报也是德国人民的真正的民族利益的勇敢的、始终不渝的捍卫者：“我们拯救了我们祖国的革命荣誉。”^④

报纸在告科伦工人书中写道：“《新莱茵报》的编辑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对你们给予他们的同情表示衷心的感谢。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⑤

^{①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02—603页。

^④ 同上书，第603页。

^⑤ 同上书，第619页。

弗莱里格拉特应马克思的请求，写了一首诗作为《新莱茵报》的告别词：

230

“别了，战斗的世界，
别了，英勇的军旅！
别了，硝烟弥漫的疆场，
别了，刀剑和长矛！

别了，但不是永别，
他们消灭不了我们的精神，弟兄们！
当钟声一响，生命复临，
我将立即披甲返程！……

我这个被放逐的叛乱者，
作为一个忠实于起义的人民的战友，
将在多瑙河畔和莱茵河边，
用言语和武器参加战斗！”^①

恩格斯在回忆《新莱茵报》的最后日子时说：“我们不得不交出
自己的堡垒，但我们退却时携带着自己的枪枝和行装，奏着军乐，
高举着印成红色的最后一号报纸的飘扬旗帜……”^②

在德国西南部

“红色的一号”报纸刚出版，马克思就离开了科伦。但是在这

① 斐·弗莱里格拉特《〈新莱茵报〉的告别词》，载于《新莱茵报》1849年5月19日第1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84页。

之后普鲁士当局仍然没有停止对马克思的迫害，并对他、维尔特和德朗克再次提出诉讼。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普鲁士反革命庆祝胜利的时候，科伦违警法庭在5月29日就作了缺席判决，宣布他们无罪了。

马克思离开普鲁士，前往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他和已经到达那里的恩格斯，试图影响全德国民议会的左派议员——在反动派和自由派退出以后的多数派。当时法兰克福议会的处境绝不是没有希望的。德国西南部已经拿起了武器，军队到处发生动摇。奥地利忙于同匈牙利人作战，普鲁士国内的局势也十分不稳。许多事情都取决于国民议会的态度，取决于它的果敢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会见国民议会左派议员时，劝他们公开参加已经爆发的起义，号召各地人民拿起武器，要求起义者武装力量开往法兰克福去直接保卫国民议会，宣布所有君主、大臣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不受法律保护，建立一个稳固的强有力的革命的执行机构，废除封建贡赋以争取农民。这样做就会使起义具有全德国的性质，使起义从防御的策略转为决定性的进攻。但是，这个大胆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计划没有得到国民议会左派议员的支持。他们宁愿让事件自行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继续努力也无济于事，就前往已经起义的巴登。

到巴登以后，他们发现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也是优柔寡断和摇摆不定的。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政府虽然拥有军队、武器和经费，却毫无作为。在同政府成员会晤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宣称，一开始就该向法兰克福进军，但是这个时机已经错过了，现在如果在匈牙利没有坚强有力的打击，或者在巴黎没有新的革命，要想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这个观点激怒了大部分与会者，但是事件已经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正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巴登前往另一个起义中心普法尔茨。他们

在凯则尔斯劳顿发现那里的人们也同样是漫不经心的。临时政府，除了它的成员德斯特尔，甚至没来采取防御措施。过了几天，马克思和恩格斯离开凯则尔斯劳顿。他们在去宾根途中和几个朋友一起被黑森士兵逮捕，并被押送到达姆施塔特，后来又从那儿押送到法兰克福，最后在法兰克福获释。

在宾根，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后一次以《新莱茵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文章。马克思在1849年5月31日致《法兰克福报》编辑部的声明中通知自己报纸过去的通讯员和读者，自5月25日以来由海·贝克尔在科伦编辑出版的自称为《新莱茵报》继承者的《西德意志报》，同《新莱茵报》毫无关系^①。从这个声明可以看出，马克思一直没有放弃一有机会就使报纸复刊的想法。

两位朋友在宾根分手了。马克思带着德斯特尔交给他的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的委托书前往巴黎。恩格斯返回普法尔茨，他想“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了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据《新莱茵报》唯一能占据的地位——士兵的地位”^②。

不久，恩格斯成了维利希的副官。维利希是志愿兵部队的指挥，这个部队中有许多工人，他们都是表现良好、纪律严明的战士。恩格斯参加了四次战斗，其中一次是拉施塔特要塞附近进行的会战。维利希的部队掩护了战败的巴登—普法尔茨军队撤退，最后于1849年7月12日离开德国领土进入瑞士境内。

重返巴黎。六月十三日

马克思去法国，以为那里已经成熟的革命危机将以无产阶级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71—172页。

的胜利而告终，这个胜利将有力地支持德国西南部、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斗争，再一次推动欧洲的革命。

6月初，马克思到达巴黎，立刻同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领导人以及各秘密工人团体的领导人取得了联系。6月7日，他给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正同全体革命派会晤。”^①这时，恰好是决定性的事件发生的前夕。路易·波拿巴总统再次对罗马共和国采取军事行动，从而公然破坏宪法关于法兰西共和国永远不侵犯其他国家的自由的规定。左派报刊要求议会反对派——小资产阶级山岳党——采取有力措施。6月11日，山岳党首脑赖德律-洛兰在立法会议上声明：“共和派一定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②

马克思在民主派报纸《人民之友》发表的《六月十三日》一文中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件。这篇文章表明，马克思不仅是事件的见证人，而且还是显然试图影响事件发展的直接参加者。正象马克思报道的，在巴黎成立了一个秘密的社会主义委员会，它号召举行起义来突袭政府。一旦胜利，该委员会就宣布自己是公社即无产阶级政权，这个公社要与新的正式政府并行活动。但是，山岳党坚决拒绝了立即举行起义的建议。尽管山岳党在议会中曾经以使用武力进行威胁，现在却决定在6月13日举行和平示威游行。

当天凌晨从比利时到达巴黎的维尔特，在6月16日给他兄弟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这次示威游行的情况。他和几个熟人（用他的话来说：“我们党内的人”）一同到百合花路，而马克思就住在这条路的45号。此后他走的路显然也就是马克思、斐·沃尔弗和德朗克走的路了。

233 维尔特和他的伙伴们一到林荫大道，就立即加入正在向立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2页。

议会行进的游行队伍的前列。当队伍走到和平路时，受到了龙骑兵的冲击。这时传来了“拿起武器！”的喊声。维尔特和他的同志们急忙赶到民族宫，那里是发武器的地方。但是，为准备起义用的武器库已被政府军队占领了。人们到处都在构筑街垒，但是，这也只能暂时阻挡一下用军刀杀戮赤手空拳的人们的龙骑兵^①。

山岳党的“议会起义”就这样不光彩地结束了。工人们从一开始就怀疑他们的计划，并不支持他们在游行队伍被驱散后对人民发出拿起武器的号召。马克思写道：“1849年6月13日只是对1848年六月的一种报复。那时‘山岳党’抛弃了无产阶级，现在无产阶级抛弃了‘山岳党’。”^②

6月13日这一天不仅是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失败的一天，马克思说，这也是“我们在全欧洲的党”的沉痛的一天^③。

巴黎实行了戒严，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马克思每天等待着被捕或者被驱逐。7月初，燕妮带着三个孩子到达巴黎，马克思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燕妮为了能够到达巴黎，不得不通过约瑟夫·魏德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把不久前才从布鲁塞尔当铺赎回的银制餐具再典当掉。这时马克思十分贫穷。报纸停刊后，从订户那儿得到的收入和出卖快速印刷机的钱，都付给了排字工人、印刷工人、纸商和通讯员，付给了编辑们，以便使他们能够躲藏起来。甚至还不得不借了三百塔勒。在巴黎，马克思真是一文不名，只好向拉萨尔借债。尽管马克思请他不要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但他还是进行公开募款，这就引起了在这种问题上非常审慎的马克思的愤怒的抗议。他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写道：“我宁愿过最贫困的

① 格奥尔格·维尔特1849年6月16日给威廉·维尔特的信，见《格奥尔格·维尔特全集》1957年柏林版第5卷第309—3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628—629页。

③ 同上书，第629页。

生活，也不愿公开求乞。”^①

234 7月19日，马克思接到法国当局关于命令他到布列塔尼的摩尔比安省去的通知。他向内政部长提出抗议，于是驱逐令就暂时停止了。

7月底，马克思终于得到了他十分悬念的恩格斯的_{消息}。恩格斯在斐维写给燕妮的一封信中，叙述了他们在宾根分别以后的全部经历，他十分关心地询问燕妮，他在巴登听说马克思在巴黎被捕的谣言究竟是真是假。“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是多么为此焦急不安，我万分迫切地恳求您安定我的心，把有关马克思的命运的_{真实情况}告诉我。”^②

马克思立即给他的朋友写了回信：“我一直为你感到十分的不安，昨天接到你的亲笔信，异常高兴。”^③他建议恩格斯写一部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史或者写一篇关于这次革命的抨击性文章，表达《新莱茵报》对民主派的总的态度。他还向恩格斯叙述了他几位编辑的行踪。

马克思本人未来的命运取决于法国当局。8月23日，一位警官来到他的住宅，命令“卡尔·马克思和他的夫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离开巴黎”。这样残暴的措施简直是接二连三地加在马克思的身上，1845年他被逐出巴黎，然后在1848年被逐出布鲁塞尔，1849年被逐出科伦，现在又一次被逐出巴黎。

马克思把他将被法国政府驱逐到布列塔尼的一个有害健康的沼地去的消息告诉恩格斯，他写道：“你知道，我不会同意这个变相的谋杀。所以我要离开法国。”^④因为没有搞到去瑞士的护照，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27页。

② 同上书，第526页。

③ 同上书，第156页。

④ 同上书，第160页。

决定去伦敦，还希望在那里创办一个杂志。马克思建议恩格斯也尽快去英国：“在伦敦我们将有事情干。”^①

马克思因为没有钱，只好把即将分娩的妻子和孩子们暂时留在巴黎。燕妮费了很大的周折才从警察局那里得到住到9月15日的许可。

8月24日，马克思动身去伦敦，去到这个新的、结果居住终身的流放地。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次历史考验

在要求马克思的精力极度紧张的革命年代，充分显示了他的天才、永不枯竭的干劲、百折不挠的意志、自我牺牲精神和革命战士的满腔热忱。列宁认为，马克思直接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革命斗争，是他生平事业的“中心点”^②。

在各个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这个具有丰富的多方面的思想内容的伟大理论有时以它的这一方面，有时以它的那一方面突出地表现出来。在1848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在1848—1849年，政治思想、战略和策略问题则占据首要地位。

马克思在1848—1849年提出的光辉的策略，说明他是历史上第一个在科学的基础上制定政策的革命活动家，这些策略是对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经验宝库的宝贵贡献。

马克思制定的政策没有使革命取得胜利，这是由“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60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729页。

未成熟的那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①的特点所决定的。

尽管革命失败了，但 1848—1849 年的风暴不仅在实践中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证实了它比其他社会主义理论更卓越，而且是这一伟大学说的发展和充实的巨大源泉。这段时期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是马克思理论思想中新的伟大成就的基础，这些成就在他总结革命教训的那些著作中得到了经典的表述。

^① 《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17 页。

第 六 章

总结革命的教训

236

“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

在伦敦的最初几个月

当马克思到达伦敦的时候，在不久前革命烈火燃烧的欧洲各国，反动势力不是已经十分猖獗，就是正在蠢蠢欲动。法国1849年6月13日事件以后，执政的“秩序党”（它联合了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两个保皇派）的反革命政策进一步为波拿巴专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849年夏天，继德国的最后一批革命基地被消灭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利用沙皇部队镇压了匈牙利革命。欧洲反革命的联合势力还扼杀了意大利的革命运动。

237

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并没有使马克思灰心丧气，他始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坚信欧洲必然要进行改革。各个阶级在革命本身进程中的态度使他更加相信在实现这些改革中工人阶级能够起决定性的作用。

尽管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损失，马克思还是明确地认识到，1848—1849年的战斗并不是徒劳无益的。这些战斗动摇了一系列国家的封建君主制的基础，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建立和发展，为进一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性准备了条件。1848—1849年革命使群众开始不再抱有幻想，打击了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显示了以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政策无可争辩的优越性。

马克思认为当时的这种局势是公开革命斗争中的被迫的停歇，接着而来的必然是革命戏剧的第二幕。有各种迹象表明这种停歇是不会持久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马克思才看出新的革命高潮不会迅速到来。但是，即使期望平静时期是短暂的时候，马克思也完全没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那种幻想，自以为很快能掌握人民的命运。马克思懂得，不管情况发生什么变化，不论反动势力的统治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要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需要恢复和扩大被破坏的联系，鼓舞那些消极悲观的人，为临近的革命战斗组织和训练无产阶级的骨干。这就是马克思在侨居伦敦的最初几个月所面临的迫切的具体任务。

重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马克思仍然认为同盟是未来的、更广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应当成为团结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组织形式。在新的条件下，实际的革命工作的重心不得不重新转
238 入同盟的地下秘密活动。后来恩格斯写道：“象 1848 年以前一样，形势使得无产阶级任何公开组织都不可能；因此，不得不重新秘密地组织起来。”^① 共产主义者同盟本身需要加以改组和巩固。原来的中央委员会实际上已不起作用；大多数支部和区部已经瓦解。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01 页。

盟的许多积极的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或者被捕了，一部分盟员脱离了运动，许多人下落不明，失掉了联系。

马克思到达伦敦后立即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领导机关。当时，除了恩格斯、沙佩尔和在维护帝国宪法运动中牺牲的莫尔，以前各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聚集在英国的首都。根据马克思的坚决要求，恩格斯离开了瑞士，他取道热那亚，乘船环绕比利牛斯半岛并穿过比斯开湾，经过五个星期的航行于11月10日左右到达伦敦，并立即参加了重建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卡尔·沙佩尔在维斯巴登被监禁期满后于1850年7月初才到达伦敦，并且也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除了老的骨干，委员会还补充了新的力量。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颇有才干的军官奥古斯特·维利希于1849年10月被选进了中央委员会。他是经恩格斯的介绍从瑞士到达伦敦的。康拉德·施拉姆也成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他是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曾在1849年9月勇敢地逃出普鲁士要塞。参加委员会的还有同盟的著名活动家格奥尔格·埃卡留斯和卡尔·普芬德。

1849年9月初，马克思参加了与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密切联系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马克思认为对工人进行理论教育具有重大意义，他从1849年11月起一直到1850年秋天在这个协会中讲演政治经济学和《共产党宣言》。

帮助革命的流亡者是聚集分散的革命力量的一项迫切的工作。每天都有大批流亡者到达英国的首都。他们为了逃避国内的迫害而奔赴政治上比较自由的国家。但是他们在这里也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大多数人极端贫穷，吃住无着。

马克思本人在伦敦也是过着贫困的生活。他在1849年9月5日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写道：“现在我确实处境困难。我的妻子临近产期，15日她又必须离开巴黎，我不知道到哪里去弄到必要的 239

钱,使她能够动身并在这里安顿下来。”^①好不容易弄到一笔路费,燕妮才带着三个孩子于9月中到了伦敦。但是马克思把个人的困苦置之度外,全力援救陷入困境甚至濒于死亡的革命战士。

在马克思倡议下,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刚刚到达伦敦的流亡者于1849年9月18日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选出了一个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马克思被选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委员会中除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还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委员会宣布,将给予所有的政治流亡者以帮助,不管他们的信仰如何和属于什么党派。然而在流亡者各派之间爆发的斗争也很快扩展到这个救济组织。为了使救济贫困者的工作不受各种流亡者集团互相倾轧的干扰,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决定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首领分道扬镳。1849年11月,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体会议上,该委员会改组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这次参加这个委员会的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马克思(当选为主席)、恩格斯、鲍威尔、普芬德和维利希。委员会公开宣布,在发放救济时,委员会将首先面向流亡者中无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的一翼。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马克思深深感到,要解决工人运动的具体任务,应当同时进行大量的理论工作来帮助无产阶级群众正确地吸取过去革命战斗的教训,更好地迎接新的革命。必须把革命年代产生的思想系统化,重新分析各国阶级斗争的变化,做出应有的理论结论,进一步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学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35页。

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48年革命的教训所作的理论总结时写道：“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①

为了对革命作出科学的总结，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宣传革命理 240
论，马克思认为暂时以杂志的形式重新出版无产阶级自己的定期刊物是非常重要的。自从《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他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设想，杂志应当在新的条件下继续执行报纸的战斗的革命路线，应当成为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接近同盟的无产阶级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和理论教育的工具。它应当成为同盟的机关刊物，成为同盟的思想的传播者。因此杂志定名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这个名称还表明，编辑们没有屈服于警察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报纸的迫害，并准备一有机会就使报纸复刊。

在1849年的整个秋冬两季，马克思都在紧张地筹备杂志的出版。他向许多朋友和熟人发出信函，要求帮助筹集资金，寻找出版商，挑选撰稿人，征集股份。

1849年底，同汉堡的印刷厂主克勒尔、舒贝特书局签订了出版和发行杂志的合同。

1849年12月15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出版启事》，其中谈到，杂志将于1850年1月由马克思主编出版。它“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②。

尽管马克思的朋友们作了各种努力，但是到了1月还没能弄到必要数量的款项。出版杂志所需要的经费到3月才收齐。1850年3月6日杂志在汉堡出版了第一期。在杂志的封面上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住在地伦敦和杂志印刷的地点汉堡，另外还有纽约，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页。

因为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有许多人流亡在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在那里找到推销杂志的基地。

1850年，杂志一共出版了六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缩短各期杂志出版的间隔时间，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杂志的最后一期，即
241 第5和第6两期合刊于1850年11月底出版。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的缺乏，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继续出版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成功。

《评论》上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德国农民战争》、《英国的十小时工作制法案》，以及他们合写的书评和国际述评。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吸收他们的战友威廉·沃尔弗和格奥尔格·埃卡留斯为《评论》撰稿。马克思竭力帮助埃卡留斯写《伦敦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的长篇文章。他鼓励先进工人在刊物上发表意见，因为他们有敏锐的洞察力，善于运用他们所掌握的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埃卡留斯的文章写的编者按语中写道：“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①

杂志出版的时间虽短，但是它完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任务。六期篇幅不大的杂志包含了非常丰富的思想，探讨了各种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

《法兰西阶级斗争》

马克思关于法国革命事件的这一著作，是总结革命经验的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486页。

重要的著作之一。这部著作的基本部分写于1850年1月至3月，并以《从1848到1849年》的简短标题发表在《评论》的头三期上。多年之后，在1895年恩格斯准备再次出版这一著作时，把马克思和他合写的《国际述评(三)》(1850年10月)作为最后一章，即第四章收入这本著作，并把这部著作定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在总结不久前的革命斗争的经验时，马克思所以注重法国并不是偶然的。从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起，法国就在欧洲历史上起着主要作用。在法国阶级斗争具有最明确和最尖锐的形式。没有一个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象法国工人阶级那样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表现得那么积极和英勇。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马克思第一次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²⁴²研究了整整一个历史时期，对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原因、性质和进程作了最卓越的分析。他在这部著作中具体阐述并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原理：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以及经济基础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关于阶级斗争和政党斗争的重要意义，关于革命变革在历史中的地位 and 人民群众的的决定性作用，关于国家和社会思想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对马克思来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万能的死板公式，而是进行具体分析的指南。在承认经济的决定意义的同时，马克思绝没有忽视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国家、政党、思想派别、个别历史人物的作用。相反地，这有助于马克思弄清上层建筑(政治和意识形态)对历史进程产生积极影响的那些具体形式。同时，与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相反，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这种影响的限度，看到不同的政党、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的立场取决于反映社会生产发展趋向的这样或那样的物质利益和阶级利益，而社会生产的发展归根到底又决定着历史的进程。

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中全面地发挥了这样的思想：社会生活中各革命时期是合乎规律的并有巨大的意义，革命是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他形象地把革命叫做“历史的火车头”^①。马克思指出，革命大大地推动历史的进程，促进人民群众无穷无尽创造力的发挥，人民群众在革命时期政治上十分积极，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建立崭新的、空前进步的社会生活方式。马克思写道：“在这运动漩涡中，在这历史的动荡的痛苦的进程中，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人的起落中，法国社会各阶级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现在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②

法国的经验最明显地证实了马克思在革命进程中所作的结论：欧洲资产阶级把它在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斗争中的革命传统
243 抛弃得越来越多了。他以独特的政论笔法和历史的洞察力描绘了法国资产阶级政治上退化和走向反动的情景。法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特别表现在对待无产阶级运动的态度上。在革命的最初日子里，资产阶级不仅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它挑动无产阶级在1848年6月举行起义，然后对无产阶级进行血腥镇压），而且是阻碍国家沿着革命和民主道路发展的保守势力。

在这种条件下工人阶级就成了革命运动和历史进步的主要力量。它必须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并着手解决各项社会主义任务。

由于法国资本主义关系不够发达而产生的幼稚性，法国无产阶级在革命的第一阶段还没有认清自己的阶级使命，被资产阶级的幻想所迷惑，以为二月的胜利建立了不仅保卫资产阶级利益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② 同上书，第448页。

且也保卫无产阶级群众利益的社会共和国。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在与资产阶级反革命进行决死的战斗中才能认清自己本身的阶级利益。1848年的巴黎六月起义在形成法国无产阶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形成国际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方面是一个转折点。马克思说，这次起义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①。

马克思认为，虽然起义者失败了，接着又遭到残酷的镇压，但这次起义最重要的、积极的后果是法国无产阶级摆脱了幻想。失败向工人阶级揭示出一个真理：希望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免受剥削只是一种空想。马克思在六月失败后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②。

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从历史论证上解决了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同盟军问题。在1848—1849年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他通过各种形式提出工人阶级必须把劳动人民中非无产阶级阶层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的思想。革命年代的经验教训使他把这一思想 244 变成了一条经过全面阐述的和明确表述的原理，这一原理已经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学说的一部分。除了无产阶级本身的幼稚以外，马克思认为六月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没有支持工人。但是，马克思还是相信，这些阶层的这种立场是暂时现象并且是违背他们本身的真正利益的。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② 同上书，第417页。

③ 同上书，第477页。

马克思写道,促使农民同工人阶级接近的原因是,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只有资本的瓦解,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政府,才能结束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地位的低落。”^①这样,马克思根据法国革命的经验做出了极其重要的理论结论和政治结论: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如果大量的农民和小资产者不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并把无产阶级看做是自己的先进战士,无产阶级就不能动摇资本主义制度。

马克思指出城市小资产阶级阶层也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同时尖锐地批评了他们的政治代表和思想家。他以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山岳党的行为为例,指出山岳党完全没有能力独立地领导革命斗争。

1848—1849年革命,不仅使小资产阶级民主制遭到破产,而且也使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遭到破产。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加深了对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流派的批判,指出这些流派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站不住脚的。他还详尽地评述了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强调勃朗在革命时期的行为以及参加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是由他的错误理论造成的,这种理论认为阶级合作和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工人团体就是达到社会主义的手段。勃朗以社会主义民主派的领袖自居,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走狗,是“资产阶级手中的玩具”^②。他当上了工人问题委员会(卢森堡委员会)主席之后,便在无产阶级的散播一种有害的幻想,说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头目准备通过“劳动组织”来认真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把卢森堡委员会讽刺地称为“社会主义的礼拜堂”、“一个虚弱无能的部……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4页。

^② 《列宁全集》第25卷第45页。

部”^①。他认为该委员会活动的失败是勃朗的空想理论和妥协策略破产的明显表现。

针对忽视阶级斗争的各种空论的社会主义体系，马克思提出了革命的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工人阶级在阶级斗争过程中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真正改造社会的武器。马克思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②

马克思在阐述科学共产主义关于社会的革命改造道路的基本原理时，第一次在自己的已出版的著作中使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这不仅使用语更加确切，而且使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思想更加深刻。马克思强调指出，这种政权应当是革命过程深入的结果，是革命过程进一步发展的手段和形式。他在1848年得出的结论是：要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必须有一个能够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一切阴谋的强有力的政权——人民的革命专政。面临着极其复杂和宏伟的任务的工人阶级专政在更大程度上应该具备这种能力。这就是马克思在阐述他的共产主义革命学说真正本质时的思想过程。

《法兰西阶级斗争》科学地阐述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社会的经济改造及其根本改革中的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 246 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01页。

② 同上书，第479—480页。

③ 同上书，第426页。

为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而斗争。

三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重新恢复起来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立即开始改组同盟的地方支部。1850年初，马克思写信给科伦的同盟盟员彼得·勒泽尔，要求他重建科伦支部并尽一切可能在莱茵省其他城市筹建支部。

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几份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对同盟的改组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些文件规定了同盟盟员，首先是在德国的同盟盟员的行动纲领，陈述了同盟在各国的状况，提出了迫切的口号和要求。

这些文件的第一份，即1850年3月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同盟重建工作的思想基础。

但是，三月的《告同盟书》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同盟在那个时期的活动范围，因为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总结1848—1849年革命经验和拟定无产阶级在未来战斗中的策略的著作之一。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在纲领和策略方面的发展，这些纲领和策略的全部意义只是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以后各个阶段才显露出来。列宁认为这个文件是“非常有意义和特别富有教益的”^①，它是制定无产阶级政党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革命策略路线的依据，是论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論的依据。

《告同盟书》的作者在这个文件中发挥了自己的如下结论：无产阶级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划清

^① 《列宁全集》第8卷第434页。

界限，以保障自己政治立场的独立性。文件指出，特别要注意的是德国的新的革命，由于自由资产阶级的破产，完全可能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代表人物执掌政权。根据他们在1848—1849年革命中的政治说教和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难得出结论：立宪民主派和共和派的小资产者将阻碍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也会象自由资产阶级在1848年出卖他们那样出卖人民群众。因此，必须坚决反对²⁴⁷把无产阶级拉入小资产者组织的一切企图，坚决反对把无产阶级降低到“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德国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一个具有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的独立的工人政党，把同盟的每个支部变成合法的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

马克思和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划清界限，反对任何宗派主义，但决不否认在斗争的一定阶段上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采取共同行动的意义。他们在《告同盟书》中阐明，为了同反革命力量作斗争，无产阶级政党可以和民主派结成暂时的同盟和联合，但必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实行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的政策。《告同盟书》根据同样的观点分析了工人参加中央与地方代议机关的选举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参加这种选举活动的必要性，同时认为工人阶级到处都要尽可能从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中间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相并列。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希望尽快结束革命，只实行某些改革，相反地，无产阶级关心的是革命进程的不断发展和深入。

马克思在他以前的著作中已经对不断革命的学说作了叙述，但是在三月的《告同盟书》中，不断革命的思想表述得更加详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6页。

马克思不断革命的学说的实质在于：革命进程必须经历许多阶段，而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和无产阶级革命阶段之间不一定要有一个长时间的、平静的、不革命的发展的时期。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到革命有可能较快地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只要群众的革命热情不断增长，从政权中清除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直至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实现这种转变。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这种转变对劳动人民和整个历史的进步最为有利。“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
248 国家政权……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①

因此，《告同盟书》的作者拟订了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为向无产阶级革命转变准备条件。工人应当成立自己的革命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员会，以与革命胜利后产生的正式的小资产阶级政府并立，借此把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的活动置于无产阶级的监督之下。此外，工人应该普遍武装起来并建立自己的军事组织，其中包括无产阶级近卫军。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政府”和无产阶级军事组织是能够加深和扩大革命政治危机的力量。他们把这些“政府”看作未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萌芽。

《告同盟书》涉及到无产阶级在土地问题上的一系列策略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发展了他们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中阐明的那些原理；他们指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工人应当把没收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不应当象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打算的那样把它们分给农民。应当利用这些土地建立一些由联合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来的农业无产阶级经营的大规模农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种措施能加强工人同农村中最穷苦的、最受剥削的阶层的联系，这对于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农民中的其他阶层将会实际看到根据集体原则建立的大规模农业的优越性。

《告同盟书》的作者没有打算在这里制订农民问题的详细纲领，只是指出了革命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无产阶级革命阶段在这方面出现的任务。但是，工农联盟这一伟大思想的某些方面在这里²⁴⁹却有所反映。这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他们的不断革命的学说中这个思想占有重要的地位。民主派企图造成一个稳定的农民小资产阶级，相反地，他们指出，只有不间断的革命才能使德国农民摆脱农业中资产阶级关系建立后出现的后果——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因此，德国农民为了避免法国农民弟兄的命运，客观上也要关心无产阶级的胜利。另外，工人阶级也需要在农村中有一些据点，其中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到的在过去地主的土地上建立的大规模的集体农场。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通篇贯穿着一个思想：必须尽可能把革命推向前进，一直到建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工人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

三月的《告同盟书》交给了亨利希·鲍威尔，他在1850年3月底被中央委员会派往德国去加速同盟的改组工作。在同盟的科伦支部和其他支部的盟员的协助下，鲍威尔把这个文件加以复制并广为散发。

鲍威尔的使命完成得很有成效。除了科伦，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哈瑙、美因兹、维斯巴登、汉堡、施韦林、柏林、布勒斯劳、哥丁根、利格尼茨、格洛高、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班堡、维尔茨堡、比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页。

雷菲尔德和斯图加特等地，改组了同盟支部或建立了新的支部。同盟的支部对许多合法的工人组织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共产主义者同盟只有同群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并把合法的工人组织变成自己的支柱，才能变得坚强有力和发挥作用。

马克思也采取步骤在其他国家（包括瑞士）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斯特·德朗克被作为特使派往瑞士。但是他的使命完成得不太成功，主要是因为瑞士流亡者中小资产阶级影响太大。

1850年6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第二个《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详细地报道了同盟组织在德国、比利时、瑞士、法国和英国的情况，并就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给地方的同盟活动家作了指示。六月的《告同盟书》由同盟的特使、旋工威廉·克
250 莱因带往德国去散发。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活动对于团结革命力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的工作不只是援助受反革命迫害的人。它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明显，它促进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重新建立，把优秀的政治流亡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委员会的全部宣言、报告和声明除了在英文报纸上发表以外，还同时在德国民主报刊上登载。它们提醒德国解放斗争的拥护者，流亡国外的革命力量并没有游手好闲，而是正在准备迎接新的战斗。尤其重要的是，委员会的全部文件上都有在革命者中负有盛名的马克思的签名。

马克思和他的战友在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有成果的。特别是在德国，同盟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尽管有个别的失败，到了1850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成了一个结构严密、协调一致、在各地有了牢固基地的组织。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期望新的欧洲革命不久就会发生，他认为各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代表的国际联合将有助于革命的胜利。1850年春，马克思引导宪章派的左翼和布朗基派流亡者代表建立更广泛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将成为它的核心。这将提高同盟的国际意义并促进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英国和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传播。

马克思所以要同宪章派和布朗基派建立更紧密的联合，是因为他认识到他们在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尽管他对他们的弱点看得非常清楚。哈尼、琼斯和宪章派的其他左翼代表在1848年革命以前就倾向科学共产主义了。在英国无产阶级斗争普遍低落时期，他们在英国工人运动中继续表达革命的倾向。在所有的法国社会主义小组和流派中，布朗基派是最接近科学共产主义的。尽管奥古斯特·布朗基本人及其亲密追随者的世界观总的来说还没有超出巴贝夫的空想共产主义的界限，尽管他们继续遵循三十年代秘密革命团体的密谋策略，马克思仍然对布朗基很尊敬，高度评价这位杰出的政治斗士的实践经验和革命嗅觉。在革命年代布朗基站在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左翼。他的坚定的立场引起资产阶级各阶层对他的仇恨。1848年4月，布朗基被判十年监禁。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布朗基叫做“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①。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称赞了这位勇敢的革命者，后来又探求同布朗基的拥护者接近和共同行动的途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30页。

1850年4月中旬，在伦敦签署了关于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定。签名的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和维利希；宪章派左翼代表哈尼；布朗基派流亡者代表维迪尔和亚当。协定的第一条规定了世界协会的纲领性原则：“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①

因此，协会的纲领包含一些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然而，同布朗基派的这种联系是不牢固的。不久他们就开始破坏协定的条款，企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同盟建立联系，该组织对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定中第一条规定的共产主义目标采取明显的敌对态度。后来布朗基派流亡者的首领们就同马克思及其战友公开对立了。这就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秋解除了同布朗基派的协定。

马克思、恩格斯同宪章派左翼建立的是另外一种关系。还在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协定签字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大力
252 帮助哈尼反对以运动的昔日领袖奥康瑙尔为中心的改良主义调和派。他们协助哈尼创办《民主评论》杂志，帮助他在杂志上宣传革命思想。世界协会建立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同宪章派左翼的联系更牢固了。他们的文章经常刊登在重新建立的革命宪章派的报刊上。《民主评论》刊登了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片断和恩格斯的文
章。哈尼主编的另一份杂志《红色共和党人》在1850年11月发表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

然而在1851年春，哈尼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来往密切，并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605页。

宪章派的革命的一翼决裂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地谴责了他的立场。但是，他们继续全力支持仍然忠于宪章主义革命传统的琼斯。琼斯接受了马克思学说的一系列原理，他不是想简单地恢复宪章运动，而是力图在社会主义基础上重新恢复宪章运动。1851年宪章派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纲领，由于琼斯的努力，在宪章运动史上第一次公开宣布了运动的社会主义目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为琼斯在1851—1852年出版的周报《寄语人民》撰稿。1851年夏，马克思在《寄语人民》杂志上发表了《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这篇文章在许多方面补充了他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对该宪法的评述。马克思也帮助琼斯写了一些有关合作社问题的文章。这些文章打破了那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发展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就能消除无产阶级的社会灾难的幻想，并且指出只有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合作社才能成为社会改革的工具。1864年，马克思回想起这些文章时写道，他和琼斯实际上早就同舒尔采-德里奇这类“工人问题”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合作社思想进行过论战了，而拉萨尔却以为揭穿这些思想完全是他的功劳。

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琼斯捍卫宪章运动的独立的原则，反对改良主义分子那种企图使运动失去无产阶级性质而屈服于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政治影响的做法。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上的评论文章

253

马克思认为，阐明革命事件对思想领域的影响是研究革命教训的重要方面。他和恩格斯一起对1849—1850年出版的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书籍写了一些书评。在《评论》第2期和第4期上发表的这些书评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了无产阶级的思想敌人对1848—1849年革命事件和革命在整个历史上的作用的解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分析了各种最新的资产阶级历史观念和各種流行的伪社会主义理论，指出它们的阶级的和政治的涵义，从革命无产阶级运动的角度对它们做了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非常敏锐地看出，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点由于1848—1849年革命而有了转变。他们指出，面对这些年无产阶级的广泛发动，甚至曾经是进步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都丧失了科学地客观地了解历史进程的能力，实质上放弃了他们过去的那些合乎理性的思想。

为了说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分析批判了弗·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基佐这位保守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作为学者是复辟时期的那些承认阶级斗争对确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用的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但是，1848年革命使他的世界观继续往右转。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他的1850年出版的关于英国革命的最新小册子，说明“即使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①。

基佐过去曾经承认革命是合乎规律的，现在竭力贬低它的历史意义，并宣称他那个时代的革命行动都是偶然的。在过去的革命事件中，基佐特别强调和叙述的是那些很少破坏传统制度而最后以妥协告终的事件，并认为这些事件是合乎理想的。即使对这些事件，他也是给以唯心主义的解释，避而不谈它们的物质原因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47页。

阶级原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中指出基佐的下述论点完全是荒谬的：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成功了”，也就是说保证了英国不经过革命爆发进一步向立宪制度发展，这是因为英国革命具有宗教的性质，具有温和的性质，相反地，十八世纪末的法国革命则是一种破坏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证明，法国革命比英国革命优越。他们认为，由于英国资产阶级与按资产阶级方式改造经济的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英国革命是不彻底的，显然没有完成，也没有触动英国的立宪君主制。与此相反，法国革命通过各种坚决的革命措施，用把土地分成小块的办法消灭了基本上封建的大土地所有制。

“其实……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①，这是对基佐小册子的评论的最后一句话。这个结论在很大的程度上也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托马斯·卡莱尔的观点的向右转所证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当代评论》也专门写了书评。他们揭穿了他的以反动的“英雄崇拜”为基础的主观唯心主义历史观，批评他把“贵人和贤人”与群众、群氓对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在个人崇拜、英雄崇拜的掩饰下，卡莱尔实际上“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②。

夸大和粉饰个人的作用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这两个警察局密探写的关于法国革命运动的两本书时反对对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对派人士的这类虚伪的颂扬。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253页。

② 同上书，第311页。

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
255 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
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
像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篇书评明确地表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对
革命运动中的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密谋策略的否定态度。书评
的作者们强调指出，密谋家们，这些“革命的炼金术士”不想组织真
正的革命斗争，而是企图用暴力手段加速革命进程，“人为地制造
革命危机，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评论德国神学家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一
书时，指出了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市侩们的思想的破产。他们根
据唯物主义的观点揭示了，宗教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在历史
过程中的地位，并论证了，随着人们掌握社会发展的真正规律的知识，宗教必然要消失。他们还指出，唯物主义世界观在自然科学和
社会科学领域中取得胜利是克服宗教偏见的先决条件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彻底揭露反科学的社会学观点是对参
加无产阶级斗争的人进行思想教育的一种手段。

国际述评。对革命前途的估计

在 1850 年这一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三篇国际述评，发
表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 2、4 和最后一期上。这些述
评深刻地分析了欧洲各国、美洲和亚洲当时的一些经济和政治事
件，作出了一些新的、由历史的进一步发展所证实的预测。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313 页。

② 同上书，第 321 页。

和恩格斯经历过 1848—1849 年的事件,所以在这些述评中对经济特别予以注意。在探索这些事件的最终原因时,马克思越来越感到必须仔细研究经济过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国际述评中表述了一条原理:经济危机推动革命危机,相反地,经济繁荣使革命停滞不前,为反动势力的巩固创造条件。后来,他们在书信中又详尽地发挥了这些看法。列宁在摘录他们的信件时写道:“危机为**无产阶级的发动**(象 256 骑兵冲锋一样)创造条件。”^①关于恩格斯所说的长时期的繁荣已经造成了意志消沉,列宁在摘录中着重指出:“由于一段**和平时期工人意志消沉了**。”^②

在 1850 年年中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革命很快就会到来,他们认为新的经济危机即将在欧洲爆发,它会引起一次新的革命。这个观点在第一、第二两篇国际述评中都有反映。但是,当他们深入研究了已形成的经济情况,就觉得这个预测是不恰当的,并对欧洲社会发展的即将出现的前景作了另外一种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新的革命即将来临这种过早的预测,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当时过高地估计了资本主义的成熟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以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应该是社会主义革命。1895 年,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③

1850 年夏,马克思研究了前十年的经济发展以后,得出了以

① 列宁《〈1844—1883 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963 年莫斯科版第 30 页。

② 同上书,第 3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97 页。

下的结论：对 1848 年革命事件的准备起过巨大作用的 1847 年经济危机的后果已经完全消失了；新的工业繁荣已经在革命时期开始了。在 1849 年和 1850 年，工业繁荣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巩固了欧洲反动势力的阵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 1850 年秋写的第三篇国际述评中，对这些结论做了论证。他们根据大量的实际材料，指出了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经济高涨，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中开始了一个暂时的不革命的时期。“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①

对革命前景的新估计也促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考虑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他们认为同盟不要再指望在最近会爆发革命。根据相对长期的反动统治，应该寻找党的活动的新策略形式。重要的是要说服同盟的其他成员及其领导核心也接受这一看法。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又遇到了许多困难。

与维利希-沙佩尔冒险主义 宗派集团的斗争

1850 年夏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形成了一个“左派”集团，它的首领是奥古斯特·维利希和卡尔·沙佩尔，前者只是出于本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7 卷第 513—514 页。

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后者还不能完全摆脱早期工人运动的宗派密谋传统。维利希、沙佩尔及其追随者不了解新的历史情况的特点，不能在确定工人运动的策略任务时考虑这些特点。实际上他们主张的是冒险主义的策略，这在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期是特别危险的。

马克思和维利希在 1849—1850 年的冬季就已经有了意见分歧，当时马克思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里讲解《共产党宣言》。他在这些演说中说，共产主义不可能突然到来，只有通过革命发展的一系列阶段才能到达共产主义，在实行共产主义改造以前，必须解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维利希根本不懂社会发展和革命进程的规律性，他否认建立共产主义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条件，想靠少数人的意志一下子把共产主义建立起来。

当马克思期望革命很快爆发的时候，他和维利希的思想分歧还是隐蔽的。但是，在 1850 年夏他和恩格斯得出在欧洲开始一个暂时不革命时期的结论并相应地改变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策略以 253 后，情况就改变了。他们坚持革命不可避免的战略方针，同时认为，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保存和聚集无产阶级骨干，使他们得到理论锻炼，以迎接新的战斗。

维利希、沙佩尔及其信徒猛烈攻击这个新的策略，竭力怂恿共产主义者同盟采取冒险主义行动，立即在德国发动革命。这是有害的，是冒险地“玩弄革命”，而不是认真准备未来的革命战斗。

1850 年 9 月中旬，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使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陷于混乱。他们破坏章程，开始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全体会议和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中，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中央委员会中处于少数的派别分子开始在工人中散布一些同《共产党宣言》和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直接相抵触的观点。

在1850年9月15日中央委员会非常会议上发生了分裂。多数派的代表——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留斯——全都出席了会议。少数派集团中出席的有维利希、沙佩尔和列曼。弗伦克尔没能参加。

马克思揭示了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意见分歧的真正原因，认为这些分歧并不象后来维利希所断言的那样是由于私人原因产生的，而是具有深刻的原则性。马克思在发言中指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企图用假想条件来代替实际条件，认为意志这类主观因素在革命中起主要作用，这在思想上和策略上是站不住脚的。马克思说：“他们用逢迎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十五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①

259 马克思在反对派别分子时指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是他们的政治冒险主义和脱离生活的宗派策略的思想基础。在多数派赞同的情况下，马克思坚决批驳了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关于要求同盟发动德国工人阶级立即夺取政权的主张。

马克思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央委员会的多数按照章程规定，有权把少数派代表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同盟，但是他不同意采取这样的步骤，他认为生活经历会使他们改正自己的错误。同时马克思也认为必须从思想上脱离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因此提出了一个既不会使同盟分裂而领导权又不致落入宗派主义分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36—637页。

之手的分立形式：把中央委员会的职权移交给科伦区部委员会，而在伦敦组织两个彼此互不相干的区部——一个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组成，另一个由维利希和沙佩尔的追随者组成。两个区部都应该属于同盟，都接受同一个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服从它的决议，各自单独与它发生联系。马克思几次强调指出，他所建议的这个出路是为了保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统一。

沙佩尔代表派别分子发言，拒绝了马克思的方案。在讨论结束以后，维利希和列曼不等表决就退出会场。留下来的沙佩尔一再表示弃权。其余的与会者一致通过了马克思的提议。

维利希、沙佩尔及其他派别分子拒绝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建立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支持者开除出盟的决议。他们靠造谣中伤和利用一些同盟盟员的行会偏见和以为革命会早日到来的天真信念才作到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的宗派主义组织比作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瑞士的反动天主教诸州的分立主义联盟，讽刺地称为宗得崩德（单独联盟）。

由于集团的分裂行动，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能再维护同盟的统一了，所以他们认为，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进行其他形式的合作也是不适当的。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支持者在 1850 年 9 月 17 日发表声明，因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大多数会员站在分裂主义者一边，所以他们退出该协会，同时也退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1850 年 10 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与支持该集团的布朗基派流亡者公开决裂。

在人数不多、组织松散的法国和瑞士支部里，宗得崩德占了优势，然而德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支部几乎全都继续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

受到科伦全体共产主义者支持的科伦区部委员会赞同伦敦人

的 1850 年 9 月 15 日的决议，宣布自己为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在 9 月 29 日的会议上撤销了宗得崩德把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支持者开除出盟的决定，宣布解散伦敦的组织并委托埃卡留斯和沙佩尔在伦敦组织两个独立的区部^①。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拒不服从科伦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于是埃卡留斯重新建立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者组成的伦敦区部，在 1850 年 11 月 11 日建议科伦中央委员会把宗得崩德的全部成员开除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表示同意，并通过了关于开除他们的决议。

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变成一个狭隘的、脱离无产阶级运动的小宗派。派别分子越来越热衷于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集团的冒险主义举动，而宗得崩德（它存在到 1853 年初）也就变成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简单附庸。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两个朋友的通信

1850 年 11 月，恩格斯不得不迁居到曼彻斯特并开始在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他重新经营“该死的生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一家给以经常的物质援助，使马克思能够从事理论工作。

尽管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住在一个城市里，他们依然保持最真挚的和密切的精神联系。有时马克思到曼彻斯特去看恩格斯，和他一起写作或休息。恩格斯也利用一切机会同伦敦的马克思一家人居住一段时间。但是，多年以来书信一直是这两个朋友的主要

^① 参看《第一国际的先驱——共产主义者同盟》俄文版第 330—331 页。

联系形式。他们已经养成了定期给对方写信的习惯，如果信件稍有延误，都会使他们感到极度不安。 261

他们的书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他们的生活和斗争的编年史。最有价值的地方是通信充分反映了两位伟大的思想家的巨大的理论和实际工作，反映了他们在科学和革命实践各方面的创造性的合作。马克思特别重视恩格斯的意见，常常请他对自己的发现、考察和结论发表看法。同样，恩格斯也把自己研究的进程和结果与马克思商量。

两位朋友讨论的问题很广泛，有哲学和自然科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和语言学、军事和技术、文学和艺术等方面的问题。他们的书信揭示了他们学说的三个组成部分的发展以及他们对一系列专门学科的创造性贡献。许多书信也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实现的写作计划。因此，在书信中既有后来在发表的著作中加以发挥的重要原理的概述，也有在已发表的著作中没有发挥的宝贵思想。

他们经常在书信中讨论和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他们的评语往往带有总结的性质，揭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本质特征。在他们的通信中，对他们读过的书籍的评价、对科学上各种重大事件和重要著作出版的议论，占有许多篇幅。

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密切注视生动的现实，例如他们周围世界所发生的经济和社会过程，各国的政治事件。这些材料有时就是他们的文章和通讯报道的主题。他们在书信中对政治活动家的评价往往比他们在文章和通讯报道中的评价更尖锐，因为在书信中他们能够更坦率地表述自己的意见。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战略和策略问题，是他们在书信中讨论的重要课题。这些书信明显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无产阶级反抗资本家的各种形式、无产阶级的同盟

者——农民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的解放运动、无产阶级在许多问题上的策略路线的制定是非常关心的。列宁在研究他们的这方面的书信时指出：“读者从这些书信中可以非常生动地看到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看到这个历史中的最重要的时期和最重大的地方。尤其宝贵的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史**。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东半球各个不同的国家和西半球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探讨了有关工人阶级**政治任务问题提法**的最有原则意义的东西。”^①

列宁不止一次地指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是巨大的思想财富。他把它看成马克思主义思想宝库的重要部分。他写道：“如果我们想用一个词来表明全部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发表所讨论的一切思想集结的中心点，那末这个词就是**辩证法**。用唯物辩证法从根本上来改造全部政治经济学，把唯物辩证法应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策和策略——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注意的事情，这就是他们做了最重要最新颖的贡献的地方，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英明地迈进的一步。”^②

对蒲鲁东进一步反击的计划

1851年7月，马克思读完了刚刚在巴黎出版的蒲鲁东的著作《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这本书明显地反映了蒲鲁东这个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世界观的基本特征，以及他的改良主义和反革命的倾向。蒲鲁东的这本新书所鼓吹的空想主义纲领就是用和平的、纯“经济的方法”，借助于组织互助和信贷，建立交换银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557页。

^② 同上书，第558页。

行,降低贷款利息等类似的改革来实现社会革命。在他看来,采取这些措施就能建立一个“没有权力的社会”。和他过去的那些著作相比,他的这本书更充分地叙述了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他坚决反对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目的而利用政治权力的一切想法,并声称任何一种国家制度都是反动的,而民主都是无用的。

读了蒲鲁东的这一著作,马克思决定在报刊上对它进行批判,这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蒲鲁东主义已经形成为一定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流派,在反动统治的条件下对工人阶级特别有害。革命 263 失败后,工人阶级中最不坚定的分子已经悲观失望了,怀疑政治斗争是否有意义。蒲鲁东的阶级和平和用改良方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喊叫以及他对政治冷淡主义的说教在这些中间已经有了反响。这对于用革命思想教育无产阶级是非常有害的。

马克思在 1851 年 8 月 8 日和 1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叙述了蒲鲁东这本书的基本思想,认为整个蒲鲁东主义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一场论战”^①。他告诉恩格斯他打算写一篇论战性文章反驳蒲鲁东,请恩格斯把对蒲鲁东的新作品的意见寄给他。

恩格斯很快就答应了马克思的要求。在 10 月底他把对蒲鲁东这本书的批判性评论寄往伦敦。马克思很赞成恩格斯的评论。他在 1851 年 11 月 24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又读了一遍你的批判。可惜不能出版。如果再添上一些我的废话,它可以由我们两人一起署名出版……”^②。很长一段时期,马克思一直想利用恩格斯写的材料发表一篇反驳蒲鲁东的文章,并寻找机会实现这一计划。这个计划几乎快要实现了。1851 年秋约瑟夫·魏德迈迁居美国。12 月中旬,马克思从他的来信中得知他打算从 1852 年 1 月起在纽约出版一份共产主义周刊《革命》。魏德迈邀请马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7 卷第 329 页。

② 同上书,第 394 页。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思和恩格斯撰稿。马克思也请魏德迈在周刊上刊登一则关于反驳蒲鲁东的小册子即将出版的广告。他在1851年12月19日写道：“你可以预告以后几期将连载我的一篇论文：《社会主义的最新启示，或比·约·蒲鲁东的〈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卡尔·马克思评》。”^①1852年1月《革命》周刊的第一期刊登了这一广告。

但是，对蒲鲁东进行反击的计划未能实现。1852年4月以前，马克思忙于评价刚刚在法国发生的波拿巴政变，认为这是一项更紧急的任务。当他有了空闲，《革命》周刊由于编者缺乏资金已经停刊，所以发表抨击性文章反击蒲鲁东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总统的追随者实行政变，解散了立法议会。在法国建立了波拿巴专政。一年以后，路易·波拿巴自称皇帝拿破仑第三。

恩格斯在1851年12月16日的一封信中建议马克思给魏德迈的《革命》周刊写一篇评论法国事件的文章。马克思立即着手写作。但是，这部著作远远超出了一篇论文的范围。马克思在一个短短的时期内创作了一部最出色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3月25日，他把第七章即最后一章寄往纽约。

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的写作过程中，经常和恩格斯交换看法并接受他的建议。除了报刊和官方文件以外，马克思还利用当时住在巴黎的海涅的秘书理查·莱茵哈特的通讯作为资料。他在和法国革命流亡者的谈话中也获得了一些重要消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18页。

马克思不得不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写他的这部著作。几乎在整个一月份他身患重病，而家庭经济又如此困难，以致他在二月份只好去典当衣物，不能去图书馆工作。尽管如此，他依然忘我地进行写作，终于创作了一部在风格和艺术表现上颇为独特的著作。威廉·李卜克内西说：“《路易·波拿巴》的语言就是箭和投枪，它的风格就是烙印与格杀。如果憎恨、轻蔑、对自由的热爱曾经在什么地方用燃烧、破坏和激昂的语句表达过，那就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本书里，这书把塔西佗的严肃的忿怒、尤维纳利斯的尖刻的讽刺和但丁的神圣的怒火综合在一起了。”^①

马克思在出版这部新著作时也遇到了不少困难。魏德迈的周刊没有存在很久。1852年5月，魏德迈才把这一著作以单行本出版，作为“不定期刊物”《革命》的第一期。马克思在德国或英国再版这一著作的尝试没有成功。

象《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样，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再次分析了1848—1849年法国革命的经验，对法国政治生活的变迁从其最终结果——十二月二日波拿巴政变的角度作了考察。

265

与马克思同时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人士不能解释法国事变的社会根源及其真正意义。在与马克思这部著作几乎同时出版的抨击性著作《小拿破仑》中，维克多·雨果本想揭露政变的头目，结果适得其反。雨果把政变描绘成法国总统、一个相当普通的人的邪恶愿望的结果，正如后来马克思指出的，他认为这个相当普通的人具有“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②。而同时出版的蒲鲁东的著作《从十二月二日政变看社会革命》，把对政变的解释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虚伪辩护和对波拿巴主义的赞扬。只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有马克思能够阐明引起法国政变的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政治现象，揭示政变的实质。关于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表现的历史分析的本领，恩格斯写道：“他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①

马克思创立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他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他解释法国事件的钥匙。他认为波拿巴政变是法国阶级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法国阶级斗争的进程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②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对抗在法国已经达到了只要革命进一步深入就可能采取社会主义措施的阶段。因此，资产阶级抛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直接的和纯粹的统治形式，为了保持剥削制度，把政权交给反动的无耻冒险家集团。所以，马克思认为波拿巴政变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性日益加剧的合乎规律的结果。波拿巴制度的产生是阶级力量对比的结果，即当时资产阶级已经不能借助于通常的议会手段来进行统治，而无产阶级要想挫败资产阶级的反革命诡计又太孱弱。

266 马克思指出了波拿巴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最反动分子的专政，同时还揭示了它的特点：在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国家政权貌似独立；进行蛊惑性的煽动，其实在维护上层剥削分子的利益和实行政治恐怖；军阀横行；叛变腐化；利用罪犯；采取诈骗、贿赂以及其他种种卑鄙龌龊的手段。根据波拿巴制度存在的最初几个月的事实，马克思就揭示了它的内部矛盾。在波拿巴集团还在庆祝胜利时，马克思就预言它必然灭亡。

马克思仔细观察了法国各个政党的立场，揭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特点，指出了社会进程和各个阶级的冲突在政治和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页。

② 同上书，第599页。

领域的反映。他提出，必须把社会政治现象的客观方面同它们在事变参加者意识中的反映区分开来，这个论点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重大贡献。他写道：“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①

马克思的关于某一个阶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著述家与该阶级本身关系的思想是极为重要的，马克思预先警告要反对那种庸俗的观点，似乎思想家应当象他们所代表的那个阶级的全体群众那样，必须有同样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方式，例如，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应当是小铺老板、小作坊主。马克思认为，一个政治家或一个作家之所以成为一定阶级的思想家，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提出的任务和结论正是这个阶级的普通成员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物质利益和生活实践所得出的任务和结论。

马克思非常注意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阶级即农民的状况，以及他们对革命和波拿巴政变的态度。马克思指出，农民投了路易·波拿巴的票，是由于他们政治上落后和闭塞，脱离城市的生活和政治生活。第二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用苛捐杂税使农民厌弃革命而支持波拿巴。他们支持波拿巴是因为这些眷恋自己小块土地的农民私有者把拿破仑王朝的代表当作自己的传统的庇护者。马克思写道：“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② 267

马克思揭示了农民的双重社会性，同时强调指出，在他们的世界观中也相应地具有革命和保守这两种倾向。农民力图保存和巩固小块土地以及由它产生的传统的生存条件，另一方面，农民又竭力想摆脱这些条件。马克思指出，波拿巴正好从农民的保守的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② 同上书，第694页。

望中给自己找到了一个暂时的支柱。“波拿巴王朝所代表的不是农民的开化,而是农民的迷信;不是农民的理智,而是农民的偏见;不是农民的未来,而是农民的过去……”^①。马克思指出,小农经济必然破产,高利贷资本家对它的盘剥必然会使农民摆脱“拿破仑观念”的腐蚀。如果说偏见使农民支持了波拿巴王朝,那么,理智、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必然会使农民同工人阶级采取一致的行动。马克思写道:“因此,农民就把负有推翻资产阶级制度使命的**城市无产阶级**看做自己的天然同盟者和领导者。”^②同时,马克思指出,从农民那里“**无产阶级革命就会得到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③。

这样,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对在无产阶级起领导作用的情况下的工农联盟的原理作了更全面的论证。四年以后,他结合德国革命斗争的前景,发挥了这一关于工农联盟的意义的思想以适合于德国条件。他在1856年4月1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④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这部著作,包含对革命理论的
268 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再一次强调指出,革命是社会进程的强有力的加速器,迫使社会进程按“速成的方式”^⑤发展。他给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划了一道严格的界限。前者“为时短暂,很快就达到自己的顶点”^⑥,而无产阶级革命不是短时期的突然爆发,是根本改造社会的一个长的时期。马克思说,无产阶级革命的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② 同上书,第697页。

③ 同上书,第6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4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6页。

展规律是“经常自己批判自己”^①，换句话说，根本不容许任何的保守主义，从不满足于既得的成就，勇于揭露并克服自己的错误和不彻底性。无产阶级革命始终要求把运动推向前进。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提出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同资产阶级国家的关系的原理，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根据1848—1849年的革命经验第一次得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的结论。马克思以法国的历史为例，研究了军事官僚国家机构的形成和发展，他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②。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决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使其运转，而又原封不动地保留这种本质上是剥削者的镇压劳动群众的工具。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③。

列宁在研究马克思的这些结论时写道：“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④

马克思在写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了他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与承认阶级矛盾存在的 269 那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观点之间的主要差别。他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7页。

② 同上书，第692页。

③ 同上书，第691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

说明这种根本差别找到了异常明确的表述方式。他在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中概括了他的这些结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

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批判。抨击性 小册子《流亡中的大人物》

马克思在捍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立场和策略立场的纯洁性时，竭力使无产阶级人士不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形形色色的民主主义流亡小组的喧嚷叫嚣的活动，给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带来了严重损害。侨居伦敦、瑞士和美国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发行了宣布新的革命即将爆发这些夸夸其谈的传单和宣言，建立了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企图人为地维持他们的那些在革命年代声誉扫地的首领的威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公开揭露小资产阶级流亡者活动的冒险性，暴露许多流亡中“大人物”的本来面目。各种流亡小组的首领们和依附于它们的宗得崩德首领们对共产主义者的恶毒攻击和造谣中伤也促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1851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报刊上揭露了在伦敦举行的纪念法国二月革命三周年的集会即所谓“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们。大会的组织者勃朗、维利希等人故意向听众隐瞒了布朗基为宴会写的从贝耳岛监狱中偷偷带出来的献词。这篇献词揭露了包括勃朗和赖得律-洛兰在内的法国临时政府成员的叛卖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写了简短的前言，前言中提到这篇献词在“平等者宴会”上被卑鄙地扣压了。

马克思也在许多书信中尖锐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首领们，揭露他们官迷心窍、争名逐利，他们预先就把未来的共和政府中的高级职务分派好了。马克思还嘲笑他们推销为立即发动革命而用的德美革命公债这种冒险的游戏。

1852年4月，马克思决定和恩格斯一起专门写一本反对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们的抨击性小册子。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月和6月间创作了这部长篇的论战性著作，其中大部分是马克思住在曼彻斯特期间两人共同写的。他们把它叫作《流亡中的大人物》。7月初，手稿就委托给一个与著名的匈牙利革命者关系密切的、自愿效劳的匈牙利流亡者班迪亚在德国出版。但是不久就发现班迪亚是警察局的暗探（马克思后来在报刊上多次揭露了班迪亚）。班迪亚把小册子的手稿卖给了普鲁士警察局。可是马克思手里还有草稿，他又作了多次努力想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出版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然而这些努力都没有成功。1930年这本小册子才在苏联第一次出版。

《流亡中的大人物》是一部杰出的政治讽刺作品，它讽刺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那些用无聊的和假革命的空谈来代替真正革命活动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小册子坚定不移地批评了对伟大革命事业的各种庸俗曲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用鲜明的艺术色彩绘制了流亡中的“大人物”的画像，刻画了他们道德的丑恶，他们精

神世界的庸俗空虚，政治上的极端不稳定。小册子的作者揭开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首领们的生活的纱幕，描绘了在原则性争论的幌子下所进行的“老鼠与青蛙之战”，即各个流亡者集团之间的无谓的争吵，无情斥责了各种泛泛空谈、装腔作势、用革命词句进行的蛊惑性投机。

- 271 金克尔、司徒卢威、卢格、海因岑这些流亡者首领们的冒险行为是特别危险的，他们给了“政府以它所希望的借口，使它得以在德国逮捕许多人，在全国各地镇压一切运动，并且利用伦敦的可怜的草人（就象利用吓唬鸦雀的草人一样）来吓唬德国的小市民”^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小册子中找到了揭露维利希—沙佩尔宗派集团的方法，虽然出于保密的考虑，不能公开谈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以及他们同派别分子的分歧。因此，他们把维利希的画像列入了流亡活动家的总画面，因为他的小资产阶级观点和其他“大人物”的观点没有多少差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维利希不能理解革命运动所面临的重大战略和策略任务。他被描写成一个具有一整套固定观念的、眼光狭窄、十分顽固的人。他的全部活动就是千方百计地使整个运动的共同利益服从于宗派小集团的利益。

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1851年5—6月，在德国境内实行了大逮捕，受害者中有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许多活动家，其中包括诺特荣克、毕尔格尔斯、丹尼尔斯、海尔曼·贝克尔、勒泽尔、列斯纳等。

为了彻底扑灭革命运动，反动势力首先打击的是马克思和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61页。

格斯的拥护者，因为警察当局一些深谋远虑的代表人物非常清楚地懂得，真正威胁现存制度的并不是各个流亡者组织喧嚣一时的超革命的空谈，而是马克思周围的那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极端秘密的和献身的活动。柏林警察总监辛凯尔迪在1852年4月的秘密报告中写道：“现在已有理由可以这样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它比一切流亡者、鼓动家和中央委员会高明得多，因为它无可辩驳地掌握了较大的知识和精神力量。马克思本人是著名的人物，大家知道，他脚趾尖里的精神财富比其余整个社团其余的人脑壳里的精神财富还要多。”^①

普鲁士政府决定在科伦审判被捕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成员，说他们犯了“图谋叛国”罪^②。普鲁士当局故意扩大这一案件的规模，利用它作为借口来彻底破坏工人组织，取消民主主义的、甚至²⁷²自由主义的反对派。

筹划这一案件的主要人物是警官施梯伯，但是一些显要人物，包括普鲁士国王在内，也插了一手。施梯伯及其助手的使命是弄到被捕者的罪证。施梯伯的行动得到法国和其他各国警察局长的密切配合。在伦敦执行他的秘密使命的就有一群密探，其中有普鲁士大使馆随员格莱夫、商人弗略里和店员希尔施等人。居住在英国首都的一些著名的共产主义者受到严密的监视。1851年12月希尔施混入了流亡伦敦的一些共产主义者中间，但很快就被怀疑他和警察局有联系，并被可耻地赶出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采取了防备措施，改变了同盟盟员每周聚会的地点和时间。

维利希—沙佩尔集团代表人物的冒险行动，以及他们在保存

① 参看卡·欧伯曼《共产主义者同盟史（1849—1852）》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61页。

党的文件和保守党的机密方面的疏忽大意，使警察局的好细更容易下手了。1851年夏天，普鲁士警察局的一个密探已经在伦敦偷走了宗得崩德的档案。同年秋天，普鲁士警察局和法国警察局在巴黎共同制造了一个所谓的德法密谋，说是一些属于宗得崩德的人干的。警察局和侦讯机关利用这些事实和偷来的文件，伪造了一种说法，似乎在马克思的拥护者和维利希的追随者之间只是个人分歧，而他们的策略立场是一致的，因此科伦的被告们应当对维利希—沙佩尔联盟的一切言论和全部文件负责。

此外，普鲁士警察局还责成希尔施同弗略里和格莱夫一起伪造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原本记录，他们硬说该委员会是在科伦中央委员会成员被捕后由马克思在伦敦创立的。警察机关和司法机关企图根据“原本记录”中虚构的材料来证明，关于所谓反政府密谋的线索应当追查到伦敦的马克思那里。

273 在全部伪造材料都收集到一起之后，在1852年10月4日才开始对科伦的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审讯。

马克思一听到共产主义者被捕的消息，就密切关心自己的同志们的命运，同德国保持经常的联系，从被告的辩护人、科伦律师阿道夫·贝尔姆巴赫那里定期了解被捕者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一连好几个月一直忙于营救被告，揭穿普鲁士政府和警察局的卑鄙手段和专横武断。1851年12月1日马克思给巴黎报刊寄了许多声明，但是都没能发表，因为第二天就发生了波拿巴政变。1852年1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给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泰晤士报》和《每日新闻》寄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援引了被捕者遭到残酷虐待的事实，揭露了普鲁士司法当局甚至在一个诉讼审级作出缺乏犯罪构成之后又重新开始侦讯的不法行为。但是这封信也没能发表。

在科伦陪审法庭审讯期间，马克思积极活动，支持他的党内同

志。这一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公开揭露普鲁士当局方面收到了成效。10月28日和30日，五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他们的声明，在声明上同他们一起签名的还有沃尔弗和弗莱里格拉特。声明谴责审讯过程是一系列“警察局所干的违反誓约、伪造文件、篡改日期、窃盗等等骗人勾当，这些勾当甚至在普鲁士政治司法史册上都是没有先例的”^①。

在科伦审讯期间，马克思事实上一手承担了为被告辩护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要和恩格斯通信，讨论对科伦共产主义者的最有效的援助方法。尽管有许多障碍，尽管受到普鲁士警察局的暗中监视，马克思在向科伦转送被告的辩护材料方面仍然表现了一个革命秘密工作者的机敏和卓越才能。马克思知道他的信件要受²⁷⁴到检查和没收，但是他把附有必要材料和文件的信通过法兰克福、杜塞尔多夫、巴黎和其他城市转寄出去。有时为了保险，还把它们复制成好多份副本一下寄出去。为了迷惑警察局暗探，他把许多信件作为商业邮件根据恩格斯提供的地址，往往不是从伦敦，而是从曼彻斯特和其他城市寄出去的。马克思就这样按时把文件转寄给那些没有被捕的科伦朋友，把揭穿制造这一案件的一整套卑鄙手段的资料交到辩护人的手里，实际上为他们确定了在法庭上对付审判的办法。

在审讯进行的五个星期里，马克思的生活过得非常紧张，在1852年10月28日燕妮·马克思写给侨居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阿道夫·克路斯的信中有一段描述：“您可以想象到，‘马克思派’在日以继夜地工作，脑袋和手脚一刻也闲不下来……我们这里现在有了整套办事机构。两三个人写东西，另一些人跑腿，还有一些人筹集便士，以便使写东西的人能够生活下去，并能把前所未闻的丑行的证据端到旧的官方世界的面前。再加上我的三个活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29页。

的孩子又唱又叫，他们常常被他们的严厉的爸爸赶走。”^①

尽管普鲁士政府对大部分起诉材料在提交法庭以前严守秘密，马克思还是识破了审讯的全部内幕及其隐蔽的动机。他立刻发现了起诉书中最薄弱的地方，正是在这里竭力给予毁灭性的反击。他一看到德国报纸上的关于审讯的新的事实，就立即写信给辩护人，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必要的资料。

为了戳穿所谓被告参加密谋的谎言，马克思给辩护人施奈德第二寄去了说明，使他可以根据这些说明把宗得崩德的文件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区别开来，并证明它们的原则差别^②。马克思往科伦寄了许多材料，证明科伦的被告和整个共产主义者同盟都同所谓的德法密谋毫不相干。马克思认为最重要的是揭露施梯伯在10月23日作为主要起诉材料提交法庭的伪造的《原本记录》。马克思帮助辩护人证明《原本记录》是肮脏的伪造品，他给辩护人提供了许多文件，其中包括记录的真正炮制者希尔施的笔迹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李卜克内西和林格斯的笔迹，因为施梯伯硬说这份记录是他们两人写的。由于马克思的帮助，被告的辩护人把施梯伯和案件的其他策划者问得张口结舌。检察官泽特被迫公开承认记录是“不可靠的”^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被告的辩护人彻底推翻了起诉中对被捕的共产主义者提出的一切荒谬的指责，这些指责是普鲁士警察机关和司法当局花费了一年半的时间才编造出来的。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从伦敦寄往科伦的揭露性材料“设下了能使政府的整个骗局炸得粉碎的反布雷”^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48、650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68—1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68页。

尽管缺乏罪证,大多数被告仍然在1852年11月12日被宣判有罪。马克思说,这些被告的罪名是事先就判定了的,因为他们所体现的“手无寸铁的革命无产阶级站在由陪审法庭所代表的统治阶级面前”^①。为了保证对共产主义者定罪,政府任命了一个由六个反动地主、四个金融贵族的代表和两名高级官员组成的陪审法庭,这在莱茵省是史无前例的。七个被告被判处不同刑期的要塞监禁:毕尔格尔斯、诺特荣克和勒泽尔六年,赖夫、奥托和贝克尔五年,列斯纳三年。丹尼斯、克莱因、雅科比和埃尔哈特四个人被宣告无罪。

在审判以后,根据马克思的倡议,在伦敦成立了一个科伦被判罪的共产主义者及其家属救济委员会。马克思的许多战友都参加了这个委员会。马克思代表委员会在1852年12月7日起草了一份给美国工人的呼吁书,其中指出,帮助无产阶级先进战士减轻痛苦是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的义务^②。

马克思还认为,写一本专门的小册子揭露普鲁士国家及其对付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手法,是自己对党的职责。在审判的日子里,马克思已经有了这部著作的构思。1852年10月底他开始写作,12月初就完成了。马克思把他的这本尖锐讽刺的小册子叫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小册子是在特别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因为马克思和他的家庭当时极端贫困。为了在美国出版,马克思把 276 手稿寄给了阿道夫·克路斯,并在1852年12月7日给他的信中写道:“如果你们考虑到,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那末你们是能够赏识这本小册子的幽默的。案件使我的处境更加恶化了,因为五个星期以来,我不是为糊口而挣钱,而是必须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5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643页。

党工作，揭露政府的阴谋诡计。此外，案件使德国出版商完全离开了我，我本来希望就出版我的《政治经济学》能同他们签订合同。”^①

小册子《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于1853年1月在巴塞尔出版。但是，3月间在运往德国的途中，在巴登边境的一个小村子威尔几乎全部（发行数是二千册）被警察没收。在美国，这一著作最初在波士顿的民主报纸《新英格兰报》上陆续发表，到1853年4月底，该报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波士顿出版的小册子在侨居美国的德国工人中享有盛名，但是在德国境内当时并未广泛流传。只是在1875年再版以后，在德国才有了广大的读者。

《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这本小册子表明，马克思不仅是为无产阶级政党的荣誉英勇辩护的一个热忱战士，而且是对工人阶级先进代表进行无耻诉讼和警察陷害的那些策划者的一个严厉的控诉人。他不仅揭穿了对共产主义者迫害的直接策划者的犯罪行为，而且谴责了整个普鲁士国家及其警察官僚制度。他揭露普鲁士司法当局的偏颇不公和资产阶级陪审法庭的阶级性。“陪审法庭是特权阶级的等级法庭，建立这种法庭的目的是为了用资产阶级良心的宽广来填补法律的空白。”^②

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以前，马克思由于需要保密，不能公开谈论同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现在，人们已经从审判材料中知道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存在及其分裂，就没有必要再保密了。他
277 在小册子中令人信服地指出，维利希—沙佩尔集团反映了小资产阶级思潮、唯意志论和教条主义观点，他们的冒险主义的密谋策略只能危害工人运动，脱离群众，给警察当局的奸细活动造成有利的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5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36页。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

建党斗争的新形式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被捕和科伦案件，标志着同盟作为一个组织在德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欧洲大陆其他各国的同盟支部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在反动势力日益猖獗的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已经不可能再存在下去，再用过去的形式继续活动也不合适了。1852年11月17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会议根据马克思的提议，通过了解散同盟地方组织的决议，同时还宣布，会议认为同盟在大陆上继续存在也是没有意义的。这一决定标志着共产主义者同盟活动的结束，尽管它的个别支部或小组在欧洲和美国的一些地区还继续活动了一些时候。

然而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解散并不意味着联合先进的无产者结成革命政党的斗争应当结束。在新的形势下，党的活动应该是保存和培养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骨干，使他们同那些还继续活动的工人组织加强联系，利用一切机会宣传科学共产主义。这些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为之献身的任务。

尽管共产主义者同盟有各种优点，马克思根本不认为它是无产阶级的政党组织始终适宜的模式。它的一般的纲领性原则、策略原则和许多组织原则都是意义深远的，但是，总的说来，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反映了在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早期阶段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斗争，这个时期无产阶级解放的运动在思想上 278 还很不成熟，在组织上也很松散，参加运动的主要成员还不是大的工厂企业的工人，而是正在变成无产者的手工业帮工。这一切在

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同盟盟员为什么人数不多(不到四百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想把它变成一个更广泛、更团结和更有影响的无产阶级组织的核心,但都没有成功。而这个时期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能够领导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方面还是迈出了第一步,也许是最困难的一步。可是这个目的本身还没有达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通过符合新的历史条件的形式和方法进行长期的艰苦的斗争。

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依靠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思想遗产,继续进行这一斗争。他们不断地强调同盟在无产阶级解放斗争史上的杰出作用,指出它的活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政治组织,它在工人运动萌芽时期就宣告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它的思想旗帜,并开始在同盟群众中宣传这些原则。同盟的纲领就是不朽的《共产党宣言》。同盟通过对《宣言》的思想的宣传,为无产阶级斗争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共产主义者同盟,作为在科学共产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开端的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形式,是后来建立的更广泛的革命工人组织和共产主义组织的先驱。共产主义者同盟不仅团结了德国工人,而且推动了无产阶级先进力量在最进步的革命学说基础上的国际的团结。它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第一国际的前身。

在培养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骨干方面,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作用。恩格斯写道,同盟对于参加革命斗争的人是一个进行政治活动的极好的学校^①。从它的队伍里造就了一批后来领导国际的人材。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0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他们本人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活动中也受益不少。他们在同盟中第一次发挥了他们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战略家和策略家的才能，增长了他们的组织能力和宣传才干。马克思领导工人阶级的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正象他亲自参加1848—1849年革命事件一样，无比地丰富了他的生活经验和政治经验，使他能在不久的将来直接领导大规模的国际无产阶级运动。

第七章

在反动年代

“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富有田园风味的’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将临的气息，而使无产阶级觉悟到他们所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①

列 宁

在反动和贫困的压迫下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黑暗的反动势力统治着欧洲。许多国家又恢复了专制制度，有的国家，例如在普鲁士，同时还不伦不类地辅之以代议制。民主主义报刊和工人报刊遭到查封，工人团体被勒令解散。无产阶级没有任何合法的可能性来联合自己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无产阶级“被公开地剥夺了 *igni et aqua*〔必需的生活条件〕②，被剥夺了出版、言论和结社的自由”③。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87页。

② 直译是：火和水。——译者注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522页。

反动势力在大陆上的胜利，也使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国内生活受到深刻的影响。两个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都激烈反对 280 进步的改革。它们虽然不敢直接侵犯政治流亡者的避难权，但是却使革命流亡者受到被引渡给独裁政府的威胁。许多革命流亡者经常受到警察的监视。反动报刊把他们描绘成可怕的歹徒。

马克思强烈感受到革命活动家在反动年代所遭受的那种压制。他已经没有可能通过革命报刊号召大陆上的无产阶级群众；除了英国，革命报刊几乎在所有地方被取缔了。要想出版自己的期刊，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相应的条件；要想同其他国家的革命工人和同志取得联系，又非常困难。大部头著作的出版过去主要由于警察的刁难而经常中断，现在更是障碍重重。在德国，海·贝克尔在1850年试图出版马克思文集未获成功，他只出版了第一册，即马克思1842年写的两篇文章，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出版商一直拒绝刊印这位无产阶级学者的作品。

很长一段时期马克思根本就没有固定的收入，物质上的匮乏在这些年是非常严重的。恩格斯尽力援助，但也十分有限，因为当时他在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办事处工作时不过是一名普通的办事员。直到1851年夏天，马克思才开始为美国《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但是微薄的、极不定期的稿酬并不能使他清偿积欠的债务，也不能使他的家庭生活得到一定的保障。

马克思长年过着清贫的生活。有时甚至没有钱订报纸、买信纸邮票和延医付药。有时马克思竟不能上街，因为他的一套常礼服还在当铺里。全家不得不在各方面紧缩开支，经常一连好几个星期用面包和马铃薯糊口。债主们粗暴地向他逼债，威胁要把他全家赶出大门，让法警扣押他的财物来抵债。

马克思由于不能改善他的家庭的遭遇和获得每天的面包而十分苦恼，为了筹措钱款，预支稿酬和延期付款，他花费了大量时间

281 去四处奔走。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时刻，他有一次写道：“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①

马克思一家人的居住条件也很恶劣，他长期没有钱租用多少象样一点的住房。从1849年秋到1850年4月，马克思全家挤在伦敦西南郊切尔西安德森街4号的一个小套间里。1849年11月5日，他的第四个孩子、他的儿子亨利希·格维多在这里出世了。女房东由于限期偿付欠租的要求没有得到答复就蛮横地撕毁了租约，全家就是在这样真正悲惨的情况下离开这所房子的。1850年5月20日，燕妮·马克思在给约瑟夫·魏德迈的一封信中写道：“由于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不多的全部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女孩们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家当拿走。那时忍受着乳房疼痛的我就只有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②

马克思设法从朋友们那里弄到一些钱来偿付女房东的债款，被扣押的家当这才得以启封，但是为了偿付药房、面包铺、肉铺和其他债主的小额欠款，这些家当又立刻被卖掉了。

马克思全家人临时搬进莱斯特街的一家德国旅馆。1850年6月初他们搬到第恩街64号，后来在1850年12月，又搬到28号的一个有两个小房间房子里。这座住宅位于市中心人烟稠密的索荷区，设备十分简陋。在1854年霍乱流行时期，索荷区是主要传染区之一。这里住着许多法国和意大利的流亡者。马克思和他的家人就在这潮湿狭窄的房子里住了将近六年。前面的房间既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631页。

书房，又兼做客厅和餐室，后面的房间是全家人的卧室。直到1856年秋，燕妮得到已故的母亲留下的一份微薄的遗产，这时，马克思才在伦敦西北郊租了一幢住宅。马克思全家在位于伦敦最好地区²⁸²的哈弗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9号（后来的门牌改为46号）这座房屋里，一直住到1864年3月。但是当时这里是荒凉的刚刚兴建的地区，垃圾成堆，没有路灯，遇到雨天道路泥泞，无法通行。

马克思的工作非常繁重，又要经常同贫困作斗争，这就损害了他的健康。生活条件极端困苦，营养不良，操劳过度，致使病魔经常光顾他全家。马克思本人患了眼病和风湿病，1853年3月，又害了肝病。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常常生病。

马克思的家庭遭到了真正的不幸。七个孩子只有三个得以幸存。一周岁的亨利希·格维多因患肺炎于1850年11月19日死去。1851年3月28日出生的弗兰契斯卡也就比他多活了几天，于1852年4月14日死去，当时正是全家极端困苦的时候。一位好心肠的法国流亡者帮助买了一口小棺材和付清了埋葬费。燕妮·马克思在1857年7月初又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刚生下就死了。

对马克思来说，最难以忍受的打击就是他的八岁的儿子埃德加尔在1855年4月6日死了。这是一个有天赋的、好学的和性情温和的孩子，全家都宠爱他。他的绰号叫“穆希”——“小麻雀”，马克思和恩格斯有时还诙谐地叫他穆希上校。1855年春，埃德加尔患了致命的严重的胃病。在孩子生病期间，马克思和他的妻子精神恍惚，好象在作恶梦似的，随着孩子病情的变化，时而寄予希望，时而陷于绝望。穆希的死震动了全家。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42页。

马克思及其家庭所遭受的苦难首先应当归咎于资产阶级世界的残酷性，在资产阶级世界中，一个伟大的革命思想家的境况必然是极端困苦的。梅林写道：“资产阶级社会为这样的天才准备的只有摧残和折磨；这些摧残和折磨表面看来也许不象古代的受难者的十字架和中世纪的火刑那样野蛮，但实质上却比这些刑罚更加残酷。”^①

283 马克思以真正英雄主义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战胜了所有这些灾难，任何考验都没能使他离开已经选定的道路。他对自己的生活目的坚信不移。1866年8月他在给自己未来的女婿拉法格的信中写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他接着补充说：“只是我不再结婚了”^②。这句话表明，马克思一想到他的亲人们不得不同他分担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变幻无常的命运，就感到非常痛苦。

他的这些话闪烁着真正的人道主义和伟大而高尚的精神：“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③为劳动人类服务的崇高思想，使马克思勇敢地经受住一切个人的考验和苦痛。

马克思在家庭中

尽管马克思看到自己的亲人们遭受苦难而感到难过，但是他

① 弗·梅林《马克思传》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21页。

③ 同上书，第544页。

从来没有认为家庭是一个累赘，而认为它是进行斗争的靠山；它不仅带来了各种操心的麻烦事，而且也带来了许多赏心乐事。马克思深感家庭生活的幸福。不管在任何条件下，他的家庭中总是充满着乐观主义精神，充满着互相完全信任和亲切热情的好客气氛，这首先是因为双亲作出了榜样。

在流亡生活的困难情况下，燕妮的优秀品质充分地表现出来了。她不仅是她丈夫的体贴入微的朋友，是孩子们的慈母和能够给他们指出发展方向、培养他们的性格与爱好的教诲者，而且也是具有和马克思同样信仰、比他的许多朋友更好地领会他的伟大思想和创作意图的忠诚同志。燕妮·马克思在她的回忆中写道，阅读和抄写她的丈夫的手稿使她感到非常愉快。除了这些工作外，她还为马克思代写书信。

马克思仍然象年轻人那样热恋着自己“钟情挚爱的、唯一亲爱的”燕妮。当她从曼彻斯特到特利尔去探望她的临终的母亲时，收到她丈夫在1856年6月21日写的一封信，信中写道：“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可挽回的损失，我都能从 284 你的可爱的容颜中看出，而当我遍吻你那亲爱的面庞的时候，我也就能克制这种悲痛。”^①

苦难和灾祸，忘我的工作使马克思乌黑发亮的头发中过早地出现了一绺绺白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那开朗而欢乐的性格。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得好，“把一个比任何人都愉快活泼的人，一个幽默乐观、真诚的笑声具有不可抗拒的感染力的人，一个在同伙中最温文有礼和最富于同情心的人”^②描写成冷酷无情和高不可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16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3页。

的雷神丘必特，是最可笑的。

马克思对孩子们特别和蔼可亲。威廉·李卜克内西回忆说，马克思“是离不开孩子的，和孩子们在一起就是休息，就能恢复精力”^①。他特别深切同情那些穷苦的孩子。他多次访问工人家庭，看到衣衫褴褛的穷苦孩子总是内心感到不安。他想方设法用友好的手势和温暖的话语鼓励他们，使他们多少得到一点愉快。

马克思全心全意地爱他自己的孩子们。不管是在他伏案写作或者是在一天劳累后休息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讨厌孩子们在他身边。他从来不因孩子们打闹嬉笑喧哗而动怒，他还经常参加他们的嬉戏，象天真的孩子那样同他们一起欢乐。他们最爱玩的游戏是女孩子骑在父亲背上的“骑兵游戏”，或者把他“套”在椅子上玩的“公共马车”游戏。一群纸军舰之间的“海战”就在一满盆水里进行。但是对孩子们和大人说来，最不能忘怀的是他们全家和几个好朋友星期天在伦敦郊外岗峦起伏、绿草如茵的汉普斯泰特荒阜的郊游。在这里进行各种热闹的比赛：赛跑、摔跤、用石子击落树上成熟的毛栗子，等等。有一次马克思象发疯似地参加投石子游戏，结果右臂有一个星期痛得不能动。女孩子们长大了，游戏也变得更复杂深奥，例如：下象棋和需要一定智力的趣味测验。

285 马克思喜欢给孩子们朗诵，讲一些往往是他自己编的神话和有趣的故事。他编的神话有时就变成了一整套故事。有一个神话故事里的主人公汉斯·吕克尔是一个魔术师，他开了一个玩具铺，尽管他有全套魔术，还是不能还清债务，不得不把玩具交给他的债主。但是，在经过无数惊险曲折之后，他的玩具最终又回到了他的店铺里。这些情节幽默、富有诗意的故事，使马克思的小听众们着了迷，它们象征性地表达了讲故事人自己的动荡的生活，表达了善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23页。

战胜恶的必胜信念。

马克思和燕妮培养孩子们酷爱读书的习惯，他们早就向孩子们介绍了世界文学的瑰宝，使他们熟悉格林兄弟、霍夫曼、《一千零一夜》、荷马叙事诗中所描绘的奇异世界，以及《尼贝龙根之歌》和《古德龙》所叙述的中世纪传说。在这个家里最受喜爱的作家和诗人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但丁和塞万提斯，菲尔丁和彭斯，歌德和巴尔扎克，海涅和弗莱里格拉特，吕凯特和夏米索。但是，特别受尊敬的是莎士比亚。女孩子们能够背诵他的剧本中的整场台词。无论是马克思本人还是他家里的人都爱读冒险小说和历史小说，特别是瓦尔特·司各脱、船长马里埃特和大仲马的作品。

马克思是一个温和宽厚的父亲；他从不摆父亲的架子，但是孩子们都非常听他的话。他决不允许自己轻视他的孩子们或忽视他们的幼稚的心情。对孩子们来说，他是一个老同志、有威信的和朋友。他象家里所有的人一样也有一个绰号，由于他肤色黝黑，大家都叫他“摩尔”。

父母亲培养孩子们诚恳老实，嫉恶如仇。全家人都同情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也渴望参加他们的斗争。

人人都为马克思的两个大女儿燕妮和劳拉的学习成绩而感到高兴。她们俩在学校里都受到奖励，她们能用已经成为家乡语言的英语写出漂亮的文章，法语也说得很好，还能够阅读但丁的原著。但是她们尽管有父母的全力帮助，对德语还是感到困难。燕妮的绘画很好，墙壁上挂了许多她的图画，而劳拉却非常爱好音乐和唱歌。

1855年1月16日在埃德加尔死前不久出生的小女儿爱琳娜（杜西）是家中的宠儿。姐姐们对对死去的弟弟的娇爱全部转到她身上了。这个活泼顽皮的小姑娘，爱好运动，她从小焕发的早慧的

想象力使所有人都感到惊讶。

海伦·德穆特(琳蕻)是马克思家庭的忠实伙伴。在流亡生活的条件下,充分显出了她对这个家庭的忠诚,表现了她在做饭、烧菜、缝纫、织补方面的非凡才能,甚至能以有限的收入把家里安排得舒适整洁。马克思认为,海伦·德穆特具有真正的组织和管理才能。他常说:“……在合理的社会条件下,她一定能够对社会做出象她在小范围内对我们做出的那些同样宝贵的贡献”^①。马克思这位象棋爱好者常常找琳蕻对局,并且不止一次认输。

经过患难考验的友谊

马克思由于不能经常同恩格斯见面而感到沮丧。他对恩格斯说:“……使我生气的是,我们现在不能同生活,同工作,同谈笑……”^②但是他们在创作上的合作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他们的精神生活是完全一致的。这一方的创作努力往往就补充了有时是补足了对方的科学探索。他们在通信中以及在偶尔的会面时,就互相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方面在科学研究方面和党的事务方面继续合作,互相交换他们同工人运动活动家联系的情况。他们也继续合写著作,但是不象过去那样在同一张桌子上撰写同一本著作。现在撰写著作就要拟订共同的观点、题目和计划,各人论述的题目照例是各自熟悉的问题。当然有时马克思也把恩格斯写的东西插进自己写的某一篇通讯中,或者这两个朋友彼此修改和

① 艾·马克思 1896 年 3 月 12 日给威·李卜克内西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 8,编号 135。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314 页。

审定对方的草稿。

这段时期充分证明了恩格斯这位朋友具有献身精神，无私忘我，同情别人。他从曼彻斯特寄出的汇款，总是在马克思的家庭最困难的时候到达。他为了让马克思能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就替马克思担负了为报纸撰稿的大部分任务。恩格斯对马克思的家²⁸⁷庭，事无巨细，总是关怀备至：替他们偿还债务，给孩子们送圣诞节礼物，给家里的病人寄送水果和葡萄酒。恩格斯每到伦敦来都使马克思全家欢腾。马克思到曼彻斯特去也受到恩格斯的殷勤接待。1855年春天马克思和他的妻子在他们的儿子死后就在这里安静地度过一段时间。

马克思非常珍视这一友谊。他把恩格斯的烦恼当作自己的烦恼，恩格斯生了病，他总是焦急不安。例如，1857年9月21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你的健康好转，这对我是最愉快的消息。”^①最使他痛心的是恩格斯为了帮助他的家庭和由于其他琐事不得不在办事处消磨时日而无暇进行研究工作。马克思也很乐于帮助他的朋友，比如弄到一本恩格斯所需要的书，摘抄一段稀有的资料，或者收集一些伦敦的报道。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友爱的感情不是挂在口头上，而是表现在行动中，这就使在精神上极端痛苦时刻发自内心的感激更有分量了。当他的儿子在他的怀中断气的那一天，他给恩格斯写信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友谊在这个可怕的时刻怎样减轻了我们的痛苦”^②。在埋葬穆希以后，他又在4月12日的信中写道：“在这些日子里，我之所以能忍受这一切可怕的痛苦，是因为时刻想念着你，想念着你的友谊，时刻希望我们两人还要在世间共同做一些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69页。

② 同上书，第28卷第441页。

意义的事情。”^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系是建立在高度原则性和完全真诚的基础上的。他们彼此开诚相见，从不互相猜忌。不论是谁错了，谁都不固执己见。马克思认为，在他的科学研究活动和创作活动中，在他的一生和斗争中，他和恩格斯的友谊是极其宝贵的。

经 济 学 研 究

马克思在侨居伦敦期间又恢复由于1848—1849年革命而中断的经济学的研究。从1850年春天起，他又非常顽强地、有目的地埋头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研究。

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过程，让无产阶级清楚地理解支配这一运动并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灭亡的那些
288 规律。他重新考虑写一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巨著。

现在马克思对问题的看法比他在革命前更成熟了。他也认识到必须研究在革命年代，特别是在革命后最初几年暴露出来的经济方面的新的实际情况。马克思住在伦敦，即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②，这对于他的研究工作也是很有利的条件。关于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工农业状况、国内外市场状况、银行和交易所情况的各种情报，都汇集到伦敦这个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最大殖民帝国的首都。在伦敦，马克思也能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这是1753年建立的世界最大的图书馆之一，藏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别的地方找不到的珍本图书和出版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42页。

② 同上书，第13卷第10页。

精力充沛的马克思紧张地进行工作。他几乎每天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都坐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里，钻研堆积如山的图书和其他资料。一直有好多年，他白天就在这里工作，晚上经常是在夜里，就在家继续工作。

马克思研究的材料“多得要命”^①。从1850年夏天到1853年8月，他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官方文件和期刊中所作的摘录共有二十四本笔记本。这些笔记本表明，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实，进行了深刻的全面的研究。

马克思还认为他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有关领域。例如，为了研究地租，他研究了农艺学，特别是农业化学。他就在这个时期摘录了著名德国学者尤斯图斯·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和这方面的其他著作。马克思努力设法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工艺情况，熟悉技术上的发明和科学上的发现。他参观了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世界工业博览会，对先进的技术，特别是新的原料(古塔波胶)、机器和工艺过程，特别感兴趣。由于深刻认识到技术的进步对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他就特别注意应用科学的历史。他利用各种参考书，其中有德国技师兼经济学家贝克曼的著作，科学技术史学家波佩的著作，尤尔的《技术词典》等等。他在1851—1853年所作的摘录中记述了好几个世纪以来各种类型的生产中采用物理学、数学和其他科学的情景。

马克思经常重新翻阅他在四十年代读过的书。例如，他重新摘录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并作了许多非常深刻的总结性和批判性的评注。他很了解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发展经济学理论的作用，既了解他们的科学贡献，也了解他们的观点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82页。

历史局限性。

马克思明确地强调指出李嘉图在学术上超过了斯密。斯密是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家，他的学术概念是比较贫乏的，随意运用劳动价值原则，这是由于当时社会关系的发展水平较低。而李嘉图则处于资本主义关系比较成熟的时期，因此他的观点比斯密的观点更加彻底和完善。马克思在摘要中写道：“在李嘉图那里，重要的一点在于：亚·斯密和萨伊认为调节者是劳动的**一定产品**，而他却处处认为是劳动、活动、生产本身，不是产品而是生产，即创造行为。由此得出了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时代。”^①

资本主义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促使资产阶级思想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里抛弃斯密和李嘉图的传统和结论。特别是斯密和李嘉图提出的劳动价值论遭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全面攻击。这就等于使经济科学庸俗化。马克思在1851年4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实际上，这门科学从亚·斯密和大·李嘉图时代起就没有什么进展，虽然在个别的常常是极其精巧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事情。”^②

290 在马克思的意见中已经清楚地流露出(虽然还没有直接表述)关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同带有退化的和直接屈从于资本的标志的庸俗学派之间的区别的论点。

马克思的摘录有相当大一部分涉及到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理论。马克思把关于这个问题的笔记本加以汇集和整理以后，就在1851年写了一个篇幅不大的草稿(大约三个半印张)，标题是《完整的货币体系》^③。货币集中地体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矛盾本质。货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1953年柏林版第8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46页。

③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524。

币是同商品、价值、价格、生产费用等等这样一些范畴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认识货币，才能对整个资本主义进行全面的正确的科学研究和分析。

马克思实际上推翻了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说。马克思已经超出了几年以前的观点，现在不再认为货币价值是从货币流通量所得出的量。相反地，他认为货币量本身是由通过货币进行交换的商品价格的总额决定的。他在1851年2月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证明，货币流通量不是象李嘉图、劳埃德以及其他许多金融和银行界的理论家和实践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受贵金属的流出和流进调节的，而是受工业和贸易的状况调节的。马克思说：“只有在业务迅速发展，需要更多的流通手段来进行这些业务的情况下，货币流通才会增加……货币流通的增加归根到底是投资增长的结果，而不是相反”。^① 恩格斯同意这个观点，并认为这样提出问题“对于把复杂的流通理论变为简单明了的基本原理，大有帮助”^②。

马克思在1851—1853年所做的经济学摘要中进一步加深了对资本的本质的了解。李嘉图认为资本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财富的组成部分，运用它达到未来生产的目的和通过这种手段可以扩大财富本身。针对李嘉图的这种理解，马克思作了如下批注：“李嘉图在这里把资本同资本的材料混淆了。财富仅仅是资本的材料。资本总是重新供生产用的**价值总和**，即不单是产品的总和，甚至也不是供生产用的产品的总和，而是供生产用的**价值的总和**”^③。 291

从这个论点和其他的论点中不难看出李嘉图和马克思对资本的看法的原则区别。按照李嘉图的观点，资本是物的简单的总和，然而马克思认为资本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即代表商品生产的一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94页。

② 同上书，第220页。

③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1953年柏林版第805页。

的历史阶段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在同李嘉图论战时，只是粗线条地勾画了从科学上揭穿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的道路，换句话说，只是接近于制定剩余价值理论。他写道：“资产阶级的财富和资产阶级全部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不是消费。要增加这种交换价值——且不谈互相欺骗——只有增加产品，更多地生产，此外没有其他办法。”但是，马克思接着说：“商品生产的增长**从来不是**资产阶级生产的目的，**价值生产的增长才是它的目的。**”^①

马克思驳斥了庸俗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按照他们的理论，利润的产生只是由于在资本主义所有者阶级内部巧妙地分配和再分配“总过剩”造成的。要进行分配，首先必须有一些能够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东西。马克思说，过剩本身并不是由贸易引起的，虽然“超额利润经常”也可以在这个范围里产生。“余额不是在这种交换中产生的，虽然只有在交换中才能实现。它是这样产生的：工人从价值二十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只得到价值十个等等工作日的产品。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长，工资价值按同一比例降低。”^②在这里还没有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但是已经指出了它的来源，指出了可以找到资本主义剥削和暴利的根源的范围。

在马克思五十年代初取得的最重要的科学成就中应当提到他的地租理论，他在1851年1月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简要地叙述了这个理论。他在制定这个理论时，认为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错误的，并重新考察了李嘉图的理论的基本论点。

292 李嘉图倾向于认为，把较坏的土地投入耕种，就造成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只有谷物价格上涨，地租总额才能提高。这种观点没有考虑到科学技术进步在经济上的后果，这就意味着承认了臭名昭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1857—1858年》1953年柏林版第804页。

② 同上书，第829页。

著的土地肥力递减的规律，马尔萨斯主义者鼓吹这一规律，力图把人民群众的贫困说成是由“不可抗拒的”自然界现象造成的。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时也指出马尔萨斯主义的土地肥力递减的规律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他揭示了级差地租的形成同农业生产率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同时强调指出，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不一定非引起地租的降低，实际上，当价格随着农业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的时候，地租是增长的^①。

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一理论立即表示热情的支持。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你现在把这一问题彻底弄清楚了，这就更是使你必须赶快完成并出版经济学著作的一种理由。”^②

在1854年到1856年，马克思没有集中研究政治经济学，因为他正忙于为报刊撰稿，研究与政治经济学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学术问题，此外当时他的著作也不可能出版。在这个时期，他重新阅读了自己所作的摘录，“想把材料整理出来，至少也是为了掌握材料，为整理材料作好准备”^③。他又仔细检查一遍过去几年所作的笔记，给《货币、信贷、危机》这份手稿加了标题。

到1857年，当马克思开始重新紧张地研究经济学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在理论上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很快就能完成政治经济学的真正变革了。

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

马克思在集中精力制定新的经济学说的时候，也全面考虑到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75—1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9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32页。

了人类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切领域中所获得的知识。

马克思认为研究自然科学对于进一步论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改进辩证唯物主义方法也具有很大的意义。后来他在关于《资本论》的一份准备材料中写道，自然科学“构成一切知识的基础”。使马克思高兴的是，恩格斯也对这个问题十分注意。他完全支持恩格斯在五十年代末产生的想法，即从哲学上总结自然科学——物理学、生理学等等的成就。

虽然马克思在这段时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进行他的全部研究工作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他没有时间写作专门的哲学著作，但是他仍然认为必须进一步系统地阐述哲学的一般问题及其个别问题。

1857年春，马克思用了一段时间研究美学，打算写一篇有关美学的文章。为此他研究了黑格尔分子的主要著作：弗·费舍的《美学或关于美的科学》，埃·弥勒的《古代人的艺术理论史》，以及其他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有各自的研究领域，但是他们的科学兴趣在许多方面是吻合一致的。例如，马克思研究军事历史问题有时是为了自己需要，有时是为了给精通军事理论和历史的恩格斯收集资料。但是他没有系统地研究过军事历史，在这方面就得完全指望恩格斯这个“曼彻斯特的陆军部”^①了。语言学也是恩格斯精通的另一个领域。马克思也承认自己的朋友是这方面的权威。但是他自己也表述了许多关于语言问题的原则性论点，并不倦地提高自己的语言知识。他的学生们后来回忆了他的一句名言：“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99页。

② 参看《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页。

马克思在侨居伦敦时已经习惯于用德语、英语、法语这三种欧洲语言讲话、思维和写作了。他在古希腊语和拉丁语方面的卓越的知识对他的学术研究工作和阅读古典文艺作品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到伦敦的时候已经能熟练地阅读意大利文了。他不仅从原文阅读他所喜爱的但丁的《神曲》，而且也阅读阿里欧斯托和博雅²⁹⁴多的长诗，讽刺作家彼得罗·阿雷蒂诺的诗，马基雅弗利的喜剧和历史著作，十九世纪意大利作家和政论家圭拉奇、马西莫·德·阿塞利奥等人的著作。他在1852年从意大利文和拉丁文阅读了意大利的伟大思想家和科学殉难者乔尔丹诺·布鲁诺的著作。

1854年春，马克思开始自修西班牙文，选读了卡德龙的《神奇的魔术师》和塞万提斯的《唐·吉珂德》，力求通过优秀的西班牙古典作家的作品去掌握西班牙文。过了五六个月，马克思已经能够为他研究西班牙史阅读西班牙文的资料了。

在马克思的经济和历史研究中，语文学的研究占有相当的地位。例如，为了弄清“资本”、“利息”、“利润”、“产品”这些术语的起源和在中世纪使用的情况，他翻阅了各种语文学工具书，其中包括杜康热的中世纪拉丁文词典。

这几年马克思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是世界史，这是由于他要探讨经济问题而需要经常研究的。他的方法要求一方面借助科学的抽象进行逻辑分析，同时必须分析所研究的现象的具体历史发展，而且必须以后者为根据。同时，马克思认识到必须在考虑历史科学的发展和总结它的成就的基础上来充实历史唯物主义。他为报纸撰稿，力图深入了解当时的事件，还要竭力阐述这些事件的历史根源，这就进一步推动了他的历史研究。

虽然马克思不得不根据制定经济理论的进程或通讯活动的需要而经常改变他的历史研究题目，但是整个说来，他的研究同首先说明历史过程的一般规律性及其具体表现这一任务是完全一致

的。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资产阶级社会，它的历史渊源，它对封建主义的胜利，它的阶级斗争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历史科学中的反映。

马克思在1854年7月27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对复辟时期主要的历史学家奥古斯丹·梯叶里的《第三等级的形成和发展史概论》一书的评论，清楚地表明了他对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的态度。²⁹⁵梯叶里在这本书中认为推动法国历史的是第三等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他详细地解释了自由市（公会）即法国资产阶级的摇篮的兴起。马克思把梯叶里称为“法国历史编纂学中的‘阶级斗争’之父”^①。

马克思对梯叶里的功绩作了应有的评价，同时利用他的书揭露了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甚至在其全盛时期所固有的缺陷。梯叶里及其学派的其他历史学家根本不懂阶级矛盾的物质根源，以为社会之所以划分为阶级主要是因为外国人的入侵。马克思着重指出，梯叶里错误地把第三等级同资产阶级混为一谈，把它看做一个统一的阶级，而没有注意对抗性矛盾就是在它的内部产生的。马克思指出，梯叶里的观点是狭隘的、不合逻辑的，因为他竭力把阶级斗争的规律仅仅局限在封建社会的范围内，甚至不愿意提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斗争的本质和性质的问题。马克思对梯叶里观点的批判，表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对阶级斗争的解释是完全对立的。

继承梯叶里学派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历史编纂学，在理解历史过程的本质方面倒退了一大步。资产阶级历史科学发展中的倒退活动，马克思很快就注意到了。1853年春，他阅读了实证主义创始人之一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某些著作：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1页。

的《社会静力学》一书和他的《从动物繁殖的一般规律引伸出的人口论》一文。在这些著作中已经表现出实证主义所特有的那种把生物学规律机械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庸俗倾向。

马克思化了很多时间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个时代，他在五十年代根据各种书籍所作的那些摘录，说明他对古代史，中世纪初期的克尔特、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命运，对繁荣时期的封建制度都极感兴趣。

马克思发现殖民政策在过去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叶起了重要作用，就把研究侵占殖民地的历史作为他的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1851年秋，他研究了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历史和关于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和秘鲁的许多书籍。1853年4月，当他决定在报刊²⁹⁶上揭露殖民制度时，就开始专心致志地研究东方各国的历史。他研究了关于英国在印度的政策的议会蓝皮书和议会委员会的报告，关于印度、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地理资料和统计资料以及其他文献。他通过东方学家的著作，了解了东方的古代史和中世纪史。他还阅读了欧洲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阿·德·萨尔梯柯夫等人关于东方各国的札记。

在研究东方各国历史的过程中，马克思就伊斯兰教产生的物质前提及其本质，也就是说，对东方宗教运动的阶级根源做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

马克思在研究印度、伊朗、阿拉伯的社会制度时指出，在这些国家里土地私有制的发展非常缓慢。他在1853年6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东方……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①在马克思看来，土地绝对归国家所有，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必须实现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6页。

中央政府负责的人工灌溉。他认为，公共工程集中在专制国家手中，村社还有生命力，它们闭关自守、与世隔绝，这都是亚洲各国发展所以缓慢并带有“停滞性质”的因素^①。当西方已经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的时候，在东方却推迟了比较进步的社会制度的成熟过程。马克思强调指出，这种情况造成了致命的后果。它削弱了亚洲各国人民对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抵抗，造成了许多亚洲国家处于殖民地的、依附的地位。

马克思在制定对外政策的革命策略时遇到了大量的和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了弄清所谓东方问题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从他1853—1854年做的笔记中整理出关于巴尔干半岛各民族历史的大量材料。他还研究了一系列公开发表的外交文件，包括发表在《公文集》上的文件。

在1856年几个月的时间里和在1857年上半年，马克思特别
297 紧张地研究了十八世纪的俄英关系，从该时期的小册子、回忆录、外交文件和历史著作（例如，施洛塞尔的《十八世纪史》）和关于英国、瑞典、俄国的历史的著作中收集资料。

这些摘录表明，马克思——沙皇制度的坚决的反对者——当时就已经对俄国人民群众的状况、风俗、日常的生活、过去的历史发生了兴趣。他对俄罗斯人民的有历史意义的文物古迹也感兴趣。他通过法国语文学家艾希霍夫《斯拉夫人的语言文学史》一书，发现了古代俄罗斯史诗《伊戈尔远征记》的法译文，并指出这部著名作品具有英雄主义的史诗性质。他在1856年3月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部史诗的要点是号召俄罗斯王公们在一大帮真正的蒙古军的进犯面前团结起来。”^②

这几年马克思还研究了波兰的历史，在1857年初还阅读了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7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3页。

主派历史学家列列韦尔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欧洲均势中的波兰民族》，以及其他著作。

作为无产阶级的学者，马克思特别关心群众运动和革命事件的历史，尤其是它们同民族解放斗争交织在一起的那些国家。1854年5—6月，他专门收集了关于1848—1849年意大利革命和马志尼主义者在这一时期的活动的材料。1854年9月2日，当革命斗争在比利牛斯半岛激烈展开的时候，他告诉恩格斯：“我当前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西班牙。”^①他的摘录了各种资料的五本厚厚的笔记本，说明他结合西班牙的全部历史和国际状况研究了西班牙的资产阶级革命时代。

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 维护德国工人中的革命传统

当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实际条件还不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努力为此逐步地准备基础了。马克思利用每一次机会同工人运动的参加者保持联系，收集关于工人的状况和情绪以及某些地方存在的秘密小组的情况。在工人运动不受禁止的英国和美国，马克思竭力通过自己的朋友和战友来影响那里的工人运动的发展。他促进了这些国家的工人报刊的出版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宣 293
传。虽然有许多困难，他还是设法使各国无产阶级活动家建立了国际联系。

马克思首先竭力从思想上影响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成长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骨干，引导他的同志们利用战斗的间歇去获取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88页。

需要的知识。他不遗余力地鼓励他的学生和战友李卜克内西、沃尔弗、埃卡留斯、施拉姆、普芬德、罗赫纳、伊曼特、皮佩尔等人努力扩大眼界，成为坚定的革命家，善于在艰难时期克服一切困难，对革命事业的胜利充满坚强的信念和决心。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时写道：“学习！学习！这就是他经常向我们大声疾呼的无上命令。他自己就是这方面的榜样，你只要一见这位伟大的智者永不停息的顽强的学习精神，也会有这样的感觉。”^①

马克思本人经常受到贫穷的煎熬，但是对党内朋友却关怀备至。他不止一次地把他最后的几文钱交给他们。马克思的家庭的确很俭朴，但是经常成为革命流亡者的避难所。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被告人阿伯拉罕·雅科比医生于1853年6月到达伦敦，就受到马克思的热情接待。雅科比虽被宣告无罪，但是他害怕重新被捕而不得不出国。威廉·皮佩尔经常是长期地住在马克思的家里。其他流亡者也是往来不绝。

马克思花了不少精力帮助同志们安排财务、挣钱谋生，1853年他曾设法为埃卡留斯在美国找一个有报酬的撰稿工作，因为他的裁缝工作不能维持生活。1859年2月，埃卡留斯的肺病加重，马克思就典当自己妻子的衣服来接济他的朋友及其家庭。康拉德·施拉姆在美国没有找到工作于1857年夏天回到英国，由于健康状况需要住到泽稷岛去，这时马克思就和恩格斯一起照料他。

马克思对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反动年代遭受的每一个损失都感到非常难过。他对罗兰特·丹尼尔斯在1855年死于肺病特别悲痛，在科伦案件酝酿期间，丹尼尔斯在普鲁士监狱里已经遭受了一年半的严重折磨。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愤怒地写道：“他完全是普鲁士警察卑鄙行径的牺牲品。”^② 1856年7月30日，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456页。

格奥尔格·维尔特在古巴岛因黄热病亡故；1858年1月中旬，马克思曾在泽稷岛看望过的康拉德·施拉姆又死于肺结核。

马克思十分痛心的是一些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犹豫动摇，消沉苟安，经受不住资产阶级世界的诱惑。这种庸俗的习气使马克思的一些战友（德朗克等人）不再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了。

马克思绝不容忍政治上的叛变行为，毫不犹豫地同背叛工人阶级的人断绝关系。例如，在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过去的活动家海尔曼·贝克尔、毕尔格尔斯和米凯尔投入资产阶级营垒的消息证实以后，他就不再承认他们是他的朋友和熟人了。相反地，他对已经认识自己错误的人却很宽容和体谅。1856年春天，马克思同共产主义者同盟内的宗派集团的领导人之一沙佩尔和解了。

虽然有许多困难，马克思还是设法同各国无产阶级组织和民主团体的代表保持接触，并且特别重视他同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的联系，那里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已经转入地下进行革命工作了。

1853年12月底，德国社会主义者古斯塔夫·勒维作为德国西部共产主义者同盟从前各支部的代表从杜塞尔多夫来拜访马克思。勒维向马克思报告了莱茵省工人的革命情绪，希望得到马克思对他们的武装起义给予精神上的支持。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条件竭力解释这样做是不适时的和鲁莽的。

两年以后，在1856年2月，勒维受杜塞尔多夫工人的委托再次来拜访马克思。马克思从他的报告中得知在莱茵省工人中正在进 300 行革命宣传，工人们依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他们的领袖。他们请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莱茵地区爆发无产阶级起义时去进行政治和军事领导。马克思非常耐心地 and 审慎地向德国工人的使者说明革命策略的原理，要他转告莱茵工人：没有德国革命的普遍高涨

和欧洲革命形势的出现，莱茵省的起义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强调说，如果巴黎无产阶级发出了革命信号，那时就应当以最大的决心和革命毅力采取行动。目前还必须保持镇定和耐心。^①

马克思认为，同德国工人保持联系，在德国工人中间维护和加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传统，是对德国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教育和国际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

马克思和五十年代的宪章派

马克思经常帮助那些为了在新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恢复宪章主义宣传而在五十年代进行真正英勇努力的宪章派革命左翼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宪章派全国协会尽管它的人数大大减少了，但在有利的条件下一定能够成为英国群众性无产阶级政党的核心，因为英国几乎是当时已经有可能建立这样政党的唯一的国家。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那样注意英国的工人运动。

马克思大力支持宪章派领袖琼斯出版宪章派从1852年5月8日开始发行的周报《人民报》。马克思不仅本人为该报撰稿不取报酬，而且还吸收埃卡留斯、皮佩尔、克路斯参加撰稿工作。在报纸出版的最初一年半的时间里，该报除了声明以外，一共发表了十七篇马克思的文章，其中包括《帕麦斯顿勋爵》一组著名文章。他结合五十年代英国的具体条件，向工人报纸的读者阐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原理。

在《人民报》危机重重，编辑部困窘不堪的时候，马克思总是向琼斯提供帮助。他在1852年9月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尽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9—30页。

管我自己经济困难,却整天整天同他一起从本丢到彼拉多^①,为他的报纸筹集资金到处奔走。”^②马克思直接参加该报的编辑工作。由于他的帮助,《人民报》成了战斗的、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报纸。

宪章派在1853年企图利用英国的罢工浪潮,吸引工人参加争取人民宪章的斗争。马克思在他的文章中强调指出了这次罢工运动的意义,他写道,如果工人不反抗厂主对他们的经济利益的进攻,“大不列颠和全欧洲的工人阶级就会成为精神萎靡、智力落后、内心空虚、任人宰割的群众,这样的群众是不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的,正如古希腊罗马的奴隶不能用自己的力量取得解放一样”^③。同时马克思非常赞同琼斯在群众集会和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讲话,他在这些讲话中论证了仅仅为经济需要而斗争是不够的,必须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

1853年底和1854年初,宪章派筹划建立名为“群众运动”的广泛的工人组织。这种组织应该把工联、没有加入组织的工人、宪章派小组联合起来,由定期召开的工人议会作为“群众运动”的领导机关。

根据琼斯的倡议,英国的第一次工人议会于1854年3月6日至18日在曼彻斯特举行。马克思作为名誉代表受到了邀请,由于不能亲自去曼彻斯特,他在1854年3月9日给工人议会寄了一封信,该信发表在《人民报》上。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向英国无产阶级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④的战斗任务。

① 此语出自圣经《路加福音》第23章。本丢·彼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总督。耶稣被捕后,被送到本丢那里受审,本丢知道耶稣是加利利人,属希律所管,就把他交给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彼拉多。人们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到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徒劳往返,不解决问题。——译者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1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134页。

但是，马克思对工人议会的希望没有实现。在工人议会中，典型的工联主义分子占了优势，他们忽视工人运动面临的重要的实际问题，却花大部时间用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来讨论解决社会问题的计划。在制定纲领时，琼斯和他的同志们对工联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合作社主义者在思想上做了重大的让步，没有坚持把宪章派的政治要求写进纲领。这样的纲领不可能成为争取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的基础。“群众运动”这个组织很快就不存在了。

1855年夏天，宪章派在伦敦组织了两次声势浩大的群众示威，抗议议会通过损害工人利益的禁止星期日交易法案，因为工人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才领到一周的工资。1855年6月24日星期日
302 和一个星期以后的7月1日星期日，在伦敦海德公园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马克思和李卜克内西一起参加了这两次事件，在遭到警察镇压的第二次示威中险遭逮捕。

虽然群众的积极性这样高涨，但是在宪章主义旗帜下的工人阶级的运动整个说来更加衰落，显然英国工人已经对政治活动失望和漠不关心了。但是就在这样严重的时期马克思仍不断地支持宪章派，竭力鼓励他们，坚定他们的信心。1856年4月14日在纪念《人民报》创刊四周年的宴会上，马克思发表了一篇极为鼓舞人心的演说，这篇演说对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到来，对无产阶级创造性的革命力量充满了坚定的信心。

琼斯本人的行为开始引起马克思的不安和痛心。他不是和群众中进行顽强的工作，而是醉心于昙花一现的、毫无前途的政治运动，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一起建立各种国际委员会、协会等等。马克思经常警告琼斯，在当时的情况下同激进主义者接近，可能造成无产阶级运动失去独立性的后果。他建议琼斯把活动的中心转到工厂区，而不要浪费精力去支持资产阶

级和小资产阶级分子。

但是琼斯没有接受马克思的建议。琼斯同激进主义者达成妥协，马克思就不能再继续给《人民报》撰稿了。1858年初，宪章派全国协会实际上已经解散。同年6月，《人民报》落入资产阶级实业家手中。虽然马克思很难同一个和自己并肩战斗过的老同志断绝友谊关系，但是他对这种动摇还是采取了不调和的态度，他同琼斯决裂了。1859年2月1日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痛苦地写道：“我已同厄内斯特·琼斯决裂了。”^①六十年代初，这位老的宪章派领袖又采取了革命的立场，马克思便同他恢复了友谊。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思想上的动摇是因为英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的倾向加强了，其原因在于：英国在全世界实行工业垄断和殖民垄断，英国资产阶级靠殖民掠夺聚敛了过多的财富，它用收买软化的手段从自己的利润中拿出一点施舍来养肥工人阶级的上层。英国无产阶级之所以四分五裂、瘫痪无力，是因为资产阶级收买了工人贵族，而工人贵族的影响就表现在自由派工联主义分子占据优势和宪章派的革命传统遭到遗忘。³⁰³

同美国工人运动的联系

共和制度和一定的民主自由，提供了在美利坚共和国北部各州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的可能性，尽管南方的种植场奴隶制还束缚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一些工人不断地向西部这块自由的土地转移。在本地美国工人和来自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的移民工人之间时有争吵。无产阶级群众在思想上还很不成熟。

马克思通过约瑟夫·魏德迈和阿道夫·克路斯这两个共产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1页。

义者同盟盟员同美国的进步工人保持联系。从1851年到1854年下半年，马克思同克路斯一直保持经常的通信联系，这种通信联系由于克路斯放弃了共产主义的宣传才告中断。牢固的友谊纽带把魏德迈（直到1866年他去世之前）和马克思联结在一起。克路斯和魏德迈是在美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他们在美国出版马克思的一些著作，在报刊上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这方面他们还得到1853年移居美国的阿·雅科比的一定的帮助。

马克思支持魏德迈在美国建立一个象共产主义者同盟那样的无产阶级组织的尝试，尤其赞同魏德迈参加1853年3月成立的广泛的美国工人同盟的创建工作。同盟的大多数成员是工人流亡者，魏德迈力图把同盟变成未来的美国工人政党的核心。

马克思的朋友们竭力利用在纽约出版的德文报纸《改革报》在美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该报于1853年3月5日创刊，不久便成为美国工人同盟的机关报；它一直出版到1854年4月底。马克思热烈赞同魏德迈和克路斯力图对该报编辑部施加影响并把该报变成无产阶级的报刊。他设法从欧洲向他们提供资料，约请琼斯、埃卡留斯、皮佩尔为报纸撰稿。马克思允许克路斯在《改革报》上发表他和恩格斯定期为美国报纸撰写的文章的德译文，不必支付稿
304 费。他给克路斯和魏德迈拟定一些美国读者关心的题目，以便反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当时流行的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凯里的理论。

由于马克思的帮助，《改革报》成了美国优秀的工人报纸之一。当报纸由于资金困难，以及编辑部小资产阶级成员的立场引起的内部分歧而停刊时，马克思感到非常惋惜。他在1854年5月22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改革报》停刊了，叫人很可惜。”^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62页。

1857年10月，与魏德迈有联系的一批德国流亡者弗里德里希·康姆和阿尔勃莱希特·康普等人，在纽约成立了共产主义者俱乐部。它的积极活动家之一是参加过巴登起义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俱乐部的成员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并用这些著作在工人中进行宣传。俱乐部的领导人设法同马克思取得直接联系。1857年12月康姆写信给马克思说：“鉴于您为共产主义思想正在进行并且将一直继续进行理论的和批判的斗争，毫无疑问，您也就是旧大陆共产主义者的导师和党的领袖，因此，本组织同您联系，就象同它的中枢联系一样……”^①

共产主义者俱乐部的代表建议马克思在欧洲重建共产主义者同盟，他回答说，欧洲各国工人运动发展的新的条件不允许重新恢复这种团结无产阶级力量的相对狭隘的形式。因此他认为主要的任务是，为建立群众性的组织准备条件，首先是制定革命的理论。

为进步的资产阶级报刊撰稿

马克思认为，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政论文章能够顺利发表的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可以在资产阶级民主报刊和一般的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在反动统治情况下，通过这个途径去影响舆论尤为重要。所以马克思接受了美国资产阶级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1851年8月初向他提出的聘请他担任驻伦敦通讯员的建议。当时马克思十分需要有这份工作，因为他已经没有任何收入了。

《纽约每日论坛报》是美国发行量最大的刊物之一。该报由出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945。

305 身低微后来成为大出版商的霍拉斯·格里利于1841年4月创办。《论坛报》成了表达资产阶级进步集团的经济理想和政治理想的喉舌。它主张限制黑人奴隶制的蔓延范围,支持解放黑人的运动,虽然并不赞同运动的最坚定的代表。由于资产阶级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之间的冲突已经不可避免,报纸采取这种方针是符合广大的社会各阶层的情绪的,从而逐步吸引了广大的读者。而报纸价格低廉也可以说是一个原因。

编辑部另一个有势力的成员查理·德纳的观点比格里利更为激进,他曾经和美国的一些傅立叶主义者有密切的联系,并一直对社会主义学说抱有兴趣。1848年秋天,德纳在科伦认识了马克思,对马克思的智慧和学识有极其强烈的印象。正是他提出了应该邀请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的建议。

恩格斯对马克思决定接受德纳的建议也表示赞成。为了使正在研究经济学的马克思能够立刻拿出点实在的东西兑现他为报纸撰稿的诺言,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要求着手写《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组文章。1852年8月,马克思本人也参加了写作。最初他是用德文写稿。稿件通常由恩格斯在曼彻斯特译成英文后寄往纽约。但是在1853年1月马克思“第一次冒险自己用英文为德纳写了一篇文章”^①。恩格斯看到马克思第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之后,立刻高兴地写道:“请接受我的祝贺。英文不仅写得好,而且很出色。”^②

后来这两位朋友对选题作了某种分工。马克思侧重于阐述经济学原理,欧洲各国的对内和对外政策,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发展。而恩格斯则几乎全部承担对军事事件的分析,但是也写许多关于其他问题的文章。有些通讯是他们两人合写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52页。

马克思对撰稿任务非常认真负责。为了写一条通讯或一篇短文他往往要事先作大量的研究工作。恩格斯后来在谈到马克思为《论坛报》写的那些文章时写道：“这不是一些普通的通讯，它们是根据认真的研究写出的，而且往往是包含一系列对于欧洲某一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详尽评论的文章。”^①与《论坛报》上的其他材料相比，这些文章的特点首先是对形势、事件、知名人士的分析十分深刻和准确；这些文章也包含着重要的理论总结。

马克思把撰写通讯这项工作紧密地结合着他的理论研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理论研究。他把他所收集的许多材料和做出的科学结论都用在他的文章中。另一方面，撰写通讯需要经常注意当前的事件和实际情况，注意具体的经济问题，这也为他的理论分析扩大了基础。马克思后来把他在《论坛报》上的许多文章的内容用在他的经济学巨著中。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经常撰写通讯使他熟悉了许多“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②。

马克思的文章很快引起了《论坛报》读者的特别注意，这就提高了该报的声誉。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文章在当时的新闻界是罕见的理论财富。例如，1853年4月7日，编辑部认为应当在社论中赞颂本报记者的“非凡才能”。社论写道：“马克思先生有他自己的非常明确的见解，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我们决不能赞同，但是，不读他的文章的人，在获得现代欧洲政治的重大问题的消息方面，将失去一个最有教益的来源。”^③德纳在1853年7月1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向她证实说，她丈夫的文章得到出版界人士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5页。

③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39页。

读者大众的高度评价。^①其他一些美国报纸，如《纽约时报》，全文或摘要转载了马克思的某些文章。这些文章在欧洲是尽人皆知的。

但是，尽管《论坛报》的编辑们可能是进步的，他们也是以纯粹
307 雇主的态度对待撰稿人，竭力以最少的报酬从撰稿人那里挤出最多的东西。最初根本没有规定应该付给马克思多少稿酬，而微薄的稿费又要拖延很久才支付。

编辑部有时不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因为编辑们认为资产阶级读者的要求改变了，或者因为他们不同意文章的内容。1856年夏天，德纳就把恩格斯写的关于泛斯拉夫主义的一组文章退给了马克思。马克思本人写的抨击沙皇俄国和波拿巴主义法国对多瑙河各公国的政策的文章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编辑部对于所发表的文章采取随心所欲的态度，常常对文章任意增删，有时增加一些与文章内容完全矛盾的文字。编辑还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相当一部分通讯作为社论，不署名发表。这种“并吞政策”^②使马克思非常气愤，但是他的抗议却完全无效。

编辑部有时规定文章不应反映某一党派的观点，这对阐述这样或那样的题目是严重的阻碍。1853年12月德纳要马克思写一组关于德国哲学的文章，同时强调说这些文章不应当刺激美国人民的宗教感情，换句话说就是要求马克思不要鼓吹无神论的世界观^③。这些条件马克思当然不能接受。1857年4月，德纳建议马克思为《论坛报》编辑部里一些进步的记者出版的《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这时，又向马克思规定了类似的条件。这样，马克思就简直不能写作关于哲学史、宪章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章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66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06页。

③ 参看查·德纳1853年12月16日给燕妮·马克思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705。

了。因此他只好主要限于写军事条目，就象恩格斯开玩笑说的，写“勇敢的军事家”^①，写历史活动家的传记。大部分条目是恩格斯写的，马克思为百科全书写了几篇关于拿破仑的元帅和外交官布律恩、贝尔蒂埃、贝西埃尔、贝尔纳多特、布里昂的传略，领导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的玻利瓦尔和参加过德国 1848 年革命的罗伯特·勃鲁姆的传略。

马克思几乎要同《论坛报》断绝关系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意识到必须通过报纸这个渠道同读者群众保持联系。他在文章 303 中尽量采取灵活的、有时是暗示的形式表达革命无产阶级的观点。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顾报纸编辑们的愿望，还是利用了资产阶级报纸来揭露资产阶级制度。即使是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马克思也是设法回避编辑部提出的关于写纯学术性条目的要求。他写的那些条目表达了革命唯物主义的信念，反映了党对他所阐述的事件的态度。

1854 年秋天，马克思通过拉萨尔接受了另一个请求——为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新奥得报》撰稿。该报是 1849 年 3 月在革命时期在布勒斯劳（弗罗茨拉夫）创办的，是反动时期最初几年保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持反对立场的报纸之一。虽然它有许多缺点，但在当时却是德国唯一的一份公开民主派的报纸。马克思在给该报编辑埃尔斯纳的信中写道：“《新奥得报》最大限度地刊载了在目前出版条件下可以刊载的一切。”^②给该报撰稿使马克思能够同德国读者建立直接的联系。马克思意识到，在反动的德国，进步报纸的出版者必然会遇到书报检查和其他方面的困难，因此他认为他有义务尽量支持《新奥得报》“同当局进行的隐蔽的斗争”^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123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630 页。

③ 同上书，第 618 页。

1855年1月2日,《新奥得报》发表了马克思的第一篇文章。以后几个月,马克思就每周定期寄去两篇通讯,有时还不止两篇。当他知道报纸缺少资金以后,就表示准备无偿地为报纸写稿。他同时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奥得报》撰写通讯,有时还为后者翻译恩格斯用英文为美国报纸写的关于克里木战争进程的军事述评。

1855年秋天,报纸的经费更加拮据,受到了停刊的威胁。它勉强出版到年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他们在《新奥得报》上的文章,启发德国和欧洲的进步的民主界在克里木战争引起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中注意革命的策略。他们的许多文章都是针对着普鲁士统治集团同沙皇俄国的继续调情的。他们也用隐喻的方式批判德国的首先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的立场。马克思在许多文章中揭露了英国立宪制度的反人民的特点,揭穿了自由派的政治理想(他们认为英国的立宪制度是未来德国国家制度的典型),从而打击了资产阶级民主派本身的立宪幻想。马克思通过描述英国无产阶级采取的一些行动使德国读者懂得:已经有迹象表明群众中的革命热情将有新的高涨;即使在反动年代工人阶级的战斗精神也没有被扑灭。

政论家马克思

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和《新奥得报》上发表的文章和通讯,鲜明地表现出这位无产阶级政论家的特点:善于在反动统治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通过对资本主义、欧洲各国的反动政治制度、统治阶级的反人民政策的深刻揭露来唤起群众的革命精神。马克思毫不留情地批评反动派和好心的资产者散布虚假的乐观主义,他

们力图证明反动时期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生活中不再有革命震荡的时代的开端。他嘲笑那些把工商业的暂时繁荣描绘成持续富裕的开始的“官方的经济预言家”^①。马克思写道：“没有一次繁荣时期，他们不利用机会断言：这一次不会有坏的一面了，这一次战胜了严酷的命运。”^②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完全相反，他在经济繁荣达到最高潮的时候预言：下一次危机将比1847年的危机更严重，规模更广。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思想家断言经济繁荣已经给劳动人民群众带来了持久的幸福，这完全是骗人的。他列举无数事实证明经济高涨丝毫没有减轻劳动人民的灾难，没有阻止下层群众日益贫困化，也没有使工厂里的工人免遭社会压迫以及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摧残，更没有根除工人阶级的可怕的灾祸——失业现象。

马克思指出，饥饿和被迫迁居外国这两种社会现象有力地说明劳动群众为资本主义的繁荣付出了何等的代价：在集中全世界 310 财富的商品堆积如山的英国，人们往往由于极度虚弱在壮年时就遭到夭折，成千上万的劳动者由于贫穷困苦、没有土地，只好离乡背井，迁居大洋彼岸。马克思不断强调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财富的增长是靠绝大多数人的破产和难以置信的苦难实现的，而财富增长的果实却为一小撮剥削者所占有。在这样的社会里，进步就象“可怕的异教神像那样，只有用人头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③。

马克思如实地描绘了资本主义的现实，从来没有陷入总是悲天悯人、满腹牢骚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伤感情调。作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他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就和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22页。

② 同上书，第4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5页。

盾的加深一定会引起为新社会制度奠定基础的未来的社会革命。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①

马克思怀着饱满的革命热情坚信：无产阶级的力量将日益壮大；历史每前进一步，无产阶级就会更快地实现改造世界的伟大使命。马克思敏锐地觉察到并在文章中反映出工人阶级力量强大的每一个征兆。在反对反动制度的斗争中，他把主要希望寄托在工人阶级身上。不论客观形势如何，是如火如荼的革命还是黑暗的反动，马克思始终信守他的目的：帮助无产阶级认清自己的历史任务，坚定不移地唤起无产阶级去进行斗争。

关于英国政治制度的文章

马克思非常注意英国这个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发达的国家，主要是根据这个“资本的首都”的经济发展，研究了资本主义世界中发生的过程。他还全面地分析了英国的国家制度、统治阶级的政策、各种政党和政治派别的立场。他在《英国的选举。——托利党和辉格党》、《宪章派》、评论 1852—1855 年阿伯丁联合内阁的一组通讯、抨击性小册子《约翰·罗素勋爵》、《不列颠宪法》、《帕麦斯顿和英国的寡头政治》、《英国的选举》以及其他许多文章中，专门论述了英国的状况。

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之一就是揭穿自由派关于资本主义的英国是自由和政治平等的堡垒的神话。他竭力消除在“资本专横和劳动被奴役达到了顶点”^②的这样一个国家周围所虚构的光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75 页。

② 同上书，第 76 页。

马克思指出,虽然英国人民赢得某些民主自由,但是英国的政治制度完全是建立在保守原则基础上的。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主要是金融和商业资产阶级)享有不可动摇的政治特权,他们垄断了政府职位,占据了几乎全部官职和议会席位。政权由两个执政党轮流执掌,时而是托利党——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地租的狂热的拥护者”,时而是辉格党——“资产阶级的,即工商业中等阶级的**贵族代表**”^①。这种两党制使执政的资产阶级贵族的寡头政治能够巧妙地巩固自己的统治,能够用各种政治力量的自由竞赛的假象来欺骗群众。

马克思发现了当时出现的土地和金融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联合、寡头政治制度更加符合后者的利益的过程,发现了逐渐具有公开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政党的改组已经开始。托利党变成了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即保守党,辉格党变成了包括中小资产阶级广大阶层的自由派的政党。

马克思强调指出,资产阶级寡头政治制度束缚国家的发展,阻挠任何民主改革。议会的立法活动无非是一套治标措施,这在预算和财政改革方面尤为显著。马克思指出,在编制预算时,寡头政治的代表竭力避免超过那一条界限,“超过它就开始对工人有利,而使贵族和资产阶级受到损害”^②。

政论家马克思常常通过对英国寡头政治的知名人物的政治素描来揭露英国的寡头政治。他描绘的十九世纪英国政界人物——帕麦斯顿、罗素、阿伯丁、克拉伦登、格莱斯顿、得比、迪斯累里等人的肖像色彩丰富,笔调泼辣,同时非常准确地勾画了英国资产阶级贵族政客们的特点。马克思也狠狠地批评了寡头政治的资产阶级对手即自由贸易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的首领——布莱特和科布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82、3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75—76页。

他们的政策模棱两可，十分害怕群众的发动，仇视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马克思写道，自由贸易派“宁愿同垂死的对手勾结，也不愿用实在的、并非表面的让步去加强日益成长的、掌握着未来的敌人”^①。

马克思在谴责英国反人民的政治制度的同时，作为客观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也对这种制度采取具体的历史的态度。当时英国的制度尽管是保守的，但是比在大陆上建立的那些制度对工人更有利。英国有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虽然是残缺不全的。英国无产阶级有可能通过所谓“外来压力”对议会和政府施加一些影响。与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不同，英国居民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英国当时还没有发达的大陆式的军事官僚国家机器。考虑到这些情况，马克思当时认为，英国与欧洲大陆各国不同，政权有可能和平地转到工人阶级手中。为了保证英国无产阶级能根据情况采用和平或非和平手段接管政权，马克思认为必须彻底改革现存的议会制度，使国家的整个政治制度民主化。这就是他为什么如此重视宪章派的纲领并且如此积极地支持恢复宪章运动的宣传的原因。

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宪章派要求普选权，其意义与在大陆上不同，在大陆上这种要求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纲领的范围，有时甚至被反革命势力用来蛊惑人心，例如在波拿巴的法国。在英国，普选权的要求——连同其他一些激进的要求——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口号。马克思写道，在英国实行普选权和实现宪章派的人民宪章的其他各项要求必将导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②。他认为提高英国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建立英国工人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实现这一点的最重要的前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0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391页。

同欧洲大陆上的反动制度进行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波拿巴主义不仅是法国而且也是整个欧洲工人阶级和民主制的主要敌人之一。同它进行斗争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一项首要任务。

马克思在为报刊写作的那些文章中，补充了他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对波拿巴制度的深刻分析。他写的关于这个题目的每一篇文章，就是一篇愤怒谴责法国波拿巴集团专横行为的抨击文，为科学探讨资产阶级社会执政的上层人物及其国家的反革命演化过程增添了新的一页，也为研究波拿巴君主政体这种资产阶级国家形式的本质添了新的一页。

马克思在《小波拿巴法国》、《对波拿巴的谋杀》、《御用军人的统治》和其他文章中强调指出，波拿巴国家反映了资产阶级日益增长的反革命趋势，反映了资产阶级借助“雪亮军刀的统治”^①，借助露骨的暴力和警察专制转变为公开的独裁统治。波拿巴制度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社会上层分子腐化的迹象。贪污行贿、盗窃国家财产的现象盛行于这个寄生性国家机关的一切部门，其中包括陆军部。马克思在1856年春天写道：“腐蚀法国军队的毒瘤——偷窃财物和盗用公款——是没落帝国的固有原则。”^②

在《法国调整粮食价格的方案》一文和其他著作中，马克思指出，拿破仑第三玩弄典型波拿巴式的手腕——在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看风转舵；同时他还竭力扮演农业法国的庇护人，“城市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4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668页。

级的社会主义的先知”，法国资产阶级眼中的“财产的救主”^①。马克思在他的通讯中指出，这种“安抚一切阶级”的政策完全是虚伪的。但是他并没有把波拿巴当局“收买法国工人阶级良心”^②的企图看作是一场无害的闹剧。他认为他的义务就是要提出警告，防止波拿巴的社会蛊惑宣传以及它对工人中的不坚定分子的腐蚀作用。

马克思认为，波拿巴集团为了自己的利益竭力利用民族运动也是一大威胁。马克思警告科苏特和马志尼不要与波拿巴集团接近，因为这可能使他们无意中变成波拿巴阴谋的工具，使匈牙利和意大利的民族解放事业遭受损失。1858年3月他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满意地指出，杰出的意大利民主主义者已经在民族问题上认清了波拿巴政策的实质。

马克思的这些文章揭示了为大金融巨头和实业家广开财源的第二帝国政体的阶级内幕。他写道，不受限制的买空卖空已经把法国变成了“赌场”^③，交易所的投机成了这个粗暴地藐视经济规律的帝国的一条“根本原则”^④。马克思有一组文章专门论述了受到拿破仑第三特别庇护的银行Crédit Mobilier〔动产信用公司〕。这个银行不仅经营信贷业务而且还投资于工业企业、运河、铁路，马克思在分析它的业务时发现银行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开始有了改变，这也就是很久以后在资本主义最后阶段才获得发展的过程的萌芽。他预言：“在工业上运用股份公司的形式，标志着现代各国经济生活中的新时代。”^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89页。

② 同上书，第4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71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226页。

⑤ 同上书，第37页。

马克思非常敏锐地看出，波拿巴报刊竭力吹嘘法国的经济“成就”，宫廷被装饰得富丽堂皇，改建首都——其实是为了“防备这个城市爆发不满事件”^①——这都不过是掩饰第二帝国的内部不稳和行将垮台的一种手段，为了不致垮台，统治集团不惜采用对外冒险的办法。广大阶层对这种制度越来越感到不满。马克思在 1857³¹⁵ 年指出，在法国“社会表层由于地下火的影响在徐徐波动并向上隆起”^②。

马克思竭力设法表明，在第二帝国制度不可避免的倾覆中，起决定作用的将不是资产阶级反对派，而是人民群众，首先是英雄的法国无产阶级。1853 年 3 月 5 日，在参加著名革命家拉斯拜尔的妻子葬礼的巴黎工人举行反对波拿巴制度的游行示威后，马克思给克路斯写道：“你看，无产者的狮子并没有死去。”^③他对正在狱中受折磨的法国工人领袖布朗基的不屈不挠的革命毅力寄予很大的希望。

马克思一再指出，欧洲的反动势力是靠各国反革命政府的联合力量支撑着的，霍亨索伦的普鲁士也积极参加了这个特殊的宪兵—警察集团。

马克思有不少通讯专门论述了普鲁士的局势。所有这些通讯充满着对反动的普鲁士主义、对普鲁士君主制度这个德意志联邦的反革命堡垒里的警察官僚制度、对保守落后的容克地主的强权的不调和的斗争精神。

马克思在《普鲁士国王的疯癫症》、《普鲁士状况》以及其他一些文章中指出，普鲁士反动派正在彻底消灭 1848 年革命时期实现的政治改革的一切痕迹，彻底消除对这可怕的一年的回忆。这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468 页。

② 同上书，第 256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8 卷第 580 页。

是对1848年宪法进行大删大改的用意。马克思指出：“整个这一无休无止的过程，就是为了要把这块七拼八凑的东西所具备的那些令人想起它的革命渊源的特点彻底抹掉。”^①马克思把普鲁士议会叫做“简单的虚设机构”，“虚有其表的机关”^②。

马克思在《霍亨索伦王朝的神权》一文中指出，这个王朝的兴起本身，说明一直维持到十九世纪的普鲁士的政策是特别反动的。不断地抢劫，背信弃义，背着邻国同强国进行阴谋勾结以便靠牺牲邻国自己捞一把，这就是那些后来当上普鲁士国王的勃兰登堡选帝侯们为达到掠夺目的而采用的传统手法。

马克思认为，普鲁士专制制度的竟然恢复是德国资产阶级懦弱胆怯和优柔寡断的结果。最后他得出结论：普鲁士的资产阶级，以及整个德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能采取坚决的反政府的行动，对人民运动怕得要命，一心一意地追逐高额利润，对于反映反对现存制度的进步哲学已经不再感到兴趣；“思想领域内的投机已经让位给有价证券的投机”^③。

马克思指出，容克地主和官僚的傲慢自负，资产阶级的奴仆般的顺从，决不证明德国的反动制度有牢固的基础。工商业在国内蓬勃发展。柏林从贵族的练武场变成了机器制造的中心。新的银行在数量上比德国议会中的公爵还要多。工业变革的后果——无产阶级的形成以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破产——再加上尚未解决的统一国家的历史任务，使德国的社会局势十分紧张，所以马克思才指望欧洲的这一部分土地上立即发生社会和政治变化。

奥地利帝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支柱之一。这个多民族的、七拼八凑的专制帝国靠挑起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民族之间的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5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713页。

纷支撑着。马克思在《奥地利的破产》一文和其他著作中强调指出，历史的洪流冲垮了几百年以来的反动的君主制度的基础。即使采用官僚警察的手段也不能阻止离心力的增长，民族解放斗争的发展，国内危机的加深，财政和其他困难的加剧。

马克思在 1853 年就指出，反动的统治者在自己周围布满了军队、绞架、监狱，当“革命地震的预报刚刚发出，他们就感到欧洲所有的王位都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①。马克思使读者们清楚地懂得，当革命的风暴再一次席卷大陆的时候，这些腐朽的制度将会有怎样的下场。

揭露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政策

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起，马克思在他的学术和政论活动中对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的历史命运越来越感到兴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落后国家的殖民奴役。英国于 1849 年吞并旁遮普，从而完成对印度的征服，1852 年占领缅甸的勃固省，进行殖民战争，侵略中国（1840—1842 年，1856—1858 年，1860 年）、阿富汗（1838—1842 年）、伊朗（1856—1857 年），还扩大它在南部非洲的占领地盘。法国殖民主义者参加远东的征服冒险，向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部落进行讨伐。美国资产阶级开始积极参加殖民扩张。但是，亚洲和非洲各国人民群众对殖民主义者的反抗也日益加强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意在东方发生的事件，并且经常在报刊上评论这些事件。他们揭露殖民政策的基本的特点，规定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8 卷第 602 页。

阶级对被压迫人民解放斗争的立场，从而发展了革命无产阶级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学说的原理，加深了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理论论证。马克思对殖民地问题的研究也为他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方面提供了补充材料，这一点后来在他的《资本论》中也有所反映。

但是马克思对问题并不只是进行纯理论上的分析。他在报刊上发表言论的目的首先是揭露殖民政策及其主谋者。十九世纪中叶，甚至许多著名的欧洲民主人士还对东方各国人民持傲慢态度，这时能热情地为这些人民的独立发展的权利进行辩护，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这是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性的表现。马克思在这问题上已经悍然不顾根深蒂固的传统和偏见了。

马克思特别注意印度这块英国最大的殖民地。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东印度公司，它的历史与结果》、《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和一系列其他著作中分析了这个国家的情况。他也密切注视中国发生的事件。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英中冲突》、《鸦片贸易史》这几篇文章中，痛斥了英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殖民主义者的远东扩张政策，而中国就成了这一政策的牺牲品。他还论述了欧洲侵略者在伊朗、土耳其、阿富汗和缅甸的所作所为。他在《伊奥尼亚群岛问题》、《印度问题。——爱尔兰的租佃权》、《爱尔兰的惶恐》几篇文章中，分析了科尔富岛和伊奥尼亚群岛其他岛屿（从1815年到1864年受英国保护）的希腊居民的状况，以及早在中世纪就成为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的状况。

马克思指出，殖民政策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最丑恶和最血腥的方面。关于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他写道：“当我们把自己的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很有体面的样子，而一到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

了。”^①资产阶级思想家力图虚伪地把殖民主义者说成是文明的使者，把他们打扮成被奴役人民的利益的保护者，这使马克思非常愤怒。马克思不止一次地指出，殖民战争是最露骨的抢劫形式，是无法无天的野蛮行为。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英国征服印度——与此同时是英国同它的殖民对手葡萄牙、荷兰、法国之间的残酷斗争——是用最无耻、最粗暴和最残酷的方式实现的一连串的海盗行为。在对这个幅员广阔的文明古国的血腥征服过程中，东印度公司这个“征服了印度来搜刮钱财”的“英国商人冒险家的公司”^②起了不小的作用。

马克思揭露了殖民掠夺者用以达到自己目的的主要方法：广泛采用古罗马的“分而治之”的原则，利用封建割据和当地王公之间的内讧，煽动种姓和宗教的纠纷，威胁利诱那些卖身求荣的达官显贵，等等。

马克思愤怒地谴责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殖民主义者为奴役中国而进行的军事冒险。他把资本主义强国对这个国家进行的所谓的鸦片战争看作是对中国人民实行的海盗政策。他痛斥那些践踏国际法一切准则的欧洲侵略者的暴行。关于英军暴行，他写道：“强奸妇女，枪挑儿童，焚烧整个整个的村庄……”，这些暴行并不 319 是“……由中国官吏而是由英国军官亲笔记载下来的……”^③

马克思揭露了欧洲侵略者在被征服国家中采取的殖民主义的专横手段，他指出，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是在最丑恶的人剥削人的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种形式恢复了早已陈旧并受到人类谴责的野蛮制度。在监工皮鞭下的不自由的劳动，种植场的奴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09页。

制，贩卖“人类血肉”^①——所有这些压迫手段又重新在殖民地盛行起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英国在殖民地广泛采用封建农奴制的超经济的高压手段。具有贡赋性质的土地税、盐税和其他捐税是榨取剩余产品和部分必要产品的主要工具。马克思指出，英国人在印度实行的土地税收制度实际上巩固了印度农村的封建关系并使它适应英国资本主义的殖民需要。在孟加拉管区，殖民主义者强迫农民服从当地的一伙剥削者，即农民群众和东印度公司之间的中间人——柴明达尔（封建地主）。在马德拉斯和孟买管区，莱特（农民）成了该公司的农奴式的佃农。

马克思强调指出，英国侵略者不仅在印度而且在爱尔兰这块欧洲殖民地上，也采用资本主义前的剥削形式，也在外国地主和当地农民（佃农）之间建立和维持这样一种关系，就好像是“掏出手枪的强盗和掏出自己钱包的过路人之间的关系”^②。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在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殖民管理机关、司法机关和军事机关这个巨大的寄生赘瘤中的全部高级职位均由英国人充任，这就突出地说明了被征服人民的无权状态。

马克思指出，殖民地的剥削形式和手段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演化的。在最初阶段，即在后来马克思称之为原始积累320 的时代，当地居民遭到明目张胆的抢劫。自从欧洲各国工业革命以后，上升的资产阶级的所有新兴力量（企业主、工厂主）力图攫取一份殖民赃物。因此，把殖民地变为工业品的销售市场和廉价原料的产地就成了殖民剥削的主要形式。殖民地变成了向资本主义国家提供农业原料的附属国。殖民地的经济完全服从于宗主国的利益，殖民地经济的发展是片面的、畸形的，殖民地的天然资源被源源窃走。同殖民地的贸易是不平等的，往往带有公开的抢劫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80页。

质,向中国私运鸦片就是一个例子。

甚至象马克思这样一位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的人也很难衡量被奴役的人民所遭受的殖民统治的悲惨后果。他在谈到印度时写道,不列颠统治当局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简直不能同这块土地过去所经受的外敌入侵、歼灭性战争、征服相比^①。东方,在英国人的统治下,一直由地方专制君主管理的灌溉系统完全处于废弃状态,结果造成农田荒芜,经常歉收,饥荒连绵不断,无数人被夺去了生命。殖民统治使印度、爱尔兰和其他殖民地的居民极端贫困,使他们变成受当地剥削者和外来奴役者的双重压迫的无权贱民。

马克思揭露了殖民统治的制度,也指出了它的内部矛盾和弱点。他敏锐地觉察到印度和其他被征服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他指出,英国人由于破坏了宗法式的村社制度,为了殖民主义者大发横财而容许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虽然具有殖民主义的畸形形式),违反意愿地为反殖民主义力量即民族资产阶级和当地无产阶级的发展创造了前提。这样,他们也就动摇了自己的统治基础。

马克思在反殖民主义运动产生的初期就已经提出了殖民地的解放道路的问题。他写道:“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不会收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②这个论断包 321
含着极有教益的思想:殖民地解放或者通过宗主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或者通过殖民地各国人民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同时,马克思决不认为这两条道路是相互排斥的。相反地,他在当时已经认为这两条道路是同一个革命的解过程的两个方面。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3页。

马克思认为,印度 1857—1859 年的伟大的民族解放起义是被压迫民族人民对殖民主义者日益反抗的一个明显的表现。他在一系列文章(《印度刑罚的调查》、《即将发行的印度公债》、《英国人在印度的收入》、《奥德的兼并》、《印度的捐税》等等)中专门分析了这次起义的原因、性质和动力。他坚决驳斥英国资产阶级报刊企图把起义别有用心地描绘成士兵的哗变。他写道,约翰牛“认为是军事叛乱的运动,实际上是民族起义”^①。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有力地打击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迫使他们改变一些统治手段,例如在 1858 年就撤销了东印度公司。

马克思也非常注意东方的另一个重大事件——中国太平天国起义(1850—1864 年);这是一次旨在反对满清王朝的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也是间接反对侵犯中国独立的外国殖民主义者的大规模的农民战争。1853 年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是把太平天国运动作为动摇古老帝国的基础的一场革命加以描写的。在资本主义列强公开干涉太平天国政权的前九年,马克思预言他们将以在中国建立“秩序”这一虚伪借口来公然支持满清反动派^②。稍晚些时候,即在 1862 年,当太平天国政权内部发生变化和出现封建显贵和官僚时,马克思在《中国记事》一文中指出了太平天国运动在这个阶段所暴露的保守特点。但是他仍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革命的。马克思并没有把东方的农民运动理想化,他清楚地看出

322 它们的弱点,特别是忠君信神这种思想意识的消极作用(太平天国起义和 1857—1859 年印度起义就具有这些特点),但他始终强调它们具有进步的历史作用。

马克思认为,1810—1826 年拉丁美洲人民反对西班牙统治的解放战争是殖民地争取独立的胜利斗争的榜样。他在为《美国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271 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6 页。

百科全书》写的《玻利瓦尔-伊-庞特》一文中指出了人民群众在这一斗争中的作用。的确，他对玻利瓦尔这个人物作了片面的评价，因为他缺乏客观的资料，只能从欧洲各式各样冒险家的蓄意歪曲的著作中获取关于拉丁美洲爱国者的资料，而这些著作过分夸大了玻利瓦尔对独裁权力的追逐。但是，马克思对拉丁美洲人民的运动本身评价很高，认为是解放的和革命的运动。

在马克思关于殖民地问题的许多文章中，最主要的思想是：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同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经济前提的成熟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指出，吸引殖民地和附属国进入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它们的内部震荡，特别是反对殖民主义者的大规模的人民斗争的开展，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加速其矛盾的发展，使经济和政治危机更加尖锐。因此马克思确信，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将削弱资本主义的阵地，从而使工人阶级更便于取得胜利。在印度起义时期，马克思在1858年1月中旬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印度使英国不断消耗人力和财力，现在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军。”^①

另一方面，马克思更坚决地号召无产阶级革命者支持殖民地人民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马克思的影响下，宪章派的领袖琼斯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人民采取了国际主义的立场，1853年他在《人民报》上愤怒地揭发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印度和中国的政策。琼斯勇敢地声援了印度起义者。

马克思关于被压迫民族人民的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是互相支持和相互制约的结论，对于民族殖民地问题³²³的革命理论的发展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列宁根据这些思想，制定了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批判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

马克思有许多政论文章是论述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问题的。早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他就认为工人阶级和革命组织应该学会识破外交秘密，在所有对外政策问题上确立自己的、与统治阶级完全相反的革命立场。在五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坚定地相信工人阶级是资产阶级社会中能团结一切进步分子和反抗侵略政策的唯一的力量，工人阶级即使在取得政权以前，也应当积极影响政府的对外政策，使它们放弃反革命的侵略计划。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助于唤醒工人对对外政策问题的兴趣。他认为揭露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的反人民实质也是动员无产阶级力量和民主力量准备迎接未来革命战斗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论述了当代国际冲突的内幕和各个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争夺德国领导权的角逐；拿破仑第三企图建立欧洲霸权而引起的纠纷；各强国在巴尔干和近东的利益冲突；普鲁士国王对瑞士的纽沙特尔州和瓦兰壬州的王朝要求所造成的普法矛盾；俄国、英国、普鲁士和其他一些国家为巩固波罗的海和北海这一地区的阵地和镇压这一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对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德国居民反抗丹麦王室集权政策的斗争（这一斗争延续到1848—1849年革命以后）进行一些引起国际摩擦的干涉。马克思研究了这些冲突的历史根源，指出这些国际政策的传统特点是从专制制度时代、封建君主反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1815年神圣同盟324的活动因袭下来的。马克思在他的一些文章和书信中不止一次地记述了那些反革命的密谋，指出他们无耻地破坏国际法以应付弱小的伙伴或对手，煽动并乘机利用民族纠纷，背信弃义，背着盟国

与敌人勾结。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十八世纪末由普鲁士、奥地利和沙皇俄国在外交上策划并实现的对波兰的三次瓜分是粗暴的专横行为。马克思在他的一些文章中还揭露了神圣同盟各强国在镇压二十年代革命运动中所起的反革命作用，痛斥了为巩固“正统”君主摇摇欲坠的宝座而对另一个民族内部事务进行干预和武装干涉的原则。

马克思在分析现代外交史时指出，资产阶级的国务活动家仿效封建专制政府的那套卑鄙的外交手腕，甚至还发展了它们的外交奸计。资产阶级在掌握政权之后也是继续沿用对外政策这个方法来达到反革命的目的。例如，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那些决议就反映了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土地贵族集团的复辟愿望，反映了幻想在革命风暴之后建立巩固“秩序”的西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梦想。因此法国外交家达莱朗-贝里戈尔这个大资产阶级的宠儿才成为这次会议的主角之一。

马克思认为，以维也纳条约为根据的国际体系是一个反动的时代错误。它的主要目的是，永远保存反革命制度，保持德国、意大利的分割状态，阻挠波兰、匈牙利、意大利人民和其他被压迫人民恢复民族独立。各国反革命政府，其中包括资产阶级政府，都首先把维持1815年现状的残余看作是阻挠业已成熟的革命民主改革的手段。

马克思在1853年10—12月写的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抨击性小册子《帕麦斯顿勋爵》是对资产阶级外交的透彻的揭露。这本小册子先后在英国、美国并以摘要的形式在德国出版。这是一部政论性文章的杰作，它既刻画了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最著名的国务活动家、英国多年来对外政策主谋人帕麦斯顿的肖像，同时也批判了英国的整个政府制度。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彻底揭露了帕麦斯顿和英国其他国家活动家的政策的真正的阶级根源，揭示了他们的

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联系。他写道，他们最关心的是防止任何乌云遮蔽“大地主和金融巨头们晴朗的天空”^①。帕麦斯顿装做一个“真正的英国大臣”，善于虚伪地以关心英国民族威望为幌子来保护大地主和金融巨头的私利。

马克思指出，帕麦斯顿对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起了很不体面的作用。这位“真正的英国大臣”自称是立宪主义的捍卫者、被压迫者的朋友，伪装同情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以此为诱饵，骗他们落入圈套。帕麦斯顿这位玩弄挑拨离间和外交诡计的能手，使这些民族听任专制强国的宰割，这一事实清楚地说明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所起的反革命作用。

在东方问题上的革命策略。

对克里木战争的态度

由于沙皇俄国和西方强国之间在近东和巴尔干的紧张关系很快引起新的欧洲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所谓东方问题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兴趣。弄清东方问题的实质并为革命力量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竭力寻找最能符合被压迫民族人民、欧洲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利益的解决东方问题的办法。他们对待这个问题就是从“第六强国”^②（他们对欧洲革命的形象的称呼）的立场出发的。根据马克思的请求，恩格斯在1853年春天已经在报刊上就这个题目发表了文章。不久马克思本人也开始在通讯中阐述东方冲突的发展，后来又阐述了克里木战争的政治方面，而当时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39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8页。

则侧重于分析一些军事行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问题的实质在于:争夺近东和巴尔干的主要阵地、争夺海峡和瓜分土耳其领土的欧洲各强国之间的矛盾同反对奥斯曼帝国的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引起的冲突交织在一起。当时,希腊、塞尔维亚,以及莫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一部分已经争得了实际上的独立,正在彻底摆脱对土耳其的从属关系。³²⁶保加利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阿尔巴尼亚仍然受土耳其的压迫。欧洲各大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俄国竭力控制这些国家和土耳其,这就使情况更加复杂了。

斗争的双方都想在这场冲突中扩张领土,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沙皇俄国是最危险的侵略力量,它从十八世纪末起就是国际反动势力的堡垒,践踏本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的自由的刽子手,欧洲反革命势力的靠山。

列宁在1909年写道:“半世纪以前,俄国一直牢固地保持了世界宪兵的荣誉。我国专制政府在上一世纪作了不少的事情,来支持欧洲任何的反动派,甚至公开用武力镇压邻国的革命运动。”^①马克思的那些政论性文章愤怒地谴责了沙皇俄国的专制制度,揭露了沙皇政府是侵略性对外政策的主谋,揭穿了沙皇俄国的外交诡计。他指出,沙皇政府为了达到它的侵略和反革命的目的,竭力利用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特别是南方斯拉夫人一向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俄国军队在同土耳其的历次战争中取得胜利,在客观上有助于这些民族摆脱土耳其的压迫,但是披着“斯拉夫人的教友的保护人”的外衣和散布泛斯拉夫主义思想的沙皇政府,实际上力图在巴尔干建立自己的统治。

马克思指出,沙皇俄国的对手——英法统治集团在自己的近东政策中怀有同样的私心。英法统治集团表面上支持土耳其帝国

^① 《列宁全集》第15卷第428页。

的完整，实际上和沙皇政府同样贪婪地把手伸进了土耳其的领地。他们借口帮助“盟友”土耳其，放肆地干预它的内部事务，调动它的武装力量，加强早已对这个政府实行的财政控制。马克思在1854年4月写道：“土耳其人开始把英国和法国看做是比沙皇更危险的敌人。”^①马克思在抨击文《卡尔斯的陷落》中还揭露了英国外交对它的盟国的背信弃义行为。

327 反俄同盟的主角法国和英国的目的也截然不同。英国资产阶级寡头政体想消灭俄国舰队，占领克里木、高加索并在这些地区建立自己的统治，而波拿巴法国则力图不仅在近东占据优势，而且还要称霸整个欧洲，靠牺牲邻国来扩大自己的边界。马克思相信，法国统治者在克里木战争之后将发动新的战争。他认为英法同盟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这果然于1856年巴黎和会期间发生了。

但是，马克思指出，英法统治集团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竭力在东方和在欧洲许多地区削弱自己的对手俄国，但是决不想消灭沙皇的专制制度。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保守的欧洲，“这个君主、封建主和资本家的欧洲”^②需要沙皇政府这个反人民制度和剥削者社会制度的保护者。西欧政治家们最害怕的就是沙皇制度崩溃后的革命后果。马克思在《奇怪的政策》一文中写道，他们希望保存“保守主义的千年王国”^③。西方强国的战略就是遵循这些反革命意图而制定的。为了避免革命混乱，他们力图把军事行动转到俄国的边沿地区，使战区尽量远离可能发生革命起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地方。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指出，他们设计的“为了局部目的而进行局部战争”^④的计划决不是为了少死一些人和减少军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218页。

② 同上书，第39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344页。

④ 同上书，第338页。

破坏，而是为了防止克里木战争变成一场反对沙皇制度的人民战争，因为这将使英法两国的反民主制度的存在受到威胁。

马克思还论述了奥地利和普鲁士对克里木战争的态度。他指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阶级的政策具有两面性：他们一方面害怕被压迫民族（匈牙利人、捷克人、波兰人、南方斯拉夫人）的民族运动发展壮大，这种民族运动只有靠沙皇政府的帮助才能加以镇压；另一方面他们在巴尔干也有自己的侵略意图，这种意图促使他们把俄国看做是对手并力图削弱它。马克思认为，普鲁士统治集团决定在战争中宣布中立，归根到底是由于害怕一旦战场被移到中欧将使那里发生革命事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确信欧洲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希望军事事件能 328 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马克思根本不同意战争永远是革命的先决条件这种庸俗观点，但是一旦战争违反人民的意愿而成为事实，工人阶级和民主力量就应当竭力使已经爆发的军事危机变得对自己有利。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克里木战争时期提出的革命策略的主要前提之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期望英法集团对俄国的“局部”战争变成欧洲人民对沙皇专制制度和对支持它的反革命势力的战争。他们强调指出，如果战争性质发生这种变化，那么革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涨就将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通过革命民主主义的途径解决1848—1849年革命没有解决的历史任务，欧洲的（包括法国和英国的）反人民制度将被消灭。马克思在《法国和英国的最近前途》一文中写道，那时欧洲无产阶级就能“取得它在法国1848年六月战斗中所失去的地位”^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只有人民革命才能够为土耳其帝国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第208页。

被压迫民族的自由开辟真正的道路。针对西欧政治家关于保存这个最反动的压迫国家、这个封建野蛮的支柱的论点，马克思认为必须用革命手段破坏这个国家并在它的废墟上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他指出，西方强国维护奥斯曼帝国的“完整”，使巴尔干各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受到威胁，并把他们推入了沙皇政府的怀抱。用革命民主主义的方法解决东方问题，首先要使南方斯拉夫人和巴尔干半岛所有民族完全摆脱土耳其的压迫。马克思知道，获得独立的民族将要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不能预料的。但是，他并不排除在巴尔干建立“斯拉夫国家的联邦共和国”^①的可能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战争变成革命战争，必然会使俄国国内
329 产生反抗沙皇制度的力量。两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展望未来时预见欧洲革命的行动范围可能扩大，可能扩展到俄国。恩格斯在表达马克思的观点时写道：“从 1789 年起，革命的边界就一直在向远处扩展。它的边界已经达到了华沙、德布勒森、布加勒斯特；下一次革命的前哨应当是彼得堡和君士坦丁堡。俄国反革命的庞然大物应当在这两个最薄弱之点受到打击。”^②

这几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开始感到极大的兴趣。马克思很注意在国外出版的俄国革命文献，继续同俄国流亡者特别是寄居巴黎的尼·伊·萨宗诺夫保持联系。

他甚至还注意到亚·伊·赫尔岑 1853 年在伦敦建立的“自由俄国印刷所”。马克思曾经读过这位著名的俄国革命作家的一些著作，其中有《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一书。但是，由于赫尔岑同流亡者中的小资产阶级集团十分接近，由于他还有某些乌托邦观点（关于用俄国农民公社“革新”欧洲的思想等等），马克思才对他抱着十分警惕的态度。此外还因为赫尔岑在 1853 年参加了俄国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9 卷第 241 页。

② 同上书，第 38 页。

由派地主伊·加·戈洛文和德国庸俗民主派卢格在自由派报纸《晨报》上掀起的反对马克思的运动。他们凭着一篇署名“弗·马·”的攻击巴枯宁的短文就指控马克思诽谤巴枯宁。其实这篇短文是英国保守派政论家弗兰西斯·马克思写的。马克思不得不在报刊上驳斥这种控告。

克里木战争并没有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希望的道路发展，也没有在西欧直接引起革命的变革。土耳其统治下的各民族的民族独立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战争的结果对俄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在战争结束十五年之后，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写道，“虽然塞瓦斯托波尔保卫战或许可能为它挽回荣誉，在巴黎的外交胜利也可能使外国人感到眩惑”，俄国在克里木的战败加剧了农奴制俄国的危机，“揭示了它的社会制度和行政制度的腐朽”^①。俄国日益成熟的革命形势不仅预示国内将有重大的社会变革，而且显然改变了欧洲的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对比；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估计到的。

《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

根据克里木战争以及西欧外交在战争进程中同俄国这个对手交锋时竭力不损害反动的沙皇制度这些鲜明的印象，马克思打算进一步揭露西方强国首先是资产阶级贵族英国的政策的内幕。1855年12月，他发表了《传统的英国政策》一文，文章表达的思想是：纵容沙皇不仅是十九世纪而且也是十八世纪英国外交的突出特点。他打算在新的著作中以1700—1721年北方战争时期以来的广泛的历史材料来证明这个论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59—560页。

1856年春天，马克思在英国博物馆进行研究时偶然发现一些过去出版的外交文献和抨击性的政治作品，那时他就想写这样一部著作了。同年3月，马克思和伦敦的德国出版商特吕布纳商谈用这些材料和其他一些材料写一本二十个印张的书。但是商谈没有得出结果，马克思这才决定在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戴维·乌尔卡尔特及其拥护者出版的定期刊物上发表这一计划撰写的著作。

在乌尔卡尔特周围有一小批对当权的寡头政治特别是对辉格党不满的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这些人大多是思想保守的，尽管其中也有一些激进分子，例如伦敦乌尔卡尔特派刊物《自由新闻》的编辑查理·多布森·科勒特。乌尔卡尔特虽然竭力谋求工人的支持，他始终凶恶地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然而，不管乌尔卡尔特派出于什么样的保守动机，他们对政府的对外政策、对政府在东方的殖民主义冒险和镇压印度起义的方法的批评，必然促使工人们去思考政治问题。

邀请马克思在乌尔卡尔特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倡议就是乌尔卡尔特派提出来的。在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这组文章发表以后，乌尔卡尔特于1853年12月9日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信中转达了同乌尔卡尔特派接近的出版商塔克尔关于单独翻印其中的一篇文章的建议^①。不久，乌尔卡尔特就开始设法和马克思个人见面。1854年2月初，他们会晤了。马克思这时才发现，他们“只在一点上，即在对帕麦斯顿的评价上”是一致的，在其他一切方面，他们的意见都是截然相反的^②。在这次会见以前和以后，马克思就在报刊上指出：乌尔卡尔特这个“天生的保守党人”的唯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观点，特别是他认为外交在社会发展中具有决定作用是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1353。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615页。

毫无根据的，他企图把沙皇打扮成欧洲革命的秘密参加者，把土耳其和奥地利帝国理想化，也是荒谬的^①。尽管如此，马克思还是认为可以利用乌尔卡尔特派的报刊，因为在乌尔卡尔特派反对帕麦斯顿对外政策的言论中有一些对工人阶级有利的合理成分。马克思把这些言论的主观动机和客观作用加以区别。关于乌尔卡尔特，马克思在1860年写道：“他在主观上无疑是一个反动分子（浪漫主义者）……但是这丝毫不妨碍他所领导的在对外政策方面的运动成为**客观上革命的运动**。”^②

马克思同乌尔卡尔特派的关系表明：为了同工人阶级当前最危险的敌人进行斗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策略甚至可以允许与无产阶级运动的敌对者暂时达成协议。马克思在谈另一个问题时写道：“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③ 马克思强调指出，同乌尔卡尔特派合作绝不意味着在思想上作任何让步或放弃批判他们的那些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敌对的观点。

乌尔卡尔特派除了翻印抨击性小册子《帕麦斯顿勋爵》外，从1856年至1859年还在他们的定期刊物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一些其他文章和材料。其中篇幅最大的是上面提到的关于十八世纪英俄外交史的著作。最初，这一著作是1856年夏在地方性的《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按作者投寄的每个部分连载的。但是文章被草率地任意删节，于是马克思就停止往设菲尔德投寄材料了。当乌尔卡尔特知道马克思和编辑部发生了争执，就建议马克思转给伦敦《自由新闻》发表，该报从1856年8月到1857年4月发表了马 332 克思的全部文稿。发表的材料只是计划撰写的这部著作的引言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7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443页。

分，包括文件和作者对正文的评注。这本著作发表时用的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后来，在马克思逝世后，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于1899年出版了这一著作的单行本，标题是《十八世纪外交秘史》。

马克思为了揭露当时反革命统治者的对外政策的历史根源，在文章中不惜用揭发性的笔调来评述他们的先辈——十八世纪的英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他说他的目的就是让读者知道“英国外交的卑鄙”^①，它对沙皇政府的奴颜婢膝。正象恩格斯后来所写的，这篇文章揭露了“英国辉格党大臣们对俄国的经常的自私自利的依赖”^②。列宁对这篇文章也作了同样的评价。

马克思虽然敏锐地看出了俄国沙皇政府和“在‘光荣革命’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政权”^③的英国资产阶级贵族寡头的反革命意图是一致的，但是在阐述英俄关系时仍不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著作写得过于尖刻造成的。这种关系的性质不仅取决于英国统治阶级的愿望，即利用沙皇政府对付革命，而且也取决于英国统治阶级本身的侵略意图，他们经常把俄国当作一个对手。无论是在北方战争时期还是在帕麦斯顿时期，英国对外政策的领导人都不止一次地策划用削弱沙皇俄国的办法来加强英国，并支持它的反对者。马克思在论述东方问题的文章中把英俄之间的矛盾看作是国际争端的重要因素。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和在《帕麦斯顿勋爵》的部分章节中，没有突出阐述这些事实，而英国政客对沙皇政府侵略意图的纵容这件事本身似乎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如此，这部著作提出的凡是

333 对侵略势力纵容、对它们采取怯懦和自私的让步的政策都是有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03页。

③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6页。

的这样一个总的论点，对于评价西欧强国的外交和制定工人阶级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独立自主的立场是具有原则性的意义的。

在《内幕》中，马克思用不少篇幅叙述俄国的历史。他没有打算详细阐述这个问题，主要是对沙皇专制制度对外侵略政策的历史前提感到兴趣。还应该注意的，马克思当时对俄国历史的了解只能根据西欧历史学家的著作（例如赛居尔的著作《俄国和彼得大帝历史》），而这些著作对俄国往往是不怀好意的，其中有许多故意歪曲的、后来已被科学驳倒的论点，比如请曼派关于基辅国起源的理论，就认为基辅国是由瓦利亚基的侵略者建立的。由于缺乏必要的材料，马克思当时不可能批判地对待这些论点。后来他在进一步的历史研究过程中对自己的看法作了许多订正。例如，八十年代初，他在《编年摘录》中指出了俄国人民为使国家摆脱鞑靼蒙古人的压迫而英勇斗争的作用。而在《内幕》中这多少有点被说成是莫斯科大公们的外交努力的结果。

尽管如此，马克思在1856—1857年对俄国历史发展的许多方面的考察还是很透彻的。通过基辅罗斯的历史，马克思得出一个对于说明早期封建制度的整个时期是很重要的结论，他指出，“没有采邑的臣属关系或者只是纳贡的采邑”^①是早期中世纪封建国家所以形成的基础。他说得很清楚，这个时期查理大帝帝国、柳里克帝国等这样一些“不协调的、庞大的、早熟的”^②国家结构是不巩固的，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都必然要瓦解，分裂为许多封土。马克思非常精辟地评述了由成吉思汗肇始的鞑靼蒙古人的入侵。马克思强调指出了这次入侵带来的极为严重的后果：居民大量被屠杀，物质宝藏遭到毁灭，在入侵者压迫下的牛马般的生活。他写道，鞑靼人的枷锁“不仅压迫了而且凌辱和摧残了成为其牺牲品的人民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6页。

② 同上书，第67页。

的心灵”。蒙古可汗建立的“一整套恐怖统治”^① 直接影响了被侵略国家的封建上层；他们的代表人物从蒙古统治者那里学会了阴险毒辣的统治方法。

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十五世纪俄国专制君主制的形成过程（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一再指出这个过程在历史上整个说来是进步的），在《内幕》中揭露了专制制度在其形成阶段就已暴露出来的丑恶特征。他指出，即使实行中央集权制和其他一些进步措施（例如，讨伐拥有封土的王公们等等），专制政权的执政者仍然经常采取马基雅弗利主义政策中的专制和奸诈的手段。马克思对中世纪罗斯各封建共和国同莫斯科大公斗争的失败原因的评述是很有意思的。他指出，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之所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万三世利用了它的内部的阶级斗争，“在诺夫哥罗德煽动象在佛罗伦萨一样激烈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不和”^②。

在彼得一世的政策中，马克思不仅看出专制独裁的特征和侵略野心，而且看出谋划国事的卓识和胆略。马克思指出：彼得大帝大胆地决定“把帝国的都城从内陆中心迁到滨海地区”^③，他起了一个革新者的作用，他反对因循守旧和墨守陈规，希望俄国文明化，摆脱停滞和落后状态，主张俄国人“适应西方民族的种种技术设备，却不受其思想的感染”^④。

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中马克思第一次顺便阐述了俄国过去的历史。虽然其目的只局限于揭露沙皇的外交政策及其根源，这也使马克思熟悉了过去俄国人民生活的某些方面，为更详尽和更全面地研究俄国打下了基础。

① 马克思《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67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同上书，第80页。

④ 同上书，第82页。

《革命的西班牙》

1854年6月底，在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事件，同欧洲总的反动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对反动的宫廷奸党不满的将军们所发动的武装起义，发展成为十九世纪西班牙的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政权转到了自由主义进步派的手中。

马克思把西班牙革命看作是人民运动重新高涨的先兆。他在通讯中阐述这次革命的进程时，指出了西班牙革命的一般的历史³³⁵特点和独特的民族特点即“某些仅仅是它所特有的因素”^①。从中世纪时起西班牙的人民运动在各省是孤立的，军队一直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对抗宫廷的唯一力量。但是这里所以有这一基础是由于一切资产阶级革命的阶级前提是共同的；不论在什么地方人民群众都是主要的动力。正是他们不止一次地造成一种使“纯粹的军事叛乱”在比利牛斯半岛发展成“普遍的起义”^②的形势。

马克思高度评价西班牙人民群众的革命毅力，但是非常怀疑他们的政治领袖——资产阶级自由派。他确信西班牙的自由派也一定会象其他欧洲国家的自由资产阶级那样怯懦妥协。

马克思的担心果然证实了。自由派政府的政策使反动派在1856年夏天重新执政，他们把西班牙第四次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几乎全部消灭了。

为了更深入地了解比利牛斯半岛发生的革命过程，马克思着手研究它的历史。1854年8月，他开始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革命的西班牙》一组文章，打算把当时的事件同西班牙人民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37页。

② 同上书，第344页。

革命的过去、西班牙人民反对专制制度和反抗拿破仑统治的斗争传统、过去几次的西班牙革命(1808—1814年、1820—1823年和1834—1843年)联系起来。这一组文章没有写完,只发表了八篇(最后一篇发表于1854年12月2日),这些文章叙述到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1820—1823年)的开始。马克思寄给《论坛报》的后三篇文章没有发表,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一份分析1820—1823年革命失败原因的手稿片断。

马克思在这组文章中进一步研究了专制君主制的历史作用,他根据西班牙的资料对过去的结论作了重要的订正,强调必须具体地历史地对待这个问题。他指出,专制制度在其产生阶段并不永远到处都起着进步的中央集权制所起的作用。例如在西班牙,马克思认为,它是一种专横的东方式的特别是土耳其式的统治形式,336 它兼有君主的无限权利和地方的分立主义,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造成国家的经济和社会的衰落。

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专制制度不可能永远束缚西班牙人民的活力,西班牙人民在反抗外国入侵者拿破仑的斗争中已经表现了强大的力量。马克思把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看作是一部表现西班牙社会“充满生气,它的每一部分都洋溢着反抗力量”^①的英雄史诗。诚然,他也指出了抵抗运动中的矛盾现象:人民群众为争取解放而努力,而封建上层人物则力图维护自己的社会特权和政治特权。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把社会改造和保卫民族的措施结合起来”^②,这时民族解放运动才能得到真正的巩固。

马克思强调指出,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贵族没有能力把这两个任务结合起来,他认为十九世纪上半叶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弱点就是“革命派没有能够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联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463页。

② 同上书,第502页。

起来”^①。因此农民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各派别之间的“斗争的消极的旁观者”^②，有时还会被反革命集团所利用。

马克思在1856年7月—8月写的总结西班牙问题的文章中强调指出，最后一次西班牙革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这些教训表明在落后的半封建的西班牙也出现了欧洲所发生的那些变化：资产阶级正在蜕化为反革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联合农民群众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的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新生的西班牙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了1854—1856年事件，虽然它还不能自决自主，仍然追随着资产阶级共和派。农民热烈支持了这次革命。1854—1856年的革命运动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军队的和王朝的特色。尽管反革命取得暂时胜利，但是所有这一切使马克思产生了这样的希望：“下一次的欧洲革命将发现，西班牙已经成熟到能够同它合作”^③。

迎接新的战斗

337

反动的艰难环境、困苦的生活重担都没能挫伤马克思的创作毅力。在这段艰难岁月中，他的富有成果的、多种多样的学术活动和政论活动对革命理论和策略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在这几年的经济研究中已经接近完成一些最伟大的发现。马克思使他的用来分析一般历史过程和研究许多国家——包括过去没有详细研究过的国家（俄国、西班牙、巴尔干半岛各国、东方各国）——的具体历史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更加深刻和更加具体化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重大的成就，就是克服资产阶级历史科学的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71页。

② 同上书，第67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53页。

当狭隘的地理偏见，这种历史科学的研究对象往往局限于欧洲历史，而且时常在这种“欧洲中心论”上再加上对非欧洲人民的种族优越感。马克思由于分析了亚洲以及部分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人民的历史，指出这些国家人民的历史同欧洲各国的发展的有机联系，强调宗主国和在资本主义世界殖民地区所发生的那些过程的紧密结合，从而为科学地认识历史，即认识全人类的历史发展、认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经常在报刊上论述当时的各种现象，这些论述在深刻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分析有资本主义关系表现的各个领域(经济学、个别国家的政治制度及其演变、对内和对外政策、意识形态)方面堪称典范。马克思在他的政论文章中象在他的主要著作中一样，也表明了他是一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为发展工人阶级的革命战略和策略作了许多工作，他确定了无产阶级对待殖民地人民解放运动应持立场的原则，制定了工人阶级在国际冲突和战争中的独立路线的原理，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革命者同其他反政府派力量的临时联盟和协议以及可能实现的条件之有益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未来革命的主要发源地将是那些从1848年以来迫切地感觉到必须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国家，仍然期待法国无产阶级表现出革
338 命的首创精神，但是，他们已经看到了革命的航线可能改变，特别是可能进一步向东方，向俄国扩展。他们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考虑到了各国在1848—1849年之后所发生的那些社会变化。

在反动年代里，影响群众尽管是那样困难，但是马克思的声音、他的文章和通讯中的革命思想还是对先进的工人起了作用。他的政论文章促进了革命情绪的高涨，激发了对现存反革命制度的憎恨，这一点在新的革命高潮开始时表现得特别明显。马克思继

续同各国工人活动家保持接触，利用一切手段同无产阶级运动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这时他已经团结了大批战友，以充分的理论知识武装了自己，对迫切的策略任务有了明确的理解，怀着老战士同敌人进行新的公开战斗的决心，迎着新的革命形势前进。

、

第 八 章

339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 决定性阶段

“自从政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①

恩格斯

关于 1857 年经济危机的论文

在反动年代,马克思以始终不减的兴趣注视着决定资本主义世界当时的经济和政治活动范围的一切情况。生产力在短时期内就有了明显的增长。工厂制度取得可观的成就。千百个工厂投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3页。

生产，它们把空前众多的工人集合在同一座厂房里。大企业中的 340
蒸气机和机床迅速排挤了工业劳动的手工方式。运输和通信工具
同时也发生了变革。全世界铁路线的总长，由 1847 年的两万五千
公里增至 1857 年的八万三千公里。

世界市场的贸易额，仅从 1850 年至 1860 年就增加了将近一
倍。信用和银行事业空前发展。各种银行的数目迅速增加，银行
的业务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交易所中始终笼罩着一股投机热潮。
这一切都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和报刊用来赞美资本主义制度。

然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发展作了准确的科学分
析，从而预言新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必将到来，它必将代替工
业和商业的高涨阶段。这一预言完全被证实了。1857 年爆发了
危机，它的表现就是生产规模急剧缩减，大批工厂倒闭，许多企业
破产，市场商品过剩，商品价格下跌，失业现象增多等等。在资本
主义历史上，这是具有真正世界性质的第一次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写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文章中，定期地阐述了自己
对欧洲经济形势的评论。许多文章揭示了 1857 年危机产生的
前提、原因、征兆和特点。

马克思特别重视 1857 年危机，首先，因为同这次危机相联系
的事实和过程使人们可以更深入地探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
其次，因为危机预示了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政治局势的直
接尖锐化。

马克思的文章是根据事变当时发展的情况，根据亲身的观察，
根据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报刊以及专门杂志上的材料而写成的，这
些文章不仅对危机前和危机当中发生的变化作了鲜明的政论性述
评，而且也作了总结，这些总结列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危机及其
周期的理论宝库。

马克思证明，不管 1857 年危机的局部性征兆和表现是怎样

的,它不是商业界和金融界的偶然停滞或破坏,而是资本主义所固有³⁴¹有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所必然产生的典型的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这种危机是任何政府都无法防止的,它是由工业和商业发展的全部矛盾进程准备好的。

当时,在政治经济学中十分流行的观点是深信发行银行通过调整货币流通,可以影响价格水平,从而使工业品的供求关系保持必要的比例,推动,或相反地,抑制现行的生产。特别是不乏这样的见解:似乎生产过剩的发生是由于货币发行量超过它的必要量,因而造成物价猛烈上涨。马克思根据英格兰银行的材料证明了这类看法的荒谬性。把伴随工业高涨而发生的交易所投机当作危机的原因,根据也是不足的。马克思嘲笑了那些作抽象议论的“有远见的人”,他们证明,问题不在于经济学,经济学本身健康,只是工业品的买主“不健康”^①。

危机以自身的事实推翻了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的种种肤浅的论调。这些资产阶级新闻工作者多年来想方设法使人相信,“贸易震荡的时代已随着贸易自由的实行而永远结束”^②。

以危机而告终的工商业繁荣的阴暗的一面,是对工人阶级的残酷剥削。英国的企业主违反议会的现行决议——经过顽强的阶级斗争而通过的所谓工厂法,延长了工作日。他们缩减工资,宁愿用童工来代替成年工。马克思在自己的一篇文章中,把英国资本家称为靠吸吮本国年轻一代工人的膏血而自肥的吸血鬼^③。危机使劳动群众本来就已十分艰难的处境更加恶化。“工业活动的停滞”^④造成的工人阶级的贫困,迅速扩展到整个欧洲。马克思揭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43页。

② 同上书,第361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1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366页。

了资产阶级政府所采取的办法，它们竭力靠“整个社会的财富”^①，特别是靠对绝大多数人民加强税收压榨，靠向工商业统治者发放慷慨的政府补助金和保证金的办法来补偿企业主和大商人的亏损。这是把危机的后果无耻地转嫁给居民中最贫苦阶层的办法。

马克思反对夸大 1857 年危机的特殊性，反对把危机看作某种孤立的³⁴²现象，他指出，“决不能容许每一次新的贸易危机所固有的特点遮掩所有各次危机共有的特征。”^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合乎规律的、有机联系着的现象。他说：“……只要这个制度还存在，危机就必然会由它产生出来，就好象一年四季的自然更迭一样。”^③

一系列新的经济学手稿的写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反动派的胜利是不会长久的，他们期望 1857 年危机在经济领域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的震荡，将产生政治后果，引起“洪水”——新的革命的冲击。在这些条件下，马克思认为，首要的任务就是最迅速地完成政治经济学著作，用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的知识把工人阶级武装起来。他认为，这样的著作将帮助无产阶级战士认清他们的革命任务，促进他们的阶级觉悟的提高和无产阶级的团结。正值危机最严重的时期，马克思着手总结他在此以前所进行的经济学研究。然而，他决定，在同读者见面之前，要为自己的著作先写出一个初步的草稿，以便自己弄清问题。

1857 年 7 月至 1858 年 5 月所写的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就是这样产生的。其中主要的一部分，就是 1857 年 10 月至 1858 年 5 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367 页。

②③ 同上书，第 607 页。

所写的长达五十印张的篇幅巨大的手稿。

1857—1858年的主要的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的科学天才的真正杰作。

在很短时间内而且又是在贫困“简直要置马克思和他的一家于死地”^①的条件下写成这样大部头的著作，这不能不令人非常震惊。我们所能见到的马克思以及他的亲人的书信，描绘了当时一位最伟大的人物所经受的十分悲惨的贫困景象。1857年1月20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这样一来，我完全搁浅了。我仅有的一点现款已投入一所新住宅……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

343 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②后来的境况就更加艰难了。1857年危机爆发时，《纽约每日论坛报》的编辑部解除了该报在欧洲各国的全部通讯员的聘约。只有马克思是个例外，因为它害怕马克思受聘为其他美国报刊撰稿。以前该报每月通常采用八篇文章，现在保证能刊登的也只有四篇了。这实际上意味着减少了一半稿费。

在这艰难岁月，恩格斯竭尽全力援助了自己的朋友。列宁强调说：“如果不是恩格斯经常在经济上舍己援助，马克思不但不能写成《资本论》，而且定会死于贫困。”^③

尽管苦难重重，马克思仍然精神焕发地从事写作。1857年12月8日他写信给恩格斯说：“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④这种精神的源泉是对革命事业的忘我的忠诚，是对无产阶级的神圣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92—93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19页。

责任感。

马克思写作了 1857—1858 年的主要经济学手稿，力图实现分六册出版自己著作的计划，这六册是资本、地产、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

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的《导言》

1857 年 8 月马克思为自己计划中的著作而写的一篇总的《导言》，是一组新的手稿。这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方面的最丰富的文献之一。它的不可估量的科学意义首先在于，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完整地表述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学这一专门科学的对象和方法的观点。

政治经济学研究物质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们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研究支配这一生产过程的运动的客观经济规律。政治经济学的任务，首先是研究社会生产的各个历史形式的特点和差别。同时又探讨一切生产方式的一般规律。

《导言》详细研究了社会生产各个方面的作用和相互间的辩证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占有自然产品供自己 344 需要；分配规定利用已生产的财富的比例；交换使个人得到他自己没有的、但希望得到的产品；在消费中，产品变成个人占有的对象。因而在这一链条中，生产是起点，消费是终点，而分配和交换是中间环节，即担任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的那个环节。马克思特别强调并论证生产对于分配来说具有首要作用的思想，分配方式总是决定于生产方式的思想。分配虽然是新的生产的前提，但是分配本身始终是生产的产物，即生产的一般的产物和它的一定历史形式的产物。

在论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一节中，马克思详细地说明了科学抽象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并阐述了正确的科学研究和叙述的基本原理。

抽象法就是从所研究的关系的现实世界中抽出这些关系的一定的要素，即抽出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分析那些具有自己的历史特点和自己的规律的各种关系的总和的出发点。因此，抽象法作为逻辑范畴，作为研究的特殊工具，同时反映现实的本质和认识的运动，因而它同样适用于表述实在现象和科学概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研究的有效途径应当首先从表面开始，从表象的东西开始，再进入现象的深处，直到最后获得最简单的规定。然后研究者才能踏上“回程”，即从分析走向综合，从局部的抽象和规定走向“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①。例如，人口范畴本身一般说来是一个内容贫乏的抽象，但是这一范畴作为预先经过研究和经过科学分析的各种局部规定（阶级、它们存在的经济基础等）的总体，却成为十分明白的、具体的东西，而不再是一个浑沌的整体。

由最简单的东西（例如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上升到
345 较为复杂的东西（例如国家、国际交换、世界市场等）是“科学上正确的”^②方法。然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不过是思维掌握具体并在认识过程中再现具体的方法。在这里，具体只被理解为“许多规定的综合”，“多样性的统一”^③。这种方法决不是具体本身产生的过程。范畴反映现实，但不创造现实。

《导言》中关于认识过程中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关系问题的解释，具有特殊的方法论上的意义。马克思在指出逻辑方法的优点时，强调指出，逻辑方法使人们有可能不是按经济范畴在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②③ 同上书，第103页。

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而是依据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它们。为了正确理解现存的和已经消失的形式，重要的是每一次都要在逻辑范畴中找出决定性的形式。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马克思放弃了按照现象的现实历史次序而再现现象的历史方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科学，因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发展的经济规律，生产形式发挥职能和进行更替的条件。对历史上较不发达的形式的认识，要以对较发达的形式的分析为前提。“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①

马克思揭示了分析政治经济学范畴的方法论的原理，概述了研究工作中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性的原则。他指出，这种一致性具有辩证性质；它不是建立在两种方法的完全重合上，而是建立在它们的相互作用、相互渗透和相互充实的基础上。逻辑分析不能是任意的思维活动：它是由所研究的经济现象本身的性质和这些现象之间存在的客观联系的性质决定的。任何现象都有自己的历史渊源，不弄清它，就不能彻底了解现象的实质。所以，运用逻辑方法研究经济现象，应该同阐明这些现象在时间上的进化，同详细的和精确的历史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的结合是全面而又深入地研究对象的必要条件，是取得正确的、科学上可靠的成果的手段。

《导言》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研究分析经济现象的方法，是同研究无产阶级革命世界观的一般哲学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他把生产关系看作社会发展的经济基础，同时一贯重视与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领域有关的过程，仔细考察它对基础的依赖性和反作用。

马克思还深入研究艺术这一社会意识形态。他凭借自己的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博学识,凭借对世界文学的优秀典范的了解,在四十年代就做出了许多结论,这些论点成了新的唯物主义美学的基础。

马克思首次在科学中揭示了艺术创作的唯物主义的前提条件。他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就指出,劳动的作用在于促进人类接受和再现美好的东西,“依照美的规律”^①来塑造“物质”的能力。同时他强调指出,艺术作品的创作能力,主要不是决定于人的人类学的即天然的特性,而是决定于人所生存的社会历史的条件。这些条件的改变也引起美学理想、要求和欣赏力的改变。

马克思高度评价艺术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他把艺术创作视为反映世界的一种形式,同时也看作把握世界的一种方法。他认为,先进的艺术对社会过程、对社会成员的教育和精神发展产生进步影响。

马克思揭示了艺术的真正社会的、历史地发展着的本质,指出阶级矛盾、一定阶级力量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在阶级对抗的社会中——对艺术的影响。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社会结构决定艺术作品的内容,决定文学艺术中的某一种类占优势。马克思把这种情况看作各个时代的艺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基本原因,特别是看作在当前条件下不可能再现古希腊[神话]和史诗的形象的基本原因。“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自动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②

347 马克思似乎为了预先防止对这些问题作庸俗社会学的解释,强调指出:社会生活的反映,一定阶级的意识形态的反映,在艺术领域中决不是直线地、机械地发生的。艺术创作作为特殊的意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3页。

形式，服从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具有自己的特点、自己的特殊规律性。马克思认为艺术的异常繁荣时期和社会在其他方面其中包括在物质生产方面的高涨时期可能是不相一致的，这就是其中的一个规律性。他强调指出，同时必须注意到意识形态，特别是艺术的发展中的相对独立性。艺术创作固然同一定的社会形态历史地联系在一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意义随着这些形态的消失而丧失。在这方面，马克思以古希腊的艺术和史诗为例，说明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①。马克思在这里对这种稀有的现象作了深刻的解释。产生这种稀有现象的原因在于，希腊艺术反映了人类早期发展阶段即童年时代对于现实的认识是朴素的、同时也是健康的、正常的，反映了那种拥有独特的吸引力即全人类的特殊魅力的对“天性”的追求^②。

在这一例子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原理：艺术作品归根到底是一定社会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反映，但是从中又要区分出构成这些作品的永久价值、属于真正全人类的因素并且也符合后代美学要求的東西。马克思主义对过去的艺术遗产决不采取虚无主义态度。马克思作出了榜样：他对世界艺术创作宝藏采取爱护的态度，加以细心的研究和运用，以便促进人类在精神文化方面一切伟大成就的进步。

马克思深入思考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中艺术的地位，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就表述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现实对真正的艺术创作抱敌对态度的思想。这种思想决不意味着否定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学艺术的发展。它包含下述函义：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 348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4页。

② 同上书，第114页。

本质同激励着真正的艺术家和艺术巧匠的人道主义原则有深刻的矛盾。他们越是深刻地意识到他们的理想和现存的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矛盾，他们就越是往往违反自己的阶级出身，在自己的作品中对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关系发出更加强烈和更加明确的抗议。资产阶级社会对艺术创作的敌对态度甚至招致资产阶级文艺对资本主义进行某种批判，把资本主义现实描绘为充满凄惨的和悲剧性的冲突的现实世界。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制度下艺术创作发展的辩证特点就是如此。正因为这个缘故，在资产阶级社会才能够涌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和其他天才作家，他们作为艺术家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和阶级环境，并以巨大的艺术力量谴责剥削制度的罪恶：对备受压迫的人的冷酷，金钱万能，对人类个性的尊严的践踏等等。

马克思在《导言》中以及在其他著作和书信中所作的概括，经久不变地列入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宝库。它们构成文学艺术的科学理论和历史的基础。

1857—1858 年的一组主要手稿

《导言》没有写完，但是它的广泛的内容也反映了 1857—1858 年新的一组经济学手稿中主要两个章节的丰富的思想财富。

在《货币章》中非常详细地研究了价值和货币的一般理论的重要问题。马克思重新审查了自己原来对货币的观点，因为以前，特别是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他继李嘉图之后，把金银列入商品的特殊范畴，认为它们的价值似乎不决定于生产费用。

马克思在批判把供求当作货币价值要素的错误理论时指出，用金属价值来计量的商品价格是由贵金属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

不是由它们在流通中的数量决定的。“……贵金属的生产费用提高，各种商品的价格就降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降低，各种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这是一般规律……”^①

马克思一步一步地仔细考察了货币经历的漫长道路。货币不是³⁴⁹是通过契约产生的，正象国家也不是通过这种途径产生的一样。货币最初是交换的产物，而交换又是分工的产物和结果。马克思指出：“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最初的前提。”^②最初扮演货币脚色的商品，是那种作为整个社会或其一部分的需求对象而经常加入交换的商品。在交换的初期阶段，盐、毛皮、牲畜和奴隶曾作为货币发挥作用。只是过了许多时间之后，那种很少用于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商品，才开始服务于这种交换的需要。“在前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而成为货币；在后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充当货币而获得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③

同样，货币的职能也是逐渐发展的。在交换和物物交换的低级阶段，货币基本上执行的是价值尺度的职能。货币要么不作为交换工具或交换手段出现，要么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作为交换工具或交换手段出现。马克思注意到：在荷马时代犍牛首先是尺度，人们一说到它们，总是把它们当作货币。

1857—1858年主要手稿的绝大部分篇幅构成《资本章》。这一章在七本手稿笔记本中几乎占了六本。

《资本章》包含对于剩余价值理论这一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石的最初叙述。马克思在这里详细考察商品生产从低级形式到它的最发达形式的历史发展过程，在后一形式下劳动力成为商品，买和卖的过程获得无所不包的性质，它使社会生活和活动的整个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41页。

② 同上书，第135页。

③ 同上书，第113页。

都服从于自己的规律。

马克思把货币看作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详细地分析了产业资本的形式变换。手稿中指出，资本交替地变成商品和货币。资本本身表示这两种规定的转换，而这种转换的最终结果和目的是使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原先投在工商业周转中的货币额比以前有所增多。这样一来，货币本身，即作为一种商品，即使是作为享有
350 特权的商品的货币和获得“自行增殖”能力的货币之间的本质差别，就被强调出来了。

然而，在社会生产的一定阶段货币变为资本，不是独自发生的，不是由于它本身的某种特殊属性，而仅仅由于下述事实：工人从事劳动的能力，换句话说，工人的劳动力，成为买卖对象，即成为同无数其他商品相并列的一种商品。购买劳动力的资本家付给劳动力的价值，平均说来等于工人生活资料和他的训练费用的价值。他为了自己个人的使用而购买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并且通过使用劳动力，除了补偿劳动力的价值，即资本用于维持这个劳动力的费用（它表现为工资）以外，还白得一部分制成品。象所有产品一样，这部分产品也是雇佣工人生产出来的。这部分产品中体现着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一切形式的非劳动收入的源泉。

可见，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只是在外观上是等价物的交换，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把这个外观说成是现存的事实，以图证明资本主义关系是合理的。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表述了不变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可变资本（劳动力的价值）的概念。这一发现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由此就弄清楚了，利润在生产过程中不是由整个资本、不是由总资本产生，而只是由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产生。至于表现为固定基金、表现为原料和材料的价值的

资本,其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并不增殖,而只是转移到制成品上。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来没有把工人被迫向自己的雇主提供的产品中的无酬部分,“就其总和即当作一个整体”^①来加以研究,虽然他们认识到利润和地租不过是这个无酬部分的一份、一部分。马克思在自己的新手稿的《资本章》中指出:“剩余价值——就它虽然是利润的基础,但又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利润这一点来说——在本质上还从来没有被阐明过。”^②

研究剩余价值,而不拘泥于它的特殊形式——利润、利息和地租,这是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这是辨别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分界线之一,后者经常把利润的特殊形式和它的一般形式混为一谈。

在手稿中同时也提到资本的历史趋势问题。马克思展望了几十年后的未来,预见到生产力发展的总趋势,这一趋势已为后来人亲眼看到。他谈了下述问题:研究“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③,各个气候地带和国度的产品的普遍相互交换,发现加工“自然物体”和制作个人消费品与生产消费品的新方法,全面研究土地以便发现可供使用的新物品和原有物品的新的有用属性。自然科学的非常高的水平应是这一切的必要前提。

资本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正是在这里表现出它的“伟大的文明作用”^④。可是,它迟早要达到自己发展的内部界限:“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⑤这一社会制度的固有本性开始同资本主义一定阶段上生产力无限的和普遍的发展趋势日益发生对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60页。

③ 同上书,第392页。

④⑤ 同上书,第393页。

马克思关于将来科学地利用这一深刻的、真正有预见的思想具有特殊意义。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大生产的条件下，“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使“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①成为生产的最重要的要素的趋势就在发展着。工业首先达到的技术水平，“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②。马克思指出，在生产即生产力的发展将摆脱束缚它们的社会对抗的社会中，科学变为直接生产力的这一过程将达到更高阶段。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发展阶段的某些其他特点的思想，非常重要。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时期，集体制将成为生产的基础，而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作为集体劳动出现。不是交换将赋予劳动以共同性质，而是生产的集体性质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集体的共同的财富。

马克思指出，在集体生产的条件下，时间的节约，以及不同的生产部门有计划地分配劳动时间，将成为第一个经济规律，成为“更高层次的”规律。一切真正的节约都表现为珍惜劳动时间，使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就等于劳动生产力发展了。珍惜劳动时间就等于扩大自由时间，即扩大劳动者充分和全面发展的时间，而劳动者的这种发展又必定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自由时间——无论闲暇时间，还是从事更高级活动的时间——使社会每个成员都能充分发展自己的智力和体力。

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论述问题的范围以及科学分析水平来看，这部手稿确实可以认为是《资本论》的第一个手稿，第一部著作，是马克思以后紧张地创作了二十多年的那部巨著的实验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219—220页。

付印新的经济学著作的准备工作

还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写作结束之前,马克思就开始了付印这一手稿的准备工作。首先编写了详细的名目索引,以便于使用各手稿笔记本。在1858年8月初至11月中旬,马克思在手稿的基础上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初稿,同时开始寻找出版者。拉萨尔在这方面帮助了马克思。他同柏林出版商敦克尔商定,将该著作分册陆续出版,每册篇幅不少于四个印张,也不多于六个印张。这种出版方法是马克思自己提出的,因为当时他没有可能把整个著作全部出版。作者原先打算在1858年5月底就付印第一分册。马克思使第一分册成为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使它成为以后各分册的全部论述的理论基础。 353

马克思贫病交加,付印手稿的准备工作极难完成。由于病体的痛苦,他几度完全不能工作,经常是自我感觉很坏,几乎不能“执笔”,有时即使能忍住疼痛稍微工作一下,接着“就得躺好几天不能动”^①。疾病拖延了完成著作的日期,影响了叙述的风格。马克思自己不满意所写的东西,何况所写的著作实际上是十五年坚持不懈的研究成果,他想以最好的形式完成它。马克思写道:“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损害”^②。马克思对自己严格要求的要求,是他在自己的科学和政治活动中严格遵循的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行动准则。

在写作手稿期间,马克思从《经济学家》杂志得知资产阶级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06、310页。

② 同上书,第546页。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济学家詹·麦克拉伦的著作《通货简史》的出版消息。马克思对这本书很感兴趣。他说：“……我的理论良心不允许我不读这本书就写下去。”^①在不列颠博物馆图书馆新书照例到得很晚。而马克思又买不起书，虽然这本书总共才值九先令六便士。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家庭依然被生活的困苦压得喘不过气来。马克思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由伦敦寄往柏林的手稿的邮资^②。准备工作完全停止了，直到恩格斯寄来汇款为止。

1859年1月26日，手稿终于寄给了出版商敦克尔。手稿的篇幅超过原来一倍。大约过了一个月，2月23日，序言也寄走了。

第一分册的印制时间拖得相当长。马克思不满意敦克尔办事的“拖拉作风”^③。1859年6月11日该书问世，发行了一千册。

《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的天才著作之一。马克思在书前加了序言，扼要地叙述了自己研究经济学的经过。序言中含有唯物史观的经典公式，根据这一观点得出的高度的革命结论无论对理论还是对实践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16页。

② 同上书，第370页。

③ 同上书，第567页。

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

唯物主义应用于社会关系而得出的基本结论和基本原理的这一经典公式，使序言成为具有独立科学价值的文献。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结尾，马克思引用了伟大的佛罗伦萨人但丁的诗句，作为自己从事科学和革命斗争的铭言：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②

除了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包括《商品》和《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

《商品》一章，无论对于叙述或理解来说，都是最困难的一章。在这一章中，马克思在商品的最简单形式中弄清了资本主义生产 355 的矛盾性质，为进一步分析和批判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范畴建立了理论的进攻阵地。从较简单形式上升到较复杂形式的卓越研究方法，反映了马克思的方法的重要特点。分析商品和价值并不是目的本身。马克思进行这一分析，是为了从逻辑上过渡到对货币和资本进行分析。

乍一看，资产阶级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则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原素存在。马克思给商品即买卖对象所下的定义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统一。

使用价值就是使物成为必需物品，有用物品，成为人的消费品。使用价值在任何社会中，在社会生产的一切形式下，总是构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② 同上书，第85页。

财富的物质内容。它是由具体劳动，即鞋匠、裁缝、木匠和农民等的劳动创造的。

相反，交换价值是经济关系。生产交换价值的、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同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以及劳动本身的特殊的具体的形式无关。这是无差别的、无质的劳动，即“没有劳动者个性的劳动”^①。形成价值实体的这种劳动，马克思称为抽象的一般的劳动。马克思早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提出了关于劳动的二重性、关于抽象劳动是交换价值的源泉的原理，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他对此作了详细的剖析。他指出，一般人类劳动的抽象，就在于把不同种类的劳动化为简单的平均劳动，即化为该社会平常人所能完成的劳动。表现在价值中的劳动是作为单独的个人人的劳动而实现的，但是它通过交换和市场关系采取了自己的对立物的形式，成为抽象的一般的劳动。所以，这种劳动是劳动的特殊社会的形式。

马克思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赞同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所持的关于价值的来源和实质的基本概念。同时，甚至同劳动价值理论的最彻底的拥护者李嘉图相比，他也向前迈了极重要的、本质上是新的一步。

356 马克思的前人，包括李嘉图在内，虽然把使用价值和价值区别开来，却未能说清它们的真正关系。他们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却未能弄明白创造价值的劳动的特点。他们只是从事价值量的研究，用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却未能抓住质的方面，未能指出表现在使用价值和价值中的劳动形式的特殊性。

只有马克思第一个做到了这一点。《商品》一章详细地叙述了关于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物的商品的二重性和作为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7页。

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劳动的二重性的学说，这是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

在关于商品的一章中，马克思揭穿了作为物的关系的商品世界的玄妙性质，为深刻地批判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一切歪曲的表现形式奠定了科学前提。

第二章《货币或简单流通》比《商品》一章篇幅更大，对问题的本质研究得更加充分。在第一章里有些论点只是提了一下，在《资本论》中才得到进一步的发挥；相反，在第二章里对一些原理已做了“详细阐述”^①，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整个这册书进行概括时对此只作了简略的复述。第一章的材料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大约增加了一倍，全部作了认真的改写；相反，第二章的材料大约缩减了一半，并未经过实质性的再加工。

这一章整个说来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和货币流通理论的完全成熟的和极为详细的叙述。由于这一章比《资本论》第一卷的相应篇章叙述得更加详细，并且包含有《资本论》中所没有的主要的历史插叙，同时又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这就使《政治经济学批判》这部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卓越著作具有独创的科学意义。

马克思制定了货币和货币流通的真正科学的理论。他指出，货币不是为了流通的方便而加入流通，而是由流通本身产生的。货币的职能开始由一种特殊商品来执行，这种商品的自然特点是便于运输、可以分割等等，正是这些特点使这种商品成为价值的最恰当的存在，使它作为社会劳动的体现而加入私人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过程。货币具有价值，不是由于它们执行某种社会职能，而是由于它们是劳动的产品，因而象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具有并非想象的和假定的，而是完全实在的价值。货币是价值的完成的最高的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页。

357 现,它是由商品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的发展而形成的。这是私人劳动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形式。

马克思研究了历史上依次出现的货币的全部职能,这就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并表述了货币的必要流通量的规律以及货币流通的其他一些规律。

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使政治经济学名副其实地发生了革命。1859年2月1日他给魏德迈写信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党取得科学上的胜利。”^①随着《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这项任务出色地完成了。

马克思指出,他的经济学观点完全优越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和教条。马克思所采用的方法的巨大优越性和对政治经济学对象的唯一正确的理解,使他在研究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原来范畴时得出一些结论,这些结论推翻了已经形成的并且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动摇的概念。同时又证明了,蒲鲁东对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批判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假兄弟”蒲鲁东主义所宣扬的所谓通过改良来消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坏的方面”的全部计划,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因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问世是工人阶级革命政党在理论上的双重胜利,既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胜利,又是对蒲鲁东及其追随者的学说这一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变种的胜利。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文献中关于货币和货币流通问题的最好的著作,然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一著作第一次叙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理论,它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54页。

德国官方的资产阶级报刊用“沉默的阴谋”来对待马克思的书。起初，甚至连马克思的一些朋友也不理解此书极为深刻的内容。因此，恩格斯的书评对宣传《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思想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他评价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个卓越的科学成就，并把这一著作看作政治经济学发展中的新阶段。该书的发行量迅速扩358大了。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洲都知道了这本书。马克思为这一成就而受到鼓舞，立即着手准备第二分册。同时，他还打算准备第一分册的英文版，但是由于日常生活上的种种不幸，不得不放弃这一计划。

马克思和达尔文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出版的年代，查理·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了。达尔文主义的产生和达尔文所提出的思想在科学中的确立，是人类智慧在揭示自然秘密方面的最出色的成就之一，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宗教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光辉胜利。

值得注意的是，在达尔文对有机界所持的自发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渐趋成熟的时候，正值这样一个时刻，马克思和恩格斯正在制定自己彻底科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马克思正在创立自己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在形成时间上的这种巧合，不能认为是纯粹偶然的现象。这种巧合的原因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从实践中产生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这些思想是由社会发展的整个进程、社会生产的成就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所促成的。

大工业的发展，蒸气机的使用，提供了推动力去发展物理和化

学，去揭示物质和能量的转换过程。采矿业的扩大推进了对地壳的研究，从而产生了发展地质学的思想。农业集约化的需要迫使人们去研究植物和动物的种，结果产生了动植物变异和发展的思想。随着资本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根本改造社会生活的条件成熟了。这一切使唯物主义辩证法能够作为一门科学而诞生。

旧的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虽然仍占优势，但已同新的、进步的世界观的日益成长的力量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只有彻底革命的和进步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才能对既有的科学和实践作出深刻而又全面的总结，并在这种总结的
359 基础上建立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他们发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即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规律。至于达尔文，他在科学的创造上虽然可以完全自由地思想，在社会政治观点上却没有超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框子。但是，他是一个诚实的、坚持原则的自然科学家，无私的真理探求者，他通过对生物学和农业实践的材料总结，自发地走上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道路。科学研究的逻辑和他从事科学活动的条件促使他走到这一步。

这样，两个科学巨人——马克思和达尔文，虽然通过完全不同的途径，却得出了相同的方法论的观点，不过一个是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领域，而另一个是在生物学领域。马克思发现和论证了社会结构的变异性，达尔文则发现和论证了动物和植物的种的变异性。恩格斯注意到这种情况，后来他指出：“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①

马克思是最早高度评价达尔文著作的人们中的一个。1860年12月19日他带着阅读《物种起源》一书的新鲜印象写信给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

说：“虽然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但是它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① 达尔文主义坚决主张自然界中发展的思想，给予关于世界不可改变的形而上学观念以致命的打击，有助于为传播社会发展的科学观点扫清基地。马克思认为达尔文学说是自然科学的伟大成就之一，这些成就同对社会现象的科学分析一样，应成为革命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的依据。达尔文的著作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然界中合理性的唯心主义的解释，科学地阐明了对自然界的合理的看法^②。

马克思也指出了达尔文世界观的某些薄弱方面，特别是下述简单类比的倾向：他竟把在动植物界中起作用的规律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在他眼前发生的竞争即“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两者作简单的类比。但是，这并不是达尔文的主要的缺点。马克思认为，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意图却危险得多，他们要把达尔文发现的生物学规律搬到人类社会，从而用自然界的“永恒”规³⁶⁰律的作用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马克思在1869年2月15日致保·拉法格和劳·拉法格的信中指出，英国社会中普遍的残酷的竞争使达尔文产生了关于生存斗争的规律和动植物中存在自然选择的思想，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则把伟大自然科学家的理论加以庸俗化和歪曲，把这一竞争的事实解释为“人类社会永远不能摆脱自己的兽性”^③的证据。

马克思和达尔文互相尊重和承认对方的科学功绩，他们的关系以此为标志而发展了，只是世界观的差别不能使他们亲近并结成友谊。达尔文为了答谢马克思寄来《资本论》一书，于1873年10月1日给他写信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31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74—57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80页。

“亲爱的先生：

承蒙寄赠巨著《资本论》，谨致谢意。诚愿对政治经济学如此高深而又重大的课题能有较多的了解，以无愧于您的惠赠。尽管我们的研究领域是如此不同，但我相信，我们两人都热诚期望扩大知识领域，而这无疑将最终造福于人类。

亲爱的先生，我仍然忠实于您

查理·达尔文”^①

在达尔文1880年10月13日的信中，也表现出对马克思的尊敬。达尔文感谢《资本论》作者想把自己的著作之一部分献给他而得到的荣誉，并强调指出，他不得不悲伤地拒绝这一荣誉。达尔文说明他所以采取这一决定，是由于不熟悉马克思的整个著作的内容，并且他由于不愿使笃信上帝的家里人伤心，总是躲避正式作出反宗教的表示。尽管如此，整封信反映出对马克思科学功绩的好评。

马克思和达尔文创立的理论在紧密的相互影响下得到发展，它们相互巩固和加强。达尔文主义为证实、论证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内容丰富的材料。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为劳动者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打下良好的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在对达尔文学说作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方面，在发
331 展他的方法论原理方面又起了卓越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高度评价达尔文主义思想，指出它的巨大的科学意义，从而促进了它的最广泛的传播。

列宁把马克思的科学功绩和达尔文的发现作了对比，他写道：“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3314。

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作为一定生产关系总和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①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第九章

362

民主运动和无产阶级运动的新高涨

“象在 1848 年那样，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吸引更广泛的、更多的‘平民’大众和一般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以及无产阶级来参加，以扩大和加剧资产阶级民主运动。”^①

列 宁

世界经济危机虽然没有直接引起革命，但却促进了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欧洲和美洲革命的新高涨。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任务一直没有完成的德国和意大利，再一次掀起了民族统一运动。俄国和美国也出现了革命形势。波兰和爱尔兰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在波拿巴法国和奥地利帝国的人民群众中也发生了革命的骚动。

363 德国、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日益高涨。无产阶级运动正在脱离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开始走上独立的发展道路。

工人运动的迫切需要促使马克思更多地注意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的实践方面。必须击退那些敌视无产阶级的集团，设法帮助工人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影响，确保工人阶级在完成资

^① 《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126—127 页。

产阶级民主改革过程中的独立自主的作用。马克思希望工人阶级能从理论上作好这方面的准备,就想尽快结束他的经济学的研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马克思便孜孜不倦地集中力量修改他的过去的经济学手稿和写作新的章节。马克思付出了难以置信的精力,终于完成了大量的理论工作,同时还履行了无产阶级组织者和政论家在新的条件下的越来越多的职责。

马克思不得不花费许多时间来制定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新的国际冲突和战争以及有关各国革命形势的策略路线。

1859年初,马克思设法扩大和加强国际无产阶级的联系。从1859年2月起,他同在为芝加哥工人出版报纸时曾得到他的帮助的魏德迈的通信又频繁起来了。他在1860年同德国和瑞士革命运动的老战士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建立的联系,就促使贝克尔转向了共产主义立场。马克思在德国的通讯范围扩大了。1862年底,他同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早就对他的活动表示同情的汉诺威医生路德维希·库格曼建立了经常性的通信联系。

马克思同住在伦敦和英国其他城市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列斯纳、普芬德、罗赫纳、伊曼特等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他希望他的每一个战友都能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革命高涨时期所面临的任务。

在新的条件下,尤其重要的是创办一个无产阶级自己的刊物,它应该成为宣传革命思想的党的公开讲坛和无产阶级战士的组织中心。马克思在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样的时刻也可能到来,而且不久就会到来,那时十分重要的是,不仅我³⁶⁴们的敌人,而且我们自己也有机会在一家伦敦报纸上发表自己的观点。”**^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8页。

《人 民 报》

1859年5月初，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讨论了在报纸上传播无产阶级观点的问题。几天以后，马克思被约请为一份新的周报即1859年5月7日创办的作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其他德国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人民报》撰稿，约请马克思的建议是该报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比斯康普提出的。马克思没有给予明确的答复，因为他想试探一下是否有可能对该报施加思想影响。他拒绝为该报正式撰稿，但他答应经常帮助比斯康普。他实践自己的诺言，参加文章的编选，为报纸筹集资金和收集资料。例如《人民报》的第2号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刚刚出版的恩格斯的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5月28日出版的第4号发表了恩格斯应马克思的请求而写的文章《意大利战争》。在马克思的影响下，报纸社论的调子逐渐有了变化，对内外的政治事件的评论也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报纸从一个主要反映伦敦的德国小资产阶级阶层狭隘利益的流亡者的报纸，逐渐变成了一个表达无产阶级立场的战斗的革命报刊。这就使马克思及其战友们在1859年6月同该报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在6月11日的第6号中，编辑部正式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弗莱里格拉特和威廉·沃尔弗参加该报工作。

从7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已经成为该报的编辑和行政负责人，该报终于变成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报纸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人民报》上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和策略问题。报纸刊登了马克思为《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以及恩格斯对该书的评论。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发现的唯物主

义历史观不仅对于科学,而且对于实践,对于革命运动都有巨大的意义。他阐述了马克思制定的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本质特征。

《人民报》捍卫无产阶级群众的利益,报道无产阶级的阶级搏斗。譬如报纸向读者报道了1859年7月底伦敦建筑工人的一次罢工³⁶⁵,这次罢工对唤醒英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马克思认为反对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报纸的主要任务之一。在许多期《人民报》的“报刊述评”栏里发表了马克思在比斯康普参加下写的一些评论,这些评论无情地批判了小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政治上的无原则性,以及他们的充满着庸俗气味和民族主义的观点。

《人民报》特别注意意大利战争(当时人们称为1859年奥意法战争),无产阶级在这场战争中的策略,以及对波拿巴主义和英国、普鲁士、俄国对外政策的揭露。

《人民报》出版时间不长。该报自创办日起就缺乏经费,到1859年8月已难以维持了。马克思曾设法筹集资金使它继续出版,但未能成功。1859年8月20日出版了最后一号即第16号。尽管报纸存在的时间很短,但是它在传播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原则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主张以革命的途径统一意大利

1859年初,意大利正处在革命爆发的前夜。统一国家和把北部地区(伦巴第、威尼斯)从奥地利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必要性越来越明显了。意大利的大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的贵族希望通过“自上而下”即通过王朝、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办法实现国家统一。撒丁王国(皮蒙特)的首相、大地主卡富尔伯爵就是这种政策的主要

鼓吹者。卡富尔认为，皮蒙特和法国联合起来共同对奥地利作战是实现这一计划的手段。另一方面，拿破仑第三也指望在“解放”意大利的虚伪口号下，利用成功的“局部”战役来巩固法国摇摇欲坠的波拿巴政体和牺牲意大利来获得新的领土。

与拿破仑第三和卡富尔的期望相反，1859年4月底爆发的法国和皮蒙特对奥地利的战争引起了意大利境内的巨大的革命高潮。人民的起义席卷了托斯卡纳、帕尔马和摩地那。这些国家的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在罗曼尼亚和教皇国的各省也爆发了起义。国内到处是革命的风暴。

366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把意大利问题看作是一个影响全欧洲的问题，认为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发展将取决于意大利的斗争。1859年1月，即在战争爆发之前，马克思写道：“意大利革命的胜利将成为一切被压迫民族为了从他们的压迫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展开共同斗争的信号。”^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主张用革命的方法解决意大利问题。马克思在1859年1月初写的《意大利的统一问题》一文中表示，他相信“意大利人对压迫者的刻骨仇恨随同日益加深的痛苦也并不是不可能爆发为全面的革命的”^②。马克思支持意大利的真正爱国力量，把它称为“意大利民族派”^③，同时还揭露了在皮蒙特的萨瓦王朝庇护下统一意大利的王朝计划的反人民和反革命的实质。他希望意大利的民主主义者能够把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和当时为数不多的工人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发起伟大的民族起义”^④。他认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才能实现民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184页。

② 同上书，第178页。

③ 同上书，第182页。

④ 同上书，第183页。

解放和根据民主的原则统一意大利，才能按照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消灭封建主义残余，推翻专制制度。

马克思在论述意大利事件的一系列文章中对意大利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相信意大利人民有能力制止贵族同大资产阶级结盟这种反革命的亲波拿巴的行为。马克思高度评价意大利民主派领袖马志尼揭露拿破仑第三对付意大利的反革命计划，认为马志尼“做出了一件英勇过人的、具有爱国主义自我牺牲精神的非凡壮举”^①。

同时马克思也全力揭露拿破仑第三对意大利实行的政策的真正目的。马克思在战争还处于外交和军事准备时期所写的许多文章（《欧洲战争前景》、《路易-拿破仑的处境》、《法国的战争前景》³⁶⁷等）中指出，拿破仑干涉意大利内政，目的是防止这个国家的革命的爆发，保持它的分裂状态和反革命制度，巩固自己在法国的地位。他写道：“第二帝国的虚伪的光荣正在迅速消失，而为了重新证明这种闻所未闻的诈骗是真实的，就需要流血。”^② 马克思对拿破仑第三的真实意图的推测在意大利战争刚开始就被完全证实了。

马克思希望革命民主力量利用当时这种局势唤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从而促使王朝战争转变为革命战争。

马克思在《意大利赢得了什么？》、《媾和》和《维拉弗兰卡条约》这几篇文章中总结了这场在1859年7月11日签订维拉弗兰卡初步和约而结束的战争。马克思指出，拿破仑第三所以匆忙缔结和约是因为意大利战争违背了战争发动者们的意志“开始变成了……革命战争”^③。但是维拉弗兰卡和约已经清楚地表明，路易-拿破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06页。

② 同上书，第188页。

③ 同上书，第470页。

提出保护被压迫民族的虚伪口号的目的根本不是为了解放和统一意大利。马克思强调指出条约对于意大利人来说是侮辱性的：伦巴第最初被割让给法国，后来又“作为法国的礼物赠给萨瓦王朝”^①，而且，拿破仑还要求把萨瓦和尼斯作为报酬攫为己有。威尼斯仍然留在奥地利的魔爪中（直至 1866 年）。马克思指出：“要经过很长时间路易-拿破仑才能重新使那些多愁善感和热忱的人们产生错觉，把他误认作为自由而奋斗的战士。”^②

加里波第运动

1859 年 7 月，马克思根据对维拉弗兰卡条约的直接印象写道：“但是，很可能，意大利的革命会干预这件事情，以改变整个半岛的状况并且再次把马志尼和共和党人推上舞台。”^③ 马克思的预见是正确的。仅仅过了十个月，1860 年 4 月在西西里爆发了反对波旁王朝的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的人民起义。杰出的意大利革命家马志尼赶去帮助起义者，1860 年 5 月他率领一支志愿兵即有名的“千人志士”在西西里登陆。加里波第的常胜部队从西西里向那不勒斯进军，9 月初占领了那不勒斯，把整个意大利南部从那不勒斯波旁王朝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此后，加里波第开始准备进军罗马。

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意大利事件，非常同情加里波第及其志愿兵的英勇斗争，并且高度评价这位真正人民统帅的革命策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第 474 页。

② 同上书，第 471 页。

③ 同上书，第 476 页。

马克思完全赞同加里波第对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玩弄的阴谋进行坚决的斗争。马克思在分析这位意大利民族英雄对法国皇帝的否定看法时，在1860年9月15日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加里波第以前完全象马志尼一样同意我对**波拿巴的使命**的看法。”^①他认为加里波第的成就不仅显示了意大利的革命统一的远景，而且动摇了拿破仑第三的欧洲政策和整个波拿巴制度的基础。

马克思揭露了对抗加里波第革命行动的皮蒙特统治集团的反革命政策。马克思忧虑地获悉撒丁王国政府同路易-拿破仑已经达成关于由皮蒙特军队进入教皇国来阻止加里波第进军罗马的协议。他写道：“卡富尔完全是波拿巴的工具……”^②

尽管加里波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没能把革命斗争进行到底。尽管马志尼和其他民主主义者一再要求，他始终没有下决心在那不勒斯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并在共和国的旗帜下继续进行争取统一整个意大利的斗争。1860年10月加里波第放弃了向罗马的进军，允许皮蒙特的军队进入那不勒斯，并交出自己的权力，从而暴露了他在政治上目光短浅和不彻底性这些固有的特点。他最关心的是意大利的统一，但没有充分考虑统一形式的问题，他虽然是一个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但是并不反对在君主立宪政体的范围内统一国家。加里波第辜负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期望，他只是一个革命将领，而远不是一个政治家。

1860年10月底举行的全民投票，确定意大利南部归属皮蒙特王国。于是意大利人民在加里波第领导下所取得的胜利果实就被萨瓦王朝和它所支持的自由派贵族和大资产阶级的联盟窃取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62页。

② 同上书，第566页。

争取德国统一斗争的策略

意大利战争引起了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的其他各邦的全国性动荡。德国的公众舆论正确地认为拿破仑第三进攻奥地利是公开侵占莱茵河左岸的前奏。在报刊上、在群众集会和俱乐部里，人们都要求对拿破仑第三的掠夺计划组织全国性反击。1859年德国全国性的运动又把许多德意志邦合并为统一国家的问题再一次提上了日程。

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无产阶级策略，把它同无产阶级革命者对待意大利冲突的策略立场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曾经镇压欧洲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波拿巴主义是德国统一的最大障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时击溃波拿巴法国看作是欧洲革命的重要的先决条件，并竭力主张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站在奥地利方面参加意大利战争。当然，他们的策略决不意味着号召支持奥地利帝国的反动制度及其在意大利的统治。他们始终愤怒地谴责奥地利摧残意大利和其他被压迫人民的自由。马克思在《普鲁士的战争前景》一文中写道：“德国人民要坚决站在意大利方面来反对奥地利，同时又不能不站在奥地利方面来反对波拿巴。”^①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利益解决当时世界政治中错综复杂问题的辩证方法。

马克思坚信，如果德意志各邦站在奥地利方面参加意大利战争，那么它们将不由自主地为王朝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从而为意大利真正摆脱奥地利的压迫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一旦奥地利和德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314页。

志各邦采取联合行动,法国的失败将会引起欧洲的革命爆发,结果不仅将消灭法国波拿巴制度,而且也将消灭奥地利本国的以及普鲁士和德意志联邦其他各邦的反动政体,不仅德国,意大利也将通过革命和民主的方法实现统一。马克思在阐述这个思想时,在《斯普累河与明乔河》这篇文章中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士同奥地利结成同盟“就意味着革命”^①。如果事态如此发展,那么沙皇俄国站在法国一边反对德国将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就更可能引起欧洲革命,加速和加剧革命的危机。

马克思在《普鲁士对战争的看法》、《Quid pro quo》、《斯普累河与明乔河》这些文章中,痛斥普鲁士政府软弱的中立政策,认为它是波拿巴主义的直接帮凶。他指出,普鲁士的统治集团不愿意反对拿破仑第三,是因为害怕革命的爆发,想利用奥地利被削弱的时机来实现以普鲁士为霸主统一德国这一王朝计划,“用诈骗的手段去贴现德国霸权的期票”^②。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的爱尔福特精神》这篇形式优美、内容深刻的文章中直截了当地指出,历史的进程要求德国抉择:要么用革命的方法来完成全国的统一和必要的变革这些迫切任务;要么就由统治集团自上而下地用符合他们利益的方式和方法来完成这些任务。马克思警告局势有转变的危险,“这个革命的纲领在反动派的手中就变成对相应的革命意图的讽刺”^③。

马克思在报纸上强调指出,意大利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欧洲的革命问题解决了。事实上,在维拉弗兰卡和约签订以后,在德国仍然全国动荡不定。1860年在普鲁士由于议会下院拒绝批准政府关于改组军队和增加军事拨款的草案而引起的宪制冲突,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437页。

② 同上书,第510页。

③ 同上书,第462页。

推动了统一德国的运动。在德国开始出现了革命的形势。马克思在1860年4月写的《柏林的情绪》一文中指出了革命浪潮的明显高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2年宪制冲突达到高潮时所写的书信表明,他们认为普鲁士的形势越来越尖锐,当时的危机很可能引起革命。但是他们象在1848年那样,非常担心自由主义反对派会胆
371 怯懦弱,向容克政府叛变投降。实际上,普鲁士自由派只是空喊反对,任凭反革命势力巩固自己的阵地。1861年在位的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于1862年9月任命波美拉尼亚的容克贵族奥托·俾斯麦为首相,后者不经议会的任何批准就开始实行军事改革。议会中的自由主义多数派、进步党人,只限于口头抗议,实际上使俾斯麦有可能象他本人在一次讲演中所说的那样用“铁和血”自上而下地来实现德国的统一。

同拉萨尔的分歧

在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的高潮时期,马克思和拉萨尔之间的分歧越来越明显了。多年来,马克思曾尽力向拉萨尔介绍革命理论,诱导他为无产阶级工作。马克思在写给恩格斯和拉萨尔本人的一些信中也多次批评后者的理论观点,认为拉萨尔一直坚持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他强调指出,拉萨尔的哲学著作是肤浅的、折衷的,而作者本人还自命不凡。

马克思在1858年2月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对拉萨尔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写的这段评语包含着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思想,“明快的拉萨尔所写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实际上是一部非常无聊的作品。赫拉克

利特借以阐明肯定和否定的统一的许许多多形象，拉萨尔都一一提到了，并趁此机会给我们献出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某些片断，而这个逻辑学未必能因此就博得好评；而且他总是唠唠叨叨地说一大套，就象一个小学生要在一次作业中证明，他已经把它的‘本质’、‘现象’以及‘辩证过程’都掌握了。”^①

马克思仍然同拉萨尔保持联系，希望后者能考虑他的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观点。尽管拉萨尔向马克思保证拥护马克思的观点，但是他实际上始终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拉萨尔当时稍感兴趣的那些社会主义观点同科学共产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它们来源于空想社会主义各流派代表人物的学说，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学说。五十年代末，世界观和对当时政治问题的看法的深刻差别，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理论问题以及在革命运动的斗争策略问题上同拉萨尔产生了原则性的意见分歧。³⁷²

1859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善意地但又非常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的一篇描写1522—1523年即德国农民战争前夕爆发的骑士起义的历史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他们在给拉萨尔的信（马克思在1859年4月19日写的信和恩格斯5月18日写的信）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美学的重要原则。他们对拉萨尔这个剧本的文学方面的分析的重点是现实主义问题。他们在这方面的见解看来就是他们对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的看法的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作为文学上的一个派别，作为艺术创作的一种方法，是世界艺术发展的最高成就。在他们看来，现实主义方法能够把现实用艺术形式最恰当、全面和深刻地反映出来。现实主义的描写决不是复制现实，而是一种认清现象的本质、对它们进行艺术概括和揭示某个时代的典型特征的方法。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62页。

克思和恩格斯就是从这一点来评价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普希金等人的创作的。马克思对巴尔扎克评价甚高，用他的话来说，这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①艺术家，最完美地创作了一幅十九世纪上半叶法国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活风俗画。他打算在写完《资本论》后，专门写一篇文章来研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这组著名的小说。马克思在185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把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萨克雷、白朗特、加斯克耳，称作是“一批杰出的小说家，他们在自己的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②。

马克思对拉萨尔剧本的评价标准表明他对现实主义本质的深刻理解。他指出了剧本的成就：优秀的结构和“情节”^③。同时他也指出拉萨尔的剧本背离了现实主义原则，辞藻浮夸，把人物描写得太抽象了。拉萨尔把人物“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④，
373 这就使他们失去了个性和真实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戏剧缺少真正的社会背景即人民群众的代表，也是背离现实主义的。拉萨尔没有能真实地反映历史状况，并使它具有戏剧色彩。

这些批评性意见反映了现实主义艺术创造的重要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艺术家们真实地反映现实，以具体的历史的态度处理所描写的现象。所描写的人物必须具有能反映他们所属的阶级的性格和心理的典型方面的真实的个性特征。一部真正现实主义作品的作者不应采用说教式的规劝形式向读者表达自己的思想，而应通过栩栩如生的和富于表现力的形象，通过各种艺术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第6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9页。

④ 同上书，第340页。

现的方法去影响读者的思想和心灵。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加深了德国的伟大诗人和戏剧家席勒的创作方法上的一些弱点,也就是说,他倾向于抽象的高谈阔论,把主人公变成抽象的、片面的、表达某种思想的传声筒;在这方面他们十分赞赏莎士比亚。他们在信中向拉萨尔指出,他在模仿席勒的风格时,忘记了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必须把思想深度和崇高理想同莎士比亚式地描写真实感情和各种人物性格的能力结合起来。

马克思对作家和作品的艺术形式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说:“……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拉萨尔的信中也谈到了文学艺术同生活、同时代的联系问题。马克思并没有指责拉萨尔想把剧本里所描写的十六世纪的事件同十九世纪中叶的形势做某种类比,想表现一个“使 1848—1849 年的革命政党……灭亡”^②的真正的悲剧性的冲突。他认为拉萨尔的错误是唯心主义地和不正确地解释这个冲突,把冲突的原因归之为似乎没有具体历史内容和阶级内容的永久的、抽象的“革命悲剧”。马克思并没有因为拉萨尔的剧本具有政治倾向而批评他,而是因为这种倾向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无产阶级革命家观点来看实际上是不正确的。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政治倾向,即某种世界观、某些政治观点的反映,是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特征。他们严厉地批判了把文学艺术凌驾于政治之上的企图,批判“为艺术而艺术”的各种理论。在这段时期,马克思还谴责了弗莱里格拉特忽视党的利益,他很遗憾地指出,偏离革命立场对这位诗人的创作发生了消极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进步的文学作品应当以生动的艺术形式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9页。

真实地表现当代的生活过程，应当是先进思想的代言人和社会进步力量的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就是从这种崇高的意义上来理解文学艺术的党性原则的。他们认为，思想性同艺术性和技巧的有机结合，是真正现实主义艺术必不可少的品质，而这正是拉萨尔的剧本所缺少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剧本的批评并不是局限于指出它的文学上的优缺点，而是包含着政治原则性。马克思坚决地谴责拉萨尔在剧本中把以骑士济金根为首的贵族反对派描写成革命思想的真正代表。他在给拉萨尔的信中写道：“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①

拉萨尔的这个错误决不是偶然的。他对德国农民战争的这些看法是由于他完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革命潜力，尤其是总被他看成是反动阶级的农民的革命潜力。在争取德国民族统一的不同道路的斗争和解决国家重要的社会和政治任务时，拉萨尔总想站在资产阶级和容克联盟一边。马克思在分析拉萨尔剧本的政治倾向时，实际上是在同他讨论以往革命事件的动力和德国将来发展的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劝说拉萨尔的尝试没有取得成效。在他答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评意见的信中，除了其他一些事情他还写道，农民战争“不是革命的，归根到底是极端反动的”^②。

375 由于 1859 年的意大利战争，马克思和拉萨尔在统一德国的方法问题上产生了特别严重的分歧。拉萨尔从小册子《波河与莱茵河》中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是十分清楚的，但是他不但支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41 页。

② 斐·拉萨尔《遗著。书信和著作》1922 年斯图加特—柏林版第 3 卷第 205 页。

他们，甚至对他们采取敌视态度。1859年5月，他在柏林匿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意大利战争和普鲁士的任务》，他在这本小册子中声明拥护亲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和普鲁士容克地主，支持用王朝的方法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德国的计划。与马克思在1848年提出的按照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国家的口号相反，拉萨尔主张由普鲁士君主政体来兼并其他各邦。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里不是号召德国人民，而是向普鲁士统治集团呼吁。

拉萨尔为普鲁士政府的中立政策辩护，建议它利用奥地利的困境来实现自己的统一纲领。拉萨尔不去揭露波拿巴主义在意大利问题上的骗局，硬说拿破仑第三在意大利正在完成“一桩伟大而正义的、文明而高度民主的、与各国人民休戚相关的事业”^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小册子感到非常不满。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把这本小册子看做是同他们关于统一德国的观点的公开论战。马克思在1859年5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的小册子是一个莫大的错误。”^②马克思向拉萨尔明确指出，他的立场与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毫无共同之处。但是马克思仍继续同拉萨尔保持联系，希望他改变观点。

列宁在阐述马克思同拉萨尔1859年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时写道：“拉萨尔设法使普鲁士和俾斯麦胜利，使德意两国的民族民主运动没有足够的力量。于是拉萨尔就动摇到民族自由主义工人政策方面去了。马克思则提倡和发扬独立的、彻底民主的、反对民族自由主义懦弱行为的政策（如果1859年普鲁士出面反对拿破仑，就会推动德国的人民运动）。 ”^③

① 斐·拉萨尔《演说和著作集》1919年柏林版第1卷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1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19—120页。

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中，重要的任务是保护正在成长但还未成熟的无产阶级的干部不受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代理人的诽谤和陷害。庸俗民主主义者卡尔·福格特就是这样一个代理人，他在1859年12月出版了一本恶毒诽谤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小册子《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福格特在这本小册子里竭力贬低马克思及其战友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的活动，把他们描绘成同警察有秘密联系的阴谋者，说他们制造赝币以便煽动革命。他企图败坏《人民报》声誉，说什么《人民报》是反动的巴伐利亚《总汇报》的分店，它的资金来源是可疑的。

马克思把福格特的攻击正确地看作是资产阶级企图使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公众面前信誉扫地。马克思对于对他本人的攻击一向是不予以理睬的，但这时党的声誉受到了损害，他就不能置之不理了。他写道：“十年来，德国报刊和美国的德文报刊对我进行了层出不穷的谩骂，我只在非常罕见的特殊情况下，即在象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那样关系到党的利益时，才在报刊上予以回答。”^①

1860年12月在伦敦出版的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就是对福格特的这本小册子的答复。马克思在写作这部著作时给自己规定了双重任务。他认为必须全面揭露福格特这个家伙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代表了整个流派的……人物”^②，是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走狗。此外，挂着民主主义者的招牌和享有自然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675页。

② 同上书，第402页。

学家声誉的福格特，正象马克思后来所证实的，在政治界正扮演着波拿巴密探的角色。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群众中的威信，马克思努力使人们对他们过去和现在的活动、他们的观点和目标有一个真正的而不是被诽谤所歪曲的了解。1860年2月23日马克思在给弗莱里格拉特的信中写道，同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意义”^①。

马克思从1860年1月底就着手为这部著作收集材料了。他几乎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集中精力写作这部著作，甚至暂时中断了他的经济学的研究。为了获得驳斥福格特的捏造和揭露福格特本人的一些材料，马克思写了将近五十多封信分发给在欧洲许多城市中的朋友、熟人、甚至是素不相识的人，还研究了大量的文件和各种文献资料。马克思还不满足，1860年2月中旬他又到曼彻斯特去找恩格斯，在那里一直住到3月25日。他同恩格斯讨论这部反对福格特的论战性著作的写作计划，并且翻阅了恩格斯所拥有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材料。马克思的许多朋友都不理解为什么他如此坚决，还以为他是在浪费时间。但是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看得很清楚，他要使群众彻底认识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的伟大和纯洁，不让工人阶级的敌人对它诋毁和诬蔑。 377

马克思在论战性著作中对福格特主要是做为一位政治人物来评述的，但也涉及到他在自然科学著作中所表达的哲学观点。马克思以尖锐的讽刺笔调尽情嘲弄福格特的粗浅的观念，因为后者同毕希纳和摩莱肖特一样都属于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庸俗唯物主义流派。

马克思一步一步地揭露福格特对无产阶级政党的诽谤，揭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9页。

他的无耻骗局。马克思指出，福格特恶意编造的故事，谎言连篇，矛盾百出，甚至这个“脑满肠肥的混蛋”^①自己也不能自圆其说。福格特无耻地控告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警察有联系，竭力掩盖他自己为警察当局所干的肮脏勾当的事实。

针对福格特的捏造，马克思叙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真实情况。他根据大量的文件，描写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创立革命的无产阶级组织的英勇斗争。他扼要地、但却非常明确地描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阐明了它的活动的历史条件、它的性质和目的以及它同宗派主义者和庸俗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斗争的重要意义。

马克思这部著作的重点是揭露福格特这个波拿巴雇佣的代理人。马克思读完福格特 1859 年 3 月出版的《欧洲现状研究》以后，深信它是在法国的直接授意下写成的，正在被拿破仑第三用来从思想上影响欧洲的社会舆论。马克思写道：“……福格特不过是土伊勒里宫里能操腹语的小丑手中的无数外语传声筒之一……”^②

378 福格特还为拿破仑第三干了一些其他的勾当。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同波拿巴代理人在许多国家分设的代理机构有联系，实际上成了波拿巴代理人的招募者。

马克思当时并不知道、后来才公布的一些文献，完全证实了他认为“民主主义者”福格特实际上为波拿巴政府效劳这种看法是正确的。第二帝国崩溃以后公布的关于拿破仑第三秘密费用开支的材料，说明福格特在 1859 年 8 月从法国皇帝那里得到了四万法郎。

马克思在他的抨击性著作中揭露了拿破仑第三的政策的反动本质，包括他在发动意大利战争时所起的作用。他也揭穿了波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4 卷第 430 页。

② 同上书，第 558 页。

巴主义在民族问题上的欺骗宣传和声名狼藉的“民族原则”^①，法国皇帝力图用它来掩盖他利用小民族的民族运动以达到其反革命的目的。马克思关于工人运动可能因波拿巴帝国统治集团向无产阶级动摇分子献媚而受到危险的警告也同样是很重要的。

马克思指出，福格特及其同伙亲普鲁士的态度、他们竭力宣传普鲁士的“统一使命”，这就是亲波拿巴立场在德国问题上的表现。这部抨击性著作对那些主张德国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的人的批判，无疑也是针对拉萨尔的，尽管马克思没有指名道姓。马克思在1859年11月26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拉萨尔实际上“是同福格特一个鼻孔出气”^②。

《福格特先生》这部著作的特色不仅在于内容深刻而丰富，而且还在于其出色的形式。就艺术价值而言，这部著作可以列为世界讽刺文学的优秀典范。恩格斯在1860年12月19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谈到这部出色的著作时写道：“这确实是你迄今为止所写的最好的论战性著作。”^③

燕妮·马克思患病

福格特的诽谤给马克思夫人的健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马克思写作反对福格特的抨击性著作的一连好几个月里，燕妮的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的状态，夜里经常失眠。她花费了许多精力来抄写这部著作。1860年11月19日，她勉强抄写完她丈夫的手稿之后，³⁷⁹就病倒了。医生诊断燕妮患了天花。虽然她为预防这种可怕的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9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29页。

病种过两次牛痘，但她的极度虚弱的身体已经不能抵抗传染病的感染了。

马克思的处境极其艰难。不得不把孩子们寄居到邻近的李卜克内西家里。他自己和海伦·德穆特一直守护在病人床边。后来燕妮在给路易莎·魏德迈的信中描绘她刚刚生病的情况时写道：“我受了很多苦。脸上象火烧一样疼痛，整晚都失眠，体贴入微地照料着我的卡尔担忧万分，最后，我失去了一切感觉，但神智一直是清楚的。我躺在敞开的窗子旁边，让十一月的寒风一直吹着。房里火炉很热，他们在我发热的嘴唇上放了冰，不时喂我几滴葡萄酒。我几乎不能吃东西了，听觉愈来愈迟钝，后来眼睛也闭上了，我不知道是不是长眠的时刻已经来临！”^①

整整一个星期，医生和亲人都在为病人的生命担忧。过了危险期，病情就好转了。马克思在1860年11月26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妻子的病情，就目前可能达到的情况来说，已有了好转。这不是一下子就能好的。但是可以作高潮的那种状况，是已经过去了。”^②但是要完全康复要多月。

燕妮的病打乱了马克思的日常生活，他本就无法工作。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写文章现在对我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了。我能用来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唯一的事情，就是数学”^③。

12月底，病人的情况有了好转，医生才允许马克思把孩子们接回家。对于暂时离开孩子们而十分痛苦的父母来说这是很大的快乐。可是马克思的健康由于在燕妮生病期间惊恐不安和过度劳累而受到了损害。燕妮的病刚刚有些恢复，1月初马克思自己又病倒了。这一次他的慢性肝脏病发作得十分厉害，他几乎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81页。

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3页。

马克思患病正是他的家庭的物质状况再一次恶化的时刻。1861年初，马克思从美国得到的稿酬显著减少了。由于内战临近，《美国新百科全书》停止出版，《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象1857年危机时期一样，再一次辞退了除马克思以外的全部欧洲通讯员，建议马克思暂时不要寄送通讯稿，以后每星期只要寄一篇文章，不必寄两篇了。

马克思为了稍微改善一下他的经济状况，2月底到荷兰的扎耳特博默耳，找他的表舅，一个相当富裕的商人莱昂·菲利浦斯。他希望管理他母亲产业的菲利浦斯能帮助他获得遗产中他应得的那一笔钱。这个愿望实现了。他回到伦敦后，在1861年5月7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目前从表舅那里挤出了一百六十英镑，所以我们得以偿还大部分债务。”^①

马克思从荷兰到普鲁士的首都柏林，他在那里从3月17日一直逗留到4月12日，想同拉萨尔商谈共同出版一份报纸的计划，并想根据普鲁士政府在威廉一世国王即位时颁布的大赦令来恢复他的普鲁士国籍。在柏林，他住在1848—1849年革命后初次见面的拉萨尔那里。拉萨尔和他的密友索菲娅·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殷勤地接待马克思，同时向他们的贵族朋友炫耀他们同这位著名的革命思想家的亲密关系。他们竭力把他引进“上流社会”，为他举行有知名人士参加的宴会，请他看戏。在歌剧院里，在紧挨着国王的包厢的一个包厢里，马克思不得不索然无味地看一场豪华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61页。

芭蕾舞的演出。他也不太欣赏“充满普鲁士的自我吹嘘”^①的弗莱塔格的喜剧《新闻界人士》。

马克思在记者席上旁听了议会下院的一次会议。马克思把它同他在1848年夏天参加过的普鲁士国民议会相比较,发现普鲁士的代议机关丝毫也没有变得更好些。“会议厅很狭小。旁听席少得可怜。议员们坐长板凳(而“老爷们”坐安乐椅),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混合物。比利时的议会同它相比简直是富丽堂皇了。议长西姆桑或参孙为了要对自己受到曼托伊费尔的拳打脚踢有所补偿,于是凭着他的驴腮骨,以内阁看门人的那种十足丑恶和粗暴的首长气派,向躲在下面的庸人们猛扑过去。”^②

在柏林的其他一些会晤也没有给马克思留下好印象。马克思在写给他在扎耳特博默耳逗留期间结识的表妹安东尼达(南尼达)·菲利浦斯的信中说,他“受到一大群庸人的包围”^③。但是他对同大学时代的朋友著名的历史学家科本的会见,却感到十分高兴。

尽管马克思认为他在普鲁士首都的逗留是多么不愉快,但他却满意地看到了日益增长的反对情绪和普遍骚动的迹象。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柏林盛行一种傲慢无礼而轻浮的风气。议院受到蔑视……大部分公众很不满意现在的报刊……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能从明年起在柏林……出版一份报纸,那确实是很合时宜的。”^④

但是马克思同拉萨尔商谈共同出版报纸一事毫无结果。拉萨尔提出的条件是报纸要完全由他个人来控制。马克思回到英国同恩格斯商量以后,拒绝了拉萨尔。马克思也不想同拉萨尔合作,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85页。

② 同上书,第168—169页。

③ 同上书,第589页。

④ 同上书,第162—163页。

为后者过分虚荣，举止傲慢，追求上流社会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马克思亲眼看到的。

在柏林，马克思在拉萨尔的协助下，为恢复普鲁士国籍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的目的是移居或者是至少长时期地留在德国经常参加对德国工人运动的领导。1861年3月25日他向柏林警察总监冯·策德利茨递交了一份申请书。

但是马克思的申请在他还没有离开普鲁士首都就借口他本人在1845年曾放弃普鲁士国籍而被拒绝了。当局认为马克思是一个十分危险的革命家，不允许他留居普鲁士。马克思委托拉萨尔继续办理这件事，但是他代马克思递交的呈文，也于1861年6月³⁸²被柏林警察总监拒绝，同年11月又被内务大臣拒绝。因此马克思写道：“所谓大赦不过是欺骗、伪装和圈套。”^①

马克思离开柏林后，在爱北斐特、巴门和科伦稍作停留。在科伦，他会见了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辩护人施奈德尔律师，以及这个案件的被告之一、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克莱因。4月19日，马克思到特利尔去看他母亲，在那里住了两天。这是他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两年半以后，1863年11月30日罕丽达·马克思就去世了。

马克思离开特利尔，取道亚琛又到了荷兰，除了扎耳特博默耳，他还访问了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他于4月29日返回伦敦。

维护布朗基

马克思在柏林逗留期间，获悉在1859年大赦后回到法国的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04页。

朗基已于1861年3月在巴黎遭到逮捕，罪名是组织秘密团体。索菲娅·哈茨费尔特告诉马克思说，柏林的民主人士对波拿巴警察的行为感到十分愤怒，表示同情布朗基。在判决前布朗基被关在巴黎马扎斯监狱，遭到狱吏的残酷对待。1861年夏尽管缺少罪证，布朗基被判四年徒刑。

马克思回到伦敦后，积极开展声援布朗基的活动。他同法国流亡者、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西蒙·贝尔纳以及前宪章派领袖厄内斯特·琼斯商议举行一次群众大会来抗议逮捕布朗基和监狱对他的残酷虐待。与此同时，马克思开始同法国革命家、布朗基的好友曾流亡布鲁塞尔用德农维耳这个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的路易·瓦托通信。通过瓦托，马克思同布朗基取得了联系。马克思在1861年6月1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事：“布朗基本人通过德农维耳，非常热情地感谢我和德国无产阶级党……对他的同情。我们同法国最极端的党重新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我认为这非常好。”^①

383 马克思采取的有效措施就是利用报纸来组织声援布朗基的运动。5月，他给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写信，请她协助发表有关布朗基在狱中的苛刻待遇的报道，传播关于释放布朗基的要求。由于马克思的努力，不仅德国而且意大利和美国的进步报刊都发表了有关迫害布朗基的报道。

马克思完全支持路易·瓦托的想法：出版一本小册子来揭露那些迫害和监禁热情的法国革命家的波拿巴分子。马克思通过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向德国的民主人士呼吁为出版这本小册子募集捐款。此外，他还通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帮助，设法在流亡者中间募集捐款。1861年11月10日，马克思把这个协会募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78页。

的钱连同一封高度赞扬布朗基的信寄给了瓦托。他写道：“请您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关心那位我一向认为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头脑和心脏的人的命运。”^①

马克思和俄国的社会变革

从五十年代末，马克思就密切注意俄国国内情况的发展，逐渐得出沙皇制度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已经削弱的结论。战争不仅暴露了沙皇俄国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落后，而且推动了正在动摇封建农奴制度基础的农奴骚动的普遍开展。马克思在1858年10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他对俄罗斯帝国革命情绪高涨的看法时写道：“1854—1855年的俄国战争……加速了俄国目前形势的变化。”^② 这一年马克思指出，农奴制度的危机日益临近，俄国的革命形势已经有了征兆，这也就削弱了沙皇制度这个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因此，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才强调：“俄国的农奴解放运动”标志着国内发展的开端，它“能够挡住俄国传统对外政策的道路”^③。

马克思对俄国日益临近的变革的社会经济原因看得很清楚。腐朽的农奴制关系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严重障碍。在这种条件下，³⁸⁴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给遭受封建农奴主和资本家双重压迫的被剥削的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贫困，这就更加剧了革命的震荡。

马克思预见到农奴制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他认为，俄国必须选择消灭农奴制的道路，为此国内各敌对阶级力量之间正进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7页。

③ 同上书，第313页。

激烈斗争。俄罗斯帝国的统治集团意识到不可能再用老一套的方法进行统治，想通过改革来寻找一条摆脱危机的出路。千百万的农民都要求用彻底的革命的方法来解决危机。马克思写道，“俄国农奴对解放的理解同政府的理解是不同的”。^① 马克思注意到统治阶级内部在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自由派地主与农奴主之间的争论，但是绝不认为他们是改革的动力。与西欧的报刊相反，他认为改革首先是农民和地主之间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的产物。

还在农民改革实行以前，马克思根据报纸透露的消息，在1858—1860年《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发表的一些文章中，揭示了农民改革的某些重要特征。其中两篇文章——《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和《关于俄国的农民解放》——完全是针对沙皇政府准备实行的改革的。他强调指出，那些专制政府只是“在革命的压力下或由于战争的关系”^②才同意解放农民。马克思早已预见到，准备实行的改革，正如同从上面采取的任何类似的措施一样，总是不彻底的，只不过是向俄国必要的资产阶级的变革迈进了一步，但不能解决全部迫切问题，这些问题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

早在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的文告公布以前，马克思在分析即将实行的改革内容时就指出：这种改革是反人民的，它的意图是尽量保护地主的利益和继续保留农奴制的残余。同时他也认为，这些措施终究不能永远阻挡土地贵族这个实际上已垂死的阶级的衰亡。对农民来说，改革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解放，奴役方式的改变，通过赎金来掠夺农民的一种手段。农民依附于地主的状态不是改革所能消除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势必由一种“新的、文明的”依附形式来代替“宗法式的”依附形式^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5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194页。

马克思认为，沙皇政府通过这种改革绝不能阻挡农民革命运动的洪流，一旦农民了解了这种改革的内容，他们的运动将更加活跃。他直截了当地谈到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同时指出，政府通过预定方式实现改革的企图可能成为“在俄国农村居民中爆发大规模起义的信号”^①。这将意味着伴随着恐怖统治的“俄国的 1793 年就会来到”，这将是“俄国历史上的第二个转折点”，将给俄国带来“真正的普遍的文明”^②。马克思期待俄国革命的爆发，同时看到俄国革命的特点：由于国内资本主义的关系不够发展，革命将具有土地革命的性质。马克思在 1859 年 2 月 4 日写给拉萨尔的信中特别谈到了这一点^③。

马克思在克里木战争之前和在战争进行期间曾经认为，俄国革命的前景还相当遥远，因而把俄国首先看作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现在，他的观点开始改变了。他一面坚决反对专制制度，一面更加注意非官方的俄国，即与国内沙皇制度对立的人民群众的俄国。他高兴地看到，这些力量在急剧增长，俄国的人民革命日益成熟。从这时起，马克思认为，俄国的革命运动、与沙皇俄国相抗衡的革命的俄国，已成为在总的革命战略的计划中、在确定今后欧洲革命的可行的路线时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固定的因素。1858 年 6 月马克思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在十年前极其有力地抑制了革命的浪潮。我们指的是俄国。但是现在它自己脚下已堆积起易燃的物品，只要从西方刮去一阵大风，就会立刻燃烧起来。”^④ 马克思在 1858 年夏天还仍然相信西欧的革命行动必将推动俄国的革命爆发，但是农民骚动的增长使他很 386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725 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第 55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2 卷第 539—540 页。

快就得出这样的结论：革命的火焰在俄国可能比在西方燃烧得更早，可能从俄国蔓延到西方国家。1859年12月，他给恩格斯写信说：“在俄国，运动发展得比欧洲其余各地都快。”^①

马克思认为俄国的革命运动是西方的无产阶级和民主主义者的同盟军。马克思在1860年1月11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把俄国发生的事件同美国反对黑奴制的斗争做了对比，他写道：“据我看，现在世界上所发生的最大的事件，一方面是……美国的奴隶运动，另一方面是俄国的奴隶运动。”^②

即使1861年3月颁布实行农民改革后，马克思仍然期待着俄国革命的爆发。他的这种看法是根据一些关于继续进行而在某些地区日益猛烈的农民骚动的报道。马克思把准备改革和实行改革期间的俄国形势看作是革命的前奏，这一评价是有历史根据的。后来列宁说：“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细心而冷静的政治家是应该承认革命的爆发完全可能，农民起义是当时非常严重的危险。”^③ 1859—1861年的革命形势没有发展成革命，但这丝毫没有贬低马克思关于俄国人民革命日益临近、俄国人民中蕴藏着真正无穷无尽的革命能量这一结论的价值。

为《新闻报》撰稿

1859年，维也纳资产阶级自由派报纸《新闻报》编辑麦克斯·弗里德兰德曾竭力争取马克思为该报撰稿，1861年6月初又向马克思提出了参加该报工作的新的邀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5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7页。

③ 《列宁全集》第5卷第23页。

《新闻报》有三万订户，在奥地利和德国有广大的读者。这几年该报在对外政策问题上持反波拿巴的立场，因而大受欢迎。但是马克思只是从1861年10月才开始给《新闻报》寄发稿件，那时他已确信该报对国内问题也采取进步立场，而且不再支持安东·冯·施梅林首相的反动的对内政策了。马克思在1861年9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满意地写道：“**维也纳《新闻报》**终于转过来反对施梅 387
林了。因此现在也许可以同该报建立联系了。”^①对马克思来说，能有机会直接在德国人中间宣传自己的观点，是非常重要的。

1861年10月，马克思按照编辑部的要求把两篇关于美国内战的试用稿寄到维也纳。这两篇文章受到称赞，并刊登在该报的第一版。马克思收到通知：从1861年11月起，他将成为《新闻报》的固定撰稿人，每一篇文章的稿酬为一英磅，每一篇报道为十先令。

马克思为《新闻报》所写的许多文章都阐述了美国内战及其国际影响。他有充分的根据认为这场战争将加强欧洲的革命运动，所以非常重视向欧洲读者提供美国事件的准确的报道。他在1862年4月2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必须“在德国传播对这一重大事件的正确观点”^②。

马克思在《新闻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也论述了英国的经济状况和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他生动地描写了由于美国内战停止从美国进口棉花而给英国棉纺织工业造成的灾难性状况。《英国的危机》、《英国工人的贫困》这两篇文章描绘了失业的纺织工人的惊人贫困。马克思也看到了宪章运动衰落后受到工联主义思想意识强烈影响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日益高涨的政治积极性。

在《新闻报》上，马克思继续揭露第二帝国的腐朽制度及其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96页。

② 同上书，第229页。

大的军费开支、宫廷的铺张挥霍和闻所未闻的营私舞弊。1861年法国、英国和西班牙开始武装干涉墨西哥以后，马克思写了一系列文章，揭露拿破仑第三对外政策的冒险性。他指出，以整顿秩序为借口的武装干涉的真正目的，是要推翻进步的胡阿雷斯政府，变墨西哥共和国为欧洲强国的殖民地。马克思的关于武装干涉墨西哥的文章也是对反殖民主义斗争的贡献。

《新闻报》的资产阶级编辑部认为马克思的许多文章过于革命了。1861年底，马克思才知道他寄去的许多文章未被刊登。他在³⁸⁸ 1861年12月27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抱怨地写道：“卑鄙的《新闻报》刊印我的文章几乎不到一半。”^① 在没有刊登的文章中，有几篇是特别论述墨西哥远征和愤怒谴责欧洲强国的殖民掠夺政策的。

1862年《新闻报》编辑部发表马克思的文章越来越少了。在1862年伦敦第二届世界工业博览会开幕之前，弗里德兰德试图让马克思只写有关博览会问题的文章。关于其他问题的文章，要马克思每星期不超过一篇。于是马克思从1862年12月起就停止为《新闻报》撰稿了。

美国内战。停止为《纽约每日 论坛报》撰稿

从1861年春天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事件上。1860年共和党候选人阿伯拉罕·林肯当选为总统——他反对黑奴制，认为废除黑奴制首先必须限制推行黑奴制的地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15页。

引起了南部种植场奴隶主的公开暴乱。南部各州相继宣布脱离美国联邦。1861年2月4日，脱离联邦的各州的代表成立了分立州南部同盟。1861年4月12日，暴乱者的军队开始向联邦的武装部队采取军事行动。一场内战以意想不到的规模开始了。

马克思认为，持续到1865年4月的美国内战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他写了四十多篇关于美国内战的文章，大部分发表在《新闻报》上。事件的军事方面照例由恩格斯来评述。但是1862年12月以后，马克思再也不能在这份定期刊物上阐明战争进程了。他不得不同《新闻报》断绝关系，在这以前他已停止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寄稿了。马克思为这家报纸不间断地工作了十年，1861年初，编辑部建议他暂停寄送通讯，他的撰稿工作就停止了。在10月该报又重新刊登他的文章。但是，在1862年3月，由于编辑部内主张同南部各州妥协的人占了优势，马克思终于同《论坛报》断绝了关系。

马克思停止为《论坛报》接着又停止为《新闻报》撰稿，马克思的生活又陷于艰难窘迫的境地。他本想安静地继续从事1861年³⁸⁹重新开始的经济著作的创作，可是却不得不为生活而到处奔波。1863年初，马克思甚至打算到一个铁路办事处去工作，但因为他的字迹不工整而被拒绝。直到1863年底，他接受了母亲的一笔不大的遗产，情况才稍有好转。

因此，马克思在他的政论文章中，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只论述了美国内战的第一个阶段。但是他写给恩格斯和其他人的书信是对这些文章的很好的补充，这些书信涉及整个战争时期，还对一些事件和人物作了尖锐的政治评论。

马克思象一个卓有远见的社会学家、一个反对反动势力的热情战士、美洲和欧洲劳动人民共同利益的捍卫者那样观察美国的事件。他的文章和书信揭示了美国内战的经济和社会根源，分析

了战争的性质和动力。他指出，内战是由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引起的，一种是北部各州已经确立的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制度”，即产业工人的雇佣劳动制度、手工业者及农业工人的劳动制度；一种是南部盛行的奴隶制度即直接剥削生产者的前资本主义形态。马克思写道：“这个斗争之所以爆发，是因为这两种制度再也不能在北美大陆上一起和平相处。”^①继续实行奴隶制与发展美国资本主义，这二者已经是越来越不能相容了。

马克思强调指出，奴隶制问题就是美国内战的实质。他在1861年10月写道：“由此可见，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这里的意思还不是说，现有的蓄奴州内部的奴隶是否应当解放，而是说，北部的两千万自由居民是否应当继续屈从于三十万奴隶主的寡头统治；共和国的各个巨大领地是应当成为建立自由州的基地，还是应当成为培植奴隶制的地方；最后，用武力向墨西哥、中美和南美扩展奴隶制度是否应当成为联邦的国家政策的指导原则。”^②

390 马克思在谈到内战的历史起因时指出，工业的北部和奴隶制的南部这两种对抗力量的斗争是“美国半个世纪的历史的动力”^③。马克思在《北美内战》这篇文章中强调指出，在这场斗争中南部经常是一股敢于战斗的进攻性力量，在奴隶制问题上取得了战胜北部的一个又一个胜利。奴隶主的寡头集团之所以能获取成就是因为始终受到北部各州的大资产阶级代表的支持，这些大资产阶级同种植场奴隶主有联系，并靠买卖棉花和买卖奴隶劳动的其他产品而发财致富。马克思指出，正是在这个反革命联盟面前“自1817年起周期性的反抗奴隶主日益加甚的侵犯的一切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65页。

② 同上书，第356页。

③ 同上书，第325页。

试，一直都遭到失败”^①。同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产阶级的进步阶层、特别是人民群众反对奴隶制的斗争加强了，这一斗争使林肯在总统选举中获得了胜利。

马克思揭露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关于分离运动似乎具有和平性质的谎言，坚决驳斥欧洲报纸企图掩盖南部奴隶主的真正目的，把他们打扮成维护各州权利不受集权的联邦政府干涉的保卫者和主张自卫的地方自治的捍卫者。他强调指出，南军的活动是一小撮剥削者集团正在进行违背广大人民甚至南部各州多数居民利益的篡权活动。马克思写道，除黑人以外，与南部奴隶主寡头统治“对立的是好几百万所谓‘白种贫民’，……而他们的处境也只有罗马帝国极度衰微时期的罗马平民才可比拟”^②。实际上，分离运动是反革命暴乱，是奴隶主叛乱，根本“不是一个防御战争，而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为了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③。

马克思强调指出，战争从北部方面来说具有进步性质，同时也尖锐地谴责北部各州资产阶级集团在战争中表现的懦弱和动摇。他批评资产阶级共和政府没有在一开始就把战争变为全国性的革命的战争。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美国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 391 性的表现。北部政府在战争初期采取的这种政策正是北部人军事失败的主要原因，尽管他们的物质后备和人员后备都优越于南部。

马克思愤慨地写道，北军被一些同情南部的反动军官搞得混乱不堪。他尖锐地批评了北部领导人在黑人问题上的政策。他们害怕革命的动荡，一开始就不愿意让黑人加入军队。马克思认为，吸收黑人加入北军将会大大影响战争的进程，大大增加北部获胜的可能性，并将削弱南部奴隶主的后方。他在1862年8月7日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352页。

② 同上书，第354页。

③ 同上书，第358页。

恩格斯信中写道：“只要有一个由黑人组成的团就会使南部大伤脑筋。”^①

马克思反复强调，反对奴隶制的斗争是符合美国劳动人民首先是美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因为奴隶制是美国工人阶级团结的障碍，它使白人和黑人在反对剥削者的斗争中发生分裂，削弱工人运动的力量。马克思写道：“在北美合众国，只要奴隶制使共和国的一部分还处于残废状态，任何独立的工人运动都是瘫痪的。”^②

马克思认为，在反对奴隶制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正是人民群众。他期望爱好自由的美国农场主、美国工人阶级能够对北部政府产生强烈的影响，使它改变作战方法。人民群众在内战过程中日益高涨的积极性必将使战争变成一场真正的革命，在革命的烈火中不论是种植场主的寡头统治，还是他们的北部走狗的叛变计划都将破产。马克思坚信：“北部终究会认真作战，采取革命的手段，并摆脱各边界蓄奴州的政客们的支配。”^③他在1862年8月写道：“迄今为止，我们所看的只是内战的第一幕，即**根据宪法**进行的战争。第二幕，即以**革命方式**进行的战争，就要开始了。”^④

392 马克思的预见完全被证实了。1862年下半年，林肯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压力下开始实行一系列最后导致北部胜利的革命的民主措施。马克思欢迎林肯的一些法令如允许建立黑人军团、叛乱者财产没收法，等等。他对林肯1862年9月22日颁布的使属于南部参加叛乱的种植场主的全部黑奴成为自由人的解放宣言尤为满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7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58页。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这个宣言的缺陷：它解放了奴隶而没有给他们分配土地。但是他强调指出了这项措施的重大的革命意义。他在《北美事件》一文中说，林肯的宣言是“联邦成立以来的美国史上最重要的文件”^①。它标志着战争转向新的阶段，即用革命方式进行战争的阶段。

马克思以鲜明的笔调评定林肯总统是一位善于听取人民群众呼声的杰出的国家活动家。马克思对林肯这个来自人民的人，按其爱好和习惯是一个平民的人，非常敬佩。马克思指出他举止朴实，办事有效率，不装腔作势，不说空话。尽管马克思批评林肯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和一定程度的不彻底性，对他的活动仍然给予高度的评价。“在美国历史和人类历史上，林肯必将与华盛顿齐名！”^②

马克思也是根据革命运动的一般前景来评价内战事件的。他认为，废除黑奴制的斗争对团结美国工人阶级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是具有头等意义的因素。他说奴隶主的叛乱“是一次财产对劳动所进行的普遍的十字军征讨的信号”^③，而北部各州的成败就关系到世界劳动人民的命运。他认为，尽管美国资产阶级力图攫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和保持黑人不平等的制度，用革命手段废除美国的奴隶制，必将大大推动大西洋彼岸的解放斗争。因此马克思才如此重视欧洲工人阶级同美国的废奴主义者、同备受奴役的黑人的团结。马克思有关美国内战的文章都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各国劳动人民——不论其民族和肤色如何——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这是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进一步发展。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58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0—21页。

英国工人支持北部各州的运动

马克思认为，英国工人阶级对英国统治集团公开支持南部干涉美国事务的抗议行动，在用劳动人民国际主义团结精神教育无产阶级群众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战争一开始英国政府就支持南部奴隶主，向他们供应武器和其他物资，允许英国船坞为南军制造舰艇。英国资产阶级和贵族策划干涉北部，联合一些反动的欧洲国家向南部提供武装援助。但是，统治阶级的计划遭到了英国人民群众首先是工人阶级的坚决反对。

马克思认为，积极影响对外政策，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在《英国的舆论》、《伦敦的工人大会》以及其他文章中指出，英国工人阶级始终忠于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在1861年冬季举行的多次群众大会上，英国工人阶级表示要坚决制止为维护奴隶制而进行的可耻侵略。马克思指出，即使美国内战造成棉纺织工业危机而引起物质上的严重匮乏，也不能摧毁英国工人阶级的坚定精神。政府想乘机利用工人的困苦，煽动对北部各州的仇恨，都没能得逞。

尽管统治阶级上层做了种种努力，英国国内对北部的同情仍在增长。1862年和1863年，在伦敦、曼彻斯特和设菲尔德相继举行了大规模的工人群众大会，表示支持反对黑奴制的战士。1863年3月26日马克思出席了由工联伦敦理事会组织的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声势浩大的工人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发言的人声明他们与英国资产阶级贵族集团完全相反，坚决支持北部各州政府。马克思在1863年4月9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了对这次群众大会的印象，他写道：“工人们自己讲得很精彩，完全没有资产阶级那套空

洞词句，丝毫不掩饰他们同资本家的对立……”^①

马克思高度评价英国无产阶级的这种国际主义立场。他在³⁹⁴1863年10月写道：“英国工人阶级博得了历史上永不泯灭的荣誉，它通过充满热情的群众大会打破了统治阶级三番两次地为维护美国奴隶主而组织干涉的企图，尽管美国内战继续下去对成百万英国工人来说意味着最大的痛苦和贫困。”^②

马克思关于英国工人阶级反干涉运动的文章，使无产阶级学会了在国际冲突中制定和捍卫自己的革命路线。

马克思对1863—1864年 波兰起义的态度

1863年初，又一个革命斗争的中心燃起了斗争的烈火。1月22—23日在属于沙皇俄国的波兰土地上发生了游击战，爆发了民族解放起义。

马克思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起义与过去历次波兰起义不同，是不仅在欧洲西部而且在欧洲东部，即俄国（在那里由于不满1861年的改革，群众中的革命骚动仍在继续）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下发生的。这就为波兰土地上的起义开辟了新的前景。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如果局势发展顺利，这次起义将成为整个欧洲革命的起点。他们指望，波兰起义将推动俄国的革命，然后一同把革命的火焰引到邻近的德国，首先引到经受严重政治危机的普鲁士和其他西欧国家。马克思在1863年2月1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15页。

道：“你对波兰事件有什么看法？有一点很明显，在欧洲又广泛地揭开了革命的纪元。……但愿这一次熔岩从东方流向西方，而不是相反……”^①

在整个起义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彼此往来的信件中分析起义者胜利的可能性和波兰事件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影响，密切注视起义者内部的派别斗争，对影响起义进程的那些外部政治势力作了评价。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起义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两个因素：波兰
395 广大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俄国进行一场使波兰人民的解放斗争同俄国革命运动结合起来的土地革命。无产阶级领袖的这种观点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看法以及1861年成立的波兰革命政党“红党”的代表的看法是一致的。俄国和波兰的一些最有远见的革命者竭力使俄国和波兰的革命力量联合起来。1862年，他们就达成了一项关于俄国革命者要支持准备在1863年春发动的波兰起义的协议。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指望波兰起义在一定条件下将会促进俄国农民群众的革命行动，也会由于俄国革命而获得有力的支援。

但是，1863年夏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的结论是：波兰起义的成功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了。他们痛心指出，波兰的运动没能发展成一场土地革命，而俄国农民的怒潮这时也平息了。马克思认为，这次波兰起义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不依靠群众革命斗争，而指望法国和英国支持的“白党”夺取了起义力量的全部领导权。代表大地主和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白党”千方百计地阻止波兰起义变为农民革命。“白党”要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他们同流亡国外的波兰贵族建立了联系。他们通过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22页。

在巴黎的查尔托雷斯基公爵同拿破仑第三的政府和帕麦斯顿的内阁保持联系。“白党”的亲西方政策，和他们在农民问题上的保守立场一样，对起义运动起了很坏的影响。马克思在1863年8月15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波兰事件就是被这个布斯特拉巴和他的阴谋对查尔托雷斯基派造成的影响完全搞坏了。”^①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许多信中揭露法国和英国对波兰起义者所采取的挑衅政策，并指出这些国家的统治集团实际上是镇压起义的同谋者，是沙皇刽子手的帮凶。法国和英国政府伪装同情起义者，但在关键时刻却让命运去任意摆布他们。他们只是做出一些 396 外交的姿态，并没有向波兰人提供实际的援助。马克思强调指出，法国和英国插手波兰事务完全是别有企图的。拿破仑第三指望造成紧张的国际形势，创造占领莱茵河左岸和进行其他冒险的有利时机。马克思立即识破了法国皇帝的险恶用心，他在1863年2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这次波兰事件中，我最担心的是波拿巴这只猪罗会找一个借口向莱茵推进，以此来摆脱他的非常难堪的处境。”^②

马克思也看出了帕麦斯顿内阁宣称同情波兰起义的真实动机：英国首相打算把俄国置于困难的外交处境，挑拨法国采取行动，并阻挠克里木战争后开始出现的法俄接近。

马克思从一开始就确信，以俾斯麦为首的普鲁士政府一定会积极支持沙皇政府镇压起义。他的看法果然不错。1863年2月8日，沙皇政府就和普鲁士政府的代表签订了一项共同对付起义者的协定，这个反革命的行动，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实际上是支持的，只不过在议会里偷偷摸摸地批评一下这个协定而已。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5页。

② 同上书，第329页。

愤怒地痛斥了向俾斯麦卑躬屈膝的普鲁士自由派的怯懦行为。

马克思尽力支持斗争中的波兰。他认为，应当利用西欧各国的工人和民主人士对被压迫的波兰人民的同情来组织对波兰人的最有效的援助，来加强各国工人的国际主义的兄弟团结。马克思鼓励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支持波兰人，并在英国、瑞士和美国的德国工人中间以及在德国本国的工人中间组织募捐，援助波兰起义者。

1863年9月，马克思对波兰人拉品斯基上校提出的帮助建立一个德国军团以援助起义者的请求是热烈响应的。他在1863年9月12日写信告诉恩格斯：“事情本身是极好的。”^①他请恩格斯在
397 曼彻斯特募集为办这件事所需要的金钱。马克思在1848年初，曾经正确地认为海尔维格和伯恩施太德通过流亡者军团的干涉人为地引起革命是有害的冒险举动，现在，在1863年把德国志愿部队派往波兰，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马克思认为，这可能是对该国已经爆发的起义运动进行国际主义支援的有效形式，是同外国志愿军参加加里波第在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进军类似的革命行动。但是，拉品斯基的远征没有实现，这不仅是因为缺乏资金，而且看来还因为“白党”对派遣外国革命军团援助起义者的思想抱反对态度。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波兰起义和同起义者团结战斗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只有同俄国的革命运动和欧洲工人阶级紧密联合起来，才能保证波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取得胜利。他们认为，把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国内的革命改革，首先是同有关广大农民群众利益的土地问题的民主解决结合起来，是被压迫民族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9页。

写作关于波兰的小册子

马克思还希望通过报刊来帮助起义者。当他得知普鲁士和俄国已经签订了关于共同镇压起义的协定，就立即决定同恩格斯一起写作一本关于波兰的专题小册子，打算通过这本小册子来揭露柏林警察和彼得堡警察的相互勾结，促使德国的民主人士采取维护波兰的坚决行动并对国内的反动派进行斗争。这本计划中的小册子的外交史部分由马克思执笔，军事部分由恩格斯来写。1863年2月底，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提出了写作小册子的初步方案，并建议用《德国与波兰。因1863年波兰起义所作的军事政治考察》作为书名。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小册子的工作主要因为马克思的健康状况而拖延下来了。从3月起一直到5月底，他的肝病发作得很厉害。尽管如此，他在这三个半月的生病期间还是作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从将近五十本书中做了许多摘要，写满了两本笔记本和 398 一本小札记本。马克思结合欧洲几个主要强国实行的政策分析了波兰问题，他研究的不仅有波兰的而且有俄国、普鲁士和法国的一些有关外交史和国内历史的文件、回忆录、通讯和历史著作。在马克思的小札记本中还有大量摘自关于1863年起义进程的新闻报道的摘要。

后来马克思系统地整理了这些材料并按题目分类，每个题目又按年代顺序排列。于是产生了两部分草稿：一部分由马克思加上了《普鲁士人一骗子手》的标题，是论述1640年至1863年普鲁士和波兰的关系的，另一部分作者没有加标题，是关于波兰和法国的关系史的编年札记。马克思在开始写这本小册子时，根据准备

的材料拟定了两个关于第一章的写作方案。在第一个方案中他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叙述到1792年，第二个方案比较详细，叙述到1770年，标题是《波兰、普鲁士和俄国》。截至5月底小册子的写作情况就是如此。1863年5月29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尽管一再努力，还是**未能完成**关于波兰的那篇东西。”^①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不得不停止写作这本小册子，因为他们断定，完成这本小册子确实需要很多时间，而且它也不能赶在对起义有实际作用的时候出版。

但是，从保存下来的手稿不仅可以看出马克思的整个构思，而且可以确定他准备写的著作的大部分内容。马克思在《普鲁士人—骗子手》这部分草稿中以及部分地在第一章最初的两个写作方案中，描绘了普鲁士和沙皇俄国两个世纪以来对波兰所采取的掠夺政策。这时，马克思主要是在揭露普鲁士，“进攻腐朽的霍亨索伦王室”^②。马克思准备写的这本小册子是他从1848年革命开始以来抨击反动的普鲁士主义的那些文章的继续和发展。

马克思详细阐述了勃兰登堡公国霍亨索伦世家兴起的经过。他指出了霍亨索伦世家如何通过卑鄙的阴谋、欺诈和背信弃义的办法侵占了臣属于波兰的普鲁士公国，扩张了自己的领地和取得了国王的封号。这个过去的藩臣利用波兰贵族共和国的衰败，以奴才般的卑鄙态度对自己的宗主进行报复，就象豺狼伺机获取猎399 物一样。马克思的手稿揭露了普鲁士在十八世纪末联合沙皇俄国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时所起的阴险作用。马克思认为，参加瓜分波兰对普鲁士的上升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这时起，普鲁士对波兰人民的每一次起义都扮演了宪兵的角色。马克思生动地描绘了普鲁士在侵占时所采用的奸诈残忍的手法。他描述了第一次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46页。

② 同上书，第329页。

分前夕普鲁士军阀在波兰的行为：“从 1771 年初开始，普属波兰的所有地区都布满了普鲁士雇佣军，他们各种难以置信的掠夺、肆虐、无耻和种种兽行令人发指。”^①

马克思在手稿中，以霍亨索伦普鲁士和沙皇俄国对波兰实行的政策为例，表述了这样一个思想：联合起来奴役其他民族就会使掠夺者彼此牵掣，加强他们的相互依赖，而较强者在很大的程度上将变成较弱者的命运的主人。马克思认为，普鲁士国王们曾经依靠沙皇俄国侵占了波兰的国土，这就是霍亨索伦家族效忠于沙皇政府、听命于全俄罗斯专制君主的主要原因之一。普鲁士和沙皇俄国所以勾结在一起，是因为它们都仇恨欧洲的革命运动，仇恨十八世纪末的资产阶级革命，仇恨这场革命对欧洲产生的要求解放的影响。霍亨索伦家族和罗曼诺夫家族始终认为波兰人民要求恢复波兰的独立就是想进行革命。马克思写道：“自雅各宾战争以来……普鲁士把波兰看法国的东方同类和革命的火山口。”^②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贯穿着这样一个思想：自从普鲁士建立以来，霍亨索伦家族对波兰采取的政策不仅与德国的真正利益毫无共同之处，而且根本对立，使邻近的斯拉夫民族和德国人身受其害。马克思在 1848—1849 年也曾发挥了这样一个思想：普鲁士君主制是用革命和民主的方法统一德国的主要障碍；德国革命发展的第一步应该是推翻普鲁士君主制。当小册子的写作工作正在紧 400 张进行的时候，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既然波兰的存在对德国来说是必要的，而同普鲁士国家并存又是不可思议的，那就应该除掉普鲁士这个国家。”^③

① 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863—1864 年手稿》1979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1 页。

② 同上书，第 8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331 页。

马克思在准备写的这本小册子中给自己提出了另一个任务：揭露西方强国特别是波拿巴第二帝国对波兰所采取的阴险政策。马克思以法波关系的历史为例指出，无论是在专制制度时代还是资产阶级统治时期，法国执政者在进行外交交易和玩弄外交手腕时总是把波兰当作一个兑换用的辅币，迫使波兰人为别人的利益流血牺牲。他们激起波兰人对独立的希望，实际上却阻挠波兰的复兴。英国资产阶级在波兰问题上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

马克思在详细研究各强国围绕波兰的外交斗争时，也分析了这些强国以及波兰本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他在手稿中研究了波兰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阶级成分。他指出，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实行的反波兰政策得到了卖身投靠的波兰贵族的支持，这些贵族只要保持自己的封建特权，甚至可以放弃民族的独立。由于民族资产阶级还不发展，波兰贵族中的进步分子（小贵族）长期来就成了反对贵族寡头政治和争取国家民族独立的代表者。马克思写道，应该把波兰贵族“同波兰小贵族加以区别，小贵族在波兰的地位同欧洲各国中等阶级的地位是一样的”^①。

马克思指出波兰贵族中的进步集团具有进步性，能接受当时的解放思想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他所引证的事例就是他们反对瓜分波兰，力图在国内为社会和政治进步扫清道路。根据这种看法，他高度评价了由于波兰爱国力量反对贵族集团的斗争而产生的1791年5月3日的宪法。尽管小贵族革命者具有阶级局限性，但是在波兰解放斗争中，在由1794年考斯丘什科起义所开始的波兰历次反抗外国压迫的起义中一直起了显著的作用。

401 马克思关于波兰的手稿是他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手稿使我们能看到他的创作活动和了解他的

^① 马克思《关于波兰问题的历史。1863—1864年手稿》197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1页。

科学的工作方法，并且表明他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的利益不论在哪一个领域，在任何一件事情上，都表现出极认真的科学态度。

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六十年代，马克思非常积极地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活动。他和恩格斯在1850年9月曾退出这个组织，因为当时宗派主义分子的影响在协会中占据优势。到了五十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协会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埃卡留斯、列斯纳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努力克服前领导的宗派主义错误，设法使协会同英国的工人组织和其他民族的无产阶级分子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因此马克思就恢复了他在该协会的工作。

马克思参加教育协会的活动，竭力用国际主义的精神教育工人。根据他的倡议，协会在1861年举行了一次法国和德国工人的群众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反对逮捕布朗基的抗议书。

在波兰起义期间，马克思做了许多工作，想把该协会变成组织西欧无产阶级一致行动支持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中心。协会同其他流亡的无产者和民主人士参加了英法工人维护波兰的活动，协会的代表出席了为此目的在伦敦召开的一些群众大会和集会，包括1863年7月22日在圣詹姆斯大厅举行的集会。

1863年10月，马克思以教育协会的名义写了一份号召为波兰起义者募捐的呼吁书。这份呼吁书概括了他在未完成的关于波兰的手稿中所表述的波兰问题对德国的重要意义的思想。他的主要论点是：“没有独立的波兰，就不可能有独立统一的德国。”^①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14页。

指责德国资产阶级“一声不响，消极冷淡地坐视英勇的人民遭到屠杀”^①，并强调指出，争取波兰独立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特别是德国
402 无产阶级的切身事业。“恢复波兰，……应该大书特书在德国工人
阶级旗帜上……”^②

呼吁书印成传单后于11月下旬分发给在英国的德国流亡者。按照马克思的委托，给德国寄去了五十份呼吁书，以便在工人中散发。

马克思通过在教育协会中的活动加强了他同无产阶级运动的先进代表的联系。他的名字不仅在德国的工人流亡者中间广泛传颂，而且也为协会与之经常联系的英法工人运动的组织所熟知。

失去一位朋友

从1853年秋天就住在曼彻斯特的威廉·沃尔弗积极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他热烈支持马克思起草的关于波兰的呼吁书。1863年12月2日他在给燕妮·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当我读了头几行，就看出来这一简短有力的宣言只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③他竭力帮助在曼彻斯特的德国流亡者中间散发呼吁书，他认为，呼吁书将有助于克服部分流亡者身上所存在的民族主义情绪。

马克思把沃尔弗看做是仅次于恩格斯的最亲密的朋友，经常就一些重要的政策问题征询他的意见。沃尔弗则努力在党的政治活动中帮助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614页。

② 同上书，第6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1963年三联书店版第212页。

沃尔弗在六十年代就经常患重病。普鲁士的监狱生活以及流亡生活的艰难岁月，使他的健康受到了摧残。沃尔弗在感到自己行将病卒的时候，于1863年12月底写了一篇遗嘱，把他的为数不多的积蓄大部分遗赠给马克思和他的一家。这笔钱对于马克思完成《资本论》第一卷的写作大有帮助。

1864年5月3日，马克思到曼彻斯特去看望他的临危的朋友。病人已经昏迷不醒，只是在神志瞬息清醒时才认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随后又失去了知觉。5月9日他逝世了。马克思把这一损失告知自己的妻子：“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①

马克思在5月13日为沃尔弗举行的葬礼上发表了简短的悼词。他是那样的激动，以致有好几次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马克思和全德工人联合会

403

在德国，工人阶级的积极性重新高涨，德国工人迫切要求团结起来，要求在有关人民群众的问题上采取独立的立场，这时拉萨尔就开始宣传建立一个工人的政治组织。他想当德国工人运动的理论家和领袖，想由他自己来制定它的纲领和策略。

拉萨尔于1862年7月—8月在伦敦逗留期间，即还在德国开始他的群众性鼓动之前，马克思就知道拉萨尔的纲领的要点了。拉萨尔认为，工人应该通过取得普选权和在国家的帮助甚至即使在普鲁士容克国家的帮助下建立生产协作社来争取自身的社会解放。这个纲领没有向工人阶级展示任何革命的远景，反而散布了不通过阶级斗争也可以达到社会主义的幻想。在伦敦会晤时，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52页。

克思就向拉萨尔说明，这些观点是和《共产党宣言》的原则完全背道而驰的。

拉萨尔的观点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法国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毕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路易·勃朗等人早在四十年代就宣传过由国家帮助建立协作社的思想了。拉萨尔不考虑英国和德国的不同的条件就接过了宪章派关于普选权的要求。马克思指出，在象德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还很低的国家里，这种要求可能被反革命势力所利用，就象波拿巴分子1851年政变时在法国利用它那样。当然，马克思谴责的并不是普选权这一口号本身，而是谴责拉萨尔竭力把这个口号说成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唯一绝对正确的手段。

马克思还批评拉萨尔忽视德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同过去的斗争、同1848年的革命传统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革命传统的承续性联系。马克思十分讨厌拉萨尔的自命不凡和自我吹嘘。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同拉萨尔的谈话时写道：“一年不见，他完全发疯了……他现在深信他不仅是最伟大的学者，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404 天才的研究家等等，而且是唐璜和革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① 拉萨尔也给马克思的妻子留下了极坏的印象，她讽刺地描写了拉萨尔的自大狂，还说他喜欢同一群谄媚者、拍马屁的人在一起：“他吃力地肩负着学者、思想家、诗人及政治活动家所获得的荣誉。”^②

在这次会面后不久马克思就同拉萨尔完全断绝了关系。后来，马克思在1865年2月23日给库格曼的信中谈到了断绝关系的原因：“在他从事鼓动的时期，我们的关系已经断绝了，这是：（1）由于他大肆自我吹嘘，甚至还把从我和其他人的著作里无耻地剽窃去的东西也拿来吹嘘；（2）因为我谴责了他的政治策略；（3）因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60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6页。

早在他开始进行鼓动以前，我在伦敦这里就向他详细解释和‘证明’过：认为‘普鲁士国家’会实行直接的社会主义干涉，那是荒谬的。他在给我的信（从1848年到1863年）中象同我会面时一样，老说他是拥护我所代表的党的。但是，一当他在伦敦（1862年底）确信他对我不能施展他的伎俩，他就立即决定以‘工人独裁者’的身份来反对我和旧的党。”^①

但是，马克思在同拉萨尔断绝关系以后仍然非常注意他的活动。当1863年5月以拉萨尔为首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认为这是恢复独立的德国工人运动的开始，是使工人不再受舒尔采-德里奇这些自由派（他们企图把无产阶级的任务限定为建立合作社、储金会等等）的监护的重要步骤。马克思指出：“在德国工人运动沉寂了十五年之后，拉萨尔又唤醒了这个运动，这是他的不朽的功绩。”^②考虑到争取德国无产阶级政治统一的斗争正在客观上起着积极的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暂时避免对拉萨尔的错误的教条和策略进行公开的反击。

但是他们十分清楚，全德工人联合会在拉萨尔的领导下完全是一个宗派主义的和改良主义的组织。拉萨尔关于国家帮助的生产合作社、关于作为政治上的万应灵丹的普选权，这些错误的教条 405 都成为联合会的纲领性原则了。拉萨尔所持的庸俗的观点是：一个工人的工资不能超过一定的最低额（这是因为“铁的工资规律”的作用），他否定为改善工人阶级经济状况的斗争的意义。因此全德工人联合会一开始就拒绝参加建立工会和组织罢工的活动。拉萨尔认为农民也是反动的一帮，联合会在拉萨尔的影响下毫不重视吸引农民群众参加解放斗争这一任务，没有要求消灭封建主义的残余。联合会的领导的民族主义倾向表现在拒不开展同国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57页。

无产阶级组织的国际联系。联合会的组织结构适合于拉萨尔的独裁作风，与工人运动的民主原则是相矛盾的。主席——拉萨尔本人担任——拥有如此大的权力，以致可以单独地、几乎不受任何监督地处理联合会的事务。实际上拉萨尔在联合会内树立对主席的个人崇拜。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拉萨尔的策略的最大的缺陷就是，他企图把工人组织引上向容克统治集团献媚的危险道路。拉萨尔对剥削阶级的攻击是片面的：他攻击资产阶级自由派（进步党人）——这种进攻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不攻击俾斯麦政府和容克地主。相反地他要工人阶级同这些势力联合起来反对资产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不知道拉萨尔同俾斯麦进行秘密通信、有过几次会晤，两人已经直接勾结上了。拉萨尔答应俾斯麦，只要俾斯麦实行普选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工人组织就支持反对进步党人的斗争，支持俾斯麦的统一计划。但是，根据拉萨尔的言论，马克思猜出他已经同普鲁士王权的代表有过接触。拉萨尔死后（他于1864年8月31日在一次决斗中被打死），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65年1月获悉：拉萨尔向俾斯麦献媚的情况比他们想象的更为严重，拉萨尔已经向普鲁士政府首脑保证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兼并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因此，他们认为拉萨尔的行为是对工人运动的背叛。尽管拉萨尔同俾斯麦的关系的全部情况是几十年后才查清的。

406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拉萨尔时并没有把他同全德工人联合会，同整个德国工人运动混为一谈。他们希望，通过联合会内部的优秀分子，即仍然忠于革命传统的工人，来改变联合会的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使联合会成为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自德国的消息表明在联合会的会内会外，特别是在莱茵省无产阶级中间都有这样一些革命的力量。拉萨尔及其追随者不能使进步的工人

忘记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领袖马克思和恩格斯。1864年春，在莱茵省龙茨多弗城举行全德工人联合会成立一周年庆祝会上，当提到他们的名字时，与会者报以热烈的欢呼。1864年夏天，佐林根的两个工人为了逃脱普鲁士当局的追捕来到伦敦，他们告诉马克思，莱茵省工人始终忠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自己的战友，特别是对1862年回国的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寄予很大的希望。他们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经常得到关于德国工人运动情况的报导。他们向李卜克内西提出指示和建议，帮助他组织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因为他们认为，传播这些思想是克服拉萨尔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揭露他的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策略、形成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革命的一翼（与拉萨尔主义相对抗）的最好手段。

在走向国际的道路上

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的新的革命高潮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的重大成就。工人的罢工斗争有了很大的规模。在许多国家出现了一些工人的组织，例如互助会、工会以及象全德工人联合会那样的政治团体。工人阶级对本国的和外国的政治事件都有强烈的反映，并要求采取独立的立场。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性取决于工人阶级本身成分的重大变化。工人阶级不仅在数量上增长了，它的结构也改变了。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大工业中的工人比共产主义者同盟时期占优势的半手工业无产阶级增加了很多。在一些刚刚出现工人阶级的国家里，工人阶级的作用也在日益增长。 407

工人运动的发展提出了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力量这一迫切的任务。工人们自发地要求建立国际的联系。产生了建立群众性的

国际工人组织的思想。上面提到的 1863 年 7 月 22 日在伦敦举行的支持波兰起义者的群众大会，就是在这方面采取实际措施的一个例子，大会之后，英法两国工人为准备这种联合成立了一个组织委员会。

但是，只凭工人自发的联合愿望还不能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还需要有一个思想基础才能把他们的力量团结起来，只有科学地代表各国工人阶级根本利益的革命理论才能提供这样的基础。这个理论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说。虽然到六十年代大多数工人还受着资产阶级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但是工人运动已经成熟到能够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马克思的理论提供了克服工人中间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消除思想混乱、战胜宗派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排外思想的手段。

在 1848—1849 年革命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通过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创造了一个未来的广泛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榜样。他们培养了一批能够组成国际无产阶级领导核心的革命干部。在反动年代，特别是在无产阶级和民主运动高潮时期，马克思为了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团结在科学共产主义旗帜的周围进行了紧张的斗争。他在这些年写的政论文章对于帮助参加当时工人运动的先进分子树立革命观点，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和加强他们的联合的愿望起了推动作用。

马克思在六十年代初参加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他发表声援布朗基的言论，他支持英国工人组织的援助波兰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废奴派的几次群众大会，他同全德工人联合会的革命的先进分子保持联系，所有这些实践活动也都促进了各国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马克思与各国工人运动的代表们的接触促进

了工人参加共同的国际斗争。

马克思及其战友的理论和实践活动，他们为传播科学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为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所进行的斗争，在奠定国际工人协会（国际）的思想基础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

马克思竭力向工人阶级提供同资本主义制度作斗争的理论武器，在整个这段时间里还加紧写作他的主要著作《资本论》。

第 十 章

《资本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

“《资本论》——这是我们的利剑、
我们的铠甲、进攻和防御的武器。”^①

约·菲·贝克尔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写作

1859年1月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寄给出版者后，立即着手第二分册的准备工作。这一分册所包含的一章，将结束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第一篇即《资本章》。马克思首先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基础上草拟了这一章的详细提纲^②。

在这一章的第一部分里，他打算揭示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二部分预定专门阐述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三部分叫作《资本和利
410 润》。提纲的最后一部分的小标题是《其他问题》，其中包括几点：农业、地产和资本。很明显，这里打算阐述地租理论。

马克思认为第二分册能很快准备好，并在第一卷问世之后立

① 约·菲·贝克尔1867年10月11日给弗·列斯纳的信。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541—549页。

即出版。可是，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第一分册刚出版，马克思就发现他并没有完全弄清楚第二分册和以后几个分册的基本思想发展中的一切细节^①。在叙述出版物的论题之前，许多问题必须补充研究。于是马克思开始向英国博物馆图书馆书库进行新的突击。又一次翻阅了大量新的资料。在许多著作中，他重新阅读了恩格斯的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非常仔细地研究了1855—1859年英国工厂视察员的报告。

这些紧张而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从1860年初中断到1861年中，主要是由于写作抨击福格特的著作。

1861—1863年的经济学手稿

直到1861年夏天，马克思又能差不多全力埋头于研究政治经济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正“紧张”写书^②。他有时丢下工作，甚至整个星期不能进行，这主要是因为“家务琐事”^③没完没了，家里人生病和生活的极端贫困带来了种种后果。

从1861年8月至1863年7月，大部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完成了，共写了二十三个笔记本，总的篇幅约有二百个印张。第一分册的续篇实际上就是这样写出来的。其实，这是继1857—1858年手稿之后的整个《资本论》的第二个稿本。

1862年6月18日，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说：“我正在把这一卷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④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5页。

③ 同上书，第228页。

④ 同上书，第251页。

但是,只用这一点来解释 1861—1863 年手稿为什么达到如此巨大的篇幅,那就错了。这一著作的篇幅多半是决定于写作意图的宏伟,以及原先为了写作唯一的、但也是很重要的一章运用了真正丰富的材料。

411 手稿对资本生产总的问题中的最重要问题作了详细叙述: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和实际上的从属、协作、分工、机器和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结果、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原始积累。可见,这个手稿反映出未来《资本论》第一卷的整个轮廓,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①。

在手稿的许多笔记本中还阐述了属于《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题目: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货币运动、再生产(主要是简单再生产)、剩余价值和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商业利润、利润率随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而下降的趋势。

1862 年底马克思在写作手稿过程中拟就了出版计划,这时计划出版的已不是第二分册,即 1859 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直接续篇,而是以《资本论》为标题,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的单独著作。从他 1862 年 12 月 28 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可以看出,那时他认为这卷书的手稿基本上已准备好了。它叙述了“政治经济学原理”^②,按照马克思自己的说法,它同第一分册合起来构成理论精髓,有了这个基础,政治经济学余下的篇章就比较容易探讨了,因为在这些篇章里将要阐述的是更加具体的关系。在这封信里,马克思表示他将誊清手稿和做付排前的最后润色。

可是,事实上手稿不仅作了誊清和润色,同时又根据新的材料作了扩充。在 1863 年上半年,马克思化了很大力量来进一步深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4 卷第 4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636 页。

研究技术史和生产工艺史,工业革命的性质和特点,这一革命对工人阶级的状况和斗争的影响^①。这位伟大的勤劳的人又长时间地工作在英国博物馆,同时还钻研有关政治经济学史的著作。

马克思因病没能迅速完成他的著作。燕妮·马克思在1863年7月6日给她的熟人马尔克海姆的信中谈到了马克思写作的一些详细情况和拖延的原因:“这个春天我亲爱的卡尔被肝病折磨得挺厉害;尽管受到了种种阻碍,但是他的书很快就会写完。如果按照原定写二十至三十个印张的计划,他早就完成了。既然现在德国人只相信‘厚书’,而更精练的表达和删去多余的东西对可尊敬的人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卡尔便补充许多历史材料,写成了五十个印张,象炮弹一样猛轰德国的土地。”^②

在1861—1863年手稿中,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进行历史的、批判的分析占很大篇幅。马克思本人把这个手稿称为“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的“庞然大物”^③。

随着手稿的扩充,马克思产生了要把准备好的著作写成三卷书的思想。

1863—1865年的经济学手稿

从1863年8月起,马克思主要研究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二十三本笔记中没有得到应有发挥的那些篇章:这就是资本的流通和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问题。换句话说,从这时起他的注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17—320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6,目录1,编号42。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4页。

意力集中在未来《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问题上。只要情况允许，他就象往常一样把写作新手稿同研究新的材料和文献结合起来。他认真阅读法文资料、有关日本的新材料和德国农业化学家李比希和申拜因的著作。

可是，马克思身患重病，这一时期的写作仍然经常中断。1863年几乎整个12月和1864年1月、2月，他去德国和荷兰办理私事。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了。他必须“领导整个协会”^①，因此实际工作使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显然，国际的活动大大影响了政治经济学的正常研究工作，写作计划的日期也不得不作修改。

马克思关心革命科学和工人运动胜过一切。他把处理其他紧急事情以外的每一分钟都用于写作《资本论》。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他就昼夜不停地工作，力求尽快地完成自己的著作。他开玩笑说，他在自己的科学工作中采用了类似1848—1850年英国工厂主（“狗厂主”）所使用的换班制度，“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②。

还在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就告诉恩格斯，只要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资本论》的理论部分（前三册）^③。第一册本来已可以付印了，但是马克思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宁愿完成整个著作。

此外，同承担出版《资本论》的汉堡出版商迈斯纳预先已经谈妥，这一著作不能超过六十个印张。鉴于这一条件，马克思认为他绝对有必要先写完整个手稿，“以便知道，要压缩和删节多少”^④，这样才能在指定的字数内均衡地和匀称地阐述各个部分。

由于艰苦的努力和顽强的意志，整个《资本论》手稿的新稿本在1865年12月底已经完成^⑤。手稿的篇幅十分庞大，其中讨论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35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8页。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0页。

租的一章就能构成一本书。

《资本论》第一卷准备付印和问世

根据恩格斯的建议，从1866年1月1日起，马克思没有马上着手对整部著作，而只是对论述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一册进行最后的加工，以准备付印。他极为愉快地和精神焕发地从事这项工作。“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他“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①。当然，实际上他又写成了一个新的文稿。然而这时不幸又降临了。燕妮·马克思于1866年4月致威廉·李卜克内西的妻子——厄内斯蒂纳的一封信中说道：“在新的一年里，原来自我感觉相当好的卡尔刚刚开始誊清自己的著作。他辩论问题的兴致，我无法向您描述，在长久的、痛苦的和几乎绝望的期待之后，我怀着内心的喜悦 414 瞧着逐渐成为巨大篇幅的手稿。而在1月底突然倒霉的老病又在马克思身上露头了。”^②

虽然卧床两个多月，马克思“白天哪怕只有短暂的时间，还是继续苦干”^③。《工作日》一节的历史部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扩展的。

马克思认为，凡是公开发表的、可能引起一定兴趣的一切著作，都要加以参考，凡是可以得到的、从中能获得必要材料的一切文献资料，都要加以整理，这乃是他应尽的职责。1866年底，他请求恩格斯尽快弄到罗杰斯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我必须把这本书读一遍，我并且专门为此在一章中留出了空位。这本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1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6，目录1，编号63。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7页。

虽然已出版很久了,但是图书馆里到现在还没有。”^①1866年2月,马克思请恩格斯帮助他弄到约·瓦茨的《工会和罢工。机器。合作社》一书,他是在一份工厂视察员报告中知道这本书的^②。1866年期间,他一次又一次地翻阅了议会的《蓝皮书》以及关于英国工业中童工和女工劳动、关于英国无产阶级居住条件的官方报告。马克思就是在这种紧张而忘我的劳动中度过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

终于,1867年4月2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说,书写好了,他亲自带着手稿去汉堡出版商奥托·迈斯纳那里。4月10日,马克思离开了太晤士河岸,4月12日中午,到了汉堡。旅途中遇到了恶劣天气和风暴,但是在长久地、自愿地被幽禁在阅览室和工作室后,马克思并没有介意大自然的风云变幻,他处在这个新的环境里觉得“痛快得无以复加”^③。他同迈斯纳会见时才弄清楚,当地没有足够的印刷工人和受过训练的校对者。因此他决定把书送到莱比锡的奥托·维干德那里去付印^④。1867年4月29日开始排印^⑤。

马克思离开汉堡,去汉诺威探望自己的朋友路德维希·库格曼。从1862年起马克思和他就有通信联系,但是总没有机会见面。在库格曼家里,他受到了令人感动的款待。宾主轻易地找到了
415 共同的语言,彼此充满了深厚的情谊。原来在库格曼的妻子盖尔特鲁黛的想象中,马克思具有“阴郁的革命家”的形象。可是使她吃惊的是,在她眼前出现的竟是“一位精神愉快、举止文雅的绅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71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89页。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92页。

⑤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0页。

他的动人的莱茵口音立刻给她留下特别亲切的印象。他的神采奕奕的乌黑眼珠在斑白的密密的头发下炯炯发光……马克思和葛可亲……他什么事情都要参与；当他特别喜欢某一个人或者当他听到独到的见解的时候，就戴上单眼镜，愉快而感兴趣地望着这个人”^①。

马克思在库格曼那里大约住了一个月。在库格曼家里他收到了第一个印张的校样。

马克思把收到的校样寄给恩格斯校阅，恩格斯积极热情地校阅清样。恩格斯读完了将近三十六个印张以后，衷心地祝贺自己的朋友取得完美的成果，由于这一成果，极其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变得十分简单和一目了然了。^②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更详细地说明价值形式的历史发展，从而用历史的实例来证实用辩证方法已证明了的東西。恩格斯认为，应当“多分一些小节和多加一些小标题，使这种抽象阐述的思路明显地表现出来”^③。库格曼也向马克思提出过类似的建议。

马克思立即满足了朋友们的愿望。他在6月2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说：“至于说到**价值形式**的阐述，那末我是既接受了你的建议，又**没有**接受你的建议，因为我想在这方面也采取辩证的态度。这就是说：第一，我写了一篇**附录**，把**这个问题**尽可能简单地和尽可能教科书式地加以叙述，第二，根据你的建议，把每一个阐述上的段落都变成**章节**等等，加上特有的小标题。”^④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信，是一份激动人心的和真正的历史文件：

① 参看《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7—318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8页。

④ 同上书，第311页。

“亲爱的弗雷德：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刚刚校完。**用小号字排印的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占了 $1\frac{1}{4}$ 个印张。

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
416 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①

马克思忘我地劳动和顽强地探索了整整二十五年。他用这样动人的语言向总是接济他和给予他以真正朋友的无私帮助的恩格斯由衷地表达真挚的友爱和感激的心情，是很自然的。

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资本论》——这是使他牺牲了“健康、幸福和家庭”②的一部书。燕妮·马克思完全有根据地说：“……恐怕没有一本书是在比这更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我大概可以就此写一部秘史。它将揭示出很多、多到无限的暗自的操心、忧虑和苦恼。如果工人们知道，为了完成这部只是为了他们和保护他们的利益而写的著作，曾经不得不作出多大的牺牲，那末他们大概就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③工人阶级从天才的手中获得了伟大的思想武器。关于这一点，马克思自己说过：《资本论》是向资产者和土地所有者脑袋发射的最厉害的炮弹④。

1867年9月14日，第一卷出版了，发行了一千册。马克思本想利用稿费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清偿所欠的债务，并且给家里添置一些东西。可是，稿费很少，马克思自己俏皮地说，甚至当作写书时抽烟的钱都不够。

马克思把自己的著作献给威廉·沃尔弗。多年的私人友谊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8—329页。

② 同上书，第543页。

③ 同上书，第598页。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2—543页。

共同的革命工作，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这位卓越人物联系在一起了。在书的里封面上写着：“献给**我的不能忘记的朋友、勇敢的忠实的高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威廉·沃尔弗**。1809年6月21日生于塔尔瑙，1864年5月9日死于曼彻斯特流亡生活中。”^①

象《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遭遇一样，德国资产阶级竭力用“沉默的阴谋”来扼杀《资本论》第一卷。这一情况使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感到不安。在这本书发行前夕，恩格斯询问马克思，是否需要“从资产阶级的观点”^②对书进行抨击，以引起广大社会人士对此书的注意。恩格斯的建议使马克思极为满意。1867年9月⁴¹⁷12日，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你从**资产阶级观点**对书进行抨击的计划是**最好的作战方法**。”^③随后，恩格斯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刊登了许多篇书评。

在表面看来似乎出自客观的资产阶级学者手笔的书评中，恩格斯指出，德国人在政治经济学方面贡献极少。德国御用的经济学家回避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困难，模仿巴师夏的非科学的观点，否定李嘉图、西斯蒙第和其他古典学派的学说。他们“为了眼前的声誉”^④，背弃了古典学派的遗产。恩格斯着重指出，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的形象就更为突出，他先前的著作，特别是1859年出版的关于货币的著作，“以其严格的科学性和无情的批判而出类拔萃”^⑤。既然德国御用政治经济学以前就拿不出任何东西能与马克思的结论相对抗，他们要反驳马克思的新著——《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就更加困难了，因为此书具有极大的科学确切性，巧妙的辩证的研究结构，对社会不同的历史状态作了令人信服的和精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51页。

③ 同上书，第3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34页。

⑤ 同上书，第233页。

的表述。恩格斯故意认真地列举了马克思的最重要的发现。

恩格斯的文章无疑起了巨大的普及作用。在马克思的朋友的组织下,在德文、英文和法文报纸上摘要发表了该书作者自己的序言,这也同样起了积极的作用。

德国资产阶级科学很快被迫放弃了“沉默的阴谋”。再继续对马克思的书装聋作哑,那简直是愚蠢到了极点。该书的意义开始被公认了。庸俗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柏林大学副教授欧·杜林在一家德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书评,是很典型的,通篇显得“狼狈不堪,恐慌不安”^①。

伟大的德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的评语使人感到兴趣。费尔巴哈在他的著作《幸福论》中指出,《资本论》具有揭露的力量和丰富的事实。他写道:“如果人们紧紧地拥挤在一起,就象在英国
418 的工厂和工人住宅——假使这些猪圈也能叫作住宅——中那样,如果人们连氧气都感到不足(关于这一点,请看卡·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著作至少就其包含的不可辩驳的事实来说,是一个极为有趣的、极令人信服的、内容丰富的著作),那么,也就完全谈不上道德,因为德行最多也不过是工厂主和资本家老爷们的专利品了。”^②

马克思的书在俄国科学知识界的进步阶层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马克思的著作在工人中间得到理解,这对马克思来说是最好的奖赏。工人刊物立刻开辟专栏刊登《资本论》。第一国际在瑞士的德国人支部的机关刊物《先驱》杂志,在1867年第九期上指出,对工人阶级来说,马克思的著作是一次“胜利的战役”。1868年9月,在国际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根据德国代表的提议,通过决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8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1959年三联书店版上卷第569页。

建议各国工人研究《资本论》，协助把它译成各国文字。决议着重指出了《资本论》作者的不可估量的功绩，因为他破天荒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制度作了科学的分析。

《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

1868年9月，彼得堡互贷协会的年轻职员，革命的民粹主义者，自由民粹运动的后来的著名活动家尼·弗·丹尼尔逊开始和马克思通信，商谈出版俄文版《资本论》。丹尼尔逊写信给马克思说：“您的近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意义，促使这里的一个出版商（尼·彼·波利亚科夫）准备出版这一著作的俄文版。”^①

在倡议把《资本论》译成俄文的人中间，热烈的拥护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彼得堡大学的学生格·瓦·洛帕廷是两个最突出的人物，后者的周围团结了彼得堡和许多其他城市的有革命情绪的青年。

1870年洛帕廷到伦敦，专程会见马克思。7月初马克思热情地接待了俄国的年轻革命家。他们很快就成了朋友。洛帕廷成了马克思所喜欢的人，马克思高度评价这位二十五岁的朋友所具有的批判才能、学识、高尚而坚强的性格。关于洛帕廷，他说道：“象他这样使我爱戴和尊敬的人是不多的。”^②洛帕廷敬佩马克思，把马克思称为“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家，是全欧洲最博学的419人”^③。在伦敦，马克思和洛帕廷多次讨论了出版《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的有关问题。洛帕廷就《资本论》俄译文的基本术语提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俄文版第1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79页。

③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8页。

方案。应他的请求，马克思打算为俄文版改写第一章(《商品和货币》)，好使它更加通俗易懂。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洛帕廷从第二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开始翻译，此外又翻译了第三章(《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第四章(《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一部分，即翻译了近三分之一。1870年11月底，洛帕廷中断了工作，返回俄国为营救流放西伯利亚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进行组织工作。洛帕廷在西伯利亚被捕，直到1873年夏天才逃了出来。

洛帕廷的朋友尼·弗·丹尼尔逊，在尼·尼·柳巴文(后来成为莫斯科大学化学教授)的协助下，完成了《资本论》的翻译工作。第一章是照原来的样子翻译的，马克思因忙于其他急事，未能履行自己改写这一章的诺言。当然，他对这一章以及其他各章作了一些局部修改和补充。

1872年3月27日，俄文版出版了，共印了三千册。这在当时已很可观了。但是需要量也不小。到同年5月15日就售出了九百册，而到年底几乎全部售完。

《资本论》俄译本是该书的第一个外文译本。马克思对译文质量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译者在马克思的亲自帮助下出色地完成了极为复杂的任务。他们所采用的许多术语得到了俄国读者的承认，并在科学领域中扎了根。

《资本论》第一卷俄文本的出版是一件大事。非常熟悉马克思的德国工人弗·列斯纳回忆说：“他非常看重俄国当时的运动，赞扬那些为研究和传布理论著作而忍受巨大牺牲的俄国人，同时也称赞他们能把握现代的思想。最后，《资本论》第一卷的俄文版终于从彼得堡寄到马克思手里，这一事件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使马克思、他的家人以及他的朋友们都感到无比欣喜。”^①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8页。

一个著名的沙皇书报检查官在同意出版马克思的著作时，预言《资本论》“在俄国没有多少人阅读，能读懂的人就更少了”^①。生活嘲笑了这种“预言”。1880年，马克思满意地指出，在俄国，阅读和重视《资本论》的人比在任何地方都多^②。俄国革命家对《资本论》中的思想的了解，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和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团体和小组的建立。《资本论》的最初版本，为后来建立俄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起了准备基础的重大作用。

《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二版

1871年秋天，《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第一版全部售完。对该书日益增长的需要，促使出版商迈斯纳向马克思提议，着手准备并在短期内出版该书的第二版。

该版的准备工作，要求马克思付出巨大的劳动。首先要改变该书的整个结构。现在全书要由第一版的六章分为独立的七篇和二十五章。几乎所有的章又分为更小的节。在改进全书的结构时，马克思参考了恩格斯在1867年提出的意见。

第二版增加了许多新的注释，有些注释是洛帕廷提议加的。正文中改动和增补的文字总量是很大的。据马克思的大女儿燕妮证实，马克思对自己所作的修改感到满意。而这种情况对马克思来说“是不常见的”^③。

《资本论》第二版的准备工作虽然极为紧张，马克思还得抽出许多时间来处理国际的事务。他不得不料理为逃脱镇压而来到伦

① 《红色文库》1933年莫斯科版第1卷(56)第7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77页。

敦的巴黎公社参加者的生活。1871年12月21—22日，燕妮·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说，她的父亲不仅要和各国统治阶级的政府进行斗争，而且还要和“身体肥胖、头发淡黄和年纪四十的”房东太太们进行经常的搏斗，因为这些房东太太由于某个公社社员没有付房租就对他发起猖狂的攻击^①。可见，当时马克思照例只有
421 在夜晚才能安静地写作《资本论》。

1872—1873年第二版起先分成九个分册出版。1872年7月中旬出版了第一分册。1873年1月马克思为该版写了跋。1875年6月初又合成一整卷出版，印数超过第一版的两倍。

作者亲自校订的《资本论》 第一卷的法文版

1872—1875年期间以分册的形式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这是该书继俄文译本之后的第二个外文译本。马克思亲自参加了该书的准备工作，因为他希望使《资本论》更加完善、更易为法国读者所理解。

准备法文版的年代，已经是巴黎公社——无产阶级政权的最初尝试——失败后的时期。

甚至大多数公社成员也仅在本能上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远远没有明确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最重要原理。1874年5月18日马克思在写给库格曼的信中指出，“在法国，理论基础和实际的健全思想深感缺乏”^②。蒲鲁东主义仍然是对工人产生有害影响的根源。1867年5月1日马克思在写给毕希纳的信中指出：“我认为，使法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1页。

国人摆脱蒲鲁东用小资产阶级的理想化把他们引入的谬误观点，是非常重要的。”^①由于这个原因，《资本论》在德国出版以后，他想用法文在巴黎出版。《资本论》的科学逻辑使蒲鲁东主义的根本幻想破灭，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运动扫清了基地。

况且，对于比利时、西班牙和意大利，法语比德语更为人们所通晓，而无政府主义分子极力设法把这些国家的工人运动，特别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资本论》的思想在这些国家的传播，摧毁了无政府主义首领的阵地。

马克思同意出版商拉沙特尔的提议，定期分册出版《资本论》。他写道：“这本书这样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在我看来，这种考虑是最为重要的。”^②

《资本论》第一卷的法译文是由费尔巴哈著作的译者约瑟夫·鲁瓦完成的。根据马克思的意见，鲁瓦虽然是精通两种语言的大行家，但译得过死，作者不够满意。马克思自己认为，这个译文还要下很大功夫。1874年5月12日他对拉沙特尔写道：“鲁瓦的稿子……从头到尾需要修改……”^③马克思不仅对译文本身作了校订，而且还作了许多新的阐述。

法文版和最初的两个德文版有很大不同。它和被认为最后的版本即恩格斯1890年编辑出版的德文第四版之间也有差别，虽然马克思对德文第二版和法文版所作的大部分修改，恩格斯在1890年版中已经考虑进去了。

在德文第二版和以后的版本中，有七篇，共二十五章。在法文版中有八篇，共三十三章。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在法文版中单独成为第八篇，简称《原始积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0页。

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里封面右侧写着：“全文经过作者重新加工”。马克思在和朋友的通信中，经常引用《资本论》的一些个别原理，所根据的正是这个法文版，他还说，这些原理不象在其他文版中那样是随便引用的。他坚持向《资本论》第一卷的其他文字的译者建议使用法文版。1878年11月15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关于俄文第二版写道：“(1)我希望分章——以及分节——按法文版处理。

(2)译者应始终细心地把德文第二版同法文版对照，因为后一种版本中有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①马克思认为，第一卷法文版更加通俗，从法文译成英文和各种罗曼语就更容易了^②。

马克思在1875年4月28日写的并以法文版跋的形式发表的告读者书中写道：“不管这个法文版本有怎样的文字上的缺点，它仍然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③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写作

马克思早在1867年就着手去完成现有的手稿，这些手稿是1865年底写的，应编成《资本论》以后各卷。这件工作时断时续地一直进行到马克思逝世。

首先，马克思深入研究的主要是各国的土地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学中的新现象。1868年7月4日马克思给德国和美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齐·迈耶尔的信中，请他经常寄些美国报纸。“如果您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2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页。

搜集到某些有关土地所有权以及美国土地关系的反资产阶级的材料，那对我是特别有价值的。”^①马克思需要这个材料，为的是在分析地租问题时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里论战。1868年10月7日他给丹尼尔逊写信说，“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 and 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②，第二卷便不能付印。最后，在马克思心目中，俄国材料日益显示出极端重要性。结果，在1871年，他决定对第二卷全部手稿进行彻底加工。

在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马克思尽一切可能来加快完成《资本论》的写作。可是，除了写作《资本论》以外，他还担负其他重要任务。在1871年11月9日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马克思惋惜地说，最近几个月来忙得很，不能从事理论工作。1872年5月28日马克思对他倾诉说：“我实在疲惫不堪，加上我在自己的理论工作中遇到干扰太多，所以我打算9月以后退出**商业事务**，这项事务目前主要落在我的肩上，而您知道，它在全世界都有自己的分部。”^③为了保密，马克思在这里把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称为“商业事务”。在这以前他也曾多次谈到关于放弃国际的日常实际工作的想法。1871年11月24日他在写给比利时工人运动活动家德·巴普的信中说：“我在伦敦已经告诉过您，我常常问我自己：我退出总委员会的时候是否已经来到？协会发展得越快，我的时间就花得越多，可是最后，总还得把《资本论》写完。”^④的确，既要写好《资本论》，又要领导国际，这不能不使人感到惊奇，象马克思这样一个当时年纪已经不轻、实际上并不健康同时又饱受着生活中极端贫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9页。

② 同上书，第5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79页。

④ 同上书，第342页。

困和无穷纠纷折磨的人，在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活动领域中该要花费多少力量和心血啊。真正伟大的目标产生出创造奇迹的伟大毅力。

1869年底马克思开始学习俄文。使马克思对俄语和俄国的社会思想发生浓厚兴趣的是，从彼得堡寄来的恩·弗列罗夫斯基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初次阅读，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马克思认为，研究俄国经济学著作和原始资料、特别是关于土地所有制方面的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马克思短时间内仔细研究了语法的基本规则，立即开始查字典来阅读俄文原著。最初阅读的是赫尔岑的《监狱与流放》（《往事与回忆》的一部分），恩格斯当时也读过。马克思把译文和俄文词根写在页边空白处，使他大大缩短了掌握俄语的过程。很快，马克思就能看弗列罗夫斯基的书了。1870年2月10日他满意地告诉恩格斯说，已经读了一百五十页。

马克思在书的页边空白处记下不理解的单词的译文，越到后来这种记载就越少；他已经能相当快地阅读了。同时他对读过的内容也能提出意见，其中还有评语。马克思高度评价这一著作的内容和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证明俄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公社的瓦解和商品生产的发展；同时他也注意到作者世界观上的弱点、对公社制度的理想化、对“阶级调和”的固有幻想以及同蒲鲁东的某些相类似的观点。例如，在书的一页上，弗列罗夫斯基表述了自己的意愿，说什么资本家和工人觉得自己不是“雇主和雇工”，而是“同志”和“兄弟”，于是马克思便在那里写下了意味深长的评语：“旧的幻想！”^①

总的说来，弗列罗夫斯基这部篇幅巨大、实际材料丰富的著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1929年俄文版第4卷第376页。

使马克思得到了他在被官方的粉饰太平或主观臆断所歪曲了的其他来源中只能零星找到的东西。马克思对拉法格夫妇写道：“在研究了他的著作之后可以深信，波澜壮阔的社会革命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并在日益临近，自然具有同俄国当前发展水平相应的初级形式。这是好消息。俄国和英国是现代欧洲体系的两大支柱。”^① 425

继阅读弗罗列夫斯基的书之后，1870年上半年马克思显然已经读过了日内瓦版的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文集第三卷，该卷收入了《对约·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第一部的补充和注释》一文。同年夏天，他在日内瓦订购了第四卷。马克思认为，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的著作是杰出的。

一年以后，马克思自己初步总结了自学俄语的体会。他写信给迈耶尔说：“成绩是要付出努力才取得的，象我这样年纪的人，为了学会一种与古典语和日耳曼语截然不同的语言，是要下一番功夫的。俄国目前发生的思想运动，证明底层深处正在发生动荡。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②

马克思掌握俄语之后，就开始系统地研究关于俄国土地关系和社会政治发展情况的官方文献和学术专著。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这是“全新的专门研究”^③。十多年来，整箱整箱的俄文书往返于彼得堡和伦敦之间。马克思的俄国朋友（丹尼尔逊和其他人）从彼得堡把这些书寄到伦敦，而马克思读过后又多次从伦敦寄回彼得堡。

从《征税委员会报告》、《农业状况调查委员会报告》、《省农民事务厅意见汇编》、《欧俄土地所有制和居民点统计资料汇编》和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11页。

同的俄国作者的著作中所作的内容广泛、数量众多的评论性摘录，说明马克思见识丰富，兴趣广泛，表明他为《资本论》付出了巨大的劳动，而在《资本论》第一卷成为各国先进无产者手边必备的书籍之后，以后各卷的初稿也已具备了。

426 马克思力求用其他地区和国家材料来补充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有关材料。

1870年1月24日他给德·巴普写信说：“……既然我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研究土地所有权问题，我认为在这一卷中比较详细地论述一下比利时土地所有权的结构和比利时的农业是有益的。可否劳驾您把我应当熟悉的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著作书目**告诉我。”^①德·巴普很快就满足了马克思的这一请求。

1876年4月马克思问左尔格，可否花钱从纽约弄到美国书目，以便了解1873年以后在美国关于美国农业和土地所有制，以及关于信贷和财政金融方面“是否出版了什么有用的东西”^②。他同时指出，从英国报纸上了解不到美国目前的丑闻（显然是同铁路建设事业等有关的土地投机和财政舞弊），并向左尔格询问是否保存了有关的美国报纸。

为了充分掌握事实，马克思钻研了关于农艺学、农业化学和植物生理学方面的世界图书资料。农业科学的最新成就使他能更深刻地和更有说服力地批判反科学的“土地肥力递减律”。

1875年5月至8月为了举例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马克思作了广泛的计算。这些计算构成未来《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章《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的基础。1876年2月中旬他写了篇幅不大、但理论丰富的手稿《级差地租和地租只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在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正文时，恩格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29—6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69页。

把这部分资料放入第四十四章^①。

1870年11月至1878年7月期间，马克思准备付印手稿《货币资本的循环》，即现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一章。在1880年期间，他为第三卷写作部分新的文稿：《利润率趋向下落的规律》。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其他篇章也着手写作了。

可是，在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马克思有意拖延写作最后 427 的正文。在许多信中，都说明了作者“延期偿付”的原因。1879年4月10日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第一**，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决不出版第二卷。这一次的现象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

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

第二，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

第三，我的医生警告我，要我把我的‘工作日’大大缩短，否则就难免重新陷入1874年和以后几年的境地，那时我时常头晕，只要专心致志地工作几小时就不能再坚持下去。”^② 马克思所以要把工作日加上引号，看来是要不顾一切警告，把这一“日”经常延长到深夜。

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要他的女儿爱琳娜把《资本论》的手稿交给恩格斯，希望他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③来。

根据作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和著作方面的遗嘱执行人的权利和义务，恩格斯把自己的科学研究计划放在一边，立即着手实现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5、34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9页。

马克思的遗愿——开始准备付印《资本论》遗稿。他把作者的第二卷手稿分成两个单独的卷——第二卷和第三卷。他以固有的谦虚和对过早逝世的朋友采取的感人的、几乎虔敬的态度，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做这件事，把自己的工作尽量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①。其实，恩格斯所做的工作，特别是第三卷的工作，意义十分重大，以致可以认为是恩格斯编辑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正如列宁公正地指出的那样，可以看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②。

428 恩格斯制定了第三卷的最后结构，给个别一些章增补了注释，为了连接片断的行文，写了大量插入的文句，在作者原有笔记的基础上新写了第四章，三次加工了整个第五章，写了序言和增补（《价值规律和利润率》和《交易所》）。恩格斯整理这几卷的全部工作继续了将近十年。

第二卷的工作费力较少，可也并不轻松，也相当复杂。甚至这卷书的手稿在当时已完全准备好付印的那个部分，也不能立即出版，因为手稿要根据马克思较后的表达法和研究成果加以修改。大部分材料未经最后系统加工。应当把1865—1870年写的四个手稿和1877年晚期写的四个手稿里的东西写成统一的文稿。恩格斯编成整个《资本论》第二卷用了两年多的时间。

1885年第二卷问世，1894年第三卷出版。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特别指出，马克思希望把《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献给自己的妻子燕妮·马克思。

恩格斯想以《资本论》第四卷即最后一卷的形式出版著作的历史批判部分——《剩余价值理论》。但是，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9页。

② 参看《列宁选集》第2卷第10页。

资本的生产过程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的著作，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著作。这一伟大著作的第一卷专门阐述资本的生产过程。如马克思所说，在本卷开头（德文第一版第一章和以后各版相应的第一篇），他对第一次单独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内容作了“概述”^①。

马克思又从分析商品即资产阶级财富的最简单细胞开始自己的研究。研究商品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所必不可少的条件。两千多年以来，人类企图详细了解商品形式——价值形式，虽然最初一看，这种形式显得很简单。这个非常困难的任务只有马克思才能胜任。深刻研究价值形式直到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是马克思最大的科学功绩之一。研究价值形式预先决定了研究资本的成就。

《资本论》第一卷的基本内容，是分析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 429

在商品生产发展的过程中，货币转化为资本，简单商品经济转变为以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经济。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提出了真正科学的剩余价值论。按照恩格斯的意见，这个理论产生了象晴天霹雳那样的影响^②。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不能解释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的真正本质。

商品本身是使用价值（满足某种需要的能力）和价值（体现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统一，同样商品生产过程必定同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页。

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既然这里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那么价值形成同样也以生产一定的价值余额为前提。其实，资本家为的是获得价值余额才组织生产。“他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商品，不仅要生产使用价值，而且要生产价值，不仅要生产价值，而且要生产剩余价值。”^①

马克思发现了下述事实：工人出卖和资本家购买的商品是劳动力，也就是劳动能力，而不是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所认为的劳动本身。这一发现提供了深刻说明资本主义剥削机器的钥匙，解决了李嘉图学派的难题之一：不能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同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协调起来。劳动力也和任何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劳动力的使用价值是它创造价值的特性，而且这个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等于工人和他的家庭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因而也是由再生产这一商业特定对象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力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工资，工资根据具体的经济行情，该国传统形成的生活水平、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力量以及许多其他情况，能够
430 围绕劳动力价值而上下摆动，并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工资单纯从外表上看是劳动的价格。作为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的转化形式，工资以劳动价格的面貌出现，因而掩盖了剥削的过程。情况表现成这样：工人出卖劳动，全部劳动被支付了报酬。事实上，工资永远低于雇佣劳动生产的产品的一般价值。工人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是在工作日的一定部分（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的。在工作日的其他部分（剩余劳动时间）工人生产超过自己劳动力价值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值。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各种积累劳动，任何生产资料都宣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11页。

为资本，并把资本看作人类社会生存的永恒条件。马克思推翻了这种观念，并指出了生产资料只在一定的条件下，即当它们是资本家的财产并用来剥削雇佣劳动时，才成为资本，所以资本是历史上一定的社会关系。

分析活劳动和生产资料在商品价值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对科学地说明资本主义剥削具有巨大的意义。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只承认资本的一种划分，即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马克思并未否定这种划分，同时从资本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的角度，作了更加重要的划分，即划分为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劳动力)。生产资料不创造新价值，只有活劳动才是新价值的源泉。在生产过程中，活劳动根据生产资料的损耗程度把它们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

马克思把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就能使他深刻分析雇佣劳动的被剥削过程，同时也使他能找到对工人剥削程度的数量的表现，即不是剩余价值同全部投资的比例，而只是同可变资本的比例。马克思把这一比例称为剩余价值率或剥削率。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剥削率也在增长，同时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和尖锐。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研究了提高剩余价值率的方法。⁴³¹ 资本家增加剩余价值率有两种途径：(1)在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不变的情况下，他靠延长工作日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绝对剩余价值)；(2)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情况下，他提高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以改变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来使自己得到好处(相对剩余价值)。第一种办法基本上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开始阶段所特有的，主要是以手工业技术和比较原始的劳动组织为基础的阶段所特有的。第二种办法是资本主义生产较为发达阶段所特有的，当时生产的技术和组织条件发展了，工人阶级日益强大

的斗争迫使资产者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工作日。马克思根据大量实际材料展示了工人阶级为争取限制劳动时间而斗争的情景。

资本家竭力追求剩余价值的绝对增长，可是实际上总想延长工作日，强迫工人在每个工时内花费大量的劳动，也就是提高劳动强度。只有活“机器”肉体的局限性和对工人愤怒的畏惧，才限制了资本家的贪婪欲望。

马克思在好几章中，主要根据英国的材料（英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它向不太发达的国家表明了它们未来的前景），对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作了精彩的历史概述。这些方法——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机器工业——同时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阶段。马克思专门和特别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历史、条件和后果。机器和其他技术的发明并没有减轻工人的劳动，而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一切新的和最新的劳动技术资料只是为了如下目的：降低商品价格，缩减必要劳动和延长追加劳动时间，也就是说，使新技术成为替“养尊处优的游惰者”^①生产剩余价值的单纯手段。

432 由于分工和机器的资本主义使用，劳动生产率增长了，工人状况也随之普遍恶化。在资本主义各国，机器引起失业现象的增多和大量的工伤事件，劳动变得紧张和单调无味，资本专制和营房式纪律也加强了。

在手工作坊里劳动完成的速度和质量，直接取决于工人，取决于他的熟练程度、经验和勤奋以及其他等等。在工厂里劳动速度主要取决于机器和工艺过程。因此，马克思把机器生产阶段的特征说成是劳动实际从属于资本的阶段。资本主义在机器和机器工业中获得了完全和自己相符合的物质技术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08页。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以后，对资本主义积累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

任何周而复始的生产过程，实质上都是再生产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人在产品价值里再生产出预付资本，并超过预付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如果剩余价值完全被资本家耗费掉，那就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现象则是扩大再生产，即资本积累。

工人们用自己的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比资本家个人消费所需要的数量要大得多。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来扩大生产规模。所以，工人不仅创造资本家个人的消费资料，而且也创造用来扩大剥削场所的追加资料。

随着资本积累或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增长起来。马克思说的有机构成，指的是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之比，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工资总额之比。由于使用越来越完善的机器，由于生产技术的发展，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更快。这种后果就是：加强了对工人阶级的剥削，提高了剩余价值率。

资本有机构成的增长，同时使劳动力的需求相对降低，因为这种需求不是由全部资本的数量决定的，而只是由相对减少的资本 433 的可变部分决定的。

与马尔萨斯所谓“永恒的”、“自然的”人口规律相对抗，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真实的人口规律，这个规律是暂时的，仅仅是由资本主义本质决定的。

一部分工人被排挤出生产，形成所谓相对人口过剩，或产业后备军。失业现象不仅造成工人的生活状况极端不稳定，使他们对未来失去信心，而且压低了工资的一般水平，使资本家易于强化在

业工人的劳动。

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上，剥削阶级的财富剧增，他们过着更加豪华奢侈、挥霍浪费的寄生生活；而在另一极上，劳动人民遭受的压迫和剥削、失业和贫穷，却日益加深。“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①

马克思所发现和表述的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普遍规律，是了解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对抗矛盾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以自己的研究彻底驳倒了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资产阶级学说的神话。资产阶级学说把资本原始积累说成是一些特别喜欢劳动的能干人，省吃俭用，用自己的劳动逐渐积攒财富的结果。马克思专门写了一章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这个过程的实质是直接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的完全分离。统治阶级使用暴力手段加速了这一过程。马克思根据大量的历史材料描述了用暴力使小农和中农丧失土地，把他们赶出农村，变成日益发展起来的工业的廉价劳动力后备军的情景。少数人手里的财富甚至也是借助于在殖民地凶残的掠夺和血腥的抢劫积累起来的。马克思在描述原始积累过程的特点时写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结束部分，对自己的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② 同上书，第829页。

究作了总结，对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前途作了结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意味着劳动越来越大规模地社会化，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化。马克思用充满无产阶级胜利的坚定信心的语言，结束了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的分析：“随着……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资本的流通过程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第二册(第二卷)中继续研究了产业资本的运动。但在这一运动中专门研究的已经不是象在第一卷中那样的生产过程，而是产业资本在流通范围内进行的那种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

马克思在第一篇分析了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他从货币资本的循环开始，然后在一些章内又分析了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

一个正在开工的资本主义企业，这就是雇佣工人和职工使用一定的生产资料(土地、厂房、机器、工具和原料等等)来生产某种商

435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1—832页。

品。无论生产资料，或者雇佣工人的劳动力本身都不是资本。只有彼此结合起来，只有前者是资本家的所有物，而工人和职工为了生活被迫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时，他们才成为资本。

货币资本已经转变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资本的这两种物质形式相结合，加在一起形成生产资本的形式。如果生产不停地进行，那么资本就经常处于这种形式。

在生产过程中，全部预付资本迟早要转变为商品，具有商品资本的形式。资本在自己的这个循环中也完成了特殊循环——商品资本的循环。这里资本家遇上了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实现问题。商品的实现，必须保证资本家收回他所花费的全部资本价值，此外还要给他提供由他的雇佣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弄清商品实现的条件和特点，是马克思在第二册中研究的主要方面之一。

马克思以前的任何经济学家，都没有在资本的所有形式、它们的相互关系和细节中考察资本的循环。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把资本理解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理解为资本价值在时间和空间上、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从一个数量到另一个更大的数量的不断运动。而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①。

马克思对资本的所有三种基本形式（货币形式、生产形式和商品形式）的循环单独地和总起来所作的分析，之所以是出色的，也因为它是揭露了资本运动中的深刻矛盾。

不断运动是全部社会资本的特点。可是，在这一运动中经常产生普遍危机和局部危机，在商品的价值和价格中经常发生革命。一些资本家手里的货币资本过剩，另一些资本家由于货币资本短缺而破产，一些资本家狂热地进行生产并扩大自己的生产，另一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2页。

资本家的机器因停工而生锈。大量商品积压、损坏和跌价，当劳动 436 人民因需求得不到满足而遭受苦难时，这些商品却经常干脆被销毁掉。一些工人因劳动过度而受到伤害，另一些工人则因失业而感到痛苦。马克思指出，这些现象以及类似的现象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运动最本质的必然的和合乎规律的结果。

资本的任何循环都要占用一定时间。这个期间不管持续多久，它客观上总要分成两部分时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马克思在第二篇中详细研究了资本的周转。对于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周转的时间，是他预付出资本以便它不只以自己原有的形式返回、而且还要增殖价值的时间。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周转时间，在任何情况下都等于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的总和。周转时间的不同，对于预付资本的数量、剩余价值的年总量、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整个进程，都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

在生产过程中，不变资本的不同部分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上去的情况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原料完全耗费了，它的全部价值，甚至包括生产中废弃的价值，都加进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中去。相反，用来加工原料的机器的价值，只是按照这些机器磨损的程度而加进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中去。商品出卖以后，资本家相应地收回原料的全部价值和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那一部分机器的价值。因此，从资本价值的流通和周转的角度来看，全部不变资本的价值又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上第一次断定，生产资料究竟变成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只要看它们的价值是逐渐还是立刻转移到商品上去，是部分地还是整个地转移到商品上去。

资本家耗费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按其周转的性质来说，和构成流动资本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流动资本是由两部分组成的，它们在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中起着完全不同

的作用，但在资本流通过程中又表现为一个整体。这种情况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剥削本质。它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商品销售时
437 在流通领域里产生了剩余价值。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利用这种假象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

马克思在对整个资本周转以及对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周转的特点所作的分析中，科学地指出资本周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部门和领域里究竟起什么作用，在物质生产的发展以及资本家和工人的状况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区分究竟是怎样表现的。

任何一个单独生产，由于各种原因可能暂时或完全停顿下来，与此相反，一切社会生产则始终是不间断的生产。研究资本再生产的条件，是第二卷的最重要课题。

重农学派魁奈是在马克思以前试图分析社会再生产的规律性的第一个经济学家。他在《经济表》中指出，某个国家(法国)总年度产品怎样周转并且最后怎样在该社会各阶级中进行分配，使这一产品的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即它的简单再生产能够进行。但是，魁奈只把农业看作生产领域，认为劳动只有在农业中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魁奈和他的学派没有研究在发达的工业生产基础上和整个社会劳动广泛分工下的资本主义再生产。

马克思从阐述整个社会产品的商品构成和价值构成开始，来分析简单再生产。形成社会年产品的商品总额，根据它的实物形式分成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由生产资料构成的，它必须或无论如何都能重新进入生产消费。第二部类是由消费品构成的，这些消费品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与此相适应，整个社会生产也分为两大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这种区分具有方法论上的重大意义：它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且也适用于任何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

两个部类的任何一个部类中耗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转移到两个部类的年产品价值中。

劳动力在一年当中生产出新价值并把它加到被消耗的不变资本⁴³⁸的价值上。资本家花在劳动力报酬上的可变资本的价值，不仅在年产品的价值中再生产出来，而且还增殖剩余价值的数量。雇佣工人在年产品价值中所创造的新价值总量，取决于他们的人数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程度。

所以，在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都是由以下几部分构成的：消费掉的不变资本(c)、可变资本(v)和剩余价值(m)。马克思把它写成 $c+v+m$ 。

马克思的巨大科学功绩就是阐明了上述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中每一部类内部，以及这两大部类之间交换的条件和比例。他制定了交换的图式、并且指出了，为使社会产品能够实现，也就是为使再生产不断进行，按照价值和产品的物质内容，社会生产的每一部类中产品构成部分的相对量应是多少。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第一次成功地指出，社会生产过程中用于工人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如何进行补偿，以及充当生产资本各个要素的那部分产品如何进行补偿。

马克思规定了不断再生产所必需的理想比例，同时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些比例是不能实现的，事实上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比例失调现象、生产过剩的局部危机和普遍危机以及货币危机。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相互作用本身，不能不经常引起比例失调现象和周期的波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协调一致只是在无秩序和无政府状态发展的总过程中经常作为瞬息即逝的要素来实现的。

对于社会再生产规律性的研究，在工人阶级革命宣传的实践中，在马克思的学生和继承者无论是反对小资产阶级关于资本主

义“自动崩溃”或“自行窒息”的有害理论的斗争中，或者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永久繁荣”和“协调发展”的辩护理论的斗争中，都具有巨大的意义。列宁完全根据马克思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结论，非常鲜明和显著地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内市场的形成，人民群众必然遭受的贫困。列宁还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对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全部重要性。加速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采用更经济的和先进的方法和部门，建立强大的动力基地和原料基地，这些都保证个人消费品生产具有高度水平，并且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济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资本论》第三卷从理论上分析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这里研究了作为生产和流通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在整个社会范围内，资本家阶级各个集团的特殊利益表现得各不相同。在工业、运输业、农业、商业和银行之间经常为夺取“阳光下的地盘”，为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中夺取更多的份额而进行斗争。把这种复杂而多样的一大堆特殊利益的交织物分辨清楚，把造成生产资料所有者阶级分裂的内部矛盾弄清楚，找到和指出每个大的资本家集团在对另外的资本家集团的关系上以及对工人阶级的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远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马克思以前的所有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做不到这一点。

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内容，马克思在第三卷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和所有人面前表现出来的资本的那

些种类和形式，究竟是什么时候和怎样产生的，并且又怎样不断地重新产生出来。资本和资本家的各种形式和种类的有规律的联系，生产和流通的每个大的部门、因而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作用和发展前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复杂性中第一次变得明确了。马克思写道：“因此，我们在本卷中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①

马克思首先指出，商品的价值怎样转化为它们的市场价格，工人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资本家的利润，这个利润怎样在各个资本家之间分成一定的部分，并且由于这种瓜分，各不相同的利润率——剩余价值量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总额之比——又怎样在投资的各个部门里转化为任何资本家的一定资本的一般平均利润率。

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家，不能解决在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基础上如何能够形成并且真正形成同样的平均利润率的问题。假定两个资本价值相等，雇用同样数量的工人和职工，假定它们同样剥削他们的劳动力，支付同样的工资，那么在其他同等周转的条件下，这些资本应该给它们的所有者提供同等的利润。这是由价值规律的作用必然得出的结论。但是，假定这些资本剥削不同数量的工人和职工，而且剥削的程度也不同——有的多些，有的少些——那么根据上述同一个价值规律，它们已经不能产生出并且也不能攫取同等利润了。

然而，在经常的资本主义实践中出现了某种直接相反的现象。实际上，同量资本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相同的利润，不取决于资本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0页。

削活劳动是多还是少。所以产生和经常存在一种表象，似乎商品的价值和它的出售价格不是由活劳动力的耗费，不是由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的。可见，如果认为这种表象是可靠的，那么劳动价值理论就是不可信赖的，在实践中价值规律就会经常被破坏。

马克思经过自己的研究，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出色地解释了不同有机构成的同量资本形成同量利润的过程。

每个资本家和每个部门的资本家集团，都极力想使投在某一企业和某一生产部门的全部资本的任何一份都能在社会范围内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中得到自己相应的份额。马克思象数学般准确地证明，在资本的有机构成同社会总资本的有机构成相符合的那些生产部门，它们的商品出售价格将同商品的实际价值相符合。在所有其他部门，商品的出售价格必然偏离商品的价值。在不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量相对来说较大的一些部门，商品的价格将超过商品的价值。在资本构成比平均社会构成较低的另一些部门，商品的价格将低于商品的价值。所有这些价格的总额，在货币上表现出全部社会产品的价值。可是价格不是直接由价值本身调节的，而是由它的改变了的形式——作为商品生产费用和平均利润的总和的生产价格调节的。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详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竞争的作用和弄清了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原因。生产价格是决定商品市场价格的尺度，它形成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

生产价格的概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是知道的。可是，实际上谁也没有研究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区别，同样也不能证明只是外表上互相否定的两种范畴间的“血缘”关系。这一点，只有马克思做到了。

马克思以前各派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解决为什么随着

资本主义的发展一般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

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利润率只是剩余价值率的转化形式。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年利润的大小和剩余价值量相同。但是，一般年利润率永远小于年剩余价值率。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中使用和耗费的不变资本越多，可变资本越少，利润率就越小于剩余价值率。因此，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社会总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导致一般利润率的降低。

同时，又有许多情况阻碍利润率的降低：（1）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2）不变资本要素的落价；（3）公开的和隐蔽的失业现象；（4）对外贸易的广泛发展和为剥削廉价劳动力向殖民地的资本输出。由于这些原因，利润率的下降规律只具有趋势性质。

第三卷详细研究了资本在商业、信贷货币流通以及农业中所采取的特殊的形态和形式。栩栩如生地出现在读者眼前的，不仅有工业资本家，而且还有商人、银行业主、大农场主和大地主。同时也出现了对抗他们的力量，即工人阶级的不同阶层和队伍。马克思还研究了全部社会剩余价值分成它的特殊部分和形式的过程，这些特殊部分和形式是和资本本身的特殊形式相适应的。442

在第二卷中已经证明，一部分资本总要以商品形式或货币形式留在流通领域。随着工业资本的发展，它的商业活动，它的买卖商品的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所以大量商品的购买和销售以及采取商品形式的资本的流通所需要的一部分资本主义费用，也增加了。商业资本不产生利润。可是，它缩减流通过程，替工业资本完成必需的和有用的工作，因而有资格得到工业资本的利润的一定份额。工业家和商人根据它们资本的多少，瓜分平均利润。由于这种瓜分的结果，产生两种利润——工业利润和商业利润。

工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以信用方式买卖商品，彼此借贷现金，作为债权人和债务人出现。资本家阶级内部的业务和货币联

系的范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因此，资本主义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独立出来并得到发展。现代银行业主取代了古代财宝收藏者和小高利贷者，登上了资本主义舞台。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闲置的过剩的货币资本的特殊市场。货币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借助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加强了工商业中资本的积聚和集中的过程，使银行业主有可能控制自己的债务人经营资本家的业务活动，一有方便机会就把自己变为他们企业的共有者，或者甚至变为完全的所有者。在动用和积累货币资本的基础上，大股份公司产生了，证券（债券、股票和其他“有价证券”）交易发展了，交易所成为资本家投机勾当和相互欺骗的中心。所有这一切助长了国家机关人员的营私舞弊，促使国家机关服从大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的利益。

在第三卷里也研究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的问题。这一研究合乎逻辑地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里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具体形式所作的上述说明。马克思主义的地租理论揭示了农业中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真实地阐明了农村无产者和农民的状况，向工业无产者指出了为消灭资本主义剥削而斗争的同盟者。

土地及其全部自然财富，都是人类劳动的普遍对象。一切社会生产都在土地上存在和发展。任何劳动产品都只是适合人类用于满足某种需要的自然物。马克思在主要分析资本主义农业，顺便研究直接使用土地、地下资源、水、森林等的其他生产部门时，抨击了资本家对自然财富的滥事开采。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全部发展，没有取消而只是改变了土地私有制。直接生产者的地产被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前提。

马克思把地租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

级差地租是农业生产条件较好的经营单位所得到的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

农业资本家的额外利润同垄断土地这一经营对象有关。这些资本家在部门内的竞争,使他们的商品形成这样一种市场价格,这种价格不是由好土地和中等土地的生产价格调节,而是由坏土地的生产价格调节。因此,在生产率较高的地块上可以得到额外利润,它表现为级差地租。

马克思还第一次从理论上证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形成绝对地租的可能性。绝对地租,这是社会向拥有唯一的财产证书的土地所有者缴纳的贡赋。大地主和地主,是一种特殊的食利者,他们靠剪“自己”土地的息票生活、完全不参加农业生产的组织和经营。由于农业中资本有机构成和劳动生产率较低,劳动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平均高于工业品的价值和生产价格。同时,私人地产的垄断不可能使农产品价格通过竞争达到社会生产价格的水平。农产品⁴⁴⁴的高价值和其他商品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形成绝对地租。

绝对地租的存在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相反,绝对地租夺走一部分剩余价值和资本去供养寄生阶级——土地贵族,从而妨碍这一生产的发展。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实际上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如果说资产阶级放弃取消土地私有制的要求,那只是因为:侵犯这种形式的私有制能够引起连锁反应,使人们起来反对一切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原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弄不清土地所有者垂手而得的收入的本质。甚至他们的优秀人物如斯密和李嘉图,竟然把地租的运动归结为自然规律的作用,从而为资本主义辩护论敞开了大门。臭名远扬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就是以李嘉图错误的地租理论为依据的最流行的原理之一。马克思的地租理论摧毁了资产阶级辩护论的立足点。

《资本论》第三卷的研究还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中间经常产生一些人倾家荡产,另一些人发财致富的过程;小农和中农

《剩余价值理论》

的臭名远扬的“稳定性”只存在于资产阶级辩护士的想象之中，极大多数的土地所有者从事繁重艰苦的劳动，仍然难于避免破产和极端贫困。基本农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实质上 and 工厂雇佣工人的状况没有多少不同。他们的唯一生路，就是同工业工人结成联盟，对资本主义发起决定性的猛攻。

马克思在第三卷末尾说，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达到一定的成熟阶段就会被抛弃，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在生产方式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的冲突”^①，是生产方式和分配方式更替的这一历史过程的基础。马克思重新证明了而这一次是更详细地证明了社会主义革命是必然的。

马克思对于自己 1861—1863 年手稿中论述《剩余价值理论》的那些篇章，在以后的年代里再也没有回头来整理过。可惜，他完全没有时间为自己伟大著作的这一部分作最后的加工。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用历史观点彻底研究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形态的规律所作的解释，并且他认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进化是资产阶级社会本身进化的反映，是它固有矛盾的发展。为了全面了解资本主义的规律性，马克思必须弄清，基础怎样影响上层建筑，资本主义现实怎样反映在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经济科学领域中。对政治经济学史的批判分析，合乎逻辑地完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前三卷中所作的研究。

同时，对马克思来说，这一分析是更加深刻地弄清资本主义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999 页。

济关系本质的前提。后来马克思写道：“……我开始写《资本论》的顺序同读者将要看到的顺序恰恰是相反的（即从第三部分——历史部分开始写）……”^①在这里马克思相信黑格尔说的话：“为了掌握对象的理论，应该知道对象的历史”。

当马克思开始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时，他本打算根据自己经济著作的各个理论部分来分类整理历史批判的资料。可是，马克思在1861—1863年手稿写作过程中就已经放弃了这种想法，决定把整个历史部分单独分成一卷。

根据恩格斯的意见，《剩余价值理论》是“政治经济学核心的”即剩余价值学说的“批判史”^②。对马克思来说，剩余价值的范畴对于他评价任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任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派都具有决定性意义。

《剩余价值理论》的第一册主要是讲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斯密以及其他人），他们在发展剩余价值理论方面的贡献，无论如何是同在价值规律基础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问题相联系的。在第二册里研究了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地租和危机问题。这里李嘉图学说是研究的重点。第三册阐述了李嘉图以后的资产阶级政治 446 经济学的特征。

第一册一开始就研究了重农学派。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马克思高度评价重农学派，认为他们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最早有系统的（不象配第等只是偶然的）解释者**”^③。他们在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解决劳动和资本的交换问题方面，迈出了巨大的第一步，首次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交换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中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0页。

斯密远远超过重农学派,发展了剩余价值理论。斯密认为,价值是由一切社会劳动创造的,而不以这种劳动生产什么样的使用价值为转移。所以,在斯密那里,并不象在重农学派那里那样剩余价值只是以地租形式出现,同时还以利润和利息形式出现。但是,斯密虽然把剩余价值看作一般范畴,看作工人无酬劳动的产品(马克思说:“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①),不过他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了。而这就意味着,斯密没有研究劳动力商品这个范畴,所以不能科学地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问题。斯密的功绩在于肯定了下述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下,劳动和资本在交换时,价值规律实际上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可是,斯密由于不了解劳动力商品的范畴,便不能解决这一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同劳动和资本交换问题有密切关系。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劳动的范畴问题,是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某些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克思是以重商主义者、重农学派和斯密为例指出这一点的)根据他们对剩余价值来源的观点直接解决的,是劳动和资本交换问题解决的结果。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全面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涵义的生产劳动被理解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在《资本论》前三卷中,马克思阐述他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是
447 从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开始分析,然后(在《资本论》第三卷)才过渡到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外表出现的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而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则不得不从他在某一经济学家那里找到的那些剩余价值转化形式出发,然后指出隐藏在转化形式后边的剩余价值理论的要素。例如,马克思在分析李嘉图的理论时,首先研究了李嘉图的地租和生产价格理论,因为在李嘉图那里剩余价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58页。

范畴只是以平均利润和地租形式出现的。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的地租理论，首先是绝对地租理论，在研究李嘉图学说的《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卷中居于中心地位。马克思的地租理论证明了斯密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一致的前提是错误的。

《剩余价值理论》对《资本论》第三卷中地租的分析作了非常重要的补充。这里马克思考察农业中两种形式的垄断（土地私有者的垄断和资本主义农场主的垄断），由此得出了如下结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土地国有化，是使农业从束缚它沿着资本主义道路发展的羁绊下解放出来的资产阶级措施。其次，马克思指出，农业品价格如果包含绝对地租或级差地租，那它就必然是垄断价格。马克思非常注意研究农业内部和部门间的竞争，因为这种竞争导致两种形式垄断发生局部的或完全的崩溃。

《剩余价值理论》的许多篇幅，研究了经济危机的原因问题，以及危机的可能性过渡到它的“现实性”的条件问题。

危机的抽象可能性，是从产品交换的简单商品形式和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职能中产生的。可是，要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那就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矛盾。资产阶级财富不是使用价值的总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使用价值也不占主要地位。相反，资产阶级财富是交换价值的总和，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中交换价值占统治地位。马克思强调指出，资产阶级生产“并不是为生产者”即为工人“生产财富”，“资产阶级财富的生产完全不是为‘充裕’而生产，不是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人生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为市场生产的商品和货币之间、买和卖之间、生产和需要之间以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53—54页。

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资产阶级生产形式必然造成分配的特殊局限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生产所具有的发展倾向，好象没有内在的局限性似的。在这一矛盾中隐藏着“危机的深刻的、最隐秘的原因”^①，这些危机是矛盾得到暂时和暴力解决的形式。

马克思在第一、二册里，主要分析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产生到顶峰(李嘉图的理论)的前进运动，在第三册里就指出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怎样随着无产者和资产者之间阶级斗争尖锐化而变得日益庸俗的。

至于谈到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李嘉图学派的解体，马克思首先分析了詹姆斯·穆勒的观点，穆勒企图借助形式逻辑的解释，把李嘉图的理论上升为某种抽象的东西。李嘉图理论的矛盾反映了资本主义现实的实际矛盾。对于穆勒来说，材料已经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在李嘉图理论中的反映。为了消除这一理论的矛盾，穆勒只是求助于纯粹形式上的、口头上的理由。

在《剩余价值理论》结束部分，马克思揭示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根源和认识根源，着重指出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之间的重大差别，尖锐地批判了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想了解统一物的内在联系”^②，没有把统一物和表现形式的多样性混为一谈；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庸俗经济学家则通常再现资本主义现实的表面现象。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特点是：它本身什么也没有创造出来，它从古典经济
449 学家那里吸取养料，它不是前进而是后退，随着阶级斗争的加剧，它日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了。

诚然，李嘉图以后时期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86页。

② 同上书，第555页。

生产方式的某些方面有一定的理解，而那些李嘉图派的社会主义者总是公开地批判资产阶级社会和捍卫工业无产者。可是，他们不能克服自己观点的资产阶级基础。

《剩余价值理论》是以最科学的、客观的和真正党性的态度来对待资产阶级经济学见解的不同学派和体系的卓越典范。既然最新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许多场合恪守被马克思彻底摧毁了的僵死原理，那么马克思对于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批判，决不是早已过去的历史的一页，而是揭露老牌资产阶级辩护论的新变种锐利武器。

《资本论》中的共产主义问题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活的统一物、作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史上的特定阶段，因而也是历史上的迟早要被另一个制度即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的暂时阶段来研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对资本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描绘了未来社会的虚构图画；与此不同，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描绘，是从有机地分析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发展趋势得出来的。马克思没有而且也不能提供未来社会的详细情景，可是他的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描绘了这个社会形态的许多根本特点，对于以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基本内容的时代来说具有巨大意义。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成果私人占有的资本主义形式之间的矛盾）及其不可避免的现象——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残酷的竞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科学技术成就不是用于造福人类而是用于达到毁灭目的的等等，所有这一切限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范围内的生产力的发展。

资本主义内部发展着的生产力，和它的社会外壳，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不相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本身产生它的必然灭亡的物质前提。但是，向共产主义的过渡不能自发进行。为此就需要革命的作用，需要进行革命，推翻资本家阶级的统治，由工人阶级来夺取政权。共产主义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原理，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最重要结论。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决不排除“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革命的可能性。根据马克思的看法，例如在不列颠群岛就存在过这种可能性，虽然“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在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面前”^①。

社会主义革命一定会确立基本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因而恢复生产者和生产条件之间的统一；生产条件对劳动者来说不再是异己的东西。生产将具有计划性和组织性。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原理、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使想对“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②的“每个人”^③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对仍然处于按劳分配发展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了说明。马克思把这个社会看作“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物。这些产物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的方式会随着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仅仅为了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每个生产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页。

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样，劳动 451
时间就会起双重作用。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
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又是
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劳动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因而也是计量生
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在那
里，人们同他们的劳动和劳动产品的社会关系，无论在生产上还是
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①

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求以客观经济规律为基础的合理经
营管理来代替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要求自觉的社会监
督和有目的地调节社会生产过程以造福于全社会。

各个生产部门间的社会劳动的自觉和合理的分配，是共产主
义社会的最重要的职能和特点。马克思写道：“只有在生产受到社
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
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
间，建立起联系。”^②这种联系的建立，要求精确提供的社会需要的
核算和社会劳动的耗费。

共产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劳动的普遍化”^③。单是由于这一点，
工作日就会缩短，自由时间就会增加。劳动时间是唯一由充分满
足社会整个成员不断增长的需要而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性调整的。

剩余劳动——超过个人需要限度的劳动——在共产主义制度
下表现为生产劳动的必要组成部分。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差别，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
因为剩余劳动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者同样是必需的，正象他
们的必要劳动是必需的一样。马克思研究了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95—96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第 20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579 页。

条件下必要劳动的范畴,同时也把“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①列入这一范畴。

452 必要劳动的范围所以会扩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还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应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丰富,他们的生活需求应该不可估量地增长。

马克思彻底研究过共产主义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基本特点。根据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而不是根据它的社会形式产生的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那些规律性,对于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基本上同样有效。

社会总生产根据自己的使命将继续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部类内部和部类之间的基本对比也将继续保持。马克思考察了社会生产第一部类内部的资本运动,着重指出,“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的”^②,也同样会产生这样的运动。由于存在以实物形式补偿固定基金的需要,所以必须有物质储备,或如马克思所说的特殊的相对生产过剩。在共产主义社会条件下,“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③,此外,因为这种储备创造了“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④的可能性。马克思也很注意象长期投资这样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方面。在这方面,他也考察了共产主义社会,认为它“必须预先计算好”^⑤,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样一些生产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无异是必需的,但不能立刻提供任何有效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73—474页。

③ 同上书,第527页。

④ 同上书,第198页。

⑤ 同上书,第350页。

果^①。

共产主义改变着物质生产中劳动本身的性质。全面发展的个性将代替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局部工人”，代替靠牺牲人类个性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被置于生产者本身的共同控制下的劳动本身，具有合理的、真正自由的性质。物质生产中的劳动领域仍是“必然王国”。虽然自由王国在必需完成的劳动的界限之外才出现，但是，自由王国只能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事实上，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②

工作日的缩短，是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前提的。创造物质价值的效率高的劳动生产力，能够扩大自由时间的范围，而自由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6—39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927页。

间又对一切活动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自由时间是空闲时间，即个人合理的活动时间，这个领域不必和本人主要的职业相一致。归根到底，它将成为联合生产者社会的财富和发展水平的真正尺度。

在《资本论》中，含有关于“未来时代”里儿童教育和家庭关系的最珍贵的见解。马克思指出，在那个时代，即在共产主义时代，“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①。根据马克思的思想，在未来的学校里“理论的和实践的工艺教育”^②将占据应有的位置。马克思接着又说道：“……
454 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③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工人家庭吸引到社会生产领域，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那么在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④。

可见，在专门研究资本主义规律的《资本论》中，马克思以他所特有的深刻性和洞察力说明了共产主义制度的一系列极重要的规律性。

《资本论》的方法及其普遍的科学意义

马克思的最伟大著作《资本论》经受了最严峻的考验——时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

② 同上书，第535页。

③ 同上书，第536—537页。

④ 同上书，第537页。

的考验。生活完全证实了它的主要的科学结论。《资本论》科学方法的力量，它的逻辑，即马克思本人在谈到他的巨著的“结构、整个的内部联系”^①时所指的那些东西，多年来在历史法庭面前同样也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还在1857—1858年，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理论进行初次完整的深入研究时，就面临着整理经验材料的整个方法问题。在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中，马克思叙述了自己的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1858年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谈到过要写一部关于辩证法的专门著作的想法。马克思写道：“如果以后再有工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②《资本论》第一卷问世以后，马克思在给约瑟夫·狄慈根的信中又提到这种想法：“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③由于没有时间，马克思没有把方法、辩证逻辑作为专门科学写成专著。可是他逝世后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列宁指出了这一点，列宁强调说：“虽然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④在列宁的这些话中，对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整个方法论原则的普遍意义作了最深刻的评价。

《资本论》的方法，体现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全部基本原理，这些原理还是马克思在四十年代开始制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

④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1873年1月24日)里写道：“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①

黑格尔对运动的普遍形式作了包罗万象的叙述。所以，马克思干脆断然地宣布自己是这一伟大哲学家的学生。但是，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被神秘化了，这种辩证法分析的对象是思想的自我发展，是思想在自然界中的自我异化和在精神发展中的自我认识。马克思意识到黑格尔思维的这一主要弱点，把黑格尔辩证法重新颠倒了过来，使之建立在现实生活关系的巩固的物质基础上。在《资本论》问世后，马克思立即写信给库格曼强调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②

可是，《资本论》的方法并不是把辩证法的某些一般范畴简单地附加到具体经验材料上去。《资本论》的逻辑表现为适应于具体研究任务而制定的政治经济学方法。根据唯物辩证法这个科学认识的普遍方法，马克思建造了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矛盾实质的具体方式和手段的极为丰富的和多样化的武库。

《资本论》——这是发达的和严整的科学范畴体系，这个体系
456 正确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有形和无形现象。《资本论》逻辑的规律和方法论原则，同样也适用于研究其他社会经济形态。它们远远超出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具有更加广泛的意义。列宁在《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26页。

学笔记》中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和发展的研究方法，首先是政治经济学的特有的方法；但是，作为一门科学的方法，它不只表现这一门科学的逻辑结构的特殊要素和特点，而且也表现更多的东西——表现理论思维本身所固有的普遍要素，表现理解现实的主要形式之一的科学所固有的普遍要素。对于一切科学来说，《资本论》是分析对象的典范，即把对象分解为各个部分，然后再加以综合，把这些部分在它的全部生动的和复杂的多样性中联结为具体的统一物。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辩证研究的最主要的表象之一，就是用**历史主义的态度**来理解整个资本主义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每个范畴。马克思把这个生产方式和它的全部要素都作为处于经常运动中的东西来加以考察，作为处于它们的产生、发展和它们行将到来的必然灭亡的过程中的东西来加以考察。马克思的前辈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把资本主义当作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与他们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做历史的考察。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他着重指出，资产阶级社会不是一个“坚实的结晶体”^②，而是一个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在该卷跋中，他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彻底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去分析资产阶级社会从商品开始的一切范畴。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首次研究价值形式的产生和发展，考察货币形式的产生过程，考察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弄清价值规律的特有的历史本质，弄清在简单商品生产情况下和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的作用之间的差别。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页。

马克思在阐明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简单的和较复杂的范畴的历史本质以后,也就指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这个生产方式在历史上是过渡性的,因而它的规律绝不等于自然规律。只有历史地分析资本主义,才使马克思能够科学地预见到未来社会的一些基本特点。

马克思从辩证法角度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运用了发展论的规律和范畴的整个武库: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对立的统一和斗争的规律,否定的否定规律,质、量和度,本质、现象和外表,内容和形式,内在的和外在的,原因和结果,必然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现实性,单一的、特殊的和普遍的,抽象的和具体的,历史的和逻辑的,等等范畴。他的任务就在于揭示所研究对象的客观辩证法,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辩证法,与此同时制定完全适合这些对象的研究方法,也就是作为逻辑和认识论的辩证法。马克思依据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思维材料,用唯物主义精神改造了黑格尔所表述的和发展的辩证法全部规律和范畴。掌握辩证方法的全部手段,使马克思能正确判定具体的经济材料。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去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形态,完成了这个概念转变为有科学根据的理论的过程,同样用唯物主义辩证法去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这种研究方法具有普遍性的有决定意义的科学根据之一。而没有辩证的方法,研究资本主义则是不可能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因为辩证法是唯一高级的也就是分析复杂现象的研究方法。在商品这个研究对象的最简单的细胞中,马克思区别了质的方面(使用价值)和量的方面(价值)。然后马克思从质和量的角度考察货币、资本和其他一切经济范畴。这些范畴的发展,它们彼此的相互转化,尤其要服从于量变和质变的互相转化的规律。所以,对这个辩证规律的认识开辟了理解现实经济过程的道路。对货币向资本的转化以及简单商品生产者向资本家的转化的分析,是量转化为质的规律发

挥作用的最光辉的范例。在分析这个过程时,马克思指出,一个生产者手里必须集中一定的最低数量的价值(货币),才能使货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而这个生产者本身就成了资本家。马克思结束分析时总结说:“在这里,也象在自然科学上一样,证明了黑格尔在他的《逻辑学》中所发现的下列规律的正确性,即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①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写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地请他注意这个情况。

后来,恩格斯举这个例子来表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和马克思唯物主义辩证法之间的区别。恩格斯写道:“黑格尔的辩证法之所以是颠倒的,是因为辩证法在黑格尔看来应当是‘思想的自我发展’,因而事物的辩证法只是它的反光。而实际上,我们头脑中的辩证法只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进行的、并服从于辩证法形式的现实发展的反映。

即使把马克思的从商品到资本的发展同黑格尔的从存在到本质的发展作一比较,您也会看到一种绝妙的对照:一方面是具体的发展,正如现实中所发生的那样;而另一方面是抽象的结构,在其中非常天才的思想以及有些地方是极其重要的转化,如质和量的互相转化,被说成一种概念向另一种概念的表面上的自我发展。”^②

马克思的全部经济学说,产生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畴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范畴的矛盾本质的分析。矛盾构成现实的每个现象发展的内部动力,因而分析矛盾就是认识发展着的现实的唯一途径,就是彻底实现历史主义原则的唯一方法。

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是从揭示商品的矛盾开始的,并以考察必然导致灭亡的整个资本主义形态的对抗性矛盾而结束;他指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3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203页。

只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才使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对抗得到解决。这样分析的结果，弄清了所有的经济范畴——劳动、商品、货币和资本等等——的两重性。

马克思不仅断定统一物分为对立的部分，而且也考察矛盾自身的发展过程：同一向差别过渡，向对立面转化，矛盾的克服。他还区分了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他指出：运动是实现矛盾的方法，矛盾的发展导致一种现象转化为另一种现象的质变。

逻辑地彻底辩证分析矛盾的方法，在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在该著作的书评中，恩格斯经典地、准确地说明了这种方法的本质：“我们采用这种方法，是从……最初的和最简单的关系出发……是从我们所遇到的最初的经济关系出发。我们来分析这种关系。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但是因为这里考察的不是只在我们头脑中发生的抽象的思想过程，而是在某个时候确实发生过或者还在发生的现实过程，因此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了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①《资本论》理论部分的整个结构也是符合马克思方法的这个特点的。

马克思彻底运用对立的统一和斗争规律，批判黑格尔的“中介”观点，调和矛盾的观点。他一直注意那个反映这一规律的现象的两方面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不可分割性。例如，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危机中，因为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533页。

经济危机中既表现出互相联系方面的统一又表现出它们的对立。

马克思彻底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总趋势，断定这一发展服从于否定的否定这一辩证法的一般规律。这一规律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和先前的社会形态的联系，另一方面和未来的共产主义形态的联系中。这一规律的作用适合于整个资本主义时代的表现，是马克思关于“剥夺剥夺者”的历史必然性的天才结论的基础。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是从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中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①。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和占有的原有的统一，达到极度破裂的地步，但生产发展的内在辩证法，必然使这种统一在社会主义所建立的更高水平上得到恢复。

自然，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性，马克思不是根据否定的否定规律得出的，而是根据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规律的具体分析得出的。但是，马克思通过纯粹实际研究作出这个结论之后，断定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服从于否定的否定规律，这一认识又使他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个全部过程的一般规律性，其中也包括未来社会的特征。在这方面马克思对这个规律的唯物主义理解和黑格尔对这个规律的唯心主义解释存在着本质差别。

否定的否定规律所起的作用也表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的许多局部过程中。资本运动的总公式 $G-W-G'$ ，已提供否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的否定的显著例子。这个规律也表现在生产从农业和工业的原始纽带开始，经过这个纽带的撕断，发展到更高级基础上新的综合中：“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原始的……纽带，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撕断了。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为一种新的更高级的综合……创造了物质前提。”^①

除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以及直接与它们有关的范畴以外，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时也充分地利用了辩证法的所有其他范畴。

461 有了对形式和内容这些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就有了区分每种经济现象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的重要方法，既能弄清每一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又能在这个范畴中揭示不只是这个历史发展阶段所固有的因素。马克思在分析经济危机的发展时，深入研究了可能性和现实性范畴，彻底考察了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复杂过程。

马克思在用心考察范畴或概念体系时面临的基本问题，是选择研究的出发点、研究的最初因素，分析这个最初因素就能弄清经济关系的复杂链条，有助于从逻辑上无懈可击地和历史上准确可靠地在理论中重现资本主义形态。

在《资本论》中，这样的出发点就是商品这个最简单的经济具体性。

但是，商品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前提，还是它的结果，作为这样的结果“每个个别的商品都表现为一定部分的资本和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②。在商品中也以隐蔽的形式充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本要素，充满了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矛盾。列宁非常深刻地和准确地形容了马克思对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1—5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120页。

的分析。他在《哲学笔记》中写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的全部科学研究方法，形成一定的体系，体系的完整性表现在从生动的直观上升到抽象的思维、从简单上升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样的方法中。

《资本论》的全部逻辑结构，在叙述研究的结果时表现出和体现出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过程。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撇开流通领域，考察了资本的生产。在第二卷中，他考察了资本的流通，把生产过程只看作是生产资本流通过程的因素。在第三卷中，⁴⁶²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考察了它的具体性。他在这卷中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并同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接近的“各种具体形式”^②。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专门地详细地分析了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概念的发展史。

在研究资本主义关系及其表现的特殊形式的深刻发展规律的过程中，马克思必须经常解决双重的任务。一方面，他把资本主义社会表面上进行的过程归结到它们的本质。这是最重要的，但只是研究的第一阶段，因为接着就应指出，这些资本主义生产的最一般的规律性在流通领域怎样变态，怎样在表面上所表现的形态不仅会隐蔽这些规律性的实质、而且也往往歪曲这个实质，造成同本质相反的假象。

对本质、现象和表象范畴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解，是马克思的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页。

方法的这一特点的基础,这首先就是要理解,虽然这些范畴也是相互联系的,但它们不是合而为一的。马克思写道:“……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

在马克思那里,由抽象到具体、由本质到现象的过程,表现为对本质以及表现它的规律的认识过程,表现为较为一般的规律在各个局部领域的许多规律中具体化的过程。例如,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生产的普遍规律,在供求规律中,在货币流通规律和其他规律中得到了发展。马克思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形式中,在调节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调节利润、地租和利息运动的各项规律以及其他规律中,揭示了剩余价值规律。这样,一系列复杂的经济关系就表现成规律的体系。作为对质的分析的最重要标志,经济规律的具体化,使他能揭示某些量和范畴之间的量的依赖性。

对于分析一般规律和它的表现的外部形式之间的矛盾来说,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发现的资本主义经济规律作用的特点, 463 这就是:“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②某一规律的绝对实现,也就是规律在每个具体场合的实现“被起反作用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缓和减弱”^③。因为马克思理解一般规律的特定的作用,分析了在某些具体场合使一般规律的作用发生变态的那些起反作用的情况和发生变态的程度,他不仅能解决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优秀思想家徒劳无益地竭力解释的那些问题,而且也能创造出研究社会机体的可靠手段,这个手段能使人们较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3页。

② 同上书,第181页。

③ 同上书,第261页。

刻地理解在生产过程中各个个人的活动同在这一活动范围内一般规律的实现之间的联系。

马克思认为,从现象“归结到”本质、从偶然形式“归结到”规律性这种过程,同从本质“引出”这个现象、从一般规律“引出”这个现象的具体形式这种相反的过程的统一,是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写道:“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 is 唯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唯一科学的方法。”^①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出色地运用了把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東西结合起来的最重要的科学原则,正如上边已经说过的那样,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里他对这一原则作了一般的表述。

问题的实质在于:对资本主义的科学的、逻辑的分析(其结果是有-定次序的经济范畴体系的建立),同这些范畴所表现的经济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的真实历史过程,究竟是什么关系?换句话说,研究任何过程的方法是否要重复它的历史的一切曲折形式,才能在理论中正确理解和重现它的现状呢?在回答这一问题时马克思指出,每个时代都存在着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体系,这个体系改变旧的生产关系因素并使它服从于自己。所以,特别是在考察资本主义时,阐述经济范畴的序列,要反映的不是这些经济范 464
畴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起决定性作用的那个次序,相反,它们的这个序列是由经济范畴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彼此所处的那些关系决定的。例如,虽然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历史上产生于工业资本以前,并对工业资本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但是要在分析工业资本以后才能对它们进行考察,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

们只是工业资本的从属要素，是工业资本的孤立的形式。

同时，逻辑分析的方法决不意味着任意构想现象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它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和理论序列形式上的反映，——修正过的反映，但这种修正是和现实历史过程本身提供的规律相适应的。

《资本论》不只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而且是对它的方法论原理本身进行深刻批判的典型，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理使它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科学分析。马克思在揭示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时，通过许多例子阐明了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方法的狭隘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陷入折中主义和表面性。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所固有的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倾向，除了他们的社会根源以外，还有他们在资产阶级世界观本身的弱点方面的认识论根源。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历史主义，是它脱离实际、敌视辩证法的最明显表现。在《资本论》第一卷跋中，马克思揭示一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这一方法论弱点的实质和阶级根源。“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它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那就只有在阶级斗争处于潜伏状态或只是在个别的现象上表现出来的时候，它还能够是科学。”^①随着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发展，造成了产生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相对抗的真正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客观前提。因此，正是马克思这位新兴阶级的理论家，成为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这决不是偶然的。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资本论》的方法论是直接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页。

立的。这一点可以从他们对经济现象的态度上看起来，他们不是阉割就是歪曲这些现象的辩证本质。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辩护理论进行了系统批判，这种理论力图否定在资产阶级社会存在着对抗矛盾。例如，针对詹姆斯·穆勒所使用的有缺陷的方法，马克思写道：“在经济关系……包含着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① 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忽视经济现象的质的方面，只限于分析量的方面，这是它的最显著的弊病之一。它不理解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的辩证法，把现象和本质混淆起来，不能领会经济规律之间的联系、不能了解具体条件下一般规律作用的矛盾过程。

甚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在解决一般规律和它的现象的具体形式之间的矛盾时，也不是努力去寻找中间环节，而是通过把具体事物直接归结为抽象事物、使具体事物直接适应抽象事物的办法。既然这样做是办不到的，那么他们或者是否定规律，或者是陷入难以解决的矛盾。价值规律和等量资本取得等量利润的规律之间的矛盾时就是如此。而只有马克思揭示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辩证法，才解决了这一矛盾。

《资本论》是马克思学说在方法论上优越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明显的例证。但是，马克思并没有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一系列使人遗憾或应该指责的谬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的分析，有助于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没有抛弃自己先辈们的遗产，而是批判地加以改造并对他们所积累的庞大实际材料作了新的理解。他写道：“只有抛开互相矛盾的教条，而去观察构成这些教条的隐蔽背景的各种互相矛盾的事实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册第91页。

实际的对抗，才能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种实证科学。”^①

《资本论》是一部具有深刻党性的著作，但这决不是事先主观地构想出研究结论，或使经验材料去适应原先编制的模式。《资本论》的党性是科学的客观性的同义词和高级形式。马克思的方法特点是：极准确地分析资本主义各阶段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不消灭矛盾，而是创造它的运动形式，使矛盾转移到新的水平，使之尖锐化，同时为用革命手段解决矛盾创造前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剥夺资本主义生产、代之以更高的社会组织形式——共产主义的结论，是根据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和规律性的科学分析进程本身有机地得出的。

《资本论》的创作，是人类思想的伟大成就。由于《资本论》问世，还在资本主义实际上开始崩溃以前，就在理论上摧毁了对资本主义牢不可破的信念。所以，《资本论》使国际工人阶级有了明确的目的，同时也使他们有了同剥削阶级雇佣奴隶制进行胜利斗争的信心。《资本论》不只是经济学著作。它对马克思主义其他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的发展，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70页。

第十一章

第一国际的创始人和领袖

467

“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①

列 宁

在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大会

1864年9月28日，在工人和民主派经常举行大会的伦敦圣马丁堂这个不大的厅堂里，举行了一次人数众多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国和法国的工人代表，还有一些无产阶级和民主派的流亡者组织的代表。这间照例悬挂着各国旗帜的朴素的大厅，在这一天晚上就成了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国际组织——国际的诞生地。

会议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决定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委托当时选出的委员会起草章程草案，提交拟于1865年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大会批准。

在圣马丁堂会议的所有参加者当中，正象恩格斯后来所写的，“只有一个人清楚地懂得正在发生什么和应该建立什么；他就是早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在 1848 年就向世界发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号召的人”^①。马克思对这个新组织的性质的看法同会议的其他参加者的设想有本质的不同。例如，伦敦的工人领袖们力图使这个组织成为调整工资、缩短工作日和配合罢工斗争的国际性工联组织。巴黎的代表们幻想通过这种组织能建立阶级“和谐”，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无息贷款来奖励合作制。只有格奥尔格·埃卡留斯的发言（他代表德国工人向大会致贺词，在会议前夕曾同马克思讨论过自己的发言），代表了有觉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呼声，认为无产阶级的这个国际主义组织是反对现存的剥削制度的手段。

马克思这时已经感到有可能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组织，这个组织，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②。

由于各国工人对国际主义团结的自发愿望而产生的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在无产阶级革命解放斗争史上起了杰出的作用。

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国际的最初一批纲领性的文件出自马克思的手笔，这对国际的命运具有极重要的意义。9 月 28 日，马克思被选入领导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委员会，以后又称为总委员会，并以这个名称载入史册），过了些时候他才知道他还被选入拟定临时（到代表大会批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39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8—39 页。

以前)章程和纲领草案的小委员会。这时委员会已经在讨论由欧文主义者约·韦斯顿草拟的一份冗长的原则宣言和由马志尼的拥护者鲁伊治·沃尔弗提出的章程草案。年轻的法国人维克多·勒·吕贝负责把这两份文件合并在一起。埃卡留斯在10月12日写信告诉马克思,并要求马克思过问这件事:“在欧洲工人组织的头生儿身上,你一定要打上你的言简意赅的烙印。”^①

但是马克思到10月18日才出席会议,会上正在讨论勒·吕贝拟就的方案。他在11月4日写信告诉恩格斯:“……我就出席了会议,当我听到好心的勒·吕贝宣读妄想当作原则宣言的一个空话连篇、写得很坏而且极不成熟的引言时,我的确吃了一惊,引言到处都带有马志尼的色彩,而且披着法国社会主义的轮廓不清的破烂外衣。”^②马克思对这个文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后,勒·吕贝的方案被退回小委员会去做彻底修订。

马志尼及其同伙企图把他们的纲领强加给国际工人协会,这说明怀有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情绪的资产阶级总想利用工人运动的高涨来实现其政治目的。总委员会中有不少意大利流亡者,马志尼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还享有威望。这就使马克思的处境十分困难,当时在总委员中除了埃卡留斯,还没有人拥护他,尽管他已被承认为献身工人阶级事业的革命家。

10月20日在马克思家里举行小委员会的例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英国工联主义者克里默、勒·吕贝、意大利人方塔纳。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开始逐段讨论章程,但是直到深夜一点钟,才通过了四十条中的第一条。克里默在其他与会者的支持下,主张总委员延期到11月1日来批准这个纲领性文件,先由小委员会在10月

① 埃卡留斯 1864 年 10 月 12 日给马克思的信(参看《第一国际的建立》1963 年三联书店版第 47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15 页。

27日做初步的审定，而这正合马克思的心意。在这段期间，所有的文件都留给马克思作最后加工。

马克思彻底改写了章程，重写了全部引言，重新制定了组织原则，把马志尼式草案的毫无意义的条款全部删掉。在以前的草案中实际上只保留了组织名称和1865年在布鲁塞尔召开全协会代表大会这一条。此外，马克思还写了一份不在原计划之内的文件——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

马克思的建议被小委员会接受了。11月1日，总委员会一致批准了他所起草的文件。于是，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纲领强加给这个新组织的企图遭到了失败；从一开始这个组织就具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质。

马克思在国际的最早一批文件中只是一般地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目的和方法，这样，当时工人运动各种派别的代表才能接受。要使一个组织具有群众性，它的纲领必须是既不排斥英国工联主义者，也不拒绝法国和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德国的拉萨尔分子。马克思非常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复杂的任务。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要把我们的观点用目前水平的工人运动所能接受的形式表达出来，那是很困难的事……重新觉醒的运动要做到使人们能象过去那样勇敢地讲话，还需要一段时间。”^①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成立宣言的特点是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他预见到，经过国际队伍内部共同行动和交流经验，工人总会承认这个以科学共产主义原则为基础的统一理论性纲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的通过，是这些原则将来取得胜利的重要前提。

在马克思起草的文件中，临时章程的引言部分特别重要，它阐述了无产阶级运动基本的纲领性原理。这个文件的第一句话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页。

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①无产阶级的斗争目的就是要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对统治阶级进行政治斗争是劳动者摆脱资本主义制度——它的基础是劳动者在经济上依赖于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压迫的手段。对工人运动来说，迫切需要的是阶级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恩格斯认为，成立宣言是对这个纲领的一种“具有约束性的 471 解释”^②。宣言一开始就回顾了从 1848 年到 1864 年工人阶级的命运。马克思愤怒地指出，恰好在工业发展上是史无前例的、“自由贸易的黄金时期”，欧洲无产阶级却越来越贫困。他写道：“不论是机器的改进，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交通工具的改良，新的殖民地的开辟，向外移民，扩大市场，自由贸易，或者是所有这一切加在一起，都不能消除劳动群众的贫困；在现代这种邪恶的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任何新的发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加深社会对比和加强社会对抗。”^③

马克思指出了工人运动在这段时期所取得的成就：争得了十小时工作日，开展了合作运动。如果说，对工作日的立法限制从原则上驳倒了自由资产阶级关于国家不应干涉经济关系的教条，那么，合作制的成就证明了工人在没有资本家参加的条件下完全能够组织生产。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合作制不能显著地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马克思写道，要解放劳动群众，合作劳动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发展，因而也必须依靠全国的财力。这是土地巨头和资本巨头所反对的，他们“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于是马克思引导工人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他指出，工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1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50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30 页。

已经具备了作为成功因素之一的人数，他接着又说：“……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①

成立宣言深刻地论证了关于工人阶级国际团结的思想。“过去的经验证明：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忽视那应该鼓励他们在解放斗争中坚定地并肩作战的兄弟团结，就会使他们受到惩罚，——使他们分散的努力遭到共同的失败。”^② 马克思号召工人反对统治阶级的那种利用民族偏见并在掠夺战争中洒流人民鲜血和浪费人民财富的罪恶的对外政策。他强调指出，针对这种政策，工人阶级在国际问题上应该坚持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阶级立场。

宣言的最后一句豪言壮语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六年前发出的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在临时章程所反映的国际工人协会机构中，一开始就既贯彻了民主制的原则——总委员会负责人（书记、财务委员、各国通讯书记等）由选举产生，又贯彻了集中制的原则——明确规定协会领导机构（代表大会、总委员会、各国的联合会委员会）享有全权。

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

协会的活动首先是由它的中央领导机构决定的。因此，具有重大意义的是马克思在正式执行德国通讯书记职务时，很快就在总委员会中起了领导作用。最初，总委员会的成员是十分复杂的。马克思坚决捍卫国际的阶级性质，努力把总委员会变成一个有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3—134页。

② 同上书，第134页。

望的战斗机关，一开始就竭力巩固它的无产阶级的核心。参加总委员会的有原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列斯纳、罗赫纳、普芬德、考布。理解并支持马克思的有六月起义的参加者、乐器匠欧仁·杜邦（1865年春任法国通讯书记），钟表匠海尔曼·荣克（瑞士通讯书记）。到1865年春，总委员会几乎已经完全成为欧洲无产阶级运动各支队伍的代表。它的委员们每逢星期二在希腊街18号的一间小房间里举行会议。

被指定起草纲领性文件的小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仍然作为比较精悍的执行机关继续工作，为总委员会的会议准备材料，并处理亟待解决的日常事务。马克思总要参加小委员会每周一次的会议，会议经常在星期六举行。他有时也把自己的工作室让出来开会。于是总委员会的几乎所有的委员和到伦敦来办理国际事务的许多外国工人，很快就都认识了梅特兰公园路莫丹那别墅1号这所马克思全家从1864年3月迁入一直居住了十一年的房屋。马克思⁴⁷³的住宅就越来越象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战斗司令部了。

国际所以取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马克思善于正确地规定当时的任务，及时地提出能保证总委员会得到各地方支部的广泛支持的口号。要具有这种本领，不仅需要深刻理解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需要十分熟悉工人斗争的具体形式、工人的思想水平以及国际无产阶级队伍中每个民族的特点。

工人报刊和社会主义报刊，国际的地方代表大会和国际代表大会的报告，与工人活动家、总委员会委员的经常接触，各地寄给总委员会的大量信件，同德国、法国、瑞士、比利时、美国战友们的私人通信，——这都是马克思在战略上和策略上进行总结的材料来源。他密切注视全世界的工人运动。当工人出于真实的阶级本能提出一些要求，而这些要求又大都符合他在理论研究中所得出的结论，这时他就特别高兴。

马克思非常注意倾听群众的呼声。但是对落后的情绪他也绝不迁就。马克思根据对总的情况的冷静分析，为国际工人协会制定了路线，这条路线首先是为了加强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运动。马克思帮助工人从提出局部的、地方性的要求提高到认识共同的阶级任务，并始终不渝地努力推动无产阶级运动向前发展。

不管是工人阶级哪一支队伍获得新成就，在国际中就成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财产。马克思考虑到未来的运动，竭力把实际斗争中所获得的每一项重大成就都写进纲领性的文件。从这个意义说，国际的历史发展，也就是坚持不懈地制定国际无产阶级的战斗纲领的过程，也就是在纲领中逐步确立马克思主义原则的过程。这也是国际内部各派之间的斗争（它反映了欧洲和美洲工人阶级怎样克服空想主义和宗派主义观点）的意义所在。

474 1871年，马克思在回顾七年来所经过的道路时写道：“国际的历史就是**总委员会**对那些力图在国际内部巩固起来以抗拒真正工人运动的各个宗派和各种浅薄尝试所进行的**不断的斗争**。”①

各种宗派的信徒所提出的教条和“包医百病”的药方，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了无产阶级一定阶层的生活经验，反映了每个国家的特殊条件。但是，既然把这种有限的经验绝对化，由此产生的一些观念就带有主观的、反科学的性质，这些观念就会折中主义地结合起来，成为一种偶然的、矛盾的东西。宗派认为，它的存在的意义不在于它自己和阶级运动有共同之处，而在于它有把自己同总的运动区别开来的“**特殊的护符**”②。

当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种变种（蒲鲁东主义者，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各种派别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各有其特点，但却有共同之处：它们不仅反映了劳动者对资本主义剥削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395页。

② 同上书，第371页。

抗议,而且也反映了小生产者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集中趋势的抗议,反映了小生产者想制止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的愿望。

自由派工联主义却采取另一种立场。与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不同,它的代表人物承认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进步性质。但是其中许多人却跟着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辩护士,对资本主义顶礼膜拜,相信它的基础不可动摇,认为工人运动的唯一目标,只是对资产阶级制度稍加修补和“改善”。自由派工联主义者变成了死心塌地的改良主义者。

马克思认为,工人运动中存在改良主义和宗派主义派别,这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对无产阶级某些阶层影响的结果,也是他们落后的表现,他相信在阶级斗争发展的进程中,这个阶段将必然会被克服。但是马克思认为绝不能袖手旁观坐等这一过程的实现。所以马克思理解到,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任务就是积极促使阶级意识的不断提高,用各种形式进行思想影响,同时还要结合细致的教育工作,热情支持工人的首创精神。“马克思把各国工人运动⁴⁷⁵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蒲鲁东、巴枯宁、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右倾分子等等)纳入一致行动的轨道,反对所有这些宗派和学派的理论,从而为各国工人阶级锻造出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①

走向群众的道路

为了使国际从一开始就具有群众性质,总委员会必须同各国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工人代表建立各种联系。西欧各国的罢工运动使工人阶级的积极分子涌现出来。马克思立刻注意到正在形成的无产阶级大军的这支具有战斗力的后备队。根据他的倡议，总委员成了从精神和物质上支持罢工斗争的组织者。总委员会的任务是揭露企业主从国外大量召募工人来代替罢工者的行为。马克思认为，反对这种行为的斗争能促使各国工人认识他们利益的一致，能培养他们阶级团结的精神。

在1865年4月25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宣读了柏林印刷工人协会寄来的一封信。该协会的领导者报道了五百名莱比锡排字工人的罢工，要求给以援助。信中写道：“工人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罢工都具有国际意义，因为工人们争取实现局部的和地方性的目的，实际上也是为整个阶级的事业而战斗……”^①总委员会决定，要求伦敦排字工人工联给以支援。马克思参加了访问这个工联的代表团。从此，经常不断地组织对罢工斗争的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援就成了总委员会和整个协会的实际工作了。

在国际内部，对罢工的态度并不是一开始就正确的。法国、瑞士、比利时的蒲鲁东主义者以及德国的拉萨尔分子，对罢工斗争采取宗派主义的否定态度。尽管英国工人运动在组织罢工方面有丰富的经验，总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员也不是全都积极支持罢工的，⁴⁷⁶木匠韦斯顿这个欧文空想主义学说的信徒尤其反对罢工。他一再在《蜂房报》上发表这方面的意见。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他总想证明：要求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是毫无意义的；工联领导无产阶级进行经济斗争，实际上是有害无益的，因为提高工资的后果必然是消费品价格的普遍上涨。

在批驳这种观点的斗争中，可以清楚地看到马克思的经济学

^① 1865年4月29日《蜂房报》第185号。

方面的研究对制定正确的阶级斗争策略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因此必须用新的经济学说的论据揭穿商品价格取决于工资水平的这种虚假的理论，这种理论削弱工人阶级的士气，诱使工人阶级安于现状。马克思认为，恰恰相反，国际应当尽力支持受“罢工疫”^①传染的工人。

马克思在1865年6月20日和27日总委员会的两次会议上做了专题报告，批判了韦斯顿的观点，同时也阐述了价值、价格和工资理论的科学原理。这个报告自从1898年以《工资、价格和利润》为题第一次发表以来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报告的主要部分通俗地阐述了以后《资本论》第一卷中的重要原理。

马克思用简单易懂的语言阐明了利润是从资本家无偿获取的剩余价值中产生的。他认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都是新创造的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可以在价值不变的范围内改变。工资可以靠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的减少来提高，反之亦然。这种比例关系也受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影响。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总的趋势是不断降低工资的平均水平，工人们仍然可以提高工资。一个国家的一般生活条件对于工人阶级的斗争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工人阶级既不应该追随那些支持韦斯顿观点的人，对日常经济斗争的力量估计不足，也不应该象英国工联领袖 477 那样，对这种力量估计过高。只有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才能根本解决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问题。因此，工会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是反抗资本侵害工人生活水平和权利的一个中心，而且在于它是培养工人同资本主义进行决战的学校。

马克思的报告获得了巨大的效果。总委员会在以后的活动中就遵循报告中所提出的理论原理和策略原理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4页。

为了加强国际工人协会，首先要吸收英国工联参加国际的队伍，因为它是宪章派全国协会解散以后英国无产阶级的唯一群众性的组织。马克思经过二十多年来对英国工人运动发展的观察，对奥哲尔、克里默和其他工联主义者这些改良主义领袖们的思想水平不抱任何幻想；但是马克思考虑到在他们的下面还有成千上万的工联成员，因此同他们在事务上保持紧密的联系。然而从一开始就同他们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

1864年11月22日，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号召英国工人团体和工联集体加入国际。伦敦及其郊区的各个组织均有权派代表一名参加总委员会。这些密切联系工人群众的新委员在许多事情上都支持马克思反对工联领袖们的改良主义。

马克思主张派总委员会委员参加工人的会议，宣传国际的思想，这种做法一直坚持到国际停止活动。委派这种代表团和听取它们的报告，很快就成为总委员会的工作的组成部分。马克思本人就经常是代表之一。在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中，一度担任总委员会书记的彩画匠罗伯特·肖，在宣传和组织能力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关于这位因患肺结核症不幸早逝的英国工人阶级的杰出的儿子，马克思在1870年写道：“**工联**所以能够团结在我们的周围，主要是由于他的不间断的努力。”^①

马克思认为，吸收工联参加直接的政治斗争具有重大的意义。
478 他热情地支持克里默，因为克里默在1865年1月建议总委员会参加资产阶级激进派发起的声势浩大的选举法改革运动。马克思明确地阐述了可以同激进资产阶级采取共同行动的条件。他认为，工人参加一般的民主运动，可以为在英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独立政党准备条件，同时对大陆上的革命的工人运动和民主运动也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44页。

产生深远的影响。1865年5月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如果英国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能够用这种方式重新活跃起来，那末我们的协会可以不声不响地为欧洲工人阶级做出来的事情，就会比用其他任何方式做出来的要多。”^①

根据总委员会的倡议和马克思设想的计划于1865年3月建立的改革同盟，对英国的政治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影响。成千上万的工人加入了同盟。争取选举改革的民主运动，一开始就具有广泛的规模。但是，同盟领导层中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即工联领袖，在紧要关头受了激进派的操纵，使这个组织不能执行总委员会的路线。

马克思还竭力利用一些对外政策问题来培养英国工人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1864年11月29日马克思受总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致林肯的公开信，祝贺他再度当选美国总统。信中充满热情的词句，表达了国际无产阶级对美国进步力量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的态度。

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以前，法国一批受到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学说强烈影响的工人，在1863年就提出了自己的工人候选人参加立法团的选举，马克思对这件事给予肯定的评价。这批工人的代表——托伦、弗里布尔、利穆津，被批准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通讯员。马克思立即把他们的巴黎通讯地址记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并通过在法国的朋友德国流亡者维克多·席利，给他 479 们寄去了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

这时，在巴黎格拉维埃街44号的一个朴素的建筑物的后院（雕刻工弗里布尔的作坊）里，国际在法国的第一个支部开始活动了。由伦敦批准的三名通讯员组成的理事会是这个支部的领导。理事会已经翻印了临时章程的法译文。但是，在第一段中就把作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13页。

无产阶级解放斗争最终目的的“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这些字删去了，而在第三段“因而工人阶级的经济解放是一切政治运动都应该作为手段服从于它的伟大目标”中，又把“作为手段”这几个字删去了。

马克思立刻注意到这种不准确的译文用蒲鲁东的思想歪曲了这份重要文件的精神。由此可见，蒲鲁东主义者根本不懂政治斗争的意义。当总委员会追问此事时，理事会却借口说什么必须考虑到第二帝国的警察制度所造成的一定的困难。

章程法译本的政治倾向，也被一批资产阶级共和派注意到了，他们曾经支持建立国际协会，但力图使它屈从于自己的影响。章程的被歪曲的译文，使资产阶级共和派可以借口指责托伦有意识放弃反对波拿巴帝国的政治斗争。在伦敦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代表们也随声附和。

巴黎支部的领导人要求总委员会给以支持，总委员会不得不第一次充当地方组织内部事务的仲裁人。这就需要马克思的高度原则性和全部组织经验，才能够使这场冲突得到顺利解决。威胁着组织的国际性和阶级性的那些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终于被挫败了。通过专门派往巴黎的席利和杜邦的活动，马克思让巴黎支部成员在1865年4月26日举行全体会议，改组了支部的领导。工人团体的代表参加了理事会促进委员会，其中有青铜匠泽菲兰·卡梅利纳，装订工人欧仁·瓦尔兰（他们都是后来的公社社员），后者已是法国工人的杰出的组织者。

480 比利时民主主义者莱昂·封丹被任命为国际工人协会在比利时的全权代表。但是他脱离无产阶级群众，妨碍总委员会同比利时工人建立联系。1865年春马克思临时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时，发现了这个情况。在比利时也象在其他地方一样，国际支部一开始活动，资产阶级分子就企图操纵这个无产阶级的组织。马克思回

击了这些企图，并同社会主义者塞扎尔·德·巴普所领导的比利时的工人代表直接通信。

德国通讯书记

为了吸引德国工人参加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花费了不少精力。从一开始他就遇到了许多困难，一方面，因为当时法律禁止德国工人团体参加国外的组织，另一方面，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拉萨尔派的领导又采取了宗派主义的立场。马克思认为，只要联合会的领导有所改变，就可以对联合会进行改组，使它摆脱拉萨尔教条的有害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不断地努力争取它参加国际。他在总委员会的会议上多次提到这个问题，并且写信同李卜克内西、济贝耳以及他在德国的其他拥护者谈论这个问题。

为了在德国宣传国际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这是拉萨尔的信徒、法兰克福的律师约·巴·施韦泽于1864年12月15日在柏林发行的报纸。马克思认为，该报的办报纲领中没有典型的拉萨尔的口号总算还好。由于李卜克内西参加了该报编辑部，正确的办报方针看来有了一定的保障。

最初，马克思把成立宣言的德文本寄给《社会民主党人报》。1864年12月底和1865年1月3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2号和第3号发表了宣言，于是马克思高兴地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报告了这项对国际说来是重要的消息。

1865年1月，蒲鲁东去世，由于施韦泽的坚决要求，马克思不得已写了一篇关于蒲鲁东的文章。

马克思巧妙地勾画了蒲鲁东的肖像，叙述了他的世界观和活动的特点，科学地、客观地指出这个思想上的敌人的功劳，以及他

481 的观点中的错误。《论蒲鲁东》这篇文章是对改良主义和宗派主义各种变种的联合进攻的光辉典范。马克思勾画了使蒲鲁东同其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首先是同拉萨尔相似的一些共同特点，尽管文章中并没提后者的名字。不会运用辩证方法，不懂历史唯物主义，对政治经济学一窍不通，用形而上学的范畴代替历史范畴，这些都是蒲鲁东的方法论上的毛病，这些毛病拉萨尔也都有。马克思指出，喜欢在科学上招摇撞骗的人，在政治上也是不坚定的、无原则的，这种人渴望虚荣，追求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①。马克思在文章中对蒲鲁东巴结波拿巴制度的批判，也就是直接谴责拉萨尔及其追随者向普鲁士统治集团献媚。马克思就是这样在拉萨尔派的报纸上十分明确地斥责了拉萨尔。

当马克思撰写论蒲鲁东这篇论文时，已经从李卜克内西那里知道拉萨尔在死前不久曾经同俾斯麦签订了协定。这件事也暴露了施韦泽的态度。显然，施韦泽不仅知道拉萨尔同俾斯麦的秘密谈判，而且他本人也同普鲁士当局有勾搭。当马克思公开要求施韦泽避免工人政党向俾斯麦作任何表面上的献媚，他的答复是请求考虑他的报纸的困难处境，必须首先站稳脚跟^②，而他本人这时仍在继续刊载一组论文《俾斯麦内阁》，吹捧普鲁士的政策。

1865年初，普鲁士议会根据进步党人的要求，讨论了修改阻碍工业发展的1845年的《工商业条例》。柏林工人开展了运动，首先要求废除条例中那些禁止联合和罢工的条文。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次运动很有意义。但是施韦泽不听他们的建议，对争取联合权的运动并不重视，认为应当大力宣传由国家帮助生产合作社。马克思在1865年2月13日给施韦泽的信中再一次严厉批评了这种改良主义的“灵丹妙药”。他写道：“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7页。

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但是工人政党的荣誉要求它自己甚至在幻想被经验驳倒以前，就抛弃这种空中楼阁。工人阶级要不是革命的，就什么也不是。”^①

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中，宣布不再为该报撰稿。这篇声明表明，决裂是由政治上的根本分歧造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要求“至少要象反对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内阁和封建专制政党”，可是报纸编辑部仍然按照“普鲁士王国政府的社会主义”的精神行事。^②

先进的德国工人对这篇声明反映很强烈，他们的许多组织，包括柏林印刷工人协会，都对声明表示支持。李卜克内西和其他一些编辑也同拉萨尔派的机关报断绝了关系。

必须广泛开展对拉萨尔派的政治立场的批判。1865年1月，马克思在曼彻斯特要求恩格斯就俾斯麦的军队改革方案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写一篇文章。这篇在2月初写完的文章超过了报纸文章的篇幅，而这时同施韦泽的决裂已在所难免，于是他们就决定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表这篇文章，标题是《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这本小册子精确地分析了德国各阶级力量的对比。恩格斯论证了建立一个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性，并且制定了工人政党在普鲁士的宪制冲突尚未解决的条件下的策略。与拉萨尔派针锋相对，恩格斯认为不仅要无情地批判资产阶级进步党的不彻底性和怯懦，而且要同军事官僚的君主制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戳穿俾斯麦的社会蛊惑宣传。马克思十分称赞恩格斯的这本小册子，还为一些德文报纸写了关于这本小册子的短评。

同《社会民主党人报》断绝关系，说明马克思这时已经放弃争取全德工人联合会加入国际的打算了。但是他还想方设法使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50—4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

际同德国工人运动保持牢固的联系。马克思根据德国的局势，于1865年初给德国工人提出个人入会的组织形式，使个别人在表面上不违背现行法律的情况下可以加入国际。这个策略证明是正确的，它促进并巩固了德国无产阶级同国际的联系。但是这个策略必须经过相当一段时间才能收到显著的效果。

波 兰 问 题

马克思在从事国际工人协会工作的最初几个月，花了不少精力来论证无产阶级对波兰问题的国际主义立场，这个问题在当时所有的国际问题中，是民主派和无产阶级最为关注的。马克思仍然非常重视波兰的民族解放运动，认为这是工人阶级必须尽力支持的一支革命力量。同时他也认为，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观点，即1863年在伦敦成立的波兰独立全国同盟领导人的观点，必须在这个问题上坚持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立场。这个同盟的许多成员（福克斯、德尔、哈特威耳）参加了国际的总委员会。从1864年12月至1865年1月，马克思就致波兰人的公开信的讨论做了几次发言，这封公开信是由一个参加工人运动的激进派政论家彼得·福克斯以总委员会英国委员的名义起草的。福克斯热情拥护恢复波兰的民族主权，但是又同其他许多英国激进派一样抱有亲法情绪，他力图证明法国历届政府的对外政策都是庇护波兰的。

为了反驳福克斯的论点，马克思举出了大量实际材料，有时还利用了他在1863年春开始写但没有写完的关于波兰史的手稿。他先向常务委员会委员，然后在总委员会上把“法国人不断背弃波兰人的历史上无可争辩的情景，从路易十五起直到第二个波拿巴止，

作了详尽的描绘”^①。他的思想表达得十分明确：波兰在西方的真正朋友不是统治集团，而是工人。

马克思积极参加1863年波兰起义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纪念大会于1865年3月1日举行。会上一致通过了以总委员会名义提出的决议，决议宣称“完整而独立的波兰是民主欧洲存在的必要条件”^②。埃卡留斯发言支持这项决议，他认为必须消灭普鲁士君主政体，因为它是恢复波兰和民主统一德国的主要障碍。484

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在报道这次纪念大会时，根本不提国际参加了大会。于是马克思就在瑞士的一家德文报纸《白鹰报》上发表了相应的《更正》。他希望用这种方法使德国工人能够知道国际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他十分强调埃卡留斯演说的意义，从而公开表明国际是反对普鲁士政府，反对拉萨尔派向俾斯麦献媚的。

在扎耳特博默耳休息

国际的领导工作和大量的理论工作，要求马克思付出真正超人的精力。他必须为许多大大小小的组织方面的事务而操心：同工人活动家会见和通讯，出席各种会议，准备决议和发言，给战友发指示，等等。1865年春天，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除写书以外，国际协会也占去了我的许多时间，因为实际上我是它的首脑。时间的损失多么巨大！……例如法国人的纠纷：

2月28日。托伦和弗里布尔从巴黎来了。中央委员会开了会，他们在会上作解释并同勒·吕贝争辩到夜里十二点。之后在博勒特酒馆有一个夜间会议，在那里我又在大约两百张会员证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06页。

签了名。(我现在已经改变了这种笨方法,即把我们的签名在制锌版时就加上去……但是还有一千张会员证,是过去印的,因此只好照旧签名。)

3月1日。波兰大会。

3月4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人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6日。小委员会开会讨论同上问题,到夜里一点钟。

3月7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开到夜里十二点钟。”^①

过度疲劳的马克思,由于严重的慢性病复发,决定稍事休息,暂时换换环境。从1865年3月19日到4月8日,他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荷兰亲戚家里住了三个星期。这所古老的市民住宅是安静舒适的。但是这位不知疲倦的战士的思想就是在这里,在休息时
485 仍然无时不在关心重大的政治问题。马克思的表舅、荷兰商人莱昂·菲力浦斯是一个眼界开阔的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他同马克思坦率地讨论美国内战的结局,德国统一的前景,波兰问题和意大利问题。老菲力浦斯对工人运动的看法是有保留的,但是他从来不认为自己的外甥是胡作非为的人,反而承认马克思肩负的任务艰巨,责任重大。

休息三个星期,对马克思有良好的疗效。特别是同表妹南尼达在一起,使他在扎耳特博默耳的逗留更为愉快,他同南尼达早就建立了无拘无束的友好关系。他开玩笑地把对方称为总委员会的“荷兰书记”。

在马克思这段短暂的“无忧无虑的”时期,还有一件十分有趣的纪念品。这就是《自白》,是他1865年4月1日写在一张戏谑性问题单上的答案,这种问题单是他近几年来应女儿们的要求不止一次填写过的。除了在扎耳特博默耳写的这个文本,还有两个文本,都是大同小异的。这份《自白》,既诙谐又严肃,表现了马克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02页。

本人的性格和真正的人道主义。请看其中的几个问题和答案：

您喜爱的优点：……………纯朴。

您的特点：……………目标始终如一。

您厌恶的缺点：……………逢迎。

您能原谅的缺点：……………轻信。

您对幸福的理解：……………斗争。

您不幸的理解：……………屈服。

您喜爱的英雄：……………斯巴达克、刻卜勒。

您喜爱的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马克思还没有回到伦敦，一份关于《资本论》的出版合同就从汉堡寄来了。急待解决的国际的工作也积压了不少。紧张艰巨的日子又来了。

在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上

486

国际临时章程曾预定1865年在比利时召开全协会工人代表大会。但是后来马克思认为为时过早，因为各地的支部在组织上和思想上都还没有巩固。1865年6月24日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谈到代表大会时写道：“事情还没有成熟……”恩格斯也支持这个意见^①。

然而在法国和瑞士的一些国际成员却对这次代表大会迫不及待。巴黎支部的领导人指望这样一来就可以承认蒲鲁东主义是协会的正式学说了。1865年7月7日，他们抢在总委员会前面发出呼吁，提出他们拟定的代表大会的议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8、142—143页。

这时，马克思已经说服总委员会先在伦敦召开主要支部领导人的代表会议，以便筹备代表大会。1865年7月25日，总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马克思起草的未来代表大会的议程草案。马克思在议程中也吸收了巴黎人提出的建议，但是在措辞上把它改得更符合国际所面临的实际任务。

马克思非常希望德国工人的代表尤其是李卜克内西能出席代表会议。但是李卜克内西没能出席，他给代表会议寄去一份关于德国工人运动的详细报告。马克思从原则上就反对吹捧领导人，为此还批评过拉萨尔派。他认为李卜克内西过分夸大了他在德国工人阶级解放斗争中的作用。1865年11月21日，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至于你的报告，我没有向代表会议宣读，因为关于我个人在其中谈得太多了。”^①

代表会议于1865年9月25—29日举行。参加在朗-爱克街的“共济会饭店”举行的上午会议的，有来自大陆的代表、常务委员会的委员。在滨河路阿德菲坊举行的下午会议更为隆重，并向公众开放；出席这些会议的除了各地的代表，还有一些客人。马克思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全部上下午的会议，结识与会者，同他们进行长时间的谈话。1865年9月28日，在圣马丁堂隆重举行了庆祝国际成立一周年的大会，会后举行了有代表的家属参加的茶会。当瓦尔兰和利穆津同马克思的女儿劳拉和燕妮跳舞的时候，马克思向托伦和弗里布尔谈到了他同蒲鲁东意见分歧的原因。10月1日，代表会议的一些代表贝克尔、荣克、德·巴普等人，在马克思家里吃了午饭。

伦敦代表会议是马克思为创建国际而斗争的重要阶段。它大大地巩固了总委员会的领导作用，提高了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90页。

威望，促进了总委员会最积极的委员埃卡留斯、列斯纳、杜邦、荣克同大陆的代表瓦尔兰、德·巴普、贝克尔的联系。马克思在起草代表大会议程草案时利用巴黎支部的建议，这个方式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的这个草案，作为马克思同弗里布尔的联合提案，在代表会议上进行了讨论，并受到一致的赞同。

代表会议拒绝了法国人提出的任何工人都能参加代表大会的要求，坚决主张严格遵守选派代表的原则。会议决定：只有持有正式成立的并交纳会费的支部的委托书的代表，才能参加代表大会。

代表会议关于波兰问题的讨论，表明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特别是德国人和英国人，支持马克思的方针，即工人阶级必须声援波兰的独立斗争。但是几乎所有的法国代表都反对把波兰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议程。这些巴黎的蒲鲁东主义者，硬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不应列入“经济的”工人代表大会的纲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也谴责总委员会坚持“民族原则”，跟着波拿巴派走。

鉴于蒲鲁东主义者对民族问题的虚无主义态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拿破仑第三蛊惑人心地利用民族问题的抗议，马克思坚决要求恩格斯在报刊上阐述波兰问题。恩格斯同意这个要求，写了一组题为《工人阶级同波兰有什么关系？》的文章^①，指出波拿巴主义者的“民族原则”同无产阶级承认民族自决权，是根本对立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在国际的活动中，多次论证了关于波兰⁴⁸⁸问题的国际主义立场。1867年1月22日，在总委员会和波兰革命流亡者为纪念1863年波兰起义在伦敦剑桥大厅联合举行的大会上，马克思发表了维护被压迫的波兰的热情演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70—183页。

国际的支部在德国的建立。

普奥战争和德国工人阶级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不懈地宣传国际的原则,1865—1866年冬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开始见了成效。秘密活动的协会支部在德国各城市建立起来了。首先建立支部的是一些保持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传统和对拉萨尔派领导人抱反对情绪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会员。这些支部进行活动时经常以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教育团体、互助会以及其他当局许可的合法组织作为掩护。这些支部虽然人数不多,但是促进了国际的思想在德国的传播,使德国工人阶级能参加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行动。

同时,在自由派1863年创立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内部的革命力量团结起来了。该联合会逐渐摆脱自由派的约束,摆脱舒尔采-德里奇的合作社思想的影响,越来越靠拢国际。年轻的施工奥古斯特·倍倍尔是这种革命无产阶级倾向的最有才干的体现者之一,在他的主持下,萨克森的二十九个工人协会于1865年7月合并了。倍倍尔参加了联合会的理事会,对联合会积极施加影响。

马克思的学生李卜克内西同倍倍尔的紧密合作,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李卜克内西在1865年4月被驱逐出柏林并在德国到处流浪,后来住在莱比锡。1865年8月,他认识了倍倍尔,并帮助倍倍尔掌握马克思主义。尽管年龄悬殊——李卜克内西已经三十九岁,倍倍尔才二十五岁——却一直合作了许多年。他们一个是1848年革命的宿将,一个是已经赢得组织者和无产阶级演说家威望的年轻工人。他们都明白,德国工人的当

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

1866年夏，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处在战争边缘的德国，⁴³⁹他们想帮助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的一翼经受住这场军事冲突的考验。俾斯麦正在准备用武力来解决普鲁士和奥地利为在德国称霸的多年争端。广大群众的反普鲁士情绪和对战争的担忧，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分子的积极活动。因此，俾斯麦认为必须造成一种防御战争的假象，他千方百计地挑动奥地利进攻。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与他们有联系的德国无产阶级活动家认为，只有用革命的方法统一德国，才能解决危机。1866年春，德国开展了群众运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联合会在这次运动中起了主导作用。倍倍尔在莱比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提出一项决议案，阐述了无产阶级——即将来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的战斗要求。关于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这一要求，也受到国际德国人支部的日内瓦委员会的支持，该委员会是国际著名的活动家约·菲·贝克尔于1866年1月在瑞士建立的。

6月中，普奥战争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估计奥地利军队将迅速推进，希望普鲁士的军事失败将导致民主革命。但是局势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由于俾斯麦实行了军事改革，普鲁士的军队比奥地利的军队更强大，奥地利的军队在萨多瓦遭到惨败。普鲁士的胜利产生了深远的后果。德意志联邦瓦解了，奥地利在解决德国全国统一的问题上也失去了发言权。普鲁士兼并了一系列德意志小邦，建立了以普鲁士君主国为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实际上就控制了整个德国。军事上的胜利也结束了普鲁士本身的宪制冲突，普鲁士的自由资产阶级沉醉于沙文主义，完全向俾斯麦屈服了。德国“自上而下地”，以最坏的方式实现了统一。普鲁士的军阀和容克地主在德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在欧洲的中心，除了波拿巴法国之外，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军事冒险的温床。

另一方面，不能不看到德国政治上的分裂状态给工人运动造成的许多障碍已经被排除了。马克思写道：“使资产阶级集中起来的一切，对工人来说当然都是有利的。”^①但是，同无条件地支持俾斯麦的施韦泽以及其他拉萨尔派首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成立北德意志联邦只不过是今后同更强大的敌人进行更激烈的革命斗争准备了基地。恩格斯指出，德国工人及其领袖所面临的刻不容缓的任务就是尽可能利用现在已经出现的可能性，“把德国无产阶级在全国范围内组织起来和团结起来”^②，建立德国工人的独立的政党。

国际无产阶级经济斗争的纲领

随着国际在各国的壮大，马克思的活动范围扩大了，他所担负的国际的工作也日益繁重。这时，马克思又象在起草第一批国际的纲领性文件时那样，不得不对付种种想把国际变成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组织的企图。

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一翼的反对者麇集在 1865 年秋成立的伦敦的法国人支部。为首的是法国政论家比埃尔·韦济尼埃，此人同一伙马志尼派的流亡者有密切联系，并在报刊上攻击总委员会。法国人支部发表了一份新的国际章程草案，规定取消总委员会，用纯技术性的秘书处来代替它。这只不过是把马克思从国际的领导岗位上排挤出去这个大阴谋的一部分。在 1866 年 3 月 6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这一伙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利用马克思及其亲密的战友们缺席的机会，通过一项倾向于“老马志尼主义”的决议，向马志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245 页。

② 同上书，第 243 页。

和沃尔弗的所谓的贡献表示感谢。

3月10日，总委员会的通讯书记杜邦、荣克、龙格、拉法格、博勃钦斯基在马克思的家里举行例行的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必须在下一次总委员会会议上由马克思对那个决议提出抗议。3月13日，尽管马克思的慢性病又发作了，他还是在总委员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国际的原则同马志尼观点的根本区别。3月6日的决议被撤销了。这段插曲说明马克思受到英国和欧洲大陆工人运动 491 的优秀代表的支持。

由于病情恶化，医生坚决要求他立即离开伦敦，离开伦敦的有害的浓雾，离开他的书桌，离开喧闹嘈杂的工人会议。恩格斯也坚决主张马克思赶快离开伦敦去治病。

3月15日傍晚，马克思到达英国东部滨海城市马尔吉特。这里以空气清新闻名。这个季节，在疗养地的人很少。他找了一间私人住宅，以躲避不速之客，摆脱在旅馆和公寓里难以避免的令人厌烦的谈话。他很早就上床睡觉，很少阅读，长时间地散步，“完全陷入佛教视为人类极乐的精神虚无状态”^①。

在海边将近一个月的休养对马克思的身体很有好处，但是他还是不放心的国际的事务，因为预定5月底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的日期越来越近了。国际的未来命运、它的战略和策略、它的总委员会的人选，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取决于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成果，因为这次代表大会将要批准协会的章程，决定进一步活动的方针。

法国人象去年一样，要求尽快召开代表大会。当时英国人正忙于选举改革运动，德国人支部刚刚成立。马克思非常担心，巴黎的蒲鲁东派可能在日内瓦得势，可能得到一些瑞士手工业者的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08页。

持。他准备到巴黎去，劝告巴黎支部的领导人对代表大会不要过于着急。恩格斯认为，由于波拿巴当局对协会采取敌视态度，这趟旅行未免冒险，并一再劝他的朋友放心。但是，代表大会未来的“东道主”，日内瓦支部领导人自己就要求总委员会延期举行，因为他们来不及做组织方面的准备工作。4月10日，马克思又参加了总委员会会议，5月1日，总委员会在马克思的参加下，决定代表大会将在1866年9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举行。

1866年夏，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开始了。马克思不想
492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他在4月23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决定尽力在这里促使它成功，但是我不能亲自去那里。”^①这首先是因为马克思认为绝不能打断——哪怕是短期地——他付印《资本论》的准备工作。1866年8月23日他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我认为，对于工人阶级说来，我这部著作所能提供的东西比我个人参加任何代表大会所能做的工作都更重要。”^②此外，马克思好几次都证实了他的策略是正确的：只要总委员会的大多数委员事先对某个问题观点一致，他就让他们去公开行动。

马克思为代表大会的组织准备工作也操了不少心。他对即将前往日内瓦的杜邦和荣克作了指示，给贝克尔写了一封详细的信，坚决主张设法使精通三种语言的荣克当选为代表大会的主席。

马克思就若干问题起草的专门指示，帮助伦敦代表团作好思想准备，以对付面临的一场同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辩论。这个文件在代表大会上作为总委员会的报告被逐条宣读，其中大部分被代表大会的决议所采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11页。

② 同上书，第523页。

马克思在起草指示时首先考虑的是激励加入国际的工人共同行动。他着重指出，代表大会议程上关于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问题，实质上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因为协会的目的就在于把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纳入共同的轨道。马克思认为，协会成功地执行的“特殊职能”就是反对破坏罢工的行为和支持罢工运动。他着重指出，协会应该尽力使“各国工人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统一大军中不仅有兄弟和同志那样的感情，而且象兄弟和同志那样地行动”^①。

马克思还阐述了关于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统计调查的建议。他提出的调查大纲是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的范例。这个大纲不仅提到了各国的工资水平（英国工联主义者在他们的劳动统计草案中只注意这一点），而且还提到了许多其他方面，如生产的性质、不同工种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②。这种调查应由工人自己进行（这样才能避免资产阶级的伪造），应有助于工人弄清自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应有助于巩固国际联系。关于对各国工人状况的统计调查这一条，后来收入共同章程，法国、德国和英国的许多支部都进行了这种调查。 493

在总委员会的赞同下，马克思在指示中提出了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那年8月，在巴尔的摩举行的美国工人代表大会上已宣布争取八小时工作日。把这项要求写进国际的纲领中，就使它变成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共同纲领了。

关于工会（工联）这一条是《指示》中的重点。其实，真正的工会运动在当时不过刚刚开始。当时只有极少数人认识到象互助保险会、教育协会、歌咏和体育团体等等这些广泛流行的工人组织同英国工联这类工会的根本区别，这类工会组织是在无产阶级反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4页。

② 同上书，第215页。

资本主义剥削的经济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因而带有明确的阶级性质。这个问题必须解释清楚，这一点正好由马克思在《工会（工联）》。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一条中做到了。

马克思在起草《指示》时，不仅考虑到英国工联的全部积极的经验，而且还直接批评英国改良主义领袖狭隘地理解他们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工联活动的弱点就是狭隘的实利主义，只满足于争取微小的让步，而不过问“一般的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工联（以及一切工会）在今后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①。它们必须吸引那些没有组织起来的、非熟练的、低工资的广大工人群众，包括农村的雇农，参加斗争。

列宁高度评价日内瓦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所通过的关于工会的决议。“在这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确切地指明了经济斗争的意义，警告社会主义者和工人不要夸大这种斗争的意义（当时在英国工人中间有过这种表现），也不要轻视这种斗争的意义（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中间，特别是在拉萨尔派中间，有过这种表现）。”^②列宁着重指出，多亏马克思，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阶级斗争必须把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的信念，才深入到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血肉之中。

马克思在准备日内瓦代表大会时，又重新提到合作社问题。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工人中间流传着各种小资产阶级的合作学说：蒲鲁东的互助主义，拉萨尔关于通过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思想，欧文主义的各种空想的合作方案。

马克思在《指示》中又一次提醒我们，要把社会生产“变为一种广泛的、和谐的自由合作劳动的制度”，只有“把社会的有组织的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153页。

量即国家政权，从资本家和大地主手中转移到生产者本人的手中”^①才能实现。同时马克思也考虑到法国和德国的许多合作社已经加入了国际，工人们参加合作社可以获得一些有用的组织技能和管理技能，所以他在《指示》中提了一些建议，使工人的合作社不致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的股份公司”。他建议工人们与其从事合作贸易，不如从事合作生产。

《指示》中关于男女儿童和少年的劳动一节是十分重要的。《指示》号召工人竭力防止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对正在成长的一代身心的摧残。但是，马克思又同鼓吹妇女和儿童不应脱离家庭“良好的”影响的蒲鲁东主义者相反，认为少年儿童合理地参加社会生产，对于帮助他们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人才有巨大的作用。《指示》论证了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即智育、体育和技术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日内瓦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工人的第一次国际集会通过了总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性文件，批准了它两年来的工作，选举了下一届总委员会，它原来的成员全体连任。代表大会表明，两年以来，⁴⁹⁵国际已在欧洲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资产阶级报刊和统治集团也看到了这些成就，并对国际重视起来了。所以，在法国，代表大会就成了对国际会员进行警察迫害的信号，这种迫害一直持续到第二帝国覆灭。

同英国工联领导人的分歧。

爱尔兰问题

日内瓦代表大会以后，国际的地位在各国得到了巩固，其中包括英国。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1866—1867年经济危机的影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19页。

因为危机促使工人们向国际无产阶级的组织寻求支援。

1866 年秋天,开始了关于工联伦敦理事会参加国际的谈判,当时工联理事会已经领导了伦敦许多工会。工联伦敦理事会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影响已经超出了伦敦的边界。马克思积极参加了这次谈判,认为这次谈判的成功将是英国工人阶级革命化的道路之一。他在 1866 年 10 月 13 日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工联伦敦理事会宣布自己为国际协会的英国支部,那么“这里的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从某种意义上说就会转移给我们,而我们就能够把运动大大地‘向前推进’”^①。

工联的一些基层组织主张加入国际。由于改良主义领袖的压力,这个问题被否定了,决定继续同国际工人协会合作,但决不办理组织上的手续。

1867 年春天,英国工人的失业人数和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同时争取普选权的群众运动有了新的高涨,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也蓬勃开展了。在总委员会中马克思的朋友们认为革命一触即发。杜邦写道:“各省二十多万人都在期待着信号,以便拿起武器开进伦敦去帮助革新者。”^②

但是改革同盟的大多数领导人,主要是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右翼工联主义者,被群众高涨的革命情绪吓破了胆,接受了一个打了折扣的选举改革法案,它只让工人阶级的上层有选举权。改革同盟拒绝支持爱尔兰人的民族要求,这也带来了一些不良的后果,影响了群众对改革同盟的支持。不久,议会就批准了托利党政府提出的第二次选举改革法案。

统治阶级通过微小的让步得以分裂英国工人的群众运动。与此同时,他们还残酷地镇压争取独立的爱尔兰战士。一百六十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第 536 页。

^②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史》1964 年莫斯科版第 253 页。

名 1867 年三月起义的参加者受到法庭的审讯,其中有一半人被判处苦役。逮捕和酷刑一直没有停止,在社会上具有民主思想的人们中引起了公愤。爱尔兰问题成了国内政治议论的中心。

爱尔兰革命兄弟会,即芬尼亚社,是爱尔兰解放运动的组织者。芬尼亚社首先代表爱尔兰农民的利益,其社会成员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劳动知识分子。马克思并不赞同芬尼亚社的密谋策略,他指出了他们的宗派主义的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但是高度评价他们的革命的胆略。恩格斯对这一点也有高度的评价。

1867 年 9 月,一批爱尔兰革命者在曼彻斯特为了营救芬尼亚社的两名领导人,武装袭击了囚车,冲突中击毙了一名警察。五人当场被捕,他们被指控犯了杀人罪,要对他们判处死刑。在英国和爱尔兰发起了营救被告的运动,总委员会积极参与了这场运动。

马克思认为,在总委员中广泛讨论爱尔兰问题,有助于制定无产阶级在民族问题上的统一策略,有助于在英国工人中宣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思想。讨论定于 1867 年 11 月 19 日举行,还邀请了英国和爱尔兰的报界代表。在第二次会议,11 月 20 日的非常会议上——这时曼彻斯特法庭已经宣布对五名被告的芬尼亚社社员中的四名执行死刑——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致内务大臣的意见书,指出这是一种政治报复行为,并坚决要求撤销原判。

改革运动的教训,同工联伦敦理事会的谈判进程,以及奥哲⁴⁹⁷尔和鲁克拉夫特这些工联领导人在爱尔兰问题上的模棱两可的立场(他们实际上也象改革同盟中的那些资产阶级激进分子那样,具有反爱尔兰的情绪,谴责芬尼亚运动),使马克思清楚地看到,尽管英国工人群众有一定的国际主义和无产阶级团结的传统,但总的来说,他们还受着改良主义思想的束缚。“宪章派的热情”在近期内也没有恢复的希望。而这时爱尔兰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具有

相当规模。由于这一切，马克思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和英国工人运动的关系的看法也有了改变。从前他曾经认为，只有英国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爱尔兰才能得到解放，现在他坚信，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推翻英国在爱尔兰的统治，才能给予英国工人阶级以必要的革命的推动，否则英国工人阶级就不能摆脱改良主义的影响，不能打倒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本来准备在11月26日的讨论会上发言。但是在会议前三天，三名被判罪的芬尼亚社社员已被处决。马克思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由英国人出面对争取爱尔兰独立的战士们表示同情更合适，他把发言提纲交给了福克斯。

马克思那天没有做的发言的提纲保留下来了。在引言部分中，他再次谈到了11月19日会议讨论过的关于被压迫民族起义权利这个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打算仅仅激起“人道和正义”的感情。尽管他的听众中可能有一些质朴的工人，他还是用严格的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描绘了爱尔兰的历史命运。他指出，自从1846年以来，爱尔兰遭受的殖民剥削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点甚至象福克斯这类热情支持爱尔兰人民的英国人以前也是不了解的。枯燥的统计资料字里行间隐藏着整个民族的悲剧：小租佃者被赶出他们世代耕耘的土地；早在十六和十七世纪就被英国地主侵占的土地变成了连片的牧场，以满足资本主义英国对廉价畜产品的需要；爱尔兰农民的壮劳力大规模地移居国外，人口减少了（二十年中减少了两百万人）；爱尔兰居民体质退化了；赤贫现象越来越严重。

498 马克思着重指出，这种新的制度是“无声无息地、着着实实在地进行着的一种歼灭”^①。因此，爱尔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采取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03页。

这样尖锐的、革命的形式是不足为奇的。对爱尔兰来说，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争取独立，只有争取独立，才能防止为地主和英国资产阶级利益而实行的毁灭性殖民政策的后果。

马克思指出，小资产阶级革命家芬尼亚社社员反映了农民对逐出土地的自发的抗议，反映了农民同地主的斗争。在这个意义上，芬尼亚运动具有社会主义色彩。芬尼亚社社员是反天主教的，是主张共和的。这一切使他们成为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英国工人阶级究竟应该对芬尼亚运动采取什么态度呢？马克思的回答是明确的。爱尔兰的独立对英国工人会有直接的好处。对爱尔兰的压迫，加强了英国本土的土地贵族和整个统治阶级的地位，保持那支经常可以转而对付工人的常备军就有理由了。爱尔兰劳动人民低下的生活水平，也间接影响了英国人的工资收入。资本家挑起的民族纠纷造成了英国无产阶级的分裂，削弱了无产阶级的力量。因此，爱尔兰的民族解放应该成为“英国民主党派的一个要求”^①。马克思就是这样结束了他的手稿。

总委员会委员中有些人是知道这个没有作的发言的内容的，因为马克思和往常一样总是毫无保留地与同志们交换思想。在总委员会11月19日会议的头一天讨论时，荣克、列斯纳、杜邦的发言就说明了这一点。过了几个星期，马克思有机会向广大听众阐述自己对爱尔兰问题的观点。12月16日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召集了一百多人。马克思详细地论述了爱尔兰被奴役的历史，以及爱尔兰许多世纪以来受英国人的压迫。对马克思的报告作了记录的埃卡留斯记下了这样一句结论：“爱尔兰问题不单纯是个民族问题，它是一个土地问题，生存问题。不革命，即灭亡，这就是当前的口号。”^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05页。

② 同上书，第639页。

为国际的社会主义纲领而斗争

马克思在领导国际的时候，总是把工人的各种要求、各种斗争形式，同无产阶级运动的主要目的，即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的社会联系起来。但是在1868年以前，没有一份国际的文件明确地提到一切社会主义纲领的根本问题，即所有制关系的问题。暂时还不得不考虑到工人阶级中那些半手工业成分的幻想，这些人认为生产工具和小块土地的个人占有就是小生产独立的保证。

但是马克思认为，在国际的纲领中公开宣布社会主义原则的时机即将成熟，他相信在这方面可以依靠先进的工人。

1867年9月在洛桑代表大会上出乎意外地引起的一场关于土地所有制的辩论，表明了社会主义思想在国际会员中的传播。引起这场辩论的是德·巴普，他提出只有采取激进的措施，例如把土地变成公有财产，才能消除现存经济制度的各种罪恶。托伦和其他一些蒲鲁东主义者竭力为土地私有制辩护。支持德·巴普的有伦敦代表列斯纳和埃卡留斯，还有日内瓦的贝克尔、柏林的拉登多夫、美国兹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老盟员施土姆普弗。

埃卡留斯对这场辩论是有充分准备的。他在1866—1867年的冬天已经在《共和国》周报上发表了一组文章，这组在马克思的帮助下写成的文章，批评了庸俗经济学家约·斯·穆勒的观点，包括他的关于通过分割公有地来恢复英国小农阶级的建议。

洛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马克思只能参加一部分。1867年4—5月他在德国，他去德国是为了把《资本论》的手稿送给出版商，接着又忙于阅读清样。代表大会的决议表明国际内部的力量

发生了明显的分化。面对着团结一致的社会主义成分的那些巴黎的蒲鲁东主义者，是工人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好斗的鼓吹者。马克思决定在这个阶段狠狠地打击他们，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在下次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我将亲自置这些蒲鲁东派的蠢驴们于死地。”^①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的出版，对于工人掌握社会主义思想和克服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思想影响，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先进的工人广泛组织学习《资本论》，解释它的内容，无产阶级报刊和民主主义报刊刊登对这本书的书评，这就给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生活注入了一股活力。在当时无产阶级报刊上向工人读者介绍《资本论》思想的一篇最好的文章，就是恩格斯在1868年3月德国工人的机关报《民主周报》上发表的书评。1867—1868年，马克思本人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中曾做过有关《资本论》的演讲，他在总委员会的一些发言中也常引用该著作的原理。贝克尔、左尔格、狄慈根、库格曼、拉法格、席利、列斯纳、埃卡留斯等人，利用各种形式宣传这部伟大的著作。在工人的集会上阐述《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成立了一些学习《资本论》的小组。李卜克内西甚至还利用了北德意志联邦国会的讲坛来传播该书的思想。

在加入国际的无产阶级群众中传播《资本论》的思想，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科学共产主义，加速阶级觉悟的提高。不提高阶级觉悟，社会主义原则就不可能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和后来的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资本论》出版一年以后，狄慈根写信给马克思说：“在我眼前消逝的这一个短暂的时期，您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影响。”^②

从1868年冬季起，马克思就十分关心定于9月6—13日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47页。

② 《约瑟夫·狄慈根》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05页。

开的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他竭力说服总委员会的全体委员接受社会主义的纲领，教育他们对社会主义问题采取科学的态度，正如他所指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的经济前提。他在 1868 年 7 月 28 日总委员会上所做的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用机器的后果的发言中强调指出，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具有种种消极方面，但使用机器的最重要的历史后果是出现了一个新的因素——有组织的“联合的”劳动，它预示着新社会制度的来临。在 1868 年 8 月 11 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提出的决议草案中这样写道：“机器生产的发展为用真正社会的生产制度代替雇佣
501 劳动制度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①在这个会议上，马克思在论证缩短工作日的要求时，又提到了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问题，关于向社会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过渡的条件问题。

伦敦的这场辩论的余波，通过埃卡留斯、列斯纳、杜邦的书信，传到了日内瓦、巴黎和布鲁塞尔。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主张公有制的国际会员在公有制的最适当的形式方面还没有取得一致意见。马克思和他的战友们认为，只有实行全国范围的财产集体公有，才能保证为最合理地、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准备条件；还有不少已经承认社会主义观点的国际会员，却以为土地和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就是把它们或者直接交给一些合作化的工人小组或农民小组，或者交给农村的、城市的市镇机关或公社。

最初马克思准备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做关于土地所有制的报告，但是他随即放弃了这个想法。德·巴普承担了这个报告。在他准备报告的过程中，与伦敦有书信来往，从那儿得到了一些帮助和实际材料。马克思的战友们努力影响德·巴普，因为当时德·巴普还主张土地归地方公有。在这方面，1868 年 5 月 13 日杜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357 页。

写给德·巴普的一封信是很有代表性的。杜邦写道：“在我看来，公社必将在总的联合中消失。卡尔·马克思说，必须建立**经济集中制**。我同意他的看法，因为否则怎能建立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应有的协调呢？”^①

德·巴普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资本主义发展的趋势是大规模生产，无论工业生产或农业生产都是如此；他的结论是：小块土地在历史上必定要消灭，大规模经营有优越性。但是他把集体所有制的形式问题留待以后解决，显然他认为在同拥护小私有制的人进行决战时必须团结各种集体主义者。他说：“未来将解决这个问题。”^②在总结发言中他还是发表了他个人的看法，⁵⁰²他反对他曾经主张过的财产地方公有，几乎逐字重复了杜邦的论点。

尽管有法国蒲鲁东主义者的阻挠，托伦又是德·巴普的主要对手，代表大会根据三十票对四票的多数人的意见宣布，“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将造成把耕地变成公共财产的社会必要性”^③。土地将交给农业合作社去耕种，但必须保证社会的利益和农业工人的利益。代表大会几乎毫无异议地一致通过了关于把森林、矿山、煤矿、铁路、公路、运河、邮政、电报变成公有财产的决议，关于耕地的决议只是这个总决议的一个条款。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这个决议标志着马克思的路线在国际中的巨大胜利，是根据社会主义纲领进一步团结国际无产阶级的重要步骤。

① 《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第257—2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3页。

③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8—1870年。会议记录》1964年俄文版第223页。

战争与和平问题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由于欧洲的战争危险日益增长，国际的领导人经常关注这个问题，在国际的几次代表大会上、在总委员会中、在工人集会上、在工人报刊上也讨论这个问题。

马克思不得不努力帮助国际的会员们对战争采取无产阶级的态度。不仅要使人们清楚地知道必须坚决为和平而斗争，并准备进行这种斗争，而且还要使人们能够理解各种武装冲突的性质，并采取相应的策略立场。必须提醒工人们不要抱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党派的和平主义幻想，帮助他们克服那种认为任何战争甚至解放战争也是绝对罪恶的片面的、和平主义的观点。

从1866年普奥战争时期起，在国际内部就对战争问题开始了热烈的辩论。在总委员会辩论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暴露了国际的不少活动家是不够成熟的。他们不太理解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特别是
503 忽视各分裂国家的民族统一、民族独立的任务，而当时的许多战争都是与此有关的。从1866年起作为最积极的总委员会委员的新闻工作者沙尔·龙格和医科大学生保尔·拉法格的立场，在这方面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两个人在许多问题上都支持马克思的路线，拉法格很快就成为马克思的忠实学生。但是他们这两个人也都深受蒲鲁东思想的影响。拉法格在辩论时硬说，民族本身就是“陈腐的偏见”，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同政治要求毫不相干，应该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已经“成熟”到能够进行社会革命的国家。马克思在1866年6月19日的会议上批判了在民族问题上的蒲鲁东的虚无主义，向拉法格友好地指出，“拉法格大概是完全不自觉地把否定

民族特性理解为由模范的法国民族来吞并各个民族了”^①。

在对外政策问题上，马克思尤其主张对局势作冷静的估计。他教导国际的领导人，不要发表大吹大擂的宣言去怂恿群众采取毫无准备的行动，不要冒险地号召输入革命。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写道：“特别是必须防止可能把我们的协会引到片面性的道路上去的任何表现。”^②总委员会1866年7月17日通过的决议就是在争论(马克思是主要发言人之一)以后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的。决议把军事冲突的责任完全归之于各国政府。国际无产阶级的独立立场就表现在不站在任何一方。总委员会的决议号召工人们“联合起来，以便获得为社会解放和政治解放所必需的力量”^③，鼓励他们巩固自己的阶级组织，这是对抗统治阶级政策的唯一现实的手段。

1867年夏，总委员会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国际对已经建立的和平和自由同盟这个国际和平主义的组织究竟应采取什么态度。法国民主派所控制的同盟的组织委员会，得到著名的激进民主派活动家穆勒、雨果、加里波第和巴枯宁的支持。马克思也接到通知，邀请他个人参加在日内瓦召开的同盟的成立大会。

马克思从原则上谴责使工人群众脱离一般民主运动的宗派主义倾向。他认为，参加这种运动可以使工人认识到自己的先进阶级的作用，认识到自己是社会进步的主导力量。但是，还必须认清无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阶级目的的共同性和差别。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联合行动，决不应该危及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

因此，1867年8月13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发言，坚决反对国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31页。

③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64—1866年。1865年伦敦代表会议。会议记录》1961年俄文版第151页。

际正式参加同盟的代表大会。他认为这样做就会提高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威信，使人们更加幻想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以消除战争。他说：“那些拒绝参加改变劳资关系事业的人，他们忽视了普遍和平的实际条件。”^①但是，同盟的成立毕竟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战情绪，因而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不要派正式代表参加同盟的大会，让国际的会员以个人的资格出席它的大会。他们应该表现出工人反对军国主义的决心，同时应该竭力维护在这个问题上的无产阶级路线。

马克思制定的对和平和自由同盟的策略，为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几项决议所确认。代表大会拒绝了同盟的要求：在资产阶级和平主义旗帜下用关于各民族人民兄弟情谊这种温情的世界主义空话把一切反战力量包括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代表大会再一次肯定国际在争取和平的斗争中的领导作用，并在决议中指出，“在国际工人协会存在的条件下”，和平和自由同盟这种国际组织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可以邀请同盟的盟员加入有关国家的国际支部。另一方面，国际的会员也应该表现出有同其他进步组织合作的意愿。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通过的另一项重要决议，是关于无产阶级在欧洲战争中的立场问题。马克思在给参加布鲁塞尔代表大会的埃卡留斯和列斯纳的指示中写道：“在这个问题上作出的决议应当
505 直截了当地说明：工人阶级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还不能对事变进程起某种决定性作用，但是，代表大会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宣布反对战争，并揭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法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内战，它对这两个国家来说是毁灭性的，对整个欧洲来说也是毁灭性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46—547页。

布鲁塞尔代表大会所通过的这项决议的基本部分给工人们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反映了马克思及其拥护者的观点。鉴于剥削制度是国家之间战争的经常根源，代表大会认为只有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才能彻底根除战争。但是，即使在现存条件下，只要人民首先是各国工人利用一切现实手段抵制政府，揭露它们的掠夺政策，那么战争的次数和规模是会减少和缩小的。

决议的这一部分总结了国际内部三年来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讨论。但是，由于比利时代表们的坚持，决议最后还是建议工人一旦爆发战争就宣布总罢工。比利时人的这种建议，就是用宣言式的、实际上不能实现的、客观上只能把工人引入歧途的口号来偷换对任何武装冲突的具体分析。马克思反对这种做法，把它称为“荒谬主张”^①。

国际文件中存在这些不成熟的主张，绝没有贬低国际在争取和平斗争中作为先驱者的历史作用。这一斗争是无产阶级竭力要建立的那种制度的性质决定的，这一斗争已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纲领性目的之一。国际工人协会的领袖在1869年5月12日写的《致合众国全国劳工同盟的公开信》中就预见到，总有一天“工人阶级终于不再作为一个驯服的追随者，而是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能在他们的所谓的主人们叫嚷战争的地方卫护和平”^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2—403页。

第一个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的诞生

每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结论和策略计划方面意见一致时，他们总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在讨论德国工人运动问题时尤其是这样。为了减轻马克思的沉重负担，恩格斯已经承担了同德国无产阶级活动家进行联系的一部分工作。他经常在私人信件中十分坦率地向他们提出批评和建议，这在总委员会通讯书记的正式信件中是不可能做到的。

1867年，先进的德国工人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他们的两位优秀的代表人物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被选入国会，因此德国工人阶级有了一个全国性的讲坛。1867年10月17日，李卜克内西向大吵大嚷的右翼议员们宣称：“我在普鲁士唯一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发言，我不是面向你们，而是面向这会场墙外的人民。”^①

李卜克内西的演说、对俾斯麦制度及其立宪的伪装即“专制主义的遮羞布”^②的大胆批评，使马克思极为高兴，10月4日他给恩格斯写道：李卜克内西“第一次在联邦国会里登台讲话，给我们带来光荣”^③。但是马克思看到，李卜克内西在抨击替俾斯麦政策辩护的拉萨尔派时，有时走到另一个极端：他的反普鲁士情绪使他对中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做了很大的让步，这样他就有背离阶级路线的危险。根据马克思的要求，恩格斯在给

① 《第一国际在德国》1964年柏林版第1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76页。

③ 同上书，第357页。

李卜克内西的一封信中建议他不但要打击普鲁士人，而且要打击他们的敌人——奥地利人、联邦主义者以及其他各小邦的支持者。

国际对德国工人的影响、他们对国际联合的愿望，使全德工人联合会队伍中对领导人的不满日益增长。于是施韦泽就想方设法要同马克思接近。他在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一些评论《资本论》的文章，并且写信到伦敦，要求就国会即将讨论的钢铁产品的保护关税问题给他提一些建议。由于施韦泽是最发达的工业区柏林的代表，马克思认为必须给他答复。从问题的实质来看，马克思认为强大的德国大工业已经不需要保护关税，但是要同意降低 507 关税，则应先要求议会对大工业企业包括对工人状况进行调查。马克思建议施韦泽这样做，而信中却故意用一种冷淡的公事公办的口气，免得他借此吹嘘自己同《资本论》作者的“接近”。

施韦泽要的下一个花招，就是将关于对待国际的态度和关于《资本论》第一卷的报告，列入即将在汉堡召开的全德工人联合会代表大会（全体大会）的议事日程。1868年7月6日，以施韦泽为首的联合会理事会正式邀请马克思以贵宾身份出席大会，因为“他作为《资本论》的作者对工人的事业有突出的贡献”^①。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回信中推托说总委员会的紧急工作使他不能离开伦敦，并对大会把工人阶级国际合作问题以及其他一些“确实应当成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②的重要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纲领，表示满意。这样也就间接地祝贺了联合会的领导人放弃许多拉萨尔的教条。马克思的这封为发表而起草的信载于1868年8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

拉萨尔派的代表大会于8月22—26日举行。不伦瑞克的出版商威廉·白拉克做了关于《资本论》的报告，莱昂哈德·邦霍尔夫

① 《第一国际在德国》1964年柏林版第7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8页。

斯特和卡尔·希尔施做了关于对待国际的态度的报告。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施韦泽的反对派的领导人。几个月以后，他们就脱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同意了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提出的纲领。当时他们还打算把施韦泽孤立起来，把联合会引上新的道路。但是施韦泽巧妙地在反对派和正统拉萨尔派之间看风使舵。依靠后者的帮助，他把关于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性质的决议弄成了一般宣言。

过了几天，1868年9月5日，以倍倍尔为首的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在纽伦堡举行代表大会，这标志着该联合会的大部分成员同自由派资产阶级决裂，最终地转到无产阶级的阶级立场上来。代表们以六十九票对四十六票，表示同意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它被简明扼要地写在提交大会的联合会的新纲领中。

508 施韦希尔就主要的问题作了报告，援引《资本论》来说明新纲领的要旨，他宣称工人阶级只有夺取政权，只有“同各国工人牢牢地站在一起”^①，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

讨论表明，代表们很熟悉国际的纲领性文件。在这方面起了不小推动作用的，是柏林社会主义者威廉·艾希霍夫写的、刚刚出版的那本小册子《国际工人协会》。马克思不仅向小册子的作者提供文件和原始资料，而且还仔细地校阅了好多页校样。艾希霍夫出席了纽伦堡的代表大会，他第一个向伦敦报告了国际工人协会的各项原则的胜利。

马克思急于要使德国工人协会联合会加入国际这项工作从组织上落实。9月22日，在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后举行的总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就宣布了联合会的理事会为国际工人协会德国的执行委员会。同时，总委员会正式授权莱比锡的李卜克内西和柏林的艾希霍夫宣传国际的思想并建立当地的支部。

^① 《第一国际在德国》1964年柏林版第243页。

当前所面临的斗争任务，就是要克服拉萨尔主义在工人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必须肃清小资产阶级的萨克森人民党对工人的影响。这个组织是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直接参加下于1866年8月建立的，它的许多成员都是工人，但是它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李卜克内西在新闻工作方面也得到萨克森民主派的支持：他的周刊《民主周报》的副标题就是《人民党机关报》。他时常感到受拘束，因为要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对人民党保持一定的从属关系。

恩格斯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对德国工人运动的状况有这样一段分析：“拉萨尔宗派的瓦解以及另一方面萨克森和南德意志的工人摆脱人民党而独立行动，这是建立新的真正的德国工人政党的两个基本条件。”^①

不久马克思就严厉地批判了施韦泽的策略。1868年9月底，施韦泽为了组织工会在柏林召开了代表大会。施韦泽竭力抢在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前面建立工会，力争工人群众对拉萨尔派组509织的支持。但是，只许拉萨尔派的工会代表参加柏林的代表大会，这就证明施韦泽仍然推行过去的宗派主义路线。

马克思在10月13日给施韦泽的信中，非常坦率地阐述了自己对宗派运动和阶级运动的区别的观点。他批评了施韦泽的计划——建立一种服从（完全是拉萨尔式的）主席独裁的严格集中制的工会组织。这种结构同工会运动的本质相矛盾，在德国尤其不适合，“这里的工人从小就受官僚主义的训戒，相信权威，相信上级机关，所以在这里首先应当培养他们的独立自主精神”^②。马克思指出，没有民主制，工人运动就不能发展。

1869年春天和夏天，拉萨尔派组织的一般成员大批加入反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6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2页。

派，支持它的领袖白拉克。根据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倡议，8月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全体代表大会，出席的有纽伦堡大多数教育协会和工会的代表，国际德国支部的代表，以及一些同施韦泽断绝关系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分会的代表。

马克思不想去爱森纳赫，尽管李卜克内西坚决请求他和恩格斯“在德国工人面前露面”。马克思认为，同拉萨尔派的教条和组织原则的决裂，最好“通过工人本身的自由发动”^①来实现。此外，马克思对实现联合的纲领有些担心，因为它还带有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影响。的确，1869年8月7—9日举行的爱森纳赫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纲领，并没有摆脱庸俗民主主义观点，还有拉萨尔主义教条的痕迹。但是在主要方面它还是符合国际的纲领性文件的原则的。一个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被一个正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的群众性的工人政党所接受，这是史无前例的。爱森纳赫纲领的公布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思想的巨大胜利，在马克思主义史和国际工人运动史上开辟了新的篇章。

510 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在全国范围内团结起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的倾向。在这方面国际工人协会章程起了促进作用，它提出各工人团体联合成全国性组织这一任务。马克思孜孜不倦地帮助工人运动的领袖认识这一客观过程，并促其胜利。

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的开始

布鲁塞尔大会关于公有制的决议表明：通过四年来的共同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2页。

动,大多数国际会员对无产阶级斗争的目的即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有了一致的认识。现在马克思面临的任務就是努力使他们在实现这一目的方法方面取得一致。但是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动力、关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关于无产阶级政党这些问题上,必然会遇到小资产阶级派别的代表人物特别是无政府主义代表人物的更剧烈的抵抗。

小生产在许多国家的一些工业部门中还占优势,这就使工人中的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情绪难以根除。正因为如此,同俄国民粹派革命家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名字有联系的、叛逆的无政府主义即“改头换面的蒲鲁东主义”才在瑞士、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国际会员中广泛流传。这位天才的大人物,1848—1849年的革命战斗的参加者,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来的奥地利和沙皇帝国的囚犯,在国际舞台上的重新出现,加剧了国际工人协会内部的斗争。

当1864年秋天马克思从列斯纳那里知道巴枯宁到达伦敦时,就表示愿意同他见面。1864年11月3日,他们两人见了面。第二天马克思就给恩格斯写道:“……我很喜欢他,而且比过去更喜欢……总之,他是十六年来我所见到的少数几个没有退步、反而有所进步的人当中的一个。”^①巴枯宁将动身到意大利去,他答应马克思说要与意大利工人建立联系,因为在反马志尼主义者的尖锐斗争中,必须取得意大利工人的支持。11月底,马克思给巴枯宁寄去了几份《成立宣言》和《临时章程》,仍然指望得到巴枯宁的支持。1867年,马克思从约·菲·贝克尔那里打听到巴枯宁的地址,还给他寄去了一本《资本论》第一卷。这一切说明,马克思在很 511
长一段时期诚心诚意地对待巴枯宁,把他看作是一个同盟者、一个可能的志同道合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7—18页。

与此同时，巴枯宁从 1865 年到 1867 年在意大利逗留的那几年，也是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最终形成的时期。这种观点反映了改革后俄国落后的经济条件，意大利的现实生活又给了它新的动力，那里劳动群众日益贫困，而无产阶级运动则刚刚开始从一般民主主义潮流中分离出来。巴枯宁在具有激进情绪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是青年中频繁活动，从中招募第一批信徒，让他们参加他的秘密的国际兄弟会。

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即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变种，反映了无权的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绝望心理，他们既对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失去了信心，自己又不能独立地组织阶级斗争。因此巴枯宁就猛烈地批判社会上的不平等和剥削，狂热地鼓吹社会主义，号召进行兼有极端个人主义、兼有“绝对”自由和自主要求的世界革命，否认任何纪律和任何权威。巴枯宁也熟悉马克思的一些著作，1869 年他曾把《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但是他全然无视社会发展的唯物史观，社会经济形态更替的规律性，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以及由于马克思坚持不懈的努力已被国际队伍中先进的欧洲工人所接受的一整套概念。

巴枯宁认为必须消灭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不是雇佣劳动制度，而是国家。他认为国家是不平等和剥削的根源。巴枯宁反对由资本主义发展全过程和无产阶级斗争所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提倡自发的“社会清算”，即“废除一切民族的和领土的国家”^①。他宣称，这种“清算”的动力是游民，即流氓无产阶级和堕落的文化人。他认为未来的社会结构就是由一些单独的、互不往来的、没有任何必要联系的自治的公社所构成。

512

巴枯宁也反对革命的群众性组织，他认为只要有能煽动起人

^① 《第一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1869 年 9 月 6—11 日》1934 年俄文版第 48 页。

民反抗精神的一些革命家的宣传鼓动，就可以发动起义。但是，为了配合这种宣传鼓动，他准许由少数革命的阴谋家组成的严格秘密的组织存在。最后，巴枯宁号召立即采取革命行动，同时宣布凡是不能直接引起革命的政治行动都是有害的。他用新的形式，恢复了蒲鲁东的放弃政治斗争的教条。

巴枯宁认为，象国际工人协会这样一个现成的国际组织是他宣传无政府主义观点的合适的场所，于是竭力要控制它。1867年，他是国际同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和平和自由同盟合并的倡议人之一。这个方案失败以后，巴枯宁于1868年秋在日内瓦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他致函总委员会要求接纳这个组织加入国际。同盟在混乱的纲领和章程中宣称它是国际的一部分，同时要求对它进行思想领导，但它却作为自治的实体存在于国际之外。在它的纲领和章程中，除了取消宗教、废除国家之类的条文，还有很快就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同巴枯宁主义斗争焦点的两项要求。这就是废除继承权——巴枯宁主义者认为这是把土地变成集体财产的手段——和放弃政治行动。

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不要陷入对个别条款的争论，而要拒绝同盟参加国际，其理由是：按照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其成员只能是地方性或全国性组织，而绝不能是国际性组织。

1869年2月27日，同盟再一次写信给总委员说，如果总委员会接受它的各支部加入国际，它就准备解散它的国际性组织。

这显然是阴谋。1869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巴枯宁以为：如果我们赞同他的‘激进纲领’，他就可以把这件事公开宣扬出去，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败坏我们的名誉。如果我们表示反对，人们就会骂我们是反革命分子。”^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5页。

马克思起草的给同盟的答复，是维护工人阶级团结的原则性策略的典范。在答复中这样写道：因为国际接受“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①的一切工人团体，因此详细地审查被接纳成员的纲领并不属于总委员会的职权范围。总委员会只是要了解它同共同章程有没有相抵触的地方。在同盟的纲领中，这种相抵触的地方就是要求“**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另一种说法而已。马克思起草的这份文件驳斥了这种要求，其中写道：“**不是各阶级的平等——这是谬论，实际上是做不到的——相反地是消灭阶级**，这才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真正秘密，也是国际工人协会的伟大目标。”^②同盟在解散它的国际性组织以后，只要修改它的纲领，它的支部就可以根据共同章程被接纳入国际。

马克思代表总委员会提出的条件被同盟的领导人正式接受，但是后来证明实际上并没有被遵守。同盟在1869年5月形式上解散以后，它的日内瓦小组以“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中央支部”的名称组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这个支部中有一些最著名的巴枯宁分子，它实际上继续领导着国际同盟这个巴枯宁派头目保留在国际内部的秘密组织。

这时马克思还不知道有一个极其秘密的巴枯宁派的国际兄弟会，也不知道国际同盟实际上保留下来了。但是马克思看出了巴枯宁的破坏性的策略，预料在巴塞尔的国际下一届代表大会上将同他发生激烈的冲突。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的一些发言都指明了他认为下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所必须遵循的方针。

1869年7月6日讨论土地问题，有人在论证土地国有化的思想时，为了反对地主的篡夺，援引农民的“天然权利”，马克思发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2页。

② 同上书，第283页。

批驳了这种做法。这些唯心主义概念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典型的说教,与此相反,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论证了国际的纲领性要求,为总委员会的代表同巴枯宁论战提供了必要的论据。他指出,工人阶级的土地纲领不应该以抽象的“天然权利”为依据,而⁵¹⁴应该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现实过程,这个过程使农民变成名义上的所有者,使他们只有一条摆脱贫困和破产的道路,这就是:以合作劳动为基础、以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工业和农业生产)为基础,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马克思认为,对农民的态度问题同日内瓦巴枯宁分子建议列入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关于废除继承权的问题,有紧密的联系。在1869年7月20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巴枯宁派所谓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的主张。他向与会者解释说,继承法,同所有一般法规一样,不是社会制度的原因,而是社会制度的结果。无产阶级的任务首先是消灭构成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的生产资料私有制,而不仅仅是消除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马克思说:“如果工人阶级拥有足够的权力来废除继承权,那它也就足够坚强有力来实行剥夺了,因为剥夺会是一种简单得多和有效得多的措施。”^①

马克思指出,巴枯宁的主张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同时从无产阶级组织的策略任务来看,这种主张是有危害的。正当国际面临对农村施加影响这一迫切任务,巴枯宁却提出了一个宗派主义的口号,这个口号只能把农民推开,把他们投入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怀抱。马克思向拉法格阐明了同巴枯宁在革命策略的重大问题上的争论的实质:“……宣布**废除继承权**就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威胁,这种威胁会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651页。

结在反动派周围。”^①

根据总委员会的请求，马克思把发言的要旨写下来以便在代表大会上宣读。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集中批
515 判了巴枯宁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了反驳这种观点，他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在国际的文件中用唯物主义哲学观点来阐明革命思想，这还是第一次。特别要指出的是，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阶段向国际的活动家介绍如何从哲学上论证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有好处的，而以前他是用他比较感兴趣的政治经济学材料来论证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必要性的。

巴塞尔代表大会。国际在农民 问题上的策略

在1869年9月6—11日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马克思的拥护者同巴枯宁的追随者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尤其是在国家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斗争问题上。例如，在讨论议事日程时，巴枯宁和比利时的代表欧仁·安斯竭力反对工人参加议会活动，说什么这在原则上是反革命的。李卜克内西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列斯纳在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谈到了这段插曲，他写道：“昨天下午发生了一场热烈的辩论……当时巴枯宁对任何政治行动都表示反感。但是李卜克内西、里廷豪森等人狠狠地收拾了他一顿；会后他还象一只野狮那样咆哮。大多数法国人都发言反对他。”^②在同巴枯宁争论中，马克思的拥护者直接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夺取政权的问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② 列斯纳1869年9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

巴塞尔代表大会再一次提出废除土地私有制，坚决重申了国际的社会主义纲领。大会的这项决议得到各国国际支部的拥护，但是却在资产阶级报刊上引起了一场真正的风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传遍了各国。例如在英国，为此目的在总委员会的直接参加下建立了土地和劳动同盟。它的纲领是埃卡留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起草的。

在德国报刊上围绕着巴塞尔决议所展开的辩论，有助于年青的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正确地制定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人民党的策略。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同志们还不太了解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宣传的意义。因此恩格斯决定为自己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版专门写一篇序言。序言写于1870年2月初，同年4月陆续发表在党中央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上。恩格斯在同马克思的通信中曾讨论过他这篇序言的基本思想。他在这篇序言中阐述了巴塞尔决议对德国这个农业生产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的重要意义。他提出警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把农民看作是统一的群众是错误的。他强调指出，农民有不同的阶层，必须考虑各阶层的特点，以利于同农村大多数劳动者建立巩固的联盟，对抗农村中富裕的资本主义成分。

爱尔兰问题的国际意义

国际中马克思主义的一翼同巴枯宁宗派主义者以及同总委员会中的改良主义者的分歧，也影响了国际对民族问题尤其是对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问题的策略。1869年夏，在爱尔兰和英国广泛地开展了要求赦免被囚禁的芬尼亚社社员的运动。10月24日，在伦敦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游行，在海德公园举行

了群众集会，马克思参加了这次集会。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中再一次提出讨论爱尔兰问题。他提出了两点：（1）英国政府对赦免问题的态度；（2）英国工人阶级在整个爱尔兰问题上的立场。

1869年11月16、23、30日关于爱尔兰问题的几次讨论，和1867年不同，是在另一种情况下进行的。这时要反对的已经不是人人不满的托利党政府，而是自由派格莱斯顿这个更为狡猾的敌人，他向工联讨好，在爱尔兰一方面进行镇压，一方面实行局部改革。在开始讨论第一点时，马克思作了长篇发言，揭露了格莱斯顿的伪善面目，指出了他的政策同他在竞选运动中慷慨发表的宣言显然是矛盾的。格莱斯顿提出的赦免条件是要芬尼亚社社员全部屈辱投降。

在马克思提出的决议中写道：格莱斯顿的这些条件“有意地侮辱了爱尔兰民族”^①。奥哲尔和其他工联改良主义领袖力图替格莱斯顿辩护，最后他们只不过是在定稿中删去了“有意地”这个词。

工联的报纸《蜂房报》一直拒不报道总委员会上的发言，但是辩论的情况和马克思的发言在瑞士、比利时、德国的国际报刊上却有大量的报道。1869年11月29日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也许你在《人民国家报》上已经看到我提出的在爱尔兰大赦问题上反对格莱斯顿的决议案。我现在攻击格莱斯顿——这件事在这里已经引起轰动——和以前攻击帕麦斯顿完全一样。在这里进行煽动的流亡者喜欢从安全的远方攻击大陆上的专制君主。对我来说，这类事只有当着暴君的面做才觉得有意思。”^②

为了揭露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马克思给在布鲁塞尔的德·巴普寄去一些材料，后者把材料发表在1870年2月27日和3月6日《国际报》上。为了同一目的，马克思的女儿燕妮在马克思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75页。

帮助下于1870年2—4月为巴黎的《马赛曲报》写了八篇文章。总委员会为支持爱尔兰人民民族解放运动所采取的那些步骤，引起了爱尔兰工人对国际的注意，为建立爱尔兰支部准备了基础。

马克思提出的第二点，即英国工人阶级对待爱尔兰问题的立场，没有讨论，因为马克思又生病了。从1870年1月中起，几乎有三个月他没能出席总委员会会议。但是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就巴枯宁主义者的攻击而写的内部通告信中，已经深刻地论述了国际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巴塞尔代表大会以后，巴枯宁的追随者转而公开向马克思和总委员会开火。1869年11—12月，他们在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参加编辑的日内瓦的《平等报》上发动了一场连续攻击总委员会的运动；他们指责总委员会破坏了章程，不肯在英国成立一个专门的联合会委员会，热衷于象爱尔兰问题这种同工人运动“毫不相干”的问题，不顾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利益把这些问题强加于国际工人运动。

1869年12月14日，总委员会讨论了《平等报》上的那些文章，决定在给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的通告信中反驳这些诬蔑。1870年1月1日，在总委员会非常会议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通告信。马克思驳斥了巴枯宁主义者的诽谤谰言，首先解释了为什么在英国没有象在其他国家那样建立国际的联合会委员会。在总委员会中，曾几次提出成立这个机构的建议，但是每一次根据当时的条件总是认为时机尚未成熟。马克思写道，“如果英国联合会委员会处于国际总委员会和工联伦敦理事会之间，它就不会享有任何威信，而且它的存在本身实际上就会使总委员会不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工人阶级。在欧洲革命时机成熟的形势下，必须考虑英国的特殊状况：它是资本的首都，它是这样一个国家，那里已经没有农民，而且绝大多数居民是雇佣工人，这就使英国成为“无产阶

级革命的伟大杠杆”。放弃这个杠杆，那该是多么愚蠢，是多么严重的犯罪行为。^①

当时英国工人运动在无产阶级的国际斗争的战略上所处的特殊地位，也就决定了爱尔兰人民解放运动的重要国际意义。马克思详细地论述了这方面的问题，并指出，作为整个革命过程组成部分的被奴役民族的解放斗争具有头等的作用。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英国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因而也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同盟军。用革命的方法解决爱尔兰问题是英国工人阶级获得解放的先决条件，这也会促使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早日到来。因此在爱尔兰问题上，国际的口号应该是：“把现存的**强制的合并**，即对爱尔兰的奴役，变为**平等自由的联盟**——如果这是可能的话，或者**完全分离**——如果这是必要的话。”^②

通告信在最后要求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把信的内容通知所有同它有联系的支部。信的原文也由马克思向比利时传达，由杜邦向法国传达。1870年3月28日，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增加了前言和结束语，把它作为《机密通知》寄往德国，让爱森纳赫派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传阅。马克思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在给国际在纽约的成员（国际支部在纽约从1869年就已经组成，其成员有不少爱尔兰的工人流亡者）迈耶尔和福格特的信中，也详细地阐述了这份重要文件的内容。

519 在日内瓦收到通告信以前，《平等报》编辑部就已经改组，并清除了巴枯宁的追随者。贝克尔过去没能认清巴枯宁主义者的教条和策略，在某些方面曾支持过他们，这时也同他们彻底决裂。巴枯宁本人在当地工人中失去了威信，也离开了日内瓦。从那以后，瑞士汝拉山区就成为巴枯宁主义的堡垒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7—438页。

② 同上书，第441页。

总委员会俄国通讯书记

马克思在从事国际的工作时，仍密切注视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因为沙皇俄国在克里木战争失败后对国际关系还有相当的影响。马克思也越来越迫切地感到需要详细了解改革后的俄国的国内生活。作为《资本论》的作者，他对这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巨大的农民国家的社会经济关系很感兴趣。

马克思在阅读有关俄国农村的材料时，特别注意人民生活方式的各种事实和特点，它们驳倒了俄国农村公社有独特性这种观点。当时西方的报刊把这种观点主要是同赫尔岑的名字联系在一起。马克思对赫尔岑十分怀疑，因为赫尔岑倾向于自由主义，同西欧的那些当时反对独立的工人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接近，而且还同巴枯宁关系密切。可惜马克思没能知道，俄国的这位伟大的革命作家在1869年，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正象列宁后来所指出的——“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主义，而是转向国际”^①；他对这个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十分尊敬并寄予希望，他对他的老友巴枯宁的观点表示怀疑，埋怨巴枯宁挑拨他同“马克思派”的关系。

马克思及其周围的友人很长一段时期并不知道在俄国的革命人士中，除了赫尔岑一派还有另一个派别。马克思对农民骚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俄国革命运动的高涨、沙皇政府对革命运动的镇压，大体上是了解的。1865年，德·巴普在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俄国在“土地和自由”这一口号下开展的斗争。但是德·巴普和马克思当时未必详细了解在六十年代初用这一名

520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18页。

称在彼得堡建立的这个秘密革命团体的活动，未必知道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和参加者。当时马克思大概也不知道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字，不知道关于他的被捕、1864年春被判处公民死刑、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消息。当时马克思没有收到或者没有注意到关于从1864—1865年冬起赫尔岑和一群年青的流亡者发生严重分歧的消息。这群流亡者中就有后来国际的活动家尼·伊·吴亭和天才的组织者、政论家亚·亚·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这两个人曾经是“土地和自由社”的领导人，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学生和追随者，同赫尔岑及其小组有联系，后来因为在革命斗争任务问题上同赫尔岑看法不一致就断绝了往来。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住在日内瓦时，积极参加当地的工人运动，1866年他用俄文发表一本小册子《我们的家务事》，叙述了俄国两代革命家的争论。

一个同马克思比较熟悉的德国政论家西吉兹蒙特·波克罕，1867年9月在日内瓦从一次偶然的谈话中听说有一批前面提到的“俄国的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在他看来是一大发现。马克思就写信告诉恩格斯，波克罕“已经发现了谢尔诺”^①。波克罕回到伦敦，向马克思介绍了这本俄文小册子。10月14日，他给在曼彻斯特的恩格斯寄去一本小册子，当天就写信给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建议把它译成德文，并要求补充一些关于俄国革命家及其著作的材料。从谢尔诺1867年10月18日的回信中可以看出，这显然指的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尼·亚·杜勃罗留波夫。看来，谢尔诺的小册子以及写给波克罕的信，成了马克思及其友人最初借以了解俄国这位伟大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文件。11月24日，波克罕把他写的一份关于这本小册子的提要交给马克思，其中包括他从那位青年的俄国通讯员那里得到的一些新材料：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18页。

尔尼雪夫斯基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的文章、他对德国哲学的了解、他的小说《怎么办?》、他的著作和杜勃罗留波夫的著作的出版情况。

《我们的家务事》这本小册子的德译文直到 1871 年才发表,但是马克思从波克罕的口头叙述和书写的提要中已经知道它的内容了,并对这位作者很感兴趣,1867 年 12 月还通过贝克尔送给他一本《资本论》第一卷。一年以后,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参加了在日内瓦出版国际的报纸的筹备委员会,他在要求马克思为该报撰稿 521 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请您在这方面对您毕生坚持的事业给以帮助。”^①马克思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马克思拒绝经常撰稿,因为他太忙了,但是他答应尽力帮忙。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是马克思与之有直接联系的俄国青年一代革命家的第一个代表。但是,不久由于谢尔诺病重和死亡,这个联系就中断了。

后来马克思同俄国革命运动活动家的联系越来越广,认为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他学习俄文,研究俄国革命文献,阅读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弗列罗夫斯基的著作,这也有利于他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开展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的条件刚刚形成,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尚未得到广泛传播。但是国内先进的社会思想家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而且对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对国际,都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列宁指出,六十年代“恰好是俄国民粹派社会主义者企图把‘欧洲制度’的一个最先进最大的特点——‘国际’搬到俄国来的时候”^②。

1870 年春,国际工人协会俄国支部在日内瓦成立了。这个支部包括一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追随者,包括已同巴枯宁断绝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俄文版第 161—16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 1 卷第 256 页。

并正在日内瓦出版《人民事业》杂志的一些革命流亡者。参加这个支部的,除了吴亭,还有波兰起义时期在白俄罗斯指挥一支起义队伍的安·达·特鲁索夫,后来积极参加巴黎公社活动的杰出的女革命家伊·鲁·德米特里耶娃-托马诺夫斯卡娅,巴黎公社的另一位参加者安·瓦·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夫姓雅克拉尔),还有维·伊·巴尔田涅夫(涅托夫),以及其他一些革命家。这个支部对俄国流亡者的先进分子有很大的影响,它同俄国国内民粹派的地下活动有联系,同其他斯拉夫国家的革命运动也有联系。例如,塞尔维亚的革命家、社会主义者斯维托扎尔·马尔柯维奇就是该支部的通讯员。

1870年3月12日,俄国支部委员会写信给马克思,请他担任
522 俄国支部在总委员会中的代表。信中有道:“俄国民主青年今天通过自己的流亡国外的弟兄对您表示深切的谢意,您以您的理论和实践的宣传帮助了我们的事业……”^①

在年青的俄国革命家的信中,马克思特别高兴的是他们抛弃了泛斯拉夫主义的幻想,懂得了俄国和西欧有共同的历史命运,同巴枯宁及其同伙彻底划清了界限。马克思欣然同意这个委员会的要求。他在3月24日给俄国支部的回信中表示赞同它的纲领的国际主义思想,因为纲领宣称,压迫波兰也就是阻碍波兰人民和俄国人民的解放。他在结束这封信时写道:“弗列罗夫斯基的以及你们的导师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作品,为俄国争得了真正的荣誉,而且证明你们的国家也开始参加到我们这一世纪的共同运动中来了。”^②

马克思作为总委员会俄国通讯书记(从俄国支部一建立,就被委任此职),经常帮助俄国的革命家,同他们定期通信,把国际的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俄文版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64页。

况和总委员会的决议告诉他们，并给他们寄去必要的文件。马克思竭力引导俄国支部成员的思想不断进步，使他们接受科学共产主义的观念，从而帮助他们克服农村公社是资本主义发展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民粹派观点。马克思尽力帮助他们理解工业无产阶级——他们没有把工业无产阶级从劳动群众中划分出来——在社会改造方面的领导作用。

俄国支部的成员把马克思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的重要文件译成俄文并出版，其中包括《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马克思通过同俄国支部的接触，扩大了他的从事俄国革命运动的朋友的圈子。在支部成员中，同马克思有特别亲密关系的是吴亭和德米特里耶娃-托马诺夫斯卡娅，他们两人后来在伦敦访问了马克思，受到马克思的热情接待。

俄国支部人数不多，但活动非常积极，它的巨大贡献就是当国际工人运动中开展反对无政府主义的尖锐斗争时，俄国支部坚决反对巴枯宁，支持国际工人协会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的一翼。这个支部几乎从成立时起就一直积极地同瑞士的巴枯宁主义作斗争。⁵²³ 4月4日在绍德封举行的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吴亭发言揭露了巴枯宁。代表大会发生了分裂，结果原来赞同巴枯宁的放弃政治斗争的纲领的汝拉各支部，另外又选举了一个联合会委员会，自己命名为“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这两个联合会委员会都向伦敦申诉。6月29日，总委员会就瑞士罗曼语区的分裂通过决议，决定设在日内瓦的原来的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应当保留自己的名称和相应的职能，建议设在绍德封的新的巴枯宁的联合会委员会应另选一个对自己合适的名称。

第二帝国的危机和欧洲革命的前景

六十年代末，马克思满意地指出了法国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变化。国际在法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868年的两次审判案和帝国警察对国际不断的有组织的迫害，引起了具有反波拿巴主义情绪的工人和民主人士对国际的同情。马克思寻找一切机会帮助法国无产阶级选择革命的斗争道路，摒弃蒲鲁东的观点。

1868年4月2日同保尔·拉法格结婚的马克思的第二个女儿劳拉，于1868年10月和她丈夫一同到了巴黎。拉法格已经取得医生的资格，但是他并不急于行医，因为他早就向往另外的事业。在巴黎，他的政论家的天才最终成熟了，他作为法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开展了活动。

在女儿和女婿前往巴黎时，马克思交给他们一份完整的国际法国各支部附有地址的名单。临别以前，他们大概不止一次地讨论了法国工人运动的一个迫切问题：必须建立法国工人运动的统一，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这两个主要派别的代表人物的宗派主义立场是统一的障碍。因此就需要克服改良主义的幻想和密谋策略，在保护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者的利益的基础上，在反对帝国的斗争中，把所有无产阶级力量团结起来。

拉法格在巴黎的朋友和同志有欧仁·瓦尔兰、匈牙利社会主义者列奥·弗兰克尔、原总委员会委员孔博和若昂纳尔。他还经常接近布朗基的亲密战友：特里东、后来的公社将军埃德·卡斯、费雷。1869年春，布朗基派准备出版《文艺复兴报》，拉法格加入了编辑部，马克思也答应为该报撰稿。

这个时期，拉法格同布朗基经常会晤。布朗基常常秘密地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视察他的战斗组织，同时拜访住在向阳路的保尔和劳拉。1869年5月底，拉法格写信告诉马克思：“小矮个”（这是布朗基在党内的绰号）“对您尤其崇敬和仰慕”^①。布朗基热烈欢迎关于约请马克思为计划出版的报纸写几篇论德国社会政治状况文章的建议。但是出版这份报纸的计划当时没有实现。

1869年1月，拉法格夫妇生了一个儿子，马克思的第一个外孙。7月初马克思去看他们，因为他很担心劳拉的健康状况。他给恩格斯写道：“上星期二晚上我到了巴黎，本星期一（7月12日）离开了那里。我的化名始终没有被识破……”^②

在法国，立法团的选举刚刚结束，选举表明反对第二帝国制度的反对派有了很大的增长。1869年5月，瓦尔兰和他的同志们发表了《巴黎工人小组选举纲领》，它表明先进的法国工人已经把蒲鲁东的教条抛得远远的了。在首都，伴随着选举的是骚动（甚至还设置了街垒）和逮捕。马克思在巴黎的所见所闻，他从拉法格夫妇的谈论和书信中、从杜邦同法国支部的通信中、从报刊中所得知的消息，都证明第二帝国的危机已经明显，已经越来越加深了。1870年1月，马克思在估计欧洲革命的前景时写道：“……革命的发起可能来自法国”^③。

1869年12月，《马赛曲报》开始在巴黎出版，这家日报的编辑部包括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工人、国际会员、布朗基主义者、左派共和主义者，他们是在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中团结在一起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这份立即担任国际机关报职能的报纸。团结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成分的下一步骤，就是1870年4月建立国际支

① 《近代史和现代史》杂志1964年第5期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37页。

部巴黎联合会,在这方面拉法格和瓦尔兰起了重要作用。

525 政治上最积极的工人在国际周围的团结,使巴枯宁主义者的影响局限在法国南部。鉴于这一情况和群众的革命情绪的增长,一些国际活动家建议总委员会迁移到巴黎。看来马克思对这个建议是肯定的,但是并未实现。

拿破仑第三为了巩固他的摇摇欲坠的地位,又玩弄蛊惑人心的骗局,他规定在1870年5月8日举行全民投票。在全民投票的前夜,国际支部的一些领导人被捕了,他们被指控为阴谋危害皇帝的生命。5月3日,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用英文和法文发表《关于对法国各支部的成员的迫害》这份呼吁书。马克思在驳斥所谓国际参加阴谋活动这种荒谬的指责时写道:“如果说工人阶级,即构成各个民族的大多数、创造各个民族的一切财富、甚至篡夺者的政权也总是力图用它的名义来掩饰自己的统治的阶级,也在进行阴谋活动的话,那末它的阴谋活动也是在公开进行,有如太阳之冲破黑暗,——它充分意识到:除了它以外不可能存在任何合法的政权。”^①

同时,马克思建议总委员会公开与所谓伦敦法国人支部的冒险主义言行划清界限。这个支部有几十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流亡者,他们从1868年就同国际工人协会脱离了关系。这个支部的领导人费·皮阿及其拥护者所发表的挑衅性宣言,通篇是假革命的词句和进行个人恐怖活动的叫嚣。这些宣言被巴黎检察机关利用作为控告国际会员的材料。1870年5月10日,总委员会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决议,声明国际对皮阿集团的行动不承担任何责任。

迫害并没有吓倒法国的国际会员。马克思在1870年5月18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83页。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满意地指出，国际的一些组织和委员会虽被破坏了，但是法国全国各地又建立了一批新的，而且数量更多。布朗基派也开始建立国际支部。法国工人阶级正按照国际的纲领走向统一。但是这一重要过程还没有来得及取到显著成果，又突然发生了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第十二章

巴 黎 公 社

“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①

马克思

新的历史时代的开端

1870—1871年发生了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法国和德国的统治阶级发动了普法战争。法国的战败，不仅导致早已破产的第二帝国政体的覆灭，而且导致国内阶级对抗的极端尖锐化。

3月18日，一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巴黎爆发了，以巴黎公社的形式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家。公社标志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升时期的结束，标志着资产阶级的全盛时代、进步的
527 资产阶级的改革时代和摧毁封建专制制度时代的结束。开始了“资产阶级绝对统治和衰落的时代，……从进步的资产阶级变成反动的和最反动的金融资本的时代”^②。这也是工人运动和社会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1卷第125页。

义思想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关头。作为工人阶级的划时代的成就，公社在历史上第一次证明了：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结论，并不只是工人阶级思想家的理论分析的结果，而且是时代的命令，是实际的需要，是历史发展本身提上日程的问题。

公社的教训使工人运动的迫切任务显得突出了，必须把一系列科学共产主义原理作为公认的基本原则列入国际无产阶级的纲领。巴黎的事件表明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那些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流派是站不住脚的，明显地证实了科学共产主义的强大生命力。

尽管各国工人对公社非常同情，但是他们并不能立即接受和掌握公社的教训。对公社的教训还需要从理论上深刻地加以认识。只有战斗的无产阶级的伟大思想家和理论家，才能全面地揭示1870—1871年所发生事件的实质，并从中得出结论。这个任务，如同以往重大阶级搏斗的时期一样，又落到了马克思的肩上。正是他把这些事件看作是通往未来的起点，看作是新历史时代来临的征兆。马克思，作为公社的第一位历史学家和编年史家，把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变成广大群众的财产，把它保留给后代的无产阶级战士。

但是马克思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此。他不仅是理论家，而且是群众革命斗争的直接“参加者”^①。马克思领导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穿过事件的急流险滩，使它遵循革命方针，绝不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正是他一直鼓励工人阶级在战争时期采取独立行动，规定国际在这个时期的总的策略，帮助交战国和中立国的无产阶级力量制定策略路线。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88页。

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作为事件参加者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他同公社的领导人有直接的联系,给公社社员提出英明的建议。他和恩格斯一起进行了大量工作,竭力在各国工人中调整有时是直接发动支援公社的运动,使这个运动保持正确的方向。无产阶级国家失败之后,马克思热情地组织对公社流亡者的援助,他们是凡尔赛恐怖的受害者。

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一篇宣言

马克思在事件发展的进程中,对造成巴黎的革命形势的历史过程作了客观的评价。这些事件中的重要环节就是1870年7月爆发的普法战争。法国波拿巴集团不断炫耀武力,企图侵犯莱茵河左岸,支持德国某些邦的分立主义倾向,这一切给德国的统一造成严重困难。另一方面,由于侵略挑衅的波拿巴帝国这个战争策源地一直存在着,普鲁士容克和德国资产阶级好战集团的军国主义情绪也就加强了,他们借口维护德国民族利益,竭力实现掠夺性的王朝计划——把霍亨索伦政权扩张到南德意志各邦。俾斯麦巧妙地利用拿破仑第三和他的集团的沙文主义的言行来平息国内反普鲁士的情绪,诱使法国在战争冲突中扮演进攻者的角色。这场客观上为了阻止拿破仑第三永久瓜分德国而开始的战争,在这种条件下就有变成占领法国的一场战役的危险。

在1870年7月19日宣战的当天,在总委员会提出关于起草战争宣言问题的会议上,马克思就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切。总委员会委员中间意见并不一致:有人谴责一般战争,有人斥责发动战争的法国或德国的统治者,有人认为工人还没有力量阻止战争冲突。马克思提醒大家,“总委员会不应该研究一般的战争问题,

而应该研究这个特殊情况”^①。象往常一样，他始终主张具体地历史地对待事件。只有根据科学的分析，明确战争的性质、原因和可能的后果，才能制定国际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总委员会委托马克思起草宣言，在7月26日总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他起草和宣读的文稿，为全体出席者一致通过。宣言以传单形式发表，并刊登在国际的许多机关报上。资产阶级报刊也转载了宣言。

马克思在这个重要文件中首先揭露了波拿巴政体，并指出，第二帝国的军事失败可能使法国复兴，可能把德国真正统一的一个主要障碍扫除掉。因此，在这个阶段从德国方面来说应该把战争看成是防御性的。同时马克思严格地划清德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同普鲁士王朝的利益之间的界限。马克思警告德国工人，在普鲁士军国主义者的操纵下，战争有可能转变为反对法国人民的掠夺战争。马克思号召国际的德国会员提高警惕，并且欢迎他们同法国工人在两国政府把他们投入同室操戈的战争时在互通的音讯中所表现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感情。

马克思写道：“单是这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实，就使人们可以展望更加光明的未来。这个事实表明，同那个经济贫困和政治昏聩的旧社会相对立，正在诞生一个新社会，而这个社会的国际原则将是**和平**，因为每一个民族都将有同一个统治者——**劳动**！”^②

帮助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制定革命策略

对工人阶级，首先是交战国的工人来说，战争是一场严峻的考验。许多重大的问题，例如他们的国际组织（在自己的旗帜上写着

①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70—1871年。会议记录》1965年俄文版第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41页。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威信,今后工人运动的发展,都取决于他们所采取的立场:是仍然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还是屈从于沙文主义狂热。马克思竭力设法帮助国际工人协会的法国会员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整个战争期间坚持革命的国际主义的方针。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德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国际工人运动最有组织的部队采取什么态度。

7月21日在北德意志联邦国会表决军事拨款时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的立场,使马克思很高兴。他们两人在表决时弃权,并发表声明说,投票赞成拨款就意味着对普鲁士政府表示信任,而投票反对拨款又可能被认为是赞同波拿巴的罪恶阴谋。马克思认为发表这个声明是一个英勇的行动,他把它翻译成英语,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宣读后刊登在英国报刊上。

战争事态的不断变化,要求无产阶级的策略任务经常加以明确和具体化。德国人民群众正确地把战争看成是民族战争。决不应该削弱对波拿巴军队的打击。另一方面,波拿巴军队的惨败改变了局势,使战争接近了转折点。陶醉于战果的普鲁士统治集团,已经准备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了。马克思在8月17日写信给恩格斯说,战争的这样的结局“将会是欧洲,尤其是德国所能遭遇到的最大的不幸”^①。

主持党的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的李卜克内西,同不伦瑞克的社会民主工党委员会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李卜克内西在战争的初期对战争的防御性质估计不足。相反,不伦瑞克委员会的某些委员则抱有民族主义情绪。从不伦瑞克发来了告急信:期待着马克思的意见。

马克思在兰兹格特收到了这封信,从8月初他就同全家住在那儿。他觉得用书信交换意见还不够,于是专程到曼彻斯特去找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9页。

格斯，商量行动计划。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回信全文，没有保留下来，但是，在9月5日社会民主工党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宣言中，有不少引文是从回信中逐字逐句摘录的。

在总委员会的七月宣言中，马克思就预见到第二帝国的覆灭。8月底，他给不伦瑞克委员会起草回信，认为这种覆灭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到战争性质的改变，号召德国工人全力反对普鲁士军阀和德国资产阶级的兼并计划。他们详尽地阐明，夺取法国的领土将给欧洲今后的前途带来致命的后果，并指出这种强盗式的和平孕育着新的战争。他们在信中写道，实现德国统⁵³¹一的任务已经解决，虽然德国“首先要在普鲁士的兵营里取得自己的统一”^①。工人现在应该坚决力争同法国缔结光荣的和约，这样的和约才会开辟完全不同的前景：大陆的西部可能获得和平发展，可能使普鲁士溶于德国之中，在发生反对沙皇制度的战争和沙皇制度失败的情况下，还可能促使“俄国社会革命的爆发（这一革命的因素只有靠这样一种外来的推动才能得到发展）”^②。

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的德国先进工人及其领导者，在这段时期光荣地履行了自己对国际工人运动的义务。同支持德国统治者的沙文主义政策的拉萨尔派首领相反，爱森纳赫派完全接受马克思的意见，认为自己的策略重点是：反对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制止战争，争取同9月4日建立的法兰西共和国缔结光荣的和约。领导人的内部分歧消除了，党把自己的队伍团结在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的旗帜周围。虽然有战争时期的各种困难，处于戒严状态，党的出版物被没收，警察迫害横行，但是爱森纳赫派在群众集会和报刊上不断抗议继续进行战争和兼并计划。

党遭到了镇压，以白拉克为首的不伦瑞克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19页。

② 同上书，第318页。

被关入要塞。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他们曾投票反对继续战争的拨款）由于在联邦国会中做了揭露性发言，在会议结束后，于1870年12月17日也被捕入狱。

马克思采取各种措施揭露俾斯麦政权的暴虐和专横行为，设法减轻自己党内朋友们所遭遇的痛苦。他给英国报纸寄去许多关于不伦瑞克委员会被捕的简讯。他在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中痛斥俾斯麦对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所采取的警察行为，认为这是粗暴地破坏了他们的议员豁免权。马克思为德国同志的英雄行动而自豪，把他们当作国际的其他各国会员的榜样。国际组织了募捐，筹款帮助被捕的社会民主党人和他们的家属。

532

第二帝国的覆灭。关于普法战争 的第二篇宣言

1870年9月5日凌晨，从巴黎发来了一封电报：沙尔·龙格告诉马克思，头天晚上法兰西共和国宣告成立了。这个消息并没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意外，他们早就看出了波拿巴政权的腐败，看到国内无产阶级力量和民主力量的团结。他们在战争发生以前，尽管武装冲突已经是一触即发，早就期待法国的革命了；他们唯一担心的是法国无产阶级政党还没有建立就爆发革命。马克思在分析欧洲革命可能的发展方向时写道：“……第一次冲击将出自法国……”^①战争加速了这个结局的到来。这场爆发的序幕就是9月1—2日的色当溃败，当时一部分法国军队投降，皇帝本人成了俘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7页。

帝国的崩溃，使法国有可能建立民主制度，有可能在全国开展对侵略者的抵抗。但是，法国工人的那些最有经验的领导人，有的在狱中，有的流亡国外；国际会员由于被动员入伍，与自己的支部失掉了联系。由于无产阶级在组织上软弱无力，它的小资产阶级同盟者犹豫不决，右翼共和派和公开的保皇派就在9月4日组成了临时政府。马克思立即识破了他们的企图：他们要同俾斯麦秘密勾结，把投降的耻辱加在年轻的共和国身上，从而为恢复帝制打下基础。

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战争的性质也改变了，战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不仅必须重申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路线，而且必须为加入国际的无产阶级确定新的任务。马克思在9月9日总委员会批准的关于普法战争的第二篇宣言中就是这样做的。为了在宣言中彻底揭露普鲁士的兼并计划，马克思不得不分析并批驳普鲁士军事专家为兼并亚尔萨斯和洛林而编造的各种论点。马克思采用了恩格斯应他的要求而寄来的一些见解。

宣言要求各国无产阶级坚决斗争，反对肢解法国和侵占法国各省，反对普鲁士容克和德国军阀的掠夺政策。马克思以罕见的洞察力描述了俾斯麦侵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及由这种侵略引起的今后几十年内欧洲各种竞争力量的组合。马克思已经看出，报复行为是不可避免的，法俄联盟必然建立，这个联盟必将同德国及其可能的联盟者发生冲突。宣言指出，国际各支部应该号召工人行动起来，全力反对普鲁士掠夺者的计划。“如果工人们忘记自己的职责，如果他们仍然采取消极态度，那末现在这场可怕的战争就会成为将来发生新的更可怕的国际战争的预兆，并且会在每一国家内使刀剑、土地和资本的霸主们又一次获得对工人的胜利。”^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1页。

马克思在阐述法国工人的任务时，直率地指出，他们的处境极其困难。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是他们的职责，但是也要防止被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口号和资产阶级的妄想所迷惑。当时马克思警告他们，当政府还能自称为国防的真诚组织者的时候，推翻政府的任何企图是必定要失败的。工人应该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来加强自己的阶级组织。马克思写道：“这将赋予他们以海格立斯般的新力量，去为法国的复兴和我们的共同事业即劳动解放的事业而斗争。”^①

这篇宣言于1870年9月11—13日在伦敦以传单形式发表。俄国革命家洛帕廷也在宣言上签了名。他在到达伦敦之前，于1870年已经在巴黎参加了国际。9月6日，法国工人、总委员会委员奥古斯特·赛拉叶和马克思提议把洛帕廷选入总委员会，后来被批准了。

国际的巴黎会员没能避免马克思在宣言中所警告的危险。他们9月4日的宣言就重复了资产阶级政客的沙文主义口号。马克思在9月14日给德·巴普的信中写道：“这个宣言的整个调子是荒谬的，同国际的精神完全不符。”^②这是因为法国无产阶级的大多数领导人在理论上是落后的，他们有很长一段时期未能识破统治集团的投降计划。只有经过封锁的艰苦考验，在同资产阶级的残酷战斗中，巴黎的先进的工人才具备了成熟的阶级意识，才摆脱了有害的幻想。

第二篇宣言号召工人，特别是英国工人努力使本国政府正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54页。

承认法兰西共和国。马克思认为，这个行动能抑制普鲁士人的兼并欲望和法国保皇派的复辟企图。1870年9月，马克思通过总委员会的英国委员，通过当时同工联有密切联系的埃卡留斯，广泛开展了支持法兰西共和国的运动。在伦敦很快就举行了二十多次大小集会。曼彻斯特、北明翰、新堡的工人也卷入了这个运动。马克思鼓励英国工人采取传统的“外部压力”的手段，强迫不列颠政府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法兰西共和国。

必须克服和平协会中的那些主张英国严守中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的抗拒。9月13日在林肯法学协会里举行的一次工人集会上，由于一部分国际会员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及时出席，尽管有人竭力为中立辩护，还是通过了一项要求承认共和国和缔结没有兼并的光荣和约的决议。

9月27日一个代表一百多个工人团体的庞大的代表团会见内阁首相格莱斯顿，是争取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的高潮。马克思在10月4日总委员会的例会上揭露格莱斯顿伪善地回避直接答复工人，借口必须等待法国国民议会临时政府的批准。

在这场运动的紧急关头，总委员会里的马克思派核心大大加强了。1870年9月20日，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到达伦敦，住在与马克思的家相距不远的地方。1869年底，恩格斯有一个在保证他独立收入的条件下脱离商业公司的机会。恩格斯就开始忙于摆脱他所不堪忍受的商业业务，以便腾出时间来从事科学研究和党的工作。恩格斯迁居伦敦之后，对马克思来说情况有了很大变化。这两个朋友现在几乎每天见面。恩格斯非常乐意地把马克思在国际中担负的大部分实际职务承担起来。10月4日他被一致通过选入总委员会。考虑到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的威望和他精通许多欧洲语言，他被委派担任比利时通讯书记，而后再担任意大利和西班牙通讯书记。于是，在历史的这一段最关键、最紧张的时期，在国际无

产阶级组织的舵盘边，马克思有了一个与他肩并肩的亲密的、最可靠的朋友。

在承认法兰西共和国运动中的那些马克思的同盟者中，有信奉奥古斯特·孔德的实证哲学和社会学观点的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孔德否认阶级斗争，认为社会进步只是逐渐进化，首先是人类知识的完善。对英国孔德主义者的政治立场也必须加以批判，因为他们把法国临时政府理想化，真的把它看作是“国防政府”，把法国资产阶级看作是真正爱国的。马克思认为当务之急是尽量消除这种幻想。他在给英国实证论者历史学教授比斯利的信中写道：“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根据我从法国得到的种种消息来看，整个资产阶级都宁愿让普鲁士占领，而不愿让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取得胜利。”^①

由于法国外交部长茹尔·法夫尔打算访问英国，伦敦的实证论者以及与他们合作的那些改良主义的工联领袖准备对他隆重欢迎。在法国人民群众已经开始认识政府成员的卖国作用时，对法夫尔的过分颂扬是很不合适的。因此，1871年1月17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上发言揭露法夫尔，特别是揭露他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的不光采的行为。

恩格斯在伦敦《派尔-麦尔新闻》发表的《战争短评》这篇文章，对批判“卖国政府”在战争中的叛卖行为和整个法国资产阶级的投降立场，作出了重大贡献。尽管这些文章论述的纯粹是军事问题，但这并不妨碍恩格斯系统地阐述国际在战争各个阶段上的观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164页。

三月十八日革命

1871年3月18日的无产阶级革命宣告巴黎公社的成立。巴黎公社是受国际深刻影响的六十年代法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全部发展的结果。列宁写道，公社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巴黎工人，“在第二帝国的最后几年，他们中间进行了切实的社会主义宣传，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参加了国际”^①。正是应该从这个意义上理解恩格斯的以下这一段话：“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②。从公社存在一开始，各国工人就认为公社的事业就是国际的事业，都奋起捍卫公社。

在3月18日事件的前夕，总委员会的每次会议都要讨论法国的局势。3月14日，马克思驳斥巴枯宁主义者罗班关于立即召开国际代表会议——原定1870年9月在美国召开的代表大会，由于战争当然没能举行——的建议，理由是“巴黎情况极不稳定”^③。

马克思担心巴黎工人在不利的形势下过早地采取行动。但是，当无产阶级革命爆发时，他却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满腔热情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支持革命。

3月18日革命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总委员会正在紧张地批驳资产阶级利用巴黎局势尖锐化所散布的对国际工人协会的造谣诽谤。在3月21日的例会上，总委员会讨论了巴黎事件。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参加工人集会，向他们解释巴黎革命的实质，号召他们“同情巴黎人的运动”^④。尽管马克思

① 《列宁全集》第17卷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3页。

③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70—1871年》俄文版第103页。

④ 同上书，第112页。

和恩格斯意识到局势十分复杂，主要危险是凡尔赛反革命分子可能同普鲁士干涉者勾结，他们仍然认为有成功的希望。

到了3月底，马克思仍然相信革命运动可能席卷全国。只要坚决镇压巴黎的反革命分子并向反动的国民议会和梯也尔政府盘踞的凡尔赛进攻，起义者就能巩固自己的胜利，保证得到各省革命分子的支持。

然而，巴黎人的防御策略使首都陷于孤立。马克思很快就指出了直到3月26日公社选举日之前一直掌握政权的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所犯错误的致命后果。4月6日他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中央委员会以及后来公社都给了梯也尔这个邪恶的侏儒以集中兵力的时间：（1）因为它们愚蠢地不愿意开始内战，好象梯也尔力图用暴力解除巴黎武装并不是开始内战似的；好象只是为解决对普鲁士人的和战问题而召集起来的国民议会不曾立即对共和国宣战似的！（2）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它们失去了宝贵的时机（……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去进行公社的选举，而组织公社的选举等等又花费了许多时间。”^①

4月初，马克思冷静地衡量了双方的力量对比，认为革命胜利的希望愈来愈小了。但是他当时还是以科学家和革命家的洞察力充分估计了巴黎工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业绩。马克思第一个清楚地认识到，这是人民群众革命首创精神的空前的表现。他认为，巴黎事件是现代社会的旧力量之间的大规模冲突，它使无产阶级产生史无前例的英雄主义。马克思对事件实质的这种认识，在他给库格曼的信中是很明显的。

第一封信是4月12日写的，是对库格曼吹毛求疵地评论巴黎革命的回答。他在4月5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决不能期待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

脑不清的巴黎人实现生产方式的变革，一般说来这也不是个别民族所能实现的。”^① 马克思的信是驳斥那些以通常的尺度衡量公社、只看到它的活动中失策和错误的人的。当时马克思已经了解了公社最初采取的那些措施：废除常备军和警察，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实行彻底民主的选举制度，公职人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领取与工人同等的工资，等等。他写道，公社活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次打碎资产阶级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实践的尝试，这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必要条件，至少对欧洲大陆各国是这样。马克思热烈地赞扬公社社员的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精神：“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② 列宁称这封信是对巴黎英勇的工人的“讴歌”^③。

马克思在五天后写的第二封信，多少也是对库格曼的怀疑的继续回答。马克思指出：“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末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④ 他强调指出，起决定作用的不利情况是普鲁士占领军盘踞法国。反革命政府卑鄙地利用这一点，迫使工人抉择：或者发动起义，或者不战而降。假如是后一种情况，那么工人阶级的消沉，将是比起义失败更大得多的不幸。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由于巴黎人的斗争而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不管这件事情的直接结果怎样，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新起点毕竟是已经取得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23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207页。

③ 《列宁选集》第1卷第68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页。

了。”^①

可见，在4月中旬马克思已经认为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尝试，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它在工人阶级伟大解放斗争史上揭开了新的篇章。

同公社社员的关系

马克思利用每一个甚至极微小的机会，同公社的领导者取得联系，帮助他们制定正确的政策。根据总委员会的决定，奥古斯特·赛拉叶被派往巴黎。他的信件给马克思提供了珍贵的情报。但是，不久凡尔赛和普鲁士的警察当局就封锁了巴黎。只好把书信偷偷地带出城市，投进郊区的邮箱。比较可靠的是找机会托人带信，但信件带到时已经很晚了。有几封给总委员的信是由拉法格带出来的，他在4月初从波尔多到达巴黎。这些信再寄到伦敦已经是4月20日以后了。5月初，俄国民粹主义者彼·拉·拉甫罗夫给马克思送来一批信件。总委员会还通过同荣格有通信关系的伊丽莎白·德米特里耶娃与公社社员进行联系。

由于需要保密，马克思宁愿口述或通过他信任的人向公社转达自己的建议。除了赛拉叶，他还同弗兰克尔和瓦尔兰保持联系。通过他们，马克思竭力劝告公社采取更有力的行动来对付巴黎内部的反革命势力，他坚决主张对凡尔赛发动进攻。由于担心俾斯麦同凡尔赛人勾结起来，马克思建议公社委员们加强面对着普鲁士军队的蒙马特尔高地的北部。后来，他沉痛地写道：“……当时他们是还有时间这样做的；我曾事先告诉他们，如果不这样做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10—211页。

话，他们就将陷入罗网”^①。马克思警告公社中的那些真正无产阶级分子即他的通信者要防止小资产阶级活动家的阴谋。1871年5月13日他在给弗兰克尔和瓦尔兰的信中写道：“我觉得，公社浪费在琐碎事务和私人争执上的时间太多了。大家知道，除了工人的影响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影响存在。”^②

从保存下来的劳动委员会委员弗兰克尔的书信可以看出，他曾向马克思请教，怎样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关系的根本改造”^③。马克思建议公社首先保证取得外省支持，从而使巴黎摆脱致命的孤立状态，马克思实质上已向公社社员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无产阶级的同盟军问题。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认为，必须把法国农民吸引到无产阶级革命方面来。为此必须消除小农的反社会主义的偏见，向他们解释并通过实践表明，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才能保证他们的真正利益。

马克思十分赞扬公社为城市小资产阶级所实行的措施：取消房租欠款，债务分期偿还，取消债务利息。他在总委员会上说道：“关于房租和商业期票的法令，真是绝妙的措施。”^④

5月初，马克思为公社的军事情况非常担忧。

革命的巴黎陷落前两个星期，马克思把俾斯麦与法夫尔为反 540 对公社而签订的秘密和约的详情通知了公社社员，并向他们提出警告，敌人在5月26日左右可能会进行决定性的打击。他写道：“你们完全有必要在巴黎以外，在英国和其他地方赶快做你们认为需要做的一切事情。”^⑤ 马克思预见到公社的失败，他认为，没收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9页。

② 同上书，第226页。

③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和资料》1972年俄文版第45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26—227页。

兰西银行的基金，把那些能使凡尔赛恶棍们声名狼藉的案卷藏起来，这样公社就可能对梯也尔施加影响，迫使他作某些让步。

支援公社的运动

梯也尔政府竭力使公社孤立，脱离法国外省和国际无产阶级。马克思说，它的政策是“……为了防备外省发生拥护巴黎的总起义，企图用一道谎言的墙壁把它们包围起来”^①。各国官方的和右派的报刊，都追随凡尔赛反革命分子散布关于公社社员的最骇人听闻的谣言。马克思在4月6日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你千万一个字也不要相信报纸上出现的关于巴黎内部事件的种种胡说八道。这一切都是谎言和欺骗。资产阶级报纸上那一套下流的胡言乱语还从来没有表现得这样出色。”^②在这种情况下，向法国和其他各国劳动人民正确地报道巴黎的革命，揭露资产阶级对公社的诽谤，便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为了宣传巴黎公社的真相，总委员会利用了国际成立六年来所形成的全部组织网，即同各地支部、它们的机关报刊和领导人的全部联络体系。马克思告诉弗兰克尔：“各个书记在给大陆和北美各支部的信中，都向工人们说明了这个伟大的巴黎革命的真实性质。”^③

在许多国家中，马克思成功地发动了支持公社的广泛运动。这个运动在德国的规模特别大，这说明马克思对德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有深刻的影响。倍倍尔5月25日在国会的演说是国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5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

③ 同上书，第218页。

主义支援的突出表现。在资产阶级容克议员的堡垒里，在右派议员的一片尖啸嘘叫声中，倍倍尔英勇地宣称，公社是全欧洲无产阶级⁵⁴¹的事业，它必将取得彻底胜利。

在总委员会指导性的影响下，支援公社的国际主义运动取得了非常广泛的规模，这说明无产阶级群众的积极性和组织性到处都在增长。甚至在经济落后的、无产阶级刚刚开始独立斗争的国家里，公社在工人中也引起了热烈的反应，激起了支持和同情的热潮，推动了团结的愿望。公社促使工人阶级中的革命倾向显露出来，使革命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界限分明。革命派的代表，不顾后者的百般反对、警察当局的无理阻挠、资产阶级官方人士的公开敌视，奋不顾身地起来支援公社。突出的特点是：支援公社社员的示威和对凡尔赛反革命分子的谴责，到处都具有抗议和反对当地政治制度的性质，成为一种反对政府的斗争形式。维护巴黎公社不朽事业的这些行动，一直延续到公社失败之后。

由于有了马克思领导的国际，在公社的纪念日举行纪念活动，举行纪念公社的群众大会和集会，给法国工人写致敬信，这已经成为了许多国家工人运动的传统。西班牙社会主义报纸《解放报》在巴黎无产阶级革命一周年时写道：“人们认为公社永远被扼杀了，它活在工人阶级伟大的心坎上。”^① 1878年3月18日，敖德萨（俄国南方工商业中心之一）的工人在给法国无产者的信中写道：“我们在自己国内工作的目的，也是你们那么多的兄弟姐妹、父老子女和朋友们在1871年巴黎街垒流血牺牲所追求的那个伟大目的。”^②

在英国组织支持公社的活动是相当困难的。民主共和运动的右翼领袖，实际上在破坏群众维护公社的运动。在这方面，他们得到右翼工联主义者暗中支持。另一方面，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⁵⁴²

①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和资料》1972年俄文版第386页。

② 同上书，第417页。

者，往往以国际的代表的名义进行活动，他们举行那些喧嚣的、假革命的保卫公社的游行示威也给支援工作造成损失。资产阶级报刊又喋喋不休地说什么巴黎的革命是由国际从伦敦“操纵”的，因此总委员会不得不采取谨慎态度。

马克思在克服这些障碍时，利用先进工人、左翼共和主义者（他们是工人阶级忠实的支持者）对公社的同情，竭力吸引英国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参加支援公社社员运动。通过他的个人联系，他竟然能使资产阶级的和工联的报刊登载关于公社的客观报道和维护公社的文章。在工人的集会上，在共和派俱乐部的会议上，就有人发表演说并通过决议来支持公社社员。

在巴黎，血腥屠杀日益临近，这时特别需要英国工人阶级的帮助。马克思因病未能出席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5月23日，他在总委员会发表了长篇演说，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他毫不掩饰地指出，公社的结局快要到来了，但这只是无产阶级暂时的失败。“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①在讨论过程中，他建议总委员会中的英国委员最好组织一次公众大会并向英国政府派一个代表团，要求它采取措施制止凡尔赛人的血腥恐怖行为。

在法夫尔宣布公社社员为刑事犯、必须引渡给凡尔赛政府的5月26日通令颁布以后，关于使公社流亡者获得在英国避难权的问题就十分重要了。因此，5月31日在海-霍耳博恩街总委员会会址（总委员会从1868年6月至1872年2月在这条街的256号房屋里举行会议）举行了一次工人会议，讨论实现这个要求，各民主团体和共和派组织的代表也出席了。

格莱斯顿不得不考虑工人的情绪和国内的民主传统，他在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77页。

复法国政府事先提出的关于引渡公社社员的要求时说，这需要由英国法庭根据每个具体情况来裁决。当然，这就给流亡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马克思需要花极大的精力来安排对6月初开始来到英国的公社流亡者（往往还带着家眷）的援助工作。为他们寻找住所和职业，筹集必要的物资，直至衣服和家庭用品，这一切都要求付出很大的努力。但是马克思对这些零星琐事并不感到厌烦，认为这是自己的国际主义职责。总委员会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还同时起了公社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作用。马克思的家属也积极参加了筹集资金的活动。

马克思竭力鼓励到伦敦来的公社流亡者振作精神，很好地关心和照顾他们。那些参加过巴黎的伟大革命战斗的人经常在马克思家里受到殷勤的接待。巴黎公社的英雄、波兰革命家瓦·符卢勃列夫斯基，后来在1878年10月9日从日内瓦写给恩格斯的信中，以感激的心情回忆了他在艰难的日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照顾。他写道：“在我流亡伦敦时期，您的家和马克思的家成了我唯一的、真正充满友情的避难所，在这里你们对我多么友爱和仁慈……”^①

营救那些躲避法国凡尔赛警察的公社社员这项极端秘密的工作，要求特别小心，需要冒很大的风险。马克思不止一次地给他们提供英国的和德国的护照，使他们能用这些护照顺利地离开国境。

马克思认为，对于巴黎公社，主要的任务就是：从理论上分析它的教训，在此结论的基础上使无产阶级群众对公社的自发同情变为继续公社的事业并把它进行到底的自觉愿望。马克思竭力宣传公社的真实情况，这样就揭露了出卖灵魂的资产阶级记者的造

^① 博雷伊沙《在伟大的流亡者中间（1848—1895）》1963年华沙版第278页。

谣中伤，纠正了宗派主义者对公社活动的曲解。必须揭露凡尔赛刽子手、梯也尔和法夫尔反革命匪帮，这对于免遭屠杀的公社社员的未来命运也是重要的。所有这一切都促使马克思抱病起草总委员会关于公社的宣言，总委员会在1871年4月18日就已经最后决定要发表这一宣言，并委托马克思起草这个文件了。

分析公社的活动。起草总委员会的宣言

马克思开始起草宣言，象他往常的做法一样认真，首先是搜集和研究他所考虑的那些事件的实际材料。保存下来的一本摘录报纸材料的笔记本，证明马克思在这方面付出了大量辛勤的劳动。这些摘录充分表明，马克思善于在新的历史现象刚产生过程中就识别它们。马克思从报纸上的一大堆谣言和诽谤中发掘原始的事实、数字和某个政治活动家的典型言论，恢复事件的本来面目，观察它们的发展，探究它们的社会原因和政治原因。在摘录中，除了援引资产阶级报刊，还有从巴黎寄给马克思的许多公社机关报刊的名称。他一个一个地记录了公社的政治和社会措施，揭示了公社的实质是第一个工人的政府。在笔记本中接着又写了关于公社社员同凡尔赛分子战斗的札记。

马克思继续搜集材料，到4月下半月便着手起草宣言的初稿。在他着手写最后的一稿以前，5月初，他开始写了第二稿。

这两个草稿对一系列重要的论点阐述得比较详细，好象马克思是在给自己解释这些论点。他在这里阐明导致公社产生的历史情况，分析了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的社会经济措施和它对中等阶层的政策，批评它的错误，并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特征作了某些理论概括。

马克思发展了他的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学说的基本原理，阐述了关于这一阶段阶级斗争的性质和无产阶级的经济政策的深刻思想。他写道，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但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①。马克思着重指出，在建设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时期，无产阶级国家的经济活动将愈来愈具有重要的意义，无产阶级国家的任务是根据新的原则改造全部经济组织，使它摆脱自发的、无政府状态的性质，使“各种生产社会形式……在全 545 国范围内和国际范围内进行协调的合作”^②。

5月下半月，马克思已在写他的宣言《法兰西内战》的最后一稿。5月23日，他向总委员会阐述了这个文件的一系列论点，5月30日他在总委员会宣读了宣言的全文，它被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法 兰 西 内 战》

马克思写的总委员会关于法兰西内战的宣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的纲领性文件之一。这部经典著作以惊人的清晰性和科学的精确性，揭示了作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最初尝试、未来社会主义国家范例的巴黎公社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写道，马克思作为一个革命家，在他的著作中对公社作了一个“深刻的、准确的、出色而起积极作用的”^③估价。宣言是用振奋人心的革命文体写成的。无产阶级在思想上的成长，国际自从成立以来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马克思能够在阐述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时抛弃那种温和的形式，这种形式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活动初期出于策略考虑而不得不采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6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用的。现在他又能够而且认为必须重新采用《共产党宣言》的语言了。

马克思着重指出，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历史行动是消灭资产阶级国家的官僚机构、旧的军队和警察、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他在给库格曼的一封信中指出，公社实际地具体地证实了《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1852年)中所作出的结论：必须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这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解放的最重要条件。马克思认为，从巴黎公社全部经验概括出来的这个革命理论的主要原理是特别重要的。除了在《法兰西内战》中，他在不久以后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也明确地表述了这个原理。

546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粉碎了关于可能利用资产阶级国家本身达到社会主义目的的改良主义幻想。他指出，这种国家的剥削实质并没改变，不管它采取什么形式——君主制、波拿巴制度还是议会共和国。

同时，在工人阶级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国家这个问题上，马克思表现了他一贯辩证的、具体历史的态度。他反对教条主义地把某些原理绝对化。他在批判资产阶级议会制，强调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时，绝不否认可以利用民主自由和议会来为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谋利益。他指出，摧毁资产阶级国家，也并不是说就绝对不能保存各种传统的民主措施，如普选制，它们可以按真正人民的精神加以改造。他写道：“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首先用反映历史发展和当时欧洲大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

状况的材料，来论证关于用暴力消灭旧国家机器的原理。他认为，这个原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大多数国家但不是所有国家所必须遵守的。他在1871年4月12日写给库格曼的信中把这个结论说得十分清楚，他指的是欧洲大陆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认为，在那些还没有发达的军事官僚机构的国家，例如当时的英国，工人阶级有可能不经过武装起义而通过和平手段取得政权，并对国家制度进行革命的改造。

马克思这位革命的学者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从公社中看到了一个萌芽状态的无产阶级国家的面貌，看到了代替被打碎的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政权形式。他写道，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留在这个一般的结论上。他还指出了巴黎公社型国家的特征，揭示它的主要特点。他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把打碎旧的资产阶级国家同建设新国家结合起来，这就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的 547
创造性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社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变革是彻底破坏和消灭一切国家组织的观点是荒谬可笑的。公社通过实践驳倒了无政府主义者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否定。

马克思指出，公社是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体现和捍卫劳动群众利益、完全依靠大多数被剥削人民的国家。由于这种国家具有无产阶级的性质，所以它才能实行彻底的民主制——一切政权机关和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他们对人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按照真正的民主原则建设和组织武装力量（国民自卫军）、新的行政司法系统和公安系统。这个国家在各方面都力求根除官僚主义习气，消灭那些使官吏高踞人民之上的特权。

同时马克思指出，新的无产阶级政权应该是充分集中的、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硬的。它应该成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工具，镇压“奴隶主们的……暴动”^①的工具。公社社员们由于没有经验犯了错误，没有坚决利用这个工具来对付凡尔赛反革命分子。但是，这同资产阶级国家采用官僚与警察的手段实现集中制完全相反，巴黎公社型的无产阶级国家通过真正民主的方法实现了集中制。

马克思认为，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必须掌握充分集中的政权，因为还要做大量的工作来改造社会关系。只存在七十二天的公社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可能以应有的规模来展开这项工作。但是，马克思高度评价公社所实行的那些社会措施（把逃离巴黎的企业主的工厂企业交给工人合作社，等等），认为它们是标志着无产阶级国家为把生产资料、土地和资本变成“自由集体劳动的工具”^②而执行的经济政策方针的最初步骤。同时马克思又提醒人们，在实行
548 经济和社会改造时不要采取冒险主义态度。他指出，这些改造不是一下子就能实现的，不要以为公社或其他任何无产阶级政府能创造这种奇迹。完成上述任务，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环境还是人们本身都必将改变。因此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非常重要，这个国家要使“人人都能享受”教育^③，从而使世界科学文化的成果成为人民群众的财富。

马克思根据公社的经验，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作用，无产阶级是劳动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即它的天然同盟军）利益的真正捍卫者，是保卫真正民族利益的战士。公社鲜明地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实质，对资产阶级沙文主义、民族主义毫不留情。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6页。

② 同上书，第378页。

③ 同上书，第375页。

一个工人国家认为自己的任务同国际劳动人民的解放运动事业是一致的。各个民族的革命家同公社社员一起战斗。公社的全部活动令人信服地表明，无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任务同社会主义任务、它本国的目的同国际主义的目的都是统一的。

公社的最重要教训之一，与其说是由公社的积极经验不如说是由它的消极经验而产生的。公社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工人政权没有一个经过考验的、清楚了解它的任务的领导者——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正如恩格斯后来在评述《法兰西内战》的内容时所写的，能起这种作用的既不是在公社中最有影响的布朗基派，也不是左翼蒲鲁东派，更不用说小资产阶级新雅各宾派了。确实，革命的发展过程和群众的阶级本能，促使忠于革命事业的公社社员们去寻找而且经常找到正确的行动方式。但是这种行动方式不符合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教条，他们还没有克服这些教条的影响。这样一种自发的、模糊的并且往往违背自己信念的领导，绝不能实行彻底革命的政策，也不能预防种种不可挽救的错误。此外，各派之间的分歧又往往引起公社本身工作的混乱。无产阶级需要一个战斗的、团结的、了解社会发展规律的先锋队，——这个对马克思来说早已清楚的结论，现在又被巴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没有一个革命的政党，工人阶级便不能保住夺得的政权，并实现社会主义的改造。《法兰西内战》的整个内容，归根到底就是这个重要原理。 549

马克思从不把公社理想化，也不隐瞒公社的错误，怀着无产阶级政论家的热情，全面描述了巴黎公社社员的伟大事业。他颂扬巴黎普通工人的真正的人道主义，他们在战争破坏的情况下，经过四个月的封锁以后，开始英勇地建设新社会。他颂扬他们在完成历史使命时所表现的谦虚、勤劳和真正忘我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

创造使命的巴黎”^①，就是马克思的不朽著作中的主角。他认为与这种巴黎相对立的，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伪善、阶级利己主义和凶暴残酷，其化身就是扼杀公社的刽子手们，凡尔赛政府的头目——这些灭绝人性的“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②。

国际中的革命无产阶级的一翼认为《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纲领性文件，并竭力为它传播。宣言的英文第一版印了一千份，于6月13日问世，6月底出了第二版，印数为两千份。8月出了第三版。后来又立即采取措施，用德文、法文、佛来米文、丹麦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等发表这个文件。马克思的著作还没有一部在这么短的时期内传播得这么广泛。

宣言的广泛传播收到了效果：世界各地都在对它议论纷纷。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对它也不能采取缄默的方法了。6月中旬，资产阶级报刊开始以别有用心的评论或攻击国际的社论形式摘要登载马克思的这部著作。《泰晤士报》甚至两次发表文章。马克思的一位朋友曾就此给他写信说：“……从英国市侩的愤怒可以判断，世界上市侩们对您的《法兰西内战》想必是狂怒不已……”^③

550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受资产阶级报刊的挑战，并不回避论战。在短时期内，他们通常以总委员会的名义，给各报编辑部写了二十几封书信、声明和辟谣。他们希望利用英国资产阶级报刊规定的发表全部读者来信的传统。但是这种传统对于无产阶级的辩护人并不适用，《泰晤士报》、《每日新闻》等报纸只登载了几篇声明。其余的都登在各国的国际定期刊物上，而有些则以手稿形式保存下来，到后来才问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5页。

② 同上书，第394页。

③ 《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文件和资料》1972年俄文版第524页。

在对公社和国际的恶毒攻击嚣张一时之际，马克思尽管一向不允许公布那些表明总委员会的某个文件是出自他的手笔的材料，这时他却以个人名义承担了国际工人协会维护公社社员行动的责任。他在6月26日给《每日新闻》编辑的信中宣布，他是《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的作者，他准备向法庭证明他所引用的有关梯也尔、法夫尔及其喽罗们的事实是真实可靠的。

《法兰西内战》中明确宣布的国际的革命纲领，使动摇分子首先是许多改良主义者脱离国际。于是，1871年6月总委员会不得不同英国工联右翼首领奥哲尔和鲁克拉夫特公开决裂，他们在资产阶级报刊上斥责宣言，从而重复了右翼蒲鲁东主义者托伦在公社时期投靠凡尔赛资产阶级阵营的叛卖行为。同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者的矛盾也加深了。

同时，总委员会公开发表“维护共产主义的主张”^①（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份正式文件的广泛传播，大大地推动了国际工人协会中真正无产阶级力量的团结。越来越多的先进无产者更快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国际的革命旗帜下，无产阶级群众更进一步团结起来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66页。

第十三章

551

为国际的思想纯洁性而斗争

“摩尔的一生，要是没有国际，便成了挖去了钻石的钻石戒指。”^①

恩格斯

筹备伦敦代表会议

《法兰西内战》的出版，只是向工人阶级介绍巴黎公社经验的第一步。以后还要作不懈的斗争和做大量的解释工作，才能使公社经验所证实和丰富的那些原理，即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关于在每个国家建立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的必要性的原理，被正式承认为国际的纲领原则。

552 这时，对公社社员的残酷迫害正在发展成为世界反动派对国际的围剿，而且愈来愈具有欧洲各国政府共同镇压工人运动的性质。德国、奥匈帝国、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时、丹麦和沙皇俄国的政府参加了凡尔赛政府的警察行动。甚至在英国和瑞士这些“自由的”国家里，反动势力也要求迫害公社社员和国际成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44页。

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运动具有空前的规模。马克思在向1872年海牙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写道：“这场用诽谤来进行的战争，无论按其遍及所有国家的战场规模来说，还是按照统治阶级中各种色彩的人物参战的齐心协力的程度来说，在历史上都是无与伦比的。”^① 这场运动的特点是，攻击的矛头始终是针对马克思个人的。

《法兰西内战》出版后，马克思作为国际的领袖已经变成知名的人物了。他在工人和进步人士中的声望愈高，无产阶级运动的敌人对“国际的最高首脑”（敌对报刊这样称呼他）的攻击也就愈猖狂。资产阶级报刊重演故技，通过诽谤运动的领袖来破坏运动的声誉，并开始散布关于马克思的种种谣言。马克思一如既往，对他个人的攻击从不理睬。但是这些攻击如果危害国际，他就公开揭露诽谤者。

新的无产阶级阶层加入了工人运动，使情况更加复杂。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丹麦、荷兰、拉丁美洲这些当时落后的国家，成立了国际的支部并有所扩大。它们的许多代表人物，还受到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主要是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同时，被公社的光辉吓破胆的改良主义者，也加紧攻击国际的革命原则。

这就必须进一步明确无产阶级运动的思想政治任务，并改进它的组织形式。但是，最近期间不可能召开有全权的代表大会来讨论这些问题。考虑到当时的局势，根据1865年的先例，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1年7月25日建议总委员会在9月在伦敦召开协 553
会的秘密代表会议。

筹备代表会议的全部重担都落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上，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1页。

们必须起草一些决议，根据公社以后工人运动的需要明确规定国际的政治纲领，还必须团结总委员会的大多数人来支持这些决议。

8月15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代表会议只限于讨论“组织问题和策略问题”，从而为代表会议确定了方向。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总委员会委托常务委员会（小委员会）起草决议。这就使马克思更容易完成他的任务，因为在小委员会中多数人是支持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召开代表会议的消息通知国际的地方组织。作为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将此事专门通知了吴亭，并告诉他，代表会议还要研究关于同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巴枯宁主义者的冲突问题。

8月下半月，马克思由于过度疲劳，不得不暂时停止工作。但是他只打算在布莱顿休息两周，而且就是在那里他也是几乎每天写信给恩格斯研究国际的事务。

9月初马克思回到伦敦，又全力以赴地投入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9月5日他在总委员会会议上建议，总委员会委员出席代表会议应该有权发言；如果某一个国家的代表不能前来，则由该国的通讯书记担任代表。9月9日和11日在马克思的家里开会的小委员会，事先审查了决议草案。9月12日和16日，总委员会讨论并通过了这些草案。最后拟定了代表会议的议事日程。

9月中旬，代表们陆续到达伦敦。马克思和恩格斯接见他们，并帮助他们安排住宿。

马克思的家早就成为接待前来伦敦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场所，他们经常受到马克思一家的特别热情的接待。甚至同情无政府主义的西班牙代表安赛尔莫·罗伦佐直到临终还记得马克思在伦敦代表会议前夕对他的友好接待。三十年后他在回忆录中写
554 道：“……我坐的马车已停在马克思住宅的门前。从门里走出一位长者，他很象一位尊贵的大主教。

我畏畏缩缩恭恭敬敬地走过去，说明我是国际西班牙联合会的代表。长者拥抱我，吻了我的前额，讲着西班牙话把我引进住宅。他就是卡尔·马克思。

因为他的家人都不在家，他就自己极其殷勤地款待我进晚餐。晚饭后，我们一面喝茶，一面广泛地交谈，谈到革命思想，宣传工作，组织工作等等，在谈起西班牙所取得的成就时马克思表示很满意。”^①然后话题转到西班牙文学，马克思评论了卡德龙、劳贝·德·维加、提尔索·德·莫利纳的著作，他的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使他的西班牙交谈者十分惊奇。他们一直谈到深夜，罗伦佐就留宿在马克思家。黎明的时候，马克思才把他引进预先为他准备好的房间。

国际历史上的里程碑

1871年9月17日国际伦敦代表会议在托登楠大院路手工业工人俱乐部开幕了。马克思代表德国，恩格斯代表意大利出席代表会议。

马克思在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中说明了会议的主要任务，即“着手进行符合形势需要的新的组织工作”^②。因此他认为会议应该集中讨论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是同无政府主义和工联主义思想家斗争的焦点。围绕着有关这个问题的基本决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当然就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这个决议的最初草案，是由著名的巴黎公社参加者、布朗基主义者瓦扬在9月20日提出的。其中谈到，工人为了自己事业的彻底胜利，应该“在政治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36—33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693页。

基础上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就象应该在经济基础上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一样”^①。尽管瓦扬的提法含糊不清，但他的草案却引起了无政府主义者代表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支持西班牙人罗伦佐的建议，即建立一个脱离政治的工会国际联合会来代替国际。法国工人、原来的公社社员德拉埃也提出了类似的思想，他建议应该把未来的工会国际联合会看作是将来社会结构（“未来公社”）的楷555模，认为它应该建立在地方分权和自治的原则基础上。德拉埃认为国际的支部只要进行一些宣传活动就行了。这两个草案，无论是罗伦佐的，还是德拉埃的，实质上都是无政府工团主义的。

马克思为瓦扬的草案辩护并加以发挥，他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出的那种组织实际上同早已存在的工联是相类似的。与无政府主义者相反，马克思根据公社的经验，竭力主张工人阶级应该进行政治斗争，它的最高形式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他着重指出，无产阶级不组织成一个政党，就不可能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就不可能赢得政权。工会并不能起无产阶级政党所起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教育者和领导者的作用。因此，马克思指出，以工会来代替工人阶级政党是毫无根据的。

马克思在专门发言中指出了工会在组织无产阶级方面的巨大作用，同时也认为工会的活动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此外，他还揭示了当时英国工联特有的弊病，它主要代表英国工人阶级中少数享有特权的工人贵族，忽视低工资的工人群众的利益。

在谈到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形式和方法、它的革命策略时，马克思说：“我们应当向各国政府声明：我们知道，你们是对付无产者的武装力量；在我们有可能用和平方式的地方，我们将用和平方式反对你们，在必须用武器的时候，则用武器。”^②

① 《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9月17—23日》1936年俄文版第4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700页。

恩格斯在发言中也支持瓦扬的建议，他的发言既反对关于放弃政治行动的无政府主义的口号，也反对对“工人的政治”的工联主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就意味着使无产阶级利益适应资产阶级利益。恩格斯说：“……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策。”^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所作的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论证，对代表们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大多数代表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决议，总委员会，换言之，它的实际领导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被委托拟定该决议的最后文本。他们参照代表会议上支持该决议的发言，彻底修改了初稿。在这个决议的 556 定稿中是这样写的：“……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②

代表会议的其他决议也涉及到如何在国际内部贯彻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如何发展国际的策略原则和组织原则：关于工农联盟，关于促进工人阶级的国际联系（包括工会的联系），关于禁止协会内部存在阴谋集团和宗派主义集团，等等。这些决议中有不少是马克思提出的。例如，根据马克思和其他代表的建议，代表会议委托总委员会出版新的章程，它应包括历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全部修订意见。还要删除已经失效的条款。1871 年年底，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努力，经过修订的共同章程出版了英文本和法文本，1872 年出版了德文本。在《附录》部分中提供了全部修订的文件根据。新章程的出版和规定国际每个会员均须持有一份章程（在许多国家，在它上面还注明会费缴纳情况，因此这就成了一种会员证）的代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440—44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455 页。

会议决议的出版,促进了国际思想上的统一,加强了它的队伍中的纪律。

关于总委员会的拥护者同瑞士巴枯宁主义者之间的冲突是代表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马克思参加了审理这个问题的委员会。委员会经常是在代表会议之后,晚上在马克思的家里集会。他比其他人更熟知巴枯宁主义者的活动。他从国际的瑞士会员吴亭、培列、贝克尔那里了解到1870年4月在绍德封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罗曼语区联合会的分裂状况。马克思看到,巴枯宁主义者的破坏活动超出了瑞士的范围,他们还在西班牙和意大利搞阴谋活动。马克思从洛帕廷和其他俄国朋友那里知道了关于巴枯宁同革命阴谋者谢·格·涅恰也夫的联系,以及后者的恐怖、挑拨和欺骗手法的危害,特别是用这些手法对付参加革命斗争的人。但是,无论是马克思还是他的战友当时还不知道在协会内部有一个巴枯宁主义者的秘密组织,对他们的破坏活动的全貌和规模也不完全清楚。

这一切决定了马克思起草的这些决议的要旨:这些决议重申总委员会关于仍保留罗曼语区联合会委员会这一原有的名称的决定,从而回击了巴枯宁主义者篡夺罗曼语区联合会领导权的企图。

马克思对代表会议的成就相当满意,虽然成绩来之不易。在会议进程中他的发言竟有九十七次。9月23日他写信给在兰兹格特的夫人:“今天代表会议终于结束了。这是一件繁重的工作。上午和晚上都开会,间歇时专门委员会开会,听取目睹者的谈话,准备报告,等等。但是工作却比以往所有代表大会加在一起做得还要多……”^①

9月25日,在伦敦举行了纪念国际成立七周年的庆祝大会。代表会议的代表、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出席了这次集会。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98页。

克思在长篇讲话中揭示了公社的历史教训，以及刚刚结束的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意义。马克思在强调公社作为工人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夺取政权的最初尝试的世界历史作用时说道：“但是，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而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国际的任务就是把工人阶级的力量组织起来、团结起来，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斗争。”^①马克思通过这种形式再一次强调了从公社教训中得出的最重要结论的意义，这个结论就是必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

争取承认伦敦代表会议的 各项决议的斗争

马克思清楚地了解，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会遇到无政府主义者和改良主义分子的反抗，所以必须阐明这些决议的意义，使它们受到总委员会和地方组织的赞同。

虽然马克思的健康状况恶化，他还是以极大的毅力承担了这项任务。他得到恩格斯的大力帮助，这个时期总委员会所有最重要的文件和决议以及当时为实际措施而订的全部计划，都是他们两人共同的事业。

马克思的几个女儿给他的帮助也不少。劳拉和她的丈夫保 558
尔·拉法格，在法国和西班牙为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做了大量工作；燕妮和爱琳娜帮助马克思处理一部分日常通信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如既往，仍依靠各国著名的工人运动参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43页。

者，其中有他们的老战友：在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在瑞士的贝克尔，还有总委员会委员赛拉叶、杜邦、列斯纳、罗赫纳等人。他们还建立了一些新的联系。

伦敦代表会议结束后的头几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花了许多时间准备出版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以及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新版本，并把它们分送到各国去。他们在给工人活动家的书信中阐明了国际的地方组织承认代表会议的决议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一些联合会召开了专门会议来讨论这些决议。赞同这些决议的有德国的各支部、瑞士罗曼语区联合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英国的各支部、国际在美国和比利时的各支部。

伦敦代表会议的成就也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特别是1872年1月6—7日在开姆尼斯召开的该党萨克森区域代表大会的赞同。1月23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报告了这件事。爱森纳赫派对伦敦代表会议的态度，证明它坚决遵循国际领导人制定的方针。在反动派加强攻势、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派别猖狂活动这种复杂的条件下，爱森纳赫派成为国际内部的一支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国际的思想纯洁性、为科学共产主义原则而斗争的基本力量。在这场斗争中，大多数有革命思想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都日益紧密地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周围团结起来了。

加紧同巴枯宁分子的斗争。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

1871年11月底，马克思从巴枯宁派的一份《社会革命报》上得知，11月12日在瑞士的一个小城市桑维耳耶召开了巴枯宁派的瑞士支部的代表大会。它宣布伦敦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是与国

际的原则相矛盾的，它宣称各支部“完全自治”，拒绝参加政治斗争，并要求解散总委员会作为取消“任何权威”的第一步。它还宣布在瑞士的巴枯宁派支部已经成立了汝拉联合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桑维耳耶通告就立即准备以总委员会的名义⁵⁵⁹写一个答复通告，打算全面揭露巴枯宁分子的破坏和分裂活动。同时，国际的领导人也采取了措施，把一切能够回击巴枯宁分子的力量都团结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各国的国际工人协会代表们的信中，全面批判了无政府主义的学说和策略，揭露了否认任何“权威”和鼓吹工人放弃政治斗争的说教。马克思向拉法格和一些战友仔细地解释了一个有权威的、向整个组织负责的中央领导机关对于国际进行有效活动的作用和意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意大利与西班牙（巴枯宁分子认为它们是自己的堡垒）的无产阶级群众的代表们建立了直接联系。在国际的领袖们的影响下，这些国家里也出现了一批总委员会的拥护者，他们不断克服反无产阶级的思想的影响，加紧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其中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是著名的意大利报纸《人民报》的出版者恩利科·比尼亚米。德国社会主义者泰奥多尔·库诺是在意大利后来又又在比利时反对巴枯宁主义的积极战士。

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居留西班牙，帮助马克思和恩格斯同西班牙支部的创建人和领导人——霍赛·梅萨、弗朗西斯科·莫拉和帕布洛·伊格列西亚斯——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由于马克思的拥护者们同巴枯宁主义影响的斗争，1872年夏建立了新马德里联合会——总委员会在西班牙的据点。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拉法格和他们的西班牙朋友们，还同葡萄牙联合会取得了联系，最早向葡萄牙工人介绍《共产党宣言》和其他科学共产主义著作的诺布雷-弗朗萨，就是该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

起草反对巴枯宁主义通告的工作也进展得很顺利。1872年

3月5日，马克思向总委员会委员介绍了他和恩格斯用法文写的《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基本内容。委员会一致赞同这个文件，并授权小委员会予以发表。

《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这部著作，是捍卫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和揭露以极左词句掩盖无政府宗派主义活动的光辉典范。作者揭露了宗派派别的本质和历史根源，证明无政府主义者的教条是站不住脚的，他们的实际活动是恶劣的。

以不容置疑的事实和文件来揭露他们的活动，是很重要的，因为大多数国际会员还不了解巴枯宁分子的阴谋活动，以及他们对总委员会所采用的种种分裂和两面派的手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清楚地看出了他们的真正目的——篡夺国际工人协会的领导权。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才阐述了巴枯宁主义的公开的同盟与总委员会的关系的全部历史，揭露了巴枯宁的信徒诽谤攻击总委员会的内幕以及他们掀起的反对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运动。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地分析了桑维耳耶通告的全文，指出它完全是诽谤，具有破坏作用。

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巴枯宁分子的全部活动都贯穿着好斗的宗派主义，其目的是以宗派来代替国际，来代替这个在反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反对他们的阶级统治的共同斗争中联合起来的各国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斗的组织^①。《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的作者指出，社会主义的宗派是工人运动的早期不成熟的阶段——它的童年——的特征，正象占星术和炼金术是科学的童年一样。最初，宗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唤起工人对社会主义的兴趣，一旦它超过了这个早期发展阶段，就变成工人运动的障碍了。力图复活宗派主义的巴枯宁分子，反映了工人运动的昨天，竭力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6页。

工人运动拉向后退。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分析巴枯宁及其同伙的纲领时指出,它“不过是在响亮词句掩饰下的一些早已被埋葬了的思想的杂乱堆集而已,而那些响亮词句只能吓唬资产阶级的呆小病者或者只能作为波拿巴的或其他的检察官用来控告国际会员的罪证”^①。他们证明:无政府主义是毫无根据的,是敌视工人运动和工人阶级真正革命理论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全部根本任务——夺取国家政权并利用它来建立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国家必将消亡、消失——颠倒过来,主张一开始就破坏任何国家组织。最有害的是他们企图把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引入无产阶级队伍中,这就等于在同握有强有力的政治手段的剥削者的斗争中竭力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

在写作这本小册子的时候,马克思认为主要的任务是保持国际的团结,从思想上粉碎和孤立巴枯宁分子。他估计到,无政府宗派主义者的言行已经被急于宣布国际内部发生分裂和危机的反动派利用了。小册子的名称本身就是对资产阶级报刊这种流行的说法的答复。马克思和恩格斯着重指出,除了一小撮分裂者,国际虽然面临着迫害,但它是团结的,这种团结的巩固是无产阶级力量和成就的保证。为了使工人运动的敌人不再有诽谤的借口,《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只是作为协会会员阅读的内部通告,没有公开发发。

但是,在小册子快要出版的时候(它于1872年5月在日内瓦出版),同巴枯宁分子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872年4月底,马克思和恩格斯首先从拉法格提供的消息中知道巴枯宁分子宣布解散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仍然作为一个秘密团体保留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页。

当然，这就改变了斗争的性质。在国际内部存在一个有自己章程和纲领的、巴枯宁派的秘密的国际性组织，这说明用自己公开言论破坏协会思想统一的巴枯宁分子，实际上已经造成了协会组织上的分裂。现在问题不仅要同他们作思想斗争，而且要采取组织措施来切除国际工人协会身上的这个毒瘤。

反对改良主义

巴黎公社之后，英国自由主义工联成了国际内部从右的方面反对科学共产主义的主要思想敌人。改良主义者在总委员会中传播工联的思想，他们口头上赞同伦敦代表会议的决议，力图用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精神来解释这些决议。改良主义者认为英国的工人政党就是一个同自由派合作并在其帮助下保证“工人领袖”赢得议会席位的政党。

马克思看出英国工人运动正在向右转。因此这就需要防止英国改良主义者歪曲国际的原则，必须为未来的、独立的英国工人政党奠定思想基础。马克思希望，根据伦敦代表会议决议建立一个独立的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过去它的职能由总委员会执行），就562 能在 1871 年以后的局势下解决这些任务。在联合会委员会的协助下，国际就能把英国已加入工联和未加入工联的无产阶级群众都吸引到自己方面来。

但是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中有不少人同资产阶级激进派有联系。约翰·黑尔斯这个才能出众、很有毅力的人想领导该委员会，他当时在总委员会中在一系列问题上支持马克思的。但是机会主义倾向在他身上占了上风，他还力图使不列颠联合会的领导同总委员会分庭抗礼。黑尔斯为了保证自己在不列颠委员会中占多

数，就拉拢一些同他有密切联系的伦敦的半工人阶级、半激进派团体的代表人物。

在1872年1月16日总委员会会议上，马克思终于把小资产阶级组织的首先是共和大同盟的所有成员清除出联合会委员会。不列颠联合会的章程也作了一些修改，这就在某种程度上防止了小资产阶级分子钻进它的领导机关。马克思成功地团结了革命力量——列斯纳、杜邦以及前宪章运动的参加者米尔纳、墨莱、布恩等人，在他们的协助下，他才能同黑尔斯及其拥护者进行斗争。

在反对具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倾向的工联主义的机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斗争中，总委员会1872年春就爱尔兰问题展开的争论，具有巨大的意义。这场争论是因黑尔斯和不列颠联合会及总委员会的其他一些英国委员对在英国和爱尔兰建立的各爱尔兰支部采取沙文主义立场而引起的。黑尔斯反对建立独立的爱尔兰支部。马克思和恩格斯揭露他的这种行为是背离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并再一次强调指出，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是英国工人阶级最重要任务之一。

马克思利用每一个机会驳斥改良主义的思想。1872年3月3日，加入不列颠联合会的曼彻斯特外国人支部的领导人杜邦，请恩格斯帮他准备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根据这个请求，马克思于3—4月写了《论土地国有化》一文，把它寄给了杜邦。5月8日，杜邦在支部会上把这个手稿作为报告宣读了。6月15日这篇文章发表在 563
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的机关报《国际先驱报》上。

针对把土地国有化要求解释成纯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措施的那些英国改良主义者，马克思在这篇内容丰富、理论上极其重要的文献中，紧密结合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论述了国有化的问题。他指出，工人阶级不应该把这样的国有化，即

主张把已成为资产阶级国家财产的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个人或工人协作社”^①看成是自身的目的。这种国有化只会加强个体经济之间的竞争，使其中最大者靠生产者而发财致富。伟大的工人阶级运动的真正的“人道目标”^②，就是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变成公共的财产，变成“整个国家”^③的财产。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使“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彻底改变”^④，才有可能广泛利用集体的社会主义劳动的优越性，把一切生产部门，其中包括农业，用有效而合理的方式组织起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的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⑤马克思着重指出，只有通过深刻的社会革命，最后把国家政权从资产阶级手中转到无产者手中，才能做到这一点。

由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企图利用国际在美国的组织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在美国支部引起的这场冲突，使马克思的拥护者同机会主义的工联主义分子的分歧更进一步发展了。一些美国激进派活动家在纽约和其他各地开始建立一些其成员主要是资产阶级的支部。他们妄想领导国际在美国的所有组织，对它们的联合机构的权限表示异议，力图用资产阶级的改革要求来代替国际的纲领。真正无产阶级力量同他们的斗争已经变得非常尖锐了。

564 马克思在给左尔格、波尔特和国际在美国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信中，制定了基本的行动路线：无论如何要防止资产阶级激进派篡夺美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他在信中写道，必须克服宗派主义，争取把本地的美国工人首先是加入工会的工人都吸引到协会的队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3页。

② 同上书，第454页。

③ 同上书，第453页。

④⑤ 同上书，第454页。

中来。在美国，参加国际各支部的主要是外侨工人（德国人、法国人、爱尔兰人、捷克人），在这样条件下，马克思所提出的任务反映了在国内建立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密切注视美国支部的事件。马克思摘录美国报纸、小册子和其他材料的一本很大的笔记本被保存下来了。1872年3月5日和12日，他总结他所搜集的材料，向总委员会报告了美国的分裂情况，并建议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加强美国支部的无产阶级成份。

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总委员会决定把纽约第十二支部——资产阶级影响的主要策源地——开除出国际。

为了防止“伪改革家、资产阶级骗子手和卖身投靠的政客”钻进协会，总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决议规定，支部成员至少三分之二是雇佣工人。^①1872年5月28日，总委员会承认由各无产阶级支部组成的临时联合会委员会，是国际在合众国的唯一领导机关。

关于美国支部分裂问题的讨论，反映某些总委员会委员对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政治行动的决议做了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的解释，尤其明显的是黑尔斯和埃卡留斯号召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团结的发言。马克思同埃卡留斯决裂了。他们虽有多年的友谊，马克思仍然严厉地谴责了他的行为。他在1872年5月3日给埃卡留斯的信中写道：“……看来你以为，当你犯了错误，别人就得对你说恭维话，而不是象对其他任何人一样向你指出真理。”^②埃卡留斯不能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伦敦代表会议决议的真正意义，转到英国改良主义者阵营中去了，成了马克思和他的革命路线的公开反对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51页。

同公社流亡者的联系

总委员会内部的尖锐斗争，英国委员中改良主义倾向的加强，迫使马克思设法通过吸收新的力量来加强总委员会里的革命的一翼。补充力量的来源之一就是公社流亡者。马克思的援助公社流亡者的组织工作，使他接近了法国流亡者中一部分无产阶级代表人物。许多公社参加者，经过巴黎公社的锻炼，无论是布朗基派的，还是蒲鲁东派的，都逐渐克服了自己过去的空想主义观点，掌握了一些科学共产主义的原理。

那些主张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布朗基主义者，比其他人更快地接受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他们亲自同马克思接触，又读过《哲学的贫困》、《资本论》这些著作，这就使他们受到巨大的影响。

在马克思周围聚集了一些优秀的公社流亡者，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国际的老会员——匈牙利革命家列奥·弗兰克尔，法国社会主义者沙尔·龙格，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参加者、公社的将军符卢勃列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著名的公社社员。其中许多人被吸收进总委员会。

马克思影响公社流亡者的途径之一就是参加他们在1872年初成立的社会问题研究小组。这个小组讨论了关于公社的报告，以及与公社有联系的理论 and 历史问题。这就使马克思有机会宣传《法兰西内战》的思想。参加小组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这部著作对巴黎革命的真正科学评价。

3月12日，马克思被总委员会指定为同社会问题研究小组共同举办的巴黎公社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演讲人之一。3月18日，

五千多人集合在圣乔治大厅附近,准备开群众大会,但是被当局禁止了。出席者就推选一百五十名代表,在社会问题研究小组的狭窄的屋子里举行了集会,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决议。决议欢呼“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①。

迎接海牙代表大会

566

5月28日,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提议开始筹备应届国际代表大会。当时的局势由于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巴枯宁派加紧破坏活动而变得非常复杂。伦敦代表会议宣布的国际的政治纲领,也受到改良主义分子的攻击。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国际正处在“非常危急的”时期^②。

从1872年6月起,开始了紧张的筹备工作。马克思知道,这次代表大会对于争取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胜利将起决定性的作用。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这次代表大会将关系到国际的存亡。”^③关于选择代表大会的地点问题也很复杂。马克思建议在海牙召开。他的理由是:荷兰政府并没有公开镇压工人运动,此外,巴枯宁分子,尤其是英国改良主义者,在荷兰没有什么紧密的联系。

总委员会确定了代表大会议事日程的主要内容。在发给各支部的通知中指出,总委员会“把修改共同章程和条例作为……最重要问题列入议事日程”^④。但是,同要求按照无政府主义精神修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

^②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71—1872年。会议记录》1965年俄文版第1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49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3页。

章程的巴枯宁分子及其追随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修改章程就应该在协会的纲领性文件中贯彻伦敦代表会议的主要决议。总委员会在马克思领导下逐条审查了共同章程。马克思修改过的那份章程保存下来了。所有这些修改都为的是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马克思力求改进章程，希望它能成为未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纲领性文献和组织原则的基础。

总委员会在7月23日的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章程中应列入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这一决议的提案。马克思赞同这个提案，他在发言时指明，它既是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也是针对改良主义者的。他说：“我们有两种敌人：放弃政治的拥护者，他们对这个决议的攻击比谁都厉害；英国和美国的工人，他们让资产阶级利用来达到政治目的。我们应该结束这种状况……”^①

567 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准备关于巴枯宁派的秘密同盟的材料。必须通过一些文件材料来充实关于同盟进行破坏活动的现有资料，从而为国际开除同盟这个异己的、敌视协会的组织这项建议提出论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同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瑞士、美国的国际的活动家进行了广泛的通信，索取必要的文件，要求他们派代表来参加代表大会，并说明当前是同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把自己的代表塞进代表大会的巴枯宁派的决战。

马克思认为德国代表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出，1871年事件之后大陆上工人运动的重心已经移到德国，所以竭力帮助德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理论上和组织上加强。

马克思确信，当时唯一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参加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他的影响下，尽管党的领袖李卜克内西和倍倍

^① 《第一国际总委员会。1871—1872年》俄文版第196页。

尔当时还在狱中，而且德国社会民主党还要在8月在德勒斯顿举行自己的代表大会，德国仍然派出了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代表团。

马克思为保证代表大会的革命原则的胜利尽了一切努力，决定以后不再进入总委员会，这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恶化，而总委员会中的大量组织活动也妨碍他的理论研究。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他的一些亲密的朋友。

8月20日上午，作为美国代表到达伦敦的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访问了马克思。这次会晤和以后（会议之前，会议期间和会议之后）的经常来往，加强了马克思同这位天才的组织者和宣传家、严以律己和富有责任感的人、革命斗争的老战士的友谊。

海牙代表大会

9月1日，马克思同恩格斯、左尔格以及英国代表们一起到达海牙。同行的还有马克思的夫人。他持有纽约德国人第一支部和莱比锡支部的委托书。在海牙，他收到毛里西奥港意大利工人协会的来信，他们也选马克思作为自己的代表。

同一天，代表们举行了预备会议，在会上马克思见到了许多战568友：来自葡萄牙的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来自瑞士的贝克尔，来自德国的库格曼、工人哲学家狄慈根、《人民国家报》的编辑之一赫普纳。参加代表大会的还有库诺、龙格、符卢勃列夫斯基、弗兰克尔。

欧洲反动势力对国际在海牙召开的这次最有代表性的、有十五个国家六十五名代表出席的代表大会惊恐万状。各国间谍麇集在海牙。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也来了。马克思作为公认的国际领导人是代表大会的中心人物。大多数代表、当地工人代表以及同

情国际的民主人士的目光都向着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学者和革命家,《资本论》、《法兰西内战》和其他优秀著作的作者。一位参加代表大会的英国人马耳特曼·巴里写道:“卡尔·马克思特别引人注意,人人的嘴边都挂着他的名字。”^①

会议是在伦巴特街 109 号一家小小的斯赫雷伊费尔咖啡馆里举行的。代表大会引起了海牙劳动人民极大的兴趣,时常有一群人在门口欢呼和高唱《马赛曲》来欢迎代表们。但是沿街都布置了士兵,这就无法组织示威游行了。

马克思掌握代表大会的进程。他对议事日程上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发了言,会后还接见自己的战友们。

在代表的预备会议上讨论议事日程时,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决定从审查代表资格证开始工作。9月2日,在代表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马克思被选入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正如他所预料的,对委员会的报告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辩论持续了三天。9月3日,马克思在为被巴枯宁派的代表提出异议的拉法格的代表资格证辩护时,宣布在国际的内部存在一个秘密的巴枯宁主义的国际性组织是同国际的原则不相容的。当时他只是向代表们一般地介绍了关于存在一个秘密同盟的材料,并提议把它开除出国际工人协会。

马克思还为巴里的代表资格证辩护,因为有几个英国改良主义者以巴里不是英国工人运动“公认的领袖”为理由对他的代表资格证表示异议。马克思在答复时说,那些正式的英国工人领袖们“或多或少都被资产阶级和政府收买了”^②。这篇发言在不列颠联合委员会的改良主义分子中引起了尖锐的反应。列宁说道:“在1872年的联合会委员会上曾通过谴责马克思的决议,因为他说,

①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报告和书信》1972年俄文版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24页。

英国的领袖被资产阶级收买了。当然，马克思的意思并不是说，有些人是叛徒。这是瞎说。他说的是有一部分工人同资产阶级结成了联盟。资产阶级直接或间接支持这一部分工人。资产阶级的行贿就表现在这上面。”^①

在讨论过程中所通过的决议批准了总委员会的行动，这说明大多数代表对总委员会的活动、它同那些敌视协会的分子的斗争是赞同的。这场辩论也反映了代表大会上的力量对比。总委员会的反对者变成了少数。巴枯宁派首领——瑞士的无政府主义者詹姆斯·吉约姆及其信徒们——始终未能在自己周围凑起十六个以上的代表。

在9月5日上午第一次公开会议上，马克思用德文宣读了他起草的《总委员会向在海牙举行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的报告》，然后它还由几位代表分别用英语、法语和荷兰语宣读，并被代表大会通过。马克思描绘了世界反动派对国际工人协会的诽谤攻击，并概略地阐述了国际的成就和它日益增长的影响。由于警察的迫害和保密的需要，他不能引用具体的材料。

他的报告强调了组织对工人斗争的重要性。他写道：“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848年时期，工人阶级在没有国际组织时和有了国际时的区别就显得特别明显。要使工人阶级自己认识到1848年六月起义是它自己的先进战士的事业，曾经需要很长的岁月。而巴黎公社却立即受到了整个国际无产阶级欢欣鼓舞的声援。”^②

修改章程问题引起了尖锐的斗争。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否决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草案；取消总委员会，协会实行完全分权制，因为这实际上就是破坏工人运动。马克思为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做了明确的发言。同时他特别强调指出总委员会是对协会负责的，570

① 《列宁全集》第30卷第4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52页。

它的权威是有整个国际的拥护和支持的。马克思的发言既反对工联主义首领自命绝对正确和独断专横的作风（其中许多人在处理自己组织的事务时几乎不受任何人的监督），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否认任何权威。马克思的战友拉法格、赫普纳、左尔格等人也发言维护把民主和集中结合起来的协会的组织原则。赫普纳在驳斥巴枯宁派的论据时说，这些反对权威的人想把自己的原则强加于工人运动，“想实现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也就是说，想把一个有战斗力的国际变成穿着睡衣和拖鞋的小市民的政党”^①。

9月6日，代表大会通过了总委员会起草的关于修改共同章程和组织条例的一系列决议。条例第六条的修改，规定总委员会不仅有权将支部，而且有权将地方联合会开除出国际，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同时指出，如果采取开除这样的非常措施，必须得到整个国际的同意。

代表大会以相当多的票数通过了关于把伦敦代表会议《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稍加修改列入章程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夺取政权已成为无产阶级的伟大使命”^②。

专门有一项决议责成总委员会发起建立群众性的国际工会组织，从而强调了象国际这样一种政党类型的组织应该对工人阶级群众性工会联合会的建立起指导和领导作用。这样一来，决议就为发展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之间正确关系的原则奠定了基础。

最后一天，9月7日，代表大会研究了关于秘密同盟的问题。

571 9月5日，根据马克思的提议，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这个问

①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9月2—7日。记录和文件》1970年俄文版第1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65页。

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向该委员会提供了他们所搜集的大量材料，证明在国际内部的确存在着一个从事破坏活动的巴枯宁主义的秘密组织，它有自己的同国际工人协会的精神和原则相对立的纲领和章程。

由于大量的文件是用俄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写的，委员会的时间又有限，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详细的研究和对比。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提出的关于同盟的报告，只不过是总结这些文件的初步尝试，因为许多文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代表大会前夕才收到的。况且巴枯宁分子伪造的证据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委员会产生误解。吉约姆及其同伙声称，根本不存在秘密的同盟；而西班牙的巴枯宁分子却说，同盟只在西班牙活动过，它已经解散了。

这一切不可能不反映在委员会在9月7日提交代表大会的报告里。但是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秘密同盟的存在原则上是同国际的章程相抵触的，它的纲领是根本违背国际的纲领规定的。根据委员会的建议，代表大会决定把巴枯宁和吉约姆开除出国际，并公布有关同盟的文件。

在通过这个决议的前夕，9月6日，恩格斯以他本人和马克思、赛拉叶、杜邦、符卢勃列夫斯基以及其他一些总委员会委员的名义，建议总委员会驻在地迁往纽约。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这一步骤，不仅考虑到总委员会的活动在欧洲大陆上的不利形势，而且考虑到如果它继续留在伦敦，就有英国改良主义者或布朗基分子在总委员会中形成多数的危险。代表大会不顾布朗基分子的反对，通过了关于未来的总委员会的驻在地和成员的决议。

海牙代表大会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代表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组织原则对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学说的胜利，给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以致命的打击。章程中列入伦敦代表会议的主要决议也具有重大意

义。代表大会为在各国建立独立的政党，为这些政党按民主和必要的集中的原则进行组织建设奠定了新的基础。

572

代表大会之后。在阿姆斯特丹 群众大会上

1872年9月8日，以马克思为首的海牙代表大会的大多数代表，应国际的地方支部的邀请，前往阿姆斯特丹，这里为代表大会的闭幕，在一个不大的会议厅里举行了群众大会。马克思是主要演讲人。他的演说表明了对工人运动的历史状况和任务的深刻理解。马克思在阐述刚刚在海牙通过的决议的主要内容时指出，代表大会“宣布，工人阶级在政治领域内必须象在社会领域内一样，同正在崩溃的旧社会进行斗争……工人总有一天必须夺取政权，以便建立一个新的劳动组织”^①。

马克思的演说为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提供了科学的基础。马克思在驳斥对无产阶级运动的策略的改良主义的解释和使它变成某种在一切时代和一切条件下都一样适用的公式的宗派教条主义的企图时，发展并论证了他早在五十年代就提出的关于每个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可能沿着不同途径（和平的和非和平的）发展的原理。他谈到，在选择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策略形式和斗争方法时，必须根据一般的原则，并考虑每个国家具体的历史状况和特点。“我们知道，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我们也不否认，有些国家，象美国、英国，——如果我对你们的制度有更好的了解，也许还可以加上荷兰，——工人可能用和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78—179页。

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①但是，马克思强调指出，在当时的历史状况下，和平的革命过程的可能性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在大陆上的大多数国家中暴力应当是我们革命的杠杆；为了最终地建立劳动的统治，总有一天正是必须采取暴力”^②。

马克思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误解，向与会者说明，由于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它的成员的变动，并不意味着旧的委员其中包括他本人不再参加国际的事务了。他声明：“不，我不会退出国际，我将一如既往，把自己的余生贡献出来，争取我们深信迟早会导致无产阶级在全世界统治的那种社会思想的胜利。”^③

573

群众大会结束后，马克思和一部分代表大会的代表参观了风景如画、河渠纵横、有许多内容丰富的博物馆的阿姆斯特丹。翌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海牙附近海滨疗养地什文宁根的一个小饭馆，为代表大会的闭幕举行了午宴。参加午宴的有马克思全家、龙格、库诺和其他几位代表。在友好欢乐的气氛中，马克思同那些不取道伦敦回国的代表们告别。

9月中旬，马克思返回伦敦，开始从事他在海牙被选入的代表大会文件出版委员会的工作。他必须立即反击资产阶级报刊和无政府主义报刊对代表大会决议的意义的歪曲。他在写给《海盜报》、《每日新闻》、《人民国家报》的一些信件中驳斥了种种诽谤性谰言，特别是把同盟首领开除出国际说成是出于个人的竞争，而不是出于深刻的原则性的考虑的谰言。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179页。

③ 同上书，第180页。

国际的最后一年

新的总委员会一成立，马克思就经常地帮助它。由于他的坚持，左尔格才同意参加总委员会，后来又被选为总委员会的总书记。为了使总委员会更容易同欧洲各地方组织（其中一部分处于地下）建立和保持联系，马克思建议在个别国家设立总委员会的全权代表，主要由前通讯书记担任。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活动远远超出了这种全权代表的职务范围。他们充当了纽约与国际的欧洲各支部之间的联络的中介人，他们还指导其他总委员会全权代表的工作。同过去一样，他们还必须处理国际的许多事务，制定它的总路线，在同敌人的斗争中捍卫它的原则，进行广泛的通信。凡是总委员会做出的最重要的决议，左尔格都要征询马克思的意见。

这时，国际的内部状况愈来愈复杂，内部的派别斗争加剧了。总委员会迁往纽约，引起了布朗基派法国流亡者的抗议。1872年底，他们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国际和革命》，指责那些支持改变总委员会驻在地的人是“逃避革命”^①。小册子是自相矛盾的。它一方面反映了科学共产主义观点、特别是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对布朗基主义者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崇拜冒险主义的、密谋的、唯意志论的策略，同时也暴露了他们对革命行动必需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对当时号召直接行动可能造成的危害一无所知。公社布朗基主义流亡者想利用国际作为冒险主义政策的工具的这一步计划，证实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见是正确的，也证实了海牙代表大会为防止布朗基主义者控制总委员会而将驻在地迁出伦敦的决议是

^① 《国际和革命。前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公社流亡者为海牙代表大会而作》1872年伦敦版第8页。

正确的。

但是，对国际的最大威胁是巴枯宁分子的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期间和会后不久，马克思就知道巴枯宁分子正在同英国改良主义者建立联系，结成一个联盟来反对国际内的革命一翼。很快他又收到关于无政府主义者于1872年9月15—16日在瑞士圣伊米耶召开国际代表大会的消息，巴枯宁派在会上否定海牙代表大会的全部决议和新的总委员会的权限，宣布一些与章程相对立的无政府主义原则，号召所有敌视科学共产主义的派别联合起来。西班牙和比利时的无政府主义者、不列颠联合会的改良主义集团也紧紧跟随发起召开圣伊米耶代表大会的巴枯宁派的汝拉联合会。他们在1872年12月至1873年1月也分别在自己的地方代表大会上谴责海牙的决议。国际的分裂已成为事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看出从组织上同“左派”分裂主义者划清界限是不可避免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最重要的是防止他们利用国际的旗帜。正是这些巴枯宁主义者力图把马克思的拥护者同欧洲工人运动隔离开来，而把自己装扮成国际中的革命的一翼。同宗派主义者继续保持统一，不仅意味着国际的灭亡，而且意味着国际的全部成果化为乌有。因此在组织上同巴枯宁派分裂和彻底揭露秘密同盟，已经成了中心任务。

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结论，条例中关于暂时开除（直到应届代表大会为止）那一条款对于那些不承认海牙代表大会各项决议和575
国际的章程从而已经把自己置身于协会的队伍之外的支部和联合会是不适用的。恩格斯在1873年1月4日对左尔格阐明了这个观点。马克思在1873年2月12日给总委员会委员弗里德里希·波尔特的信中也详细地论证了这个观点。他写道：“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团体都有权退出国际，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总委员会就应正式确认这种退出，而绝对不要宣布暂时开除。暂时开除的规定是指这

样的情况，即某些团体(支部或联合会)只是对总委员会的权力提出异议，或者只是违反章程或条例的某一条款。但是，在章程中没有一条谈到那些否认整个组织的团体，根据一个简单的理由，即从章程中自然而然得出的结论是：这样的团体不再属于国际。”^①

马克思的这封信包含了关于党的建设、关于一切组织成员和地方支部必须遵守上级机关的决议和章程的深刻思想，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这封信成了纽约总委员会一项极重要决议的基础。5月30日总委员会作出决议：参加那些拒绝海牙代表大会决议的分裂主义代表大会的或者对这些代表大会表示拥护的一切全国性或地方性联合会、支部和个人，“已经自己把自己置于国际工人协会的队伍之外，并且不再是协会的会员”^②。

这项决议实际上把已经走上分裂道路的巴枯宁分子和改良主义分子开除出国际。这就意味着同敌视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的那些力量划清组织界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路线的胜利，这就能保持国际的思想旗帜以及它所制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原则和组织原则的纯洁性。

必须彻底揭露巴枯宁派的秘密的破坏活动。根据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应该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收集的有关巴枯宁秘密同盟的全部文件。由于同盟活动调查委员会没有这样做，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承担了这个任务。他们决定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出版一本专门的小册子。马克思还有另一个打算，它与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有一定的联系，这就是写一本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丹尼尔逊在1873年4月就把传记材料寄给他了。马克思知道，巴枯宁的威信是凭着他在同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实际上曾起过革命作用才有的。马克思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打算以俄国的另一位更彻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5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738页。

的革命战士和思想家来同巴枯宁相对比，他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观点比巴枯宁的唯心主义观点高超万倍，他对革命青年（不仅仅是俄国的）的影响，与巴枯宁的影响相反，是非常有益的，促进了革命青年靠近工人运动。

由于病情加重，马克思未能实现这个愿望。正因为如此，关于同盟的小册子的写作他也只参加了一小部分，它的主要部分是恩格斯和拉法格完成的。马克思亲自写的只是结语部分。但是小册子的计划与基本论点都是他们同马克思一起拟定的。

1873年8月，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出版了。作者们在发表这本小册子时正确地认为，对付巴枯宁分子的阴谋诡计，“只有一个办法，然而具有毁灭性力量的办法，这就是把它彻底公开”^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出色地运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的小册子根据许多文件证明了巴枯宁的秘密同盟的存在，揭露了它的破坏活动的所有丑恶的方面，以及它为了控制国际而把无政府主义教条强加给国际所施展的种种阴谋诡计和诈骗伎俩。

对同盟纲领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它同国际的革命原则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巴枯宁分子的思想武库太贫乏，太简陋了：他们用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观点按“兵营式共产主义”的精神来设想未来的社会，他们狂热地号召进行危害革命运动的暴动和全面破坏，他们玩弄超革命的词句，疯狂地仇视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他们依靠游民，以为这就是最革命的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捍卫了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抨击了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揭示了分裂活动给工人运动造成的危害。

在欧洲各国反动势力猖獗和国际内部分裂这种非常复杂的形 577
势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准备协会的下一届代表大会，按照在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72页。

牙通过的决议，这次代表大会应于 1873 年 9 月在瑞士召开。但是到 8 月下半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这次代表大会不可能有多大代表性的担心完全被证实了。一些资产阶级政府实行的残酷逮捕和迫害，许多国家工人运动的暂时低落，给代表大会的举行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局面。

马克思和恩格斯讨论了他们是否参加即将在日内瓦举行的代表大会，他们决定不出席。

国际工人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 1873 年 9 月 8 日在日内瓦召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预料的，参加代表大会的基本上是瑞士人。只有两名代表来自其他国家。在代表大会上，以贝克尔为首的大多数代表不得不进行艰巨的斗争，反对企图同无政府主义者妥协并主张总委员会迁到日内瓦的那些代表，而一旦迁到日内瓦就会造成总委员会被巴枯宁主义宗派分子直接篡夺的危险。经过贝克尔及其支持者的努力，代表大会克服了动摇者的阻挠，进一步确认了在海牙通过的决议。这样，国际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依然忠于它的革命无产阶级的旗帜。

国际工人协会停止活动

在筹备日内瓦代表大会时，马克思终于确信国际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871 年以后所发生的变化要求改变工人运动的组织形式。现在的主要任务是联合各国无产阶级力量，根据国际的纲领建立本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现有的国际无产阶级的联合这种旧的形式已不再适应已经改变了的无产阶级斗争的需要，何况它作为合法的群众性组织在许多欧洲国家由于警察迫害实际上已经不可能进行活动了。马克思 1873 年 9 月 27 日在给左尔格的信

中写道：“鉴于欧洲的形势，我认为，暂时让国际这一形式上的组织退到后台去，是绝对有利的……”^①

马克思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问题上没有任何教条主义，他⁵⁷⁸认为工人运动发展本身必将造成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的改变。他着重指出，国际停止活动，决不意味着削弱各国先进无产者之间兄弟般的国际主义的联系。国际工人协会所贯彻的工人运动的国际主义团结的原则，是永世长存的。所改变的不过是实现这种团结的形式。马克思在1875年写道：“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排除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的发展导致无产阶级新的国际联合组织的建立的可能性。他们希望，这种组织一开始就会完全以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为基础，并获得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的支持。

1873年底，国际实质上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它的组织活动几乎全部停止了，尽管1876年7月15日在费拉得尔菲亚代表会议上才最后通过了关于解散国际的决议。马克思活动的最光辉的篇章之一结束了。恩格斯后来在回忆这段时期时写道：国际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③。

马克思在九年里，放下他的科学著述，牺牲了健康，把全部精力投入第一个无产阶级群众性的国际组织的领导工作。这个组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6页。

的活动成果是极其辉煌的。由于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经历了一个最重要的发展阶段并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国际存在的年代里，欧美各国成千上万的工人联合在无产
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下，意识到自己是统一的劳动大军的战士。
工人运动第一次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强大因素出现在国际范围
内。作为马克思领导国际工人协会的结果，在向广大劳动群众介
579 绍伟大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方面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马克思以前的
的各种类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被击败了并被挤出去了，在德
国建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其他国家里也为建
立这样的政党创造了前提。

在第一国际存在的年代里，工人阶级取得了为争取自身利益
而斗争的丰富经验。巴黎公社（国际工人协会的全部活动为其成
立作了准备）以及马克思对公社教训的理论总结，对于以后的无产
阶级运动具有特殊的意义。在马克思的直接影响下，在国际的队
伍中成长了一批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组织者、政论家和宣传
家。国际的思想已经传播到世界许多地方，包括当时还落后的东
欧和拉丁美洲各国。

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用列宁的话来说，“奠定了国际无产
阶级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基础”^①。国际的功绩，对于国际工人运
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对于反对资本暴君、争取社会进步、争取共产
主义的以后一代一代的不屈的战士来说，是永放光芒的。“第一
国际是不会被人遗忘的，它在工人解放的斗争史中是万古长存
的。”^②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第210页。

第十四章

进一步发展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策略

580

“卡尔·马克思是那些罕见的天才之一，他们不论在科学或社会活动方面都是数一数二的。马克思把这两者结合得十分紧密，除非我们同时把他当作科学家和社会主义的战士，我们就永远不能了解他。”^①

保尔·拉法格

1871年巴黎公社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七十年代初的工业高涨，在1873年被空前持久的世界经济危机代替了，危机特别沉重地打击了德国和美国。工商业危机正好赶上早已开始的慢性农业危机。当危机的最初征兆刚刚出现时，马克思就预言了这次危机相当深重。1873年1月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写道：“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②

各个国家在世界经济中所起的作用开始有了变化。英国已经达到它的工商业垄断的顶点。在美国和德国出现了更快的经济发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5页。

展的征兆。已经可以初步看出，垄断前资本主义正在逐渐变成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过程完成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股份资本已经相当普遍了，尽管卡特尔在七十年代还是“一种暂时的现象”^①。

政治方面在七十年代，象在后来的二十年一样，其特点是相对和平，没有发生任何大的革命动荡。“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②这就是列宁对这个时期的描述。在欧洲，反革命资产阶级和大地主的政权，无论是象法国那样的保守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还是象1871年1月建立的德意志帝国那种反动的君主政体，是相对稳定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德意志帝国是“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③。在欧洲的国家中只有俄国在七十年代末开始出现新的革命形势，并且在巴尔干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没有停止。

正如马克思所预料的，普法战争的结果为新的国际冲突准备了基础，由于德意志帝国统治阶级的沙文主义侵略政策和法国资产阶级好战集团的复仇企图，在1873、1875和1877年出现了真正的战争危险。殖民主义扩张愈演愈烈，非洲大陆成了扩张的主要地区之一。

在这种形势下，工人阶级面临的任务是积聚力量，准备迎接新的革命斗争，在各个国家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成了首要的问题。列宁写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④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745页。

② 同上书，第4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22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但是，反动势力的加强，许多国家里工人阶级政治积极性的某种下降，业已破产但尚未退出舞台的宗派主义流派的代表的活动，这一切阻碍着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过程。改良主义的思想影响仍然存在，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还有某些消极面：马克思主义思想往往被领会得很肤浅，因此造成机会主义分子摇摆不定。

尽管如此，工人运动仍然取得很大的进展。由于国际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在许多国家中占据了牢固的阵地，对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段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他们不懈地宣传革命理论，经常帮助许多国家的工人活动家，这就使无产阶级分子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联合和团结起来了。

七十年代中期

马克思在摆脱领导国际的那些繁重的组织工作以后，在这段时期，就把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科学。首先是完成《资本论》的写作。

马克思一如既往以非凡的热情全神贯注地进行工作。即使在休息的时候他也还在工作；他在散步时不是与同伴交谈自己的想法，就是考虑各种问题。他几乎每天都要和恩格斯见面，总是激烈地讨论各种科学和政治问题。这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散步或者在马克思的书房里交谈，他们在房间里从一个角落慢慢地踱向另一个角落；马克思走一条对角线，恩格斯走另一条对角线。有时谈话变成一场真正的学术辩论，而且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的。

过分紧张的工作使马克思的身体又一次支持不住了。1873年

春天在他身上又出现了劳累过度的症状：剧烈的头痛、严重的失眠。几乎丧失了工作能力，这对于马克思这样的人来说是最可怕
583 的。稍后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中说：“丧失工作能力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①医生们严格规定他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四小时，并且要经常离开伦敦到外地去休养。恩格斯负责监督马克思是否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目的是想让马克思把“工作习惯改变”^②一下。

但是，马克思在1873年深秋在哈罗格特疗养和1874年春在兰兹格特海边的逗留并没有使身体有显著的好转。1874年夏，他的慢性肝炎反而更严重了。

根据医生的劝告，1874年8月中旬马克思由他的女儿爱琳娜（杜西）陪同前往卡尔斯巴德（卡罗维发利）。在那里，从8月19日到9月21日他们一直居住在日尔曼尼亚旅馆，这也是他后来几次疗养时下榻的地方。为了不引人注意，他在疗养者登记簿上登记的是食利者查理·马克思。

卡尔斯巴德的矿泉水对于病人的肝脏颇有效验。经过后来在这个疗养区的两次疗养——1875年8月15日—9月11日，1876年8月15日—9月15日（这次也是与爱琳娜一起来的）——马克思的身体情况总的来说有了显著好转。

体力的恢复使马克思能在从卡尔斯巴德返回的途中作了几次旅行。1874年9月他在德勒斯顿、莱比锡、柏林和汉堡停留，会见了许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家李卜克内西、盖布、约克，以及出版商迈斯纳。1875年，应麦克斯·奥本海姆（库格曼的亲戚，住在布拉格，非常赞赏该市的历史传统和革命传统）的邀请，马克思游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6页。

② 同上书，第596页。

览了“古老的胡斯城”^①。1876年9月15日，他再一次到布拉格去拜访奥本海姆，然后在爱琳娜的陪同下到宾根和克罗茨纳赫去旅行，他在克罗茨纳赫指给女儿看了三十三年前他结婚时度蜜月的那些地方。在返回伦敦之前，马克思到列日拜访了国际俄国支部原领导人吴亭。

从医学观点来看，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的逗留是十分有益的，但是，与疗养者们的交往却使他不太愉快。使他特别生气的是“那帮纠缠不休的汉堡—不来梅—汉诺威的庸俗男女”^②。他也对他第 584 一次来卡尔斯巴德休养时经常见面的库格曼感到失望。他一开始就对库格曼关于放弃政治活动和专心埋头于科学的建议感到厌恶。库格曼对待自己妻子和女儿的傲慢态度也使马克思气愤。有一次他再也忍不住了，直截了当地对库格曼说出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他们闹翻了，直到马克思启程离开卡尔斯巴德之前才重新和好，但他们之间原先那种亲密关系毕竟没有恢复。马克思对他老朋友的庸俗狭隘和唯我独尊的表现是不能原谅的。

但是在卡尔斯巴德疗养者中间，马克思也碰到了一些谈得来的人。他结识了几个有教养的、见多识广的医生、画家和学者。1875年秋，他在这里与早在伦敦就相识的著名的俄国民族志学家、历史学家和法学家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特别接近。他们经常一同到郊外去散步。

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引起了地方当局的特别注意。“红色博士”的名声早就引起官方人士和资产阶级公众的仇视和恐惧，他们硬说他参加了各种各样的革命事件，甚至也参加了意大利的无政府主义叛乱。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布洛斯根据一位目击者的叙述讲到，一个名字叫作麦克斯·卡尔的德国人在1873年到达米兰，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49页。

② 同上书，第123页。

就使警察当局惊恐万状，因为在外宾登记表上这个姓名的顺序颠倒为卡尔·麦克斯。当时他住的那间房屋被警察包围了，所有在场的人都受到检查，麦克斯本人被带到警察局，他好不容易才证明，他甚至不是和他们所认为的那个人同姓^①。

马克思在民主的英国度过了二十多年，即使在英国官方人士对他也是采取敌视态度。他想取得英国国籍的要求遭到了拒绝。1874年8月他在第一次去卡尔斯巴德之前曾向内务大臣罗伯特·娄提出申请，申请未被批准，理由是马克思“对普鲁士君主不忠”。

当然，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领土上，马克思只能得到更坏的
585 待遇。一开始他没有被人认出来，但是，1874年8月30日，疗养区的一家地方小报《喷泉报》——马克思把它称作造谣报——发表了“国际的领袖”^②来此治疗的消息。当马克思第二次到达卡尔斯巴德时，警察当局就有了戒备。1875年9月1日卡尔斯巴德地方长官向布拉格的上级机关报告：在疗养地有“一位著名的民主主义社会党的领袖”^③。波希米亚总督向维也纳内务大臣呈送了一份相应的报告。但是政府官员们从马克思的行动中找不到公开迫害的任何借口。他们只好下令对他进行“不断的秘密监视”^④。

1877年8月，马克思偕妻子和爱琳娜去诺伊恩阿尔疗养，这是莱茵普鲁士的一个僻静的疗养地方，它的矿泉水的疗效不如卡尔斯巴德的。他给恩格斯写信说，他把卡尔斯巴德矿泉水留着以备在病情危险时再用。他还诙谐地说，“对待自己的身体，……必须要

① 参看威廉·布洛斯1873年9月21日给恩格斯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3305。

② 埃贡·埃尔温·基施《卡尔·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1953年柏林版第35页。

③ 同上书，第20页。

④ 同上书，第22页。

要外交手腕”^①。但是马克思再也没有机会享用对他颇有疗效的卡尔斯巴德矿泉水了，因为德国和奥匈帝国先后对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的警察迫害以及后来俾斯麦反社会党人法的实行，使他再也不能到欧洲中部去了。

年复一年地消耗着马克思体力的病魔，并没有减弱他的脑力活动，也没有减弱这位研究者的孜孜不倦的精神和这位战士的热情。七十年代后半期，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他又非常热忱地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凡是在那几年见过他的人都很惊异，他做出的判断明确深刻，他的科学知识那样渊博、兴趣那样广泛，他对国际形势和各国状况了如指掌。一位在1878年12月拜访过马克思的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的通讯员奇怪“对近二十年来最重要的**美国问题马克思竟能如此熟悉**”^②。另一个美国记者、社会主义者约翰·斯温顿在1880年秋在兰兹格特与马克思有过一次谈话，他这样描述了他的印象：“他的谈话使我想起苏格拉底的对话。他的谈吐是那样不拘形式、那样明确利落、那样新颖独创、那样机智尖锐、那样真诚实在；还带有一些讽刺，有时幽默而且令人愉快。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谈到俄国的人心思变，德国的思想变革，法国的运动，英国的停滞。他用充满希望的声调讲到 586 俄国，用哲学的口吻论述德国，谈到法国时热情奔放，谈到英国时阴郁低沉，至于谈到自由派在英国议会中为之耗费许多时间的那些‘微小的改革’他则十分蔑视。”^③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仍然非常爱好文学艺术。许多访问过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9页。

② 贝尔·安德烈亚斯《马克思论德国社会民主党、俾斯麦和反社会党人法》。载于《社会史文库》1965年汉诺威版第5卷第367页。

③ 约翰·斯温顿《在英国和法国四十天的观感和札记》1880年纽约版第42页。

特兰公园路 41 号——这是马克思于 1875 年 3 月迁入的最后一个住宅——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爱琳娜·马克思的一位朋友马里安·科明说，在马克思的书桌上有许多诗人和散文作家的书籍，其中还有布尔韦尔-利顿的小说。前面提到的那个《芝加哥论坛报》通讯员在马克思的书房里看到书架上除了大量各种语种的科学著作外，还有莎士比亚、狄更斯、萨克雷、莫里哀、拉辛、伏尔泰、歌德等人的著作。马克思的一家人经常谈论文艺作品，他们讨论了维多利亚时期的一些作家，白朗特姐妹，以及各国新出版的文学作品。在卡尔斯巴德，马克思经常出席音乐晚会，喜欢合唱团的演出。他与画家奥托·克尼勒长时间地谈论过美术。

在伦敦，马克思经常去剧院看戏，特别爱看莎士比亚的戏剧。他和他家里的其他成员都非常赏识卓越的英国演员和导演亨利·厄尔文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天才演技。马克思同意他的妻子在德国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厄尔文和他的同事们在舞台上为恢复对这位天才作家作品的兴趣而进行的斗争。从 1875 年 11 月到 1877 年 5 月，她在民主派的《法兰克福报和商报》上发表的以伦敦舞台生活为主题的一系列文艺评论的文章中，详细地评述了厄尔文在扮演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麦克佩斯》、《理查三世》中的主角时的现实主义演技。她对英国资产阶级人士的趋炎附势、追求庸俗的传奇剧和小市民趣味的论述是一针见血的。她写道，这就是他们对莎士比亚冷淡，对厄尔文这样先进的、有创造性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不赞赏的原因。无产阶级观众是莎士比亚的真正赏
587 识者，是他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这就是那些文章的主要思想。这个思想和文章中表达的其他思想，包括对表演技巧的实质的思想，也反映了马克思本人的意见。

在 1880—1881 年，业余小组“道勃雷俱乐部”（这是按照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一个人物起的名称）在马克思的家里举办过几次沙

士比亚著作朗诵会^①。

象过去一样，马克思喜欢在空闲时下象棋。这时他的对手常常是杜西。

踏着父亲的足迹

马克思的成年的女儿们不仅是他钟爱的孩子，而且也是他的战友。燕妮和劳拉在六十年代末，最小的爱琳娜在七十年代都成了为工人阶级事业积极斗争的战士。马克思通过各种形式引导她们参加他的科学研究和党务工作。他完全有理由以自己的女儿们自豪，坚信她们决不会背离已经选定的道路。

马克思的女儿们很早就想为赡养家庭尽一份力量。燕妮从1869年就开始从事私人授课。十八岁的爱琳娜在1873年到布莱顿去当学校教员，但是疾病使她不得不中断她的教学活动。

三姐妹都见多识广，学习优秀，精通多种外语，在写作方面很有才华。除了社会科学、工人运动史和革命运动史，燕妮还喜欢研究自然科学，研究达尔文的理论。劳拉成了第一流的翻译家。后来她把《共产党宣言》译成法文，还翻译了其他许多马克思主义文献，她把贝朗热的歌曲，夏米索、欧仁·鲍狄埃（《国际歌》歌词作者）、博德累尔和其他诗人的诗歌译成英文。爱琳娜十分熟悉英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具有出众的表演才能，这使她能够在莎士比亚作品的研究方面一显身手并能登台演出。虽然后来她一直没有放弃文艺研究，并且仍然热爱戏剧，但她始终还是把参加工人运动当作首要任务。

^① 马里安·科明《我对马克思的回忆》。载于《十九世纪和十九世纪以后》1922年1月第539期第91卷第161页。

马克思的女儿们在青少年时代就热烈同情解放运动。燕妮喜爱的英雄是古罗马护民官格拉古，劳拉喜爱的是革命诗人雪莱，爱琳娜喜爱的则是加里波第。随着思想的成熟，她们的浪漫的革命情绪变成了亲自为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的自觉愿望。马克思的女儿们都成长为国际主义者，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运动都使她们欢欣鼓舞。为了表示对波兰 1863—1864 年起义参加者的支持，燕妮佩戴了一枚别人赠送的起义十字纪念章。在英国政府镇压爱尔兰芬尼亚社社员之后，她把纪念章系在一条作为争取爱尔兰自由的战士的民族标志的绿带上。燕妮、劳拉、爱琳娜同许多国际活动家和巴黎公社的英雄们保持着最友好的关系。她们热情支持俄国革命家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奋不顾身的斗争。洛帕廷、拉甫洛夫、德米特里耶娃、加特曼、以及后来的斯捷普尼亚克-克拉夫钦斯基，都是她们的朋友。

1868 年，劳拉把自己的命运和保尔·拉法格结合在一起，成为他在革命斗争中的忠实助手。不管命运把他抛到哪里，她一直在他的身边。她抱着小孩跟随拉法格去西班牙，躲避梯也尔警察当局对他的追缉，因为他作为国际工人协会波尔多支部的领导人曾经帮助巴黎公社的活动家们。劳拉协助拉法格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宣传国际的思想，和他一起出席海牙代表大会。

积极参加国际的事务的燕妮也同样经受过一场革命坚定性的严重考验。1871 年夏，她和爱琳娜在法国南部休养地巴涅尔-德-吕雄疗养时被逮捕，并受到上加龙省省长凯腊特里的严厉审讯。凯腊特里想探听当时已逃往西班牙的拉法格的情况。但是由于燕妮镇定自若和沉着冷静，警察的诡计和省长的威胁失败了。凯腊特里遭到了应有的驳斥，对马克思一家的妇女们的毅力很恼火。回到伦敦后，燕妮就在报刊上揭露了梯也尔共和国的头目。

1872 年秋，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全家重新团聚在一起。

保尔·拉法格和劳拉·拉法格住在离马克思家不远的伦敦汉普斯泰特区。1872年10月，燕妮和国际著名活动家沙尔·龙格结婚。马克思的两个女儿不得不作为政治流亡者的妻子过着艰苦的生活。沙尔·龙格想在牛津找一份固定的职业，但是没有成功，不久只好返回伦敦。直到1874年底，他才找到了一个教授法文的固定职业。同样，拉法格夫妇也有许多不幸的遭遇。尽管女儿们不得不经常与贫困作斗争，但是双亲仍然满意这种志同道合的婚姻。燕妮订婚时，她的母亲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这一对年青⁵⁸⁹人观点和信仰都一致”，这是“他们未来幸福的保证”^①。拉法格夫妇之间更是情投意合。

龙格在1880年被赦免后回到法国，不久拉法格也回到法国，那时燕妮和劳拉还暂时留在伦敦，和患病的双亲在一起。燕妮给龙格提供他在《正义报》的工作中所需要的通讯资料。她写给龙格的许多信件说明她对法国工人运动内部在建立法国工人党和制定党纲问题上所进行的斗争有强烈的反映。她爱龙格，但是毅然指责她的丈夫在关键时刻在思想上摇摆不定，她坦率地向他表明她不同意他对马克思主义纲领采取反对立场，不同意他接近资产阶级激进派。劳拉·拉法格回到法国以后也成了工人党的积极活动家。

马克思的小女儿爱琳娜也是很早就开始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了。1874年，她在法国流亡者杂志《红与黑》上发表了她的译成法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演说。她还积极参加英国的社会活动，竭力支援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她在父亲逝世后，同1873年就与马克思一家结识的自然科学博士、达尔文主义者爱德华·艾威林结婚。八十年代，艾威林夫妇在英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中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4页。

起了显著的作用。

马克思对女儿们的接二连三的不幸忍受了很大的痛苦。他在1874年8月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在这方面，我不象在其他事情上那么坚强，家庭的不幸常常使我十分难过。”^①拉法格夫妇三个小孩的天折、燕妮的第一个孩子的早亡，对马克思来说都是残酷的打击。他在1874年8月14日给燕妮的信中写道：“想起他来，我心如刀割，这样可爱、这样迷人的小家伙难道能使人忘记吗！不过，我的孩子，为了你的父亲，我希望你坚强起来。”^②

马克思把对女儿们的爱也转到了外孙们的身上。燕妮在第一个小孩夭折之后又生了四个儿子：让(1876)、哈利(1878)、埃德加⁵⁹⁰尔(1879)、马赛尔(1881)和一个女儿燕妮(1882)。和孩子们在一起，同他们做游戏使马克思感到真正的愉快。马克思当时喜爱的小孩埃德加尔·龙格后来回忆说：“他和孩子们在一起玩时，自己也好象一个孩子，从不耽心这会有损他的尊严。”^③这些孩子们总是同外祖父处于平等的地位。

正如马克思在给他在她的大女儿的一封信中所说的，要“实实在在地担起做外祖父的责任”^④，他认为不能只是让外孙们开开心，用一些礼物使他们高兴等等，而首先应该是关心他们的发育和教育。马克思很关心孩子们的阅读，让他们从幼年就接触世界文学的经典著作。他非常注意使外孙们有一个全家充满正直、互相尊重、团结友爱的环境。即使在那些最顽皮的孩子们眼里马克思也享有绝对的威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9页。

② 同上书，第642页。

③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01页。

④ 同上书，第302—303页。

就社会主义革命理论问题 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的理论工作主要是《资本论》的写作。但是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的需要以及同反马克思主义流派的思想斗争的必要性，往往迫使马克思去研究革命理论的其他问题，进一步发挥并具体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和策略原理。因此，他也在意大利社会主义报刊上积极参与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他对无政府主义流派的方法论和世界观做了总的批判性分析。

早在1872年1月，马克思给意大利年鉴《共和国年鉴》寄去一篇《政治冷淡主义》的文章，但是这本年鉴拖到1873年底才出版。除了马克思的这篇文章，这本年鉴还发表了恩格斯的文章《论权威》。

马克思的这篇文章揭示了关于工人阶级放弃政治活动、不参加民主运动和不建立自己的政党等等这些无政府主义说教的危害性。马克思指出，在“社会清算”——似乎这是对工人有利的——的假革命词句掩盖下的这种说教，注定要使无产阶级无所作为、士气低落，使雇佣奴隶制永世长存。“在等待这个美好的社会清算 591 时，工人阶级应该象一群饱食的绵羊那样，温顺有礼；不去打扰政府，要害怕警察当局，尊重法律，毫无怨言地充当炮灰。”^①

无产阶级国家是对社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工具，是这篇文章的中心内容。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以革命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②，马克思在卫护上述思想而同他们论战时指出，从历史上来说，无产阶级国家是暂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6页。

时的。列宁在评论这篇文章时写道：“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①

马克思在批判地研究 1873 年在日内瓦出版的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时，使自己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规律的观点更有系统和更加深刻了。巴枯宁的信徒们把这本书奉为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准则。当然，马克思决不能忽视他在国际中的这个主要的思想敌人所写的这一著作。他在 1875 年上半年以摘要或评述的形式写了一篇独特的著作（1926 年才在苏联发表）。实际上，马克思的《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批判地分析了巴枯宁的主要的历史观点和社会观点，阐明了他自己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重要问题上的思想。

马克思指出巴枯宁世界观的特征是：唯意志论，不懂得革命必须具备客观的、社会和经济的前提，指望游民阶层，把似乎对社会主义最有准备的东欧“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与被文明“败坏”的西欧民族对立起来。在谈到巴枯宁观点中的唯心主义基础时，马克思写道：“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②

592 马克思指出，无政府主义首领高喊废除国家，其实这是以进步和落后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拉平”为基础的未来“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最原始的理想。这些理想充分表明巴枯宁无视生产力发展的作用，无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无视作为社会改造的工具的工人阶级政权，无视无产阶级政党的意义。马克思写道，巴枯宁“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只知道关于社会革命的政治词句”^③。

针对巴枯宁的观点，马克思论述了关于无产阶级国家实质的

①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22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90 页。

③ 同上书，第 695 页。

深刻思想。工人阶级一旦夺取政权，必须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摧毁旧的社会组织。用“新的社会组织”取代旧的社会组织是工人阶级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马克思认为这样的国家是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变革的主要杠杆，是积极影响客观的社会过程，加速这种过程的力量。

马克思的这篇摘要比过去任何一部著作更详尽地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暂时性和国家消亡的社会基础的问题。“……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么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① 马克思认为，只有在实行深刻的社会改造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国家消亡的先决条件。他指出，“阶级统治一旦消失，目前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也就不存在了。”^②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对待农民的政策方面，马克思也作出了一些重要的结论。他阐明了关于工农联盟的原理，不仅指出必须通过符合农民利益的有效措施来赢得农民群众对无产阶级国家的支持，并且还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吸引劳动农民参加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实现从农民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个体小经济转变为大集体经济的方法这样一些丰富的思想。马克思强调指出，任何人为地加快这一过程的暴力的或强制性的措施都是不能容许的。马克思写道，无产阶级要“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4页。

② 同上书，第699页。

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①。

对待农民的政策应当是灵活的，应当考虑到各国农村人口的社会组成的特点、他们的传统和习惯。只有在租佃资本家撵走了农民，而真正的农民变成了无产者的地方，才能够加快实现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但是在农民小块土地占优势的地方，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操之过急只会败事有余。这与巴枯宁提出的实际上是更加扩大小块土地的措施一样，是不适宜的。

对国际工人运动的思想领导

国际停止活动以后，马克思仍然是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上的领袖和导师。尽管没有担任什么正式职务，他和恩格斯在工人运动中一直起着领导作用。工人和社会主义者越是懂得对无产阶级革命斗争问题必须采取科学态度，他们对马克思也就越加尊重。进步的工人在摆脱改良主义思想引起的狭隘学理主义和实践主义以后就越来越深信：“工人阶级的事业”，正如意大利社会主义者尼约基-维亚尼在1877年3月29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所写的，“不是教会里的教条，而是科学的理论”^②。因此，随着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的每一个新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提供科学论证的人的名字也享有越来越高的威望。正象一位美国记者在1878年对马克思所说的，甚至他的敌人也认为他是社会主义运动的“头脑和心脏”^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5页。

② 奥斯瓦多·尼约基-维亚尼1877年3月29日给恩格斯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3768。

③ 贝尔·安德烈亚斯《马克思论德国社会民主党、俾斯麦和反社会党人法》，载于《社会史文库》第5卷第372页。

恩格斯写道：“马克思由于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成就已经赢得了这样的地位，各国工人运动的最优秀的人物都充分信任他。他们在**紧要关头**都向他请教，而且总是发现他的建议是最好的……马克思所起的特殊的和对运动极端重要的影响，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① 594

马克思经常和那些来伦敦的社会主义者们聚会和交谈。那时他的客人有西班牙人霍赛·梅萨(1875年夏)，国际丹麦支部的创始人、丹麦社会主义者路易·皮奥(1876年秋)，俄国革命者彼·拉甫洛夫。马克思还有十分广泛的通信联系。向他求教的不仅有经过考验的无产阶级运动的领导人，还有刚刚从事革命斗争的人。

经常和马克思恩格斯通信的人有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赫普纳、盖布、艾希霍夫、狄慈根、布洛斯特等。马克思还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韦努伊埃有书信来往。1877年初他与法国的社会主义者青年大学生的代表加布里埃尔·杰维尔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在巴黎度过大半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卡尔·希尔施不仅与马克思而且与他的女儿爱琳娜都有频繁的通信往来。从瑞士给马克思来信的有老贝克尔和国际活动家培列。从比利时来信的有格拉泽·德·维耳布罗尔，从丹麦写信来的有皮奥。1875年从伦敦移居维也纳、以后又移居布达佩斯的列奥·弗兰克尔，曾向马克思报告了他在奥匈帝国活动的详细情况。马克思的俄国朋友洛帕廷，波兰朋友符卢勃列夫斯基，意大利人比尼亚米等也时常向他报告他们自己的情况。关于俄国情况的详细报告则来自丹尼尔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国也有许多通信人。除了他们的好朋友左尔格，他们还收到移居美国的克林格斯、库诺、波尔特、爱尔兰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4—225页。

麦克唐奈和欧仁·杜邦等人的来信。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的人也愈来愈多了。

马克思想方设法帮助工人运动活动家宣传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他不得不经常为再版和翻译《资本论》、《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著作而操劳。当时急需出版一些通俗读物。马克思非常了解对广大群众阐释经济学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他对通俗解释《资本论》的人的要求和对译者的要求同样严格。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变成无政府主义者的约翰·莫斯特于1873年在开姆尼斯出版的简述《资本论》第一卷内容的小册子《资本和劳动》很不满意。但是
595 是由于当时还没有另一种通俗性的概述，马克思就迁就了李卜克内西的要求，同意在1875年8月把这本小册子检查一下出第二版。这本小册子虽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但是马克思纠正了一些严重的错误并作了一系列修改和补充。小册子的修订本于1876年出版。

马克思认为向工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并传授无产阶级的过去的斗争经验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他特别关心要真实地向读者介绍国际的历史。他严厉地批判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和无政府主义的作者所撰写的关于国际的著作，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例如他认为蒲鲁东分子弗里布尔的书就是“一本最不可信的”著作^①。

马克思特别憎恨那种故意伪造的行为。1878年，他在英国的进步报刊上坚决驳斥了原总委员会委员、自由派工联主义者乔治·豪威耳在《十九世纪》杂志上发表的粗暴地歪曲国际的文章。豪威耳的杜撰绝不是出于他的无知，而是由于他敌视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运动。马克思指出：企图诽谤革命的一翼并宣称无产阶级国际联合的思想是无用的，这正符合于那些被英国资产阶级所腐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40页。

的“工人活动家”的世界观，他们的特点是“摹仿那种有着满腹的德行、有支付能力的道德、钱袋满满的英国人所固有的思维方式和文体”^①。

马克思曾打算找一些合适的作者来写国际的历史，因为他本人还腾不出手来做这件事。他细心地保存了他所掌握的工人协会的各种文献，它们是写作国际历史的重要资料。

马克思认为让工人运动的参加者吸取巴黎公社的经验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撰写真实的巴黎公社历史对此具有促进作用。他认为原公社成员普·奥·利沙加勒 1876 年在比利时出版的那本关于公社的历史的书是十分成功的。作者在写作该书第一版和准备后几版时，吸取了马克思的一些意见。马克思热心地建议白拉克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承担“这部对于我们党具有重要意义和德国读者普遍感兴趣的著作”^②的德文版出版工作。他为该书寻找译者并为 1878 年出版的德文版核对了译文。⁵⁹⁶

这几年马克思仍然十分重视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各国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者。与那些妄谈国际灭亡、国际工人运动瓦解的资产阶级的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家相反，马克思始终强调：国际工人协会只是作为一定的组织形式停止活动，但是工人团结一致为加强在每个国家和在世界范围内都必将不断发展。这是因为工人群众“在经常的、积极的、直接的交往中，由思想交流、相互帮助和共同意愿团结起来”^③了。

马克思努力使各国社会主义者继承和发扬国际的传统，忘我地始终一贯地支持被压迫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他参加了 1875 年 1 月 23 日在伦敦举行的纪念 1863—1864 年波兰起义十二周年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68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88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69 页。

际大会。马克思、恩格斯、弗兰克尔、利沙加勒、拉甫罗夫在这次大会上发表了演说。与会者聚精会神地听了马克思的演说，他在演说中对波兰民族——“全世界的革命战士”^①致以热诚的敬礼，因为波兰民族的子弟在国际解放运动中起了杰出的作用并参加了巴黎公社。马克思说：工人阶级维护波兰的解放事业，因为工人阶级从根本上反对民族压迫，而这种压迫是阻碍社会的发展、妨碍劳动人民争取摆脱社会奴役的斗争。波兰的解放对于俄国、普鲁士奥匈帝国这三个专制国家将是一个打击，必将促进整个欧洲的社会解放运动。

马克思认为，建立各国社会主义者之间的联系是特别重要的。但是马克思对于为建立新的国际联合而召开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建议是很谨慎的。他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采取这一步骤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时宜的。此外，马克思还担心，无政府主义者阴谋采取这个步骤来拯救自己的国际组织免遭崩溃，而改良主义者又千方百计地夺取建立国际联合的主动权，所以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的思想本身可能因此而丧失信誉。而一旦真的需要建立这样一个组织时，这就会使它的建立更加困难。

因此，马克思对1877年9月9日—15日在根特召开的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的结果是满意的，大会击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头目吉约姆、克鲁泡特金等人再次把巴枯宁派的原则强加给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企图。代表大会不顾他们的反对，作出了关于工人必须参加政治斗争和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决议。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者的追随者，其中包括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都与无政府主义者脱离关系。马克思认为根特代表大会——正如他在1877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一封信中说的——“至少有一点是好的，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31页。

是吉约姆之流已为他们原来的同盟者完全抛弃。好不容易才把佛来米工人劝住，否则他们就会把伟大的吉约姆痛打一顿”^①。

马克思相信工人运动未来的成果，但并没有把它理想化，也没有忽视各国工人运动所面临的困难。他痛心地谈到法国工人尚未抛弃蒲鲁东主义和其他空想主义的幻想，同时指出：他们暂时还没有克服理论方面的落后性^②。与此同时，马克思把法国工会的建立看作是一种积极的现象，他在1874年8月4日写给左尔格的信中指出，虽然这些组织还深受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和合作社主义者的影响，对工人运动的任命的理解还过于肤浅，但是工会的成立却是法国无产阶级组织性增强的证明，马克思认为，工会运动展现了在法国争取建立群众性工人政党的远景^③。

另一方面，在法国仍然保持着国际的革命传统，它们得到社会主义团体的成员和工会左翼小组的支持。可以看到，工人运动的优秀分子都强烈地向往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指出，无政府主义分子已经把意大利、西班牙的工人运动，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比利时的工人运动引入绝境。但是他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因为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在实践中毫无结果必然会引起工人对他们的“超社会主义”^④的失望。他在1877年5月3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对上意大利联合会的声明表示满意，它声明“正式同意大利各巴枯宁主义团体断绝直接的联盟关系”^⑤。在西班牙和比利时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

马克思认为，英国工人运动的衰退是因为改良主义的影响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1页。

③ 同上书，第637—638页。

④ 同上书，第6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页。

益增长。自由派工联主义首领是改良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他们是自由党的政治附庸，以向资产阶级献媚讨好的代价换取资产阶级在议会选举中对他们的支持。马克思写道，“产业工人应当首先摆脱他们现时的领袖”^①，才能实行独立的阶级政策。

马克思认为，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障碍，除了客观原因（工人阶级的流动和多种民族成分，土著美人和移民工人之间的不等等）以外，就是相当一部分工人对资产阶级“职业政客”的依赖^②。在工人组织中还有不少宗派主义分子妨碍开展争取群众的斗争。但是，阶级对抗的加深是促进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有力因素。1877年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是美国阶级斗争明显的爆发。马克思把这一斗争描写为“反对国内战争后产生的联合资本寡头的第一次爆发”^③。马克思强调说：“美国罢工斗争的高涨很可能成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的起点。”^④

马克思认为1874年4月5—6日在诺伊德尔费耳召开的创建奥地利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大会对于奥匈帝国的工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他对捷克无产阶级代表能参加大会的工作感到特别高兴。这说明斯拉夫工人开始“同德国工人采取一致行动”^⑤。马克思认为，社会民主党人的最重要任务就是使以煽动民族不和为统治阶级政策基础的哈布斯堡帝国的各地工人阶级进一步加强国际团结。

马克思对德国工人运动的发展特别满意。那里的爱森纳赫派
599 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最强大、最有组织性的民族分遣队。德国工人政党在普法战争期间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英勇地保卫了巴黎公社，因而受到各国工人的尊敬并赢得几乎一致公认的国际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1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59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8页。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地位。列宁指出：从 1871 年以来将近半个世纪，德国工人阶级“是全世界社会主义组织的榜样”^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导师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作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对它的领袖们提出了特别高的要求，密切注视他们是否遵循革命的方针，绝不容许对这一方针有任何背离。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关怀着把德国社会民主党变成一个群众性的、思想成熟的政党。马克思千方百计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俾斯麦制度，反对警察专横和军国主义的斗争。他很注意那些经常遭受迫害的爱森纳赫派从事活动的艰苦条件。1872 年 3 月，党的领导人倍倍尔、李卜克内西、赫普纳被莱比锡法庭判处两年徒刑。然而警察的迫害只能提高社会民主党在群众中的威望。马克思写道，“在德国，俾斯麦在为我们工作。”^②

马克思高度评价德国工人党的组织工作、它在工会的活动和它在出版党的刊物方面的努力。爱森纳赫派在 1874 年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包括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在内，赢得了六个席位。爱森纳赫派领导人巧妙地利用国会讲台揭露俾斯麦的政策并宣传革命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伦敦得到了热烈的赞许。

马克思十分满意恩格斯在那段时期大力帮助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恩格斯在《人民国家报》上的那些政论文章，他针对德国

① 《列宁全集》第 27 卷第 45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638 页。

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所写的《论住宅问题》、连载文章《行动中的巴枯宁主义者》、《流亡者文献》和《德国农民战争》第三版序言等，都表明了这两位战友的共同观点。

600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在党的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没有恩格斯的
多，但是他仍然利用再版自己过去的著作的机会在前言和跋中向他的德国朋友们提示对党说来十分重要的问题。考虑到德国到处都是警察迫害的气氛，马克思认为有必要在1874年10—12月《人民国家报》上连续发表《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随后又于1875年初出版了这本抨击性小册子的单行本。马克思为单行本写了一篇跋，其中说道，和普鲁士1852年科伦案件时期的情况一样，在俾斯麦的德国，进行“无限统治”^①的是政治警察。马克思指出俾斯麦及其仆从们“消灭工人政党”^②的企图是十分可笑的。反动分子的任何努力都不能阻止社会主义革命的临近。“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达到均衡。”^③

虽然马克思对于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取得的成果感到由衷的高兴，却没有忽视德国社会民主党活动中的阴暗面。爱森纳赫纲领中还保留着拉萨尔的观点的痕迹。加入爱森纳赫派的一部分原拉萨尔分子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拉萨尔思想和名望的崇拜。不是所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都懂得为消除德国工人思想中的拉萨尔主义残余而斗争的重要意义，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在1873年向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专门在这方面进行解释工作。倍倍尔在回信中承认“对拉萨尔的崇拜必须连根拔掉”^④。他还特意建议马克思亲自承担对拉萨尔著作的批判。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马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26页。

③ 同上书，第627页。

④ 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册第237页。

克思在经济学领域的学术权威,是确定无疑的,所以这样一篇著作会发生莫大的作用。”^①

理论修养的不足有时使党的领导人难以识别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形形色色的小资产阶级著作家的言论的庸俗性和反革命的本质。而这种作者的文章还经常出现在党的刊物上。马克思在1874年8月4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你也许已经看到,《人民国家报》上有时刊登一些不学无术之徒的市侩幻想。这种破烂货是从教师、医生和大学生那里来的。恩格斯已经把李卜克内西痛斥了一番,看来,有时这样做对他是必要的。”^②

601

消除德国工人运动内部分裂的尝试使保持党的思想旗帜纯洁性的问题显得分外迫切。社会民主工党和拉萨尔的全德工人联合会这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组织的存在,正在分散工人阶级对付资产阶级和容克地主的力量。它们在德国统一的方法问题上的主要政治分歧,在1871年德意志帝国成立以后已经失掉了现实意义。在两个组织的一般成员中间合并的愿望增强了。

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分裂给德国工人阶级带来的危害,但是他们一再指出,真正的统一只有在坚定的思想基础上,在承认科学共产主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他们认为对倒退的拉萨尔教条进行批驳是合并的必要条件。由于消除拉萨尔主义需要一定的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劝告德国的战友们对于组织上的合并不要操之过急,但是同时要采取实际的步骤建立行动上的一致。他们担心,如果没有必要的思想准备和政治准备,就匆忙实行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联合会的合并,这将增强党内机会主义成分,降低党的思想水平,弊多而利少。他们认为,要实现统一,首先应当尽力巩固社会民主工党,加强它与群众的联系。这样才能迫使拉萨

^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我的一生》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2册第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638页。

尔分子接受一切的必要条件。

最初，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是遵循这些意见的。在1874年7月召开的党的科堡代表大会上，主要是由于李卜克内西的努力，尽管有人主张立即合并，还是通过了这样一条路线：一方面要与拉萨尔组织进行实际合作，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在无原则地混淆拉萨尔教条与党纲党章的基础上合并。代表大会制定的路线是：“统一，但不是合并”^①。

可是李卜克内西没有能坚持这一立场。他在与拉萨尔分子协
602 商过程中，实际上开始贯彻不惜任何代价实现合并这个想法。他断定取得的好处足以抵偿全部让步。1875年2月，李卜克内西、伯恩施坦等在纲领的许多重要问题上向拉萨尔分子妥协了。

合并纲领的草案于1875年3月7日在党的报刊上发表。马克思和恩格斯得知这个草案之后即刻确信爱森纳赫派犯了严重的错误，它将给党带来恶果。这份草案意味着对机会主义派别让步，与同样很不完满的1869年爱森纳赫纲领相比，是一个倒退。后来，恩格斯在评述这个最后经过某些修改的纲领时写道，这个纲领是折衷主义的东拼西凑的产物，它的组成部分如下：“（1）拉萨尔的词句和口号，这些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应接受……（2）一系列庸俗民主主义的要求，这些要求是按照人民党的精神和风格拟出的；（3）一些多半是从《宣言》中抄来的本应是共产主义的命题，但作了这样的修改，只要仔细一看，全都是些令人毛骨耸然的谬论。”^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促使爱森纳赫派纠正错误。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批判了纲领草案，特别是

① 《德国工人运动史》1965年柏林版第一部分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48页。

其中关于“铁的工资规律”和“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的拉萨尔教条，对国家本质的庸俗解释和对工人党国际义务的忽视等等。他坚决谴责李卜克内西和爱森纳赫派的其他领导人情愿为了合并而牺牲工人运动的根本利益。恩格斯警告他们：在错误基础上的合并是不能巩固的，也不能保证党的队伍的真正统一。这种合并本身就包含着分歧和纠纷的根源，只会对分裂党的家伙们有利。

就是在爱森纳赫派当中也有不少人反对纲领草案不满。白拉克在他写的信件中表示，这个草案甚至不适宜作为讨论的基础，因为它是不能修改好的。他在1875年5月10日写给马克思的信中说：“只有完全抛弃它，才能走出这片烂泥潭。”^① 倍倍尔——他在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协商时还在狱中，直至1875年4月1日才被释放——也对这个纲领表示不满。但是不管是倍倍尔还是白拉克都没有足够的坚定性反对党的领导中的多数。

603

5月初，马克思对纲领草案仔细地准备了批评性意见，它的最后稿本连同1875年5月5日给白拉克的一封信寄到德国，并让白拉克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后来这个文件被称为《哥达纲领批判》。在附信中马克思阐述了关于如何克服工人运动分裂的重要思想。马克思指出，统一会给工人阶级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以思想上的原则性让步作代价是达不到统一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通信集》197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8页。

的界碑。”^①

马克思在这封信中提出的中心思想是：在思想问题上妥协是不允许的，尽管他承认在策略上的妥协甚至暂时的政治让步是可能的和适宜的。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严厉地斥责了**人们在说明原则时所抱的折衷态度。马克思写信给党的领袖们说，如果需要联合，那么为了达到运动的实际目的，可以缔结条约，但是绝不能拿原则来做交易，决不要作理论上的‘让步’”^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 1875 年 5 月 22—27 日召开的、宣告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立的哥达合并代表大会的那些组织者的警告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从伦敦寄来的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只有小部分被考虑，代表大会对这个纲领草案没有作什么重大改动就通过了。当然，关于承认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和从而产生的德国党的国际义务的条文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作出的重要补充。总的来看，哥达纲领背离了无产阶级运动的科学纲领和策略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打算公开与这个文件划清界限。但当他们看到不论是朋友方面还是敌人方面对纲领都有自己的特殊解
604 释，就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恩格斯在 1875 年 10 月 11 日写给白拉克的信中说：“工人、资产者和小资产者在其中领会出它本来应该有但现在却没有的东西”，接着又补充说，“这就使我们可以对这个纲领保持沉默”^③。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考虑到德国工人运动内部的分裂被消除这一事实本身的积极方面。

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没有能够适当地估价《哥达纲领批判》的理论内容。1891 年，由于出现了修改党纲的问题，在恩格斯的倡导和努力之下，马克思的著作才得以发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4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1 卷第 241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148 页。

《哥达纲领批判》

《哥达纲领批判》是科学共产主义一个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马克思撰写这部著作，再一次显示了他的科学预见的惊人威力，他不仅能看出将来社会发展的一般方向，而且能看出它将要经历的许多具体道路。他敏锐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观点，同时发挥了他自己的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关于无产阶级国家的作用和演变以及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两个发展阶段的思想。

后来，当工人阶级直接面临着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社会的实际任务时，马克思这一文献的意义就充分显示出来。1917年秋，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前夜列宁极其正确地写道：“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①

在马克思著作中对哥达纲领草案的错误的批判本身具有总结的性质，就象是对马克思主义同与它对立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论战进行总结。他首先揭露他们在方法论上的共同缺陷：不懂社会生产的决定作用，企图把批判现存制度和设计未来社会的重心转到物质财富的分配领域。马克思写道：“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②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中对作为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的拉萨尔主义作了详尽的评述。对拉萨尔教条的打击总的来说是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机会主义派别的，拉萨尔的教义就是他们的思想根源之一。

马克思指出拉萨尔的臭名远扬的“铁的工资规律”这一命题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这一规律宣称工人在现存制度下根本不可能获得劳动条件的改善。马克思说明，拉萨尔的论点企图庸俗地用“永恒的人口规律”（他追随马尔萨斯，硬说人口的增长必然会使工资水平下降）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对抗。马克思强调指出，这个教条掩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解除了工人的武装，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似乎有组织地反抗资本主义压迫，成立工会和进行罢工都是徒劳无益的。马克思还认为，纲领的重大错误是列入了拉萨尔关于由现存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的要求，把这当作和平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

马克思坚决谴责拉萨尔及其信徒所谓的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的主张。这种提法否定了工农联盟。他认为纲领只字不提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斗争，因此也是绝非偶然，这是符合拉萨尔同容克地主和普鲁士君主结成反对资产阶级联盟的错误方针的。马克思认为拉萨尔主义的狭隘民族主义是极端有害的，它在纲领草案中也留下了痕迹，因为其中根本没有谈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这个错误只是在纲领的最后文本中才部分地得到纠正。

在马克思看来，忽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就是最严重的错误。马克思写道，承认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首先作为阶级组织起来，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①，这绝不是说可以忽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页。

无产阶级解放的主要条件之一：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无产阶级的⁶⁰⁶团结、统一和联合。

马克思集中火力批判了纲领歪曲工人阶级解放的途径和国家的作用。他最坚决地驳斥了在社会分裂成敌对阶级的条件下的人民国家的口号、国家的超阶级性这一概念。纲领通过关于“国家的自由基础”这些庸俗民主主义空想的词句，它的十分温和的政治要求——甚至没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造成一种幻想：似乎德意志帝国或者其他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可以具有真正自由的人民的性质，可以用它当作民主改革甚至社会主义改革的工具。对国家本质作这种极端庸俗和反科学的解释的来源，马克思是十分清楚的。他写道，哥达纲领“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①。

与改良主义的空想相反，马克思彻底揭露了资产阶级国家的与无产阶级相敌对的本质，并发展了无产阶级国家的理论的原理。他再一次指出，工人阶级要进行巨大的革命的社会改造，以实现从资本主义向新的、没有阶级对抗的社会制度的过渡，就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必须掌握这场巨大改造工作的国家领导权。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指出，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列宁认为，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全部革命学说的总结^③。在评论这一原理时列宁强调说，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绝不仅仅是对反抗的剥削阶级采取革命暴力，它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页。

② 同上书，第21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620页。

607 先是在建设没有剥削者的社会的基础方面进行各种组织工作和经济工作，必须为此逐渐克服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和风俗道德，用社会主义思想对小资产阶级群众和工人阶级本身进行再教育。“所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时期是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①

马克思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的阐述是对革命理论的十分重大的贡献，他在这里概括了他以前的科学结论，并用新的结论加以补充，用列宁的话来说，运用他的发展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②。列宁指出马克思在规定共产主义的本质和社会经济原则时采取的是严谨的科学态度。“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③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以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为基础的高度发展的社会制度——问题的看法的重要特点是，他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社会形态，它的形成和发展是根据一定的客观规律的。马克思对他的思想的全部阐述都表明共产主义不能够靠发号施令一举建成。共产主义的建立是深刻的革命改造的结果，这些改造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相当长的时间。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在它的发展中要经历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在这个阶段形成“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④的社会制度和高级阶段——本来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过渡，然后向第二阶段、即高级阶段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857页。

②③ 同上书，第243页。

④ 同上书，第250页。

过渡是逐步实现的，这是一个伟大的改造过程，既包括生产、生产⁶⁰⁸关系领域，也包括物质财富的分配、人们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他们的道德。然而，马克思把从资产阶级社会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时所完成的改造与在向共产主义第二阶段过渡时期需要实现的改造加以区别。马克思写道，在前一种情况下指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它“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①。在后一个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它自身基础上”^②向高级阶段发展。因此任务就是竭力发展和完善这个基础，保证物质生产和文化大幅度增长，以便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痕迹”，并在各个生活领域实行共产主义原则。

马克思揭示了共产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的基本特点。他指出，在第一阶段将要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剥削，但是社会的所有成员还不能都享有同样的物质生活水平，按劳分配将是满足劳动者需求和分配物质财富的原则。由于各人的天赋和工作能力等等不可能完全相同，由于其他方面（家庭状况等）还有差别，根据付出的社会必要劳动获得产品的“平等的权利”不能保证在这些条件下的事实上的平等。在分配中的这种实际上的不平等——马克思称之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造成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极大丰富，保证能向新的、更完善的分配原则过渡，才能得到克服。

马克思驳斥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拉萨尔派的庸俗观点，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每个成员将获得“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劳动的全部产品”。马克思认为，哥达纲领接受拉萨尔派的这个论点是极大的错误。他指出，社会的总产品即使在共产主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609 义社会也不能全部用于个人消费。首先必须从总产品中扣除用于补偿生产过程本身消耗的生产资料和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基金。还要建立应付自然灾害和保险的后备基金。就是规定用于消费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在扣除了补偿管理费用和照顾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支出,以及满足社会成员的共同需要(教育、公共卫生事业等等)的部分后,才能够在个人中间进行分配。马克思指出,随着新社会的发展用于管理的那部分将逐渐减少,而用于社会消费的那部分产品将越来越多。

马克思预言,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人们的生活水平、劳动条件和思想觉悟将发生根本的变化。劳动将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成为创造的乐趣的源泉。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和普遍富裕将能充分满足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这里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出,马克思绝没有把共产主义世界设想为一个建立在禁欲原则、普遍限制、消灭个性和使个人的需求水平拉平的基础上的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生活非常富裕,再也不用在物质上操心。社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全面发展的可能。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马克思还论述了无产阶级国家在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期的演变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过渡时期国家的一种形式,过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时期的长短取决于资本主义社会被革命地改造为共产主义社会所需要的⁶¹⁰时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①，只是一般地涉及国家的未来命运问题，同时，他把未来的国家制度同无产阶级专政区别开来。他指出，随着共产主义制度的建立，国家将发生“变化”。但是那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②社会职能将保留下来。

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绝没有把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国家的消亡看作在新的社会制度胜利后一切国家制度立即简单的消失。他对这个问题坚持科学的态度，当然，他当时没有掌握回答这一问题的资料。可是马克思那时已经十分清楚，在这个阶段将是旧的国家制度逐渐改造为符合变化了的社会条件和社会需求的新的社会管理形式的过程。

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和它的两个阶段的天才的科学预见，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的不可估价的贡献。

参与《反杜林论》的写作

哥达纲领在理论上向拉萨尔派做了不可容忍的让步，这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造成了一种对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解的气氛。马克思在1877年10月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③党内某些人士主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们——官吏、职员、作家、大学生等等——对于各种小资产阶级乌托邦、对于流行的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② 同上书，第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页。

产阶级哲学和经济学理论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妄图把这些理论同马克思主义折衷地揉合在一起，经常用它们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这一切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的不安。

党内相当一部分有教养的上层人物醉心于德国庸俗哲学家、经济学家欧根·杜林的观点，是思想动摇的表现之一。柏林大学讲
611 师杜林在他的讲义和从1869年起完全充斥书籍市场的许多著作中提出创立一门新的、“包罗万象的科学”的要求。他吹嘘自己的观点是人类知识的顶峰。他高傲地宣称过去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的诋毁特别放肆和无知。在1867年底发表的对《资本论》第一卷的评论中，杜林在试图把错误归之于作者时，他的措词总的说来还算是温和的，但是他的后来的一些著作——《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第二版（1874年11月问世）、《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就粗暴地攻击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各个组成部分了。他用粗糙的机械唯物主义的说教、资产阶级实证论社会学家对社会的唯心主义和进化论的观点以及各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思想拼凑出一个折衷主义的混合物，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当科学共产主义已经在工人运动中深深扎根的时候，再企图恢复社会空想主义就是反动倒退了。马克思写道，杜林式的空想社会主义“就只能是愚蠢的——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①。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杜林的信徒也妄图抬出杜林主义作为德国工人运动的正式理论。被伯恩斯坦的热烈称赞弄糊涂的倍倍尔于1874年3月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了肯定杜林的文章。李卜克内西向恩格斯保证说，杜林虽然是头脑不清的人，但是“绝对诚实可靠，并且完全站在我们一边”^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8页。

② 《威廉·李卜克内西。与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63年海牙版第190页。

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下,党的领导人很快就认识到批判杜林主义这一威胁工人运动理论和思想原则的流派的必要性,布洛斯在1874年8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对于杜林,您说的很正确”^①。李卜克内西也承认,杜林的观点在党内的传播是非常有害的。白拉克和狄慈根也写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公开批判杜林的思想。

最初,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没有必要亲自与这些大体说来是平庸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进行论战。可是杜林主义,特别是⁶¹²在同拉萨尔派合并以后,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广泛传播使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考虑公开反对杜林的问题。可是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在理论上去同这个“包罗万象的体系”进行交锋。况且李卜克内西还在动摇不定:他有时坚决要求恩格斯发表批判杜林主义的文章,有时又在杜林分子的压力下,在《人民国家报》上摘要刊登杜林的著作。

所有这一切使恩格斯决定写文章反击杜林。从1877年1月3日至1878年7月7日他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新的机关报《前进报》(于1876年10月创刊)上连续发表了一大批批判文章。其中有些部分还印成了小册子,1878年它们就合成一本书出版了,书名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更出名的是该书的简称《反杜林论》。

恩格斯在该书中以他的机敏的才华、朝气蓬勃的论战热情和一个经验丰富的思想战士的技巧,揭露杜林的假革新的观点是空虚贫乏、陈腐平庸的。他指出,这些庸俗的观点同这位作者自诩的绝对无误和他对以往科学采取的虚无主义的高傲态度显然是十分矛盾的。恩格斯还利用批判杜林的机会从正面阐明了马克思主

^① 威·布洛斯1874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3443。

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的主要内容。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反杜林论》“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①。恩格斯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用极通俗的形式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成果,也反映了恩格斯本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尤其是在对自然科学、历史科学和军事科学材料进行哲学概括方面所做的创造性的贡献。

马克思竭力促进这部杰出的著作的产生。1876年5月25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②他完全了解恩格斯的计划,并想方设法帮助恩格斯撰写这部著作。例如,
613 他重新翻阅了欧文的著作,编制了欧文的著作目录,在1877年8月8日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提到一些在批判杜林歪曲社会主义思想史方面的非常重要的著作。马克思还帮助恩格斯搜集其他的有关材料。

马克思直接参加了第二编(《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对杜林的经济学说史的观点做了批判性的分析。1877年3月初,他寄给恩格斯一份有关材料,8月他又补充了对重农主义者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所有这些材料构成了该书的第二编第十章——《〈批判史〉论述》。恩格斯在收到这一章的第一部分后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衷心感谢你在《批判史》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这超过了我在这个领域里也把这个家伙驳得体无完肤的需要。”^③

马克思撰写的这一章,严格按照全书的总的构思:驳斥杜林企图贬低科学共产主义的意义,缩小它的思想先驱的功绩。和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5页。

③ 同上书,第38页。

杜林相反，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古典学派的代表，从配第、布阿吉贝尔到李嘉图在发展经济思想方面所做的贡献做了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杜林既然鄙视经典作家，他本人就只好欣赏他们的模仿者和庸俗化者——德国人李斯特、美国人凯里——的理论。同时，马克思揭示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局限性。这一章还揭露杜林企图歪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它的原理同完全相反的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说教混为一谈。

《反杜林论》的出版促进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上的成熟，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各国的传播。这本著作帮助工人读者克服非无产阶级流派的影响，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

第十五章

614

为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马克思和革命的俄国

“马克思是科学大师，也是工人阶级的卫士，他的功绩是不需要树碑立传的。证实他的业绩的不是青铜白石，而是来自全世界各个角落、响应他的不朽的战斗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浩浩荡荡无产者大军。”^①

弗·阿·左尔格

最后几年的理论研究

马克思直至晚年，尽管健康状况恶化，仍然是一位真正伟大的科学工作者。即使年迈，他还保持着青年时代对科学的热爱，如饥
615 似渴地阅读新书，在书上划了许多横线，作了不少记号，按照他的说法，要把这些书本变为他的“奴隶”^②。

马克思对科学的兴趣依然十分广泛，在这段时期里他最关怀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23页。

② 同上书，第70页。

的还是《资本论》。马克思在继续撰写未完成部分的过程中,尽力研究资本主义各国新的经济现象和政治现象,注意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关领域的最新成就。蓬勃发展的工人运动也促使他熟悉政治和思想方面所发生的事件。

马克思已经大体上阐明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大部分问题的理论内容,但是他仍采取十分严谨的科学态度。恩格斯写道,只要列举马克思留下来的手稿,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①。这几年马克思又重新研究了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他仔细地研究了有关商业、金融、银行业、土地关系等方面的新文献。

马克思在研究《资本论》第一卷的问题时,他注意的是英国这个工业资本主义的典型国家,而现在,当他为准备第二卷和第三卷而进行新的研究时,就越来越注意俄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了。

1881年马克思开列的题为《我书架上的俄国资料》的书单中就有一百二十种以上,但是这个书单并没有包括他在工作中所使用的资料。尼·弗·丹尼尔逊、彼·拉·拉甫罗夫、尼·伊·季别尔、伊·伊·考夫曼、尼·阿·卡布鲁柯夫、敏·卡·哥尔布诺娃、维·伊·查苏利奇等都积极帮助马克思收集俄国书籍。他还研究1861年以后在俄国出版的各种文件汇编和统计汇编(包括自治局统计汇编),阅读俄国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俄国学者关于通史、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学方面的著作。在这些俄国书籍中,革命民主派代表们的科学政论著作,首先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占有特殊的地位。

马克思非常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从他根据多卷本的《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页。

616 制委员会报告书》所做的、有四十多个印张的四本笔记中就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的紧张程度。他从《军事统计汇编》中汲取大量材料，从各种专题论著中得到不少资料。例如，他在1882年秋阅读了著名的俄国学者、民粹派政论家亚·尼·恩格尔加爾特的《乡村来信》一书，并在这本书上作了大量的评注。他在研究恩格尔加爾特的其他著作时所作的札记《**俄国的状况。劳动，资产阶级的形成，资本，地租**（以俄国为例）》^①，证明他的这些研究同他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问题是有联系的。后来，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写道：“由于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②

马克思收集了大量有关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的材料。左尔格、哈尼和美国的其他朋友寄给他的各联邦机关和州的机关所发表的统计汇编和文件汇编、美国 and 英国定期刊物上的一些文章，都是他的研究对象。因此他才能在有关工业的迅速发展、西部的垦殖、农场的状况、劳动条件、工人的移入等等方面获得重要的资料。马克思在摘记中记下了大股份公司的形成过程，以及万德比尔特、古尔德、洛克菲勒这些金融大王和工业巨头的发家史。他在1878年底写的关于股份公司开发公有土地的提纲中指出，许多百万富翁都是靠土地投机发财致富的。马克思以“铁路大王”詹姆斯·乔伊作为例子，此人控制了西部成千上万的小垦殖者，成了他们的“主宰和国王”^③。

马克思也很注意西欧的经济行情、1873年危机的后果和关于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3678。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页。

③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3929。

农业危机的资料。1877年春，他在阅读并摘录鲁道夫·迈耶尔的《德国政界的滥设企业者和营私舞弊》一书时，总结了他对德国经济⁶¹⁷中的新现象的看法：“工业生产和大商业越来越依赖银行，依赖于大资本家……”^①。1880年，他建议正在研究法国银行制度的拉法格注意“资本的输出”^②。在《法国土地所有权的分配的札记和摘录》中，他指出了法国农民大规模破产的过程^③。

马克思还继续注视经济思想方面的新现象。他坚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被庸俗化了，其规模越来越广泛，其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在这方面，所谓“讲坛社会主义者”的文献就是一种反映，这些文献都是那些知道广大群众向往社会主义并力图用社会主义的漂亮词句来为资本主义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写的。1877年，马克思把这个派别的主要代言人阿·谢夫莱在《社会主义精髓》这本小册子中所描绘的未来社会，叫作“温良的小资产者的理想王国”^④。

在1879年年中和1880年11月之间，马克思写了关于德国教授阿道夫·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卷的详细批评意见。他以这本书为例，揭示了讲坛社会主义整个派别及其先驱者卡·洛贝尔图斯这个容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家的缺陷。马克思着重指出，瓦格纳和其他“社会-法的概念”的拥护者们对国民经济的基本问题采取庸俗的、唯心主义的态度，力图简单描绘经济现象而不分析经济规律，把经济现象说成是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演变的反映。例如，马克思在谈到瓦格纳对交换的产生和发展的看法时讽刺地写道：“……这个蠢汉(vir obs-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3944。

② 《马克思和十九世纪国际工人运动的若干问题》1970年俄文版第471页。

③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4098。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27页。

curus)完全本末倒置。在他看来,先有法,后有交易。”^① 瓦格纳及其一伙学究鼓吹肤浅的进化论,否定革命的作用,力图把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把解决社会问题归结为消除各种舞弊现象、改革赋税制度和实行工人保险等等。

同洛贝尔图斯一样,瓦格纳和其他一些讲坛社会主义者也认为
618 为资产阶级国家有一个特殊的社会使命。马克思指出,瓦格纳对国家的颂扬使他奴颜婢膝地吹捧俾斯麦的警察官僚的帝国,甚至证明继续保存容克地主土地占有制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说,瓦格纳及其同伙的“一只脚却仍然站在旧的垃圾上”,同时鄙视地把他们称为现存国家的“农奴”^②。

马克思指出,瓦格纳对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的解释是庸俗的。他“象德国教授们那样传统地”^③ 把使用价值和价值混淆在一起,硬把利润说成是价值的“构成”因素^④。马克思还指出,象瓦格纳这伙资产阶级辩护士,采取卑鄙的手法来“批判”他的经济学说,把各种荒谬的论点和不是马克思的观点都说成是马克思的。

在这段时期,马克思研究自然科学同他进一步研究政治经济学是紧密相联的。在研究地租问题时,他认为必须弄清楚农艺学方面的最新资料,这就促使他深入钻研化学、农业化学、生物学、地质学这些有关的科学。1875年他对恩格尔加尔特的《农业的化学基础》一书作了摘要,1878年他再一次阅读了英国人约翰斯顿的《农业化学和地质学基础》。他充实了自己对有机化学的知识。1882年 he 从头到尾阅读了罗斯科和肖莱马写的一本化学教科书以及迈耶尔的一本关于化学方面的最新理论的书。他从有关地质学和矿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22页。

② 同上书,第414—415页。

③ 同上书,第400页。

④ 同上书,第401页。

学的书籍(包括英国地质学家朱克斯、艾伦的著作)和有关植物生理学、动物生理学、人的生理学的书籍(马·施莱登、约·兰克等人的著作)中作了大量的摘要。他对设法使化学和生物学互相结合的试验,特别对德国科学家特劳白用化学合成法制造细胞的试验非常感兴趣。

八十年代初,马克思读了法国工程师奥斯皮塔利埃的一本书,知道了讨论电在各个方面应用问题的巴黎国际电学家会议(1881年9月)的成果。1882年11月2日他写信告诉恩格斯说,在1882年慕尼黑电气技术展览会上展出远距离输电线路的法国人德普勒的发明是很有前途的。

马克思热烈欢迎促进技术和生产的发展、改善生活条件的各种直接有益于人类的科学发现。恩格斯写道:“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①

这几年高等数学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占特殊地位。经常需要进行复杂计算的经济研究工作,使马克思对数学产生了兴趣。从马克思在各个时期,特别是1858年起所写的准备材料的笔记本中,可以看到他在钻研数学史、商业算术、解析几何、代数时所作的札记。多年来马克思总是一有空闲就演算数学题,包括高等数学习题。

马克思最初研究数学只是为了有时要应用它,后来他就单独地探讨这门学科了。这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于数学同哲学、辩证逻辑学有着许多相通之处,马克思认为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在马克思研究数学时,正是恩格斯写作《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5页。

然辩证法》这部对自然科学成就作辩证唯物主义概括的著作进入关键的阶段。因此在他八十年代初写的《论导函数概念》、《论微分》手稿中就标明：“给将军”（恩格斯的绰号），“给弗雷德”^①。

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古典数学家笛卡儿、莱布尼茨、牛顿、欧勒和麦克劳林等人的著作，以及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方面的许多大学教科书。他根据这些材料把自己写的东西编在一起，其中包括以上提到的关于微分学的两份手稿，一些准备材料及其补充，关于微分学的历史的几个草稿，分析泰勒定理和麦克劳林定理、拉格朗日的导函数理论的若干片断等等。马克思显然想把这些原稿和草稿编成一部完整的著作，但是他没能对他的数学手稿进行最后的润色。

620 马克思在自己写的东西中力求揭示微分学的基本概念和方法同初等代数之间的辩证关系，并创造性地解释了这些概念。他在论述数学史的时候，阐述了牛顿、莱布尼茨、欧勒、达兰贝尔、拉格朗日对创立和发展微分学的作用。他在这一段历史叙述中指出，只有科学思维发展到高级的、真正辩证的阶段，才能充分揭示被研究的现象的实质。

恩格斯阅读了马克思的第一批数学稿子，认为其中颇有独到之处，并在1881年8月18日的信中热烈祝贺自己的朋友取得的成就。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打算出版他的数学手稿，但是由于其他工作太多，这个打算没能实现。

《数学手稿》是说明马克思的科学知识渊博的又一个例子。拉法格有充分根据地说，马克思的头脑“就象停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开向任何思想的海洋”^②。马克思的摆满书柜的书房，就好象一个船长的驾驶室，他从那里注视着人类

① 马克思《数学手稿》197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5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9页。

知识的海洋,为这个宝库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研究世界史

马克思对世界史各种问题的研究在他的科学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这方面的兴趣是非常广的。

马克思的历史研究工作有时是同解决《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问题紧密相联的,这表明他想制定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和阐明资本主义前的社会形态的经济规律。有时这项研究工作也是与此无关的。马克思认为重要的是通过了解历史科学的最新成就,来加深和发展对整个历史过程的唯物主义观点。

在研究土地关系和地租的产生时,马克思全面地探讨了各个民族的土地所有制的起源和发展。在七十年代,他的这项研究工作使他对土地私有制的前身即公社占有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在此以前马克思根据有关东方国家的材料,就认为农村公社这些闭关自守的社会机体有很强的生命力和稳定性。在不少古代民族中,农村公社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称之为亚细亚的生产方式类型的生产关系体系中的基本单位^①。他认为,直到中世纪,在东方国家还存在着这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古代和中世纪东方专制国家就是靠这种与外界隔绝的小天地(马克思称农村公社为“与世隔绝的小天地”^②)而维持的。

马克思不仅深入研究亚洲的土地公社占有制的历史,而且还深入研究欧洲、非洲和美洲的土地公社占有制的历史,于是他更加相信公社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形式。他从六十年代末阅读过的杰出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6页。

的德国学者格·毛勒的著作中，摘录了大量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1876年，马克思详细地摘录了毛勒的《马尔克制度、农户制度、乡村制度、城市制度和公共政权的历史概论》、《德国马尔克制度史》以及其他著作。1881年，他又重新阅读了这些书。

马克思从德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历史学家汉森、梅恩、格林、亚契尼、卡尔德纳斯等人的著作中获得了有关土地公社占有制的大量材料。他认为，他的俄国朋友柯瓦列夫斯基的《土地公社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一书有重大的科学意义，这本书是1879年出版时他从作者那里得到的。这本书描绘了北美洲印地安人、东印度群岛西班牙殖民地居民、印度和阿尔及利亚民族的公社制度。1880年出版的英国人约·菲尔的《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农村》一书补充了他以前对印度公社的了解。更早以前，马克思还研读了杰出的斯拉夫学家博吉希奇在一份法文专刊上发表的关于南方斯拉夫人的习惯法的论文，以及乌提舍诺维奇的关于南方斯拉夫人家公社（扎德鲁加）的著作。

在马克思的研究工作中，对俄国的公社制度的研究占有显著的地位。他摘录了普鲁士官员哈克斯特豪森的《关于俄国的农村制度》一书和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勒卢阿-博利约有关这一问题的著作，此外，还根据俄国学者索柯洛夫斯基、瓦西里契柯夫、别利亚耶夫、柯舍列夫、谢苗诺夫、契切林、盖里埃的著作，写了大量札记。他对俄国公社及其历史演变的丰富知识，以及他对其他国家土地公社占有制的历史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在给俄国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回信的三个草稿中阐述了这些看法，在1881年3月8日复信的定稿（保存下来的是草稿和誊清稿）中简要地叙述了他的观点。

马克思认为，公社是一种最古老的社会制度，是以血统亲属关系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原始社会关系的产物。在原始社会

解体过程中，公社经历了重大的变化：从氏族公社变为地域性公社，公社社员个人耕种土地，房屋和牲畜归个人所有。虽然土地仍然是公有的，但定期在各个家庭之间进行重新调配，公有土地仍归集体使用。公社以后的演变，在不同的民族那里，正象马克思所说的，取决于它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环境”^①。他着重指出，公社本身有两种历史趋势：一种趋势是私有制因素的加强，公社本身解体；另一种趋势是保存集体因素，使公社成为一个富有生命力的机体，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到封建主义时期，在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甚至还能存在到资本主义时期。

马克思认为，在还保存着公社的那些国家，首先是俄国，公社今后的命运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这些国家的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景。他相信这在原则上是十分可能的，同时着重指出，要实现这一点，必要的条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他认为，如果内部环境适宜，公社不再受专制国家的压迫和半农奴制的剥削——这在俄国只有经过人民革命才能达到——保存下来的公社形式，才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改造的起点。如果社会发展是这样的，公社才能避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避免的灭亡，才能在资产阶级社会已经形成的新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改造成为合作劳动的形式，总而言之，象马克思所说的，才能“获得新的生命”^②。

623

马克思对土地公社占有制历史的研究使他感到必须阐明古代社会制度的特征。早在四十年代，当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时，就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原始社会是既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国家权力的一个没有阶级的制度。在他们后来的研究中，他们坚信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们发现了在古代民族特别是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克尔特人和日耳曼人的习俗中有一些特征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页。

② 同上书，第451页。

能用关于古代社会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假说来解释。

但是，只有根据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和民族志学的新发现才能把这种假说变为有科学根据的理论。这些科学领域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对古代石器进行了科学分类，发现了现代人的祖先之一——尼安德人。1871年，查·达尔文的《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一书出版了，为科学的人类起源学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创造性地发展了达尔文的结论。

1877年，美国民族志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他根据对古代习俗首先是北美部落的习俗的多年研究，证明氏族是原始社会的社会单位，古代的婚姻形式是群婚制，在古代的亲属关系中表现为各种形式的一夫多妻制。摩尔根证实了瑞士学者巴霍芬的假说：原始部落的妇女享有崇高地位，因为在群婚制条件下，世系是依母系来确定的。他把巴霍芬在《母权论》（1861年）一书中所提出的母权制理论同他自己的关于古代社会氏族组织的学说联系起来，证明了母权制氏族在历史上先于父权制氏族。

当整个欧洲和美国一部分官方科学根本不提摩尔根的功绩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的著作在科学上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624 并从这位美国学者的著作里找到了可以证明他们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正确的新的事实根据。

马克思决定写一部专门的著作来论述摩尔根的发现。他对《古代社会》一书作了详细摘要（大概在1880年底至1881年初），认真地研究了有关原始文化史的一些现有的文献。

这部摘要表明，马克思创造性地对待摩尔根的结论，他想根据他对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的研究来阐述这些结论。马克思的评语——后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一

书中利用了这些评语——表明，他对自发的唯物论者摩尔根的著作决不是全部都同意的。马克思重新整理材料，为的是按正确的次序来描述社会制度的演变。摩尔根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在国家产生之后，而马克思在摘要中则认为相反。他在一系列评语中纠正了摩尔根的观点，例如，马克思认为摩尔根关于人类在原始时代已经“在食物生产这一领域”达到“绝对支配地步”^①这一断言是牵强附会的。马克思根据摩尔根的材料，常常作出更广泛的总结。他在评述这个美国学者关于家庭的演变引起亲属关系变化的想法时，着重指出，这里就反映了一个普遍规律：第二性的、即上层建筑的现象依赖于第一性的、即基础的现象。“政治、宗教、法律和一般哲学体系也完全一样。”^②

马克思比摩尔根更深刻地探索了为什么许多资产阶级学者（格罗特、蒙森）要曲解氏族关系的本质，为什么他们企图唯心主义地例如用古代宗教的特点来解释氏族关系，并企图引用神话作证。他在评注中着重指出，这是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局限性，也常常是由于保守的政治信念。例如他在谈到用现代的观点来描写荷马时代的希腊军事首长（巴赛勒斯）的权力时写道：“欧洲的学者们大都是天生的宫廷奴才，他们把巴赛勒斯变为现代意义上的君主。美国共和主义者摩尔根是反对这一点的。”^③

马克思认为，其他有关原始历史的著作，如梅恩、拉伯克、泰罗等人的著作，都不如摩尔根的著作，尽管从这些书中也能找到一些 625 有用的实际材料。他对梅恩的《古代社会制度史讲演录》写了许多评语，并驳斥这位作者所采用的、在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中流行的那种错误的公式，按照这种公式，家长制的家庭、家庭公社，是先于

① 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96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页。

② 同上书，第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20—121页。

氏族的原始社会的形式。马克思指出：“事实正好相反”^①。马克思接着指出，梅恩承认古代存在公社所有制，但他是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追随者的立场来解释公社所有制的。他把公社描绘成对个人使用暴力的化身。梅恩竭力把公社制度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所谓个人自由的中心——对立起来，马克思认为这是替资产阶级辩护和虚伪的典型。他也尖锐地批判梅恩企图把国家权力说成是一种独立的和永恒的社会制度。他指出，社会发展到分裂为敌对阶级的阶段，国家就作为一定阶级利益的工具而产生。“只有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的产生才成为可能，社会一旦发展到它现在还没有达到的那个阶段，国家又将要消失。”^②

马克思在阅读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时指出，作者关于群婚制和母权制的论点是合理的，但同时他的关于原始社会的社会组织的概念是非常混乱的。马克思的结论是：“因此，拉伯克对原始社会的基础——氏族，一点也不知道。”^③

马克思对原始历史的研究使他的社会发展理论更加深刻，使历史唯物主义能有新的资料作为依据。马克思在历史研究的其他领域也证实了自己的一些论点。

马克思非常重视解放运动的历史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他根据卡·毕歇尔的《不自由工人的起义》（1874年出版）一书，编写了古罗马奴隶早期起义的年表。他阅读了俄国历史学家尼·伊·柯斯托马罗夫的《斯切潘·拉辛起义》一书，作了有关十七世纪俄国农民运动史的摘录。马克思对吉诺·卡波尼的《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历史》一书作了摘要，专门研究了历史上最早的一次无产阶级前身手工业者的革命行动——1378年佛罗伦萨梳毛工（原毛梳理工）的起义。

①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4080。

③ 同上，编号4264。

马克思非常注意十八世纪末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1879年他阅读了俄国历史学家尼·伊·卡列也夫的《十八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法国农民和农民问题》一书，他在给柯瓦列夫斯基的信中说这本书“非常好”^①。他对1875年出版的法国民主派历史学家若尔日·阿韦奈耳的《革命星期一》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也表明他始终关心法国革命时期的社会和政治情况，它的国际关系，同反革命阴谋万第叛乱的斗争，革命阵营内部的派别斗争，以及革命年代产生的一些革命民主主义、平均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掠夺尚未瓜分完的地盘而进行的殖民竞争，促使马克思用更多的时间去研究殖民地人民的命运和他们的解放运动。

1880—1881年，他重新开始对英国的第一个殖民地爱尔兰的土地关系的研究，而在前一年他阅读了卡尔顿关于爱尔兰农民贫困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报道。激进派政论家的文章和其他材料使马克思确信，印度劳动人民的状况也丝毫没有改变。马克思在1881年2月19日写信给丹尼尔逊，谈到了印度人民遭受的殖民掠夺及其严重后果——居民极端贫困，饥荒周期性地发生，其规模之大“是欧洲迄今为止所无法想象的”。他在谈到殖民主义者从这个国家不断地榨取大量财富时写道：“这是残酷的敲骨吸髓的过程！”^②

马克思重新研究了 this 苦难深重的国家过去的历史。1879—1881年，他根据一批著作的实际材料编写了内容广泛的《印度史编年摘录》，它包括几个世纪，即从穆斯林的征服和大莫卧儿帝国的建立到1859年英国人对民族解放起义的镇压。这部著作充满着对殖民压迫的强烈反抗。马克思愤怒地谴责殖民主义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1页。

627 “英国的恶棍和吸血鬼”^①，以及替他们效劳的印度贵族中的卖国贼。他谈到了1857—1859年大规模的民族解放起义，并指出了它的失败原因。

马克思研究了荷兰和英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殖民统治历史，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和美国人对日本的入侵，以及关于中国的著作。他在1882年秋对马耳霍耳的《埃及的财政》一文（文章刊登在同年10月《现代评论》杂志上）所作的摘录中，特别提到了殖民政策的新特点：股份公司在经济上侵占和掠夺落后国家所起的作用日益增长。他着重指出，控制埃及的财政，使它服从于欧洲银行，这就为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涉准备了条件。马克思在1883年1月9日给女儿爱琳娜的信中把英国殖民者征服埃及称作所有征服行动中最无耻的征服^②。

马克思在晚年打算总结一下自己的历史知识，编制同一时期各国历史发展的大事年表。这个计划只实现了一部分，他主要是整理了欧洲历史的材料以及亚洲和非洲一些民族（阿拉伯人、蒙古人、土耳其人、花剌子模人）的历史材料。但是，即使他能收集这样大量的史实，也是令人吃惊的。从1881年底到1882年底他写了四大本关于世界史的札记，包括公元前一世纪初到公元十七世纪中叶的历史事件。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了马克思的手稿，并加上了《编年摘录》这一标题。

马克思利用的主要材料是弗·克·施洛塞尔的九卷本《世界通史》。在一些篇章中他还利用了卡·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激进主义者威·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著名的哲学家大·休谟的《英国史》，尼·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尼·米·卡拉姆津的《俄国国家史》，菲·保·赛居尔的《俄国和彼得大

① 马克思《印度史编年摘录》1947年俄文版第91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21页。

帝历史》。马克思在札记中还附有约·理·格林的《英国人民史》一书摘要。马克思在评价事件和人物时完全不受材料的影响。他的札记往往不是简单地重复他所研究的著作中的材料，而是表达了自己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和理解。

在《编年摘录》里马克思注意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但是也常常⁶²⁸研究政治生活的各种现象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他的论述表明：历史不是偶然的千变万化的事实，而是既反映历史过程的总趋势，也反映各个国家历史过程的特殊性的一系列有规律的事件。总之这是一幅描绘封建社会从封建关系产生到封建制度解体、专制君主制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历史画卷。

《编年摘录》再一次证明，马克思认识到了历史是富于戏剧情节的生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普遍规律绝不是作为某种命定的使诸现象划一化的力量起作用。普遍规律是通过千百次偶然事件和偏离常规的现象为自己开辟道路，在不同的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

马克思厌恶貌似公正的姿态，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常用这种姿态来掩饰自己替统治阶级政策辩护的行为。他在手稿中用了很多愤怒的语言来形容压迫者和侵略者、想掌权的封建主、在位的暴君、贪婪的神父和主教、宗教狂和蒙昧主义者。他把掠夺东方国家的十字军骑士蔑视地称为“**十字军蠢货**”，把侵占斯拉夫土地的策划者德意志公爵狮子亨利称为“奸诈阴险、掠夺成性、贪得无厌之徒”，把残暴征服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和践踏俄罗斯土地的利沃尼亚骑士团骑士称为“无赖”、“**走狗骑士**”^①，把十五至十六世纪卖身投靠的雇佣兵称为“**国际匪徒**”^②。马克思的尖锐语句反映了他对剥削者的态度，但他并没有把历史简单地描述成为不是黑的，就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5卷第144、197、3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7卷第169页。

是白的。马克思善于发现某个国家活动家在政策上的矛盾的特点和进步的方面。例如,马克思认为,“同市民和农民相处融洽,只是对高等贵族残忍狠毒、奸诈阴谋”^①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政策,体现了王权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所起的进步的集中的作用。他对“伟大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伊万三世也持有同样的看法。

马克思对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寄予深切的同情。他的摘录详细
629 地记载了封建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事实。他看出从十四世纪开始的欧洲各国阶级冲突的日益激化:“在法国和英国……**大封建主和骑士阶层之间内战不已,市民起义反对大封建主和骑士,遭受压迫的下层人民无比愤怒。**”^②马克思详细地研究了多耳契诺领导的意大利农民起义,法国的扎克雷起义,英国的瓦特·泰勒和杰克·凯德起义,捷克的胡斯运动,德国 1524—1525 年伟大的农民战争,以及 1566—1609 年尼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他没有忽视农民运动的弱点,即思想上停滞落后,政治上缺乏远见。他始终强调,农民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最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

马克思认为,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也是一个非常进步的因素。从他的摘录中可以看出他非常推崇百年战争期间鼓舞人民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法国农村姑娘贞德。他特别指出,莫斯科大公顿河的德米特利 1378 年在沃扎和 1380 年“在广阔的**库利科沃田野**”^③战胜鞑靼人,这对于俄罗斯人民摆脱蒙古人的羁绊具有重要的意义。

《编年摘录》总的说来反映了马克思对世界史问题的大量的研究工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 6 卷第 387 页。

② 同上书,第 6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 8 卷第 151 页。

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

马克思一直到晚年始终把科学研究和对工人运动的实际领导结合在一起。恩格斯着重指出：“为雇佣工人阶级摆脱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生产制度的桎梏而斗争，这是他真正的爱好，从来还没有过一个象他那样积极的战士。”^①

在马克思一生的最后几年，在欧洲和美洲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越来越成为工人运动的首要任务。七十年代中期以前在历史舞台上实际上只有两个有组织的工人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奥地利匈牙利社会民主党在进行活动，随后在个别国家党组织的成立过程就加快了。

1879年10月在马赛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法国工人党，该党⁶³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居于领导地位。1879年诞生了比利时社会党。在毗邻的荷兰，前牧师斐迪南·多梅拉·纽文胡斯从1879年起开始出版社会主义报纸《人人权利报》，1882年在他的积极参加下建立了全尼德兰社会民主联盟。在此以前，即在1876年诞生了丹麦社会民主联盟，1881年在马尔摩建立了瑞典宣传社会主义委员会。以前的国际活动家对于这些组织的创建起了卓越的作用。

由于梅萨、伊格列西亚斯和其他西班牙社会主义者的活动，西班牙社会主义工人党于1879年在马德里成立了。1875年，国际工人协会葡萄牙支部的前组织者着手筹建葡萄牙社会党。1877年底，瑞士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但是由于成员复杂，因此并不巩固。

在意大利，因为无政府主义在工人运动中根深蒂固，建立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3页。

党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加入上意大利联合会(1876年成立)和罗曼尼亚革命社会党(1881年建立)的工人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的先进分子,克服了无政府主义教条,主张参加政治斗争。

在哈布斯堡帝国的非奥地利土地上,建立自己政党的趋势也很明显。1878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诞生了。在很大程度上多亏弗兰克尔的活动,1880年匈牙利全国工人党成立了。

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开始向东方扩展。1878年,波兰革命运动的活动家(路·瓦林斯基和其他人)制定了社会主义华沙纲领。经过四年,即1882年诞生了波兰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无产者”。

这个时期也正是俄国革命运动从民粹主义向马克思主义过渡的时期。俄国第一批工人组织南俄工人协会(1875年)和俄国北方工人协会(1878年)的创始人,竭力吸取西欧工人运动的经验。建立这些第一批工人组织的叶·奥·扎斯拉夫斯基、维·巴·奥勃诺尔斯基和斯·尼·哈尔土林,在国际思想的鼓舞下,研究了马克思的著作。八十年代初,成立第一个俄国马克思主义小组“劳动解放社”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社会主义的组织也开始在美洲大陆产生。在美国1876年,在费拉德尔菲亚代表大会上各个社会主义小组联合成为工人党。法国和德国流亡者——国际会员,其中有拉法格的朋友、巴黎公社参加者、马克思的熟人雷蒙·维耳马尔在阿根廷、乌拉圭、智利开展社会主义宣传方面起了巨大作用。1879年,在阿根廷建立了革命宣传团体“先锋队”。1878年成立了墨西哥社会党。

到处出现社会主义政党和组织,这就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时期所制定的方针是正确的。但是,建立起来的一些政党需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加以巩固。它们的领导人(以前常常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往往不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些组织(如丹麦、瑞典和其他国家)的纲领仍有哥达纲领中拉萨尔主义的错误。

领导人内部的宗派主义倾向常常妨碍同群众建立巩固的联系。

为了对已经成立的工人政党进行革命教育和锻炼，必须作艰巨的长期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领袖经常帮助各国社会主义者，使他们在国际范围内采取一致的行动。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前不久写道：“我们认为我们作为**国际社会主义**的代表的这种特殊地位是有一定的意义的。”^①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各国社会主义者活动的特点，努力把他们的活动引上争取社会主义的国际斗争的轨道，用其他的形式来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列宁写道，在国际停止活动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团结各国无产者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的精神领导者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②。

马克思教导社会主义者既要有坚定的革命政策，又要冷静地对待具体的情况。他坚决反对空洞的计划，反对以抽象的无根据的争论和推理来代替实际的革命工作。他认为，不应该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解为适应任何情况的一叠现成的药方，他着重指出，社会主义者的具体政策“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③。

马克思尽力促进社会主义运动代表之间的国际联系地开展，他一直认为，在一些国家里社会主义政党立足未稳以前，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的国际组织还为时过早。他写信给纽文胡斯说：“我确信，建立一个新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决定性的时刻还没有到来。”^④

1881年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这是在马克思生前召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3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54页。

④ 同上书，第155页。

的最后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也认为，建立新的国际的计划是不合时宜的。这次代表大会于10月上半月在瑞士的库尔城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十二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者，其中有俄国的代表（阿克雪里罗得）。代表大会甚至没有考虑建立国际社会主义组织的问题。大会的讨论和决议表明，国际工人运动的真正代表尽管在一些问题上还不成熟，还是采取了坚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立场。代表大会结束后，贝克尔在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这是“一次国际性的党代表大会，它摆脱了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学理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和其他为人类造福的灵丹妙方的发明者”^①。

马克思认为，反对统治阶级的对外侵略政策，反对战争危险是社会主义政党的一项重要的重要的国际主义任务。他在1880年9月12日给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我希望在欧洲不要发生普遍的战争。虽然归根到底战争非但不能阻止反而会促进社会的发展（我指的是**经济**的发展），但是战争无疑会造成相当长期的、没有益处的力量衰竭。”^② 马克思认为，反对军国主义是国际的一个重要传统，这个传统应该尽可能加以发扬。

633

反对俾斯麦的非常法。 对机会主义的批判

1878年德意志帝国统治集团的政策向右急转。这首先是因
为统治阶级害怕社会民主党的影响日益增长，也是因为大地主和
大资产阶级的联盟企图通过保护关税、殖民掠夺、对外扩张的办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4312。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39—440页。

法来夺取国外市场。为了实现这些目的，为了弥补不断增长的军事开支，就必须增加税收，这正好是俾斯麦想要采取的步骤。以前他想同民族自由党人结成联盟，现在竭力依靠右派势力，希望在右派势力的支持下来巩固军国主义制度，镇压工人和民主运动，吓唬自由主义反对派。

俾斯麦及其追随者主要是打击社会主义工人党，认为社会主义工人党是他们推行新的经济和政治方针的主要障碍。统治集团利用了谋刺威廉一世皇帝的两起事件（1878年5月11日一个失业的白铁工人赫德尔向他开枪，同年6月2日农学院学生、无政府主义者诺比林开枪把他打成重伤）来打击工人党。尽管这两起谋刺事件与社会民主党无关，但是它却被加上了恐怖行动的罪名。

1878年10月19日，帝国国会保守派多数通过了有效期三年的《取缔社会民主党人危害治安的意向的法律》。以后俾斯麦还延长了几次。这项法律禁止任何工人团体、报刊的存在，禁止任何社会主义的宣传运动。当局能在某些地方和城市实行“小戒严”，在实行“小戒严”时，警察有权驱散任何集会，把不良分子连同其家属驱逐出境，等等。在辩论这项法律时，马克思指出：“颁布非常法是为了把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表面合法性也剥夺掉。”^①

其他一些国家也仿效俾斯麦的政策。奥匈帝国所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是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1878年9月，法国政府禁止在巴黎举行国际工人代表大会。1878年底，教皇利奥十三世颁布了反对社会主义者的特别通谕。

在德国工人党处于困难的日子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挺身而出，在国际舞台上维护它的利益。马克思在收到白拉克寄来的1878年9月16日和17日帝国国会会议讨论法律草案的速记记录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76页。

立即开始给《每日新闻》写揭露性的文章，这篇文章大概没写完。也许他知道，英国资产阶级报刊是绝不会发表这篇文章的。从保存下来的文章草稿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必须反击德国反动派，必须揭露反动派把社会民主党和无政府主义派别混为一谈的企图，驳斥所谓社会民主党人的理论推动人们采取暴力行为和恐怖活动的谬论。针对反动分子关于社会主义者相信暴力的叫嚣，马克思指出，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绝不单单是武装冲突和起义。在采取暴力革命之前，解放斗争不可避免地要经过一个和平的发展阶段。从解放斗争的和平阶段到非和平阶段不取决于革命者的主观愿望，也不取决于他们的理论，而首先取决于统治阶级本身的行动。“只要这个社会的掌权者不采取暴力来阻碍历史发展，那么历史发展就一直是‘和平的’发展。”^①

马克思指出，对广泛开展的工人运动采取恐怖手段的人竟然责难社会民主党人使用暴力，这真是莫大的虚伪。他写道，残酷的非常法“是掌权者对‘和平阶段’的发展所做的暴力反应”^②。

马克思在向美国资产阶级报纸《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的谈话（发表于1879年1月5日）中，公开表明了对非常法及其实施的原因和俾斯麦政府反革命阴谋的看法。他在谈话中把俾斯麦的政策驳得体无完肤，指出了它的波拿巴主义的实质和加强军事警察专政的野心。马克思说：“俾斯麦正在步拿破仑的后尘。他先是以统一德国为借口，建立专制制度……他曾在虚伪的宪法掩饰下，为了他的那套军事和统一计划而向人民敲骨吸髓地征税，而现在他却企图完全抛开宪法来做这件事了。为了恣意掠夺人民，他弄来一个社会主义幽灵，并千方百计地制造人民暴动。”^③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库》俄文版第1(6)卷第397页。

③ 《苏共历史问题》1966年第10期第12—13页。

马克思指出，德国首相未能完全实现他的挑衅性计划。由于德国无产阶级镇定沉着，这些计划被粉碎了。马克思在另一个地方指出，破坏一些人的革命名誉，把他们说成是象诺比林那样的“堕落的家伙”，这种企图也是不会得逞的^①。俾斯麦的这种相当于政变的专制独裁的行动是注定要失败的。马克思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十二年后，即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被废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

马克思号召各国工人活动家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团结起来。他尽力为反社会党人法的受害者募集捐款。

马克思确信，德国工人在反对非常法的斗争中定会表现出应有的坚韧不拔精神，德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先锋队也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广大党员面对警察手段镇定自若、坚毅果断地继续斗争。阶级的本能使他们采用新的革命工作方式。在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地方，逐渐出现了新的地下组织，建立了秘密的宣传联络网，一些合法的手段也被利用来进行党的活动。

群众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本能，但是非常法却使党的一些领导人惊慌失措。在非常法被通过以前，作为党的执行委员会的汉堡中央选举委员会，不顾倍倍尔的反对，宣布自行解散，并号召地方党组织跟着它做。这实质上就是取消党。情况的改变竟使许多不坚定的社会民主党活动家认为必须放弃革命的斗争方法，至于露骨的改良主义者就不必提了。布洛斯是这些看法的表达者之一。为了党的合法存在，布洛斯和其他一些胆小怕事和信心不足的机
636
会主义者，准备牺牲革命的原则，以求建立一个能迎合俾斯麦制度的新党。他们支持俾斯麦的措施，包括俾斯麦为了蛊惑人心于1881年颁布的工人保险法案。1879年5月17日社会民主党议员

① 《泰晤士报。文学增刊》1949年7月15日第464页。

凯泽尔在帝国国会党团的同意下发表演说，为政府的有利于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保护关税法案辩护。马克思称凯泽尔的演说为可耻演说^①。

在党的队伍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危险。在德国，甚至在奥匈帝国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分子活跃起来了。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的动摇不定、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是这种“左”倾得以发展的条件。杜林的许多追随者，首先是莫斯特，还有先前的拉萨尔分子哈赛尔曼都成了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情绪的传播者，这不是偶然的。

1878年底，约翰·莫斯特和其他社会民主党人被驱逐出柏林前往伦敦，打算随后流亡美国。但是他因受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委托担任《自由》周报的编辑而留居伦敦。周报于1879年1月初创刊，起初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但很快就鼓吹极左的无政府主义观点。它把机会主义的罪名横加在整个党的领导身上，大肆诽谤。莫斯特及其同道反对党的合法的活动形式：参加选举，利用帝国国会讲坛等等。他们号召同当局进行公开冲突，准备起义，并把赫德尔和诺比林的恐怖行动说成是真正革命性的表现。恩格斯在1879年7月1日给贝克尔的信中愤怒地写道：“《自由》喋喋不休地拚命谈论革命……”^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莫斯特路线的危害性是非常明显的，它使党的纪律涣散，使党脱离群众，有助于俾斯麦当局采取警察挑畔行动。马克思、恩格斯给工人活动家的许多信件表明，他们坚决地同莫斯特集团划清了界限（莫斯特散布流言，说什么他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并且赞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反对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派别的斗争。

637 与这样的“左”右摇摆相反，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和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90页。

^② 同上书，第357页。

的其他领导人善于探索正确的路线。在这严重的时刻，奥古斯特·倍倍尔充分显示出他的组织者的才能和斗争素质。他作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活动家不仅善于领导群众，而且善于向群众学习，支持并发挥群众的积极性。他先于其他人认识到执行委员会关于自行解散的决定的错误，并且认为必须制定党在非法条件下活动的新方式。倍倍尔依靠先进工人，花了很大力量来恢复党的组织。

1878年秋由他领导的莱比锡救济委员会行使党的领导机关的职权。在德国工人运动的新时期，按列宁的说法，倍倍尔“显示出了自己是党的真正领袖”^①。

倍倍尔准确地看到了工人运动的迫切要求，但是他没有立即认清机会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给党能带来多大的危害。在机会主义者的影响下李卜克内西有时偏离革命精神，例如，他在1879年3月17日帝国国会上宣布，社会民主党作为改革党将遵守非常法。

在讨论中央机关报（该报必须在国外出版）编辑部人员问题时，党的领导对右倾机会主义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希尔施被确定为编辑，但是在同他谈判时才弄清楚，除了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参加的莱比锡编辑委员会之外，在报纸的出版地苏黎世还必须设立一个监督委员会或管理委员会。有人提议让改良主义者卡尔·赫希柏格和以前的杜林分子爱·伯恩施坦和卡·奥·施拉姆参加编辑委员会。编辑部这样的结构，将来报纸的经费又要仰仗赫希柏格提供——马克思还在1877年就称他为“捐资入党”^②的资产者，并尖锐地批评了他所编辑的柏林杂志《未来》^③——这就使苏黎世集团可以左右报纸的方针。希尔施不愿意充当“傀儡”^④，他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2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81页。

③ 同上书，第283页。

④ 同上书，第372页。

拒绝担任编辑。

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希尔施的行动，并收回他们以前答应为报纸撰稿的诺言。恩格斯在1879年8月4日给倍倍尔的信中以
638 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坚决声明，他们将不同在“社会博爱主义者”赫希柏格监督下的党机关报发生任何关系^①。

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起初不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认为他们对赫希柏格不公正。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赫希柏格的想法很快得到了新的证实。1879年9月初，由赫希柏格编辑出版的杂志《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一期在苏黎世问世，上面刊登了一篇标题为《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的文章。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这篇用三颗星花署名的文章的作者就是监督委员会的三个内定成员：赫希柏格、伯恩斯坦和施拉姆。

“三人星座”（马克思讽刺地称呼文章的作者）的这篇文章仿佛是所有右派分子的一篇宣言。马克思指出：“还从来没有出版过比这更使党丢脸的东西。”^② 这篇文章斥责社会民主党过去的全部革命活动，其中包括党对巴黎公社的支持。作者又指责党，说什么党由于“不温和驯顺”招致了非常法。文章通篇皆是庸人的号叫：放弃革命目标，俯首听命于俾斯麦的警察制度，对过去的革命“罪过”进行忏悔。苏黎世三人团还责怪党同资产阶级作斗争，声称要吸收资产者入党，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放到领导岗位上，因为工人缺少教育。

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比愤慨。赫希柏格一到伦敦，恩格斯立即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气愤（这时期马克思在兰兹格特休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向党的领导提出重新审查党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成员的最后要求的时刻已经到了。他们通常以忠告和建议的方式向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60页。

^② 同上书，第389页。

人党领导人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现在党的阶级基础本身要遭到破坏,他们就只能用另外的方式了。1879年9月中恩格斯草拟了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白拉克和社会民主党其他领袖的一封信。

9月17日恩格斯和当天刚回到伦敦的马克思一起讨论了这封信,定稿后共同署名寄给了收信人。通告信(马克思把这封信叫作通告信)⁶³⁹的作者警告党的领导人:如果党的新机关报成为赫希柏格及其同伙的喉舌,“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①。

《通告信》是反对机会主义和反对对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态度的最光辉的文件之一。《通告信》的作者愤怒地谈到吓破了胆的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企图把危害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性质的政策硬塞给党。“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帮助倍倍尔和其他德国领导人更清醒地看待苏黎世集团在刊物上发表的言论。倍倍尔1879年10月23日就苏黎世的文章写信给恩格斯:“我阅读它后,理解了您的愤慨。”^③白拉克认为机会主义者的行径是企图“动摇党的基础,威胁党的生存”^④。党的领导人放弃了吸收赫希柏格及其朋友参加中央机关报出版工作的打算。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感到党内对他们不满,于是暂时退却了。

1879年9月28日《社会民主党人报》试刊号在苏黎世出版,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弗里茨舍参加了周报编辑委员会。但是主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90页。

② 同上书,第187页。

③ 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3卷第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和白拉克通信集》197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52页。

的人选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格奥尔格·福尔马尔被任命为主编。在他任职时期(1879年9月至1880年12月),党的中央机关报经常犯机会主义的错误。但是这份报纸当时在组织党的地下革命活动方面起了巨大作用。一大批党的积极分子冲破警察的重重障碍,按时地把《社会民主党人报》从苏黎世秘密运到德国。

1880年8月20日至23日在瑞士的古堡维登举行的党的第一次秘密代表大会证明党的领导已克服了摇摆性。代表大会反对
640 偏离革命路线,把无政府主义者的领袖莫斯特和哈赛尔曼开除出党。代表大会不顾右派(赫希柏格、凯泽尔及其他人)和温和派的反对,对纲领作了修改:删去了党要“利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那条条款中“合法的”一词。代表大会的这些决议使党明确了既要利用合法斗争形式,也要利用非法斗争的形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代表大会的总结非常满意。1880年9月底李卜克内西到达伦敦,把情况告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但是李卜克内西用玫瑰色来描绘党的状况,而不谈福尔马尔编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现的问题,这种倾向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定警惕。

不久倍倍尔也认为必须撤换福尔马尔。为了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商讨新任编辑的问题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倍倍尔决定1880年12月上半月去伦敦。在这之前他本人没见过马克思和恩格斯。他约请苏黎世三人团中的伯恩施坦一起去,当时伯恩施坦在受到批评后采取了较正确的立场。但是,后来证明,伯恩施坦只是在恩格斯的影响下才暂时采取了那种立场,恩格斯逝世后他就成了修正主义主要思想家。

倍倍尔从12月9日到月中在伦敦逗留。德国客人住在恩格斯家里,马克思也常在家里接待他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好客和亲切的接待给倍倍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友好的气氛中讨

论了许多问题。后来倍倍尔写道：“……我们离开了伦敦，对此行的结果非常满意。”^①

伯恩斯坦被指派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福尔马尔的免职对报纸起了积极作用。这都是恩格斯从1881年12月起经常为该报纸撰稿的结果。马克思也通过恩格斯尽力帮助该报。马克思在一些信中建议加强报道工人的贫困状况，不仅是私人企业的，而且是国营企业的工人的贫困状况，以便揭露俾斯麦的社会蛊惑宣传，即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②。他经常对该报编辑伯恩斯坦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

马克思高兴的是，德国党虽然遭到了迫害，但是它在群众中的⁶⁴¹影响加强了。党在1881年帝国国会的选举中获得十二个席位，同1877年在合法条件下所得到的席位一样多。马克思和恩格斯热情赞扬广大党员的坚定精神和英雄主义。他们也高度评价了德国无产阶级革命领导人的活动，特别是倍倍尔的活动。当1882年9月资产阶级报刊散布倍倍尔逝世的消息时，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是可怕的，是我们党的一个极为重大的不幸！他是德国（可以说是“欧洲”）工人阶级中罕见的人物。”^③当马克思和恩格斯知道，这是报纸的误传，他们的心情顿时感到轻快。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这个大体上是它的历史上的英雄时期的活动，并不是非常满意的。他们确信在党的队伍里还有不少机会主义策略的追随者。他们对一些自命为党的理论家和政论家的年青一代的代表人物抱警惕的态度。例如，1881年卡尔·考茨基（奥地利女作家敏娜·考茨基的儿子）到马克思家作客时给马克思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1874年考茨基

① 奥·倍倍尔《我的一生》1965年三联书店版第3卷第1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9页。

③ 同上书，第92页。

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他受到各种思想影响——从实证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到拉萨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直到1880年初他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人时，才倾向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在1881年4月11日给自己大女儿的信中写道：“当这个可爱的人第一次到我这里来的时候，……我脱口第一句就问他：您象不象您的母亲？他保证说一点也不象，我就暗暗为他母亲庆幸。他是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功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不过，在他那种人当中他还算个正派人。”^①恩格斯也在和考茨基认识的头几个月里，就说他是一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②。

由于同恩格斯在精神上的交往，考茨基很快就成了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但是过了许多年以
642 后，马克思在年青的考茨基身上看到的那些缺点又出现了，这些缺点对他以后的政治演变和他向机会主义立场的转变起了一定的作用。

虽然德国工人运动遇到许多外部的和内部的困难，而且这些困难不总是很容易和很快地克服的，但它还是不断发展壮大。它越来越成为德国政治生活中的强大因素，并有力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发展。

对创建法国工人党的贡献

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代表为建立和巩固自己独立的革命政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1页。

② 同上书，第211页。

而作的斗争，在七十至八十年代的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注视这个革命的过程，并竭尽全力加以促进。

法国警察企图监视马克思与法国的联系。巴黎警察局编写了一本它截获的马克思在1875—1876年给希尔施信件的内容摘记。从这本内容摘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非常关心在法国工人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他希望在法国找到一些能够联合社会主义者、能对法国无产者阶级意识的觉醒起决定性影响的力量。

他找到了这样的力量。1876年秋茹尔·盖得（真名马蒂约·茹尔·巴集耳）结束流亡生活，回到了法国。当时，由于盖得在报刊上维护巴黎公社，他被缺席判处五年徒刑。他逃到瑞士，参加了国际活动，属于巴枯宁派。在先后留居瑞士和意大利期间，盖得开始对无政府主义感到失望。在这方面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和其他著作对他起很大作用。在法国盖得认识了大学生社会主义小组的成员，认识了希尔施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这一切都促使他转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尽管他并没有立即放弃以前的观点。

盖得团结了杰维尔、马萨尔、夏布里和其他志同道合者，在法国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方面开创了一个新阶段。1877年11月，盖得和他的朋友成功地出版了周报《平等报》。编辑部公开宣布它拥护“新旧世界无产阶级中所有严肃的思想家现在所遵循的集体主义学说”。“集体主义”这个用语在法国通常是表示马克思主义的意思。从拉法格成为该报的积极撰稿人，后来成为其编辑之一的时候起，该报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日益明显。马克思在1880年11月5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你或许已经注意到，恰恰是《平等报》（主要是由于盖得转到我们这边和我的女婿拉法格的努力）

第一次成了真正的‘法国的’工人报纸。”^①

《平等报》对工人的革命影响以及它的国际联系，引起了政府的不安，招致警察对编辑部的迫害。1878年夏，盖得和他的好几个朋友因试图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而被监禁。

盖得被释放后，马克思才与他建立了私人联系。盖得与龙格在激进派报纸《法国革命报》上展开了论战，龙格还没有彻底克服蒲鲁东的传统，没有批判地对待资产阶级激进派空洞的社会计划。马克思在1879年1月写信给盖得，赞同他的立场。信的全文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其中有些见解，盖得在同年春寄往伦敦的回信中重复甚至引用过。从盖得的回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法国社会主义者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建立“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党”^②。他认为实现这个任务的途径，是在工人中宣传科学共产主义，克服资产阶级激进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影响，开展广泛的鼓动活动。盖得表示完全同意这些意见，并非常希望亲自和马克思会面。

1879年夏盖得和拉法格开始经常通信(1882年春天以前拉法格住在伦敦)，从此开始了他们之间的友谊。拉法格经常把盖得的信给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与他们讨论他所写的回信。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又有了一条渠道可以用来帮助法国社会主义者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了。保存下来的拉法格给盖得的书信，反映了马克思在幕后做的这项工作，反映了他对著名的工人运动活动家的富有思想性和策略性的影响。在这些书信中谈到，必须牢记运动的最终目的，同时必须注意工人阶级的日常需求，不要把对工团主义者和
644 合作社主义者的改良主义思想采取的否定态度扩大到整个工会运动和合作社运动，必须善于发现和利用工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0页。

② 同上书，第339页。

的合理成分。

当盖得和拉法格进行友好的争论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往往站在盖得一边。盖得的观点经常反映出他对法国的具体情况是比较了解的，而拉法格则长期以来没有接触。

马克思非常注意盖得和拉法格发表的言论。除了阅读刊登在《平等报》上的材料外，他还阅读了1879年出版的盖得的小册子《集体主义和革命》。马克思在小册子里关于工人在未来社会中将得到“全部的劳动产品”^①的错误提法的地方，都打上了问号。但是，整个说来马克思对这本小册子的评价是肯定的。后来马克思对盖得1880年11月发表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文章做了摘录^②。马克思也阅读了拉法格的著作，包括他的长篇文章《法国土地所有制的变动》^③。

1879年10月20—31日，在马赛举行了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在1876年10月在巴黎举行的和1878年1—2月在里昂举行的两次代表大会上，资产阶级合作社主义者占了优势，与前两次代表大会不同，这一次在马赛代表大会上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占了多数。代表大会不顾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反对，通过了关于确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制为工人运动的目的的决议和关于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的政党的决议。代表大会的领导者委托盖得（他因病没能出席会议）制定党的纲领。马克思高度地评价了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个伟大胜利。他写道：“法国真正的工人党的第一个组织是从马赛代表大会开始建立的”。^④

马克思和恩格斯帮助法国党的活动家制定统一的纲领，为党参加政治活动和选举斗争做好准备，在思想上巩固党。1880年3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3996。

②③ 同上，编号4006。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1页。

月《平等报》刊登了恩格斯的《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的两篇文章。文章阐明，在某些法国社会主义者中间流行的关于资产阶级国家能够实现重大的社会改革的观点纯属幻想。过了两周，马克思在《平等报》上发表了关于《哲学的贫困》的短文，预告该报将发表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的一些章节。马克思在这篇短文中阐明了他和蒲鲁东论战的实质，并强调指出必须用真正的唯物主义学说来说反对唯心主义和空想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为1880年1月开始出版的社会主义月刊《社会主义评论》撰稿。恩格斯应拉法格请求，为《社会主义评论》把《反杜林论》一书中的三章改写为一篇独立的文章《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发表在该杂志1880年3—5月几期上。同年出版了单行本。1880年5月马克思为法文版单行本写了一篇介绍恩格斯传略的导言，称他是“现代社会主义最杰出的代表人物”^①之一。

早在1880年4月马克思就为《社会主义评论》写《调查表》，《调查表》发表在该杂志上，并印成单行本出版。这个《工人调查表》传播很广；仅单行本就发行了二万五千册。它是一个对工人阶级的状况进行社会调查的周密的提纲。调查表共四个部分约有一百个问题。但是文件的意义不限于此。它是进行巧妙的社会主义鼓动的典范，它促使工人去考虑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通过调查表的形式，实质上阐述了工人阶级的经济要求：限制工作日，增加工资，实行工人自己监督下的有效的保险，男女同工同酬，禁用童工和缩短少年工人的工作日，工会组织完全合法化等等。总之，调查表引导被询问的工人得出必须彻底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的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59页。

刚刚建立的工人党首先需要—个纲领。盖得在拟定纲领时遇到了困难，他根据拉法格的建议，决定向马克思请教。1880年5月初这位法国社会主义者来到伦敦。在这里他认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见到了拉法格。在恩格斯的家里举行了会议，除了主人外，参加会议的有马克思、盖得和拉法格。他们讨论了法国工人党纲领草案。马克思当场向盖得口授了纲领的一般理论性导言部分。其余部分，是盖得在拉法格的参与下事先拟定好的。这部分包括最低纲领，各项政治和经济的要求，这些要求是准备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实现的，并被看成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中的一个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使这个纲领的一系列提法更为确切。马克思不同意关于法定最低工资这一条，因为实际上这可能被企业主利用来压制工资的提高，除了这一条，他对整个最低纲领是非常满意的。他指出，它包括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①。它提出的要求是：废除限制集会、出版和结社自由的法令，实行成年人八小时工作日和少年六小时工作日，男女同工同酬，禁止把国有企业、银行、铁路、矿山等转到私人手里。

导言部分是纲领的核心，决定纲领的理论水平。马克思以非常简练、通俗易懂的形式（毫无法国社会主义者的文件所固有的追求浮华词藻和空话连篇的毛病），阐述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共产主义目的。马克思在谈到他努力的结果时写道：“这是把法国工人从空话的云雾中拉回现实的土地上来—个强有力的步骤。”^②马克思仅用—页篇幅就阐述了一些极重要的原理：关于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关于工人阶级的革命活动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决定性手段，关于必须建立无产阶级的独立的政党。文件中写道：“生产者阶级的解放是不分性别和种族的全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1页。

人类的解放。”^① 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导言是“具有充分说服力的杰作，寥寥数语就对群众说得一清二楚”^②。

1880年10月14日，在工人党哈佛尔代表大会上以多数票通过了法国工人运动中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巨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中获得牢固
647 阵地的标志。同时这个纲领是检验法国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的试金石，它有助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分子同改良主义分子、宗派主义分子划清界限。

围绕着纲领所进行的斗争早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以前就开始了。草案一公布立即遭到资产阶级激进派和同情他们的具有蒲鲁东思想情绪的社会主义者（其中包括龙格）的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在哈佛尔代表大会上激烈反对通过纲领。布朗基派对纲领也持否定态度，虽然在国际活动期间他们在接受唯物主义世界观和科学共产主义方面已迈进了一步，但在策略问题方面他们还没有克服他们领袖的唯意志论和密谋的观点。他们仍然天真地相信，有首倡精神的革命的少数人有无限的能力，能随时进行共产主义革命。1881年布朗基派脱离工人党，成立了自己的中央革命委员会。

但是，工人党内部的机会主义派是革命马克思主义派的主要敌人。机会主义派的首领是原先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保尔·布鲁斯和贝努瓦·马隆。无论是布鲁斯还是马隆，在马赛代表大会期间都作为集体主义的拥护者出现，都在口头上承认马克思的学说。但是，马隆自称他的观点是某种“完整的社会主义”，它不仅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而且还以“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格律恩、拉萨尔、新康德主义者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4页。

格的教义为基础。布鲁斯的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同样也是折衷主义的。布鲁斯和马隆反映了工人党内那些对党的纲领中的革命方针不满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

哈佛尔代表大会之后,布鲁斯、马隆及其追随者直接攻击工人党的领导。《无产者报》是他们的喉舌。他们宣称:哈佛尔纲领,特别是纲领的导言部分是造成年青的工人党的一切失败,包括它在1881年的选举失败的根源。布鲁斯在1881年11月发表的《再论社会主义的团结》一文中阐述了改良主义的纲领。作者提出要放弃“一种学说的狭隘眼界”(指马克思主义),党要为各种学说的拥护者敞开大门。布鲁斯宣称,党采取最终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针等于支持“要么立刻实现一切,要么全不实现”的原则。与此相反,他建议,只提出一些在当时可能实现的要求,实行“可能的政策”。⁶⁴⁸可能派(人们这样称呼新的机会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把对社会的革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偷换成和平的、渐进的、小市民的“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空想理论,这就是主张将各种经济部门转归地方管理机关,并在此基础上组织“公用事业”。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下子就看穿了可能派的小资产阶级的本质。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可能派败坏工人党,他们观点的传播有可能把工人党降低到“最普通的工联的水平”^①。

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法国的马克思派应是同可能派作斗争的主角。因此当他们看到盖得和拉法格在同思想上的敌人论战时常常把王牌送给论敌,他们就感到很痛心了。革命的马克思派的领袖们有时不够沉着和灵活,有时教条主义地、简单地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而且那些法国人总是醉心于革命的词句。恩格斯直截了当地指出,盖得有巴黎的偏见,“似乎必须经常反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14页。

地说‘革命’这个词”^①。盖得及其拥护者在抨击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时，一味以宗派主义观点全盘否定争取改革的斗争的意义。盖得派不够重视工人的实践活动和日常需要。然而在理论上比较成熟的拉法格也犯盖得的某些宗派主义错误。马克思抱怨法国马克思派狭隘地、教条主义地解释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以致有一次他挖苦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②

马克思批评自己的法国学生的错误，同时完全支持他们总的路线。马克思认为，以盖得和拉法格为首的工人党马克思派，体现了法国工人运动的真正革命的倾向。马克思把工人党的未来与盖得派的胜利联系在一起。

当时党内分裂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在1881年10月底兰斯代表大会上可能派的代表（其中许多是代表虚构组织的）占了多数，他们通过了一些支持自治原则而破坏党的统一的决议。其中包括每个联合会有权制定自己的纲领。可能派基本上都被选入全国委
649 员会。代表大会宣布《无产者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代表大会之后，可能派加强了反对盖得和拉法格的诽谤运动。

在法国的马克思派处于紧急的关头，马克思和恩格斯想方设法帮助他们。1882年2月马克思在赴阿尔及尔治疗的途中，不顾健康状况的恶化，应邀在巴黎同盖得、杰维尔和他们的西班牙拥护者梅萨会晤。同年夏天，从阿尔及尔回来后，在阿尔让台逗留期间，马克思经常同早就定居法国的拉法格会晤。8月2日在巴黎梅萨的家里，他再次同盖得和杰维尔会晤，这次拉法格也在场。马克思从会晤和谈话中得出的印象是，尽管情况是严重的，但“盖得和他那一派正在巩固自己的地位”^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23页。

② 同上书，第385页。

③ 同上书，第82页。

秋天，在组织上同机会主义者划清界限已势在必行。1882年9月25日以盖得为首的马克思派代表，为了抗议可能派的机会主义政策，退出了在圣亚田举行的工人党代表大会，并在罗昂召开了自已的代表大会。可能派的代表大会废除了哈佛尔纲领，而代之以各联合会的种种不同的纲领；而马克思派却在自己的代表大会上重申忠于哈佛尔纲领所阐述的原则，并通过了关于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党的主要政治目的的专门决议。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党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他们认为，圣亚田所发生的事件是工人运动内部客观矛盾增长的结果，这些矛盾的产生是由于工人运动内部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革命无产阶级的倾向和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倾向。他们认为，一般来说这些对立的倾向的斗争是阶级社会中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规律。用什么形式同机会主义分子实行必要的分裂，则取决于具体的条件。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法国的事件为例教导说，当保持形式上的统一使党有发生改良主义蜕变的紧急关头，分裂对工人运动来说并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分裂为工人党的真正统一、即在革命基础上的统一创造条件。

最初可能派组织人数较多，这并没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到不安。盖得派的优势在于，拥护他们的首先是大工业中心的无产⁶⁵⁰阶级，包括巴黎的许多产业工人，而可能派基本上是在经济落后的地区，在法国的南部和西部以及在首都的小企业的工人中间占优势。法国马克思派经受了尖锐的党内斗争的考验，捍卫了自己的纲领这面思想旗帜。马克思认为这是革命原则在法国工人运动中将来取得胜利的保证。

英国社会主义宣传的新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英国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倾向增强的主要原因首先是英国的资本主义工业在世界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只有英国丧失了这样的地位，形势才能发生根本的变化。

早在七十年代末就有迹象表明英国的工业垄断地位正在削弱。美国和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英国。英国作为殖民强国和世界市场上的商品（包括殖民地商品）的主要出口国仍保持首位，但在工业品生产方面渐渐失去了领先地位。英国的经济从1873年开始停滞，没有任何高涨，在1878—1879年就进入了严重危机阶段。

广大的无产阶级阶层状况的恶化，对群众的情绪发生了影响。群众开始对只联合熟练工人的行会性的关门主义的工联感到失望。工人和激进的知识分子力求摆脱自由派在政治上的控制。在爱尔兰蓬勃兴起的民族运动和土地运动是震荡的重要因素。在不列颠群岛已经开始形成这样的形势：国际在英国工人运动中播下的革命社会主义的种子必将长出第一批幼芽。

这些年代里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寻找使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起来的方法和途径，向它的优秀分子介绍社会主义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称赞细木工工联秘书亚当·魏勒尔的活动，他以前参加过美国内战，是国际不列颠联合会委员会委员。魏勒尔在工会组织
651 中把实际工作同公开捍卫社会主义观点结合起来；在工联伦敦理事会和工联每年的代表大会上（魏勒尔在1876—1883年都当选为代表大会代表），他支持激进的决议，反对大多数人的改良主义立场。

1880年秋天，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和罗伯特·班纳通信，他是苏格兰的一群倾向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激进工联主义者的代表人物。班纳9月17日从爱丁堡写信给马克思说：“我希望您听到下面的话不致感到意外：在特威德河以北地区除了我，您的恭顺的崇敬者，还有一些人都在高度评价您过去和现在为社会民主主义所作的贡献。”^①马克思11月中寄出的回信没有保存下来，但从班纳1880年12月给马克思的信，以及给恩格斯的信中（恩格斯给班纳的信也没找到），可以看出他们俩写给苏格兰社会主义者的信中的内容。马克思向他介绍了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情况、自由党人（他们要把工人运动置于自己的政治影响之下）的政策实质。他还提醒班纳注意英国社会生活中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动，这些变动为克服自由党的工人政策的狭隘性创造了前提。班纳同意马克思的看法，他写道：“……您谈到的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在我们中间已深深地扎根。”^②

激进俱乐部和激进团体的许多成员其中包括国际工人协会不列颠联合会的过去的活动家，早在国际时期就很熟悉马克思了。这些组织有时邀请他作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讲演。1879年在伦敦索荷区成立的争取成年男子普选权同盟的领导人人都知道马克思的名字和著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全力支持那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新生力量，帮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人物转到工人阶级方面来。但是，马克思对待那些在半路停滞不前、力图把社会主义观点同反革命的和庸俗的观点结合起来、或者力图利用社会主义运动来达到个人目的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马克思同英国政论家亨利·迈尔斯·海德门的关系，就是这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4176。

② 同上，编号4218。

652 方面的例证。富裕的律师和交易所经纪人海德门，按其政治信仰来说是个资产阶级激进派，他同情托利党。1880年他试图作为保守党的候选人进入议会，但没有成功。同时他因揭露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的某些方面，揭露自由党政府对爱尔兰民族运动所采取的镇压措施而享有名望。1880年6月海德门通过希尔施同马克思认识，不止一次地同马克思会晤。他阅读了法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这决定了他转向社会主义。但是，他的社会主义观点是非常肤浅的、极不彻底的。

马克思花费了不少的精力向海德门说明完整地理解革命学说的必要性。但是海德门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结论。他曲解马克思关于在英国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和平发展的原理，他企图用“社会改组”、“社会改造”来代替这个概念，把马克思主义观点和“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把马克思同洛贝尔图斯和拉萨尔相提并论。

马克思把海德门看成工人运动的民主主义同路人，并竭力促进他的观点的进步，但马克思绝不认为他是英国社会主义的领袖。而海德门却急于想扮演这个角色。1881年春天他和他的朋友着手把工人的和民主派的激进俱乐部联合成一个组织，力求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分子和社会主义分子都联合在这个组织里。

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海德门建立的组织——1881年6月8日最后建成并定名为民主联盟——是个半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性质的团体。他对作为领导者的海德门不抱任何幻想。他指出：“所有这些可爱的中产阶级作家——如果不说是专家的话——都满怀着一一种非满足不可的愿望：立即利用顺风传到他们耳朵里的任何新思想来捞取金钱，或者捞取名誉，或者捞取政治资本。”^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40页。

在成立会议上，海德门向代表们散发了他刚刚出版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作为对民主联盟纲领的解释。他在其中两章（《劳动》和《资本》）里复述了，甚至部分或直接照抄《资本论》第一卷的许多地方，却不提作者的名字，只是在序言里含糊地提到他利用了“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的作家”的思想。⁶⁵³

在阅读海德门的小册子时马克思确信，作者不仅完全剽窃而且歪曲了《资本论》中的许多思想。例如，当海德门转述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的思想时，用颂扬资产阶级民主，以拉萨尔关于国家干涉的办法解决社会问题的处方来“补充”马克思的思想。作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说什么英国人精神上有优越性，他们不让自己受那个把其他民族推上无政府状态和毁灭道路的“社会主义恶魔”的诱惑。凡是这些地方马克思都打上着重号和惊叹号。小册子有的地方充分暴露了海德门的沙文主义，他硬说盎格鲁撒克逊的民主制对全人类负有特殊的社会使命，他把讲英语的各民族的联合说成是实行社会改造的可靠途径，还强调说，英国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方面是“大公无私的”^①。

马克思认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宣传与这种庸俗民主主义和沙文主义的观点是不相容的。马克思针对海德门为自己对《资本论》的放肆态度所作的某种辩解，在1881年7月2日给海德门的回信中公开声明，反对把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折衷主义地混合在一起。他还指出，不同意海德门及其朋友们的意见：一般英国人本能地“对社会主义感到恐惧”，不相信社会主义理论，更不相信外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无论是在‘国际’时期，还是在宪章运动时期，我都没有发现这种情况。”^②他坚信，革命的无产阶级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408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4—195页。

学说会给自己开辟通往英国工人阶级的道路。

这个看法逐渐地为生活所证实。在英国无产阶级和民主派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愈来愈大。1881年12月有才华的新闻工作者贝尔福特·巴克斯在《现代思想》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和他的学说的文章。马克思把这篇文章寄给拉甫罗夫时，告诉他说：“他那如此真诚的语言和充满信心的语调给人以极深刻的印象。”^①著名的诗人、艺术家和政论家威廉·莫利斯参加了社会主义的宣传工作。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先进工人中间得到了愈来愈多的拥护者。

在民主联盟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83年夏联盟通过了社会主义的纲领，1884年它改组为社会民主联盟，宣布马克思主义为联盟的理论纲领。但是海德门和其他领导人的宗派主义和机会主义立场长期阻碍了该组织执行正确的革命的路线。

为英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扫清地基，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但是在马克思生前，在这个改良主义根深蒂固的国家里，科学共产主义已经开始初步与英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了。

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前景

马克思从来没有到过美国。然而他非常熟悉美国的经济和政治生活，敏锐地看出了这个国家发展的趋势。

1882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关于美国“神话般的资本积聚”^②。马克思注意到作为“垄断力量”的股份公司在美国的作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0页。

这些股份公司“从国内战争一开始就以日益加快的速度控制工业、商业、地产、铁路和金融业”^①。马克思把美国的土地关系看作是在农业中不受封建残余束缚而自由经营企业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各种矛盾加深的例子。

美国繁荣的背面，就是通过加强劳动强度对工人的大量剥削，危机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灾难，失业人数的空前增多。“美国文明”必然使各个阶层的居民，首先是黑人，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只有美国工人阶级的上层享有优裕的条件。其余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移民工人，实际上毫无权利，备受社会压迫，在这方面与其他国家自己的弟兄们没有什么区别。马克思写道：“美国的优秀作家们⁶⁵⁵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尽管反对奴隶制的战争打碎了束缚黑人的锁链，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使白人生产者遭到奴役。”^②美国的资产阶级国家尽管打着民主的招牌，但是极端仇视工人阶级。它是资本主义巨头手中的工具。“一群匪帮掌握了立法机关，并把政治变为交易对象”^③，——马克思就是这样形容美国的政治制度的。

马克思认为，美国工人阶级对资本政权的反抗的加剧是不可避免的。他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道路是特殊的、曲折的。无产阶级人数增多和集中化程度加强，剥削加剧，阶级矛盾深化，经常失业等等情况，加速美国工人运动的发展，除此之外，一些阻碍无产阶级力量团结的因素也在起作用。在七十年代，工人特别是本地工人，还有可能在西部得到土地，变为农场主。最妨碍美国工人阶级团结的，是它民族成份的复杂性，因为从爱尔兰、英国、德国、意大利，而七十年代起从东欧国家、中国等地来的移民越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页。

③ 《苏共历史问题》1966年第10期第9页。

来越多。由于受到这些互相矛盾的倾向的影响，美国工人运动便时而高涨，时而低落。在思想方面更是形形色色：狭隘的工联主义思想、不问政治倾向与密谋传统同时并存，除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

国际在美国活动的最重要的成果是，1876年夏成立了美国工人党，参加该党的有以左尔格、奥·魏德迈、帕·麦克唐奈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派。美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保持经常的联系。被委任为党报《劳动旗帜》编辑的麦克唐奈，请求他们寄一些文章和简讯。1876年12月他给马克思写信说：“您或者恩格斯先生哪怕只写一行字……大家都很高兴读它，并认为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①恩格斯于1878年3月在这家纽约报纸上发表了《一八七七年的欧洲工人》一组文章。

656 但是，美国工人党内部的科学共产主义拥护者不得不进行艰苦的斗争，以反对拉萨尔派和其他宗派主义和改良主义分子，其中主要是德国的流亡者。麦克唐奈在上述给马克思的信中说道，他、左尔格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正在进行“一场反对阴谋家、宗教狂热者和糊涂人的伟大战斗”^②。1877年党的代表大会把工人党改名为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在这次会上拉萨尔派占了上风。左尔格、麦克唐奈和他们的拥护者被迫退党，而拉萨尔派的领导人修改了党纲，确定党的主要目标是参加选举斗争。新领导的态度，不愿在本地美国人中间进行工作，甚至不愿学习英语，使党变为狭隘的宗派组织。

当那些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人在党内积极活动的时候，情况就有所好转。同时党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常常对党施加影响。党的报纸《纽约人民报》、《社会主义者报》——两家报纸都创办于

^{①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3732。

1878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八十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期间马克思的战友赫普纳参加了《纽约人民报》的出版工作。他有步骤地以《工人丛书》的形式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

马克思和恩格斯努力促进美国社会主义者克服对待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教条主义态度，更密切地联系工人群众（即使他们还没有社会主义的信念），不要抽象地进行社会主义宣传，而要采取群众能接受的形式，把社会主义宣传同捍卫工人的具体利益，同直接参加他们的日常斗争结合起来。列宁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根据各个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的特点和主要缺点，在他们对各国社会主义者提出建议和批评所犯的错误时，提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劝告。他们以前警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首先要防止右倾机会主义，这时他们首先指责美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狭隘的宗派主义观点，指责后者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教条，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同斗争的实际条件相结合。列宁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英美社会主义运动时，特别尖锐地批评它脱离了工人运动。”^①

马克思阐明，在美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是同美国无产阶级广 657
大阶层的群众性的斗争分不开的。社会主义者只有投身到这个斗争中去，才能为建党奠定基础。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群众的阶级觉悟低，他们的狭隘的实际主义，对于这个任务的解决都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首先在人人了解具体的实际任务的基础上，利用群众对联合的自发要求，就能把无产阶级斗争的参加者团结起来。这样就能用社会主义精神教育工人，帮助他们接受革命的社会主义纲领。

社会主义的宣传脱离无产阶级群众的日常斗争，这是无产阶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693页。

级群众受各种激进的资产阶级理论的影响的原因之一。例如，美国激进的政论家和经济学家亨利·乔治的观点在美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认为土地国有化是社会改造的主要手段，这个思想，深受一些租地农场主和美国工人的欢迎，他们仍然幻想回到土地上去，痛恨那些侵占土地的土地投机商和铁路公司等等。1880年出版的乔治的《进步和贫困》一书，在美国、英国和爱尔兰被许多人当作社会主义著作。

马克思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并在页边上做了批注。他还阅读了1881年出版的乔治的另一本书《爱尔兰的土地问题》。马克思在这两本书的批注中指出了作者观点的局限性和错误。他强调指出，乔治企图把现代社会贫困的原因说成是土地私有制，这是站不住脚的。土地私有制只是资本家垄断生产资料的形式之一，而且在理论上不是必然的形式。马克思在《爱尔兰的土地问题》一书的页边上写道：劳动者的贫困“不是土地私有制造成的，而是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①。乔治以及与他类似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理解，废除地租，确切些说，把它以土地税的形式交给国家，来代替其余的赋税，这本身不能消灭雇佣劳动和对剩余价值的占有。这只会巩固资本主义，以地租来增加资本主义利润的其他部分。马克思指出，《进步和贫困》一书的作者在理论上的软弱无力使他看不到在美国，与他的理论相反，正是土地价格低廉，“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达到了欧洲从未达到的高度”^②。

马克思在1881年6月2日给美国社会主义者、乔治的崇拜者斯温顿的信和6月20日给左尔格的信中，做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对乔治作为政论家的天才给予应有的评价。马克思并不否认废除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4142。

② 同上，编号4086。

地租是进步的要求，他提醒说，这个要求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已作为无产阶级国家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措施之一提出来了。因此，乔治的错误在于：他没有把英国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早就提出过的这个激进的要求，看作是一种过渡的措施，而是跟随比利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科兰，把它当作摆脱一切社会弊端的万应灵丹。乔治替这个药方作“美国式的”广告，自吹是这个药方的第一个发明者，他在群众中散布幻想，在客观上就是把群众的革命反抗精神引上错误的道路，使他们脱离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的斗争。马克思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可见，所有这一切无非是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下，企图挽救资本家的统治，实际上是要在比现在更广泛的基础上来重新巩固资本家的统治。”^①

马克思关于美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特点，关于美国工人运动在其发展道路上遇到的障碍和危险，关于美国社会主义者必须克服宗派主义、回击非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等思想，逐渐对美国先进工人发生了影响。

对改革后的俄国发展的分析

马克思在他的最后十年里特别注意俄国，当时俄国正经历着对人民来说是痛苦的、从落后的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1861年起，这个国家进入了一个以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和革命力量的蓬勃增长为标志的阶段。

1861年农民改革的原因、实质和后果，是马克思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他的手稿《关于俄国一八六一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93页。

札记》具有特别的吸引力。马克思先系统地整理和概括他所积累
659 的材料，在 1881 年底或 1882 年初写成了这些札记。马克思认为改革的准备是同农民不满的增长、同农民运动的发展有直接的联系，这是他在 1858 年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阐述过的思想，他得出结论说：“农民同地主之间进行游击战争。”^①

当时不仅俄国的官方报刊，而且所有欧洲自由主义报刊都继续吹捧“沙皇—解放者”和“伟大的改革”，马克思却认为改革是掠夺农民。他指出，被迫开始废除农奴制的沙皇“从一开始就决定给地主尽可能多一些（而给农民尽可能少一些）”^②。马克思深刻地 and 明确地阐述了改革的实质：“解放一般说来就是高贵的地主再也不能支配农民的人身，出卖他们等等。这种人身奴役制已被消灭。地主失去了支配农民人身的权力……现在农民在经济上依附于他们原先的地主。”^③马克思强调指出，1861 年 2 月 19 日的诏书，采用保留半农奴制关系的所谓“暂时义务状态”的办法来长期地维持农民的不自由劳动。马克思认为，赎金是把对农民的掠夺用法律固定下来，是因废除农奴制而给地主的贡品。

马克思指出，改革的掠夺性质引起了人民的愤懑和反对地主斗争的新的爆发。“1861 年 2 月 19 日（3 月 3 日）的解放诏书颁布以后——农民中普遍发生了骚动和暴乱；他们认为诏书是虚假的、伪造的文件；武装镇压开始了；在《诏书》发表以后头三个月内农奴普遍遭受鞭笞。”^④

马克思在许多笔记中全面地描述了改革后的农村和千百万农民群众的状况，他们过着极贫穷的生活，吃的是带糠的面包和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463 页。

② 同上书，第 455 页。

③ 同上书，第 463—464 页。

④ 同上书，第 453 页。

藜，经常由于连续歉收而挨饿和死亡。地主对小农的剥削比农奴制时期更残酷。高利贷者和富农把农民在可怜的小块土地上的收入全搜刮了。专制国家把繁重的租税和国库税加在“解放的”农民⁶⁶⁰身上。马克思着重指出，农民贫困的经济状况与他们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无权地位是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马克思的《关于改革的札记》和其他手稿证明，他把改革和改革的结果看作是资本主义结构在俄国建立的开端，不止一次地把1861年以后俄国的发展看作是工业新纪元的开始。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个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尚属早期。马克思在手稿中记下了在1861年前好些年的商品和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资料。不过马克思特别指出，1861年是俄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农奴制废除后国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的开端。

马克思非常清楚地看到在俄国进步的经济发展道路上的一切障碍。他认为最主要的障碍，是1861年以后保留下来的大地主土地占有制以及由它决定的农民对旧日主人的依附。马克思认为，在俄国改革后的农村中，半封建的关系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关系极其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是俄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是俄国社会生活的特点，它们引起了这个国家特别尖锐的阶级对立。

马克思善于发现和正确地评价俄国农业中许多半农奴制关系束缚下的资本主义因素。例如，他指出，一部分地主经济由徭役制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使用了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采用改良的工具和农业机器。从马克思在研究《税制委员会报告书》和其他材料时所做的札记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特别注意的是，如甜菜制糖厂、酿酒厂和马车制造厂这类由地主经营的企业，商品性农业地区的出现，以及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畜牧业。他特别重视农民内部日益增长的矛盾。在马克思的笔记里，有好几十页是关于农民

在财产上的分化，富农收买地主的土地，他们使用雇佣劳动，出租小块土地给农民以及关于高利贷业务等资料。

马克思在阅读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讽刺性作品时，把作者描写“社会的新柱石”——资本家和富农的章节都标了出来。

661 马克思仔细研究了在俄国农村与富裕阶层相对立的社会集团的形成过程。在他的手稿中有许多关于俄国的雇农、贫农和其他各种农业工人阶级的材料。马克思非常熟悉俄国农业无产阶级的特点：雇农和短工一般都拥有份地，份地不仅不给占有者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而且还把他拴在“村社”上，确切地说把他拴在恶霸富农和当地地主身上，也就是使他处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最坏条件下。

马克思看到，正如过去的西欧一样，俄国所发生的社会过程正在导致“剥夺农民即广大人民群众”^①，导致小生产者丧失土地和破产的俄国方式的实现。马克思指出，俄国农民的分化，大部分农民的无产阶级化和俄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条件。

马克思非常关切地注视着俄国工业的增长，新工厂的建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区域、在弗拉基米尔和其他省份、在黑海和阿速夫海沿岸、在波兰和俄罗斯帝国的其他地方出现的新工业部门。他在研究《军事统计汇编》和《税制委员会报告书》时所做的札记证明，他对俄国市场关系和对外贸易也感兴趣。他收集了有关海港的发展，俄国同中亚细亚、波斯和中国的贸易的资料。他还专门研究了俄国的铁路建设，以及它对宗法关系的进一步瓦解和商业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根据对社会经济关系的分析，揭示了俄国专制国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2页。

阶级性和反动作用，阐明了它的国内外政策的特征。尽管 1861 年以后在政治制度方面作了某些改变——除了农民改革，沙皇政府被迫在司法、行政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正如马克思强调指出的，国内的统治制度仍然是极端专制的。沙皇政府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同时它仍然保留了依靠军事警察统治的专制政权的全部主要特征。

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专制制度与这种发展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马克思认为，沙皇财政的困难是俄国现存制度不稳的标志之一。沙皇政府整顿财政的尝试，使他清楚地回想起十八世纪投机商为把法国专制制度从财政灾难中挽救出来所采取的那些措施。他讽刺地说道，“俄国财政炼金术士”^①走上了同样的道路。马克思指出，国内局势不稳的沙皇专制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再也不能那样顺利地实行它的侵略计划了；它在七十年代巴尔干危机和 1877—1878 年俄土战争期间的军事和外交困难，就说明了这一点。国内日益壮大的革命运动破坏了俄国沙皇政府的一整套侵略的对外政策。马克思在 1879 年 9 月 10 日写道：“俄国在国外的外交获得成功的秘密在于俄国国内象死一般的沉寂。随着国内运动的发生，这种魔力也就消失了。”^②

马克思非常满意地看到，官方的俄国与革命的俄国之间的矛盾加深了。俄国进步的革命集团的代表人物对国内状况的评论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从此他越来越注意俄国社会思想界的著作、革命的政论文章和文学艺术，马克思公正地把文学艺术看作俄国生活的镜子和俄国社会中先进分子的思想变化的晴雨表。马克思非常熟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称他为“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203 页。

② 同上书，第 105 页。

家”^①，一直很有兴趣地研究他的著作，特别是他专门分析在 1861 年改革的准备阶段和实行期间的俄国社会经济关系的著作。还在七十年代初马克思就阅读了从丹尼尔逊处得到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没有收信人的信》的手稿副本，这部手稿对改革进行了全面的批判。1881 年他重新阅读了这部光辉的政论著作。

马克思在研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时，高度评价了他提出的通过人民革命同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作斗争的纲领。马克思对这位俄国革命家战斗的民主主义，他对人民群众的深信，他对沙皇制度和农奴制的极端仇恨，作了应有的评价。

663 马克思不仅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看作是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和天才的文学家，而且看作是革命阵营的领袖，俄国新一代革命家的教育者和领导者。马克思在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对反村社土地所有权的哲学偏见的批判》页边上的批注证明，马克思非常重视伟大的革命思想家关于俄国不经过资本主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②。马克思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关于利用村社进行俄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见解具有空想的性质——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当时条件下也不可能看到保证当时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真正社会力量，——但是马克思从他的见解中发现了许多合理的东西（关于“集体主义和协作社的精神”的意义，关于村社使用农业机器和科学成就等等）。马克思认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对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这个问题的探讨，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的一家人不仅熟悉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哲学和历史著作，而且熟悉他的政论著作和文艺作品。燕妮·马克思在 1877 年 5 月《法兰克福报和商报》刊登的伦敦文学和戏剧生活评论中，批评英国资产阶级报刊对俄国革命文学的无耻诽谤，她称车尔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 卷第 17 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 1，目录 1，编号 3406。

雪夫斯基为“现代最伟大的革命作家”。同时她援引了他的小说《怎么办?》和发表在《同时代人》杂志上的文章,在这些文章里他“要求俄国政府解放农奴(当然,实际上它已经用另一种方式实现了),用非常尖刻的笔调抨击当时的彼得堡报界虚伪的自由主义,当政府把他流放到西伯利亚时,这些自由主义‘可尊敬的’代表人物就松了一口气”^①。

马克思知道诗人尼·阿·涅克拉索夫、伟大的讽刺作家米·叶·萨尔梯柯夫-谢德林是属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一派的。1873年2月他阅读了丹尼尔逊寄来的萨尔梯柯夫-谢德林的讽刺作品《外省人旅京记》和《塔什干的老爷们》。后来马克思又读了他的其他著作《在国外》和《芒烈波避难所》。马克思在1878年对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的小册子《俄国政府对乌克兰文学的迫害》上做的批注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伟大的乌克兰诗人和革命家塔·格·舍夫琴柯的作品^②。 664

总之,马克思对俄国文学艺术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对十九世纪的俄国诗歌和艺术性散文的繁荣表示赞赏。拉法格回忆马克思曾津津有味地阅读普希金、果戈里和谢德林的著作。马克思把一本《叶甫盖尼·奥涅金》的最初版本(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已经引用了这本书)小心地保存起来,在他逝世后恩格斯又把它作为他们的俄国藏书中最珍贵的东西保存下来。弗兰契斯卡·库格曼转述了马克思对俄国其他作家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屠格涅夫非常真实地描述了俄国人民的特性和他们那种斯拉夫民族的沉毅的感情。他认为对于自然的描写未必有哪一位作家能超过莱蒙托夫,至少具有这种才华的人是

① 《德国工人运动史评论》1966年第6期第1045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6470。

寥寥无几的。”^①与马克思接近的人的书信和回忆录告诉我们，在他的家里播放俄国古典音乐，收藏了从俄国寄来的米·伊·格林卡的歌剧的钢琴曲，弹奏俄国流行的抒情歌曲。

马克思认为俄国作家的作品不只是美学欣赏的源泉。他欣赏俄国的文艺，因为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俄国社会生活的丰富而具体的材料。

对俄国革命的殷切希望

马克思越研究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越深入探讨俄国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所发生的过程，就越坚信：俄国正走向巨大的、将对全欧洲起决定性影响的革命震荡。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世界意义充满了极其乐观的信心”^②。

七十年代下半期，马克思坚信，俄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
665 更临近革命了。他希望，沙皇政府由于1877—1878年俄土战争而发生的困难，会加速革命事变的到来。马克思在1877年9月27日给左尔格的信中谈到了这一点。俄国革命的前景使他欢欣鼓舞：“……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③

在七十至八十年代之交产生的俄国第二次革命形势到来之前，马克思对于成熟的俄国革命的所有重要问题的看法已完全形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2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7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75页。

成了。他坚信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有巨大力量的，这个信念是基于他对革命形势的客观前提的深入了解，对国内进步发展的需求的科学判断。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日益迫近的俄国革命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它的主要目的是消灭专制制度、土地的地主占有制和半农奴制关系。与幻想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粹派相反，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俄国面临的革命变革应当是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对解决土地问题有切身利害关系的农民，一定要使革命变革具有巨大的爆炸力，要保证人民革命深入广泛地发展。

马克思在观察俄国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时，看清了它是不坚定的，常常在政治上同仰仗它的经济利益的专制制度进行妥协。他知道，资产阶级不会认真地反抗沙皇制度，不能采取任何有革命意义的行动。

马克思认为推翻专制制度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首要任务。在他看来，政治革命和土地革命是民主主义变革的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对沙皇制度的致命打击，将敲起警钟，唤起广大的各阶层人民投入更积极的革命创造活动。马克思相信，俄国革命运动会造就伟大的人民领袖——不愧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继承人。

马克思坚信，推翻专制制度一定会为俄罗斯民族和俄国其他民族的真正的进步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情况下，在它的帮助下，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或者大大缩短这个阶段而进到社会主义。马克思对这种可能性的⁶⁶⁶设想，根据的是总的历史情况已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不仅是同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相比（马克思经常从规模和上升发展方面把未来的俄国革命同法国革命相比），而且是同1848年革命事件时期相比而言的。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已经达到一个新的

高度，在胜利的情况下能够而且必将影响俄国人民革命的进程和历史结局。

因为俄国工人阶级在这个时期还没有形成一支能够领导全民斗争的有组织力量，马克思认为俄国革命的命运和西欧的无产阶级是有联系的。西欧无产阶级对俄国革命者的帮助能保证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和社会复兴，对马克思说来，这几乎成了一个定理。他还认为，俄国革命和西欧工人阶级胜利的运动的相互作用，能保证俄国革命斗争不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最终把国家导致社会主义。

这个思想反映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给 1881 年 3 月斯拉夫人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十周年纪念大会主席的信中。在这封信中他们坚信，正在俄国发展的革命运动“也许是长期而激烈的斗争，最终肯定要导致俄国公社的建立”^①。

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又经常强调，俄国民主革命作为全欧洲革命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对西欧革命过程发生特殊的影响。他们认为，未来的俄国革命变革将成为全世界历史的转折点。

马克思把整个欧洲国际关系体系的改变同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同推翻沙皇制度联系在一起。他指出，革命“归根到底必然会结束旧欧洲的整个现状”^②。它象“清新的风”一样将对德国起良好的影响，它将“一举”改变德国的状况，导致普鲁士容克和军阀统治的瓦解。马克思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写道，俄国的革命将是“普鲁士的丧钟”^③。马克思把波兰的解放，欧洲其他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奥匈帝国及其他国家的革命变革都同俄国革命联系在一起。

667 力量的对比将会发生根本变化，变得有利于整个欧洲大陆的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270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227 页。

③ 同上书，第 296 页。

阶级和革命民主主义。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看法，专制制度的瓦解应当意味着“欧洲整个形势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一定会受到各国工人兴高采烈的欢迎，把它看做是向他们的共同目标——劳动的普遍解放大大迈进了一步”^①。

由于殷切地期待俄国的革命，与俄国革命家共同期望革命早日爆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革命的临近作了过高的估计。他们对革命爆发的日期作了错误的估计，但是在主要方面——在分析革命的客观前提，预见革命的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是完全正确的。

俄国革命家的顾问和朋友

七十年代在俄国，俄国革命家向沙皇专制制度展开了英勇斗争。革命力量和俄国官方的冲突在1879—1881年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在这个时期下层群众的革命风潮恰好和正开始的“上层危机”同时发生，执政集团在寻求摆脱不稳定状况的出路中动摇不定，采取了“鞭子加糖饼”的政策。俄国革命者在七十年代上半期建立了一些新的革命团体和小组，建立了“到民间去”，到了1876年他们又建立一个全俄的、集中的、极其秘密的组织，不久以后这个组织取名为“土地和自由社”。该组织内部主要在策略问题上发生了分歧，于1879年8月分裂为两个组织：对沙皇政府发动直接进攻的“民意党”和“土地平分社”。1881年3月1日按“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决定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这事件之后，革命运动遭到了特别残酷的镇压，在人民中得不到必要的支持，运动便走向低潮。革命者在和沙皇的斗争中耗尽了力量，无组织的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58页。

668 散的农民群众还不够成熟，还不能采取共同行动，工人阶级在俄国刚刚形成。资产阶级的自由派又怯懦地拒绝援助反专制制度的战士。俄国反动势力重新嚣张起来。民粹运动开始失去其革命性，逐渐转变为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一翼。

七十年代的革命事件，对俄国的社会生活和以后解放斗争的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革命事件构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平民知识分子时期的一定阶段^①。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平民知识分子，先进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热情地捍卫了人民的利益。七十年代的革命民粹派表达了要求摆脱农奴制残余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广大农民群众的愿望。他们继承了其先驱和导师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人民革命力量的信念、以革命的方法同沙皇制度作斗争的方针、以及社会主义的理想。

马克思很清楚，俄国民粹派希望立即进行社会主义变革，是一种幻想。但是，正象恩格斯说的，他却坚决反对同那些忠于人民、为自己的错误主张而奋斗的战士进行“争论”^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思想上的不成熟符合于当时的俄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水平。马克思和恩格斯相信，随着俄国革命者自己经验的积累和对西欧工人运动教训的研究（许多民粹派对西欧工人运动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错误将被克服。民粹主义的思想上的弱点并没有使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不到它客观上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内容，以及它同沙皇制度奋不顾身的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西方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各个派别看作是无产阶级组织的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同时注意到俄国工人阶级还刚刚迈出了独立的最初几步，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改造已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0卷第2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8页。

经提上日程，小资产阶级民粹主义运动还没有完全失去自己的革命可能性。因此他们支持革命的民粹派，把他们看作西欧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同盟者。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赞赏他们对沙皇制度的强烈憎恨、他们的奋不顾身的精神、革命的坚定性、国际主义的倾向、以及他们发动俄国农民这个欧洲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后备军起来斗争的意愿。

马克思熟悉民粹派的许多刊物：1873—1876年拉甫罗夫在国⁶⁶⁹外出版的《前进》杂志和报纸，秘密的机关刊物《土地和自由报》和《民意报》，以及他们的纲领性文件，民粹派的政论性文献和类似民粹派观点的文献。除了原先的俄国朋友和通讯员拉甫罗夫、洛帕廷、丹尼尔逊之外，马克思又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列·尼·加特曼、尼·亚·莫罗佐夫、维·伊·查苏利奇。马克思和拉甫罗夫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关系。拉甫罗夫总是非常真诚地尊重马克思和恩格斯，听取他们的意见，竭力考虑他们的劝告。他是马克思家里的常客，经常和马克思通信。但这并没有妨碍马克思和恩格斯清楚地看出他们的俄国朋友们世界观上的弱点和矛盾。

1880年和1881年马克思在家里曾接见民粹主义运动的参加者加特曼和莫罗佐夫。通过这两个人和拉甫罗夫，马克思同“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建立了直接的联系。他给俄国革命流亡者提供在德国的一些可靠地址，并敦促他在各国的战友全力帮助俄国的革命运动。他乐于答应俄国革命者的请求，例如，他曾支持俄国流亡者提出的在国外出版英文周报《虚无主义者》以争取西欧各国的社会舆论同情俄国革命运动的想法。但是报纸没能出版。

马克思很珍视同革命的俄国的代表的联系，他以自豪的心情把“民意党”执行委员会1880年11月6日（俄历10月25日）的信给朋友们的看。这封信以深切的敬意谈到了马克思在科学上的功绩、他对俄国革命活动的重视，还请求马克思帮助加特曼向西方

舆论界报道俄国开展的斗争的性质。为了表示同情民粹派，马克思很早以前就把附有本人签名的两张照片寄给了执行委员会委员（这两张照片不久就落入警察手中）。

俄国的革命者也越来越尊敬马克思。革命的民粹派对他的学说和活动特别感兴趣。他们之中许多人专心致志地阅读科学共产主义的著作。民粹主义运动中的无产阶级分子斯·哈尔士林、彼·阿列克谢也夫、安·卡尔品科特别倾心于这些著作。《资本论》在俄国革命的青年中间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许多民粹派不仅阅读《资本论》，而且还在小组里、在一些宣传性小册子（谢·米·
670 克拉夫钦斯基的《聪明人瑙莫夫娜的故事》，阿·尼·巴赫的《饥饿沙皇》）里引用它。“民意党”执行委员会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资本论》已成为“有教养者的手头必备的书籍”^①。俄国革命者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著作也非常熟悉。1881年3月“民意党”领导人之一尼·伊·基巴耳契奇被捕时，被搜出一本《共产党宣言》，这位杰出的革命家、学者、发明家早在1875年就开始翻译它了。

但是，民粹派难以掌握马克思的学说，因为他们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例如他们认为俄国社会的发展有其特殊性，认为资本主义是退步的、没落的——在这一点上比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观点倒退了，——把农民村社理想化，把全体农民看作是最革命的阶级。民粹派这些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的西方，而对俄国是不适用的。在民粹派政论家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中就贯穿了这类思想。1882年马克思得到了这本书。民粹派从表面上来领会马克思的理论，并力图把它同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杜林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俄文版第427页。

思想，同拉甫罗夫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时常机械地混在一起，拉甫罗夫也是坚持“批判的思维的个人”在历史上起决定性作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尽一切努力减轻俄国革命者在寻求正确的世界观和策略中所遭到的痛苦。他们反对巴枯宁主义和涅恰也夫主义的斗争，加速了克服无政府主义影响的过程，尽管巴枯宁的有些思想在很长的时间里还继续对民粹派起作用。1874—1875年，恩格斯在马克思的全力支持下，在《流亡者文献》一组文章里同拉甫罗夫和特卡乔夫这些民粹派著名思想家进行了论战，对揭露民粹派的思想错误起了巨大的作用。文章指出，拉甫罗夫企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这种观点是折衷主义的，是站不住脚的。文章还揭露了特卡乔夫的一些错误的观点：俄国的国家是超阶级的，在俄国容易进行革命变革，可以采取密谋手段。这些错误的唯心主义观点是民粹派世界观的本质特点，他们完全不了解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同一定的社会阶级的利益之间的联系。

671

以后马克思还不止一次地向民粹派指出他们观点的错误。但是随着俄国民粹派反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的激化，马克思认为，对他们的批评必须尽可能地采取比较友好和策略的形式。当时不宜公开谴责民粹派的思想体系的空想主义的原理，因为他们正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进行斗争。在这个时期民粹派组织的实践的革命活动比其运动的理论方面，重要得多。同时马克思不放过机会来阐明自己对俄国知识界所关心的一些尖锐问题的意见，指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同民粹派对问题的态度之间的区别。他还对歪曲他的学说的企图给予答复。

到了1877年底就有必要来进行这种批判了，当时资产阶级政论家在俄国报刊上对《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进行评论，因此民粹派权威的社会学家之一、后来是自由主义民粹派的思想家尼·

康·米海洛夫斯基在民主主义杂志《祖国纪事》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这篇文章回答了茹柯夫斯基这个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自由派报纸《欧洲通报》上对马克思的恶毒攻击。米海洛夫斯基捍卫“热血男儿”马克思，反驳自由派批评者，但是他是站在民粹派的立场上来进行这种“捍卫”的。他认为，《资本论》表明了作者的“罕见的逻辑力和学识渊博”。但是正因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严谨的、完整的，因而是有诱惑力的”，所以他预先警告说，在它的面前不能完全“把门敞开”^①。米海洛夫斯基毫无根据地否认在俄国存在着资本主义，因此否认《资本论》作者的结论适用于俄国。他与所有的民粹派一样，幻想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通过农民公社走向社会主义。

马克思一读完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马上就用法文写了给《祖国纪事》编辑部的信的草稿。这封信反对把《资本论》的思想庸俗化，反对把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变为一种“万能钥匙”，借以把各个
672 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降为一般的公式，而不去研究这种历史的具体过程。揭示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决不象米海洛夫斯基所理解的那样，认为社会发展注定处处按照一定的死板公式进行，而不取决于各个国家的特殊的历史条件。因此马克思坚决反对把他在原始积累这一章里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②。

为了正确回答俄国民粹派提出俄国可以不可以越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的问题，马克思建议他们要切合实际地看待国内正在发生的经济和社会过程。与民粹派的思想家和政论家相反，马克思本人已考虑到并建议他们考虑在俄国已经出现的“成为资本主

① 《祖国纪事》1877年第10期第322、3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义民族”的趋势。在给《祖国纪事》的信中他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①因此马克思认为俄国的社会经济发 展的资本主义道路是现实的。

马克思坚决反对，民粹派社会学把资本主义庸俗地解释为绝对的祸害。他强调指出，在世界历史上正是资本主义大生产为社会主义准备了物质前提。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他的文件中发现了这封给《祖国纪事》的信。他把书信的一份副本寄给查苏利奇，另一份交给洛帕廷，后者把马克思的信送到了俄国，在马克思的信还未发表之前（1886年在国外发表，1888年在俄国发表）该信的抄本已经在俄国到处传播了。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推测说，马克思之所以没有把信寄出，因为光是他的名字就会使“刊登他的这篇答辩文章的刊物的存在遭到危险”^②。从格列勃·乌斯宾斯基的评论中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信在俄国的进步人士中发生何等的影 响。乌斯宾斯基在《令人痛心的责备》一文中写道：“寥寥几行，写得象他的《资本论》那样，每一行都是千真万确的和公正的，——卡·马克思 673 从1861年起照亮了我们经济生活的全过程。”^③

马克思1881年初给查苏利奇的上述回信也证明，马克思同民粹派在公社和俄国的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存在着原则性的意见分歧。

查苏利奇写这封信给马克思的直接原因，是瓦·巴·沃龙佐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而引起的一场争论，作者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23页。

③ 《格·伊·乌斯宾斯基文集》1957年莫斯科版第9卷第166页。

文章里力图证明资本主义在俄国没有基础。查苏利奇、克拉夫钦斯基、斯蒂凡诺维奇、捷依奇以及他们的波兰朋友迪克施坦和瓦林斯基，在日内瓦讨论了这篇文章。一部分人同意作者的意见，其余多数人对他的论据提出异议。列·捷依奇回忆道，当时“我们要维拉·伊万诺夫娜在信中请求马克思解决这个问题”^①。查苏利奇在1881年2月16日就代表同志们向马克思提出来了。早在1880年12月莫罗佐夫就以“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要求马克思发表一本关于俄国公社的著作。应俄国朋友们的请求，马克思于1881年3月8日写信给查苏利奇，许多人通过收信人知道了该信的内容。例如，捷依奇就抄了一份，寄给普列汉诺夫。马克思在这封信里再次反对把他的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理论绝对化。至于俄国公社问题，马克思在信中写道：“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②

马克思强调公社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被利用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因此他坚决反对民粹派把农村公社理想化。与民粹派的观点相反，马克思认为，公社本身并不能成为俄国社会主义革新的泉源，相反地，俄国革命和各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的工人阶级对俄国革命的支持，必将为革新这个古旧的制度，为用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它创造条件。马克思要求，必须冷静地对待现存的公社，不要忽视那些使公社变成征税压榨的工具的情况，不要忽视那些促使公社瓦解的过程。关于公社的问题，他在一封复信草稿中写道，

674 由于国家的财政搜括而削弱的公社，“成了商人、地主、高利贷者剥削的对象。这种外来的压迫使得公社内部原来已经产生的各种利

① 《劳动解放社》（1924年）莫斯科版第1集第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9页。

益的斗争更加尖锐，并加速了公社内各种瓦解因素的发展”^①。

马克思认为，把在俄国保存公社说成是俄国农民的特殊的社会主义使命，是毫无根据的。他把公社看作是一切民族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所具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对一切公社的作用和它在俄国的作用问题的这种态度，贯穿了真正的历史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82年1月21日写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里，更明确地阐述了关于俄国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思想。在序言里他们对公社是否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形式的问题，作了他们认为当时“唯一可能的”答复。“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共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②

马克思通过对民粹派世界观的批判来帮助当时俄国革命运动的优秀分子重新审查自己的信念，以利于接受科学共产主义。

马克思满意地指出了俄国革命者在思想发展上的进步，特别是他们逐渐抛弃了无政府主义学说、政治上的冷淡主义，从“民意”转向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马克思认为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起初结成“土地和自由社”而后结成“民意党”的民粹派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以自觉而严格的纪律为基础的、集中的组织。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民意党”的创建，用恩格斯的话说，看成是在俄国建立了“具有前所未闻的自我牺牲精神和毅力”^③的革命党。马克思在同民意党人莫罗佐夫的谈话中说过，他觉得俄国革命者对沙皇制度的斗争“神奇得完全象幻想小说中所描写的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26页。

样”^①。马克思在1880年底收到的一份《工人、“民意党”党员的纲领》(主要起草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的页边上的批注表明,他是不赞同民意党人和其他民粹主义派别所抱的幻想,但对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持赞许的态度,例如俄罗斯帝国内各民族自决的要求^②。马克思完全支持“民意党”所提出的民主革命变革的口号,以及争取政治和公民自由的口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民意党人在1881年3月1日以后写给新沙皇的一封信提出政治改革要求的信的内容,给予肯定的评价。恩格斯于1883年秋天同洛帕廷的谈话里说明了马克思对这个文件的称赞,称赞它的坚定的,但心平气和、克制的口气^③。

民意党人主要是采用恐怖手段反对专制制度。“民意党”的革命恐怖,在相当程度上是对沙皇政权对革命者及其同情者的野蛮迫害和暴虐行为的报复。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意把个人的恐怖原则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他们只容许在特殊的情况下采用它。他们希望俄国革命者的恐怖行动将会激起人民对专制制度的不满。同时马克思坚信,俄国革命者自己会把恐怖手段看作是暂时的、迫不得已的手段。他在1881年4月11日给燕妮·龙格的信中写道,“民意党”执行委员会的策略“与莫斯特和其他一些孩子般的空谈家的幼稚做法截然不同,后者把刺杀帝王当作一种‘理论’和‘法宝’加以鼓吹”。他指出,“相反地,前者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象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④

①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53页。

②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1,编号4033。

③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54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3页。

列宁写道，少数的民意党人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最表同情的反响”^①。在这期间马克思阅读了彼·费·阿利索夫的小册子《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和米·彼·德拉哥马诺夫的小册子《俄国的残暴屠杀》。马克思怀着焦急的心情注视着对3月1日革命行动的参加者和组织者的审判。他赞扬热里雅鲍夫、彼洛夫斯卡娅和基巴耳契奇在法庭上的表现，认为他们是真正的英雄和革命家。“这真是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②

马克思对另一个民粹派组织——“土地平分社”的批评甚于对“民意党”的批评。他公正地看出，土地平分派的观点和策略受到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影响和巴枯宁派的关于放弃政治这一早已过时的教条的影响。马克思在书信中谈到了土地平分派的“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认为他们的主要错误是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民意党人认识到民主变革作为走向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阶段的必要性，与此相反，“土地平分社”的代表人物仍然认为，“俄国应当一个筋斗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③。

同时马克思竭力帮助俄国革命者克服他们之间的分歧，帮助他们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沙皇制度的斗争中团结起来。因此，当1880年马克思收到通过莫罗佐夫转交给他的邀请书，请求他为民意党人和土地平分派在国外共同出版的《俄国社会革命丛书》撰稿时，他同意了。他准备把自己的著作交给出版者出版，并答应为他们决定出版的著作专门写一篇序言。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3—9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453页。

《共产党宣言》新的俄文译本于 1882 年作为这部丛书出版了。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拉甫罗夫把他们在 1848 年 1 月为这一新的俄文版本所写的序言交给该版的译者——“土地平分社”的领导人之一格·瓦·普列汉诺夫。他们在这—光辉的文献里再一次强调指出了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及其伟大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在对俄国革命家的英勇行动记忆犹新的情况下写道：“……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队伍了。”^①

另外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是：俄文版《宣言》的发起人普列汉诺夫在这部著作和其他科学共产主义著作的影响下，开始相信只有马克思的学说才是引导俄国革命运动走上正确道路的指路明灯。1883 年普列汉诺夫和他的同志们创立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它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恩格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谈到了这件为俄国解放斗争开辟了新的前景的大事，他写道：“……我感到自豪的是，在俄国青年中有一派真诚接受了马克思的伟大的经济理论和历史理论，并坚决地同他们前辈的一切无政府主义的和带有一点斯拉夫主义的传统决裂。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②

重大的损失。病情恶化

1880 年夏天马克思夫人的健康急剧恶化，医生早就诊断她患肝病。10 月初马克思得到了更可怕的诊断结论。医生确诊燕妮患的是肝癌。马克思在 1881 年 6 月 6 日给长女的信中写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31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50 页。

你知道——她患的那种病无法可治，她的确愈来愈虚弱。”^①

1881年6月底马克思陪着有病的妻子去海滨的伊斯特勃恩，他们在那里住了一个月。为了满足燕妮看望外孙们的热烈愿望，他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和她一起去法国。海伦·德穆特陪伴他们旅行。

马克思和他的旅伴们于7月26日到达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龙格的一家住在那里。但是在8月中爱琳娜病重的消息传来了。马克思把妻子留给海伦照顾，急忙动身去伦敦。他发现小女儿的神经和身体处于极度衰弱的状态。由于他采取了紧急的措施，爱琳娜开始慢慢地恢复了健康。随后燕妮·马克思和海伦·德穆特也回到伦敦。

从1881年秋天起燕妮就愈来愈难以起床，直至完全卧床不起。这时马克思自己也患了重病。10月他患胸膜炎，并发支气管炎和肺炎。病情十分严重，以致医生担心他有生命危险。精神上的痛苦——意识到隔壁房内妻子的垂危——加重了他的病痛。直到10月底马克思才脱险，他能够呆在燕妮的病榻旁了。爱琳娜回忆说：“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早晨，他觉得自己健强得能够到母亲房间去了。他们在一起又都年轻起来，象一对共同进入生活的热恋中的青年男女，而不是彼此正向生命话别的一个被疾病摧毁了的老人和一个将死的老妇。”^②

1881年12月2日燕妮·马克思逝世。

678

最亲近的人的逝世给马克思以致命的打击。在12月5日安葬燕妮的时候，医生禁止他走出房间，他的身体还很虚弱，而且这个不幸对他刺激很大。许多党内同志的和亲友的吊唁信给了他支持。这些吊唁信“都充满了非常真诚的心情，非常深厚的同情，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86页。

②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38页。

是罕见的，而通常这只不过是奉行故事而已”，这使马克思很受感动。他给女儿写道，这是因为燕妮“一切都自然而真实，朴素而不做作”^①。

在艰难的日子里，恩格斯象往常一样总是和马克思在一起。他不仅负责料理丧事，而且认为自己有责任在报刊上阐述马克思夫人在工人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了他写的悼词，悼念这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的老战士队伍”中的代表。在《平等报》上发表了恩格斯在她的墓前的讲话。恩格斯在燕妮的墓前讲道：“……我们将不止一次地为再也听不到她的大胆而合理的意见（大胆而不吹嘘、合理而不失尊严的意见）而感到遗憾。”^②

1882年1月的头三个星期马克思和爱琳娜是在威特岛的文特诺尔度过的。他到那里去的目的是，希望海洋空气能够治好慢性支气管炎和厉害的咳嗽，而咳嗽又加重了他本已严重的失眠症。确实，马克思的健康状况稍有好转。他急切地盼望能重新坐下来工作。

返回伦敦后马克思又开始了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但是，为了不使伦敦的变化无常的春天气候影响他的健康，医生坚持让他到南方某一地方去，并建议他去阿尔及尔。

经过短时间的准备，2月上半月马克思已经到了法国，在阿尔让台的燕妮·龙格家里住了一个星期。在马赛逗留了两个星期后，他启程去阿尔及尔，20日抵达阿尔及尔，在途中他得了重感冒。这里使他很扫兴：严寒、狂风和暴雨代替了他所期望的风和日暖的天气。他在给长女的信中写道：“最近十年来，阿尔及尔从没有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3页。

这样糟糕的冬季。”^①结果支气管炎加重了。最倒霉的是他又得了胸膜炎。

无论是病情的加重，还是连绵不断的恶劣天气（偶尔有几天晴天），都不能阻碍马克思欣赏这块地区的优美风景，它使马克思回忆起神话《一千零一夜》。马克思从自己的住处“维多利亚旅馆”一连好几小时观赏阿尔及尔港湾的美景、临海岗峦起伏的山坡和隐没在绿荫中的座座别墅。远处雪峰高耸，群山壮丽。他给恩格斯写道：“再也没有比这里早晨八点钟的景致、空气、植物——欧洲和非洲奇妙的混合——更迷人的了。”^②只要身体好一些，马克思就去散步。他参观了闻名的阿尔及尔植物园，他很赞赏这个公园里的“非常美丽的……大林荫路”^③，棕榈林荫路，梧桐林荫路和木兰林荫路。

但是，阿尔及尔丰富多彩的天然景色没有挡住马克思的视线，他看到了这个法国殖民地生活中所特有的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从他同老共和主义者、被流放到阿尔及尔的政治犯费默法官的开诚布公的谈话中，从他亲身的观察中，他清楚地了解到土著居民的无权地位，殖民主义制度的残忍和严酷。

4月中胸膜炎的症状消失了，但支气管炎没有痊愈。特别糟糕的是，从沙漠刮来了南风，扬起了铺天盖地的灰尘。在折磨人的炎热到来之前，马克思遵照医生的意见决定离开阿尔及尔，到法国里符耶腊去。5月初他抵达蒙特卡罗。但是这一次马克思不走运。给他看病的当地医生发现他的胸膜炎复发了。马克思不得不在傀儡王国摩纳哥，在被赌场吸引到这里来的“上流社会的懒汉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283页。

② 同上书，第41页。

③ 同上书，第302页。

冒险家的这个巢穴里”^①治疗了几乎整整一个月。

6月3日马克思离开蒙特卡罗。肺病专家建议他到山区去做进一步的治疗。但是马克思决定到阿尔让台与燕妮和外孙们呆一些日子。在亲人身边他觉得身体好些了，这一次他在这里逗留了很长的时间，从6月8日到8月22日，他在离住处不远的恩吉安用硫矿泉水和吸入疗法进行治疗。后来他在劳拉·拉法格的陪同下到瑞士日内瓦湖去。马克思在斐维住了一个月，直到9月25日。在离开瑞士之前，他参观了日内瓦，并与自己的老朋友贝克尔会了面。会面使他们俩感到非常高兴。

680 9月28日马克思又到了阿尔让台。医生对他到瑞士旅行的结果感到满意，允许他返回英国，但是要求他在伦敦留居的时间不超过两三个星期。几乎整个10月份马克思都在梅特兰公园路自己的家里度过。他又埋头从事科学研究，研究原始社会史、俄国的土地关系和其他问题。随后马克思又到威特岛去。在那里他继续进行科学研究。

1883年1月初马克思在文特诺尔得到了他的大女儿燕妮病重的消息。这个消息使他的神经受了刺激，咳嗽的发作发展到危险的痉挛。1月12日爱琳娜给马克思带来了可怕的消息——燕妮已于前一天逝世了。失去了一个仅活到三十八岁的心爱的女儿，一个五个孩子的母亲，这对马克思的打击是太沉重了。他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拖着衰弱的身体又回到了伦敦。

1883年3月14日

疾病的袭击使悲痛的日子日益临近。马克思的支气管炎加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64页。

了，喉头炎使他在长时间内除了喝些牛奶，什么也不能吞咽。2月里，医生确诊是肺脓肿。病人眼看着消瘦下去了。爱琳娜·海伦·德穆特和恩格斯为了挽救他的生命尽了一切努力。亲人们不懈的努力几乎战胜了疾病。3月初病情稍有好转。3月9日家庭医生和朋友唐金很有把握地说，如果病人能够再支持两个月的话，就有痊愈的希望。

但是这个希望没有实现。3月14日下午两点半钟，每天都去探望自己的朋友的恩格斯看到全家都在掉泪。病人从早晨开始出血，接着体力就衰竭了。海伦上楼到他的房间时，看见马克思坐在安乐椅上处于半睡状态。她立刻又下楼来了，她请恩格斯到病人那儿去。翌日恩格斯在给左尔格的信中写道：“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①

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逝世的噩耗迅速传遍全世界。不仅欧 681
洲和美洲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的报刊，而且资产阶级报刊都刊登了这个消息。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承认马克思的精神力量。俄国自由派杂志《司法通报》称马克思为“杰出的人物”，“罕见的学者”。澳大利亚资产阶级报纸《新维也纳日报》在3月17日的一号上强调指出：“卡尔·马克思应该列为当代最重要和最杰出的人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59—460页。

但是,即使马克思逝世了,资产阶级报刊也不能稍微客观地评价他的作用,它们在称赞已故者的天才的词句掩盖下竭力贬低他的影响,曲解他的学说和活动,肆无忌惮地歪曲他的生平。在马克思的生前,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用仇视和诽谤迫害他,在他逝世后对他更大肆诽谤,甚至还诽谤他的拥护者。

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对马克思逝世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工人活动家和普通社会主义者怀着对工人阶级和全体被压迫人民的导师和领袖的爱戴心情,从各个国家和世界各地往伦敦寄发唁函,对他的逝世给全世界劳动者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深表悲痛。这些情感贯穿在各国工人报刊上的悼文中和追悼会上的讲演词里。他们表示坚信,马克思的伟大思想是永垂不朽的,他为之贡献毕生精力的事业是不可战胜的。

为不幸消息所震惊而致函恩格斯的有,无产阶级斗争的老战士们:住在美国的老宪章主义者哈尼,贝克尔,左尔格和罗赫纳。列斯纳给爱琳娜·马克思写道:“只要人类存在在地球上,他的名字和事业将永存。他的天才象太阳一样向全人类发出灿烂的光辉,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它。”^①

奥古斯特·倍倍尔和尤莉娅·倍倍尔,爱尔福特社会民主党组织,汉诺威社会民主党人从德国发来唁电。李卜克内西受党领导机关的委托到伦敦参加葬礼。法国工人党巴黎联合会发来唁电。⁶⁸² 法国工人党中央联合会举行了追悼会。霍赛·梅萨以西班牙社会党名义发来唁电。德·巴普以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名义向马克思的家属表示慰问。纽文胡斯以荷兰社会党人的名义写信给恩格斯表示慰问。从苏黎世寄来了社会主义斯拉夫同盟“斯拉夫”举行的追悼会上的决议,与会者建议筹集一笔以马克思命名的基金,以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3,编号151。

便帮助解放斗争中的受害者。

在伦敦举行了民主联盟盟员大会，悼念“全世界工人的伟大思想家和天才朋友”^①。在伦敦民主联盟梅里勒榜分部、细木工联合会和其他组织都举行了追悼会。美国社会主义者于3月19日在纽约举行了追悼大会。前国际活动家、美国工人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库诺把自己写的悼词内容告诉了恩格斯。

革命俄国的代表在悼念马克思时深表哀痛和崇敬。在拉甫罗夫写的俄国社会主义者的挽词中有这样一句话：“卡尔·马克思的逝世将使一切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和估价他对当代的影响的人感到悲痛。”^②恩格斯还收到由洛帕廷、普列汉诺夫和巴尔季娜署名的俄国社会主义流亡者协会从日内瓦寄来的电报。洛帕廷在1883年3月28日给爱琳娜的信中写道，他把马克思“当作朋友热爱，当作老师爱戴，当作父亲尊敬”^③。莫斯科彼得罗夫农学院学生，彼得堡工艺学院学生，敖德萨的高等院校学生和俄国高等女校学生，筹集购买花圈的钱款，并通过各种方式把钱转寄给恩格斯。先进的俄国活动家关心马克思著作的出版和传播。丹尼尔逊写信给爱琳娜·马克思，表示愿意把他所拥有的材料和书信交给马克思遗著未来的出版者支配。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和查苏利奇对1883年3月底至4月初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哥本哈根代表大会寄去贺词，希望建立专门基金，“以出版马克思全集**大众版**”^④。

各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代表对伟大思想家和革命家的逝世，发表了真挚的悼念之词。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比斯利在给爱琳娜·马克思的信中写道：“他是个真正杰出的人；虽然我不同意他的观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3，编号174。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和革命的俄国》俄文版第485页。

④ 《普列汉诺夫遗著》1940年俄文版第8卷第1分册（1883—1894年）第26页。

点,但我高度评价他的动机,并且非常尊重他。”^①柏林农学院学生
683 1883年3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中表示坚信,马克思的思想永垂
不朽,“十九世纪将以他的名字命名”^②。

工人运动活动家在马克思逝世后宣布,承认马克思在把社会主义变为科学的伟大事业中的丰功伟绩,承认他作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领袖的作用。杰维尔给恩格斯的信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为工人的解放,全人类的解放作的贡献比谁都大”^③。纽文胡斯在荷兰社会主义杂志1883年3月24日的《人人权利报》上发表的悼文中写道:“他是为社会主义奠定科学基础的人……”^④

在社会主义报刊上,在工人阶级讲演人的演说中,都极力强调马克思学说的国际主义性质。无产阶级阵营的代表指出,马克思的逝世对全世界劳动者,所有要求进步的人们,全世界的科学和文化,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恩格斯最透彻地表达了这个思想,对于马克思的逝世恩格斯说道:“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⑤

在这悲痛的日子里,支持着工人运动活动家的一个思想是:马克思的事业将由他的忠实的老战友恩格斯来继承。马克思的朋友和学生都知道,科学共产主义是这两位天才的思想家“以奇妙的方式互相取长补短”^⑥、共同创造的成果。还在马克思生病期间领导工人运动的重担就逐步落到恩格斯的肩上。根据马克思生前的遗言,恩格斯和爱琳娜·马克思是他的遗著处理人。

①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3,编号173。

② 同上,全宗1,目录3,编号147。

③ 同上,全宗1,目录5,编号4396。

④ 《德国工人运动史文集》1966年第4期第6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60页。

⑥ 约·菲·贝尔克1883年3月18日给恩格斯的信。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央党务档案,全宗1,目录5,编号4399。

3月17日马克思的葬仪在海格特公墓举行,这个公墓通常是安葬被官方社会和教会抛弃的人的地方。安葬仪式是简朴的,这是逝者的意愿,他反对豪华的葬仪。参加葬仪的有他的亲属,其中包括同时代表法国工人党的拉法格夫妇,以及龙格,还有早在共产主义者同盟时的马克思的战友:李卜克内西(在葬仪上发表了演说),列斯纳和罗赫纳。参加葬仪的还有两位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动物学家雷伊·朗凯斯特和化学家肖莱马。《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献了花圈。龙格宣读了收到的唁电。

在掘开的马克思墓穴边,在以前安葬他夫人的遗体的墓穴边,恩格斯庄严而热情地讲述了马克思的天才的科学发现的意义,他作为学者和革命战士的伟大形象。“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5—576页。

人 名 索 引

A

- 阿贝尔, 雅克·勒奈 (Hébert, Jacques-René 1757—1794)——84。
- 阿伯丁伯爵, 乔治·戈登 (Aberdeen, George Gordon, Earl of 1784—1860)——311, 312。
- 阿克雪里罗得, 巴维尔·波利索维奇 (Аксельрод, Павел Борисович 1850—1928)——632, 682。
- 阿雷蒂诺, 彼得罗 (Aretino, Pietro 1492—1556)——294。
- 阿里欧斯托, 洛多维科 (Ariosto, Lodovico 1474—1533)——294。
- 阿利索夫, 彼得·费多谢也维奇 (Алисов, Петр Федосеевич 生于 1840 年)——675。
- 阿列克谢也夫,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Алексеев,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9—1891)——669。
- 阿塞利奥, 马西莫·德 (Azeglio, Massimo d' 1798—1866)——294。
- 阿韦奈耳, 若尔日 (Avenel, Georges 1828—1876)——626。
- 埃德, 艾米尔·德吉烈·弗朗斯瓦 (Eudes, Émil-Désiré-François 1843—1888)——524。
- 埃尔哈特, 约翰·路德维希·阿尔伯特 (Erhardt, Johann Ludwig Albert 约生于 1820 年)——275。
- 埃尔斯纳, 卡尔·弗里德里希·摩里茨 (Elsner, Karl Friedrich Moritz 1809—1894)——308。
- 埃卡留斯, 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221, 238, 241, 258, 260, 298, 300, 303, 401, 468, 469, 484, 487, 498—501, 504, 515, 534, 564。
- 埃塞尔 (Esser)——40。
- 埃塞尔, 克利斯提安·约瑟夫 (Esser, Christian Joseph 约生于 1809 年)——221。
- 埃斯库罗斯 (Aischylos 公元前 525—456)——285。
- 爱尔维修, 克劳德·阿德里安 (Helvétius, Claude-Adrien 1715—1771)——67。
- 艾德门兹, 托马斯·娄 (Edmonds, Thomas Rowe 1803—1889)——92。
- 艾伦, 格兰特 (Allen, Grant 1848—1899)——618。
- 艾威林, 爱德华 (Aveling, Edward 1851—1898)——589。
- 艾韦贝克, 奥古斯特·海耳曼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52, 63, 79, 114, 117, 222。
- 艾希霍夫, 弗雷德里克·古斯塔夫 (Eichhoff, Frédéric-Gustave 1799—1875)——297。
- 艾希霍夫, 卡尔·威廉 (Eichhoff, Karl Wilhelm 1833—1895)——508, 594。

安贝尔, 雅克 (Imbert, Jacques 1793—1851)——150。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194, 196, 224。

安年柯夫, 巴维尔·瓦西里也维奇 (Анненков, Паве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12—1887)——108, 113, 117, 123。

安斯, 欧仁 (Hins, Eugène 1839—1923)——515。

奥艾尔, 伊格纳茨 (Auer, Ignaz 1846—1907)——603。

奥艾尔巴赫, 倍尔托特 (Auerbach, Berthold 1812—1882)——15。

奥本海姆, 达哥贝尔特 (Oppenheim, Dagobert 1809—1889)——31。

奥本海姆, 麦克斯 (Oppenheim, Max)——583。

奥勃诺尔斯基, 维克多·巴甫洛维奇 (Обносский, Виктор Павлович 1852—1919)——630。

奥尔斯瓦特, 鲁道夫 (Auerswald, Rudolf 1795—1866)——194, 200。

奥康瑞尔, 菲格斯 (O'Connor, Feargus 1794—1855)——115, 252。

奥斯皮塔利埃, 爱德华 (Hospitalier, Edouard)——618。

奥托, 卡尔·乌尼巴德 (Otto, Karl Wunibald 约生于1809年)——275。

奥哲尔, 乔治 (Odger, George 1820—1877)——477, 497, 516, 550。

B

巴贝夫, 格拉古 (Babeuf, Gracchus 1760—1797) (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 François-Noël)——51, 52, 78, 84。

巴尔季娜, 索菲娅·伊拉里昂诺夫娜 (Бардина, Софья Илларионовна 1853—1883)——682。

巴尔田涅夫, 维克多·伊万诺维奇 (Бар-тенев, Виктор Иванович 生于1838年) (假名阿列克谢也夫, 涅托夫 Алексеев, Нетов)——521。

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 (Balzac, Honoré de 1799—1850)——235, 348, 372。

巴赫, 阿列克塞·尼古拉也维奇 (Бах, 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7—1946)——670。

巴霍芬, 约翰·雅科布 (Bachofen, Johann Jakob 1815—1887)——623。

巴克斯, 厄内斯特·贝尔福特 (Bax, Ernest Belfort 1854—1926)——653。

巴枯宁,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Бакунин, 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14—1876)——41, 52, 54, 63, 65, 76, 156, 198, 227, 329, 475, 503, 510—515, 517, 519, 521—523, 556, 560, 571, 576, 591—592, 670。

巴里, 马耳特曼 (Barry, Maltman 1842—1909)——568。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 (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417。

白恩士 (又译: 彭斯, 阴斯), 罗伯特 (Burns, Robert 1759—1796)——285。

白尔尼, 卡尔·路德维希 (Börne, Karl Ludwig 1786—1837)——44。

白拉克, 威廉 (Bracke, Wilhelm 1842—1880)——507, 509, 531, 594, 595, 602—604, 611, 634, 637—639。

白朗特, 埃米莉 (Brontë, Emily 1819—1848)——586。

白朗特, 夏绿蒂 (Brontë, Charlotte 1816—1855) (笔名柯勒·贝尔 Currer Bell)——372, 586。

班迪亚, 亚诺什 (Bangya, János 1817—1868)——270。

班纳, 罗伯特 (Banner, Robert)——651。

邦霍尔斯特, 莱昂哈德·冯 (Bonhorst, Leonhard von 生于1840年)——507。
邦纳罗蒂, 菲力浦 (Buonarroti, Filippo 1761—1837)——78, 84。
鲍狄埃, 欧仁 (Pottier, Eugène 1816—1887)——587。
鲍洛施, 阿路伊斯 (Borrosch, Alois 1797—1869)——199。
鲍威尔, 埃德加尔 (Bauer, Edgar 1820—1886)——13, 22, 29, 46, 66—68。
鲍威尔, 布鲁诺 (Bauer, Bruno 1809—1882)——13—14, 20, 22, 41, 66—68, 75, 95—97。
鲍威尔, 亨利希 (Bauer, Heinrich)——90, 114, 131, 152, 170, 171, 221, 239, 249, 258。
贝尔蒂埃, 路易·亚历山大 (Berthier, Louis-Alexandre 1753—1815)——307。
贝尔姆巴赫, 阿道夫 (Bermbach, Adolph 1822—1875)——273。
贝尔纳, 西蒙·弗朗斯瓦 (Bernard, Simon-François 1817—1862)——382。
贝尔纳多特, 让·巴蒂斯特·茹尔 (Bernadotte, Jean-Baptiste-Jules 1763—1844)——307。
贝尔奈斯, 卡尔·路德维希 (Bernays, Karl Ludwig 1815—1879)——40, 41, 52, 63, 75, 79。
贝尔尼埃, 弗朗斯瓦 (Bernier, François 1625—1688)——296。
贝克尔, 海尔曼·亨利希 (Becker, Hermann Heinrich 1820—1885) (“红色贝克尔” der “rote Becker”)——201—202, 224, 231, 271, 275, 280, 299。
贝克尔, 约翰·菲力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363, 409, 487, 489, 492, 499—500, 510, 519, 520, 556, 558, 568, 577, 594, 632, 636, 679, 681。
贝克曼, 约翰 (Beckmann, John 1739—1811)——289。
贝朗热, 比埃尔·让 (Beranger, Pierre-Jean 1780—1857)——587。
贝西埃尔, 让·巴蒂斯特 (Bessières, Jean-Baptiste 1768—1813)——307。
倍倍尔, 奥古斯特 (Bebel, August 1840—1913)——488, 489, 506—509, 530—531, 540, 541, 558, 567, 594, 599, 600, 602, 603, 611, 635, 637—641, 681。
倍倍尔, 尤莉娅 (Bebel, Julie 1843—1910)——681。
倍恩, 托马斯 (Paine, Thomas 1737—1809)——5。
比尼亚米, 恩利科 (Bignami, Enrico 1846—1921)——559, 594。
比斯康普, 埃拉尔德 (Biskamp, Elard)——364—365。
比斯利, 爱德华·斯宾塞 (Beesly, Edward Spencer 1831—1915)——535, 682—683。
彼得一世 (Пётр I 1672—1725)——334。
彼洛夫斯卡娅, 索菲娅·李沃夫娜 (Перовская, Софья Львовна 1853—1881)——676。
俾斯麦, 奥托 (Bismarck, Otto 1815—1898)——141, 371, 375, 396, 405, 481—482, 484, 489—490, 506, 528, 531—532, 539—540, 585, 599, 600, 633—636, 640, 644。
毕尔格尔斯, 亨利希 (Bürgers, Heinrich 1820—1878)——52, 63, 76, 86, 135,

140, 145, 181, 183, 201, 202, 271, 275, 299。

毕舍, 菲利浦·约瑟夫·本杰明 (Buche, Philippe-Joseph-Benjamin 1796—1865) ——50, 403。

毕希纳, 路德维希 (Büchner, Ludwig 1824—1899) ——377, 421。

毕歇尔, 卡尔 (Bücher, Karl 1847—1930) ——625。

别利亚耶夫, 伊万·德米特里也维奇 (Беляев, Иван Дмитриевич 1810—1873) ——621。

别林斯基, 维萨里昂·格里哥里也维奇 (Белинский, В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1—1848) ——47, 112。

波尔恩, 斯蒂凡 (Born, Stephan 1824—1898) (真名西蒙·布特米尔希 Simon Buttermilch) ——88, 176—179, 222, 227。

波尔特, 弗里德里希 (Bolte, Friedrich) ——563, 575, 594。

波克罕, 西吉兹蒙特·路德维希 (Borkheim, Sigismund Ludwig 1825—1885) ——520。

波利亚科夫,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 (Поляков, 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1841左右—1905) ——418。

波拿巴, 路易——见拿破仑第三。

波旁王朝——111, 367, 368。

波佩, 约翰·亨利希·摩里茨·冯 (Poppe, Johann Heinrich Moritz von 1776—1854) ——289。

波特金, 瓦西里·彼得罗维奇 (Боткин, Василий Петрович 1811—1869) ——54。

玻利瓦尔-伊-庞特, 西蒙 (Bolívar y Ponte, Simon 1783—1830) ——307, 322。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 ——206。

勃朗, 路易 (Blanc, Louis 1811—1882) ——40, 50, 52, 151, 178—179, 244—245, 269—270, 403。

勃鲁姆, 罗伯特 (Blum, Robert 1807—1848) ——205, 307。

伯恩施太德, 阿达尔贝特 (Bornstedt, Adalbert 1808—1851) ——62, 140—141, 172, 397。

伯恩施太因, 亨利希 (Börnstein, Heinrich 1805—1892) ——62, 63。

伯恩斯坦, 爱德华 (Bernstein, Eduard 1850—1932) ——602, 611, 637, 638, 640。

博勃钦斯基, 康斯坦蒂 (Bobczyński, Konstanty 生于1817年) ——490。

博德莱尔, 沙尔 (Baudelaire, Charles 1821—1867) ——587。

博尔夏特, 弗里德里希 (Borchardt, Friedrich) ——202。

博吉希奇, 巴尔塔扎尔 (Bogišić, Baltazar 1834—1908) ——621。

博纳德子爵, 路易·加布里埃尔·昂布鲁瓦兹 (Bonald, Louis-Gabriel-Ambroise, vicomte de 1754—1840) ——25。

博塔, 卡洛·朱泽培·古利埃尔莫 (Botta, Carlo Giuseppe Guglielmo 1766—1837) ——627。

博雅多, 马提奥·马利阿 (Boiardo, Matteo Maria 1434—1494) ——294。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von 1817—1899) ——205。

不伦瑞克公爵, 卡尔-威廉-斐迪南 (Braunschwei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Herzog von 1735—1806)

—8。

布阿吉尔贝尔, 比埃尔 (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 —55, 613。

布恩, 马丁·詹姆斯 (Boon, Martin James) —562。

布尔韦尔-利顿, 爱德华·乔治·利顿 (Bulwer-Lytton, Edward George Lytton 1803—1873) —586。

布格哈特 (Burghard, J. E.) —159。

布拉戈耶夫, 季米特尔 (Благоев, Димитр 1856—1924) —160。

布莱特, 约翰 (Bright, John 1811—1889) —312。

布朗基, 路易·奥古斯特 (Blanqui, Louis-Auguste 1805—1881) —51, 250—251, 269, 315, 382—383, 401, 407, 523, 524。

布雷, 约翰·弗兰西斯 (Bray, John Francis 1809—1895) —92, 126。

布里昂, 路易·安都昂·福韦戴·德 (Bourrienne, Louis-Antoine Fauvelet de 1769—1834) —307。

布里索, 雅克·让·比埃尔 (Brissot, Jacques-Jean-Pierre 1754—1793) —121。

布鲁诺, 乔尔丹诺 (Bruno, Giordano 1548—1600) —294。

布鲁斯, 保尔 (Brousse, Paul 1844—1912) —647。

布洛斯, 威廉 (Blos, Wilhelm 1849—1927) —584, 594, 611, 635—636。

布律恩, 吉约姆·玛丽·安 (Brune, Guillaume-Marie-Anne 1763—1815) —307。

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 米哈伊尔·瓦西里也维奇 (Буташиевич-Петрашевский, 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821—1866) —112。

C

策德利茨-诺伊基尔希, 康斯坦丁 (Zedlitz-Neukirch, Konstantin 生于 1813 年) —381, 382。

查尔托雷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Czartoryski, Wladyslaw 1828—1894) —395。

查理大帝 (Charlemagne 742 左右—814) —333。

查苏利奇, 维拉·伊万诺夫娜 (Засулич, Вера Ивановна 1851—1919) —615, 622, 669, 672, 673, 677, 682。

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利洛维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1828—1889) —418, 419, 425, 520—522, 576, 615, 642, 662—663, 665, 668, 670。

成吉思汗 (1162—1227) —333。

茨魏费尔 (Zweiffel) —195, 210, 216。

D

达尔文, 查理·罗伯特 (Darwin, Charles Robert 1809—1882) —358—361, 587, 623。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Périgord, Charles-Maurice 1754—1838) —324。

达兰贝尔, 让·巴蒂斯特·勒龙德 (D'Alembert, Jean-Baptiste Le Rond 1717—1783) —620。

大仲马, 亚历山大 (Dumas père, Alexandre 1803—1870) —285。

丹尼尔斯, 罗兰 (Daniels, Roland 1819—1855) —52, 86, 93, 132—133, 135, 271, 275, 298—299。

丹尼尔逊, 尼古拉·弗兰策维奇 (Даниельсон, Николай Францевич 1844

—1918) (笔名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он) —418—419, 422, 423, 425, 427, 576, 594, 615, 626, 632, 662, 663, 669, 682。

但丁·阿利格埃里 (Dante Alighieri 1265—1321) —264, 285, 294, 354。

道梅尔, 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Daur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 —255。

得比伯爵, 爱德华·乔治·杰弗里·史密斯·斯坦利 (Derby, Edward George Geoffrey Smith Stanley, Earl of 1799—1869) —312。

德·巴普, 塞扎尔 (De Paep, César 1842—1890) —423, 426, 480, 487, 499, 501—502, 517, 519, 533, 682。

德尔, 威廉 (Dell, William) —483。

德拉埃, 比埃尔·路易 (Delahaye, Pierre-Louis 生于 1820 年) —554—555。

德拉奥德, 律西安 (Delahodde 或 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 (假名杜普雷 Duprez) —254。

德拉哥马诺夫, 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 (Драгоманов, 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1841—1895) —664, 675。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 (矮子) —176, 181—183, 195, 201, 203, 220, 229, 230, 232, 249, 299。

德·梅斯特尔, 约瑟夫 (De Maistre, Joseph 1753—1821) —25。

德米特里耶娃 (托马诺夫斯卡娅), 伊丽莎白·鲁基尼奇娜 (Дмитриева (То-мановская), Елизавета Лукинична 1861—1909 以后) —521—522, 539, 588。

德漠克利特 (Democritus 约公元前 460—370) —16, 17。

德穆兰, 卡米耶 (Desmoulins, Camille 1760—1794) —54。

德穆特, 海伦 (琳荷, 尼姆) (Demuth, Helene (Lenchen, Nim) 1823—1890) —80, 96, 286, 379, 677, 680。

德纳, 查理·安德森 (Dana, Charles Anderson 1819—1897) —305—307。

德普勒, 马塞尔 (Deprez, Marcel 1843—1918) —618。

德萨米, 泰奥多尔 (Dézamy, Theodore 1803—1850) —51, 84。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 安都昂·路易·克劳德 (Destutt de Tracy, Antoine-Louis-Claude, comte de 1754—1836) —55。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D'Est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 —156, 198, 202, 205, 231。

狄慈根, 约瑟夫 (Dietzgen, Joseph 1828—1888) —454, 500, 568, 594, 611。

狄更斯, 查理 (Dickens, Charles 1812—1870) (笔名波兹 Boz) —372, 586。

迪克施坦, 希蒙 (Dickstein, Szymon 1859—1884) —673。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312。

笛卡儿, 勒奈 (Descartes, René 1596—1650) —619。

蒂尔索-德莫利纳 (Tirso de Molina 死于 1648 年) —554。

杜邦, 欧仁 (Dupont, Eugène 1831 左右—1881) —472, 479, 487, 490, 492, 495, 498, 501—502, 518, 524, 558, 562, 571, 594。

杜勃罗留波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Добролюб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6—1861) —520, 663, 665,

668。
杜康热, 沙尔·杜弗雷纳 (Du Cange, Charles Dufresne 1610—1688)——294。
杜林, 欧根·卡尔 (Dühring, Eugen Karl 1833—1921)——417, 610—613, 636, 670。
敦克尔, 弗兰茨 (Duncker, Franz 1822—1888)——352, 353。
多尔契诺 (Dolcino 死于 1307 年)——629。

E

厄尔文, 亨利 (Irving, Henry 1838—1905)——586。
恩格尔哈特, 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 (Энгельгардт,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1832—1893)——616, 618。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820—1895)——4, 6, 12, 23, 32, 38, 41, 44—46, 48—49, 54, 56, 63, 65—75, 78, 80—82, 84—92, 94—108, 110, 112—114, 116—120, 122—124, 131—136, 139—141, 143—146, 149—156, 158—169, 171—176, 178—179, 181—182, 184, 186, 190—191, 195—196, 201—203, 214, 216—223, 225—232, 234, 236—241, 246—249, 251—265, 267, 269—271, 273—275, 277—278, 280, 282, 286—287, 289—294, 296—300, 303—308, 313, 317, 322—330, 332, 334, 338—339, 342—343, 353, 357—360, 363—364, 366, 368—375, 377—383, 386—389, 391, 393—398, 400—407, 410—411, 413—417, 420, 422, 424—429, 445, 450, 454, 457—459, 468—472, 478, 480—482, 484, 486—492, 496, 499—500, 503, 506, 508—510, 512, 515—516, 520,

524—525, 528, 530—532, 534—536, 543, 545, 548, 550—562, 566—567, 571, 573—578, 582—585, 590, 593—594, 596, 598—604, 610—613, 615—616, 618—620, 623—624, 627, 629, 631—632, 634, 636—646, 648—651, 654—656, 660, 664—670, 672, 674—684。

恩格斯, 弗里德里希 (Engels, Friedrich 1796—1860)——44—45。

F

法夫尔, 茹尔 (Favre, Jules 1809—1880)——535, 540, 542, 543, 550。
范德比尔特, 科尔奈利乌斯 (Vanderbilt, Cornelius 1794—1877)——616。
方塔纳, 朱泽培 (Fontana, Giuseppe)——469。
菲尔, 约翰 (Phear, John 1825—1905)——621。
菲尔丁, 亨利 (Fielding, Henry 1707—1754)——285。
菲利浦斯, 安东尼达 (南尼达) (Philips, Antoinette (Nannette) 1837 左右—1885)——381, 485。
菲利浦斯, 莱昂 (Philips, Lion 1794—1866)——380, 485。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13, 18—20, 34—36, 39—42, 45, 51, 58, 60—62, 66, 73, 82—83, 95—96, 99, 104, 107, 118, 417, 422。
费雷, 泰奥菲尔·沙尔 (Ferré, Théophile-Charles 1845—1871)——524。
费默 (Fermé)——679。
费舍, 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 (Vischer, Friedrich Theodor 1807—1887)——293。

费希特, 约翰·哥特利布(Fichte, Johann

Gottlieb 1762—1814)——11。

封丹, 莱昂(Fontaine, Léon)——480。

福尔马尔, 格奥尔格·亨利希(Vollmar,
Georg Heinrich 1850—1922)——639,
640。

福格勒(Vogler, C.G.)——125。

福格特, 奥古斯特(Vogt, August 约 1830
—1883)——518。

福格特, 卡尔(Vogt, Karl 1817—1895)
——375—378, 410。

福克斯, 彼得(Fox, Peter 死于 1869 年)
(真名彼得·福克斯·安德列 Peter
Fox André)——483, 497。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Voltaire,
François-Marie 1694—1778)(真姓阿
鲁埃 Arouet)——5, 15, 586。

符卢勃列夫斯基, 瓦列里(Wróblewski,
Walery 1836—1908)——543, 565,
568, 571, 594。

弗莱里格拉特, 斐迪南(Freiligrath,
Ferdinand 1810—1876)——87, 145,
183, 203, 220, 229—230, 233, 238, 273,
285, 364, 374, 376。

弗莱塔格, 古斯塔夫(Freytag, Gustav
1816—1895)——380。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200。

弗兰克(Frank, A.)——125。

弗兰克尔, 列奥(Frankel, Leo 1844—
1896)——160, 523, 539, 540, 565, 568,
594, 596, 630。

弗里布尔, 厄内斯特·爱德华(Fribourg,
Ernest Edouard)——478, 479, 484,
487, 595。

弗里茨舍, 弗里德里希·威廉(Fritzsche,
Friedrich Wilhelm 1825—1905)——

639。

弗里德兰德, 麦克斯(Friedländer, Max
1829—1872)——386, 388。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Wil-
helm III 1770—1840)——6。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Wil-
helm IV 1795—1861)——20, 21, 31,
75, 76, 111, 200, 206, 227。

弗列罗夫斯基, 恩·(Флеровский, Н.
1829—1918)(瓦西里·瓦西里也维
奇·别尔维 Васи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Берви 的笔名)——424—425, 521—
522。

弗伦克尔(Fränkell)——258。

弗洛孔, 斐迪南(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170。

弗吕贝尔, 尤利乌斯(Fröbel, Julius 1805
—1893)——39, 68, 145, 198。

弗略里, 查理(Fleury, Charles 生于 1824
年)(真名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
特·克劳泽 Carl Friedrich August
Krause)——272。

傅立叶, 沙尔(Fourier, Charles 1772—
—1837)——4, 50, 79, 84, 85, 167。

G

盖布, 奥古斯特(Geib, August 1842—
1879)——583, 594, 603。

盖得, 茹尔(Guesde, Jules 1845—1922)
(真名巴集耳, 马蒂约 Basile, Ma-
thieu)——642—646, 648—649。

盖里埃·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Ге-
рье, 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1837—
1919)——621。

甘斯, 爱德华(Gans, Eduard 1798 左右
—1839)——10。

哥尔布诺娃-卡布鲁柯娃, 敏娜·卡尔洛
夫娜(Горбунова-Каблуккова, Минна

Карловна 1840—1931)——615。
 哥特沙克, 安得列阿斯 (Gottschalk, Andreas 1815—1849)——177—179, 194, 196, 203, 215, 222。
 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146, 285, 372, 586。
 戈洛文, 伊万·加甫利洛维奇 (Головин, Иван Гаврилович 1816—1886)——329。
 格拉古 (凯尤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Ca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53—121)——587。
 格拉古 (提比利乌斯·赛姆普罗尼乌斯·格拉古) (Tiberius Sempronius Gracchus 公元前 163—133)——587。
 格拉泽·德·维尔布罗尔 (Glaser de Willebrord, E.)——594。
 格莱夫 (Greiff)——272。
 格莱斯顿, 威廉·尤尔特 (Gladstone, William Ewart 1809—1898)——312, 516—517, 534 542。
 格里利, 霍拉斯 (Greeley, Horace 1811—1872)——305。
 格林, 威廉 (Grimm, Wilhelm 1786—1859)——285。
 格林, 雅科布 (Grimm, Jacob 1785—1863)——285。
 格林, 约翰·理查 (Green, John Richard 1837—1883)——621, 627。
 格林卡,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 (Глинка, 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1804—1857)——664。
 格罗特, 乔治 (Grote, George 1794—1871)——624。
 格律恩, 卡尔 (Grün, Karl 1817—1887)——98, 108, 118, 120, 122, 647。
 格舍尔, 卡尔·弗里德里希 (Göschel,

Karl Friedrich 1784—1862)——13。
 格特雷克, 佩尔 (Görtrek, Per 1798—1876)——159。
 葛德文, 威廉 (Godwin, William 1756—1836)——84。
 古耳德, 杰伊 (Gould, Jay 1836—1892)——616。
 圭拉奇, 弗兰契斯科·多梅尼科 (Guerazzi, Francesco Domenico 1804—1873)——294。
 果戈里, 尼古拉·瓦西里也维奇 (Гоголь,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1809—1852)——664。

Н

哈布斯堡王朝——64, 191, 204, 236, 316, 327, 584, 598, 630。
 哈茨费尔特伯爵夫人, 索菲娅 (Hatzfeldt, Sophie, Gräfin von 1805—1881)——380, 382—383。
 哈尔士林, 斯切潘·尼古拉也维奇 (Халтурин, Степ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6—1882)——630, 669。
 哈克斯特豪森, 奥古斯特 (Haxthausen, August 1792—1866)——621。
 哈勒, 卡尔·路德维希 (Haller, Carl Ludwig 1768—1854)——25。
 哈尼, 玛丽 (Harney, Mary 死于 1853 年)——96。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90, 96, 154, 156, 159, 170, 193, 250—252, 616, 681。
 哈赛尔曼, 威廉 (Hasselmann, Wilhelm 生于 1844 年)——636, 640。
 哈特威耳, 罗伯特 (Hartwell, Robert 生于 1812 年)——483。
 海德门, 亨利·迈尔斯 (Hyndman, Henry Mayers 1842—1921)——

651—654。
海尔堡, 路易 (Heilberg, Louis 1818—1852)——113。
海尔维格, 格奥尔格 (Herwegh, Georg 1817—1875)——39, 41, 52, 53, 63, 79, 140, 172, 397。
海涅, 亨利希 (Heine, Heinrich 1797—1856)——15, 40, 41, 47, 52—53, 63, 75, 76, 79, 96, 264, 285。
海因岑, 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145—146, 148, 271。
汉森, 格奥尔格 (Hanssen, Georg 1809—1894)——621。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 David 1790—1864)——22, 194, 195, 200。
豪德 (Haude)——221。
豪威耳, 乔治 (Howell, George 1833—1910)——595。
荷马 (Homerus)——8, 285, 349。
赫德尔, 麦克斯 (Hödel, Max 1857—1878)——633, 636。
赫尔岑,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Герцен,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12—1870)——47, 54, 112, 329, 424, 519—520, 668。
赫拉克利特 (Herakleitos 约公元前540—480)——371。
赫普纳, 阿道夫 (Hepner, Adolf 1846—1923)——568, 570, 594, 599, 656。
赫斯, 莫泽斯 (Heß, Moses 1812—1875)——15, 22, 40, 41, 85, 95, 153, 222。
赫希伯格, 卡尔 (Höchberg, Karl 1853—1885) (笔名路德维希·李希特尔 Ludwig Richter)——637—640。
黑尔斯, 约翰 (Hales, John 生于1839年)——562, 564。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10—18, 20, 33—38, 44, 58, 61—62, 97, 99, 123, 125—127, 371, 445, 454—455, 457, 458, 460。
黑克尔 (Hecker)——195。
胡阿雷斯, 贝尼托·帕布洛 (Juárez, Benito Pablo 1806—1872)——387。
胡果, 古斯塔夫 (Hugo, Gustav 1764—1844)——25。
华盛顿, 乔治 (Washington, George 1732—1799)——392。
霍布斯, 托马斯 (Hobbes, Thomas 1588—1679)——67。
霍尔巴赫, 保尔·昂利 (Holbach, Paul Henry 1723—1789)——15。
霍夫曼, 恩斯特·泰奥多尔·亚马多 (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1776—1822)——285。
霍亨索伦王朝——187, 191, 315, 398—399, 528。

J

基巴耳契奇,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ибальчич,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3—1881)——670, 676。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uizot, François-Pierre-Guillaume 1787—1874)——55, 76, 161, 253—254。
吉尔, 乌尔利希·弗兰茨 (Kyll, Ulrich Franz)——203, 215, 219。
吉尔克, 尤利乌斯 (Gierke, Julius 死于1855年)——188。
吉约姆, 詹姆斯 (Guillaume, James 1844—1916)——569, 571, 597。
季别尔,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Зибер,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44—1888)——615。
季米特里·顿斯科伊 (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

1350—1389)——629。
 济贝耳, 卡尔 (Siebel, Karl 1836—1868)
 ——480。
 加布勒, 格奥尔格·安德烈亚斯 (Gabler,
 Georg Andreas 1786—1853) ——
 13。
 加尔, 路德维希 (Gall, Ludwig 1794—
 1863)——5。
 加里波第, 朱泽培 (Garibaldi, Giuseppe
 1807—1882)——367—368, 397, 503,
 587。
 加尼耳, 沙尔 (Ganih, Charles 1758—
 1836)——92。
 加斯克耳, 伊丽莎白 (Gaskell, Elisabeth
 1810—1865)——372。
 加特曼, 列甫·尼古拉也维奇 (Гартман,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1850—1908)——
 588, 669。
 杰维尔, 加布里埃尔 (Dewille, Gabriel
 1854—1940)——594, 642, 649, 683。
 捷依奇, 列甫·格里哥里也维奇 (Дейч,
 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55—1941)——
 673。
 金克尔, 哥特弗利德 (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271。

K

卡贝, 埃蒂耶纳 (Cabet, Etienne 1788—
 1856)——40, 50—52, 84。
 卡波尼, 吉诺 (Capponi, Gino 1792—
 1876)——625。
 卡布鲁柯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Каблук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9—1919)——615。
 卡德龙·德·拉·巴卡, 彼得罗 (Calderon
 de la Barca, Pedro 1600—1681)
 ——294, 554。
 卡德纳斯, 弗朗西斯科 (Cardenas, Fran-

cisco de 1816—1898)——621。
 卡尔顿, 威廉 (Carleton, William 1794
 ——1869)——626。
 卡尔品科, 安德烈 (Карпенко, Андрей)
 ——669。
 卡富尔, 卡米洛·本佐 (Cavour, Camillo
 Benso 1810—1861)——365, 368。
 卡拉姆津, 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
 (Карамзин, Никола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766—1826)——627。
 卡莱尔, 托马斯 (Carlyle, Thomas 1795
 ——1881)——93, 254。
 卡列也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арее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50—1931)——
 626。
 卡梅利纳, 泽菲兰 (Camélinat, Zéphirin
 1840—1932)——479。
 卡斯, 热尔曼 (Casse, Germain)——
 524。
 凯德, 杰克 (Cade, Jack 死于 1450年)
 ——629。
 凯腊特里伯爵, 艾米尔 (Kératry, Émile,
 comte de 1832—1905)——588。
 凯里, 亨利·查理 (Carey, Henry Charles
 1793—1879)——304, 423, 613。
 凯泽尔, 麦克斯 (Kayser, Max 1853—
 1888)——636, 640。
 康德, 伊曼努尔 (Kant, Immanuel 1724
 ——1804)——11。
 康姆, 弗里德里希 (Kamm, Friedrich 死
 于 1867 年)——304。
 康普, 阿尔勃莱希特 (Komp, Albrecht)
 ——304。
 康普豪森, 卢道夫 (Camphausen,
 Ludolf 1803—1890)——22, 194。
 考布, 卡尔 (Kaub, Karl)——472。
 考茨基, 卡尔 (Kautsky, Karl 1854—
 1938)——641—642。

考茨基, 敏娜 (Kautsky, Minna 1837—1912)——641。

考夫曼, 伊拉里昂·伊格纳切维奇 (Кауфман, Илларион Игнатьевич 1848—1916)——615。

考斯丘什科, 塔杰乌什 (Kościuszko, Tadeusz 1746—1817)——400。

柯舍列夫,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Кошеле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1806—1883)——621。

柯斯托马罗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Костомар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7—1885)——625。

柯瓦列夫斯基, 马克西姆·马克西莫维奇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Максим Максимович 1851—1916)——584, 621, 626。

科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627。

科本, 卡尔·弗里德里希 (Köppen, Karl Friedrich 1808—1863)——14—15, 22, 381。

科布顿,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312。

科布伦茨, 彼得·约瑟夫 (Coblenz, Peter Joseph 1808—1854)——28。

科尔夫, 海尔曼 (Korff, Hermann)——195, 216。

科尔文-克鲁科夫斯卡娅 (雅克拉尔), 安娜·瓦西里也夫娜 (Корвин-Круковская (Jaclard), Анна Васильевна 1843—1887)——521。

科兰, 让·吉约姆·塞扎尔·亚历山大·伊波利特 (Colins, Jean-Guillaume-César-Alexandre-Hippolyte 1783—1859)——658。

科勒特, 查理·多布森 (Collet, Charles Dobson 死于 1898 年)——330。

科明, 马里安 (Comyn, Marian)——586。

科斯策尔斯基, 弗拉基斯拉夫 (Kościelski, Władysław 1818—1895)——199。

科苏特, 拉约什 (路德维希) (Kossuth, Lajos (Ludwig) 1802—1894)——111, 314。

克拉夫钦斯基, 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 (Кравчинский,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1851—1895) (笔名斯捷普尼亚克 Степняк)——588, 670, 673。

克拉伦登伯爵, 乔治·威廉·弗雷德里克·维尔利斯 (Clarendon, George William Frederick Villiers, Earl of 1800—1870)——312。

克莱因, 卡尔·威廉 (Klein, Carl Wilhelm)——250。

克莱因, 约翰·雅科布 (Klein, Johann Jacob 1818—1896)——275, 382。

克劳特, 威廉 (Clouth, Wilhelm)——195。

克勒尔 (Köhler, J. E. M.)——240。

克里默, 威廉·兰德尔 (Cremer, William Randall 1838—1908)——469, 477, 478。

克利盖, 海尔曼 (Kriege, Hermann 1820—1850)——118—120。

克林格斯, 卡尔 (Klings, Karl 1825 左右—1874 以后)——594。

克鲁泡特金, 彼得·阿列克谢也维奇 (Кропоткин, Пе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1842—1921)——597。

克路斯, 阿道夫 (Cluß, Adolf 1820 左右—1889 以后)——175, 274, 276, 300, 303—304, 315。

克尼勒, 奥托 (Knille, Otto 1832—1898)——586。

刻卜勒, 约翰奈斯 (Kepler, Johannes

1571—1630)——485。
 孔博,阿马代·本杰明(Combault, Amadé Benjamin 约生于1838年)——523。
 孔德,奥古斯特(Comte, Auguste 1798—1857)——535。
 孔西得朗,维克多(Considérant, Victor 1808—1893)——27, 84。
 库伯,托马斯(Cooper, Thomas 1805—1892)——114。
 库恩,贝拉(Kun, Béla 1886—1939)——160。
 库尔曼,格奥尔格(Kuhlmann, Georg 生于1812年)——95, 98。
 库格曼,弗兰契斯卡(Kugelman, Franziska 1858—约1930)——584, 664。
 库格曼,盖尔特鲁黛(Kugelman, Gertrud 约生于1839年)——415, 584。
 库格曼,路德维希(Kugelman, Ludwig 1828—1902)——363, 404, 411, 414—415, 420, 421, 455, 492, 495, 500, 508, 517, 537—538, 545, 546, 568, 583, 584, 589。
 库诺,弗里德里希·泰奥多尔(Cuno, Friedrich Theodor 1847—1934)——559, 568, 573, 594, 682。
 魁奈,弗朗斯瓦(Quesnay, François 1694—1774)——437, 613。

L

拉伯克,约翰(Lubbock, John 1834—1913)——624, 625。
 拉德茨基,约瑟夫(Radetzky, Joseph 1766—1858)——169, 198, 226。
 拉登多夫,奥古斯特(Ladendorf, August)——499。
 拉法格,保尔(Lafargue, Paul 1842—1911)——283, 360, 425, 490, 500, 503,

514, 518, 523—524, 538, 558, 559, 561, 568, 570, 576, 580, 588, 589, 617, 620, 631, 643—646, 648—649, 664, 683。
 拉甫罗夫,彼得·拉甫罗维奇(Лавров, Петр Лаврович 1823—1900)——539, 588, 594, 596, 615, 654, 669, 670, 676, 682。
 拉格朗日,约瑟夫·路易(Lagrange, Joseph-Louis 1736—1813)——619, 620。
 拉梅耐,费里西德(Lamennais, Félicité 1782—1854)——40。
 拉普斯基,泰奥菲尔(Łapiński, Teofil 1827—1886)——396—397。
 拉萨尔,斐迪南(Lassalle, Ferdinand 1825—1864)——208, 233, 252, 308, 352, 368, 371—375, 378, 380—382, 385, 403—406, 480—481, 509, 600, 602, 605, 647, 652, 670。
 拉沙特尔,莫里斯(Lachâtre, Maurice 1814—1900)——421, 422。
 拉斯拜尔,弗朗斯瓦(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315。
 拉辛,让(Racine, Jean 1639—1699)——586。
 拉辛,斯切潘·季莫费也维奇(Разин, Степан Тимофеевич 死于1671年)——625。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威廉(Leibniz, Gottfried Wilhelm 1646—1716)——5, 8, 619, 620。
 莱蒙托夫,米哈伊尔·尤里也维奇(Лермонтов, Михаил Юрьевич 1814—1841)——664。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Lessing, Gotthold Ephraim 1729—1781)——5, 15。
 莱茵哈特,理查德(Reinhardt, Richard

1829—1898)——264。
赖德律-洛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Auguste 1807—1874)——151, 232, 270。
赖夫, 威廉·约瑟夫 (Reiff, Wilhelm Joseph 生于1824年)——221, 275。
兰克, 约翰 (Ranke, Johannes 1836—1916)——618。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 (Lange, Friedrich Albert 1828—1875)——647。
朗凯斯特, 爱得文·雷伊 (Lankester, Edwin Ray 1847—1929)——684。
劳埃德, 赛米尔·琼斯, 奥维尔斯顿男爵 (Lloyd, Samuel Jones, Baron of Overstone 1796—1883)——290。
勒尔斯, 维图斯 (Loers, Vitus 死于1862年)——7。
勒克莱克, 泰奥菲尔 (Leclerc, Teophile 生于1771年)——84。
勒鲁, 比埃 (Leroux, Pierre 1797—1871)——27, 50。
勒鲁瓦-博利厄, 阿纳托尔 (Leroy-Beaulieu, Anatole 1842—1912)——621。
勒·吕贝, 维克多 (Le Lubez, Victor-P. 约生于1834年)——469, 484。
勒瓦瑟尔, 勒奈 (Levasseur, René 1747—1834)——54。
勒维, 古斯塔夫 (Levy, Gustav)——299—300。
勒泽尔, 彼得·格尔哈德 (Röser, Peter Gerhard 1814—1865)——221, 246, 271, 275。
雷姆佩尔, 鲁道夫 (Rempel, Rudolph 1815—1868)——108。
黎塞留公爵, 阿尔芒·让·杜·普莱西 (Richelieu, Armand-Jean du Plessis, duc de 1585—1642)——404。

李比希, 尤斯图斯 (Liebig, Justus 1803—1873)——288, 412。
李卜克内西, 厄内斯蒂纳 (Liebknecht, Ernestine 死于1867年)——379, 413。
李卜克内西, 威廉 (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264, 275, 284, 286, 298, 302, 379, 406, 413, 480—482, 486, 488, 500, 506—509, 515, 530—531, 537, 540, 558, 567, 583, 589, 594, 595, 599—603, 611—612, 637—640, 666, 681, 683。
李嘉图, 大卫 (Ricardo, David 1772—1823)——55, 57, 92, 123, 128, 129, 289—292, 348, 355, 356, 417, 429, 444—445, 447—448, 613, 658。
李斯特, 弗里德里希 (List, Friedrich 1789—1846)——81, 613。
李希特, 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 (Richter, Johann Paul Friedrich 1763—1825) (笔名让·保尔 Jean Paul)——146。
里廷豪森, 摩里茨 (Rittinghausen, Moritz 1814—1890)——515。
利奥, 亨利希 (Leo, Heinrich 1799—1878)——25。
利奥十三世 (Leo XIII 1810—1903)——634。
利穆津, 沙尔 (Limousin, Charles-M.)——478, 487。
利沙加勒, 普罗斯佩·奥利维耶 (Lissagaray, Prosper Olivier 1838—1901)——595, 596。
列列韦尔, 约阿希姆 (Lelewel, Joachim 1786—1861)——88, 150, 158, 297。
列曼, 阿尔伯特 (Lehmann, Albert)——258, 259。
列宁,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Ленин,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1870—1924) ——
 40, 47, 65, 71, 73, 77, 80, 107, 119,
 125, 157, 160, 161, 178, 184—186,
 188, 190, 191, 214, 225, 234, 239,
 245, 246, 256, 262, 268, 279, 323,
 326, 332, 342, 343, 360—362, 375,
 386, 427, 439, 454—456, 461, 467, 475,
 493—494, 519, 521, 535, 538, 545,
 569, 579, 581—582, 591, 599, 603, 604,
 606—607, 612, 631, 637, 656, 664, 668,
 675。
 列斯凯, 卡尔·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
 (Leske, Carl Friedrich Julius 1821
 —1886) ——93—94。
 列斯纳, 弗里德里希 (Leßner, Friedrich
 1825—1910) ——154, 160, 205, 216,
 271, 275, 363, 401, 419, 472, 487, 498
 —501, 504, 510, 515, 558, 562, 681,
 684。
 林格斯 (Rings, L. W.) ——275。
 林肯, 阿伯拉罕 (Lincoln, Abraham 1809
 —1865) ——388, 390, 391—392, 478。
 柳巴文, 尼古拉·尼古拉也维奇 (Люба-
 вин, 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1845—
 1918) ——419。
 柳里克王朝 ——333。
 龙格, 埃德加尔 (Longuet, Edgar 1879—
 1950) ——589, 590。
 龙格, 昂利 (哈利) (Longuet, Henry
 (Harry) 1873—1883) ——589。
 龙格, 马赛尔 (Longuet, Marcel 1881—
 1949) ——589。
 龙格, 让·罗朗·弗雷德里克 (Longuet,
 Jean-Laurent-Frederick 1876—1938)
 (琼尼 Johnny) ——589。
 龙格, 沙尔 (Longuet, Charles 1839—
 1903) ——490, 503, 532, 565, 568, 573,
 588—589, 643, 647, 677, 683, 684。

龙格, 燕妮 (Longuet, Jenny 1882—1952)
 (美美 Mémé) ——590。
 娄, 罗伯特, 舍布鲁克子爵 (Lowe,
 Robert, Viscount Sherbrooke 1811
 —1892) ——584。
 卢, 雅克 (Roux, Jacques 1752—1794)
 ——84。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
 1880) ——13, 21—23, 29, 30, 32—35,
 39, 41, 47, 48—49, 53, 63—64, 68, 95,
 122, 145, 271, 329。
 卢克莱修 (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
 (Titus Lucretius Carus 约公元前 99
 —55) ——16—17。
 卢梭, 让·雅克 (Rousseau, Jean-Jacques
 1712—1778) ——5, 15, 37。
 鲁克拉夫特, 本杰明 (Lucraft, Benjamin
 1809—1897) ——497, 550。
 鲁滕堡, 阿道夫 (Rutenberg, Adolf 1808
 —1869) ——14, 22。
 鲁瓦, 约瑟夫 (Roy, Joseph) ——422。
 路易·菲力浦 (Louis-Philippe 1773—
 1850) ——168。
 路易十一 (Louis XI 1423—1483) ——
 628。
 路易十五 (Louis XV 1710—1774) ——
 483。
 罗班, 保尔 (Robin, Paul 1837—1912)
 ——517, 536。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
 re, Maximilien 1758—1794) ——54。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约生
 于 1824 年) ——298, 363, 472, 558,
 681, 684。
 罗杰斯, 詹姆斯·爱得文·撒罗耳德
 (Rogers, James Edwin Thorold
 1823—1890) ——414。
 罗伦佐, 安塞尔莫 (Lorenzo, Anselmo

1841—1915)——553—555。
 罗曼诺夫王朝——399。
 罗斯科,亨利·恩菲耳德(Roscoe, Henry
 Enfield 1833—1915)——618。
 罗素,约翰(Russell, John 1792—1878)
 ——312。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Rod-
 bertus-Jagetzow, Johann Karl 1805
 —1875)——617, 652。
 洛克,约翰(Locke, John 1632—1704)
 ——5, 67。
 洛克菲勒,约翰·戴维逊(Rockefeller,
 John Davison 1839—1937)——616。
 洛帕廷,格尔曼·亚历山大罗维奇(Ло-
 патин, Герма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5
 —1918)——418—420, 533, 556, 588,
 594, 669, 672, 675, 682。
 洛佩·德·维加,费利克斯(Lope de
 Vega, Félix 1562—1635)——554。
 吕凯特,弗里德里希(Rückert, Friedrich
 1788—1868)——285。
 吕宁,奥托(Lüning, Otto 1818—1868)
 ——118。

M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Mably, Gabriel
 1709—1785)——84。
 马耳霍耳,迈克尔·乔治(Mullhals,
 Michael George)——627。
 马尔柯维奇,斯维托扎尔(Маркович,
 Светозар 1846—1875)——521。
 马尔克海姆,贝尔塔(Markheim, Bertha
 约1832—1892)——412。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Malthus,
 Thomas Robert 1766—1834)——
 433, 605。
 马基雅弗利,尼古洛(Machiavelli, Nic-
 colò 1469—1527)——37, 294, 627。

马克思,埃德加尔(Marx, Edgar 1847—
 1855)(穆希 Musch)——80, 282, 285,
 287。
 马克思,艾米莉(Marx, Emilie 1822—
 1888)(夫姓康拉第 Conradi)——6。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Marx-Aveling,
 Eleanor 1855—1898)(杜西 Tussy)
 ——6, 53, 96, 284—286, 332, 379, 427,
 485, 558, 583, 585—589, 594, 627, 677
 —678, 680—683。
 马克思,弗兰契斯卡(Marx, Franziska
 1851—1852)——232。
 马克思,弗兰西斯·约瑟夫·彼得(Marx,
 Francis Joseph Peter 1816—1876)
 ——329。
 马克思,罕丽达(Marx, Henriette 1787
 —1863)(父姓普勒斯堡 Preßburg)
 ——5, 6, 380, 382。
 马克思,亨利希(Marx, Heinrich 1777—
 1838)——4—11, 40, 203。
 马克思,亨利希·格维多(Marx, Heinrich
 Guido 1849—1850)(小福克斯 Föx-
 chen)——281, 282。
 马克思,劳拉(Marx, Laura 1845—1911)
 (夫姓拉法格 Lafargue)——80, 96,
 284, 285, 360, 379, 425, 485, 487, 523,
 524, 558, 559, 568, 587—589, 679, 683。
 马克思,路易莎(Marx, Louise 1821—
 1893)(夫姓尤塔 Jutta)——6。
 马克思,索菲娅(Marx, Sophie 1816—
 约1897)(夫姓施马尔豪森 Schmal-
 hausen)——6。
 马克思,燕妮(Marx, Jenny 1814—1881)
 (父姓冯·威斯特华伦 von West-
 phalen)——8—10, 33—34, 40, 53,
 54, 76, 79, 80, 171, 233, 234, 238—
 239, 274, 281—285, 287, 298, 306, 307,
 378—379, 402, 404, 412—413, 416,

428, 557, 567, 585, 586, 589, 663, 677—678, 684。
 马克思, 燕妮 (Marx, Jenny 1844—1883) (夫姓龙格 Longuet) ——53, 54, 76, 284, 285, 379, 420, 485, 487, 517, 558, 587—590, 641, 675, 677—680。
 马利亚特, 弗雷德里克 (Marryat, Frederick 1792—1848) ——285。
 马隆, 贝努瓦 (Malon, Benoît 1841—1893) ——647。
 马萨尔, 艾米尔 (Massard, Émile) ——642。
 马特伊, 鲁道夫 (Matthäi, Rudolph) ——98。
 马雅可夫斯基,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 (Маяк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1893—1930) ——VIII。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314, 366—368, 469, 475, 490。
 迈斯纳, 奥托·卡尔 (Meißner, Otto Karl 1819—1902) ——413, 414, 420, 583。
 迈耶尔, 鲁道夫·海尔曼 (Meyer, Rudolph Hermann 1839—1899) ——616。
 迈耶尔, 齐格弗里特 (Meyer, Sigfrid 1840 左右—1872) ——423, 425, 518。
 迈耶尔, 尤利乌斯 (Meyer, Julius 死于 1867 年) ——108。
 迈耶尔, 尤利乌斯·洛塔尔 (Meyer, Julius Lothar 1830—1895) ——618。
 麦捷尔, 尤斯图斯 (Möser, Justus 1720—1794) ——37。
 麦克劳洛赫, 约翰·拉姆赛 (MacCulloch, John Ramsay 1789—1864) ——55, 92。
 麦克拉伦, 詹姆斯 (Maclaren, James)

——353。
 麦克劳林, 科林 (Maclaurin, Colin 1698—1746) ——619。
 麦克唐奈, 帕特里克 (MacDonnel, J. Patrick 1847—1906) ——594, 655—656。
 曼明格, 安东 (Memminger, Anton 1846—约 1924) ——82。
 曼托伊费尔, 奥托·泰奥多尔 (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 ——210, 218, 228, 381。
 毛勒, 格奥尔格·路德维希 (Maurer, Georg Ludwig 1790—1872) ——621。
 梅恩, 亨利·詹姆斯·萨姆纳 (Maine, Henry James Sumner 1822—1888) ——621, 624—625。
 梅利奈, 弗朗斯瓦 (Mellinet, François 1768—1852) ——150。
 梅林, 弗兰茨 (Mehring, Franz 1846—1919) ——XI, 282。
 梅洛斯拉夫斯基, 路德维克 (Microslawski, Ludwik 1814—1878) ——297。
 梅萨-伊-列奥姆帕特, 霍赛 (Mesa y Leompert, José 1840—1904) ——160, 559, 594, 630, 649, 681—682。
 梅特涅, 克雷门斯 (Metternich, Clemens 1773—1859) ——111, 161, 168。
 梅因, 爱德华 (Meyen, Eduard 1812—1870) ——30。
 蒙森, 泰奥多尔 (Mommsen, Theodor 1817—1903) ——624。
 孟德斯鸠, 沙尔 (Montesquieu, Charles 1689—1755) ——37。
 弥勒, 爱德华 (Müller, Eduard 1804—1875) ——293。
 弥勒, 雅科布 (Müller, Jakob 生于 1825 年) ——221。

米尔柏格, 阿尔都尔 (Mülberger, Arthur 1847—1907) —— 599。

米尔纳, 乔治 (Milner, George) —— 562。

米海洛夫斯基, 尼古拉·康斯坦丁诺维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1842—1904) —— 671—672。

米凯尔, 约翰 (Miquel, Johannes 1828—1901) —— 299。

米涅, 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 (Mignet, François-Auguste-Marie 1796—1884) —— 55。

摩根根, 路易斯·亨利 (Morgan, Lewis Henry 1818—1881) —— 623—625。

摩莱里 (Morelly 十八世纪) —— 84。

摩莱肖特, 雅科布 (Moleschott, Jakob 1822—1893) —— 377。

莫尔, 约瑟夫 (Moll, Joseph 1813—1849) —— 90, 114, 131—133, 152, 170, 171, 196, 198, 201—203, 221, 238。

莫拉, 弗朗西斯科 (Mora, Francisco 1842—1924) —— 559。

莫里哀, 让·巴蒂斯特 (Molière, Jean-Baptiste 1622—1673) (真姓波克兰 Poquelin) —— 586。

莫利斯, 威廉 (Morris, William 1834—1896) —— 654。

莫罗佐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 (Мороз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54—1946) —— 669, 673—674, 676。

莫斯特, 约翰 (Most, Johann 1846—1906) —— 594—595, 636, 640, 675。

莫伊勒, 格罗曼 (Maurer, German 1813—约1882) —— 52。

墨莱, 查理 (Murray, Charles) —— 562。

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 (Mill, John

Stuart 1806—1873) —— 92, 425, 499, 503。

穆勒, 詹姆斯 (Mill, James 1773—1836) —— 55, 92, 448, 465。

N

拿破仑第一 (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 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 —— 1, 2, 176, 213。

拿破仑第三 (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 —— 232, 264—268, 313, 314, 323, 336, 365—370, 375, 377—378, 387, 395, 396, 483, 487, 525, 528, 530, 532, 560, 634。

尼约基-维亚尼, 奥斯瓦多 (Gnocchi-Viani, Osvaldo 1837—1917) —— 593。

涅克拉索夫, 尼古拉·阿列克谢也维奇 (Некрасов,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1821—1878) —— 663。

涅恰也夫, 谢尔盖·格纳迪也维奇 (Нечаев, Сергей Геннадиевич 1847—1882) —— 556。

牛顿, 伊萨克 (Newton, Isaac 1642—1727) —— 8, 619, 620。

纽文胡斯, 斐迪南·多梅拉 (Nieuwenhuis, Ferdinand Domela 1846—1919) —— 630, 632, 682—683。

诺比林, 卡尔·爱德华 (Nobiling, Karl Eduard 1848—1878) —— 633, 635, 636。

诺布雷-弗朗萨, 若瑟 (Nobre-França, José) —— 559。

诺特荣克, 彼得 (Nothjung, Peter 1821—1866) —— 221, 271, 275。

诺通布, 让·巴蒂斯特 (Nothomb, Jean-Baptiste 1805—1881) —— 78。

O

- 欧勒, 列奥纳特 (Euler, Leonard 1707
1783) ——619, 620。
欧文, 罗伯特 (Owen, Robert 1771—
1858) ——4, 45, 84, 92, 167, 476, 613。

P

- 帕麦斯顿子爵, 亨利·约翰·坦普尔
(Palmerston, Henry John Temple,
Viscount 1784—1865) ——312, 324—
325, 331—332, 395, 396, 517。
培根, 弗兰西斯, 维鲁拉姆男爵 (Bacon,
Francis, Baron of Verulam 1561—
1626) ——67。
培列, 昂利 (Perret, Henri) ——556, 594。
配第, 威廉 (Petty, William 1623—
1687) ——446, 613。
皮阿, 费里克斯 (Pyat, Félix 1810—
1889) ——525。
皮奥, 路易 (Pio, Louis 1841—1894) ——
594。
皮佩尔, 威廉 (Pieper, Wilhelm 约生于
1826年) ——298, 300, 303。
皮特曼, 海尔曼 (Püttmann, Hermann
1811—1894) ——118。
珀歇, 雅克 (Peuchet, Jacques 1758—
1830) ——85。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Joseph 1809—1865) ——27,
40, 50, 52, 72—73, 84, 121—130, 167,
178—179, 262—263, 265, 357, 421,
424, 475, 478, 480—481, 487, 503, 645,
670。
普芬德, 卡尔 (Pfänder, Karl 1818—
1876) ——238, 239, 258, 298, 363, 472。
普列汉诺夫, 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
(Плеханов, Георгий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1856—1918) ——160, 673, 676, 682。

普卢塔克 (Plutarchos 约 46—125) ——
16。

普希金, 亚历山大·谢尔盖也维奇
(Пушкин,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1799—1837) ——372, 664。

Q

齐茨, 弗兰茨 (Zitz, Franz 1803—1877)
——204。

契切林, 波利斯·尼古拉也维奇 (Чичерин,
Борис Николаевич 1828—1904)
——621。

乔伊, 詹姆斯 (Joy, James 1853—1893)
——616。

乔治, 亨利 (George, Henry 1839—
1897) ——657—658。

乔治·桑 (George Sand 1804—1876)
(真名奥罗尔·杜班 Aurore Dupin)
——131。

切特姆, 汉弗莱 (Chetham, Humphrey)
——90。

切希, 亨利希·路德维希 (Tschech,
Heinrich Ludwig 1789—1844) ——
75。

琼斯 (Jones) ——90。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 ——90, 154,
155, 193, 250, 252, 300—303, 322,
382。

屈韦特尔, 弗里德里希 (Kühlwetter,
Friedrich 1809—1882) ——195—
196。

R

让·保尔——见李希特尔, 约翰·保尔·
弗里德里希。

热里雅鲍夫, 安德烈·伊万诺维奇

(желябов,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1851—1881)——675, 676。
 日果, 菲利浦·沙尔 (Gigot, Philippe Charles 1820—1860)——88, 113, 135, 171。
 荣克, 格奥尔格 (Jung, Georg 1814—1886)——79。
 荣克, 海尔曼 (Jung, Hermann 1830—1901)——472, 487, 490, 492, 498, 539。
 茹柯夫斯基, 尤利·加拉克提昂诺维奇 (Жукровский, Юлий Галактионович 1822—1907)——671。
 若昂纳尔, 茹尔 (Johannard, Jules 1843—1888)——523。
 若特兰, 律西安·列奥波特 (Jottrand, Lucien-Léopold 1804—1877)——149—150。

S

萨尔梯柯夫, 阿列克塞·德米特利也维奇 (Салтыков, Алекс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1806—1859)——296。
 萨尔梯柯夫-谢德林, 米哈伊尔·叶夫格拉弗维奇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ихаил Евграфович 1826—1889)——660, 663, 664。
 萨克雷, 威廉·梅克皮斯 (Thackeray, William Makepeace 1811—1863)——372, 586。
 萨维尼, 弗里德里希·卡尔 (Savigny, Friedrich Karl 1779—1861)——25。
 萨伊, 让·巴蒂斯特 (Say, Jean-Baptiste 1767—1832)——55, 289。
 萨宗诺夫,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 (Са-зонов, 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1815—1862)——54, 329。
 塞居尔, 菲利浦·保尔 (Ségur, Philippe-Paul 1780—1873)——333, 627。

赛拉叶, 奥古斯特 (Serrailier, Auguste 生于 1840 年)——533, 538, 539, 558, 571。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 (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146, 285, 294, 372。
 沙多勃利昂子爵, 弗朗斯瓦·勒奈 (Chateaubriand, François-René, vicomte de 1768—1848)——37。
 沙培尔, 冯 (Schaper, von)——23, 28, 29。
 沙佩尔, 卡尔 (Schapper, Karl 1812—1870)——90, 114, 120, 131, 152, 154, 170—172, 176, 196, 198, 201—203, 210, 215, 217, 220, 221, 224, 238, 257—260, 271, 272, 276—277, 299。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146, 285, 348, 372, 373, 586—587。
 舍夫琴柯, 塔拉斯·格里哥里也维奇 (Шевченко, Тарас Григорьевич 1814—1861)——664。
 申拜因, 克利斯提安·弗里德里希 (Schönbein, Christian Friedrich 1799—1868)——412。
 圣保罗, 威廉 (Saint-Paul, Wilhelm 1815 左右—1852)——30。
 圣茹斯特, 路易·安都昂 (Saint-Just, Louis-Antoine 1767—1794)——54。
 圣西门, 昂利 (Saint-Simon, Henri 1760—1825)——4, 9, 36, 50, 79, 81, 84, 167。
 施蒂纳, 麦克斯 (Stirner, Max 1806—1856) (卡斯帕尔·施米特 Caspar Schmidt 的笔名)——29, 95—97。
 施拉姆, 卡尔·奥古斯特 (Schramm, Karl August)——637, 638。
 施拉姆, 康拉德 (Schramm, Konrad

1822 左右—1858)——238, 258, 298—299。
 施莱登, 马蒂亚斯·雅科布 (Schleiden, Matthias Jakob 1804—1881)——678。
 施洛塞尔, 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 (Schlosser, Friedrich Christoph 1776—1861)——297, 627。
 施略费尔, 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löffel, Friedrich Wilhelm 1800—1870)——204。
 施梅林, 安东 (Schmerling, Anton 1805—1893)——386。
 施奈德尔第二, 卡尔 (Schneider II, Karl)——198, 201, 208, 210, 215—217, 219, 224, 274, 382。
 施塔耳, 弗里德里希·尤利乌斯 (Stahl, Friedrich Julius 1802—1861)——25。
 施泰因, 尤利乌斯 (Stein, Julius 1813—1889)——199。
 施泰因宁格尔, 约翰 (Steininger, Johann 1794—1874)——6。
 施特劳斯, 大卫·弗里德里希 (Strauß,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13—14, 19。
 施梯伯, 威廉 (Stieber, Wilhelm 1818—1882)——272, 274—275。
 施土姆普弗, 保尔 (Stumpf, Paul 1827 左右—1913)——499。
 施瓦策, 恩斯特 (Schwarzer, Ernst 1803—1860)——198。
 施韦希尔, 罗伯特 (Schweichel, Robert 1821—1907) (笔名罗祖斯 Rosus)——508。
 施韦泽, 约翰·巴普提斯特 (Schweitzer, Johann Baptist 1834—1875)——480—482, 490, 506—509。
 狮子亨利 (Heinrich der Löwe 1129—

1195)——628。
 叔尔茨, 卡尔 (Schurz, Karl 1829—1906)——197。
 舒尔采-德里奇, 海耳曼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 1808—1883)——252, 404, 488。
 司各脱, 瓦尔特 (Scott, Walter 1771—1832)——285。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ve, Gustav 1805—1870)——145, 271。
 斯巴达克 (Spartacus 死于公元前 71 年)——485。
 斯宾塞, 赫伯特 (Spencer, Herbert 1820—1903)——295。
 斯蒂凡诺维奇, 雅科夫·瓦西里也维奇 (Стефанович, Яков Васильевич 1854—1915)——673。
 斯卡尔培克, 弗雷德里克 (Skarbek, Frédéric 1792—1866)——55。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55, 57, 92, 123, 128, 289, 444—447。
 斯温顿, 约翰 (Swinton, John 1830—1901)——585—586, 658。
 苏格拉底 (Sokrates 约公元前 469—399)——585。
 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约公元前 497—406)——285。
 索柯洛夫斯基, 巴维尔·亚历山大罗维奇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42—1906)——621。

T

塔克尔 (Tucker)——331。
 塔西佗 (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塔西佗) (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 约 55—120)——264。
 泰勒, 布鲁克 (Taylor, Brook 1685—

1731)——619。

泰勒, 瓦特 (Tyler, Wat 死于 1381 年)
——629。

泰罗, 爱德华·伯纳特 (Tylor, Edward
Burnett 1832—1917)——624。

汤普逊, 威廉 (Thompson, William 1785
左右—1833)——92—93, 126。

唐金 (Donkin)——680。

特德斯科, 维克多 (Tedesco, Victor 1821
—1897)——88。

特卡乔夫, 彼得·尼基提奇 (Ткачев,
Петр Никитич 1844—1885)——
670。

特劳白, 摩里茨 (Traube, Moritz 1826—
1894)——618。

特里东, 埃德姆·玛丽·古斯塔夫 (Tri-
don, Edme-Marie-Gustave 1841—
1871)——523—524。

特鲁索夫, 安东·丹尼洛维奇 (Трусов,
Антон Данилович 1835—1886)——
521。

特吕布纳, 尼古劳斯 (Trübner, Nikolaus
1817—1884)——330。

忒伦底乌斯 (普卜利乌斯·忒伦底乌斯·
阿费尔) (Publius Terentius Afer 公
元前 185 左右—159)——146。

梯也尔, 阿道夫 (Thiers, Adolphe 1797
—1877)——536—537, 540, 543,
550。

梯叶里, 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
(Thierry, Jacques-Nicolas-Augustin
1795—1856)——55, 294—295。

屠格涅夫, 伊万·谢尔盖也维奇 (Тургенев,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1818—1883)
——664。

托伦, 昂利·路易 (Tolain, Henri-Louis
1828—1897)——478, 479, 484, 487,
499, 502, 550。

W

瓦茨, 约翰 (Watts, John 1818—1887)
——414。

瓦尔兰, 路易·欧仁 (Varlin, Louis-
Eugène 1839—1871)——479, 487,
523—524, 539。

瓦格纳, 阿道夫 (Wagner, Adolph 1835
—1917)——617—618。

瓦克斯穆特, 恩斯特·威廉·哥特利布
(Wachsmuth, Ernst Wilhelm Gott-
lieb 1784—1866)——37。

瓦劳, 卡尔 (Wallau, Karl 1823—1877)
——88, 171, 175, 176。

瓦林斯基, 路德维克 (Waryński, Ludwik
1856—1889)——630, 673。

瓦托, 路易 (Watteau, Louis 生于 1824
年) (笔名德农维耳 Denonville)——
382, 383。

瓦西里契柯夫, 亚历山大·伊拉里昂诺维
奇 (Васильчик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Иллари-
ононович 1818—1881)——621。

瓦扬, 爱德华·玛丽 (Vaillant, Edouard-
Marie 1840—1915)——554, 555。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371, 380, 633。

威斯特华伦, 埃德加尔·冯 (Westphalen,
Edgar von 1819—约 1890)——9, 80,
113。

威斯特华伦, 斐迪南·冯 (Westphalen,
Ferdinand von 1799—1876)——8—
9。

威斯特华伦, 卡罗琳·冯 (Westphalen,
Karoline von 1779—1856)——9,
33, 80, 281, 283。

威斯特华伦, 路德维希·冯 (Westphalen,
Ludwig von 1770—1842)——8—
10。

韦济尼埃,比埃尔(Vésinier, Pierre 1826—1902)——490。
 韦努伊埃,茹斯特(Vernouillet, Just)——594。
 韦斯顿,约翰(Weston, John)——469, 476。
 维迪尔,茹尔(Vidil, Jules)——251。
 维耳马尔,雷蒙(Wilmart, Raimond) (假名维耳莫 Wilmot)——631。
 维尔纽夫-巴尔热蒙,让·保尔·阿尔邦(Villeneuve-Bargemont, Jean-Paul-Alban 1784—1850)——93。
 维尔特,格奥尔夫(Weerth, Georg 1822—1856)——86—87, 140, 143, 150, 172, 176, 181, 182, 203, 229, 230, 232—233, 299。
 维干德,奥托(Wigand, Otto 1795—1870)——96, 97, 414。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231—232, 238, 239, 251, 257—260, 269, 271, 272, 276—277。
 维滕巴赫,约翰·胡果(Wyttenbach, Johann Hugo 1767—1848)——6。
 魏德迈,奥托(Weydemeyer, Otto)——655。
 魏德迈,路易莎(Weydemeyer, Louise)——379。
 魏德迈,约瑟夫(Weydemeyer, Joseph 1818—1866)——86, 94, 107, 108, 113—114, 120, 131, 135—136, 139, 233, 263—264, 269, 281, 302—304, 357, 363。
 魏尔,亚历山大(Weill, Alexandre 1811—1899)——63。
 魏勒尔,亚当(Weiler, Adam 死于1894年)——650—651。
 魏特林,威廉(Weitling, Wilhelm 1808

—1871)——52, 63, 90, 113, 115—120, 134, 197。
 沃尔弗,斐迪南(Wolf, Ferdinand 1812—1895) (红色沃尔弗 der rote Wolf)——113, 131, 140, 181, 183, 232。
 沃尔弗,鲁伊治(Wolff, Luigi)——469, 490。
 沃尔弗,威廉(Wolff, Wilhelm 1809—1864) (鲁普斯 Lupus)——87—88, 113—114, 133, 135, 140, 171, 176, 181—182, 189, 201—203, 219, 221, 224, 241, 273, 298, 364, 402, 416。
 沃龙佐夫,瓦西里·巴甫洛维奇(Воронцов, 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1847—1918)——670, 673。
 沃罗夫斯基,瓦茨拉夫·瓦茨拉沃维奇(Воровский, Вацлав Вацлавович 1871—1923)——160。
 乌尔卡尔特,戴维(Urquhart, David 1805—1877)——330—332。
 乌斯宾斯基,格列勃·伊万诺维奇(Успенский, 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1843—1902)——672—673。
 乌提舍诺维奇-奥斯特罗日钦斯基,奥格尼斯拉夫(Utješnović-Ostrožinski, Ognjeslav M. 生于1817年)——621。
 吴亭,尼古拉·伊萨柯维奇(Утин, Николай Исаакович 1845—1883)——520—523, 553, 556, 583。

X

希尔施,卡尔(Hirsch, Karl 1841—1900)——507, 594, 637, 642, 652。
 希尔施,威廉(Hirsch, Wilhelm)——272, 275。
 西蒙,路德维希(Simon, Ludwig 1810—

1872)——204—205。
 西姆桑, 马丁·爱德华·西吉兹蒙特 (Sim-
 son, Martin Eduard Sigismund
 1810—1899)——381。
 西尼耳, 纳索·威廉 (Senior, Nassau
 William 1790—1864)——92。
 西斯蒙第, 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 (Sismondi, Jean-Charles-Léonard
 Simonde de 1773—1842)——93,
 417。
 席勒, 弗里德里希 (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373。
 席利, 维克多 (Schily, Victor 1810—
 1875)——197, 479, 500。
 夏布里, 茹尔 (Chabry, Jules 1846—
 1893)——642。
 夏米索, 阿德尔贝特·冯 (Chamisso,
 Adelbert von 1781—1838)——285,
 587。
 肖, 罗伯特 (Shaw, Robert 死于 1869 年)
 ——477。
 肖莱马, 卡尔 (Schorlemmer, Carl 1834
 —1892) (肖利迈 Jollymeier)——618,
 684。
 谢尔诺-索洛维也维奇, 亚历山大·亚历
 山大罗维奇 (Серно-Соловье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1838—
 1869)——520—521。
 谢夫莱, 阿尔伯特·埃伯哈德·弗里德
 里希 (Schäffle, Albert Eberhard
 Friedrich 1831—1903)——617。
 谢林, 弗里德里希·威廉 (Schelling,
 Friedrich Wilhelm 1775—1854)
 ——40, 45。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彼得·彼得罗维
 奇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Петр
 Петрович 1827—1914)——621。
 谢努, 阿道夫 (Chenu, Adolphe 约生于

1817 年)——254。
 辛凯尔迪, 卡尔·路德维希·弗里
 德里希 (Hinckeldey, Karl Ludwig
 Friedrich 1805—1856)——271。
 辛利克斯, 海尔曼·弗里德里希·威廉
 (Hinrichs, Hermann Friedrich Wil-
 helm 1794—1861)——13。
 休谟, 大卫 (Hume, David 1711—1776)
 ——627。
 雪莱, 派尔希·毕希 (Shelley, Percy
 Bysshe 1792—1822)——587。

Y

雅科比, 阿布拉罕 (Jacobi, Abraham
 1830—1919)——275, 298, 303。
 雅科比, 约翰 (Jacoby, Johann 1805—
 1877)——20, 205。
 亚当 (Adam)——251。
 亚历山大二世 (Александр II 1818—
 —1881)——384, 659, 667, 675。
 亚契尼, 斯蒂凡诺 (Jacini, Stefano 1827
 —1891)——621。
 耶拉契奇, 约西普 (Jellačić, Josip 1801
 —1859)——204。
 伊壁鸠鲁 (Epikouros 约公元前 341—270)
 ——15—17。
 伊格列西阿斯, 帕布洛 (Iglesias, Pablo
 1850—1925)——559, 630。
 伊曼特, 彼得 (Imandt, Peter)——298,
 363。
 伊万三世 (Иван III 1440—1505)——
 334, 628。
 尤尔, 安德鲁 (Ure, Andrew 1778—
 1857)——289。
 尤维纳利斯 (德基姆斯·尤尼乌斯·尤维
 纳利斯)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
 生于一世纪六十年代, 死于 127 年以
 后)——264。

雨果, 维克多 (Hugo, Victor 1802—1885)
——265, 503。

约翰斯顿, 詹姆斯·芬利·韦尔 (John-
ston, James Finley Weir 1796—
1855)——618。

约克, 泰奥多尔 (Yorck, Theodor 1830—
1875)——583。

云格, 阿道夫·弗里德里希 (Junge,
Adolph Friedrich)——88, 135。

Z

扎斯拉夫斯基, 叶甫盖尼·奥西波维奇
(Заславский, Евгений Осипович
1844—1878)——630。

载勒尔, 塞巴斯提安 (Seiler, Sebastian
约 1810—1890)——113。

泽米希, 弗里德里希·海耳曼 (Semmig,
Friedrich Hermann 1820—1897)——
98。

泽特, 奥托·约瑟夫·阿尔诺德 (Saedt,
Otto Joseph Arnold 1816—1886)
——275。

贞德(圣女贞德) (Jeanne d'Arc 1412 左
右—1431)——629。

朱克斯, 约瑟夫·比特 (Jukes, Joseph
Beete 1811—1869)——618。

左尔格,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 (Sorge,
Friedrich Adolph 1828—1906)——
304, 426, 500, 563, 566, 567, 570, 573,
575, 577, 583, 594, 597, 600, 610, 614,
616, 643, 655—656, 658, 665, 680, 681。

期 刊 索 引

A

《爱北斐特日报》(《Elberfelder Zeitung》)——75。

B

《白鹰报》(《Der weiße Adler》)(苏黎世)——484。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里子、伦敦)——89, 90, 144, 152, 170, 171。

《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伦敦)——252。

C

《晨报》(《The Morning Advertiser》)(伦敦)——653。

D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巴黎)——39, 41, 44—49, 56, 62—63。

《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莱比锡)——30。

《德国现代哲学和政论界轶文集》(《Anekdoten zur neuesten deutschen

Philosophie und Publicistik》)(苏黎世、温特图尔)——22, 34。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140—141, 143—144, 146, 152, 156—157, 169, 172。

《德意志电讯》(《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汉堡)——44, 63。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159, 217。

《地球报》(《Le Globe》)(巴黎)——75。

F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231。

《法兰克福报和商报》(《Frankfurter Zeitung und Handelsblatt》)——586, 653。

《法兰西革命报》(《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巴黎)——643。

《蜂房报》(《The Bee-Hive Newspaper》)(伦敦)——476, 516。

G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52, 76, 151, 171, 193。

《改革报》(《Die Reform》)(纽约)——303—304。

《革命》(《Die Revolution》)(纽约)——263—264。

《公文集。外交评论》(《The Portfolio.

Diplomatic Review》(伦敦)——296。
 《共产主义杂志》(《Kommunistische Zeitschrift》)(伦敦)——140。
 《共和国》(《The Commonwealth》)(伦敦)——499。
 《国际报》(《L'Internationale》)(布鲁塞尔)——517。
 《国际先驱报》(《The International Herald》)(伦敦)——563。
 《国民报》(《National-Zeitung》)(柏林)——215。

H

《海盜报》(《Le Corsaire》)(巴黎)——573。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伦敦)——303—304。
 《红与黑》(《Rouge et Noire》)——589。

J

《激进报》(《Der Radikale》)(维也纳)——198。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伦敦)——252。
 《解放报》(《La Emancipacion》)(马德里)——541。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353。

K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74, 180, 214。
 《矿泉报》(《Der Sprudel》)(卡尔斯巴德)——585。

L

《莱比锡总汇报》(《Leipziger Allge-

meine Zeitung》)——30。
 《莱茵报》(《Rheinische Zeitung》)(科伦)——22—24, 25—33, 39, 45, 46, 53, 67, 145, 176。
 《莱茵观察家》(《Rheinischer Beobachter》)(科伦)——74, 141。
 《劳动旗帜》(《The Labor Standard》)(纽约)——655。
 《黎明报》(《L'Alba》)(佛罗伦萨)——189。

M

《马赛曲报》(《La Marseillaise》)(巴黎)——517, 524。
 《曼海姆晚报》(《Mannheimer Abendzeitung》)——23, 46, 74。
 《每日新闻》(《The Daily News》)(伦敦)——273, 531, 550, 573, 634。
 《民主工场报》(《L'Atelier Démocratique》)(布鲁塞尔)——144。
 《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见《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
 《民主周报》(《Demokratisches Wochenblatt》)(莱比锡)——500, 508。

N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280, 304—309, 321, 335, 340, 343, 380, 384—385, 388, 659。
 《纽约人民报》(《New Yorker Volkszeitung》)——656。
 《纽约时报》(《The New-York Times》)——306。

O

《欧洲通报》(《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彼得堡)——671。

P

- 《派尔-麦尔新闻》(《The Pall Mall Gazette》)(伦敦)——535。
《平等报》(《L'Égalité》)(日内瓦)——517, 519。
《平等报》(《L'Égalité》)(巴黎)——642—644, 678。

Q

- 《前进报》(《Vorwärts》)(莱比锡)——612。
《前进报》(《Vorwärts!》)(巴黎)——53, 62—65, 75, 76, 115。
《前进! 不定期评论》(《Вперед! Непериод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苏黎世、伦敦)——669。
《前进! 双周评论》(《Вперед! Двухнедель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伦敦)——669。

R

- 《人民报》(《The People's Paper》)(伦敦)——300—302。
《人民报》(《La Plebe》)(洛迪)——559。
《人民报》(《Das Volk》)(伦敦)——364—365, 376。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莱比锡)——516—517, 530, 568, 573, 599, 600, 611—612。
《人民论坛报》(《Der Volks-Tribun》)(纽约)——118, 120。
《人民事业》(《Народное дело》)(日内瓦)——521。
《人民之友》(《Der Volksfreund》)(维也纳)——232。
《人人权利报》(《Recht voor Allen》)(阿姆斯特丹)——630, 683。
《瑞士共和主义者》(《Schweizerischer

Republikaner》)(苏黎世)——45。

S

- 《社会革命报》(《Le Révolution Sociale》)(日内瓦)——558。
《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Jahrbuch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苏黎世)——638。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zialdemokrat》)(苏黎世)——639—641, 678, 684。
《社会民主党人报》(《Der Social-Demokrat》)(柏林)——480—482, 506—507。
《社会明镜》(《Gesellschaftsspiegel》)(爱北斐特)——75, 85。
《社会主义评论》(《La Revue socialiste》)(里昂、巴黎)——645。
《社会主义者报》(《The Socialist》)(芝加哥)——656。
《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The Sheffield Free Press》)——331—332。
《时代》(《Times》)(伦敦)——273, 549—550。
《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伦敦)——595。
《士瓦本信使报》(《Schwäbischer Merkur》)(斯图加特)——63。
《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 für Bürger, Bauern und Soldaten》)——220。
《司法通报》(《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彼得堡)——671—673。

T

- 《特利尔日报》(《Trier'sche Zeitung》)——54, 76。
《铁路报》(《Die Eisenbahn》)(莱比锡)

W

- 《威斯特伐里亚汽船》(《Das Westphälische Dampfboot》)(帕德波恩)——108, 120, 131。
《维干德季刊》(《Wigand's Vierteljahrsschrift》)(莱比锡)——95。
《未来报》(《Die Zukunft》)(柏林)——637。
《文学总汇报》(《Allgemeine Literatur-Zeitung》)(沙洛顿堡)——66—67。
《无产者报》(《Le Prolétaire》)(巴黎)——647, 649。

X

-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科伦)——231。
《先驱》(《Der Vorbote》)(日内瓦)——418。
《现代评论》(《The Contemporary Review》)(伦敦)——627。
《现代思想》(《Modern Thought》)(伦敦)——653。
《协和报》(《Concordia》)(都灵)——179。
《新奥德报》(《Neue Oder-Zeitung》)(布勒斯劳)——308—309。
《新道德世界。合理社会的报纸》(《The New Moral World: and Gazette of the Rational Society》)(伦敦)——46。
《新科伦报》(《Neue Kölnische Zeitung》)——见《市民、农民和士兵的新科伦报》。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136, 176, 178—205, 208—211, 215—216, 219—223, 225—231, 234, 240。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伦敦、汉堡)——239—241, 253, 255。
《新维也纳日报》(《Neues Wiener Tagblatt》)——681。
《新闻报》(《Die Presse》)(维也纳)——386—388。
《新英格兰报》(《Neu-England-Zeitung》)(波士顿)——276。

Y

- 《雅典神殿。德国知识界杂志》(《Athenäum. Zeitschrift für das gebildete Deutschland》)(柏林)——10。
《1841年人民报》(《Le Populaire de 1841》)(巴黎)——51。
《1845年博爱月刊。共产主义刊物》(《La Fraternité de 1845. Organe du communisme》)(巴黎)——76。
《1874年共和国年鉴》(《Almanacco Repubblicano per l'anno 1874》)(洛迪)——590。

Z

- 《正义报》(《La Justice》)(巴黎)——589。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4。
《芝加哥论坛报》(《The Chicago Tribune》)——585, 586, 634。
《自由》(《Freiheit》)(伦敦)——636。
《自由新闻》(《The Free Press》)(伦敦)——330。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26, 47, 74, 376。
《祖国纪事》(《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彼得堡)——671—673。

内 部 发 行

书号 11002·529

定价 2.55 元